

彭述之選集

第四卷

十月書屋



# 彭述之選集

第四卷

十月書屋

2010年





彭述之（左）與陳碧蘭（右）



## 出版說明

收入本卷的文章、通信或講話，是著者彭述之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八〇年所作的（除了附錄《評胡適之的實驗主義與改良主義》、《西班牙內戰與國際局勢前途》等文寫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之外）。

著者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離開上海到香港，但因遭到港英帝國主義者的搜捕，不能在香港居住和活動，被迫於一九五〇年一月前往越南，五一年七月轉赴歐洲；作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者的他，參加了第四國際的工作。這一卷刊出的著作、通信等論述，很大部份都是關於國際問題的。這方面的論述，表現出他對第四國際重新統一的強烈主張，對推進世界各國革命工作的熱心和努力，從而促成了第四國際在一九六三年六月的重新統一。

本卷所收入各文、信等的目錄初稿，曾經由著者本人過目，只有《中共黨內鬥爭與中國政局》和附錄 2 至 5 是最新加上的。

本卷前面的三篇通信（即：《論國際重新統一的必要》、《再論國際重新統一問題》、《關於統一中的一些問題》）、《關於平權委員會的決議草案》和附件《關於平權委員會的決議》、以及《中共黨內鬥爭與中國政局》，都是近幾年多方設法找到英文本新譯出的；後面幾篇關於拉丁美洲和葡萄牙的舊譯文或講話，則是著者在生時已譯出或記錄下來的。由於各篇譯文幾乎都是從中文譯成英文，再從英文譯為中文，所以只能保留原意，卻未必是原來的文字。

一九八〇年，著者在八十六歲高齡時，寫出了《國際對古巴問題看法的歷史演化》一文後，本來還要繼續執筆撰述

的，因而在《蘇聯一國建設社會主義與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鬥爭》的最後一行，還寫有一個小標題「中蘇衝突的原因及其後果」，但沒有最後完成。

綜觀著者一生，自一九二〇年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成爲中國共產黨黨員後，一九二九年接受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觀點而被中共開除黨籍，就一直爲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艱苦奮鬥。晚年健康惡化，終於不幸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病逝於美國。

本書得以出版，感謝張開、秋姐、張蓮、何水、蕭舟、張兄、丁言實等人各方面熱心協助。

# 目錄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〇年)

論巴布洛的修正主義和官僚方法	
——致加農同志的信（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廿八日）	1
對巴布洛主義的檢討	
——從巴布洛到柯克林、克拉克、麥斯特（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	21
論國際重新統一的必要	
——給杜勃士同志的信（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	49
再論國際重新統一問題	
——給杜勃士同志的信（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日）	54
關於平權委員會的決議（草案）（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七日）	61
附件：關於平權委員會的決議	
——國際委員會巴黎會議通過（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七至八日）	63
關於統一中的一些問題	
——給格里·希利同志的信（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67
關於保衛蘇聯及列寧的布黨的民集制原則問題的討論	
——答一位留日友人提出的問題（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七日）	72
第二次大戰後國際局勢的演化與第四國際的任務（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81
給錫蘭社會平等黨總書記古尼華道那同志的一封公開信（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廿七日）	100

爲暴露白恩斯癱瘓國際委員會阻礙統一給加農同志的信(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二日) .....	109
爲托洛茨基殉難第十八週年紀念致中國同志們的信(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 .....	131
從赫魯曉夫訪美反映出來的國際局勢及其前途(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	149
對蘇達的批評的批評(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五日) .....	157
關於古巴革命的決議草案(一九六一年七月) .....	172
關於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重新統一的意見和建議(一九六一年八月五日) .....	176
關於人民公社和中共及其政權性質的爭論(一九六二年) .....	198
白恩斯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往那裏去？	
——評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教派主義傾向的危險性(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四日) .....	206
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的形成(一九六四年四月) .....	250
中共黨內鬥爭與中國政局(一九六七年二月廿八日) .....	259
關於中國問題給國際執委會的信(一九六七年三月) .....	272
我們在中共內部派系鬥爭中應有的立場(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	277
爲第四國際重新統一和反希利的極端教派主義而鬥爭(一九六九年) .....	294
回到托洛茨基主義的道路(一九六九年三月五日) .....	305
關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代表少數派對世界大會作的報告(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六日) .....	319
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理論、政綱、傳統及其幹部的歷煉	
——又一次「對蘇達的批評的批評」(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	327

論「墮落的」和「變態的」工人國家與政治革命 ——評葉寧的修正主義傾向（一九七八年六月廿一日） .....	372
拉丁美洲游擊戰爭問題（一九七八年） .....	394
葡萄牙的革命問題（一九七八年） .....	401
蘇聯一國建設社會主義與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鬥爭（一九七九年） .....	407
闡析拉丁美洲國家的若干問題（一九七九年九月） .....	415
國際對古巴問題看法的歷史演化 ——兼評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關於古巴的意見（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六日） .....	424

## 附錄

（附錄 1）陳碧蘭：給劉毅同志的信（一九六一年四月廿九日） .....	440
（附錄 2）評胡適之的實驗主義與改良主義（一九三一年） .....	450
（附錄 3）怎樣去正確認識和領導目前的「紅軍」鬥爭（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 .....	467
（附錄 4）西班牙內戰與國際局勢前途（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廿二日） .....	475
（附錄 5）對於「新啓蒙運動」的檢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二日） .....	501
（附錄 6）歷史唯物論闡釋 .....	509



# 論巴布洛的修正主義和官僚方法

## ——給加農同志的信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廿八日)

親愛的加農：

早在本年初，我就想寫信告訴你：我來到這裏參加書記局後，所親身經歷到和看到以巴布洛為代表在組織上所表現的嚴重官僚主義及其政治上的修正主義傾向，勢將引起整個國際的危機。但爲了「謹慎」（這是那時馬尼厄魯這樣地勸告過我的），一直拖延下來，現在危機果然猛烈地爆炸出來了！因此迫得我不得不來寫這封已經延遲了的信。

我之所以要寫信給你，不但因爲你是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我們國際的領袖黨的創立者和一貫的領導者，而且曾經與托洛茨基親密地合作，完成了過渡綱領，創立了我們的國際，並在長期間領導了好幾次反機會主義、教派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勝利鬥爭。此外也是極重要的，你是從 KOMINTERN（共產國際）奮鬥出來，通過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它的上升時期及史大林操縱它的開始墮落時期，因而獲得了豐富而深刻的經驗——這對於我們的國際運動的維護和發展是一宗最可貴的教訓。我認爲以你的經驗及社會主義工人黨所具有的能力，與各國的真正托洛茨基主義者合作，可以挽救當前的危機。

最近你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工人黨所公開發表的《告全世界托洛茨基主義者的信》，在我們國際運動史上雖然是非常的，破例的，但爲搶救當前極度嚴重的危機卻是必要的。我可以憑我兩年餘來參加書記局的痛苦經驗來證明這個「非常

舉動」之必要和正當。

我在中國從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雖已有廿餘年，但由於我所處的環境之特殊，經常遭受諸種反動勢力之壓迫和迫害，以致常陷於孤立地位，很難與國際發生密切聯繫，無法參與國際的活動。自毛澤東黨取得政權後，我被迫離開中國而來到歐洲。因此，我曾抱著頗大的希望：一方面擬將中國近年來所發生的事變的經過詳細提供國際，共同商討，以期得出正確的決定，作為今後中國及東方落後諸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方針；另一方面，在可能範圍內貢獻我的經驗於國際領導機關，以協助它推進我們的運動。但兩年餘來的經驗證明：不但事實與我原來的願望完全相反，而且眼看著一個可怕的危機從書記局內醞釀，日在生長，越來越向各支部蔓延！這也是我極度感到困惱和痛苦而難於緘默的。

現在讓我將兩年餘來親歷的事實，按照時間的順序寫在下面：

第三次世界大會上曾成立了一個「遠東問題委員會」，實際上是專門討論中國問題，意在對這個重大的問題加以詳細的研討，提出決議以供大會討論和通過。我被推定為中國問題的報告人。但當我的報告尚未達成一半時，書記局派到該會議的主持人阿利，以「安全」為名，突然提議中途停止我的報告，並要求該會議通過以前有關中國問題的決議案（即國際執委會第七次及第八次會議所通過的決議）。我當時不但感到驚異，而且表示了憤慨的抗議。我聲言：遠東委員會是由大會產生的，大會高於一切，不能接受行將改選的書記局的命令中止。假如遠東委員會的任務只在通過以前的決議，那就根本不須要它。它的成立，原是要根據事變的發展和新的事實予以詳盡的討論而作出更正確的決定。同時我亦聲明：既然要我作報告，我不但有完成我的報告的責任和權利，

而且有權聽取到會諸代表對我的報告表示他們的意見（不管贊成與否），並得出一個多數贊成的結論，報告大會。由於我的抗議和絕大多數到會者對阿利干涉的反對，才勉強讓我將報告作完，但沒有經過任何討論，遠東委員會便結束了，事實上是流產了！

導致遠東委員會所以毫無結果，主要原因是由於書記局的負責者聽到我在第一次會議上的報告時，感到我的意見與他們原來的不一致，並怕我的意見影響到會的諸代表，所以不惜用命令方式中途停止我的報告。這從克拉克代替阿利出席第二次會議的「解釋」中反映了出來。克說：「書記局想不到會議有這樣的發展！」這意思就是說，想不到我的報告會發表與他們不同的意見。從書記局的負責者看來，好像大會產生的委員會，其任務只能用事實或論據來證明他們以前的決議或意見都是正確的，否則，便不惜用命令停止它的進行。

對重大的政治問題（那時到會諸代表都認為中國問題是當前最重大的問題）採取這樣專斷的態度和對大會產生的委員會表現如此的操縱，這是與布爾什維克的傳統遠不相符的。這是我來這裏後第一個不愉快的感想。

我對遠東委員會的不滿，巴布洛是感覺到了的。所以通過貝尼斯來向我「解釋」。在解釋中他將責任歸之阿利。並說巴是願意接受別人的意見的，希望我參加書記局同他合作，特別在東方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問題方面多負責任。我當時對貝的解釋雖然並不覺得滿意，但我還是十分誠懇地準備與巴等合作，以期盡可能為運動服務。

大會後不久，法國黨內多數派與少數派的分歧問題即重復發作了。這問題到去年初達到了危機點。當書記局的兩次會議上討論法國問題時，巴總是強調多數派領導份子的壞傾向如何不可救藥，必須採取嚴厲措施。我所表示的不變意見

是：多數派既包含有上 X 的黨員，且其中不少是重要產業工人，即令上層某些領導份子傾向不好，（我當時對多數派某幾個領袖亦有不好的印象。但現在我應當承認：我對他們的不好印象，只是因為那時過份信任巴及少數派對他們的描述所造成的。）但我們應當盡說服的責任，應盡量說服多數派同志，尤其是工人同志。為此，在法國黨內應該舉行一個普遍的政治討論。有必要時，將此討論擴展到各國支部中去。這樣，不但可以將雙方不同的政治意見劃分清楚，而且可以藉此提高一般的政治水準。假如政治上發現真正不可調和的分歧時，即令走到分裂也是不足為惜的。我這種意見並未遇到任何反對。但巴布洛是完全按照他自己的預定計劃去進行的。

所以巴於去年一月間出席法國黨的中央執委會會議時，即當場以書記局名義宣佈停止了多數派十六名中委職權。事實上，書記局並未曾有過停止多數派中委職權的決定。當時書記局五人中，有三人完全不知——格爾曼在 X，馬尼厄魯回國，我雖在 X 城，但巴事先絕未告知我。而且一國支部正式選出來的中央委員，即令他們在政治上犯了嚴重錯誤，甚至在行動上違反了紀律，也只有國際執委會才有權停止他們的職權，而書記局是沒有這種權利的。何況書記局並未作過這樣的決定！巴那次假借書記局名義停止多數派十六名中委職權，這就充分暴露他假借名義，任意破壞組織傳統的個人獨裁行動達到肆無忌憚的程度了！

當巴停止法國多數派中委職權剛發生後，格爾曼適從 X 國回來，找我談話，問我對此事有甚麼意見。我告訴他的大意是：法多數派的政治意見，還只限於策略上的分歧，而且又沒有經過普遍的討論。在此時採取組織措施是完全不當的。何況巴採取的措施又沒有經過大家的同意，是完全違反我們組織傳統的專斷行爲。格爾曼除表示同意我的意見之

外，亦告訴我：多數派的領袖是活動的，巴等以前曾極力稱讚他們，但現在竟突然把他們說成一文不值，而企圖完全排斥他們於運動之外了！他言下不勝憤慨。

爲了檢討巴停止多數派中央委員引起更嚴重的局勢，書記局曾召開了一次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可以說是去年二月執委會的預備會議）。在該次會議上，格爾曼、德國的 J，義大利的 L 和我，都一致反對巴所採取的措施。但巴還是強行爲自己辯護，說：在上次書記局會議上已經決定過「必須採取嚴厲措施」，應由上次出席書記局會議的人共同負責。但所謂「嚴厲措施」的具體內容是甚麼？在甚麼情形下採取？巴從來沒有說過。書記局當然不會對此有正式的決定。事實上也沒有這樣的決定。

但巴利用他自己曾經提出過的「嚴厲措施」作爲一個「代數公式」，並自以爲已獲得了大家的同意，任意將「數字」，即「停止十六名中委職權」填進去，這便愈益暴露了巴在有計劃地玩弄陰謀。

這次書記局擴大會議本應嚴肅地檢討巴任意停止多數派中委職權的錯誤所在，並追究其責任，才能夠替正確解決多數派問題開闢一條道路。但巴卻以威脅的態度極力阻止討論這些問題，轉而提議與多數派開談判，謀取妥協。即事實上取消對多數派中委的停職，成立一個多數派與少數派聯合的領導機關，以格爾曼代表書記局爲其仲裁，這便是二月執委會的唯一結果！這顯然是巴又在玩弄陰謀，以圖暫時掩蓋自己停止多數派中委職權這一荒謬舉動，再行徐圖報復。因此，使法國黨多數派的問題更陷於混亂而無法獲得正當的解決，以致弄到完全破裂，這是往後的結果證明了的。

看到巴對法國多數派問題上所表現的專橫舉動及其所玩弄的陰謀詭計，我深深地感到書記局在巴操縱之下，將會產

生可怕的後果。所以當去年四月初我到 N 城旅行時，曾與先在那裏的馬尼厄魯作了一次談話。（那時他的妻子 F 亦在座）我向他指出：由巴獨自停止法十六名中委職權一事看來，書記局本身已隱藏了極度嚴重的弱點，值得我們加以嚴重的注意。我們既失去了老托，便只有形成一個集體的領導，才能避免內部的危機而應付外來的事變。我當時認為巴還是不可少的，但不能讓他任意專斷。重大的政治問題和組織問題不但不能單由書記局解決，即執委會亦不夠，因為能夠出席執委會的人是有限的，必須徵求各國支部負責而有經驗的領袖們的意見（我曾指出你的名字為例），以此形成真正的集體領導。在我發表前面的意見之後，馬當面表示：他完全同意我所提出關於集體領導的意見，重新考慮法國多數派的問題，並擬於次日與巴作一懇切商談，以資徵求同意。但在次日馬與巴進行商談前，巴藉口一件小事，即向我進行一種專橫的挑戰，那時馬也在場。大概是馬看到巴這種無理挑戰的情形而取消了他與巴的懇談吧！

當我從 N 城回到歐洲時（去年五月中旬）巴即羅織了兩件罪名——「破壞國際信譽」和「自由行動」（意即違反紀律）——向我猛攻。他所舉的「事實」是：我同我的妻子在 N 城時曾在澳洲布萊特列夫婦面前詆毀國際，回歐洲後又在越南同志面前說國際的壞話；以及我們當時從一家旅館遷至另一住所，事先不告訴他。當我起初聽到巴這種莫須有的誣衊時，雖然十分憤怒，但仍是耐著性子通過我的女兒請求巴當面解釋誤會。但巴竟專斷地拒絕了她的請求，並聲稱：他「所指出的全是事實」。這樣我便深深地感覺到巴是有意地有計劃地誣衊我，企圖藉此摧毀我的信譽，以便進一步排除我於書記局之外。因此我迫不得已要求將巴誣衊我的問題提出於書記局會議上加以檢討。在書記局會議上，我根據無可爭辯的事

實，指出巴指責我破壞國際信譽完全是偽造，可以找布夫婦及越南同志作見證。關於「自由行動」更屬荒謬！因我在旅館裏付不出房租而被迫找越南同志幫助找尋最低價的住所，根本無事先告訴巴之必要。我要求關於他誣衊我的問題再用具體事實解答。他不但不能解答，反而大肆咆哮，並宣稱：「我是總書記，我有我的規律」。我告訴他：「總書記並沒有特權，我們的規律是民主集中制，絕不能由個人獨裁，任意誣衊和壓制別人。」最後由格爾曼提出一個關於我和巴糾紛的決議，其大意是：我沒有破壞國際信譽及違反紀律的事實，但巴也沒有誣衊我。這是一個兩面討好而不顧是非的滑頭的決議！我當時聲明我不能接受這樣的決議，我保留將來向上級會議的申訴權。

我認為書記局的總書記任意誣衊另一書記「破壞國際信譽」及「違反紀律」，絕非普通所謂「私人問題」，更不是「小事」，而是組織內極嚴重的有關組織和人事的問題，換句話說，這是以卑鄙的官僚主義手段排斥異己的最露骨表現，這在史大林黨裏雖然是常見的事，但在我們運動史上卻是空前的。

隨後，貝尼斯從英倫來告訴我的女兒，說他從獨立觀察的布萊特列詳細聽到巴的妻子在 N 城對待我們，尤其是對待我的妻子的暴虐行爲，實等於瘋狂，他十分同情我們。但說巴是誤聽了他的妻子的話，意在暗示我們不要堅持「申訴」。同時馬尼厄魯也極力勸告我，說我如將問題公開出來，巴勢必無法幹下去，但現在誰來代他。總之他勸我以不了了之。我爲了「顧全大局」，一直忍耐下來，但我始終認爲巴這次對我的誣衊不但是不可饒恕的，而且以他所處的地位來說是十分危險的。假如他有政權在手的話，他極可能作出史大林曾經作過的一切迫害行爲出來！

關於中國問題，自我初到此地迄至去年六月執委會十一次會議，這將近一年的中間，除了讓我在第三次世界大會及遠東委員會會議上作過報告外，在書記局內從來沒有提出過討論或交換過意見。甚至對中國問題的草案提出書記局會議討論，我也未被邀請參加發表意見——這種不邀請完全是非法地剝奪了我的書記局成員的權利。尤其是巴，當他在十一次執委會上發表意見之前，我從未聽到他對此問題所採取的立場，只是間接聽說：巴認為毛已完成了不斷革命論的諸要點，毛黨已是中派主義的黨，毛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而佛朗的意見，我更毫無所知。只有格爾曼曾和我私人交換過一些意見。但他自稱：在中國問題上，他的立場是最溫和的。這就表明書記局的領導層對於像中國問題這樣重大的政治問題，事先並沒有，或有意避免相互間（至少對於我）交換意見，共同商討，以期儘可能獲得比較一致而正確的意見作成決議，提交執委會去討論和通過；而只是在執委會上攻擊他們所認為錯誤的意見，取得多數通過，草草了事，由此我覺得書記局的負責者們絕不是在政治上誠意商討，謀取合作，而是故意地用各種手段打擊不同意見。尤其是巴，他在十一次執委會會議上竟公然強調說：中國有一派教派主義者，必須加以肅清！（這兩句話，在「國際公報」關於「第三次中國革命的報告與討論」專號所載的巴的演辭中是刪除了的。）他所指的教派主義者，當然是暗指我，意在威脅我，行將把我排除於國際之外。我雖然不致為他這種威脅所嚇倒，但由此又一次證明：巴是準備用對付法國多數派的手段來對付中國同志的。

關於《中國第三次革命》決議案的內容，想你早已知道得很清楚。我對於該決議案（即草案）的批評，即「對中國第三次革命決議草案的幾點修正意見」，也於兩月前寄給了

你，故我在這裏毋須多說。我只告訴你一點：關於決議案送到中國後，不但沒有使原來的紛歧意見獲得澄清，反而引起了更多的混亂和迷惑。從理論上和事實上反對決議案的同志們不必說，即贊成它的同志們，差不多每個人對它的解釋都不同，因而沒有可能依照該決議案作出一個多數同意的行動綱領。最糟糕的是：大家從決議案中都找不出或看不出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出路。例如有位完全贊成決議案的 F 同志說：「我們必須解散我們的組織，以便實際參加毛黨所領導的群眾工作」。這顯然是取消主義；另一位 Y 同志更坦白地宣稱：「國際決議案是對的，但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沒有前途」。這是十足的悲觀主義。這樣整個的組織在政治上等於解除了武裝，迷失了方向，因而在組織方面陷於無了無休的糾紛，日益趨近解體的邊緣。

當然，我並不是說，中國組織弄到這種危險地步，完全要由國際決議案負責。寧可說，主要是由於毛黨的勝利及其所加於我們的迫害的無比壓力——這種客觀局勢所造成。但國際決議案沒有給這種客觀局勢以合理的分析和解釋，替中國組織指出一個可信的前途和正確的路線，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因為該決議案乃是巴的修正主義和格爾曼的調和主義（主要是對巴調和）的混合物，其中除了充滿著理論上的錯誤，事實上的虛構和自相矛盾外，再加上對毛政權的特別美化和它的前途的幻想，因而便形成對史大林主義的強烈有力的妥協主義的傾向——我們同志中的取消主義和悲觀主義即導源於此。因此，我可以說，巴的修正主義，即對史大林主義的妥協主義，已在中國組織中引起了可怕的後果，這是值得大家加以高度的警惕的。

去年十一月間執委會的十一次執委會會議上，書記局讓我報告中國的組織情況（這是第一次），當我報告到毛政權幾年

來不斷地有計劃地迫害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的事實時，全會場大為震驚。義大利的 L 甚至起而質問：爲甚麼書記局以前不將中國同志被迫害的事情告訴各支部？巴在當時的緊張氣氛下便狼狽地起而聲辯稱：毛政權殺害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並非有意，而是誤會的，即誤當國特殺的；即令毛迫害托派是事實，也屬例外」。格爾曼則提出問題：「是在甚麼條件之下殺害托派？」我當時盡量根據一切事實和「條件」指證毛黨之迫害托派是由其根深蒂固的史大林主義仇視托派的老傳統，是完全有計劃地和有系統地企圖根絕托派。我並指出：毛之迫害托派並非「例外」，不久以前胡志明之殺害越南托派整個領導層，以及西班牙內戰中史大林黨格柏烏之殺害無數托洛茨基主義者，便是絕對不可否認的事實證明。巴此時卻反而質問我：「你是否因此取消了你所贊成的滲入史大林黨及其所控制的群眾組織內工作的政策？」我答覆他：「滲入史大林黨工作的政策，我們早在四年前，即從一九四九年開始，便已有計劃地在大陸進行了。但正因爲毛黨對托派的無比迫害，我們進行這一政策時必須特別嚴密，絕不可對史大林主義者抱有任何幻想」。我並當場警告 XX、XX 支部進行這一政策時，必須根據中國的教訓，重新加以嚴密的考慮和佈置。否則，將會引致毀滅的危險，這是執委會要負責的。總之，由巴這次代毛黨迫害中國托派所作的辯護，你可以看出：他對毛政權的美化和幻想達到了何等可驚的程度！

更壞的是：在今年二月初書記局的擴大會議上，當我將去年十二月廿二日及本年一月八日毛黨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逮捕托派的事實提出報告，並要求會議對此加以討論時，巴甚至表示拒絕討論。他說：「史大林主義者迫害托洛茨基主義者，這是 A、B、C，大家都知道，無須多事討論的。」我當時很憤怒地指斥他：「你就不懂得這個 A、B、C，否則，你

便不會在上次執委會的會議上替毛黨迫害托派作辯護了！」但巴還進一步說：「逮捕幾百個托洛茨基主義者，比起毛的革命成就來，算不得甚麼」。這幾句話同你們的西托爾區四個脫離運動的少數派贊成史大林主義者所說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對革命更爲有害」（這是引自舊金山給我關於「美國多數派與少數派」的簡略報告中的。）是屬於同一的範疇。這證明在「毛的革命成就的眩耀」之下，巴已完全離開了老托對於史大林主義迫害者的傳統立場，而替史大林主義作義務辯護了！

正在這時，我收到「國際公報」關於「中國第三次革命的報告和討論」專號英文版，我發見其中沒有我「對第三次中國革命決議草案的幾點修正意見」。因此，我在上面所指出的書記局擴大會議上質問巴何以不公佈我的文件？巴的答覆是：「你的文件已發表於『國際公報』的另一號」。隨後，我在所有的「國際公報」內卻找不出我批評草案的那個文件。這顯然是巴有意私下扣留了它。因爲我的文件無可爭論地指出了「中國第三次革命」決議案中的幾個最基本的錯誤：對「不斷革命論」的「修正」，「工農政府」的曲解，所謂「毛黨違背克里姆林宮意旨」的事實上的虛構，以及對「整個毛黨將轉變爲中派主義黨」的幻想等，都是「中國第三次革命」的報告者和參加討論者不曾根據理論和事實駁倒過我的。因而巴不惜私下加以扣留，將我批評決議案的文件在同志面前隱瞞起來。這純粹是史大林主義的官僚主義方法的典型表現，正是我們在廿五年前在開始墮落的共產黨內曾經堅決反對過，且是我們成立左派反對派的原因之一。但巴還不止於此。即當我質問他何以不發表我的文件時，他竟公然扯謊說已在別的「國際公報」內發表過了，這便是在官僚主義的專斷手段上再加上了說謊的欺騙！

在這裏應特別提出的是：自去年初我在法多數派問題上反對巴的專斷措施後，在這整整一年當中，巴除了在各方面用官僚主義手段盡量打擊我之外，並無形中取消了我參加書記局一切會議的權利；換句話說，在這一年當中，巴從沒有通知我參加書記局本身的任何會議。書記局的成員是執委會正式選舉出來的。但巴不經過執委會的討論和通過，竟私自停止了我參加書記局會議的職權。這顯然是一種最專橫最狂妄的官僚主義表現。

差不多在這同一時期中，我發見馬尼厄魯以另一種方式被排斥於書記局會議之外。即是：以被派至 X 工作為名，無形中剝奪了他參加書記局會議和工作的權利。但大家知道，馬是專門來參加書記局工作的。這就充分證明：巴為操縱書記局，便不惜用官僚主義的手法和陰謀，將美洲和亞洲的代表無形中排斥於書記局之外了！

另一方面，我已經約略知道克拉克在社會主義工人黨內進行著小組織鬥爭，反對黨的領導層（例如前年冬克發動了批評你的《到和平之路》的小冊子的鬥爭。）企圖奪取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導權。這顯然是巴在幕後指使的。因為我常常從圍繞著巴的人們中聽到：「克拉克是美國最好的領袖」，——這無異於在暗示：社會主義工人黨應該由他來領導。同時有一位留學在這裏的中國同志 H 親自告訴我：自去年春季以後，巴對他表示特別好感和信任，幾次向他提示：派他回中國去整理組織。H 表示：「我在中國組織內沒有地位和威信」。巴鼓勵他說：「你不要害怕，我們國際支持你，你大膽地去幹就行了」。H 從巴的話中已清楚地瞭解：巴不但很不信任我，而且十分仇視我，因而想派他到中國去特別進行小組織工作。當然，他是絕不願意幹這種勾當的，所以坦白地告訴我們。

我從前面所指出的一切事實中，已深刻地感到：巴顯然有一種修正主義傾向，特別是他用一切可怕的官僚主義手段把持書記局，並已著手在各支部內建立自己的小組織，企圖操縱整個國際運動。因此當馬尼厄魯離開此地最後來向我告別時，我曾經舉出一些事實坦白地告訴他：國際領機內已隱藏了一種極嚴重的危機，並在加速度發展。我希望他將此種意見轉告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導層，特別轉告你，及時加以警覺，以便設法挽救。當時馬對我的話雖沒有表示任何意見，但他答允一定將我的意見轉達給你及其他某些領袖們。

在去年五月初的執委會會議上，有兩件事情值得在這裏提述一下：(A) 在討論關於史大林死後蘇聯問題的決議案時，曾經引起了頗大的爭論。在爭論中，貝尼斯首先指出決議案的精神太過樂觀。從過去對南國事變過份樂觀的失敗中，我們應學得一點教訓。他並指稱：史大林主義黨還是史大林主義黨，我們不可對他大抱幻想。但巴對貝的演說卻加以威脅式的攻擊。其大意是：貝以一個負責的領袖絕不應發表反國際路線的意見。依照巴的意思等於說：他們起草的決議案都是合乎「國際路線」的，不容許有所懷疑或反對。這樣一來，他們對任何新發生的事變和重大問題所起草的決議，只須加以舉手通過就行了。任何對草案的懷疑和反對意見，都被認為是違反「國際路線」的。這正與史大林的「總路線」不容許批評的官僚主義態度一樣！(B) 在這次會議上，巴提出了改選書記局，理由是書記局工作人員不夠。所以另從英意選出兩人參加。這樣便正式排除了美洲和亞洲代表，書記局變成了ES（歐洲書記局）！從此巴算是「合法地」改選了書記局的成份，得以自由地操縱書記局，以便「合法地」佈置他排斥異己、篡奪國際的陰謀。

當五月的執委會會議時，我曾提出了兩個文件，——「上

海五個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呼籲」及我「致中共領導層的抗議迫害托洛茨基主義者書」，希望該會議略加討論和通過，以便公佈於各支部的公開刊物上，作一廣泛的援救中國被迫害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運動。但巴通過格爾曼告訴我：將這兩個文件交書記局會議去討論和決定。在書記局會議上（那次出席的僅巴和 F 兩人）我聲明希望我所提出的兩個文件，通過交各支部公開發表，並藉此作一援救中國被難同志的運動。巴與 F 都同意發表「五人呼籲」，但對於我的「抗議書」認為其中有不能同意的地方，希望在日後與我商討再決定。

但時間經過了四個月（從五月至九月），我還沒有看到「五人呼籲」被發表，因此，我懷疑巴又是私下扣留了這個文件，我才於九月初將這文件的副本寄給我們留美的一個同志 J，請其設法寄給美報，並代為查詢以前曾否從書記局收到它。我所接到答覆是：「絕對沒有」。由此，我知道巴又在玩弄詭計以欺騙我。至巴之所以玩弄欺騙手段以扣留這個文件，其用意是顯然的：（A）巴一向美化毛政權，如「五人呼籲」一經公開發表，便等於從根揭破了他的美化幻想。（B）巴早已在各支部，尤其是在美國宣傳中國托洛茨基主義為教派主義，逃離革命等等（這也是 J 告訴我的）。假如這個文件被發表，便不啻從事實上完全揭穿了巴是在有意造謠誣蔑。（C）巴害怕這個文件發表後妨礙他所強調的「滲入政策」的理想，即恐怕 XX、XX 等國的同志們從「五人呼籲」中看到毛黨對中國同志的殘酷迫害，而懷疑巴所理想的「滲入政策」，要求重加討論。

但巴之扣留「五人呼籲」，除了有意欺騙我及中國同志外，還犯了兩種不可饒恕的罪惡：（A）在客觀上是在群眾面前替毛黨隱瞞了它迫害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最具體而最可惡的事實。（B）使各國執行「滲入政策」的同志們，無法從

中國同志所受到的殘酷迫害中獲得教訓。這等於將他們放在危險地帶工作而不讓他們知道危險之所在。這正是所謂「駝鳥政策」！例如當 XX 同志準備回國執行「滲入政策」而召集一個會議請我去演講時，這個會議的主持人請求我不要將中國同志被迫害的事實告訴他們。我知道這是巴的授意向我暗示。我雖遵守了該主持者的請求，但我警告他：駝鳥政策是最危險的。

我的「抗議書」原是在去年十一月執委會會議上，由馬尼厄魯提議，經全體一致贊成請我寫的。其用意在藉此向國際間公開暴露毛黨迫害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作一宣傳，以便引起工人階級和進步團體的輿論界給毛的迫害行為施行壓力，或能阻止它肆無忌憚地繼續迫害。我為搜集最可靠的材料，至本年四月間才將「抗議書」寫成。這可說已經是太遲了，但巴藉口派人與我商討該書的內容，又拖延了兩個多月，（在兩個多月中 F 同我談了兩次，指出幾點不重要的地方和我爭論，當然沒有甚麼結果。）最後，七月初，格爾曼來同我談。他開頭便指責我的抗議書的形式寫得完全不對，必須重寫。依照他的意見，我在抗議書中首先應向毛黨表示完全擁護它所領導的運動，贊揚他的革命成就，不要多批評它，然後才提到他們迫害我們同志的事實和表示抗議。其次，格爾曼說在該書內所發表的意見與國際決議案大不相同。因而指為「無望的教派主義」。最後，他表示：書記局不能負責將這個文件給各支部公開發表。假如我一定要發表，只有由我自行送去發表。

格爾曼在這次談話中所表現的態度，與他以前對我的「溫和」或調和態度大不相同，頗令我驚奇，這完全是巴布洛式的。我早已知道絕對不願意我的「抗議書」向外公開發表，其原因大約與「五人呼籲」相同。至於這個文件在形式上是

否寫得「完全不對」，它的內容是否為「無望的教派主義」，現在既已在美報公佈出來，大家都已看到，自有公斷，我不想在這裏為自己辯解。但由格爾曼代表書記局的上級意見中可以看出一點：他們是希望我向毛黨呈上一個「頌揚表」，以便與之謀取妥協。巴等對於史大林主義的妥協主義傾向，從這裏又間接地反映了出來。

寫到這裏，將格爾曼兩年餘來態度的轉變順帶提敘一下，對於你瞭解他在書記局內及現時鬥爭中所起的作用，或者是不無幫助的。

我可以說，自我來到這裏同格爾曼接觸時起，我對他是最懷好感的。因為我看到他對工作認真和努力，對同志的熱誠與和善，在政治上的相當修養，對組織問題尚能尊重傳統，我曾認為他是我們運動中最有希望的新起的領導者之一。雖然我也看出他觀察問題缺乏深刻的分析，帶有象徵主義的特點，在重大問題上常表現動搖或調和主義的精神，並容易改變自己的主張……但我還是認為他在未來運動的經驗中可能改變這些缺點。所以當我初到此地的一個時期內，聽到巴周圍的人們對格爾曼作種種不利的宣傳，把他描繪成爲毫無獨立見解，甚至是「爲巴搜集材料的秘書」時（阿利語），我曾替他感到不平。當法國問題發生後，格爾曼表示反對巴的專斷措施時，我又親眼看到巴及法少數派領袖們對他猛烈的打擊，而代他感到難堪。因此我曾通過我的女兒向他致同情之意。他那時對她說：「假如這次沒有德意支持我，我是被打下去了！」也就正因為「有德意的支持」，所以巴隨即特別向格爾曼讓步，在對法多數派的問題上，推他代表書記局參加多數派與少數派的聯合領機，並以他爲「仲裁者」。這樣一來，格爾曼便被安置到與多數派正面衝突的首位，代巴執行了他自己曾經反對過的預謀！差不多同時，巴又推格爾曼起草中

國問題決議案，使他同我對立起來。從此以後，格爾曼在巴的「讓步」與「抬舉」（差不多提高他僅次於巴自己的地位）之下，便逐步放棄了自己的調和主義的立場，而陷進巴的官僚主義的圈套裏面去了。格爾曼今天完全站在巴方面來對抗你所領導的反修正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鬥爭，便是他在巴的圈套內不自覺地最露骨的表現。我至今尚爲他這種墮落行爲惋惜！假如巴這次沒有格爾曼的支持，即通過他拉攏德意領導層的支持，巴是無法硬幹下去，因而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從這一點說，格爾曼在這次鬥爭中所起的罪惡作用是帶有決定性的。總之，我根據兩年餘來觀察格爾曼的經驗，不能不作出如下的結論：格爾曼在許多方面，特別是在他的性格方面，都類似布哈林，他常在革命的良心與一時的權位之間搖擺。當後者獲得一時的滿足時，前者便被擱置在一旁了。要想格爾曼重新回到正統的托洛茨基主義方面來，只有當他的革命良心在將來發見巴的全部陰謀而覺到自己已陷於可怕的圈套時，才有可能。

你們黨內這次多數派與少數派的鬥爭，據說已進行了一年半以上，而且至五月全國委員會會議後，越來越激烈，越來越趨於分裂的邊緣。假如書記局的負責者真是爲運動的利益著想，他應當及時召集一次執委會的特別會議，檢討雙方分歧意見之所在，採取一個正確的立場，以便支援代表正確意見的一方獲得勝利。即令不如此，書記局至少應將你們爭論的文件送交執委會的委員們及各支部的領導層以便他們研究、討論，並發表意見和批評，從旁協助你們間鬥爭之合理進行。但巴所把持的書記局卻完全將你們鬥爭的消息及一切文件對執委會的委員及各國支部隱瞞起來。例如我，直至九月初才從我們留美的 J 獲得你們黨內鬥爭的簡單消息，隨後經過了 J 再從 F 同志方面得到美國「多數派與少數派」的簡

短報導，才略知雙方意見分歧的要點。假如沒有 J，我將完全被蒙在鼓裏。只有等到你們「告世界托洛茨基主義者的信」公佈後，才能獲知真相。因為在此以前，書記局的負責者們從沒有將你們黨內鬥爭的情形告訴過我。這就充分證明：巴等採取這種絕對封鎖的官僚主義手段，是含有一種不可告人的陰謀在內的。現在事實十分明顯：你們的少數派不但在政治上是巴的修正主義的擁護者和發揮者，而且他們在鬥爭中所採取的方法和破壞行爲，都是由巴在幕後指使和操縱的。換句話說，你們黨內這次鬥爭弄到這樣分裂的惡果，完全是巴爲了自己的小組織利益所促成的。

從前面所敘述的所親歷的一切事實，可以作出如下的總結：在政治方面，單就巴對毛黨及其政權所加上的美化及對它所抱的幻想，尤其是從他替毛黨迫害托洛茨基主義者所作的辯護看來，便不可爭論地暴露了巴的修正主義對史大林主義的妥協傾向。這一妥協主義已使得中國支部陷於極度混亂、迷惑、乃至取消主義和悲觀主義的解體邊緣。在組織方面，從巴假借書記局名義私自停止法多數派中委職權；任意排除異己，把持書記局，並通過書記局操縱執委會；在各支部私造派系，陰謀奪取領導權；私行扣留應發表，甚至應允發表的文件；乃至封鎖隔離，造謠誣衊，說謊欺騙；——這一切，都是我在廿五年前在史大林操縱的墮落中的共黨內所親身遭遇到和看到的，現在又在巴所操縱的我們國際的領機內重演出來了！這就充分證明：巴的官僚主義已達到了何等可驚的危險程度！！最近美、英黨內少數派所幹的分裂行爲，以及巴現時正在加緊進行的分裂整個國際的陰謀活動，僅僅是巴希圖篡奪整個國際的野心及其官僚主義之邏輯發展而已。

由前面所列舉的事實及其結論，我相信已可充分證明你

這次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工人黨所採取的「非常舉動」之「必要」與「正端」。

最近中國有位負責同志（他在政治上是大體同意你們的）寫信來問我：「何以社會主義工人黨不依照民集制在內部進行討論，爭取多數支持，便首先發表公開信號召各支部來驅逐巴？」像不瞭解箇中真相而懷抱這種天真合法觀念的同志們一定不少。現時巴及其擁護者們正在大肆宣傳：「加農所發表的公開信，是完全破壞了組織傳統，違反了民集制的紀律」。他們希圖以此迷惑和欺騙同志，而掩蓋巴自己曾經及現在仍在以官僚主義手段踐踏組織傳統和破壞民集制紀律的篡奪陰謀。因此，我在本月八日致中國組織的信中，對前面所提出的問題給了如下解答：

「上敍雙方的政治意見（指你和巴所代表的）雖然有如此嚴重的分歧，但假如書記局能保持合理的常態，還可以，而且應該盡量在內部進行討論，通過民集制來解決的。但現在異常不幸的是：書記局已完全為巴所把持或篡奪了。巴利用這個『合法機關』肆無忌憚地進行組織陰謀：在書記局內專橫地排斥了異己，在各支部內暗組自己的派系，企圖篡奪領導權或分裂組織。這便使得依照民集制的常態討論成為不可能。因而迫使加農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工人黨採取了現時這樣的非常舉動，公開發表《告全世界托洛茨基主義者書》，要求驅逐巴及其代理人於國際領機之外。這在我們國際的運動史上確乎是空前的，是一種帶革命性的舉動。但此種舉動之所以成為必需，除了打破巴的篡奪陰謀之外，還在爭取時間，搶救第四國際的運動，以便及時重新有計劃地有系統地加以調整和佈置，以應付日益迫近的新的世界大戰和革命局勢的到來。假如這次鬥爭拖延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才發動，那就將『噬臍莫及』了！」

但我亦應當指出：巴幾年來在國際領機中所進行的篡奪陰謀，及其為達成此種陰謀所玩弄的極度專橫而狂妄的種種官僚主義手法是早已在各方面或多或少暴露出來了的。我們國際及各支部的負責者們，沒有能及時加以警覺，予以嚴厲的監視、批評、干涉和制止，以致造成今天這樣極度危險而難於收拾的局勢！這是值得我們大家特別加以檢討與反省的。我們當中的每一負責者及一切正統的托洛茨基主義者，都必須從這次巴布洛事變中記取一個嚴峻的教訓！（關於教訓方面，假如你高興，我還可以提供一些材料和意見和你討論。）

最後，我要順便告訴你：我們中國的組織自接到《告全世界托洛茨基主義者書》後，它的領機——全國臨時委員會即舉行了好幾次會議，進行了最嚴肅的討論。結果，差不多全體一致（僅一人棄權）贊成你們公開信內的見解和主張，並表示堅決參加你所領導的這次反修正主義和反官僚主義的鬥爭。他們經過這次討論後，已恢復了原來的信心，開始從過去的混亂、糾紛和迷惘中解脫出來。他們現時正在一般黨員群眾中展開一個普遍的討論，以圖將一切基本問題依照正統托洛茨基主義的傳統立場重新加以檢討，以便獲得一致意見，重新團結向革命的道路前進。我認為這是你這次領導的正統托洛茨基主義者反對修正主義鬥爭過程中第一個具有樂觀意義的象徵。

謹致

熱誠的問候！

彭述之

## 對巴布洛主義的檢討

——從巴布洛到柯克林、克拉克、麥斯特

（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

巴布洛的修正主義和取消主義，不但在第四國際內部引起了政治上不可調和的對立，並已在組織上造成了世界大規模的分裂，這是我們運動史上一個空前的災難！因此，在現時開始進行重新統一運動之時，我們必須給它以全盤的和徹底的檢討與清算，以便我們的國際在一個正統托洛茨基主義的鞏固的思想基礎上獲得重新團結。

但當進行評論巴布洛的修正主義前，在這裡須先聲明兩點：

（一）對巴布洛主義的批評已發表了許多文件，如 SWP（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告全世界托洛茨基主義者書》和 LSSP（錫蘭平等社會黨）《對史大林主義興衰的決議》，第四國際《戰士報》（*Militant*）和法文《真理報》（*La Verité*）所發表的文章，以及國際委員會內部公報和法國 PCI（托派多數派）和社會主義工人黨等內部公報所公佈的文件等。在這許多文件和文章中，對巴布洛的政治上的修正主義和組織上的官僚主義曾給了詳細的揭露和抨擊。因此，本文不擬完全重複過去的批評，只是將這些文件和文章的內容加以綜合，選擇其有關巴布洛主義的基本觀念及其所引起的嚴重後果給以系統評述，便於同志們作進一步的討論。

（二）巴布洛輸入他的修正主義思想於我們運動中，與以前一切修正主義者（如盤納姆 Burnham、夏克曼 Shachtman）不同，不是坦白的、公開的和有系統的，而是隱藏地、碎片

地和語意雙關地偷運進來。尤其當他受到指責時，他往往簡單否定或詭辯，有時甚至利用托洛茨基的某些文句作護符，以便欺蒙同志。本文篇幅有限，故對巴布洛的一切詭辯遁辭和矛盾無法一一予以揭露和批評，而只就其主要思想的邏輯發展，尤其是他的擁護者們所徹底發揮的思想和行動上的表現加以評述而已。

### 「幾世紀的變態工人國家」

巴布洛於一九四九年末第一次公佈了他的「幾世紀的變態工人國家」的觀念（見一九四九年十月出版的《國際消息公報》內《論南斯拉夫的階級性質》第3頁），隨後於一九五一年初又重複它（見一九五一年二月至四月出版的法文《第四國際》（*Quatrieme Internationale*）《我們往何處去？》第46-47頁）。當其遭到某些同志們的指責時，（如比勒特輪 Bleibtreu 的《巴布洛往何處去？》）他並特別為文為這一觀念辯護。（見一九五一年六月出版的《國際消息公報》內《論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延續和性質》）。由此充分證明巴布洛的「幾世紀的變態工人國家」這一觀念，不但是他離開托洛茨基主義走上修正主義、取消主義的出發點，而且是他的全部修正主義的「理論根據」。他本人及其追隨者們往後所發揮的一切修正主義、取消主義的思想及其行動，都是從這一基本觀念或理論邏輯演繹出來的。因此特別值得評述。

實際上，所謂「變態的工人國家」乃是從一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就是：十月革命勝利後所成立的第一個工人國家，由於俄國本身的**經濟落後**，和沒有及時獲得西方先進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援助而陷於**孤立**，以致形成了史大林主義的、寄生的官僚層，剝奪了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力，

轉變了無產階級專政為波拿巴特獨裁，但同時尚保留十月革命所創造的國有財產制。因此，托洛茨基稱之為「墮落的工人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又因為西方先進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如法意等國）遭受挫折（這也是由於史大林主義的背叛政策），克里姆林宮官僚藉軍事官僚方法在東歐諸國所成立的「人民民主政府」，自始即剝奪了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力，但隨後又逐步排除資產階級於政權之外，並沒收其財產為國有。根據托洛茨基主義的傳統，可以稱此等國家為「變態的工人國家」。

但這些墮落的或變態的工人國家，絕對不能延長幾個世紀。而只能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的初期的一些特殊條件所產生的「暫時的和過渡性質的」（托洛茨基語）現象，因為蘇聯的經濟落後及其孤立這些特殊條件一經消失，就是說，蘇聯及東歐諸國的經濟發展達到先進國家的水準，尤其是西方先進國的無產階級革命獲得勝利，則蘇聯及東歐諸國的工人階級必然暴動起來推翻史大林主義的官僚獨裁，在一個更高的水準上恢復或重建工人階級的民主政權的。

像巴布洛判定「變態的工人國家，將延長幾個世紀」，這就等於承認史大林主義官僚層統治的蘇聯和東歐諸國將延長幾個世紀。同時也就是承認蘇聯和東歐諸國的經濟發展將要經過幾個世紀才能達到先進國家的水準，而西方先進國無產階級階級革命更是幾世紀以後的事了。這種思想比之「官僚集產主義」還要走得遠。假如真是這樣，則全部《過渡綱領》便變成毫無現實意義的空語了。這是何等荒謬的背離托洛茨基主義的一種極端的悲觀主義啊！

但巴布洛究竟怎樣為他此種極端的悲觀主義作辯護呢？他援引馬克思論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不能立即「發展共產主義」，「從舊社會的胎裡帶來的胎痣」（「birthmarks carrying over

from the womb of the old society to disappear」) 要經過相當長期才能消失，以及列寧說「完全過渡到共產主義」(complet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很難期待我們的下一代人」。最後他特別徵引托洛茨基的如下的話：「在資本主義國家裡窒息工人運動的官僚主義傾向，無論在何處，甚至在無產階級革命之後也會表現出來，」由此作出結論說：「因此在托洛茨基的精神裡（如果不是在他的著作底每一字裡）認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要經過整個歷史時期，充滿著官僚變態的過渡政制；而這不可避免的官僚變態（它有著經濟基礎），只當在革命征服了先進國家，以及生產力能達到和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時才能夠消失。」（見一九五一年六月《國際消息公報》第一一至一二頁）因而很驕傲地宣稱：「我相信我在我的兩篇文章（即《論南斯拉夫的階級性》及《我們往何處去》）裡寫的關於過渡時期的可能的延續和性質是完全符合於托洛茨基論這些問題的真實意見的。」（同上引一二頁，粗字體原有。）這就是說，巴布洛「相信」他新發明的「幾世紀的工人國家」或「佔據整個時代的」「官僚主義的變態的過渡政制」，是「完全符合於托洛茨基論這些問題的真實觀念的！」

巴布洛在這裡的詭辯，除了將馬克思所謂的「胎痣」和列寧所說「不能期待我們下一代人完成共產主義」與「變態的工人國家」混成一談外，便是故意把托洛茨基所指出的一般的「官僚主義傾向」與特殊條件下產生的「變態的工人國家」等量齊觀。但托洛茨基在巴布洛所引的同一著作中卻明白地指稱：「無產階級專政是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橋樑。因此在本質上，它具有暫時的性質，而實現專政的最基本的任務，就是專政自覺地準備自身的消亡。」（《被背叛的革命》五二頁）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既是帶著「暫時的性質」，怎麼能說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初期，由於國家的「經

濟落後」和「孤立」的特殊條件而產生的變態工人國家怎會延長幾個世紀呢？

托洛茨基在《保衛馬克思主義》（第七頁）中更明確地寫道：「在蘇維埃國家的官僚主義墮落中，表現出來的不是現代社會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一般規律，而是在一個落後的革命國家處於一個資本主義環境中的情形下，上述規律的一種特殊的例外的和暫時的反映。……但上述的官僚層萬能的兩個條件——本國的落後性及帝國主義的包圍——卻具有一種暫時的和過渡的性質，而且由於世界革命的勝利必然消失。」（粗字體係本文作者所用）假如承認「變態的工人國家將延長幾個世紀」，不但等於承認「蘇維埃國家的官僚主義的墮落乃是「現代社會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一般法則」，而且巴布洛自己前面所說的「革命在先進國的勝利與生產力達到並超過最先進資本主義的水準」，也須「經過幾個世紀」才能實現了！

但巴布洛根據他這種新發明的極度悲觀的「幾個世紀的變態工人國家」的理論，最後卻以「莊嚴的口吻」教訓我們說：「這樣地堅持過渡時期的可能延續和性質究竟有什麼實際上的重要性呢？首先是用以武裝我們的幹部，使他們有歷史的展望，善於估量和避免失卻耐心和陷於印象主義的能力；其次是賦與他們能掌握處在我們目前時代的革命的發展的真正和具體的表示形式，避免受任何定形的思想阻礙。」（同上引文一二頁。）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巴布洛早在一九四九年末，至少在一九五一年夏（即他寫前面這篇文章的時候），便決心以「幾世紀的變態工人國家」這一「歷史遠景和達到目標的清楚概念來武裝我們運動中的共產主義幹部了。」這是我們今天評論巴布洛的修正主義、取消主義時應予以特別注意的。至於他以這一「歷史遠景」所「武裝的幹部」究

竟如何，留在後面再說。現在讓我們進一步評論他對「我們時代的革命發展」的「真實而具體的表現」。

### 「新的現實」

巴布洛及其擁護者往後所特別強調的「新的現實」(new reality)，便是「我們時代的革命發展之真實而具體的表現」這一公式之翻譯或簡稱。他們幾年來曾強調他們是如何把握了這一「現實」，並不斷指責別人（尤其是柯克林派指責 SWP 的領導層）不瞭解它，「仍然生活在過去的時代裡」，因而陷於「教派主義」等等。因此，我們可以說，假如「幾個世紀的變態工人國家」是巴布洛的修正主義的「代數公式」，則「新的現實」便是他的「數學內容」。巴布洛及其擁護者們的一切「現實的政治」或新路線都直接導源於此。

但究竟什麼是「新的現實」或「我們時代的革命發展之真實而具體的表現」呢？巴布洛在一個頗長的時間內還只是給它一些抽象的和模糊的描述，並沒有「具體地」指出。因此，曾令人猜疑不定。最後，在事變的壓力之下，尤其是在史大林死後局勢的推動之下，巴布洛才將他宣傳已久的「新的現實」的畫圖在他們的《史大林主義的興衰》草案裡第一次向我們清楚而具體地展示出來。

這個草案劈頭便說：「一九一七年以來蘇聯和世界工人階級的演化，主要是取決於全世界的階級關係的動力。這個運動經過了如下三個主要時期：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三年的世界革命的興起；一九二三到一九四三年的世界革命的退潮；一九四三年以來的新的革命的興起。」根據這三個時期的機械的劃分，草案的第二個時期（即史大林主義在革命退潮中興起的時期）與第三時期（新的革命興起的時期）作了一番對比的描述之後，得出結論說：「蘇聯官僚緊握著各共產黨的

發展，稱之為革命的退潮，蘇聯的孤立和經濟的落後這些基本條件已經消失了。」（《史大林主義的興衰》第三頁）但這個「結論」之與客觀事實真相不相符合，或遠離「現實」，SWP根據不可爭論的客觀事實對它已作了頗為詳細的批評，（見一九五三年九、十月號《第四國際》九九至一〇一頁）請讀者去自行參考。這裡僅著重指出以下三點：

（1）草案所指出的「新的革命興起」的事實，僅限於某些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落後國家（如南斯拉夫、中國及其他殖民地等），而完全忽視了先進國並無真正革命的上升。依據托洛茨基主義的傳統見解，只有先進國的革命興起和勝利，才是史大林主義真正解體的「基本條件」。至於落後國家革命的興起乃至勝利，我們必須加以辯證的理解，就是說：這些國家（尤其是中國）的革命勝利的發展，對帝國主義無疑地給了最嚴重的打擊，但對蘇聯史大林主義官僚層卻是矛盾的：它們一方面固然多少鬆懈了克里姆林宮對這些國家的革命運動和共產黨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它們又在蘇聯及全世界的群眾中多少提高了史大林主義的權威，因而暫時緩和了後者的解體過程。

（2）根據托洛茨基主義的同一傳統見解，蘇聯「孤立」的真正打破，只有一個或幾個先進國的工人階級走上革命的勝利才有可能，上次大戰後，蘇聯對東歐的佔領和落後國家革命運動的勝利，固然鬆懈了帝國主義對蘇聯的包圍。但另一方面，正因此使得所有的帝國主義國家在美帝領導之下團結一致，在全世界範圍內建立了對蘇聯及其控制國的「包圍網」，並在準備以新的原子彈戰爭來摧毀它們，要徹底打破這種「包圍網」和「原子彈戰爭」的威脅，也只有先進國工人階級革命的興起和勝利才可想像。

（3）由於十月革命所創立的國有財產制，經過幾個五年

計劃的建設之後，蘇聯的經濟確已逐步接近先進國家的水準，多少改變了它的落後性，並多少改善了一般群眾的生活，提高他們的文化，這對於未來摧毀史大林主義，無疑是一非常重要的因素。但由於史大林官僚層對計劃經濟的歪曲，不但使農業經濟遠落在工業經濟之後，而且使生產一般群眾所必需的消費品的輕工業遠落在重工業之後，再加上官僚的特權享受和浪費，以致一般工人和農民群眾的生活仍然停留在貧困狀態中（至少與官僚生活比較是如此）。因此，托洛茨基所指出的：「消費品的及為獲得這些消費品的普遍鬥爭產生出僭取分配作用的警察來。」（《保衛馬克思主義》，第七頁）這一「基本條件」並沒有本質上的改變，只是量的變化而已。

「因此，對世界局勢的過去十年的嚴肅分析，就會發覺構成蘇維埃官僚興起的三個主要原因並沒有基本改變，而只是某種程度的變化。克里姆林宮處在新的，但並非決定性地不同的環境中活動。它的壽命能延長多久，將依賴於世界範圍和蘇聯境內的活生生的鬥爭力量，以及在鬥爭中出現一個能領導蘇維埃群眾起義反對統治階級的托洛茨基主義政黨。」（同上引《第四國際》一〇一頁）這才是符合於分析戰後局勢發展的客觀「現實」的唯一正確的結論。

此外，我們還須指出一點，巴布洛從戰後「新的現實」所作出的極度樂觀的結論，表面上似乎與其「幾世紀的變態工人國家」的極度悲觀的理論不可調和。但實際上，前者正是後者的邏輯發展或具體化。因為巴布洛所謂「史大林主義興起的三個基本條件已經消失」，並不是指蘇聯工人階級推翻史大林主義官僚獨裁的政治革命及世界工人階級，特別是先進國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的條件已成熟到有保證的程度，而只是「證明」史大林主義官僚層在客觀「基本條件」的改變與「群眾壓力下」不得不逐漸「讓步」、「解放」或「改

正」自己，以此去適應革命的需要。這對於托洛茨基主義的歷史作用顯然是極度悲觀的。

現在讓我們進一步來看巴布洛從「新的現實」中所得出的有關於我們運動的戰略性的「新的政治結論」吧。

### 官僚層的「自我改良」代替了群眾的「政治革命」

《史大林主義的興衰》草案裡說：「從歷史上來說，馬林柯夫時代顯示了波拿巴特式的專政的開始衰落。這種制度現今只能以壓制來維持……」這意思就是說，「馬林柯夫時代的政權」必須以「讓步」或「改良」來「維持」自己。所以巴布洛在《史大林之後的新路向》一文中，列舉了馬林柯夫各種「讓步措施」之後，在「新轉向的動力」的標題之下宣稱：「他們的讓步底動力，就是在蘇聯自己國內，及其與衛星國，中國和其他共產黨，在事實上完全取消史大林主義的遺產。要反復過來再不會容易了……當讓步一旦擴大，步向真正取消史大林主義的政權的威脅就成爲不可抗拒。」（一九五三年三——四月號《第四國際》六頁，著重線是本文作者所加）。

「走向史大林主義政權的真正取消」既已「變成不可抵抗」，問題僅在於經由「什麼形式」。所以巴布洛對此提出了如下的問題：「會不會在官僚內部出現爲了維持現況——要不是爲了回潮的話——的一派，和日益地受到群眾的巨大的壓力所驅使的另一派之間發生急劇的危機和猛烈的鬥爭？」（同上引文）

巴布洛沒有答覆自己所提出的問題，但問題提出的本身的意向已很清楚。正如 LSSP 所批評：「上述文字從蘇聯官僚對群眾的讓步的過分樂觀的評價出發，提出了一種展望，以爲官僚內部的鬥爭能夠把史大林主義制度真正取消。這同我

們認為（史大林主義的真正取消）是群眾與官僚層間的鬥爭的觀念大相徑庭……群眾的角色是對官僚的的壓力作用。這種展望放棄了托洛茨基主義的政治革命，即由群眾鬥爭推翻官僚來恢復社會主義民主的觀念。」（一九五四年 LSSP 內部公報第六頁）

對於前面的同一問題，克拉克（Clarke），巴布洛思想最密切的合作者，更以如下的方式提出：「這個過程會不會以蘇聯境內的群眾暴動反對官僚這個方式？還是對群眾讓步和分享政權——就像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在興起的資產階級和沒落的貴族之間的鬥爭的漫長的政治革命時期一樣——逐漸挖空了官僚層的基礎？又或許這演化採取了上述兩種形式？今天我們不能預言。」（《第四國際》一九五三年一——二月號）

克拉克同巴布洛一樣，只限於提出問題而避免答復。但他提出問題的本身卻同樣明顯：他已預見到「官僚與群眾分享政權逐步地摧毀官僚基礎」的前途。但：「由克拉克加以發展的觀念，即孤立克里姆林宮能夠與蘇聯人民『分享權力』，是向蘇聯必須政治革命這個綱領和托洛茨基主義對官僚寄生階層的本質和作用的觀念挑戰。」（一九五三年九月——十月《第四國際》第一一一頁和一九五三年三月——四月《第四國際》第五七頁。）同時，由克拉克援引：「在漫長的資產階級革命中興起的資產階級和沒落的貴族的政治關係」，與官僚和群眾「分享政權逐漸地摧毀官僚的基礎」這一類比看來，「幾個世紀的變態的工人國家」的「歷史遠景」，在這裡又看到它的具體的運用！

總而言之，無論是巴布洛推翻史大林主義官僚專政的希望寄托在官僚的自我糾正（經過統治層內部的鬥爭），或克拉克將這同一希望寄托於官僚的讓步與群眾分享政權上，其結

論是同樣的：**蘇聯官僚的自我糾正或自我改良將代替群眾的政治革命！**

但托洛茨基卻堅決地指示我們：「這個危機不會有和平的出路。沒有自動拔去利爪的魔鬼。蘇維埃官僚不會未經戰鬥而放棄其陣地，發展顯然地引向革命的道路。」（《保衛馬克思主義》）巴布洛和克拉克希望蘇聯官僚層自我改良來取消史大林主義，這就等於幻想「魔鬼自動拔去其毒爪」或撒旦變成耶穌！

### 由對世界革命的背叛轉變為與它聯盟

巴布洛及其追隨者既已判定蘇聯官僚層在國內的政策是愈來愈向群眾讓步，逐漸地改良自己，與「群眾分享政權，逐漸地摧毀官僚主義的基礎」。根據「對外政策是國內政策的延續」，巴布洛便在《史大林主義的興衰》草案裡宣稱：「新的局勢將越來越多地約束了官僚玩弄反革命手段的能力。」和「這些試圖的**實際效果**（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爭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某些資產階級的支持，去與帝國主義國家達成暫時的和局部的協定）已變得愈來愈有限和短暫。」（草案第十頁）

既然「官僚層與帝國主義密圖妥協愈來愈受限制和短暫」，其邏輯的結論便只有與世界的革命謀取聯盟。所以草案說：「處在帝國主義的威脅和殖民地革命之間，蘇維埃官僚覺得自己不得不與世界革命聯盟來反對前者……一般地以殖民地革命為本錢與帝國主義作交易的圖謀必須放棄了。」這就是說：「至少這在殖民地革命方面說，官僚已經『放棄』它過去把世界革命出賣予帝國主義的政策。」（同上 LSSP 決議草案內部公報六頁）

官僚層之放棄對世界革命的反動政策，在巴布洛看來並

不限於對殖民地國家。他早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國際執委會第十二次會議上的報告即已宣稱：「今天的客觀條件已根本不同了，不管官僚層的欲望是怎樣，在實際上他們將提出另一種路線來。」「各共產黨的領導層似乎認為關於它們的主要方針，不是與各自的資產階級聯合反對美國，相反地，是史大林（在蘇共第十九次大會）的閉幕演說上所包含的意見：資產階級已經確定地完全是『反動的』和『反民族』的了；因之他們認定自己為『新的突擊隊』（'new shock brigades'），其任務和遠景是在各自的國家內效法蘇聯共產黨一樣奪取政權。」

由巴布洛前面的話所得出的結論便只能是：「蘇維埃官僚已將自己與帝國主義國家的革命聯在一起」「可能的前景是蘇維埃官僚在實際上不得不放棄自己與帝國主義內取得均衡的種種叛賣政策；就是說，在帝國主義的威脅和世界革命的夾攻之間，蘇維埃官僚將把自己與世界革命聯在一起。」（見上引 LSSP 內部公報一九五四年四月第七頁）

### 各共產黨在群眾壓力下轉變為領導革命走向勝利的黨

蘇聯史大林主義官僚層在群眾壓力下既可以自我改良來代替群眾的政治革命，根據這同一「理論」，則各國共產黨便更可以因群眾壓力而改良自己，走向領導革命奪取政權的道路。

所以《史大林主義的興起與衰落》草案說：「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覺得自己已處於與戰前時期絕對不同的條件下。」這裡所謂與戰前絕對不同的條件就是：「在它們的國家裡向著革命鬥爭的方向發展起來的群眾運動的巨大力量繼續增高地自我宣示出來；與莫斯科的關係鬆懈了……」由此得出的結論就是：「在多數工人是共產黨員的國家裡的共產黨，

在群眾的壓力下，毋須拋棄從史大林主義遺傳下來的政治和理論的包袱，也能夠制訂出對於克里姆林宮指令的革命方針。共產黨會這樣做，完全是群眾的壓力」。群眾一直在尋找一個新的時期，利用政黨來滿足他們的願望；他們比過去對黨領導有更多的批評，也不再會不管結果而追隨黨的任何轉向……現實發生的，不是群眾的共產黨的組織上的分解，而毋寧是各黨內的史大林主義思想，以及從克里姆林宮到這些黨的隊伍的官僚主義關係的分解、分子化……」（《史大林主義的興起與衰落》草案第三四到三五頁）

前面的一段話已明顯地表示出：群眾的共產黨，在群眾的壓力下，將逐步向左轉，逐步放棄史大林主義的觀念以適應群眾願望的革命立場。這一思想，與前面所引過的巴布洛在國際執委會第十二次全會的報告中的話配合起來，更顯得清楚而確定。因此，LSSP 替它作出了如下的邏輯的推論：「倘若這個聲明是正確的話，這就是說：各共產黨已經從尋求和本國資產階級聯盟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階級合作政策，改變為基本上是革命的前景，即奪取政權，反對資產階級。」（LSSP 內部公報第八頁）

蘇聯官僚的自我改良代替了群眾的政治革命，它的對外政策由背叛世界革命轉變為與後者聯盟，以及各國共產黨在群眾壓力下領導革命奪取政權，——巴布洛對於托洛茨基主義這三個戰略性問題的修正，其在理論上的荒謬和歪曲及事實上的牽強附會，SWP 根據托洛茨基主義的傳統及客觀事實，已對它們作了詳細的分析和批評，我無須重複，請讀者去參考一九五三年九——十月號第四國際一〇一至一〇七頁，這裡僅引出 LSSP 對上述三個基本問題的總批判如下：「上述所討論的三個要點有著邏輯上的內在聯系。將它們連在一起，就會得出一個主導的觀念；就是說，在這世界革命上漲

的時期內，蘇維埃官僚已放棄謀求和帝國主義取得持久的妥協；群眾的共產黨裡的史大林主義領導在群眾的壓力下被推向革命的道路。這種觀念不僅導致對托洛茨基主義關於史大林主義的立場的基本修改，而且否定了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為其繼續獨立存在之一切辯護的理由。」（同上 LSSP 內部公報一九五四年四月第七頁，著重點系本文作者所加）

### 巴布洛主義在實際上的運用

巴布洛的修正主義和取消主義的理論和政綱既已如前面所述，現在讓我們來看它在實際上的運用。底下的幾個例子可以說是最典型的。

一九五三年六月東德的暴動，這是史大林在蘇聯篡奪政權以來，第一個無產階級暴動起來企圖摧毀史大林主義官僚及其代理人的最偉大的事件。它對於全世界工人階級，尤其對於托洛茨基主義者具有最重大的政治意義：它第一次以事實證明，「以被壓迫的群眾暴動推翻史大林主義官僚的政治革命」，是絕對符合於現實需要和不可避免的。我們應以此去提高全世界工人階級，特別是蘇聯及其衛星國的工人階級的信心和勇氣。但巴布洛派不但沒有這樣作，反而說：「……蘇聯領導人、各種各樣的人民民主黨和各共產黨的領袖們，再不能曲解和無視這些事件的深刻意義了。它們一直無法不沿著更廣泛真正的讓步的道路走，以避免永遠與群眾的支持隔離開來，及避免挑撥起更巨大的爆炸。從今開始，它們不能夠半途而廢了。它們將被迫施行一些讓步，以避免在最近將來的更大爆炸；可能的話，還會以『冷淡的姿態』造就出一種從目前過渡到群眾更能容忍的形勢。」（第四國際書記處文告）這充分證明巴布洛派從他們的修正主義的觀點，在東德六月暴動事件中所看到的只是史大林主義官僚層將愈來愈向群眾

讓步，愈益趨於改良自己以避免「政治革命」而已。（請參考一九五三年九、十月《第四國際》一一〇至一一一頁）

一九五三年八月法國的總罷工，是工人階級為政權的鬥爭開啓了一個最有利的局勢，是戰後法國社會危機的一個轉捩點。但正式領導的社會黨和史大林黨卻完全背叛了這個運動。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正應藉此儘量暴露社會黨，尤其是史大林黨領導層的這種可恥的背叛，以此喚醒它們控制下的革命分子及整個工人階級的階級覺悟，為下一階段的鬥爭作準備。但巴布洛派除了指責社會黨的背叛外，對於史大林黨則以「缺乏政策」去掩蓋在克里姆林宮外交政策下維持資本主義現狀的背叛行為。尤其可恥的是：當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戰士們（PCI「法國托派多數派的同志」）以其正確立場在雷諾廠的工人群眾中與史大林主義者的背叛政策鬥爭時，巴布洛派竟散發傳單，公開在工人群眾中指責他們，誣詆他們是因違反紀律被第四國際開除的分子，以此幫助了史大林主義者藉以掩飾其背叛行為（參考 SWP《告全世界托洛茨基主義者書》）

越南的解放戰爭，近年來已逐步勝利，尤其在奪取了奠邊府之後，事實表現可能驅逐法帝國主義於越南之外，達到完全的獨立。但克里姆林宮官僚為了自己的外交利益，竟在日內瓦會議上與帝國主義一起決定「越南停戰與自由選舉」，以此為籌碼與法帝國主義謀取妥協。這是蘇聯官僚層又一次最明顯的對殖民地解放戰爭的新背叛。但巴布洛派，不但不提出「撤退帝國主義的軍隊和革命自由發展」的主張，反而公然贊成「越南停戰與自由選舉」的背叛政策。（見巴布洛派國際書記處一九五四年四月九日的通訊）

「聯合國」與「國際聯盟」一樣，是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帝國主義所把持的分贓機關和壓迫革命的工具。根據托洛

茨基主義的傳統，我們應不斷地利用各種機會暴露它的帝國主義強盜性和反革命作用。但巴布洛派竟公然擁護「人民民主的中國」加入聯合國。（見《中國第三次革命決議案》）這是在全世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面前散佈和加深對聯合國這個分贓與反革命機關的幻想。

「原子武器的禁止」問題與一般的「裁軍」問題一樣，是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的幻想，其主要作用在欺騙工人階級，癱瘓他們的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革命鬥爭。沒有世界工人階級革命的勝利，原子武器的廢止或一般的裁軍是不可想像的。但巴布洛派不揭破此種和平主義者的欺騙與罪惡作用，不提出工人階級以革命徹底摧毀戰爭基礎的主張，反而跟隨在史大林主義者之後，大彈其「禁止原子武器」的和平幻想曲。

從巴布洛派對史大林主義官僚關於前面所指出的這些大事件和問題上所採取的政策之辯護與附和，充分證明他們已完全離開托洛茨基主義的傳統立場，而變成爲擁護史大林主義的一個左翼了。

### 公開否定《過渡綱領》

從前面所指出的「幾世紀的變態工人國家」，「蘇聯官僚的自我改良代替政治革命」及其「由對世界革命的背叛轉變爲與之聯盟」，「各共產黨在群眾的壓力下逐步轉變爲領導革命奪取政權」，以及對「聯合國」與「和平」「廢止原子武器」等實際問題上所採取的純機會主義態度——這些明顯地證明巴布洛已經否定了我們的《過渡綱領》。

但在巴布洛進行其修正主義和取消主義的頗長的時間內，雖然是極力避免提到《過渡綱領》，卻還沒有公然否定它。迄至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法國黨中央委員會全會上討論對史大

林黨的策略時，多數派質問巴布洛是否放棄了《過渡綱領》，巴布洛才被迫作出聲明：「今天的史大林主義運動客觀上被處於一個新條件中，冷戰，與帝國主義的衝突將導致決定性的一役的前景，使它不得不可行動，而且這行動已經開始了。沒有人能夠否認史大林派在目前的行爲。從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七年，他們對和平共存曾抱有幻想。我們願意與抱有這種理解的同志討論，他們會把寫於完全不同時期的《過渡綱領》放在一邊。戰爭以來的事故是巨大的。新事物產生了。馬克思主義思想要在《過渡綱領》的字裡行間尋求庇護，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不能接受的。」這是逐字援引在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準備特別大會出版的《真理報》第一期，巴布洛於一九五二年初在法國黨中央全會上的聲明記錄。

巴布洛聲明在我們討論對史大林黨的策略時，必須「把寫於完全不同時期的過渡綱領放在一邊」，這就等於說，我們的過渡綱領已經過時，再也不適用於「新條件」或「新的現實」了！

在美國黨的公開信對巴布洛修正主義的攻擊下，巴布洛對《過渡綱領》的否定顯得更清楚：「他們（指加農等同志）還停留在一九三八年的政治圖式和純粹『正統』的想法上……他們還以一九三八年的態度對待史大林派的組織、運動和蘇聯……所有這些預測的成份和正確的政治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歷史進程下被推翻了。」（摘自法國黨少數派機關報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號《工人的真相》「La Vereté des Travailleurs」）

巴布洛在這裡所指的「一九三八年的圖式」，無疑是指第四國際成立大會上通過的過渡綱領。按照巴布洛的判斷，這個綱領所採取的立場，標誌著我們對史大林主義和蘇聯的理論分析和基本政策而採取的對待史大林派的組織、運動和蘇聯的態度，已經被「完全不同的歷史進程」所推翻了！這是

由巴布洛自己首次公開對《過渡綱領》宣告的否定：他的修正主義和取消主義的發展由此也就達到了高峰。

### 巴布洛的官僚行徑

巴布洛非常明白，在第四國際內，要實行他的修正主義和親史大林主義的政策，必然會遇到長期在托洛茨基主義學校受教育的幹部的抵抗。爲了這個理由，他不僅長期運用模稜兩可、似是而非和左右逢迎的言詞來掩飾他的真正意向，甚至還在組織問題上運用官僚方法來作爲系統地達到其目的底最後武器。

在一九五〇年底到一九五一年初，當法蘭克和格爾曼同志在一系列問題上反對巴布洛的修正主義傾向時，巴布洛恐嚇要把他們開除出書記局。巴布洛在事實上甚至還把這個措施向紐西蘭黨（即美國黨）提出，要求它們附議。雖然這個荒唐的措施受到紐西蘭黨的堅決反對而無法付諸實行，法蘭克和曼德爾最後還是在巴布洛不斷的處分威脅下放棄了他們的意見。

一九五一年六月，正當法國黨的多數派猛烈地反對巴布洛的《我們往何處去？》一文內的修正主義思想和批評國際執委會第九次全會通過的決議案時候，巴布洛以書記局的名義發信給法國黨的中央委員會，命令它取消多數派的反對文件，並不得在黨內討論國際執委會第九次全會通過的決議。然而這正是第三次世界大會召開前普遍討論一切決議的時期，巴布洛爲了保衛自己的修正主義立場，竟公然以命令禁止法國黨內的民主討論了！

在第三次世界大會上，巴布洛不但扣留了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對大會決議的修正文件，並通過克拉克將它燒毀。同時又將法國黨多數派批評和修正國際執委會第九次會議決議

的一切文件向一切代表們封鎖起來，並在代表中散發種種謠言，以此壓抑了法國多數派反對他的修正主義傾向的意見。

一九五一年一月，巴布洛在法國黨中央執委會會議上，假借國際書記局的名義當場停止了多數派十六名中委的職權。隨後，則強迫成立多數派與少數派的平權委員會，以格爾曼（Germain）代表國際書記局為其仲裁者。巴布洛利用此種官僚主義的詭計，便剝奪了多數派在黨內的領導權。最後，則以同樣的手段排除他們於國際之外。

由於彭述之反對巴布洛獨自停止法國黨多數派十六名中委的非法措施，巴布洛即捏造種種罪名，誣衊他「破壞國際信譽，違反紀律」，企圖藉此排除他於國際書記局外。當碰到彭述之的抵抗時，巴布洛則於無形中剝奪了前者參加國際書記局一切會議的合法權利。並私自扣留他批評《中國第三次革命決議案》的文件，不予發表。差不多同時，巴布洛又以另一種詭計剝奪了美洲代表 Manuel [Novack] 參與國際書記局會議和工作的權利。由此，第三次世界大會後的國際書記局五個成員中，便有兩個被巴布洛非法地排除了。

一九五二年末至五三年初，毛澤東政權大捕托派至數百人之多，上海漏網的五個托洛茨基主義者寫了一封向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及革命團體呼籲求援的緊急公開信，由彭述之轉交巴布洛，要求在各國支部刊物公開發表。巴布洛雖當面答允此種要求，但卻把那封公開信扣留在他的辦公室裡。其用意僅在於怕這封公開信發表後，將打破他對於毛政權的美化宣傳，以及揭露他對中國托派所散佈的「不到群眾中去的教派主義者」的謊言。

當一九五三年五月國際執委會大會上討論史大林死後的局勢決議案，白恩斯同志批評該決案太過樂觀，並警告不要對史大林主義黨過存幻想時，巴布洛即以威脅的口吻指斥

說：「他以一個負責領袖不應發表與國際路線不同的意見」。隨後，看到白恩斯表示支持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多數派的立場時，巴布洛竟公然命令前者「在第四次世界大會召開前保衛多數派的路線」（即巴布洛的修正主義路線），否則他將遭到「報復」。這就等於說，凡是國際書記局起草的決案是不容許批評的，而支持與巴布洛的修正主義不同的意見則要被「報復」。

巴布洛自第三次世界大會後，除了用盡詭計開除法國黨多數派，在國際書記局內排除他的反對者外，並通過柯克林和克拉克在 SWP（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內組織他的派系，反對多數的領導層，企圖以排除法國黨多數派的故技奪取該黨的領導。當此種陰謀在該黨一九五三年五月全國委員會全會上遭到失敗時，巴布洛即促使柯克林與克拉克等實行對黨怠工，破壞黨的紀律，以致最後分裂了黨。在另一方面，巴布洛以同樣的手法，通過柯林斯在英國組織他的小組織，分裂了那裡的托派。最後，以同樣的方法分裂了加拿大的黨。

巴布洛為完全把持國際的領導機關，又私自在國際書記局內設立了一個辦事處（BUREAU）（這是完全違反國際的組織章程的），以此控制了國際書記局，並經過國際書記局控制了國際執行委員會。

從上敘巴布洛在國際領導機關內私設辦事處（BUREAU），操縱國際書記局及國際執行委員會等領導機關，任意排除異己，在各支部製造派系，以此搶奪領導權，分裂組織，扣留必須發表的重要文件，壓制內部的民主討論……這些便充分證明他已採取史大林的官僚集中制及其一切陰謀詭計，代替了第四國際繼承下來的布爾什維主義的民主集中制了。

## 巴布洛主義通過柯克林、克拉克和麥斯特的最後發展

巴布洛的修正主義和取消主義，在遭到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告全世界托洛茨基主義者書》的公開打擊後，他本人已暫時採取防衛的或退縮的態度。但正因為公開信的攻擊，巴布洛的思想上的密切的合作者和擁護者，即他的嫡派，卻更加果決地，急促地將巴布洛主義發展到了它的最後的邏輯結論。

柯克林、克拉克派在其《我們的方向》中寫道：「讓我們簡單地總結目前實況的其中一個結論吧：我們看到的，史大林主義會被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摧毀這展望是已被證實為錯誤的了。我們看到的世界，是半個歐洲的東面已被史大林主義統治，共產黨成為亞洲的殖民地革命的領導，同樣的黨是義大利和法國的工人階級裡的最龐大的政黨。其餘的西方世界裡，社會民主黨得以復興；在工人階級還未發展到政治上獨立存在的美國，改良主義的工人官僚仍占支配地位。存在了二十五年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一直不能發展成為群眾的組織……」（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柯克林派的全國局通過的草案。重刊自美國《社會主義者教育者、消息和教育公報》，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五四年五月，第二頁）這個「目前實況的總結」，比之巴布洛的「新現實的總結」確是更為「具體」。但也正因此，前者便剝去了後者的表面上極度樂觀的外衣，而顯露巴布洛主義的極度悲觀的本來面目了。

柯克林派（Cochranites）根據前面這個「當前現實的結論」接著說：「我們的整個傳統事實是……對現存的工人運動全無益處。因為這個傳統大多是產生在工人運動之外，對工人是異物。他們看不見，也不會相信這是解決他們的問題的恰當方法。我們必須面對這個現實，並吸取必要的教訓。」（同上一五頁）這裡說得很清楚：「我們的整個傳統」，即全

部托洛茨基主義的傳統，包括「過渡綱領」在內，都已「不適合於工人運動的問題」了。由此所得出來的「必要教訓」便只能是：「世界革命的公式一定指向這個結論：明日的革命黨將不會是接受我們運動傳統的意義上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同上）

既然「明日的革命黨將不會是托派」，那末，托洛茨基主義者怎麼辦呢？柯克林派最後提出的辦法便是：放棄一切托洛茨基主義的傳統，不要提「托洛茨基的名字、著作和第四國際的名字和存在」。因為這樣做是「狹隘的小組織思想和組織上的拜物教」。只要「將我們自己完全滲入現存的運動中」就夠了。（同上引文第六頁）這裡只有一句話沒有明白說出：取消托洛茨基主義的一切獨立的黨的組織和第四國際。

立夫斯東（克拉克），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少數派的代表，在巴布洛所召開的「六月會議」上，根據柯克林派的上述立場，作了如下的具體的發揮和建議：一切群眾的黨派，從史大林黨、社會民主黨到其他小資產階級的黨，在群眾壓力之下，都會走向領導革命奪取政權的道路。因此，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必須完全滲入這些群眾的黨裡去，而無須有獨立的黨的組織。同時，第四國際也不須要有集中的組織，只須出版一個理論的機關報就夠了。（這裡所引立夫斯東的演說的大意，是根據一位參加「六月會議」的代表的報導。）立夫斯東這種赤裸裸的取消主義，不但完全代表柯克林派的意見，而且為英國的柯林斯（Collins）、法國的麥斯特（Mestre）和一位巴布洛分子所一致支持。因此，他們在巴布洛的「六月會議」上形成了一條頑強地傾向於取消第四國際的聯合陣線。這便是巴布洛自一九五一年以來，「以歷史遠景和達到目標的清楚概念」所「武裝起來的我們運動中的共產主義幹部」！

但在麥斯特看來，立夫斯東還不夠徹底，因為後者還提出托洛茨基主義的第四國際留下「一個理論的機關報」。所以她在她的一篇文章中進一步宣稱：「不但托洛茨基在一九三八年成立第四國際是根本錯誤的，即一九二三年組織左派反對派也是不對的。」（見麥斯特出版的《共產主義者》「The Communist」第三期）這便等於說，不但托洛茨基所寫的「過渡綱領」和一切其他的文件及其所創立的國際是根本錯誤的，甚至在一九二三年開始反對史大林主義的鬥爭都是絕不應該了。這便是巴布洛主義發展的最後邏輯結論！根據這個「結論」，人們可以把它當作一個「悔過」，無條件地回到史大林黨裡去幫助它的「自我改良」！

有人說，巴布洛不但在「六月會議」上曾起而反對立夫斯東的立場，而且最近特別為文批評了柯克林、克拉克、柯林斯和麥斯特的錯誤思想。（如一九五四年出版的法文《第四國際》*Quatrieme Internationale*）這便證明巴布洛的態度已大有改變。

但巴布洛這些姿態，絕不足以證明他已改變了或放棄了他的修正主義、取消主義的根本思想。僅僅因為他看到他自已「武裝起來的幹部」太不耐，太欠謹慎、太露骨，走得太快，破壞了他小心地逐步地進行他的修正主義、取消主義的計劃；同時又看到那些「幹部」所大膽發揮的、毫不掩飾的取消主義的思想和行動，招致了參加「六月會議」的其他托洛茨基主義者們的強烈反感，大大地動搖了他在「國際書記局」的總書記地位。所以他迫不得已才來批評他們。換言之，巴布洛今日之「批評他的幹部」，僅僅為了緩和某些參加六月會議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反感，保持他的總書記地位，以便於徐圖實現他的修正主義、取消主義的原來計劃而已。

這裡只提醒人們注意如下的事實：巴布洛在他所召開的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的「國際執委會」上「一致通過的」對美國的克拉克派及英國的柯林斯派之「忠實於國際」(loyal to the International)表示「熱烈致敬」(warmly salutes)；而同時瘋狂地咒罵「受楊格帝國主義的壓力」(「who are under the pressure of Yankee imperialism」)的加農派(Cannonites)的「教派主義」；——這就足夠反證今天巴布洛的作偽了。

### 巴布洛主義產生的原因及其後果

巴布洛主義產生的客觀原因，在他及其擁護者們所不斷強調的「新的現實」或「當前的現實」(「present reality」)中已多少透露了出來。

自上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各種極度複雜的因素，蘇聯已表現為世界第二個強國，她佔領了東歐許多國家，並同化了她們；法意共產黨勢力大為增長，以及某些殖民地的共產黨取得了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地位；尤其是毛澤東黨摧毀了蔣政權，佔領了整個中國大陸，建立其人民民主政府，……這一切都表現出史大林主義勢力的擴張已達到空前炫人耳目的程度。這與史大林主義在戰前所處的孤立情形對照起來，更顯得炫人。這就大大地吸引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陷於困惱而感到無出路的一部份群眾，尤其是小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在史大林主義勢力這種炫人的擴張中，似乎看到他們的憧憬，對它發生了「新的希望」。而這種「新的希望」，反映在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的頭腦中，經過「理論的說明」，便形成了史大林主義「自我改良」的體系。多依徹(Isaac Deutscher)，波蘭的共產黨員，曾一度是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追隨者，後來是大英帝國的公民，便是製造此種史大林主義「自我改良」學說的先驅，而巴布洛則是多依徹主義在第四國際內部的傳播者。

這從底下的事實可以證明：當多依徹在他一九四九年出版的《史大林傳》（「Life of Stalin」）中，將史大林主義的擴張與世界革命的擴張等量齊觀時，巴布洛即由此形成了他的「幾個世紀變態的工人國家」的理論。當史大林死後，多依徹在他的《俄國——跟著是什麼？》（「Russia What Next？」）內宣稱：「政權向著社會主義民主逐漸演進」，「對這些條件的分析得出一個一般的結論就是，國內諸因素的平衡有利於這個制度的民主復興」（請參考加農的《托洛茨基還是多依徹》（「Trotsky or Deutscher,」）一文，載於一九五四年冬季的《第四國際》）。巴布洛即跟著發表了他的《馬林柯夫的新路線》（「Malenkov's New Course」），得出史大林主義官僚層會以循序漸進的「讓步」來「改良自己」的結論。此外，而且更重要的是：巴布洛曾對白恩斯同志說：「通俗化我們的思想給廣大群眾，多伊徹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多」（見加農的《托洛茨基還是多依徹》文內所引）。由此可以清楚看出：巴布洛主義僅是將多依徹主義移植於我們國際內加以發揮和系統化而已。

因此，可以說，巴布洛主義是在史大林主義勢力空前膨脹的壓力下產生的一種親史大林主義的傾向。如果將它與一九三九年盤納姆、夏克曼所代表的仇史大林主義傾向對照起來，便更顯得清楚。因為後者恰是在那時史大林主義處於極度孤立狀態中產生的，這兩種傾向雖然是站在完全相反的地位，但其反映的社會階級意識是相同的，即小資產階級的印象主義。

從整個馬克思主義的國際運動史看來，假如伯恩斯坦是從十九世紀末的資本主義繁榮（資本主義最高發展的帝國主義）中看到「資本主義可以和平發展到社會主義」，因而修正了堅持「無產階級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史大林是在一九二三年德國革命失敗後，看到國際革命的無望，而以「一國社

會主義」修正了堅持「國際革命」的列寧主義，則巴布洛便是跟隨多依徹後面，在戰後史大林主義的擴張中看出它的「自我改良」，而修正了「以工人群眾暴動推翻史大林主義官僚層」、繼承馬克思列寧主義完成世界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

但是，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已證實它的完全破產，史大林的修正主義在一九三三年德國革命失敗中證實了它的徹底背叛，則巴布洛的修正主義便在一九五三年六月的東德暴動和同年八月的法國總罷工暴露了它的原形。

至於巴布洛主義（即巴布洛本人及其追隨者柯克林、克拉克、麥斯特所徹底發揮的思想和行動）的後果，現已清楚地擺在我們面前：它已完全修正了全部的托洛茨基主義，即背叛了托洛茨基主義的一切傳統和綱領，達到了親史大林主義的極端的取消主義。更由於巴布洛本人控制了國際的領導機關，他的修正主義和取消主義通過法文《第四國際》雜誌及其所控制的某些支部的機關報散佈在群眾中，發生了極壞的影響，迷失了群眾的方向，大大地污損了托洛茨基主義的旗幟，幫助了親史大林主義的發展。另一方面，巴布洛通過他所「武裝起來的幹部」，不但在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分裂了那些國家的組織，走到完全離開第四國際，公開替史大林主義辯護，譏諷托洛茨基主義。而且在國際書記局支配下的各支部內，亦引起了思想上的極度混亂，使許多同志感到迷惑而趨於頹喪。這是第四國際成立以來所遭到的第一次最大規模的最嚴重的打擊。

要是沒有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向全世界托洛茨基主義者號召的公開信這勇敢的干預，沒有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這個把全部正統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維繫起來的組織去抗拒和保衛他們的立場，沒有錫蘭及其他地區的支部的

強烈批評，依照巴布洛派的自然發展，如柯克林、克拉克和麥斯特所表現的，則現時的第四國際也許已經處在分崩離析的狀態中！但正因為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國際委員會和錫蘭托派的打擊與批評，再一次證明托洛茨基主義的傳統和思想是最堅強的力量，能夠經得起各種事變的考驗的。

### 結束語

巴布洛的修正主義和取消主義的內容及其後果已經如上面所述，現在，擺在每一個忠實於托洛茨基主義及其歷史任務的同志面前的問題，便是怎樣利用這場反巴布洛主義的鬥爭來提高自己，鞏固和增強我們的運動。我們應該利用這次機會來重溫過渡綱領內的基本原則和所有的托洛茨基主義的基本原則，特別是關於史大林主義的性質和作用的基本觀念。在這個基礎上，能夠對戰後的全新的國際局勢及發展作出分析（對此我們會提交另一些文件作為討論基礎），為第四國際在未來的大事變（戰爭和革命）作好準備，引導世界革命走向勝利。

為了使不同國家支部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對巴布洛派的討論更有效和更充分，就必須採取徹底的布爾什維克的民主程序。只有真正民主的普遍討論，才能打破巴布洛的官僚主義的操縱把持。我們相信在討論的過程中，巴布洛的修正主義和取消主義的本來面目會暴露得更明顯，對繼承和發展了馬列主義的托洛茨基主義的正確性，亦會發揮得更加清晰。再加上近年來的事變發展，如史大林派在落後國家（如印度、錫蘭、印尼等）尋求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反美聯盟」；在先進國家（如日本、美國、法國等）支持所謂的「民主或進步的資產階級」。這種種反動的幻想暴露了克里姆林宮為防止新的世界大戰和維持「和平共存」而狂熱地尋求與西方帝國主

義妥協的企圖。這些新鮮的事件加起來進一步暴露出巴布洛派的徹底破產，同時更清楚地證明托洛茨基主義對史大林主義的本質和作用的評價無可比擬正確。

一種革命思想的體系，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思想，通常在經過鬥爭後會發展得更加深刻和豐富。因此我們可以相信，托洛茨基主義在經過了反對巴布洛的修正主義和取消主義的鬥爭後會更加充實，因而，所有真正的托洛茨基者會在更高的意識層面上重新團聚起來。

#### 譯註

原文為英文（Peng Shuzi Pabloism Reviewed: From Pablo to Cochran, Clarke, and Mestre）原載《為第四國際的重新統一而鬥爭》第一卷（*The Struggle to Reunify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Volume I: The First Parity Commission and Peng Shuzi's 「Pabloism Reviewed」*。）收錄於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出版的「社會主義者教育系列公報」（Education for Socialists series of bulletins by the（US）Socialist Workers Party）。

## 論國際重新統一的必要

### ——給杜勃士同志的信

（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

尊敬的史密斯：

八月二日我寫給你短信只是簡單地表達了我對中國和殖民地兩個問題草案的看法。本來我想寫得更詳細些，以便你能更充分地瞭解我對這兩個草案以及與此相關問題的看法，但即使現在，病痛仍不允許我這樣做。這次我也只能談這樣一個建議：我們應該正式地談論這些草案了。這一點你也在七月六日的信中提到。

你在信中說：「我們建議國際委員會（IC）目前不應對任何草案進行正式的表決，除非是決定是否給大家分發材料以進行討論。我們也建議討論的材料只發送給正統托派的同志們。因為我們都知道，我們和巴布洛派（Pabloites）沒有任何討論的基礎。當務之急，我們應該給聚集在國際委員會周圍的正統托派制定一條總體的政治路線。」

我完全同意你的這一觀點：國際委員會目前不應對任何草案都進行表決，除非是為決定在正統托派同志中發放討論材料。但我認為，這種討論的參與範圍不應僅限於圍繞在國際委員會的正統托派。

誠然，我們和正統巴布洛派（如柯克林〔Cochran〕、勞倫斯〔Lawrence〕、莫雷·道森〔Murray Dowson〕）之間確實沒有什麼討論的基礎。他們不僅脫離了第四國際，還跟國際書記局（IS）鬧了分裂。但由於仍有許多托派同志留在國際書記局或受其影響，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也必須和他們一

起討論問題。只有通過共同的討論，我們才能爭取到他們的信任，使他們完全擺脫巴布洛主義的影響，再次回到正統托派的立場上來。

我要提請你注意下列事實：

1. 在歐洲各國的托派中，除了法國和瑞士，聚在國際委員會周圍的正統托派都是少數。法國托派的多數已分成三大派別，甚至布雷托（Bleibtreu）派又被蘭伯特（Lambert）派開除出去。我們都知道在法國多數派中，能發揮領導作用並堅決反對巴布洛修正主義的不是別人，正是布雷托（他在法國托派中享有崇高的政治聲望，只是在組織能力方面略顯不足）。蘭伯特派雖然是法國多數派中的多數，但它已經幾乎不能代表正統的托洛茨基主義了；另外，他們還有強烈的小集團意識（布雷托被開除出去的主要原因是他不懈的批評這些錯誤的趨向）。蘭伯特派還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如南斯拉夫和中國問題上的觀點，已經很接近巴布洛的修正主義了。在國際委員會今年 6 月份的會議上，布洛赫（Bloch）對南斯拉夫問題的觀點就是明證。
2. 另一方面，法國法蘭克（Frank）派的多數同志，尤其是那些年輕同志，他們正在認識到巴布洛主義的危害，認為蘇聯的官僚集團和法國的史大林主義政黨是在追求與帝國主義的和諧相處。他們通過自己的切身經驗得出結論：巴布洛等人對史大林主義的認識是不正確的，只有托洛茨基主義才能擔當起世界革命的重任。他們也認識到，加農（Cannon）等人代表了托洛茨基主義的正統立場。因此他們呼籲我們托派迅速重新統一起來。義大利的利維奧

(Livio) 派也存在同樣的情況。我暫時還不瞭解德國的尼古拉斯 (Jungclas) 派的情況，但我相信他們中一定會有許多人是可以被我們爭取過來，回到正統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上的。

3. 錫蘭平等社會黨在政治上是一個真正的托派政黨（而且它是我們運動中唯一一個擁有廣大民眾基礎的政黨）。這是我們都知道的，他們之所以還留在國際書記局，只是組織上形式主義的限制，但他們熱切地希望通過平權委員會進行一次廣泛的討論，以清除巴布洛的修正主義，重新統一托派。目前，印度的托派同志還沒有表態，但從他們和錫蘭平等社會黨的傳統密切關係來看，他們的態度可能要受後者的影響。
4. 拉丁美洲的大多數組織都還在國際書記局的影響之下，實際上是在巴布洛的個人控制之下。他主要通過閉塞和欺騙控制了這些組織，以致於這些組織的普通成員不可能找到正統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來反擊巴布洛主義。

列舉以上事實旨在說明，我們絕不能僅僅滿足於目前聚集在國際委員會周圍的托派力量，我們應該更進一步去爭取和團結那些仍留在國際書記局的托派同志，尤其是錫蘭平等社會黨；盡一切努力去爭取德國、法國、義大利、拉美國家的普通托派成員。要達到這一目標，我們只能是把正統托派的文件發送給國際書記局的所有派別，並通過平權委員會舉辦一次廣泛而徹底的大討論。

現在，如果我們拒絕或回避這樣一次討論，那麼我們將在客觀上幫助了巴布洛派繼續控制國際書記局，使他得以繼續以第四國際的名義欺騙同志、迷惑民眾。這將不利於托派

運動的發展，對我們未來的革命將是一個不可估量的損害。

因此，我認爲我們再也不應該繼續耽擱平權委員會的工作了（實際上它的工作已經被耽擱得太久了），也就是說，我們應該通過平權委員會盡可能廣泛地向受國際書記局控制的組織發送我們的文件，並舉辦範圍廣泛的討論會。我相信這種討論對我們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我們有可能通過這樣的討論，清除巴布洛的修正主義，重新把所有的托派力量（首先是錫蘭平等社會黨和印度的托派力量）團結在正統托洛茨基主義的旗幟下。因爲按照柯克蘭、勞倫斯和麥斯特列（Mestre）的闡述，巴布洛派已經同克里姆林宮以及全世界的史大林主義政黨聯合起來，追求與美帝國主義及各國資產階級的和平相處。所以，我們應該爭取並重新召集所有的托派力量，重建第四國際的統一。

考慮到歐洲的形勢，尤其是法國和義大利的形勢：史大林主義政黨的內部危機正日益醞釀和增強，普通黨員對政黨領袖的不滿與日俱增（這是他們的機會主義政策的後果，也是普通黨員對其政黨領袖的背離）。因此，我們非常有必要在同一面托派旗幟下召集起所有的托派力量，以便能夠積極地影響它們的普通黨員，促使他們起來批評、反抗乃至脫離機會主義官僚們的領導。（關於這些政黨的情況，如果你感興趣的話，我可以提供更詳細的資料。）

但是法國的蘭伯特派絕對忽視了這一形勢。他們不僅堅決地反對國際書記局（包括錫蘭平等社會黨）組織的各種討論和再統一的各種嘗試，而把代表正統托洛茨基主義的佈雷托開除出去。他們甚至利用去年冬天你給布洛赫（Bloch）的信去煽動義大利的同志贊成他們的觀點。這說明他們只關心的是自己的小集團利益，而不是整個托派運動。

托洛茨基既同所有的修正主義者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又

從不放棄任何機會去爭取任何一個同志和團體，以便把他們團結到我們的隊伍中來。我們應該繼續發揚這一精神。

由於你的意見在國際委員會中很有份量，所以我希望你能夠仔細、嚴肅地考慮上述問題。

致以同志的問候！

彭述之

## 再論國際重新統一問題

### ——給杜勃士同志的信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日）

尊敬的史密斯同志：

很高興收到你九月二十九日的回信。得知你也有同樣的想法：「把我們內部的討論擴展到受巴布洛影響的黨派普通成員中。」這樣，我們的討論就限於具體的實現方式了，也即通過什麼渠道或什麼組織把我們的文件發送至那些受巴布洛影響的黨派團體普通成員手中，以及我們怎樣才能主導大討論的進行。關於這一點，我相信在當前的情況下，除了平權委員會之外，我們沒有任何其他可利用的組織形式了。

確實，你們已經給錫蘭的同志發送了一些文件，但我們不可能都用這樣的方法直接把我們的文件發給所有那些受巴布洛影響的團體。即便是錫蘭同志，我相信他們也不會對這種方式感到滿意的。因為他們最希望的不只是能夠和我們直接地進行討論，而且是希望各方都能夠通過平權委員會來傳遞資料，以便為召開一次廣泛的討論做好準備，最終使討論的成果成為所有托派力量重新統一起來永恆基石。有件事需要在此說明：自今年三月份國際委員會給錫蘭平等社會黨，要求它重新考慮其立場，迄今一直都杳無回音。這充分說明，如果我們選擇完全放棄平權委員會而直接送資料給他們的話，他們一定會很不滿意並不會做出任何實際的回應的。況且，由錫蘭平等社會黨提出的組建平權委員會的建議，是已經被國際委員會採納和施行了。平權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也在去年十一月份召開，我們和國際書記局都派代表參加

了。因此如果我們拿不出過硬的理由就放棄平權委員會的話，錫蘭同志以及其他受巴布洛派影響的同志都會對此難以理解的，這將會招致他們的不滿與厭惡。實際上，這也會給巴布洛一個極好的機會發動一場反對國際委員會的運動，攻擊國際委員會是平權委員會的破壞者和托派統一的反對者，從而在錫蘭普通黨員和受其影響的其他托派同志中間煽動對國際委員會的不滿情緒。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巴布洛就能繼續主導國際書記局並遂行其陰謀。

你在信中提到：「平權委員會的一次會議清楚地表明了，在當前階段和巴布洛派進行政治討論是毫無意義的。在那次會議上，巴布洛派把他們自『世界托派第三次代表大會』（Third Congress）以來全部的文件拿了出來，還提出以他們的破產路線作為討論的基礎（雖然它們的這一路線甚至在其內部鬥爭和分裂中都遭到棄絕）。」根據貝蒂（Betty）對此次會議的報導，我覺得情況非常簡單。國際書記局的代表們並沒有提出任何條件，只是請我方代表提出我們的條件，而我方代表說出的條件僅僅是希望進行一次廣泛的討論，並為此討論雙方提交各自的議案。但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向他們證明「平權委員會的一次會議清楚地表明了，在當前階段和巴布洛派進行政治討論是毫無意義的。」我深感，既然我方代表正式地允諾國際書記局可以提交討論議案，那麼我們就應該履行自己的承諾，以證明我們爭取托派重新統一、尤其是爭取錫蘭托派的誠意。因此，我們應該籌劃好一次廣泛的政治討論，否則這將給巴布洛一個有力的藉口：說國際委員會害怕討論、反對統一等等，以便於他繼續欺騙和控制追隨國際書記局的黨派團體。

誠然，在會議進程中，巴布洛派把他們自「世界托派第三次代表大會」以來的全部文件都拿了出來，還提出以他們

的破產路線作為討論的基礎。但我並不認為我們應感到不愉快。既然巴布洛的修正主義和取消主義（liquidationist）路線（包括模糊的、修正主義成分的「三大」文件），「甚至在其內部鬥爭和分裂中都遭到棄絕」，並且這兩年形勢的發展進一步證明了它的破產；這樣，如果巴布洛派還將它們拿出來進行討論，這將只會有助於所有托派同志，特別是那些留在國際書記局的同志，通過對我們文件的討論，更清晰、更深刻地認識到巴布洛主義的真實面目。

你也提到：「我們根本看不出來平權委員會在這一過程中能有何作為。它可能還會起相反的作用：給巴布洛派一個藉口，使他得以謀劃組建一個新的組織，從而混淆意識形態的問題。」但我感覺，我們還沒有充足的理由和事實來下此判斷。因為平權委員會還沒有正式開始行使其職能，我們不能事先就判定它將無所作為甚至起反面作用。如果最終的討論進程證明了平權委員會不能發揮有利的作用，並相反「給巴布洛派一個藉口，使他得以謀劃組建一個新的組織，從而混淆意識形態的問題」，那麼我們就選擇公開會議的全部細節。到那時，破壞討論和重新統一的罪責將全部落在巴布洛派身上。這樣一來，我們將會贏得所有留在國際書記局的托派同志們（首先是錫蘭托派）的同情與支持，這也就意味著巴布洛所控制的國際書記局的分裂。要知道，國際書記局得以繼續存在的主要原因就是錫蘭平等社會黨（這一公認的有著強大群眾基礎的托派政黨）的支持，一旦後者脫離了它，它將不可避免地分化和瓦解。

另外，我們還必須正視這一事實：儘管我們與巴布洛派的決裂是完全正確和非常必要的，但由於我們並沒有在公開決裂前發表批判巴布洛主義的聲明，也沒有在內部進行國際性的廣泛討論，以致我們的普通成員並沒有認識到巴布洛修

正主義和取消主義的真實面目。因此，這一次決裂從組織程序上講是一次「例外」(exceptional)，這是國際委員會不可否認的不利和「弱點」。更準確地講，正是由於這一點，許多托派(包括錫蘭托派)迄今都不能理解我們為什麼採取這一「例外」行爲，從而繼續留在國際書記局。這也是巴布洛派仍然能影響和控制國際書記局的主要原因之一。

爲了彌補這一「弱點」，我們不僅應該召集有受巴布洛派影響的黨派團體普通成員一起參加的大討論，而且也必須使他們瞭解到：我們反對巴布洛主義的鬥爭絕對不是在分裂托派運動，相反，我們是在清除損害托洛茨基主義的修正主義者和取消主義者，並試圖重新團結忠誠的托派同志，以鞏固和擴大我們的運動。

爲了達到這一目標，我們必須尊重所有留在國際書記局的托派同志的意願，通過平權委員會組織一次廣泛的政治討論(像錫蘭同志所建議的那樣)，以便大家能夠在一起思考和協商重新統一托派的必要措施。如果我們忽視了他們的這一願望，單方面地放棄我們曾同意了的建議——通過平權委員會組織一次政治討論，而改爲只是簡單地向他們發送文件、要求他們發表自己的觀點，這將會招致他們的不滿，並使他們認爲我們對其採取的是一種小集團主義的態度，而對托派的重新統一根本就無誠意。這最終將有助於巴布洛繼續控制國際書記局，並利用第四國際的名義，繼續推行其修正主義和取消主義路線。

簡而言之，對於平權委員會，我希望你能充分考慮各方面的情況認真地考慮這一問題，並採取一種切實的态度。如果你認定平權委員會絕對地無益而有害，那麼請你另外提出一個詳細而可行的解決方案，使之能更好地組織我們和國際書記局所屬的黨派團體普通成員之間的大討論。

至於你說：「我們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把聚集在國際委員會的托派力量以明確的政治立場鞏固起來。」我原則上也是同意的。但我覺得我們再也不能繼續拖延和巴布洛派普通同志間的討論了。因為客觀形勢的發展，特別是歐洲大陸形勢的發展，已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迫切地要求我們盡可能迅速地重新統一起來，並鞏固所有的托派力量。

下面我將簡述一下法國和義大利的局勢：

由於國內外局勢的壓力，特別是法國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日益高漲，法國資產階級的統治一直陷於不斷增強的危機之中。本來，在這種條件下爆發革命的可能性很大。但革命的可能性卻被革命領導力量的危機大大削弱了。史大林主義政黨完全服務於克里姆林宮的外交戰略，而且其內部的危機也持續不斷。馬蒂（Marty）和迪隆（Tillon）事件以及最近的萊柯（Lecoeur）事件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

法共黨內的馬蒂事件在社會上已經廣為知曉，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吧。在此我只想提一下馬蒂在今年夏初出版的一本書及其影響。馬蒂在書中批評了法共領導人的機會主義政策，他的基本觀點很接近我們托派的立場。為此法共的官僚集團說他是托派分子，並阻止其黨員和群眾閱讀這本書。儘管這樣，還是有許多的法共黨員暗地裏看了這本書，並或多或少地認同馬蒂對法共領導人及其政策的批評。重要的是，當他們越來越感覺到其領導人的政策將走進死胡同時，他們就會越來越同意馬蒂的看法，進而逐漸形成自己的反對立場。所以我們可以說，馬蒂的批判精神和立場很有可能加速法共內部危機的爆發。但我認為這需要有兩個前提，一是法國的托派應積極地介入，二是適當的時機。

馬蒂的著作還在法國左翼知識份子中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法蘭西觀察報》（France-Observateur）的時事評論編輯中，

有不少或多或少地同情史大林主義政黨的人，但自從他們讀了馬蒂的書後，他們立即滿懷同情地刊登了該書的摘要，還聯絡一些對馬蒂持同情態度的托派同志（如佈雷托）。雖然這些知識份子不能代表一種社會力量，但他們能更敏銳地感覺到並反映出當前社會政治思潮的傾向。

史大林主義官僚集團對馬蒂的非難不是毫無根據的。在馬蒂離開法共後的第二天，他就跟拉法葉特（Laverite）取得了聯繫並互通信件。他還和佈雷托、蘭伯特等人談過幾次。那時馬蒂正在研究托洛茨基的著作，他從自己的經歷中認識到克里姆林宮政治領導層面臨的政治絕境，並婉轉地對托派運動寄予了希望。這本來是我們的一次絕好機會；利用這一契機，我們可以在政治上幫助馬蒂籌備並發表對史大林主義政黨的批判，表明他自己的立場，從而使法共內部的分歧明朗化。但不幸的是，此時正值整個托派運動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況，尤其是法國托派也分成幾大派別，馬蒂對此顯得很失望。更糟糕的是，在蘭伯特派和馬蒂聯繫的一年時間裏（佈雷托因為與蘭伯特派的觀點衝突，被迫終止與馬蒂的接觸），蘭伯特不僅沒有在政治上幫助馬蒂以便藉此機會介入法共內部的分歧，而且由於一些細節的問題，引起了馬蒂的強烈不滿（如長期拖延出版馬蒂的著作等等）。最後馬蒂與他們決裂了，這當然使馬蒂很苦惱。現在只有佈雷托還和馬蒂保持著聯繫。據佈雷托說，馬蒂在七月份給他的來信中，他感謝了佈雷托對其著作的中肯批評，並表示接受。他告訴佈雷托，他將在該書再版時予以修正。這說明他還是很尊重托派同志的觀點的。

考慮到法國史大林主義政黨內日益加深的危機和馬蒂對其領導人提出批評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我認為對法國全體托派而言，這一點顯得尤為迫切：儘快團結起來並採取統一的標準、制定正確的方案，去爭取那些仍受史大林主義政黨影響的黨員

和群眾，加速其政治分裂，並將其精英吸引到我們的隊伍中來。

義大利史大林主義政黨的危機更甚於法國。所謂的「共產主義行動」(Communist Action) 組織不僅在黨內各派和群眾組織中有穩固的基礎，而且還通過其內部刊物《共產主義行動》，從左的角度公開抨擊其政黨的領導層及其機會主義政策。如果這種局勢繼續發展下去，義大利共產黨將不可避免地公開分裂。因此義大利的全體托派力量也有必要制定一個統一的標準和實施方案介入這一局勢。

總而言之，從上述法國和義大利史大林主義政黨暴露出來的事實看，我們再也不能拖延與國際書記局的托派同志們（特別是其中的法蘭克派和利維奧派）為重新統一進行一次大討論了。

你的友好彭述之

## 關於平權委員會的決議（草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七日）

（彭述之提交，被 5 比 1 否決）

1. 我們當初接受錫蘭同志的建議組建平權委員會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應籌備一次包括錫蘭同志以及所有受巴布洛派影響的廣大托派同志與團體參加的大討論也依然是正確的。因為這樣可以徹底清除巴布洛主義的影響，並有利於全體托派的重新統一。
2. 如果平權委員會在過去一直沒有發揮什麼作用，甚至起了消極作用的話，那麼這主要是由於我們沒有及時向平權委員會提交討論文件並分發給所有受巴布洛派影響的團體，從而進一步打擊巴布洛主義。
3. 現在，我們的主要文件已經準備就緒，我們應立即實踐自己的諾言，把它們提交給平權委員會，並通過它分發給國際書記局的所有團體以作討論之資料。
4. 如果我們對參加平權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國際書記局的代表們缺乏信任，那麼我們就應該立即寫信給錫蘭支部，邀請他們派代表參與平權委員會的組織工作，並對平權委員會的任務提出具體建議，尤其是對如何組織大討論提出建議。
5. 只有在錫蘭支部拒絕派出代表，以及平權委員會內的國際書記局代表反對我們提出的必要建議時，我們才有充分的理由說平權委員會對組織大討

論和托派的重新統一毫無意義，並宣佈退出。只有這樣，破壞平權委員會的責任才不在我們而在巴布洛派。

6. 今天，我們沒有提出任何證據就宣佈退出平權委員會，而只是簡單地承認在最初同意組建平權委員會是一個錯誤。這種做法不僅是非常輕率、不負責任的，而且將必然在錫蘭黨內以及所有受巴布洛派影響的托派同志中招致異議和不滿。這只會有助於巴布洛鞏固其在國際書記局的地位並繼續以第四國際的名義推行其修正主義和取消主義觀念，繼續蒙蔽民眾。這將不可避免地給我們的運動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

附件：

## 關於平權委員會的決議

### ——國際委員會巴黎會議通過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七至八日）

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七至八日的會議上，國際委員會終於有機會來審查平權委員會自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成立以來兩年間的工作情況。

平權委員會的歷程，光榮地記錄著世界托派運動的絕大多數力量旗幟鮮明地與巴布洛修正主義決裂的歷史；整體而言，平權委員會的各成員國支部，也分別在各自的國家裏獲得了良好的發展。事實表明，許多重要國家的產業鬥爭和殖民地解放運動都深深受到我們成員國支部的影響，通過這些鬥爭，世界托洛茨基主義有力地在勞苦大眾心中確立了地位。此外，在這些鬥爭中，我們的隊伍在數量上也取得了平穩的增長。

國際委員會認為，這些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我們對巴布洛主義的政治鬥爭。這一鬥爭使我們的組織受益匪淺，有力地促進了我們的政黨建設。在與修正主義不可調和的鬥爭中，我們在各個領域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們反擊巴布洛主義的政治鬥爭，在一九五四年四月達到了頂點：錫蘭平等社會黨公開批判巴布洛派的決議——「史大林主義的興衰」；與此同時，冰島（加拿大）支部也與巴布洛派公開決裂。所有這些成就的取得，都與我們號召與巴布洛派進行公開政治鬥爭的《公開信》的發表有關。

在巴布洛派一九五四年六月的一次小範圍會議上，甚至

一些親史大林主義的人，如柯林斯(羅蘭士)和克拉克(Clarke)都在取消主義(liquidationist)的議案中，強烈地支持正統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這是巴布洛主義不可避免的後果，也再次向世界革命運動證明了：我們同巴布洛主義的決裂以及決裂後發生的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儘管那時柯林斯已經公開地支持英國史大林主義政黨的外交政策。

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國際委員會責無旁貸地認識到重新定位世界革命運動的政治任務已經被拖延了。這主要是由於一種錯誤的觀點所致，它認為：一個由巴布洛派參加的平權委員會，可以通過組織共同的討論來幫助巴布洛派中的一些普通成員放棄他們的錯誤觀念。國際委員會現在認為，我們本可以通過巴布洛派內部的持續分化更容易地達到這一目標的。平權委員會在客觀上混淆了巴布洛派的內部鬥爭，並且還可能因此削弱了正統托派的力量。

所以有必要在此聲明，我們任何人都不會相信通過平權委員會和巴布洛派建立起聯合的，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存絲毫的幻想。事實已經證明我們的認識絕不是毫無根據的。巴布洛派也曾虛偽地談過聯合，但在一九五五年六月的英國船業工人罷工鬥爭中，他們不是去努力團結英國的工人，反而建議去聯合德國不來梅港的工人；因為他們認為這次罷工是「加農派」領導的。他們在這次罷工中再次扮演了工賊的角色。過去我們中間總有一些觀念不牢的人容易被人鼓動，認為有這些叛徒們參加的平權委員會可能會產生一些奇跡或取得一些其他成就。現在國際委員會公開地認識到並糾正了這一錯誤認識。因此，我們決定立即退出平權委員會。

同時，國際委員會熱情地看到錫蘭平等社會黨對英國工人罷工的支持。這一行為再次顯示了他們對巴布洛派政策的反對和對正統托洛茨基主義的堅持。

我們現在對錫蘭同志，以及所有真誠希望統一起來的托派同志鄭重宣佈：種種事實已經無可辯駁地說明，托派的統一只能嚴格建立在托洛茨基同志為我們運動煞費苦心所創立的基本原則之上。

目前，國際委員會正在為托派第四次世界大會的召開籌備一次國際討論會。所有的正統托派同志都將被邀請參加。只有在這次討論中產生了廣泛的政治認同後，我們才能考慮制定爭取真誠統一的方案。

本決議的投票情況是：五票（法國、英國、瑞士、德國、荷蘭）贊成，一票（中國）反對。

由彭述之提出的被五比一否決的議案，附在本文件後面。大家一致同意，要求所有支部的領導人繼續考慮這一問題，並儘快將其意見告知國際委員會書記。

### **1. 關於團結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鬥爭的決議**

談到托派在全世界的軍事行動，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要對北非人民的英勇鬥爭表示崇高的敬意。儘管遭受了嚴厲的鎮壓，他們依然卓有成效地打擊了法國帝國主義。我們相信，這場鬥爭將以北非人民贏得完全的獨立而告終。

國際委員會要對在過去一年裏遭受壓制的阿爾及利亞革命致以親切的問候。雖然殖民當局在這裏投入了遠遠超過印度支那戰爭的反動力量，但革命運動還是在某一中心地區對法國帝國主義給予日益嚴厲的打擊。現在，阿爾及利亞的革命運動正經受著空前殘暴的鎮壓，數以萬計的人被謀殺或被關進集中營。

國際委員會充分意識到阿爾及利亞革命對於法國乃至全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重要意義。

國際委員會要為依然處於危急的非法狀態的「阿爾及利亞民族運動」（Algerian National Movement）組織歡呼。它正在勞苦大眾的領導下對帝國主義進行著毫不妥協的鬥爭。麥

薩利·哈吉（Messali Hadj）已成為全世界被壓迫、被奴役人民心中一個活生生的榜樣。

國際委員會要蔑視那些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史大林主義者及其組織與法國帝國主義狼狽為奸的行爲。由於阿爾及利亞革命運動的壓力，他們跑去幫助帝國主義，企圖充當阿爾及利亞人民的「代言人」，提出了「階段性獨立」的陰謀。這完全是維護帝國主義利益的行徑。

與他們不同的是，我們托派全力支持「阿爾及利亞民族運動」提出的口號：要求制憲會議成為阿爾及利亞的最高權力機關。這是唯一的堅持民主原則與社會主義原則的民族獨立口號。

國際委員會要向「國際主義共產黨」（the Internationalist Communist Party，第四國際的一個法國團體）致敬。因為他們已經積極組織了法國工人與阿爾及利亞工人兄弟般的團結陣線，以抗擊共同的敵人。

這一決議獲得全票通過，但彭述之同志要求將他下面的觀點附在本決議後面：

「在反抗法國帝國主義的鬥爭中，我們應該團結北非所有的革命群眾，即使他們的觀點還不甚明確。」

- 2、 國際委員會決定，由於法國大選將至，所有各支部均應考慮對國際主義共產黨（PCI）給予盡可能多的經費支持。這件事迫在眉睫。
- 3、 國際委員會決定，儘快將本次會議的決議翻譯成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以便到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時大部分同志都已經瞭解到本次會議的精神。
- 4、 國際委員會的下次會議將於一月六日舉行。所有支部均應提交其活動報告，以便在下次會議上進行討論。

普萊斯頓·希利（Preston Healy）

國際委員會書記

## 關於統一中的一些問題

### ——給格里·希利同志的信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尊敬的白恩斯同志：

遵照上次會議時您的提議，我現送上一份提拉克·克尼華道那（Tilak Goonewardene）給我的回信。錫蘭平等社會黨（LSSP）說平權委員會失敗的責任是在國際委員會（IC）身上，因為我們從來都不怎麼積極地繼續履行它的職能。所以他們覺得不值得為平權委員會浪費一名代表。據此表述，我認為這至少暗示了一點：如果我們能夠誠心誠意地履行職責，他們還是樂意派代表參加平權委員會的。

考慮到國際委員會上次會議上大多數人的立場，我感到很難給提拉克回信，以繼續討論這一問題（儘管看起來，他們很希望就此問題與我進一步討論——他們給了我一個直接的通信地址）。有鑒於此，在我送上提拉克這封信的同時，我認為有必要表達一下個人的一些看法，並希望您能重新考慮這個對我們至關重要的問題。

在我看來，平等社會黨說我們應該對平權委員會失敗負責的指責是完全符合事實的。起初，當布洛赫（Bloch）等人頑固地反對並試圖阻止平權委員會的組建時，正是所有其他支部，特別是貴國支部的堅決支持，我們決定接納平等社會黨的建議，派出代表參加平權委員會。但自從去年十一月份平權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開始，國際委員會就一直採取一種完全消極、隨意的態度，直到最後貴國支部正式宣佈退出。這導致了上次國際委員會會議上的多數派決議。所有這

些事實都證明了錫蘭黨（Ceylon party）的判斷是無可辯駁地正確的。

誠然，你確實在上次會議上強調指出，我們在過去犯了一個重大的錯誤：在最初沒有考慮到一些同志的警告（也就是布洛赫一派的警告），就決定接受平等社會黨的建議，認可了組建平權委員會的請求。但我還是要提請您注意以下事實：

1、就平權委員會的組建問題與錫蘭黨代表進行討論的正是英國的同志，尤其是您。在我看來，當您決定就這一重要問題與錫蘭黨代表討論時，您應該是經過慎重考慮的。實際情況是，在巴布洛派（Pabloite）的六月會議後，您就在同錫蘭黨代表進行磋商，並同意他們組建平權委員會。這是完全正確的。因為這樣可以進一步打擊巴布洛主義，以便國際書記局（IS）能夠贏得所有「托派」特別是錫蘭「托派」的支持。這一觀點在加農同志給提拉克的信中也表達得很清楚。

2、去年八月，在國際委員會就平權委員會這一問題進行討論時，法國的代表們表達了激烈的反對意見，您曾予以激烈的反駁，並以同樣的魄力建議國際委員會批准平權委員會的章程。毋庸諱言，我當時是完全支持您的。

3、去年八月國際委員會大會結束後，布洛赫和一些法國同志採取了一種阻撓平權委員會發揮實際作用的態度。針對這一點，您曾在去年十一月國際委員會大會上嚴厲地批評了他們，您還起草了一份決議以確定平權委員會的角色，並號召委員們參加平權委員會。您甚至還提議免去布洛赫的國際委員會書記一職。直到今年六月的會議上，當布洛赫拿出一封義大利同志的來信反對平權委員會時，您仍然捍衛著自己固有的立場，批評蘭伯特一夥的不忠誠、不道德行爲——企圖通過一些小伎倆鼓動義大利的同志支持他們。

通過以上事實，以及這麼多的嚴肅討論與激烈爭吵，我

很難相信當您決定採納錫蘭黨的意見時，您會是因為輕率和考慮不周犯下錯誤。

在上次會議上，您對錫蘭黨缺點的批評的確令我震驚。因為不久前，特別是自去年八月份以來，當布洛赫一派誹謗平等社會黨時（他們依據的是其成員從錫蘭訪問歸來後的一篇報告），貴國支部極其憤慨，您更是挺身而出為錫蘭黨辯護。但怎麼都想不到的是，不到一年的時間，您竟然完全認同了法國同志對平等社會黨的意見，轉而反對您曾一直支持的觀點。

我在上次會議上的評論中說道：儘管平等社會黨存在某些缺點（事實上，任何一個支部都存在缺點，十全十美是不存在的），但是它的優點遠遠大於其缺點。它不僅在政治上堅持了托派的一貫立場，而且它還是我們運動中唯一一個具有群眾基礎並能有效地發動全國範圍內群眾運動的支部。確切地講，它已經在全世界托派中，尤其是在東方的托派中贏得了巨大的聲望。因此，為了促進東方托派運動的發展，我們主要的任務應該是鼓勵它、幫助它（當然不能壓制任何正確的批評），進而團結它。同時由於印度史大林派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妥協，我們也必須關注印度托派的發展。因此，努力尋求與平等社會黨的進一步合作以促進托派運動的深度發展，就顯得迫在眉睫了。另外我還要指出一點：由於您身處英帝國主義的中心，所以無論是以前還是現在，您都應該對那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的托派運動予以特別的關注，尤其是對錫蘭和印度，我們更應該真誠地與他們緊密合作，以對付我們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

為了爭取與平等社會黨的深入合作，我們應該採取一個正確的立場以贏得他們的信任，而不是指責他們的缺點或採取一種宗派化的態度。從這一立場出發，我認為您以前與錫

蘭代表們協商的努力以及採納他們對平權委員會的建議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感到欣慰，也就是說，才能讓他們相信我們是爲了整個運動的利益真誠地與他們合作的。現在我不得不指出，您最近在同一問題上的立場不僅沒有贏得他們的信任，而且相反招致了他們的不滿。提拉克給我的回信就是明證。

至於繼續平權委員會職能的原因與必要性，我已經在國際委員會大會上反復地講述過，並且我已經把我最近給史密斯（杜勃士）的信一併附寄了去，在此我就不再多說了。

無論怎樣，我認爲我們退出平權委員會的惡果是無窮的：我們不僅在錫蘭黨內而且在巴布洛派影響下的托派中招致了憤慨與不滿；這將進一步持續我們運動的分裂與分化，並在客觀上有助於巴布洛在此鞏固他在國際書記局的地位，使他得以繼續欺騙廣大同志和群眾，影響托派運動的健康發展。因此我要求您必須重新考慮這一問題。關於這一問題的決議應該在徵求新西蘭（即美國支部\*）和中國支部的意見後予以對外公佈。這是一個慎重的、合理的補救措施。但對於其他支部和小組，我們也可以徵求他們的意見，如冰島（加拿大支部）。另外，我必須再告訴您一件事情：今年八月份的義大利小組會議，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一份支持平權委員會繼續存在的決議。但是參加會議的布洛赫同志對這一決議未置一詞。很明顯這是一條對他們很不利的消息。這一點是值得我們討論和查問的。

我的具體建議如下：上次會議與平權委員會有關的決議應推遲對外公佈，同時應儘快地徵求新西蘭、冰島等支部的最終意見；這一決議應重新予以討論，並在國際委員會下一次會議上作出最終決定。至於中國支部，由於通信地址的問題，我還沒有及時組織大家討論國際委員會的這一決議。但

我相信，他們是不會站在錫蘭黨以及國際書記局所屬的其他托派的對立面的。

在國際書記局兩年的痛苦經驗和教訓，使我深深感到：我們在對待重要問題時，一定要採取審慎而嚴肅的態度；我們只有嚴格地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和必要的組織程序，才能重建我們運動的良好傳統。

我對您本人抱有十分的敬意，也很欽佩您在您的祖國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此，我希望您也能在國際範圍內做出同樣出色的成果來。這是您義不容辭的職責。

您的友好

彭述之

\*譯者註：由於當年美、加政府禁止本國政黨參加外國政治組織，迫使美、加兩國的第四國際支部暫時分別改稱為新西蘭和冰島支部。

# 關於保衛蘇聯及列寧的布黨的 民集制原則問題的討論

——答一位留日友人提出的問題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七日)

親愛的 Le：

你在來信中對於保衛蘇聯問題和列寧黨民集制問題，所提出的懷疑是：

A. 「在戰爭（指未來大戰）一起後，政權在官僚手中，在軍事獨裁下……它拿藉口阻止進步人士之批評、宣傳和向群眾工作，……會罪惡地摧毀一切。那麼，著手工作就十分困難，甚至成爲不可能的。……」

B. 「是民主自由問題，一個政黨在野時所要求的，到一旦上臺即不回顧，無產階級專政成爲一黨專政，其發展爲官僚與獨裁者，實勢所必然。……沒有公共的管理，腐敗現象必不可免。沒有出版與集會等自由，那裡還顧得上創意力與機動呢？蘇聯與中共今日之現狀，決不能簡單以落後國家一詞而忘記了當年列氏布黨原則是否有恰當之處。……」

上面這兩個疑問，確是一般地容易引起的，但也是最危險的。因爲對它們如不加以徹底的澄清和理解，可能引到對原則的懷疑，甚或放棄。但要徹底澄清和理解它們，首先還是要從原則方面著手。而且這兩個問題中間是有著相互的聯繫的。現在讓我們從第二個問題說起。

列氏建立布黨的原則是民集制。這制度的本身是非常辯證而絕對正確的。沒有這種制度便根本談不上任何革命黨的

建立，更談不到任何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與完成了。所以懷疑這種制度的原則，就等於懷疑馬氏的全部學說。

但對民集制要達到正確的理解和運用，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事。人們往往將民主與集中任意割裂開來，而擇其中之一以為己用。例如小布爾喬亞的民眾主義者，選擇或強調前者而否認後者；小布爾喬亞的官僚們則相反，堅持後者而抹殺前者。只有真正代表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者，如列寧、托洛茨基們，才能將它們有機地辯證地聯貫起來，加以靈活的運用。正如老托所說：「沒有內部的民主便沒有革命的教育；沒有紀律，便沒有革命的行動。第四國際的內部機構是建立在民主與集中的原則之上：討論的充分民主，行動的完全一致。」

假如仔細研究過列氏在布黨中對於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實踐和靈活運用的無數事實，便可充分瞭解這個原則是完全正確而唯一有效的了。例如，列寧提出「四月提綱」（一九一七年）後，他即要求黨內盡量進行民主自由的討論。在此種討論過程中，他贏了多數，決定了往後的基本方針。從此，便是要求少數服從多數，對外行動一致，以便爭取和帶動群眾走向革命勝利的前途。以後，無論是對布萊斯特和約問題，新經濟政策問題等，都是在決定之前，經過最民主的自由討論，獲得大多數的支持，才作最後決定的。

在進行討論的過程中，沒有人享受特權不受到批評和攻擊。（列氏本人即遭到千百次的批評和攻擊的。）列氏的唯一權利，也就是每個黨員的權利，只是根據理論和事實去批評或反駁對方，以便說服和贏取多數的支持。正因為有這樣的制度和切實的運用，老列才建成了布黨，並藉它取得革命之勝利，和保持其勝利成果。因此，我們現在沒有任何理由和事實足以懷疑「列氏的布黨原則有欠當之處。」相反，只有

忠實地徹底地遵照和運用「列氏的布黨原則」，未來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以及蘇聯的復興和中國的改變，才有可能。

至於老史（大林）及其他的官僚們（老毛在內）之剝奪了群眾的「出版與集會等自由」，使得「一切公共制度的生命漸趨死滅」，談不上「創意力和機動」……——這一切，絕不足以證明「列氏的布黨原則之不當。」相反，只是證實了史及其追隨者們，完全背棄了列氏的原則，才形成了「蘇聯與中共今日之現狀。」

這裡，僅簡單地指出如下一些事實就夠證明史之背棄列的民集原則達到如何程度：1. 在老史統治的黨內，重大的問題都未經過黨內的民主自由討論，即使形式上經過討論，也沒有人敢發表對立的主張，更沒有人敢批評和攻擊老史本人的錯誤。所以老史起草決議或提出的主張，都是刻板地「一致通過的。」2. 如果有人提出不同的主張或批評老史，便必然遭到開除黨籍，取消工作，充軍，甚至槍斃或暗殺。無須說，老毛是完全模倣老史的作風，這是取消一切民主的最惡毒的巴拿帕特獨裁。在這種獨裁制下，當然「一切公共制度的生命漸趨死滅，」談不到任何群眾的「創意和機動」了。

但老史及其追隨者們，何以竟能背棄「列氏布黨原則」到如此程度，而形成其寡頭的官僚獨裁呢？這便是問題的核心。你說：「不能單以落後國一詞」來解釋，而忘記了當年列氏的布黨原則是否有欠當之處。關於「列氏布黨原則」的正確及其在實踐上之有效，我們在前面已從列氏的理論及其實踐上的成功中作了不可爭論的說明。因此，問題便只在於「落後國」能否解釋斯的官僚層之形成。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想：只要你仔細讀過老托的《蘇聯現狀及其前途》和其他著作，一定會充分瞭解或得到解釋的。

因此，這裡只簡單地指出幾點：

1. 正由於俄國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無產階級踏上政權後，不能不依靠大量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在行政、經濟和文化各方面來進行其改造工作。因此，這大量的知識份子便得以形成新的官僚層。在當時可能避免這種新官僚層的形成，或至少避免它篡奪無產階級政權的，只有依靠西方先進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及時的援助。但正因為沒有這樣的援助，蘇聯在孤立狀態中，新官僚層之形成，乃至篡奪無產階級的政治權利，便成爲無法避免的了。這才是唯一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解釋。

2. 也只有從前面這一正確解釋，我們才能獲得一個正確的政治結論：要復興蘇聯回到列氏的時代，即重新走上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必須由群眾以暴力推翻史的官僚層，（即政治革命）恢復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民主。但要達到這點，先進國的革命勝利便是不可缺少的前提。因此，可以說，蘇聯的復興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特別是與先進國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是緊相聯繫的。史之放棄世界革命與托洛茨基之堅持這個革命，其根因即在於此。

我們還可以從一個假設來具體地解釋上面的問題。假如一九二三年德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了，情形將是如何地不同呢？德國的工人階級都具有較高的文化水準，差不多都能讀能寫。更具有高度的技能及民主傳統。因此，他們在踏上政權後，雖然還不能拒絕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協助，但他們一定可以控制後者。因爲工人們在全人口中佔壓倒的多數，（俄國工人在走上政權的當時，僅佔人口中一個最少的少數）同時他們的能力足以管理他們的國家。在這種情形下，小資產階級的新官僚層那裡還有形成之可能呢？同時，蘇聯無產階級得到德國文化水準極高的無產階級的援助，它的小

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在強大的壓力之下，也就不敢，並且不可能結成一個新官僚層來壓制無產階級了。另一方面，蘇聯無產階級得到德國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鼓舞和支援，他們會勇敢地抬起頭來，抑制那些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跋扈的。再進一步，假如英、法、美的無產階級獲得勝利，其情形將是怎樣的樂觀呢！

你說：「所謂民集制，僅在一個黨行之，日久必生流弊。世上能有列托之心胸不濫用權力者，實少乎其少。」不錯，「能有列托之心胸不濫用權力，」實在是難得的。但問題並不是由少數個人的主觀德性來決定，而應由造成主觀德性的客觀條件來決定。在一個落後國的條件下，即在無產階級文化水準太低和缺乏民主傳統等的條件下，少數人「濫用權力」是很可能的，甚至是不可免的。在這種條件下，「不濫用權力」便顯得「難能而可貴」。（可謂「歲寒松柏」。）但在無產階級文化水準高度發展的條件下，因為大家都知道並能夠使用其本身應有的「權力」，因而也就一定要限制別人「濫用權力」了。這樣，「不濫用權力」將變成普遍的現象，因而成爲一般人的普通德性了。這時，倒是「濫用權力」，不但不可可能，而且會顯得奇怪的。

總之，我們應常常記住馬克思的話：「是存在決定意識，不是意識決定存在。」老史們之背叛列氏原則而墮落到現時如此驚人的罪惡程度，最後分析起來，並非由於他們的天性使然，而是由於俄國的落後與孤立的環境所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固然，像老史這類人，其本性是「粗暴」（列氏對他的批評）和毒辣的。但假如他們被放在無產階級文化水準較高的條件下，或蘇聯無產階級得到西方先進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援助的條件下，他們不但無法發展其罪惡的本性，而且會被群眾踐踏在腳底下的。這也正是托洛茨基堅持推進世界革

命，特別是先進國革命的根本。

我們如果正確地理解了民集制的原則及聯共墮落和新官僚層形成的客觀原因，則對於「保衛蘇聯」的問題，也就不難理解了。這裡讓我們指出蘇聯內部情況的幾個主要點：

A. 官僚層在群眾中原是居於極少數。由於工業的迅速發展，無產階級數量的巨大增加，（當年十月革命時，無產階級人數僅四百餘萬，現在已增至四千八百萬。）官僚在群眾中愈顯得渺小。

B. 無產階級在十月革命時，文化水準一般很低，有很大的一部份甚至不能讀和寫。現在他們的絕大部份差不多都能讀和寫了。因此，他們在各方面的能力都提高了。

C. 官僚的腐敗與橫暴，不斷地暴露出來。有時甚至是由他們自行暴露出來。例如貝利亞事件等。現在他們正在開始暴露老史的「個人統治」及其「思想上的錯誤」，如米高揚和沙斯諾夫等最近在聯共廿次大會上所發表的。但在群眾的眼中，槍斃貝利亞的官僚們，當時是完全狼狽為奸的；批評史獨裁和錯誤的官僚們，正是當時史實行獨裁和犯錯誤的無條件的擁護者。

D. 群眾中，已經有很多的先進份子，他們根據自己親身經歷的痛苦經驗，已相當普遍進行了反官僚的鬥爭，並形成了最秘密的組織。（如列寧團等）這從集中營幾百萬政治犯的龐大數字上充份地反映了出來。

單就上面的幾種情形，便已可預測官僚層未來的命運了。

當然，在未來的大戰中，官僚們是要盡可能利用他們手中的「政權」來「阻止進步人士之批評、宣傳和向群眾工作的」。但這種「阻止」並不是萬能的。寧可說，是有限的，尤其在大戰當中。因為在大戰中，在敵人最可怖的威脅下，官僚們為保衛自己的腦袋，不得不或多或少遷就群眾的壓力，

尤其不得不讓群眾武裝起來。但群眾一經武裝起來，他們的發言權也就更顯得有力了。這時，平常在官僚威壓下心懷不滿和憤恨的無數群眾，在一批最勇敢而具政治頭腦的份子（如列寧團之類）的宣傳和鼓動之下，那些高高在上的極少數官僚們是無法「阻止」的。尤其在某些先進國革命運動高漲（這是必然的）鼓舞之下，蘇聯群眾將變得更勇敢和積極，是未來蘇聯群眾在實踐中行動的指揮，而伏庫塔集中營……的大暴動，更是群眾推翻官僚獨裁的預告。

當東德六月事件爆發前，誰也沒有想到會發生如此大規模的普遍全國的群眾暴動。因為情形正是：「政權在官僚手中，在軍事獨裁下，」「它阻止進步人士之批評、宣傳和向群眾工作。」「它們……罪惡的摧殘一切。」大家以為在這種情形下，不但起來暴動不可能，即「著手工作」也「是十分困難，甚至不可能的。」但事實怎樣呢？事實是：那些平常在廠裡似乎很老實的，並經常在官僚和格柏烏監視下的無數工人，尤其是青年工人，一旦在一個簡單的示威刺激之下，便有如雨後春筍般突然抬起頭來，在各工廠裡，各城市裏，一下子組成了他們的罷工委員會、糾察隊和別動隊等；並迅速地把各廠的組織聯繫起來，成立了城市的指導中心；最後，各城市相互間也很快取得聯絡，成立全國性的指導核心，至少是聯絡的核心；就這樣地形成了全國範圍的反官僚獨裁的暴動，使得東德傀儡政府陷於手足無措的癱瘓狀態。最有意義的是，甚至許多共黨的下層黨員被捲入鬥爭中，或消極悲觀。這一偉大的英勇的事實，不是雄辯地證明官僚們的「軍事獨裁」和「格柏烏的卑劣手段，」在大事發生前表現得衰弱無力嗎？！不是同時證明了：「進步人士之批評、宣傳和向群眾工作」，不但是完全「可能」，甚至發動群眾起來暴動也是「可能的」嗎？！像東德這樣的事件，正是未來東歐各國

及蘇聯本身的群眾暴動的榜樣。東德暴動之被壓平，僅因為蘇聯全部軍隊動員的野蠻行動。但此種行動，在未來的戰爭中是會受到限制的。因為軍隊本身會起分化作用，因而轉過來，或部份地轉過來同情群眾暴動以反對官僚們是很可能的。伏庫塔的守衛集中營的士兵們，已暗暗地表示了他們對獄犯大罷工的同情，便是象徵性的預示。

總之，對蘇聯未來的動向，必須從動的發展的觀點來推斷和估計。如果從靜的觀點來看問題，則希特勒、莫索里尼、乃至蔣介石，在他們當年極盛的時候看來，似乎都是安如磐石，不可動搖的，但歷史證明，前兩者都倒下去了，後者也被趕出了大陸。難道蘇聯官僚層能夠逃過這種命運嗎？！老黑格爾說得很好：「不合理的終歸消滅。」

你說「官僚的國有財產把持在手中，群眾一時不會瞭解官僚與財產的關係。」但實際上，蘇聯群眾比我們這些蘇聯以外的人們瞭解得更具體和實際。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財產是國有，即大家共有的，絕不屬於任何私人，當然也不屬於官僚。另一方面，他們從實際生活中看到，官僚們是在濫用權力，侵蝕國有財產的果實，享受特權，養尊處優，剝奪群眾壓低他們的生活水準及一切應享的權利。因此，在群眾中發生的一切不滿和憤恨，從沒有歸咎於國有財產，而只是朝向官僚們的橫暴和壓制發洩。有不少從東歐及蘇聯逃出來的份子，他們並不懂得托洛茨基主義，但他們說，社會主義的國有財產是對的，應當保持的，但官僚們利用這種財產來享受特權，剝奪群眾，應該打倒。「列寧團」（現時普遍蘇聯全國的極秘密組織，也是領導了伏庫塔打大罷工的核心組織。）雖然不知道托氏的主張，（因為他們差不多全是青年工人和學生）而他們的政治方針和口號是：「回到列寧時代。」這意思就是說，消滅官僚獨裁，保持社會主義財產制，恢復工人的

民主，回到列氏的路線向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列寧團」這種方針和口號，正是無誤地反映了群眾對於「官僚與國有財產關係」之正確瞭解哩。

我們在上次信中曾說過「保衛蘇聯」只是保衛由十月革命所創立的社會主義財產制，絕非保衛那侵蝕社會主義財產制的官僚們。相反地，爲了徹底和有效地保衛此種財產制使其合理地發展，必須推倒那個官僚層。這在表面上似乎矛盾的，但實際上是完全由矛盾的客觀現實得出來的辯證的唯一正確的結論。把「保衛蘇聯」看作爲保衛官僚層，是把官僚層加以美化，把它看作國有財產的代表，——這是史大林主義者或新史大林主義者的立場。另方面，在承認官僚層把持國有財產及其一切的罪惡之下，認爲保衛國有財產，即等於保衛官僚層或等於保衛它的「物質基礎」，這是一切小資產階級的反蘇的民主主義者的主張。但這兩者，在方法上是一致的，即形式邏輯。因而在實際的可能產生的後果上，都是違背蘇聯無產階級及世界革命的利益，而客觀上（不管他們的主觀如何）是爲帝國主義服務的。所以「保衛蘇聯」與「打倒官僚獨裁」是有機地不可分離的，是代表蘇聯無產階級和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利益的唯一正確的方針。

述之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七日

## 第二次大戰後國際局勢的演化與

### 第四國際的任務（草案）<sup>1</sup>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局勢的演化過程，其最本質的趨勢是：蘇維埃經濟形式之不可抑制的擴展，由地球面積六分之一擴展至三分之一；資本主義制度的均衡之不可挽回的破壞，老的殖民帝國的分崩離析，美帝國主義壓倒優勢的形成，前者對於後者之卑屈的依賴。由此便構成了美帝所領導的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財產制的蘇聯集團間之不可調和的矛盾，並因此急切地投進了新的世界大戰的準備。

正由於蘇維埃經濟形式的擴展，這首先便大大地縮少了帝國主義賴以生存的世界市場。再加上殖民地與半殖民地解放運動之不斷興起，更使這一市場遭到了致命的打擊。因而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生產與消費間的矛盾，日益趨於不可忍受的地步，由此從根動搖了社會的均衡，日益醞釀著和加深著社會階級的衝突，替世界革命準備了客觀的前提。

同時，也正因為蘇維埃經濟形式的擴張，便與強加在它上面的史大林主義官僚獨裁制的矛盾，日趨緊張和尖銳，而迫近最後的爆炸點——政治革命。

---

<sup>1</sup>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國際局勢的一般演化，尤其是關於蘇聯、中國第三次革命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發展，I.C.（國際委員會）所提供的「討論草案」，（如《今日的世界》、《今日的蘇聯》、《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後果》，和《殖民地資產階級的興起》）已作了頗為詳細的分析。因此，本草案不擬重覆那些分析。而是根據那些分析所達到的重要結論，尤其是在最近發生的事變的光照下，（如聯共廿次大會所宣佈的反史大林個人崇拜運動，波匈的革命運動，蘇彝士運河的爭奪戰等。）指出戰後整個國際局勢的演化過程及其前途與第四國際的任務。

### 資本帝國主義之不可挽回的衰朽及其矛盾的日益尖銳

（二）爲重分世界市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德、日、意帝國主義被完全打下去了，但勝利的帝國主義面臨的，首先卻是歐洲的東半部已落入蘇聯的掌握。尤其是英法帝國主義，不但毫無所得，反而發見它們自己的殖民地正陷於民族解放運動的沖擊中。

這便迫使大英帝國不得不向印度、巴基斯坦（大英帝國的支柱）、緬甸和錫蘭的土著資產階級讓步，容許它們的「政治獨立」，企圖以此保持其經濟的基本權利（如投資及英鎊集團等）。單只這一「讓步」便已足夠證明英帝的衰朽到了何等可驚的程度！

法帝曾試圖以武力壓平其殖民地的革命運動。但它在越南經過八年消耗巨量人力和物力的流血戰爭之後，終於被迫縮回了它的魔掌，而讓美帝去繼承它的越南南部的殘破遺產。它現時又在阿爾及利亞進行同樣絕望的戰爭。這更顯出法帝臨死掙扎之無比痛苦！

（三）由於在戰爭中所起的決定作用及其生產的特別增長，美帝不但使失敗的德日意成爲它的附庸，即勝利的英法在戰爭消耗與破壞所引起的經濟和社會危機，以及殖民地革命運動的威脅之下，也只有卑躬屈膝地依賴它的救援。因此，美帝得以支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成爲帝國主義的最後堡壘。

但美帝所得到的遠較整個帝國主義所失去的少得多。美帝參戰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從日帝手中奪取太平洋彼岸的廣大市場，尤其是中國市場。但戰後它在那裏所碰到的卻是暴風雨般的民族解放運動。雖然它曾獲得克里姆林宮抑制中共和恢復蔣介石政權的同意（雅爾達協定），但由於蔣政府的過份腐朽與不可抑制的群眾革命行動（農民武裝鬥爭），終於只

好看著整個中國大陸落入中共手中。

它在印尼曾推動荷蘭與土著資產階級妥協，企圖以此參加那裏的市場。但在印尼資產階級腐朽與群眾運動日益醞釀的威脅之下，其結果仍然是一大疑問。尤其它在朝鮮戰爭中所付出的鉅大代價，僅能勉強維持南朝鮮的殘破局面。這一切充分暴露了這個帝國主義最後堡壘本身力量的限度和弱點，並同時反映了資本主義制度之不可挽回的腐朽的深度。

（四）在經濟和社會的平面上，由於它所處的特殊地位，美國本身在戰爭中不但沒有遭受任何破壞，反而藉著戰爭的需要大大地擴張了它的生產，出現了「空前的繁榮」。因而不僅能夠維持本國人民的生活水準，保持社會的相對均衡，而且還暫時挽救了西歐諸國的社會危機（當然是得到克里姆林宮叛賣法意革命的幫助），並協助它們（通過馬歇爾計劃）恢復了為戰爭所破壞的生產。但這一切不僅沒有解決資本主義生產與消費間的基本矛盾，反而使得這種矛盾愈益尖銳起來。

首先是美國本身的生產過剩已深感到市場的過份狹小。尤其是它的農產品更少出路。它除了高築關稅堡壘以阻止外貨輸入外，便是用傾銷去侵蝕其他各國的市場。這樣，不但引起了西歐諸國，尤其是大英帝國的抵制，而且大大地破壞了落後國家的農業（由於農產品的傾銷），因而更壓低了它們對工業品的購買力，加深了生產與消費間的矛盾。因此，早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前，蕭條的徵兆已提出了警告。這便是美帝急不及待地發動這一戰爭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朝鮮戰爭確實阻止了經濟危機的爆發，並由於軍事的需要大大提高了生產。不但美國的生產大事擴充，即英、法、尤其是德日的生產，都超過戰前的水準，出現了「新的繁榮」。但此種繁榮隨著朝鮮戰爭的停止便立即消逝，代之而起的又是危機的威脅。美國汽車工業的大減生產，歐洲紡織

業的開始衰落，尤其是日本大部份工業的停滯，在在都顯示此種經濟危機的徵兆。因而爭奪市場又成爲這些生產過剩國家間之最迫切的問題。

由生產過剩而引起的生產停滯，首先受到影響的是工人階級。不但它當中的一部份已直接遭到失業的痛苦，即在業的工人群眾，由於物價的繼續增高（即通貨的不斷膨脹）亦日益感到生活低落的威脅。「歐洲大多數國家近兩年來所經歷的物價高漲，是今天真正的危機」（見「歐洲合作組織」一九五六年十月所披露的文件，載於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出版的一九五六年十月的經濟評論）。此種「物價高漲的真正危險」，不僅在「歐洲大多數的國家」，即美國和其他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亦是如此。在物價日益高漲，即通貨日趨膨脹（此種膨脹，在生產停滯和軍備加緊的情形下是不可避免的）壓力之下，工人群眾生活的水準勢必降低。這就迫使工人群眾不得不起而進行鬥爭。此種鬥爭（由罷工表現出來）現在已在美國和英國開始發動。在不遠的將來，隨著經濟危機的發生，誓必以更大的規模普及到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而釀成社會的大危機。

另一方面，在落後國家，由於帝國主義生產品的傾銷所引起的生產的停滯，尤其是由於美國農產品的傾銷所造成的農業危機與土地問題的尖銳化及一般農民的貧窮化，勢必迫使一般勞苦群眾，尤其是廣大的農民群眾，不得不日益走向生死鬥爭的道路。

（六）解決生產過剩所引起的市場問題及避免社會危機，在帝國主義者看來只能藉助於戰爭。這便是以前兩次世界大戰的根本原因。因此上次大戰剛結束後，領導資本主義世界的美帝即將新的大戰的準備提出於議事日程。雖然克里姆林宮的官僚盡力犧牲法意的革命，並將其所佔領的東歐諸

國限制於資本主義的範圍內，以表示極願與西方帝國主義謀取妥協，但在美帝眼中，蘇聯社會主義財產制存在和生長，它的勢力範圍擴展至東歐，以及各國史大林主義黨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領導或參予的民族解放運動（不管它們所採取的政策是機會主義的），對於資本主義的生存和發展，都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威脅。

因此，美帝所領導的資本主義世界對於反蘇戰爭的準備，也就隨著經濟危機的威脅之增加與落後國解放運動之發展而日益緊張。它以馬歇爾計劃穩定了西歐之後，立即發動了冷戰，隨著大肆擴充軍備，建立北大西洋協定集團（NATO），重新武裝它的盟國，成立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加強那裏的防綫。並在蘇聯集團周圍建立普及全球的海陸空軍基地，大量製造核子武器，準備一舉摧毀蘇聯及其衛星國。

### 蘇維埃經濟形式的生長和擴張與史大林主義的危機

（七）由於十月革命所創立的社會主義財產制，工農群眾的無比犧牲精神，以及帝國主義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但擊退了希特勒的毀滅性的進攻，而且佔領了歐洲的東半部，成為戰後世界的第二大強國。隨後由於中共對蔣介石的勝利，蘇聯的勢力更擴張至亞洲大陸（包括北朝鮮和北越）。這樣，它便給了帝國主義以最嚴重的打擊，因而沖破了戰前那樣被包圍的孤立狀態。

另一方面，由於同一社會主義財產制的存在及其工業的動力，和工農群眾的同一犧牲精神，蘇聯迅速地恢復了被戰爭所毀壞的生產機構，而且以驚人的速度提高了生產，成為世界第二工業國。這便使得原來落後的俄國經濟接近了西方先進國的水準。

在蘇軍佔領的東歐諸國，克里姆林宮雖曾極力將這些國家限制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以便與西方帝國主義進行妥協。但在美帝所領導的冷戰進攻與實際準備大戰的威脅之下，迫使官僚們不得不依照蘇維埃的經濟形式去同化他們。就是說，不得不沒收那些國家的資產階級的財產為國有，進行計劃經濟。雖然官僚們同化東歐是用它自己的方法，——盡量避免群眾革命行動的軍事官僚方法——但這一「同化」的事實證明：蘇維埃經濟形式的擴張動力是不可抑制的。現在這同一蘇維埃經濟形式的動力，更迫使毛澤東放棄其「新民主主義」的反動圖式（即長期建立非資本主義非社會主義的烏托邦經濟），而在中國大陸開始大規模進行同化，並同時擴展到了北朝鮮和北越。

（八）蘇聯生產的驚人增長及蘇維埃經濟形式的大大地擴張，固然給了帝國主義的生存以最嚴重的威脅，加深了它的矛盾與危機，但同時與壓在此種經濟基礎上的史大林主義官僚獨裁政制的矛盾，也以同一比例生長和擴展起來，日益走近爆炸的邊緣。

由俄國的落後與孤立所形成和生長起來的寄生官僚層，曾經以極端橫暴和殘酷的格柏烏，迫害其反對者，鎮壓群眾（大規模的逮捕、莫須有的審判、屠殺、集中營的奴役等），以保持其巴拿帕特的獨裁及一切生活上的享受特權。但現在它正面對著一個新興的工人階級！

這個隨著生產的增長而增長起來的階級，由於其數量之龐大（其數目達四千八百萬，僅次於美國），它的技術與文化之提高，及其在戰爭中與生產上所起過的決定作用，已深刻感到它自身的作用、力量和地位之重要。尤其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運動繼續勝利和蘇維埃經濟形式大形擴張的鼓舞之下，更感到官僚加在它身上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奪之不可

忍受。因而工人群眾改善生活與地位的熱望，便同史大林主義官僚的壓迫和剝奪的衝突不可抑制地加深和加速起來。

（九）蘇維埃經濟形式擴展至東歐諸國，在計劃經濟與工業化的推動之下，這些國家的經濟確獲得了空前迅速的發展。但正由於克里姆林宮以純粹的軍事官僚方法輸入此種經濟形式，因而一種仿照蘇聯史大林主義模型製造出來的寡頭政治便在大俄羅斯主義的面貌下顯現出來。在這種政制下，不但工人群眾的一切政治權利被剝奪，而且經常處在格柏烏的恐怖之下，過著比戰前資本主義統治下更低的生活水準。因此反對本國傀儡官僚與其大俄羅斯主義的憤懣與怨恨，便隨著壓迫的增加與生活的痛苦，在工人群眾中日益醞釀著。

蘇維埃經濟擴展至北朝鮮與北越，雖然不是由於克里姆林宮的直接的推進，而是由於毛澤東、金日成與胡志明的「自願做行」，但他們在做行蘇維埃經濟形式和經濟計劃（包括工業化與集體農場化）的進程中所採取的方法，與蘇聯官僚在東歐諸國所進行的方法，本質上並無差異。因而在中國、北朝鮮和北越這些國家內的工人和貧農群眾與毛、金、胡等所代表的官僚層的衝突也就逐步在醞釀中，僅僅其程度比之東歐諸國和蘇聯的較為緩和而已。

（十）蘇聯，尤其是東歐諸國的群眾與史大林主義官僚層之不可調和的矛盾，早在史大林在生時已達到了極度緊張的狀態。蘇聯戰前和戰後的幾次大肅清運動，即是此種緊張狀態之無誤的反映。南斯拉夫之被迫與克里姆林宮公開破裂，以及隨著此種破裂而來的東歐諸國的大肅清運動，都充分表明了鐵托及東歐各國史大林黨的一部份領袖，在群眾極度憤懣的壓力之下，對克里姆林宮所表示的強烈的離心傾向。

史大林死後，繼承他的馬林柯夫們，在顧慮群眾乘著史大林之死起而進攻的威脅之下，曾被迫採取了某些讓步的措

施（所謂馬林柯夫新路綫），試圖以此緩和群眾的憤懣，繼續保持他們的特權地位。但東德的工人群眾，諾林斯克（NORINSK）和伏庫塔（VORKOTA）集中營的囚犯們，還是將史大林之死作為謀取解放機會而舉行了暴動和總罷工。雖然這些暴動和總罷工是被殘酷地鎮壓下去了，但由此充分表明：蘇聯，特別是東歐諸國的工人群眾和被壓迫者已達到用暴動來進攻官僚的程度了！

（十一）克里姆林宮的官僚們在東德和諾林斯克的暴動及伏庫塔的總罷工中，已深刻感到他們所處的地位異常險惡。為了繼續保持自己的特權，官僚們經過一個頗長時期的猶豫和考慮之後，終於不得不向日益增加憤恨的群眾作進一步的讓步。這便是聯共第廿次大會上所宣佈的「新政策」，以及特別強調反對「史大林個人崇拜」和「史大林個人獨裁」之全部用意。無疑地，這是史大林主義演化史上之一個劃時期的標誌。

「反史大林的個人崇拜」，在官僚們是企圖將過去引起群眾憎恨的一切罪惡都加在已死的「史大林的個人獨裁」之上，以此挽救還在活著的整個官僚層的命運。但在反「史大林的個人崇拜」與「史大林的個人獨裁」中，官僚們不得不宣佈如下的事實：史大林的總書記地位是列寧生前所極欲撤換的（並引列寧遺囑作證）；史大林是違反了列寧的民主集中制的；史大林利用格柏烏為工具，製造「人民公敵」的罪名，通過一系列的莫須有的大審判（即以酷刑迫令被告自承罪狀），剷除了無數的老布爾什維克與千千萬萬的革命青年和群眾；史大林迷信他與希特勒所訂的協定，致使蘇聯在戰爭初期遭受了大慘敗，喪失了幾百萬的生命；他用極殘酷的大規模的流放毀滅了幾十萬被壓迫的人民……（見赫魯曉夫在蘇共第廿次大會秘密會議上的報告）。史大林為自己個人的「榮

譽」，偽造了聯共的黨史和俄國革命的史實（見米高揚在蘇共大會上的演說）。所有這些事實都為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主義者不斷地揭露過和抨擊過的。

雖然官僚們極力隱藏了史大林主義在全部思想上對馬列主義的背叛，及其在蘇聯所施行的一切罪惡政策（如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強迫農場集體化與一般地忽視人民生活必需的生產等）和對各國革命（如中國第二次革命，德國一九三〇年——三三年的革命，西班牙一九三一至三八年的革命，法國一九三六年革命局勢，以及戰後法意的革命運動等）實施的背叛政策所引起的災禍與慘敗。但全世界的人民，尤其是被各國史大林黨領導層所欺騙的革命者（包括史大林黨的下層黨員）和工人群眾，從赫魯曉夫等所列舉的事實中，已十分清楚地看出那個曾經被宣揚為「偉大而英明的領袖」，「列寧的承繼者」的史大林，及「永無錯誤的史大林主義」的真實面貌和驚人的罪惡了！這同時也就從反面替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主義者三十餘年來反對史大林主義及其官僚獨裁的堅苦鬥爭作了不可爭論的強而有力的申辯。

史大林主義，現在是被史大林一手提拔起來的繼承者們正式宣告破產了，史大林主義的危機以驚人的形式爆發出來了！因此，在聯共第廿次大會之後，各國史大林黨都陷於極度混亂、動搖、分化和分解的狀態中。尤其是東歐諸國的史大林黨，由於過去在清黨運動中所種下的惡果及克里姆林宮的直接壓迫，更在其黨員群眾與工人階級中顯得不能忍受。這便是波蘭和匈牙利的革命最近爆發的直接原因。

（十二）波蘭的革命乃是波茲南暴動的繼續發展。這一普遍全國的革命運動，雖由於中派領袖們對克里姆林宮的妥協，沒有進行到底，但它已獲得了初步的成果：克里姆林宮派到波蘭的獨裁者羅可索夫斯基是被趕走了，群眾已自行組織起來

了，他們의思想和言論已獲得相當的自由了……這一切將會成爲下一階段革命徹底勝利的保障。由波蘭革命直接推動起來的匈牙利革命，比之前者進行得更爲徹底，因而具有更爲重大的歷史意義。它的目標清楚地表現爲推翻本國史大林主義的官僚獨裁和克里姆林宮的大俄羅斯主義的壓迫。它由群眾的示威、總罷工，直接進到武裝暴動，並在暴動過程中成立了工人委員會（蘇維埃）和民軍，瓦解了史大林黨和吉羅的秘密警察及其獨裁機構，提出了撤退蘇聯軍隊和由民眾自由投票選舉成立新政府的主張，這些由革命行動而非書面提出來的政治綱領，正是東歐諸國全體被壓迫民眾的迫切要求，而爲托洛茨基主義者早所提供的。雖然匈牙利的革命是被克里姆林宮的坦克無比殘暴地鎮壓下去了，但工人群眾的革命意志並沒有因此頹喪，他們的鬥爭還在繼續進行。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得出結論：匈牙利革命是蘇聯集團內政治革命之正式開幕。假如一九〇五年莫斯科暴動是十月革命的預演，則此次匈牙利革命便是全東歐及蘇聯未來政治革命之最生動的榜樣。

另一方面，從蘇聯坦克鎮壓匈牙利革命的無比殘酷事實中，不但充分暴露了赫魯曉夫們在聯共廿次大會上所宣傳的『改良政策』是虛偽的、欺騙的，即他們反對『史大林個人獨裁』的罪惡，也僅僅是藉此以掩飾他們自己在史大林指揮下所犯的一切罪惡而已。現在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及一切被壓迫群眾又一次（鎮壓東德暴動是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史大林的繼承者們是完全承襲了史大林的全部反動政策及其殘酷手段，以對待革命的群眾而保持他們的特權。正因此，便進一步加深了各國史大林黨的危機，加速了它們的分化和分解過程。

### 前途——戰爭與革命

（十三）列寧研究「帝國主義」得出的基本結論是：帝

國主義奪取市場的戰爭與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這些結論，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十月革命，尤其是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中國第三次革命以後，今天比之以往任何時期更為真實和迫切。雖然克里姆林宮的官僚們爲了保持自己的特權地位，同樣害怕戰爭與革命，而重新宣佈「戰爭可以避免，社會主義可以通過議會爭取多數達到」，而無須經過革命。（見赫魯曉夫在聯共第廿次大會上的公開報告）但此種重覆爲列寧所猛烈攻擊過的第二國際叛徒們的破產調調，同他們多年來所大肆宣傳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和平共存」一樣，除了暴露官僚們的極端反動的保守主義外，只能在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和一切被壓迫的勞苦群眾中散佈幻想，模糊他們的階級意識，阻礙他們的革命鬥爭，客觀上幫助帝國主義順利地進行其戰爭準備而已。

因此，現時擺在全世界面前的問題已不是戰爭與革命是否會發生，而是：由戰爭的爆發產生革命，還是由革命的勝利去阻止戰爭。

（十四）人們從美帝反蘇戰爭的決心與備戰的積極出發，斷定戰爭已遠遠地跑到革命的面前，而不可抑制地迫近它的爆發點。但這種觀點是形式的、機械的。因爲它忽視了戰略本身所包含的矛盾和革命的潛在動力。

毫無疑問，美帝反蘇戰爭的決心是絕對的，它對於戰爭的準備是盡其力之所及積極地進行的。但在準備戰爭的過程中，美帝已經遭到了，並且還要遭到許多不易克服的矛盾和障礙。例如：美帝與其同盟國間，特別與英法間的矛盾；帝國主義與殖民地間的矛盾，以及帝國主義與本國群眾間的矛盾；——這些矛盾，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前，雖不足以阻止戰爭的爆發，但妨礙戰爭的準備，即拖延戰爭的爆發是完全可能的。

在朝鮮戰爭中，美帝曾擬將此種戰爭推至中國大陸，以此擴展成爲反蘇大戰。但由於英法爲自己的殖民地革命運動所牽制（如英之馬來亞，法之越南），表示消極態度，尤其因爲中國的參戰所表現的驚人戰鬥能力，這便打破了美帝原來的陰謀。

當奠邊府被包圍，越南戰爭陷於極度危急時，美帝參謀總部也曾擬藉口中共對越盟的援助，使用核子武器進攻中國，以此擴大戰爭範圍。但由於英國的反對，法國的消極，美國只好採取觀望等待的態度。

最近英法帝國主義冒險所發動的重奪蘇彝士運河的戰爭，如果繼續進行下去，便有可能發展成新的世界大戰。但美帝深深感到在這樣的戰爭中，整個中東和北非的阿拉伯民族將站到蘇聯方面。這樣，不但它在中東的油源和北非的空軍基地將全歸烏有，而且還要用極大的軍力來對付阿拉伯民族的解放戰爭。這對於反蘇戰爭將是一個致命的威脅。這便是美帝不得不對英法實施壓力，促其儘速停戰的主要原因。但今後中東和北非的阿拉伯民族問題，對於美帝的備戰計劃仍然是一個極難克服的障礙。

此外，西德的重整軍備（這是美帝備戰計劃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在法國的掣肘（如一九五四年法議會通過決議反對西德加入歐洲集團）和本國人民反對之下（西德國會幾次延期通過阿登納的整軍計劃，即是反映了民衆的反對）進行得極爲遲緩；英國統治階級，在蘇聯佔有核子毀滅武器的威脅之下，對於戰爭的恐懼與猶豫；法帝調動全部軍隊鎮壓阿爾及爾暴動，使得北大西洋同盟的軍力大爲削弱；各國民衆，尤其英國民衆反戰情緒的高漲；（最近英國人民反對艾登政府發動蘇彝士戰爭，便是顯例。）……所有這類的因素，雖不足以阻止戰爭，但對於美帝備戰和發動戰爭的時間表，曾起

了，而且還要起著阻礙與拖延的作用的。

（十五）在戰爭延期爆發的情形下，經濟的危機，如前面所指出的徵兆，依照生產日益增加與市場日益縮小的邏輯發展，將不可抑制地爆發出來。雖然爆發的時間不能預測，但要延期長久是不可能的。如果經濟的蕭條一旦出現，則工廠關閉，工人失業，物價高昂，銀行倒閉，財政混亂，勢必掀起社會的大危機。這樣，一個新的革命局勢將在全世界範圍內顯現出來。

首先是法意的工人階級將隨著經濟蕭條的刺激踏進戰場。法意的工人群眾，雖然因為史大林黨和社會黨的背叛政策遭受了挫折，但它們的實力一直保存下來。而且在失業和貧困的經常威脅之下（意），在統治階級不斷鎮壓殖民地革命所加的重負和痛苦之下（法），工人群眾早已對現狀深感不滿。因而一種革命的潛局久已存在於這兩個國家中。此種潛伏的革命局勢，在經濟蕭條的推動之下，很快就會轉變為公開的革命局勢的。

在英國，工黨的左派運動（貝文所代表的）和工人的急進運動（如碼頭工人的獨立罷工）無誤地反映了工人群眾對現狀（包括對勞動官僚）的深刻不滿。此種不滿，一旦遇到經濟危機的刺激，便有可能轉變為公開的革命行動。完全被剝奪了殖民地市場的西德和日本，由於它們的高度生產力，已深深地感到生產過剩的窒息。此種生產過剩的結果，不是降低工資，便是乾脆停止生產。因而工人群眾的不安和不滿情緒日在發酵中。新的經濟危機將不可避免地要推動這兩個國家的工人階級踏上革命舞臺。

最後，就是美國也絕難逃避經濟恐慌所引起的革命的沖擊。三十年代的經濟蕭條對它所發生的後果，便是最好的證明。

在落後國家，無論是亞洲、非洲或拉丁美洲，由於民族與土地問題的急待解決，民族民主的運動不是已經爆發成爲公開的戰爭，便是在潛滋暗長。在未來經濟恐慌的推動下，這些國家勢必被捲入暴風雨般的革命怒潮中。而那個代表「中立主義」（即企圖以「中立」的幌子避免捲入戰爭，並藉史大林黨的幫助阻止本國革命）的尼赫魯的印度，由於它的土地問題與國內民族問題的異常尖銳，將會成爲落後國家的革命的主流。

假如三十年代的經濟蕭條曾引起了德國一九三〇——三三年的革命，西班牙一九三一——三八年的革命，法國一九三六年的靜坐大罷工和美國的產業工人大會（CIO）運動，我們便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下一次的經濟蕭條中，一個普及資本主義世界的革命局面不可避免地要開展出來。

（十六）另一方面，在蘇聯集團內，最近波、匈的革命已絕對無誤地指出：整個東歐不僅是一座火山，而且火山的缺口已冒出火焰來了。克里姆林宮的坦克車可以暫時堵住火山的裂口，但絕對不能阻止火山的最後爆發。相反，暫時堵住火山裂口，只有醞成火山的總爆發而已。

很明顯地，當波匈的革命運動前進時，東歐其他國家，如東德、捷克、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等，都已呈現不穩狀態。東德與羅馬尼亞的學生青年們，甚至已公開提出了某些反官僚的民主要求（他們多出身於工人和農民的家庭，常是敏感地反映了一般民眾的憤懣和願望），這正是以前引起波匈革命的序曲。僅因爲匈牙利革命遭受了克里姆林宮的無比殘酷鎮壓，東歐其他國家的革命才暫時被抑制下來。但克里姆林宮的坦克壓平了東德的工人暴動（一九五三年六月）之後仍然爆發了最近的波匈革命，這就足夠證明：這次匈牙利革命的被鎮壓，絕不能阻止東歐其他國家未來革命之興起。因此，

可以確定地預言：在不遠的將來，在新的事件的刺激之下，東歐這座革命的火山一定會全部爆炸的。

至於蘇聯本身所積累的火藥庫，在諾林斯克集中營的暴動和伏庫塔集中營的總罷工中已經提出了爆炸的信號。聯共廿次大會所宣佈的改良措施與反史大林崇拜，更明顯地表明：官僚們在日益增加憤懣的群眾壓力之下，不得不以對群眾的最大讓步來阻止，至少緩和他們走上革命的道路。但一切歷史經驗證明：凡是一個統治者或者統治層迫得要用對民眾的「讓步」來阻止或緩和革命爆發時，往往是加速革命的到來。

蘇聯的工人階級和各民族的被壓迫群眾，在史大林主義官僚獨裁的無比殘暴統治之下，已經經歷了整個世代（三十年）。現在，由於他們自身數量的巨大增加及文化水準的提高，他們已深刻地覺到他們力量的偉大。尤其在官僚自行宣告破產（如公開承認史大林——官僚的主腦的錯誤和驚人的罪惡），及其內部的沖突和日趨衰弱的情形下，工人階級和一切被壓迫群眾，一定會感到他們「最後說話」的時機是到來了。在下一階段中，假如不是蘇聯的被壓迫群眾，在東歐諸國新起革命之前推翻史大林主義的官僚，則至少將跟隨東歐革命的重新爆發，起而以自己的力量掃除克里姆林宮的官僚窠穴的。

革命一旦在蘇聯爆發，必然要蔓延到中國、北朝鮮和北越。則毛澤東、金日成、胡志明所領導的史大林主義官僚層，當然不能逃避政治革命的命運。

（十七）前面所指出的革命遠景，並不排除因某種特殊事件而促發新的大戰的可能。不但美帝在經濟危機嚴重威脅之下，可能利用於它有利的突發事件發動反蘇戰爭；即克里姆林宮官僚，在東歐或蘇聯的革命直接威脅下，也有可能冒

險挑起戰爭以圖轉移革命的致命危險。但即令在這類的情形下爆發戰爭，革命還是不能被長久拖延的。更可能的是，革命將隨著戰爭的爆發而爆發，以此去直接干涉戰爭，乃至終止戰爭。這便是今天的世界局勢與上兩次大戰前的局勢大大不同之所在。

### 第四國際的任務

（十八）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或蘇聯集團內的政治革命的客觀條件，不是已經完全成熟了，便是在成熟的進程中。

一個普遍全球的革命遠景正擺在面前！

「如果沒有社會主義的革命，在下一歷史時期內，將有一個大災難威脅著全部人類的文化。現在的問題歸結到無產階級，主要的還是歸結到它的革命先鋒隊。人類歷史的危機還原為革命領導的危機。」「往後隨著時間的進展，他們企圖把歷史車輪往後拉的絕望的努力，將更清楚向群眾指出，無產階級領導的危機，已變成了人類文化的危機，而這一危機只有第四國際才能解決。」

托洛茨基十九年前所寫下的這一預測，「只有第四國際才能夠解決無產階級領導的危機」，現在已臨到它的「實現」的時候了！

（十九）在過去，第四國際解決無產階級領導危機的主要障礙是克里姆林宮的史大林所代表的蘇聯官僚及其所控制的各國史大林黨。因為它們不但假借馬列主義的名義，憑藉十月革命所創造的社會主義財產制，吸引了成千萬的革命者和工人群眾；而且利用蘇聯的物質力量，在全世界範圍內，對托洛茨基主義者施行了極端惡毒的污衊與無比兇殘的迫害（包括莫須有的審判、屠殺、充軍、暗殺等），企圖阻止繼承

馬列主義和十月革命傳統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發展。事實上，無可否認地，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在史大林主義官僚這種污衊和迫害之下，確實遭到了極大的損害，阻止了它的自然發展，拖延了它解決無產階級領導危機的歷史任務。

但現在的情形是完全改變了！不但史大林已被他的繼承者們宣告為違反列寧的民主集中制的獨裁者，侵犯蘇聯社會主義法律的謀殺犯；即以「改良」和「集體領導」標榜的官僚層也很快就在鎮壓匈牙利革命中盡情暴露了他們無比反動的面貌。史大林主義的危機現在正以劇烈的分化和分裂形式在各國史大林黨中顯現出來了。這不但給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發展清除了主要的障礙，而且替它實行解決無產階級領導危機造成了最有利的條件。

（二十）根據英、法、美、意、瑞士、加拿大及拉丁美洲某些國家史大林黨內部最近分化和分解的事實，明白地表現了如下三種傾向：

- A， 官僚的領導層，除少數個人外，仍在堅持史大林主義的反動立場，奴顏婢膝地繼續服從克里姆林宮新主人的指揮；
- B， 一部份領袖或幹部已公開脫離或準備脫離黨，從右邊走向社會民主黨的道路；
- C， 下層幹部，不但從左邊反對其領導，並急切地搜求托洛茨基的著作及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刊物，希望從它們當中找到出路。有些甚至直接轉入托洛茨基主義的運動。

雖然，上面所指的第三種傾向，在現時還多半限於知識份子的青年，但他們正像波匈的學生青年一樣，乃是下層黨員群眾意向之無誤的反映。此種轉向革命走向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傾向，在今後各史大林黨分化和分解的進程中，將隨

著不斷發生的新事變的刺激，而成爲不可抑制的潮流。可能像第一次大戰後，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的破產一樣，它們的黨員群眾大批地轉到第三國際。這可能是第四國際獲得廣大的革命幹部，以此發展成爲群眾黨，實際上解決無產階級革命領導的主要條件。這裏的問題在於第四國際對當前史大林主義危機所引起的各史大林黨的分化和分解採取正確的態度和最有效的活動。

（二十一）首先必須懂得史大林黨的黨員群眾與官僚領導之間的根本差異：後者是完全依靠克里姆林宮的支持，因而無條件地接受其指揮以維持其存在；前者則是對資本主義的現狀懷抱深刻的不滿，因而憧憬社會主義，接受馬列主義的觀念，並把社會主義財產制的蘇聯視爲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榜樣。他們的根本錯誤在於承認史大林主義是「馬列主義的繼續發展」，並以史大林主義的官僚獨裁與社會主義的財產制混爲一物。托洛茨基主義者的責任，便是用理論與事實向史大林黨的黨員群眾耐心而詳盡地解釋：史大林主義是馬列主義者的反面，史大林主義的官僚獨裁是完全剝奪了工人階級政治權利的後果，與社會主義的財產關係是絕對不相容的。在現時史大林主義已完全破產，黨員群眾已對克里姆林宮及本國官僚發生反感、懷疑和動搖的情況下，我們是容易說服他們，爭取他們到托洛茨基運動中來的。

（二十二）因此，第四國際的各國支部必須以全力干涉當前史大林主義的危機，動員一切力量去加深與加速史大林黨的分化與分解進程，採取一切必須的有效方法，在史大林黨內外，去接觸他們的黨員群眾，與他們不斷地進行公開的或秘密的（爲了避免其官僚領導的干涉）討論，供給或介紹他們托洛茨基的遺著或托洛茨基主義的刊物，盡力說服他們，爭取他們。我們的口號是：徹底瓦解史大林黨，爭取它

們內部的一切革命份子到第四國際的旗幟之下來。這對於我們解決無產階級革命領導的危機將發生決定作用。

以全力干涉史大林黨的分化和分解進程，並非鬆懈對其他的工人群眾黨和群眾組織的工作。相反，如果從史大林黨中爭取了大多數的革命份子變成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幹部，則對於其他群眾黨組織的工作將更廣泛地有效地進行。

在史大林黨危機的發展中，各種各式的反史大林主義的團體或組織都特別活躍起來。托洛茨基主義者必須利用這一機會，與一切從左邊反史大林主義的團體進行公開的討論，將革命的一切基本理論與戰略問題提到它們前面，同他們誠懇地交換意見，獲取共同的革命立場，以便重新集合一切革命力量為革命服務。

最後，為了有系統地有計劃地干涉史大林黨的分化和分解運動，一切以托洛茨基主義的名義發言與活動的組織，必須盡可能在重新確認托洛茨基主義的傳統，《過渡綱領》的諸原則，尤其是關於史大林主義的作用和政策的原則上重新統一起來。

解決無產階級領導的危機，準備領導世界革命走向勝利，以此從根消滅新的世界大戰，這便是第四國際當前的歷史任務。

# 給錫蘭社會平等黨總書記古尼華道那同志的 一封公開信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廿七日)

親愛的古尼華道那同志：

當我聽到你們的黨被中國人民政府正式邀請派遣代表前往中國訪問時，我曾代表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組織，於本年二月廿二日寫信給你，希望你們訪問中國的代表們，「利用這次訪問中國的機會，向中國群眾表示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正面立場，以此澄清他們對於我們的，即官方宣傳的誤解。」並「特別希望你們前往訪問中國的代表們，向中共提出如下的要求：

「釋放一切被監禁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恢復他們的名譽。(他們曾是以「反動派」的名義被逮捕和監禁的。)

「允許托派的組織合法存在與活動。」

但我代表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包括關禁在毛政府的集中營的上百名同志和同情者們)這個迫切而合理的「希望」和「要求」，竟得不到你的任何回音！

雖然如此，我還是在期待著，或許你們的訪華代表們將以言行的事實來答覆我的信？

迄至今年七月初，我讀了從中國寄來的本年五月份的「人民日報」，其中記載了你們的代表團所表示的態度和言論。這不但與我的「期待」和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希望」不符，簡直是相反。因此我當時曾擬再寫一信給你，批評你們訪華代表團的言行。但有同志對我說：「還是等一等吧，也許錫蘭

黨訪問中國的代表中，會有人發表訪問後的觀感，如哥文（Golvin）同志訪蘇回來後所發表的。哥文的文章發表於一九五七年六月某期 MILLITANT（戰士報），他從實地考察證明蘇聯的政治革命之不可避免」。我接受了這位同志的提議，一直等到九月末，還未見到你們的代表們訪華回來後任何文字的發表。於是我又著手寫信給你。

恰在此時，又有一位法國同志來告訴我，說你已來歐洲旅行。他並轉述你有意想見我。於是我的信又中止下來，意在見了你本人後再說。但你雖在歐洲旅行了將近兩月，卻找不出一點時間來履行你有意見我的諾言！

尤其是最近從英國方面的同志知道，你們的訪華代表之一，Rad Soyza 同志，在倫敦的一次會議上（九月十七日）報告關於中國的訪問而答覆問題時，竟說：「中國托派沒有正式接觸錫蘭社會平等黨」。這便迫著我再也不能緘默下去了。

以上是表明我遲至此刻才來給你寫這封公開信的原因。

現在讓我將你們的代表團在訪華過程中所表示的態度和言論，從《人民日報》上摘錄下來，附以必要的批評。

中國《人民日報》披露有關你們代表團訪問的消息，一共有四次。（見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十七、十九和三十一日的該報）其中較重要而值得注意的是五月十九和三十一日的記載。因為十九日的消息標明，「劉少奇以人代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資格宴請錫蘭新平等社會黨代表團」，並和你們的代表們「交換許多意見」。三十一日的新聞標題為「錫蘭新平等社會黨代表團告別晚宴，」並指出「有周恩來總理出席」。

在五月十九日的宴會上，關於你們代表團與劉少奇的談話有如下的記錄：

「賓主進行了長時間的暢談，」

「劉少奇委員長向客人們表示了熱烈的歡迎。他說，我

們兩團應該友好合作。

「佩雷拉（Perera）說：……更重要的是，中國是亞洲擊退任何侵略的堡壘。

「劉少奇說：中國是大國，但還不是強國。

「佩雷拉說：可是亞洲國家都仰望著中國。他認為中國和印度應該是保衛亞洲國家不受侵略的國家。

「談話大家都認為東方人應該防止帝國主義重新抬頭。佩雷拉說：美帝國主義接受英國與法國的許多教訓，他的侵略更狡猾。劉少奇說：美國更強大。因此大家應該聯合起來，集中力量才可以同它進行鬥爭。

「客人們還談到，亞洲許多國家的經濟是朝著一個方向發展的，因此應該進行經濟合作。主人表示同樣的看法，賓主都認為中錫兩國是遵循著平等互利的原則進行貿易來往。客人們認為中國在貿易中很慷慨，特別賣大米給錫蘭。……

「佩雷拉談到錫蘭政府積極的中立的外交政策，我們是擁護政府的外交政策的。

「客人們表示，中國在短短期間內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們要研究和學習中國的經驗。劉少奇請客人們在中國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都要看。他說：我們的缺點和錯誤很多。官僚主義很厲害。

「劉少奇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有官僚主義，在社會主義社會也有官僚主義。問題是如何對待官僚主義。我們是堅決反對它的。但是進行這種鬥爭要適當，不要過火。

「劉少奇說：現在我們全國各地工廠、農村、學校和機關，都在評論缺點和錯誤，矛頭是指向領導者。……

「佩雷拉向劉少奇贈送了禮品，並表示錫蘭人民和新平等社會黨對中國人民的敬意和友誼。劉少奇表示感謝。」

在五月三十一日的「告別宴會」上，《人民日報》記載的

摘要如下：

「周恩來出席了宴會，佩雷拉對錫蘭新平等社會黨（L.S.S.P）代表團在中國受到親切的款待和熱烈的歡迎表示感謝。他說：這次代表訪問中國是愉快的，有收穫，並且有很大的興趣。

「佩雷拉說：這次代表團的訪問中國，相信已增加了中錫兩國的瞭解，促進了彼此的善意，鞏固了兩國的友誼。

「佩雷拉說：錫蘭和中國一樣渴望和平、錫蘭將和印度、中國一起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戰爭……」

從上面這些頗為冗長的摘錄中，也就是從你們的代表團與劉少奇和周恩來（他們是僅次於毛澤東的中共的兩個領袖）的全部談話中，不但沒有看到你們的代表們向劉與周詢及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命運，而且也沒有表現出他們是代表托洛茨基主義者（雖然他們是以托洛茨基主義者的 L.S.S.P 的名義被邀請去訪問中國的），向中國群眾表示應有的革命態度和主張，表示他們代表錫蘭被剝削和被壓迫的工人和農民的任何革命的意向或願望。

你們的代表團的發言人所發表的一切言論，如上面所指出的，很明顯地只是站在國家的和平的立場上，好像他們是代表錫蘭的現時的統治者，與中國官方進行一些外交式的交換意見，呈獻一些頌詞。這不但與日本社會黨代表團訪華時所發表的意見毫無差別，即與尼赫魯、蘇加諾和吳努們的許多代表團在訪華時所表示的態度和言論也沒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

當你們代表團的發言人佩雷拉同志談到「中國和印度應該是兩個保衛亞洲國家的國家」時，他竟忘記了尼赫魯的印度與毛澤東的中國之間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前者仍然是資產階級佔統治地位，而將「保衛亞洲國家不受侵略」的命運寄

托在它身上。未免令人驚奇！當他談到「亞洲許多國家的經濟朝著一個方向發展，應該進行經濟合作」時，他完全忽視了你們的錫蘭和印度等國家還停留在資本主義統治的基礎上，資本主義統治的印度和錫蘭怎能與已經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國「進行經濟合作呢？」

尤其當佩雷拉「談到錫蘭奉行積極的中立的外交政策」，你們的黨「是擁護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時候，這表示他完全不懂得尼赫魯和班達蘭乃克（Bandaranaike）等所謂的「積極的中立的外交政策」，僅僅是他們代表本國資產階級的基本利益在「中立主義的積極的外交政策」的幌子之下，取得克里姆林宮的官僚與本國史大林主義黨的支持，以妨阻和癱瘓工農群眾走上革命的解放道路而已。

當佩雷拉談到「錫蘭和中國一樣渴望和平。錫蘭將和中國、印度一起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戰爭」時，他竟沒有提到，甚或沒有暗示錫蘭和印度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奪取政權的革命意向和需要，以此為有效地「反對戰爭」，達到「和平」之唯一手段。這證明他完全忘記了列寧與托洛茨基對於「和平與戰爭」的基本觀念，就是說：在帝國主義時代，如果先進國的工人階級和落後國的被剝削群眾，不聯合起來，以革命的行動去摧毀帝國主義，首先是摧毀本國的資產階級，剝奪它們的財產，則戰爭是絕不會終止，真正的和平是不會實現的。你們的代表團主張同班達蘭乃克統治的錫蘭與尼赫魯統治的印度去爭取「和平」，「反對戰爭」，試問這與克里姆林宮所指揮的各國史大林黨對於「戰爭與和平」的立場有什麼不同？！

其中含有諷刺意義並令人驚奇的是，當你們的代表們恭維中國的「巨大成就」，表示「要研究和學習中國的經驗」時，劉少奇卻教導他們「在中國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都要看。」

他甚至說：「中國的缺點和錯誤很多，官僚主義很厲害。」而你們的代表們對此竟然默不作聲！

難道你們的代表們不知道或不承認中國是在史大林主義者的官僚主義的統治之下嗎？即令他們以前不知道或不承認中國的官僚主義，至少劉少奇已被迫地告訴他們了。而且當時，即你們的代表訪問的時候，正是學生、工人、農民及一切知識份子反對和抨擊中共的官僚主義最激烈而達到高潮的時候，如劉少奇在他的談話中所承認的。假如你們的代表們沒有忘記他們自己是反史大林黨的官僚主義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便應當利用劉少奇自己談到官僚主義這個絕好的機會，援引馬克思、列寧（即令不援引托洛茨基）對於防止工人國家官僚主義化的主張，如工人階級的充分的民主，一切行政和經濟及文化機關，由工人和貧農自由選舉的蘇維埃或委員會直接管理或監督，一切行政的官吏和經濟機關的管理員的薪金不得超過技術工人的工資，……向劉少奇，同時也就是向中國工農群眾及革命的知識份子指出：只有根據馬列的這種主張，才能有效地「適當地」「進行反官僚主義的鬥爭」，並進一步消滅官僚主義。劉少奇所謂「不要過火」，正是站在官僚主義者的立場上，企圖以「過火」之罪名壓抑工人群眾的民主，繼續其官僚的統治。這是應當給他揭破的。假如你們的代表團能夠這樣做，在當時中國正被捲入暴風雨般的批評中共官僚主義的「大鳴大放運動」中，將發生重大的影響，在中國廣大的群眾中替托洛茨基主義贏得了尊敬和嚮往的。很可惜，你們的代表團竟放棄了這樣的一個絕好機會！

像前面所指出的你們的訪華代表團所表示的態度和言論，在中國工農群眾和革命分子中一定引起了不少的懷疑和混亂。首先他們將感到錫蘭的托洛茨基主義者與中國史大林主義黨的立場沒有什麼不同。因而引起他們對中國托洛茨基

主義者的主張的迷惑。另一方面，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正利用這個機會向中國的群眾暗示：你們看，這是 L.S.S.P. 的代表們，錫蘭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他們在各方面都表示同意我們，稱讚我們，「要學習」我們的「經驗」。這與中國托派被攻擊的「以左的面貌幹反革命的勾當，」是多麼不同啊！

尤其令人奇怪的是：你們的代表們和劉少奇與周恩來談到了許多問題和事物，甚至連中國「賣大米給錫蘭」的事情也談到，卻沒有一句話提到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被迫害被監禁的事情。難道你們的代表們認為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之被迫害被監禁是無足輕重的事，不值得你們注意和關懷，不值得你們向中共提出質問與要求嗎？

我想你一定不會忘記，當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於一九五六年四月訪問英國時，英國工黨那些最保守的領袖們，甚至也向前者提出了釋放東歐各國的社會黨人，他們的同志的要求。為什麼你們的訪華代表們，連英國工黨領袖們那種對同志的關懷都缺乏呢？

假如你們的代表們沒有放棄或忘記托洛茨基的國際主義，他們是絕對應該，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向中共的領袖劉少奇、周恩來，乃至毛澤東（據說，你們的代表團曾得到毛的特別引見）正式提出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被迫害和被監禁的問題，要求釋放他們，並允許中國托派合法存在與活動的。

首先，你們的代表們，可以根據你們的黨，錫蘭的托洛茨基主義者，雖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不但沒有被迫害，被監禁，而且還能夠合法存在與活動，參加選舉、被選為國會議員，甚至得到中國人民政府正式邀請訪問。為什麼號稱走上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國，反而要迫害與你們同樣的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不容許他們合法存在與活動呢？而且中共既已允許一切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黨派合法存在與活

動，並參加了政權，爲什麼要特別迫害站在工農群眾利益上發言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呢？

假如中共的領袖們拒絕你們代表團的要求，說中國托派「犯了反革命的罪惡」，如他們一向所宣傳的，那你們的代表便可以乘此機會要求中國人民政府對中國托派來一個公開的審判，讓你們的黨和其他各國工人群眾的組織派遣代表觀審，以明真相。這樣，不但會在中國廣大的群眾和輿論中發生巨大的影響，給中國被迫害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以有力的援助，而且還給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一個勇敢而光榮的貢獻。你們的代表團爲什麼放棄這種光榮的任務呢？不錯，你們的訪華代表團員之一，Bernada Soyza 同志曾說：「The Chinese Trolskyists have no Official contact with the L.S.S.P.」（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與 L.S.S.P.之間並無正式接觸）。也許他們以此爲理由來辯稱他們在訪問中國時所採取的立場。但事實是：我在本年二月廿二日，即你們的代表去中國以前的兩個多月，已「代表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寫信給你，和你們進行「official contact」，希望你們的訪華代表團向中共提出「釋放一切托洛茨基主義者」，「允許托派組織的合法存在與活動」了。這證明你們的代表團不向中共提出如上的要求，是明知而故意無視的。此種對同志，對中國幾百個托洛茨基主義者被迫害的重大事件的毫不關懷和輕視的態度，究竟怎樣解釋呢？

此間有位同志（他是與你們有過「正式接觸的」）替你們的訪華代表團辯護說：錫蘭的黨準備在不遠的將來走上政權，因爲自己的國太小，必須獲得中國那樣的大國的支持，因而不願在中共面前表示激烈的革命態度和主張，更不願因中國托派被迫害的問題與中共發生爭執或破裂。假如此種辯護是反映了你們的傾向，那我便不得不向你們提出忠告：正

因為你們的國太小，你們的黨如要走上政權，尤其是維持政權，便應特別站在革命的國際主義的立場上，以此去贏得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和蘇聯）的工人階級的支持，特別是印度工人階級的援助，才有可能。把希望寄托在中國或蘇聯的史大林黨的統治層上，其結果只能是一負數。這是值得你們加以嚴肅地考慮的決定性的問題。

就我個人說，我是一向尊敬你們的黨在運動中所獲得的成就的。但當我看到你們的訪華代表表現的那些錯誤觀念，那種離開國際主義的民族保守主義的傾向，卻不得不給以如上的批評。如果你們的黨，能夠根據同志的批評來檢討一下你們的訪華代表團的言行，以至你們整個黨的方針，我相信，這對於你們的黨，對於我們的整個運動，都是很有益的。

友好的彭述之

## 為暴露白恩斯癱瘓國際委員會阻礙統一

### 給加農同志的信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二日)

親愛的加農同志：

我現在覺得必須寫這封信給你討論關於我們運動的重新統一問題。因為我認為對這個問題假如不給以極大的注意和努力，使它獲得儘速而合理的解決，勢必使我們的整個運動產生難以估計的損害，甚至災禍的。

你去年三月十二日答覆古尼華道那（Coonewardona）同志的信中，已明白地指出了關於統一的可能的先決條件，雙方政治意見的接近，在同年四月末給國際書記處（I.S.）的代表（Patrih）的信中，你更提出了有關統一的具體建議。由此，證明你對於這個問題已給了很大的注意和負責的主張。我在當時，是完全支持你的觀點和建議的。（見我去年六月初致國際委員會委員們的信）

但你的觀點和建議卻遭到了某些同志的反對。特別是白恩斯同志的強烈反感和抵制。（見他去年五月十三日給你的信）以致統一的進行完全被打斷了，至少是暫時停頓了。

但為了我們整個運動的歷史利益，我深深地感到再事拖延統一是不容許的。

我們的運動，經過將近三十年的最艱苦的鬥爭，現在才達到一個歷史的轉捩點。就是說，自聯共廿次大會宣佈清算史大林的「個人崇拜」及其「個人獨裁」以及罪狀，尤其自波匈革命後，在全世界的史大林黨內已掀起了空前的危機，發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兩極化和分解運動。這對於我們托洛茨

基主義運動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最有利的客觀條件。這是大家所公認的。

但在這個最為有利於我們運動發展的客觀條件下，卻在我們主觀方面橫著一種最嚴重的障礙。這就是我們運動遍及全世界的分裂狀態。由於此種分裂情形，在許多國家裡已發生了極惡劣的影響，並正在阻礙著我們運動的前進。

現在讓我略舉幾個國家的事實來證明此種惡劣影響之不可忍受和極須改正。

在法國，史大林黨（這是蘇聯集團外最強大的黨）內部已正式成立了左派反對派的組織，這是該黨廿餘年來的第一次，它出版了內部公報提出民主討論的要求。在政治上公開批評黨的官僚領導，檢討史大林主義的思想根源。更重要的是，這個反對派內部有許多人尋求和閱讀托洛茨基的著作及托派刊物，其中一部份甚至在思想上完全同意托洛茨基主義。但在另一方面，由於這裡托派的四分五裂，不但無法對史大林黨的危機進行一致的有系統的干涉，而且由於它們間的互相攻擊，特別由於仇史大林主義的傾向，（如朗貝派所代表的）致使許多同意或同情托洛茨基主義的左派反對派分子感到迷惑，甚至困惱。例如一位左派反對派的分子同另一位（他已加入托派組織）說：托派內部發生如此的分裂和紛爭，我們雖然同意托洛茨基主義，但怎麼辦，加入那一派好呢？這種情緒是很自然而相當普遍的。因此，雖然有一部份青年加入了佛朗派，（這是由於後者在左派反對派運動中積極活動的結果，）但還有許多在思想上同意托洛茨基主義，可以加入我們運動的分子，卻採取觀望態度，甚至消極。這不僅對我們運動的發展是一個障礙，而且在客觀上是幫助史大林黨的官僚緩和了危機。

意大利史大林黨的危機，雖然有它自己的特點，但其危

機的廣度和深度，較之法國史大林黨更為嚴重。該黨內部發生了許多反對派的集團。雖然這些集團在思想上頗為混亂，但一般是要求民主討論，反對和批評其官僚領導。這對於我們運動的開展，無疑是最好的園地。但由於我們組織的分裂，對史大林黨危機無法進行應有的干涉。正因此，不但屬於國際書記處的里維奧（Livio）派要求統一，即屬於國際委員會的組織也是堅持統一的。

南美的智利，是一個處在革命前期狀態的國家，同時那裡的史大林黨的危機也最為深刻。但那裡的托派組織卻分裂成爲四個：一個屬於國際委員會，一個屬於國際書記處，其他兩個原來是中立的。我曾見到後三個組織的代表。他們一致被認定智利的客觀條件對於我們運動的發展極為有利，但我們自己的分歧大大地妨礙了我們的發展。因此，他們認爲，重新統一是絕對必須和迫切的。雖然那兩個原來中立的組織的代表並不滿意 I.S.（國際書記處）屬下的拉丁美洲局的某些主張和措施，但爲了運動的利益，他們覺得必須統一。因此，他們現在已加入 I.S. 並強烈要求 I.S. 和 I.C.（國際委員會）雙方立即統一起來，以便智利四個組織形成統一的黨，以應付當前最有利於我們運動的局勢，首先是有計劃地去干涉史大林黨正在發展中的危機，爭取它內部最好的革命分子到我們運動中來。

我又見到一位屬於 I.S. 的日本組織的代表。這個組織是在波匈事變後正式成立的。（其中的分子多來自史大林黨）它出版了日文的《第四國際》。這就是說，在日本亦有兩個托派的組織。這位日本同志告訴我，日本的情形對於我們運動的發展是有利的。但兩個托派組織的存在是一個大障礙。因此他迫切地要求整個運動的統一，以此排除我們主觀方面的障礙，免得放過了有利於我們運動的機會。

此外，我相信你一定知道，印度的客觀條件對於我們運動的發展是很有利的。但那裡卻存在幾個托派的組織，互相獨立，各自為政，這便根本談不到利用有利的客觀條件來發展我們的運動了。若要使印度的各組織統一起來以應付當前有利的環境，只有在整個國際運動的統一和幫助之下，才有可能。

由前面指出的一些國家的具體事實已夠表明，爲了我們整個運動在空前有利的歷史條件下展開，重新統一不但是絕對必須的，而且是刻不容緩的。

現在的中心問題在於；雙方的政治立場是否愈來愈接近，還是同一九五三年分裂時一樣，甚或「巴布洛修正主義與我們之間的鴻溝變得越來越廣。」（見英國同志出版的《反對巴布洛修正主義的鬥爭》第三頁）假如後者的判斷是正確的，當然談不到統一。但近兩年來的事實指明，卻是前者的判斷是正確的。

關於這一點，你在答 Coonewardona（古尼華道那）的信中，根據柯克林、柯林斯及麥斯特等之公開離開運動，以及近年來的事變發展的推動，指出雙方的政治立場已趨於接近。正因此，你才進一步提出了統一談判的具體建議。即就我所看到的 I.S. 方面的文件（連先那萊爾同志批評過的《史大林主義的衰落與崩解》在內），尤其是我所見到的 I.S. 方面某些支部的代表人物及和他們談論一些重要政治問題所得到的印象，更證明你的判斷是客觀的和正確的。

英國同志強調雙方政治意見的「鴻溝越來越廣」的判斷，並沒有提供可信的論據。這從先那萊爾對《史大林主義的衰落與崩解》的批評中反映出來。如果我們平心靜氣地讀了《史大林主義的衰落與崩解》那個草案，雖然覺得其中還含有某些模糊、雙關語氣和錯誤（尤其是格爾曼的學究氣），但就一

般說，並非離開我們的立場愈來愈遠，寧可說它比之以前那個《史大林主義的興起與衰落》草案的內容是進步的，較為接近我們的立場的。因為它當中已重復而肯定地說出了蘇聯及東歐諸國的政治革命之不可避免及日益接近爆發點的結論，這正是關於蘇聯問題的原則上的接近，而且，先那萊爾的批評經過格爾曼的反駁之後，迄今仍表示緘默，足見「愈來愈廣」的判斷已無法支持。

在實際上，法國佛朗派在史大林黨工作策略的轉變是一個最好的說明。你知道，依照巴布洛發明的「滲入政策」是：我們托派滲入史大林黨，主要是推動該黨的領導左傾，使其接受群眾的壓力，走向革命的道路。但最近兩年來佛朗派在史大林黨內工作的政策卻是相反。他們是以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影響史大林黨的下層群眾，反對其官僚領導，其總目標在爭取一切革命戰士，瓦解該黨。正因此，他們在史大林黨的左派反對派運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影響了大批青年到他們的組織中。這正是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對史大林黨的傳統立場。但不幸，我們的朗貝派對史大林黨的左派反對派採取了極端的教派態度，以致毫無所獲。

白恩斯同志在給你的信中特別強調巴布洛的「政治方法」（political method）沒有改變，以此作為拒絕統一談判的主要論據。對此，我在去年六月初致國際委員會委員們的信中曾予以說明：「我個人認為要巴布洛改變他的基於印象派的修正主義觀點，以及改變他在組織問題上的官僚主義方法和玩弄權術的手段，是極為困難的。可是，我們卻不能因此拒絕或拖延統一，我們的目的不是個別幾個人如巴布洛之流，而是仍然留在國際書記處（I.S.）各個國家支部的大多數同志，他們是忠誠於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

不錯，白恩斯同志在答覆我的信中提出了如下的問題：

「如果巴布洛運動中大多數的人是托派，那麼，爲什麼巴布洛卻可以如此輕易地推行他的各種政策？」

對這個問題，我覺得我們必須平心靜氣地加以解答。這主要是由於：在公開分裂之前，在各國支部內，除了紐西蘭支部〔即美國支部的代名〕經過一個較長時期的政治討論，和英國支部經過短促的爭論外，其他的支部沒有經過任何的政治討論，在思想上劃清正統托洛茨基主義與巴布洛的修正主義間的界限。更壞的是，在成爲分裂導火線的法國問題上，國際絕大多數的領袖們（包括後來參加正統托洛茨基主義者運動的某些領袖在內），無論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都是完全支持巴布洛的立場和措施的。因而在 I.S. 能夠控制下的各支部的黨員群眾在政治上缺乏清楚的認識。再加上我們方面所採取的非常手段（如 S.W.P.〔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公開信及國際委員會的成立的宣佈），這在當時雖是出於不得已的，乃至是必須的，但一般同志很難了解這點。——在這種特殊情況下，所以巴布洛才「可以如此輕易地推行他的各種政策」。

我可以隨便舉幾個事實來證明。當中國同志最初接到 S.W.P. 的公開信時，絕大多數在政治上都贊成該信的立場。但同時，他們認爲在發表公開信前，沒有在國際各支部內提供文件，舉行政治討論，是不符合於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的，錯誤的。爲此，我們曾寫了極長的信給他們，詳細地指出了巴布洛以官僚方法控制國際領導機關，排斥異己，使正常的內部民主討論成爲不可能，才迫不得已採取那種「公開信」的非常手段。這樣，他們才接受了「公開信」的號召而進行鬥爭。假如沒有我們根據親身經歷的事實向他們詳加解釋，他們多份是在政治上贊成「公開信」的立場，在組織上表示懷疑，甚或反對的。

有一位德國的老戰士，Hiprae 同志，一九五六年從東德

集中營被釋放出來。他表示在政治上完全同意 I.C. 方面，但在組織上表示懷疑。(即懷疑沒有事先經過內部的民主討論而發表「公開信」) 因此，他在組織上採取中立態度，希望統一後正式參加組織活動。爲此，我於去年二月初曾與他作了一次談話。根據我親身的經驗向他指出巴布洛在組織上的官僚主義專斷及破壞民主集中原則的種種事實，他才表示在組織上擬作進一步的考慮。

前面兩個事實可以表明，即是忠實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和老戰士，雖在政治上同意我們，但在組織上很難了解「公開信」的非常舉動。因而對此表示懷疑，甚或反對。(冰島支部〔即加拿大支部的代名〕D 同志起初也是如此的。) 因此，我深信，留在 I.S. 內的各支部的絕大多數同志之所以不能接受「公開信」的號召，仍然留在 I.S. 內，多半是由於不能了解我們所採取的這種「非常舉動」，即事先沒有在內部提出批評巴布洛的修正主義的文件，讓他們有機會討論和分辨雙方的立場，因而發生反感。

假如我們在分裂前提出了批評巴布洛的修正主義的文件，經過普遍而深入的討論，在思想上劃清正統托洛茨基主義與修正主義的界限，如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反盤納姆和夏克曼的修正主義一樣，其結果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對這種問題，應當同對其他的問題一樣，給以客觀的分析和評價，才不致陷入純粹主觀的判斷，以爲凡是贊成我們的(如「公開信」的非常舉動)就是正統托洛茨基主義者，懷疑或不贊成我們的便是巴布洛主義者。

而且，在另一方面，正由於紐西蘭(即美國組織的代名)和英國的組織事先舉行了內部的討論，或多或少劃分了政治上的界線，所以柯克林派和柯林斯派，便依照巴布洛所發動的修正主義思想的邏輯發展，走到了最後反托洛茨基主義者

或親史大林主義的結論，因而完全脫離了運動。也正由於相反的原因，即分裂前沒有經過任何的政治討論，留在 I.S. 內的各支部的絕大多數同志，仍然站在托洛茨基主義的旗幟下繼續奮鬥。

還有一個重要點，這裡必須指出：留在 I.S. 內的各支部的絕大多數同志，雖然在一個頗長的時期內受了巴布洛主義的某些影響，在思想上發生了某種迷惑或混亂；但自柯克林、柯林斯和麥斯特的反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露骨地表明之後，特別是自聯共廿次大會宣佈清算史大林的個人崇拜和內部的罪惡及波匈革命發生之後，他們已從鐵的歷史事變中清楚地看到了托洛茨基主義的傳統、原則和政綱，特別是關於蘇聯和史大林主義官僚的診斷之絕對正確，因而自然地澄清了他們以前思想上的某些迷惑和混亂，回到了托洛茨基主義的正統立場。正因此，他們一致地強烈地要求和我們統一起來。——這種傾向，從 I.S. 召開的所謂「第五次世界大會」（去年九月）上一致通常要求統一的決議反映了出來。

從前面的解釋，我可以斷言，留在 I.S. 內的各國支部的絕大多數同志，並非什麼巴布洛主義者，寧可說，他們同我們一樣，一般地是忠實於托洛茨基主義，並正在為我們的運動努力奮鬥的。這是我們運動多年來所集聚的大批幹部，是我們運動中一部份寶貴的財產，對於將來各國運動的開展會發生重要的動力作用的。我們絕對不應因為他們留在 I.S. 所屬的支部內，簡單地以「巴布洛派」的名義一筆抹煞他們，拒絕與他們統一合作。

此外，白恩斯同志在給你的信中援引錫蘭黨所領導的總工會致蘇聯工會的「五一」祝賀電，斷定：「他們今天比以前任何時候來說，在政治上離我們更遠。」以此暗示我們與他們沒有統一的可能。

關於錫蘭黨領導層中的某些人在政治上具有的民族保守傾向及對史大林黨的某種妥協傾向，不但在致蘇聯工會的「五一」祝賀電內反映出來，而且在它的訪華代表團的言論上表現得更為清楚。因此，我在不久以前曾寫了一封公開信致古尼華道那批評他們。但我們絕不應因此得出結論說，錫蘭同志已離開了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或愈來愈在政治上離開了我們，而和我們沒有統一合作的可能了。我們必須了解，錫蘭黨不但是我們運動中具有長期奮鬥歷史的黨，而且是擁有真正群眾基礎的黨。特別是在過去幾年中，它曾積極而勇敢地領導了多次大規模的群眾鬥爭，因而獲得更廣大的群眾的支持。它現在正走近政權的邊緣。雖然它的領導層中某一部份具有頗為嚴重的保守和妥協傾向，但它的絕大多數的幹部和黨員群眾，是忠實於托洛茨基主義的。（這從過去幾年的群眾鬥爭中清楚地反映了出來）我們的任務不是疏遠他們，拋棄他們，恰好相反，而是同他們取得密切的合作，及時地給以必要的批評，糾正其領導層的某些錯誤傾向，幫助他們順利地走上政權。這不僅對於錫蘭的運動具有決定的意義，而且對於整個東方的，尤其是印度的運動，也將發生重大決定的影響。但要作到這一點，只有我們整個運動重新統一，因而與錫蘭黨統一後，在一個統一的國際組織和領導底下，才有可能。光是在背後指責錫蘭黨人，拒絕和他們謀取統一，那是消極的，毫無意義，對運動不負責任的。

總而言之，從你的判斷，以及我前面的引證和解釋，足夠表明：在政治方面，不管雙方還存在著某些分歧，但一般說是愈來愈趨於接近的。尤其就 I.S. 屬下的各支部的絕大多數的同志來說，他們是忠實於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由此證明，重新統一的先決條件已完全具備了。

現在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關於組織方面的問題，特

別是關於巴布洛的官僚方法和玩弄詭計的問題。

當一九五四年秋，在 I.C.（國際委員會）會議上討論「平權委員會」時，法國同志特別強調巴布洛的官僚手法的可怕，以此作為拒絕接受平權委員會的理由之一。在去年九月 I.C. 會議上討論統一問題，我主張根據你的「具體建議」試行統一談判時，白恩斯同志也強調巴布洛的官僚手段及其玩弄詭計，以此表明我們無法與他重新統一。因此，我覺得對此必須加以客觀的檢討。因為這不僅是有關統一談判能否進行，而且是與未來的國際領導機關的內部制度密切相關的重大問題。

無須說，我個人是特別反對和指責過巴布洛的官僚操縱及其玩弄詭計的。但巴布洛以前在 I.S. 以及 I.E.C.（國際執行委員會）內之能夠形成那種獨裁式的個人專斷及其任意玩弄詭計，我們卻不能簡單地拿他個人的性格和野心來解釋。固然，巴布洛的性格是專橫的，官僚主義的，並且是個羊頭獅子心的典型人物。但假如當時各國支部的領袖們，特別是歐洲支部的領袖們，能夠保持和運用布爾塞維克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和傳統，對國際領導機關及領導者們給以應有的監督，對他們的言行予以必須的批評，巴布洛的性格和野心是無法發展的，至少是不會發展到那樣不受控制的可怕程度。但不幸，事實恰相反。

當一九五一年夏我初抵這裡時，就有一位中國同志 H 告訴我，現在國際領導機關中最有權威的人物是巴布洛。（因為我以前連巴布洛這個名字也是不熟悉的。）他並引用利維斯東，紐西蘭（即美國）駐國際的代表的話：「巴布洛在政治上可以趕上托洛茨基，在組織能力方面甚至超過後者。」在第三次世界大會上，當 I.S. 出席「遠東委員會」的代表 A 打斷我關於中國問題的報告，我表示抗議時，白恩斯代表巴布洛

來同我談話，他除了將責任轉嫁給 A 外，並說：「巴布洛是我的密友，他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都是天才，他是能夠接受別人的意見的……」隨後，他並對我們的女兒說：「巴布洛應設想他是托洛茨基的繼承者。」像這類的宣傳，在別的方面也時常聽到。由此，你可以看到，巴布洛的「權威」或「個人崇拜」便是這樣地被培養起來的。

巴布洛既已得到國際一部份領袖，特別是紐西蘭和英國的委員們如此地推崇和支持，他便自然地覺到他的「權威」已高出於一切，可以獨斷獨行，壓服或打擊任何的反對者了。所以，當一九五一年初佛朗和格爾曼在某些問題上表示不同意他的意見時，他即以排除前者出 I.S. 相威脅，並企圖通過利維斯東獲得紐西蘭（即美國）支部的支持，這是你所知道的。在法國多數派與少數派的問題上，他壓制多數派，禁止黨內的民主討論，乃至獨自停止多數派十六名中委的職權，都是事先或事後獲得某些有力的支部的領袖們的支持，特別是英國支部領袖的支持的。這是我親自看到的事實。例如，巴布洛停止法多數派中委職權後，在 I.S. 的擴大會議上，討論該事件時，格爾曼、德國的 J、意大利的 L 和我都反對巴布洛此種專橫的措施，但白恩斯卻堅決地支持他。即在巴布洛對我進行種種專橫無禮的攻擊和打擊時，所有國際領導機關的領袖們不但沒有一個人起而據理批評他，甚至或多或少是替他辯護或解釋的。

假如沒有紐西蘭的代表（利維斯東）和英國領袖對巴布洛的「個人崇拜」的那種宣傳，假如在許多重要的政治問題和組織措施上，特別是獨自停止法國多數派十六名中委職權的橫暴措施上，給他以應有的批評和懲戒，巴布洛不但無法實行他的專橫獨斷和玩弄詭計，而且早已被停止職權而離開國際的領導機關了。這樣，後來的分裂也就不致發生了。這

裡表明，只要堅持和正確地運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和傳統，是可以防止官僚主義的專橫和野心家的跋扈的。

事實上，經過「公開信」及其他許多文件的批評和暴露，以及柯克林、利維斯東、柯林斯和麥斯特等，他的思想上的最密切的合作者，公開脫離運動之後，巴布洛的「權威」和「個人崇拜」已遭到了致命的打擊。他之所以還能繼續維持他在 I.S. 內的地位，主要是由於他巧妙地利用了 I.S. 各支部絕大多數同志不能了解我們方面所採取的「特殊行動」（不經過內部的民主批評和討論而發表公開信及成立國際委員會），以及 I.C. 對「平權委員會」所採取的極不聰明的態度及其在政治上絕少表現。雖然如此，巴布洛在 I.S. 各支部內的「權威」和影響已大大地衰落了，批評和反對他的人已越來越多了。（這在 I.S. 召開的所謂第五次世界大會上也清楚地反映了出來。）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可以獨斷獨行，任意排斥別人和玩弄詭計了。

在這種情形下，假如我們同 I.S. 方面談判統一，是無須過份害怕巴布洛玩弄詭計的，因為我們一發見他玩弄詭計時，即可以根據事實向雙方各支部的黨員群眾公佈，揭露他，使他在群眾批評的光照之下無地自容。

而且我們還必須了解，I.S. 之再三向我們發出統一的呼籲，甚至特派代表同你談判，並非出於巴布洛個人的什麼詭計，或如白恩斯所說的是「以虛假的統一拼湊布塊掩飾的政治陷阱。」（見他給我的信），而是由於 I.S. 受到各支部絕大多數同志急切要求統一的強大壓力。在這樣的情形下，巴布洛是不敢任意玩弄詭計的。即使玩弄詭計，經我們揭露後，他一定要遭到 I.S. 各支部黨員群眾的憤怒的攻擊，將破壞統一運動的責任加在他身上。

因此，我認為人們特別強調巴布洛的官僚手法，玩弄詭

計或「陷阱」來拒絕進行統一談判，假如不是完全不了解上敘的情形，便是有意企圖使我們運動的分裂狀態永遠繼續下去，以達到某種私圖。

由於巴布洛過去操縱國際領導機關，以致最後引起分裂，某些同志便因此懷疑統一後，是否可以避免重蹈以前的覆轍，再度發生分裂。對於這樣的問題，我認為是不難解決的。假如我們了解了巴布洛以前所以形成他的「權威」或「個人崇拜」，以及敢於獨斷獨行和玩弄詭計的原因（如前面所指出的）；各支部依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和傳統，實行監督國際領導機關和領導者，在領導機關內實行共同負責和集體領導，個人專斷和玩弄詭計便沒有存在之可能。此外，而且也是重要的，經過這次分裂的痛苦教訓和經驗，未來國際領導機關的候選人不但必須予以慎重的選擇，而且要根據國際章程（假如原有的章程不夠完善，儘可修改和增加），隨時彈劾乃至撤換濫用職權或不稱職的人。

總而言之，我們的國際既沒有官僚化的物質基礎，只要嚴格遵守和運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和傳統，不但可以防止官僚主義的橫行，而且可以避免無原則的分裂的。

至於白恩斯同志說：「我們絕對反對回到巴布洛關於國際組織的舊觀念，即從各國支部抽取資源，以讓某些國際旅行者可以在千里之外的某些小團體中撐起巴布洛的派系，又或是不斷在巴黎開會，迫使支部要籌集經費才能派代表出席。我們的國際工作必須以現實的方法組織起來，要符合各支部的資源，而不是模仿舊的共產國際的方式。」（見他去年五月十三日給你的信）是的，「我們絕對反對回到巴布洛關於國際組織的舊觀念。」即他的過份集中的，甚至是集中於總書記的觀念裡去（但不是簡單地限於「從各國支部抽取資源」）。但同時我們亦應完全拒絕把我們的國際組織拖回到第二國際

那種散漫的毫無積極作用的狀態裡去。換句話說，像 I.C.幾年來所存在的散漫而絕少作用的情形必須予以改正。

I.C.在它過去存在的四年餘中，除了最初在反巴布洛主義的運動中起了某種作用外，可說極少成就，尤其在政治的領導方面說，幾等於不存在。例如，對聯共廿次大會宣佈清算史大林的個人崇拜和獨裁那樣重大的歷史事件，I.C.竟作不出一個宣言或決議（一九五六年三月 I.C.會議原推法國同志起草對該事件的決議，但由於起草人的不負責任，以致無形取消）。這是出於什麼「國際觀念」！一九五六年十一月 I.C.會議正式決定於一九五七年夏召開世界大會，（並推我替大會起草政治決案，該草案於去年一月初送交英國，延至八月才被印出！）但 I.C.書記獨自地並不宣佈理由地將該項決議無形取消，這又是出於什麼「國際組織的觀念」！！意大利支部，這是歐洲重要國家支部之一，三年餘來竟沒有被邀它派一代表出席會議。雖然我曾數次向英國建議邀請意支部派代表出席 I.C.會議，以便討論那裡史大林黨危機的局勢。但所得到的答覆是「財政困難」。而同時英支部每次派兩代表出席 I.C.會議，就不感到財政困難，（其實 I.C.的財政情形從來就沒有報告過，所以至今我是毫無所知。）這又是出於什麼一種「國際組織的觀念」！！！！……

總而言之，I.C.本身是極不健全的。它沒有類似 I.S.那樣的機構，以便集體工作，以致形成極度散漫的狀態。它沒有公開的刊物，以資對外宣傳和號召，也沒有內部公報，以便各國支部交換消息和意見。即以 I.C.的會議說，除了不按期或任意延期召集外，所有會議都極少討論政治問題，甚至連替大會準備的決案都沒有正式討論過。最壞的是，每次會議事先既無準備，（尤其是關於政治文件方面的準備）而會議通過的決案又往往不實行。（例如紐西蘭支部替 I.C.起草的幾個

討論草案，不但 I.C. 本身從未討論過，即 I.C. 會議決定將該項草案譯成法德文給支部討論，也從未實行。) I.C. 此種散漫的不負責的情形，不可免地要產生書記在某些事務上的專斷的流弊。(例如任意取消召開世界大會的決定，以及藉口財政困難不邀請意支部派代表出席 I.C. 會議等。) 假如，我們的國際組織不是一種裝飾品，而是為了替我們的整個運動和革命服務，I.C. 幾年來所表現的這種散漫，甚至癱瘓的情形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可惜白恩斯同志在批評巴布洛的「國際組織的觀念」時，他竟完全忘記 I.C. 三年餘來像上面所指出的這種極度散漫而絕少積極作用的可悲狀態。這證明他所強調的「我們的國際工作必須以現實的方法組織起來，要符合各支部的資源……」的國際觀念是極可疑的。

白恩斯同志在給你的信中說：「一段時間以來巴布洛和格爾曼的宣傳機器惡意地散佈一個說法，說只能直接跟加農談判。我們的支部和國際委員會被視為攀附在美國支部的依附物之類，P.O.D. 的造訪，是為鞏固這種流言，這種談判上的大老闆的觀念，典型地正是一般的『個人崇拜』！正因為如此，國際委員會和美國（支部）必須同步前進……。如果沒有最充分的討論，便不應也不能作出任何決定。」

這一段歪曲事實，對別人肆行譏諷，對自己推卸責任的話，我覺得有根據事實加以糾正和批評之必要。

首先，我應指出，I.S. 派 B.O.D. 同你直接談判，並非把英國同志和國際委員會視為「美國支部的依附物」，而是國際委員會，特別是白恩斯本人在過去對平權委員會之不負責任及以後對 I.S. 的統一呼籲之不理睬的後果。

「平權委員會」原來為白恩斯，在一九五四年七月「直接地」與錫蘭代表談重新統一的重要建議。白恩斯將該項建

議提出於一九五七年八月的 I.C.會議上，並要求 I.C.接受。當時法國同志表示堅決反對。經過激烈的爭論之後，絕大多數通過接受了平委會的建議。但為特別慎重起見，I.C.並決定將該建議送交各支部討論徵求它們的同意。同年十一月 I.C.會議又重新討論平委會的問題。白恩斯並提出了參加平委會的具體條件，又得到絕大多數的贊成。且為了通過平委會舉行雙方黨員群眾的普遍的政治討論，I.C.曾指定我起草評巴布洛主義的討論文件，英國同志擔任起草政治討論文件，（後來白恩斯轉請紐西蘭同志起草該項文件）最後推出了出席平委會的代表三人。由於法國 Blooch 同志拒絕擔任出席平委會會議的代表，白恩斯同志甚至提議撤銷他的 I.C.的書記職責，因而後者作了 I.C.的書記。這表明，I.C.對於平委會問題是經過了極嚴肅的考慮和爭論，再得到了各支部的贊同才達到最後的決定的。

但自平委會於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舉行第一次會議，進行初步的談話後，當 I.S.於一九五五年初寫信 I.C.要求繼續進行平委會的談判時，I.C.的新書記卻不予以答覆。至同年四月的 I.C.會議上，白恩斯更公然主張廢棄平委會，其唯一理由是 I.C.接受平委會的建議從開始就是錯誤的。但錯誤究在什麼地方，卻沒有說出來。貝尼斯在去年六月給我的信中，把廢棄平委會的責任推給錫蘭同志，因為他們曾對他表示派代表參加平委會而沒有履行。實際上，在一九五四年八月及十一月兩次 I.C.會議上討論平委會問題時，他都沒有指出以錫蘭派代表參加平委會為我們接受該委會的條件。最不可否認的事實，即他本人起草的參加平委會的幾個條件，也絕沒有提到錫蘭派代表參加的條件，這證明只是他把自己的責任推給錫蘭同志而已。因此，平委會就這樣毫無理由地被取消了，通過平委會進行統一談判的嘗試，也就變成泡影了！

白恩斯同志對平委會這種反覆無常，前後極端矛盾的不負責任的態度，不但給了 I.S. 方面企圖與 I.C. 重新統一的完全失望，引起了 I.S. 屬下各支部黨員群眾對 I.C. 的極大不滿（這反過來又幫助巴布洛鞏固他在 I.S. 的地位），而且對於 I.C. 的各支部也是開玩笑的。因為在決定接受平委會的建議前曾經徵求過它們的同意的。

雖然 I.C. 單方面取消了平委會，拆斷了統一談判的橋樑，但屬於 I.S. 的各支部的絕大多數黨員群眾要求重新統一的願望，卻沒有因此終止。尤其在聯共廿次大會及波匈革命所引起的各國史大林黨的危機爆發後，他們更感到統一的必要和迫切。因此，迫使 I.E.C. 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開的會議上又決定了向我們發出要求統一的呼籲。但 I.C. 對此呼籲並未加以理睬。在這種情形下，I.S. 派遣 P.O.D. 來同你直接談判了，這顯然是由於環境所迫，即：一方面受到它的各支部黨員群眾迫切要求統一的強大壓力；（此種壓力，在法國佛朗派最明顯地表示了出來，）另一方面，因 I.C. 完全拒絕了任何統一的談判；這當中，我看不出 I.S. 有把英國支部和 I.C. 視為「美國支部的依附物」的意向，這僅僅表明它企圖尋找能夠代表我們的運動而又嚴肅地負責的人作談判的對象，以便得到統一的結果而已。

但白恩斯同志竟把 I.S. 這種出於不得已的舉動諷刺成爲「這種大老闆觀念典型地正是一般的個人崇拜」，但諷刺絕不能掩蓋事實。事實是：白恩斯在毫無理由地取消了平權委員會，拒絕了任何統一談判之後，他企圖用這些「大老闆」和「典型的個人崇拜」的可厭字眼來阻止你推動統一運動的進行，以便使我們的運動在一個最有利於發展的歷史條件之下繼續分裂下去。他所說的「正因為如此，國際委員會和美國支部必須同步前進，」意思就是說：美國支部必須同國際委

員會一起拒絕任何統一談判的進行。所以當紐西蘭支部去年六月全國委員會關於統一問題的決議發出後，白恩斯即利用這個決議，在去年九月召開的 I.C.會議上要求通過，以此又一次打斷了統一談判的進行。實際上，在紐西蘭的六月決議之後，即去年八月 I.S.曾給了 I.C.一信，在該信中明白表示接受你給 P.O.D.的信中所提出的第一項條件，即謀取共同政治協定的條件，作為開始進行談判的基礎。這是 I.C.應該加以考慮和接受的。但白恩斯竟完全置之不理。由此證明他是不惜利用任何機會和採取任何手段以阻礙統一談判的進行。雖然他在他給我的信中表示：「我們贊成有一個能奏效的統一」，但在去年九月 I.C.會議後同我私下談話時，卻肯定說，「同巴布洛談統一是不可能的！！這又證明前一句話只是公開的外交辭令而已。

白恩斯同志在給你的信中又說：「我們這裡的運動主要受教於 I.W.P.（國際工人黨）長期為原則而鬥爭的經驗之上。我們相信，今天我們有能力協助我們的美國同志，因為我們的工作條件是有利的……我們歷史上第一次把一流的知識分子幹部與影響力日益增強的工會派系聯手並進……我們相信，假以時日我們將會從共產黨爭取到最重要的異議人士。」

白恩斯同志在這裡特別列舉英國工作的成就，「有能力協助我們的美國同志。」這是好的。但他卻忽視了，現在急於需要協助，還不是美國同志，而是歐洲大陸的，特別法意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因為這裡正有一個最有利的條件，隨而獲得了今天的成就。但人們卻不應以此自滿，更不應以這種成就來代替分裂狀態。而且英國現時的成就雖然是可寶貴的，但還只是初步的。要爭取英國史大林黨的絕大多數的活躍成員，特別是工人的活躍成員（不僅僅是「最重要的異議人士」），還須要相當的時間和最大的努力。而且要達到這一

目標，只有我們整個國際的運動，尤其是歐洲法、意的托洛茨基主義者能夠有效地干涉史大林黨的危機，取得更大的勝利之後，才可想像。但，白恩斯同志恰好忽視了這一方面，即我們的國際今天應當特別注意和努力幫助的一方面。

我們必須了解，法意是處於真正的革命前期狀態的國家，法意的史大林黨是蘇聯集團外史大林主義運動的主要支柱。單以法國的史大林黨而論，它擁有將近三十萬的黨員，（比英國史大林黨黨員多十倍）控制著三百萬以上會員的工會組織，具有五百萬以上的投票者。假如這個黨一旦趨於崩潰，（這是可能的，因為它內部的危機正在向更廣和更深的方面發展，問題在於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有效干涉。）意大利的史大林黨即將隨之瓦解，因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史大林黨，特別是歐洲各國的史大林黨（包括英國史大林黨在內），也就自然地要遭到致命的影響。這樣，蘇聯集團內的革命者將勇敢地抬起頭來，史大林主義的官僚的地位將日趨削弱而動搖。所以從國際的觀點上說，我們的運動必須特別注意和盡可能幫助法意的托洛茨基主義者集中一切力量最有效地去干涉史大林黨的危機，爭取它們當中的一切革命分子到我們運動來，以此瓦解這兩個黨。這是托洛茨基主義者解決革命領導危機，領導革命走向勝利的決定性的條件。但要朝這個方向走，首先就必須將法意現有的各托派組織儘速地統一起來，以便利用當前有利的條件，以及未來因新事變而產生的更有利的條件，正確地，有系統地在史大林黨內外進行不屈不撓的工作。白恩斯同志以 I.C. 的書記地位頑強地反對統一運動，企圖繼續維持現時的分裂狀態，這證明他對於我們運動在法意的這種重大性和決定性不是完全不了解，便是完全忽視了的。因此，現應坦白地說，白恩斯同志雖然負了我們國際運動的主要責任，但他的眼光並沒有超出不列顛三島。這從他

給你的，及他答覆我的信中，除了重復地強調英國支部反巴布洛派的經驗和英國工作的成就外，沒有一句話提到我們整個運動當前的迫切任務，特別是法意托派運動的迫切任務，充分地反映了出來。

總括前面的分析和說明，我可以說，明顯地白恩斯同志在統一問題上，所表示的一切意見在我們整個國際運動的歷史利益上，他是站在狹小的派系的利益或教派主義的觀點上，如果他要繼續堅持他的觀點，這是不相容的。

「如果下一個歷史時期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話，一個大災難便威脅著全人類的文化。」托洛茨基給我們所寫下的這句話，在核子武器這樣發展的今天，更具有緊急性。「無產階級領導的危機，已成為人類文化的危機，只能由第四國際來解決。」托洛茨基這句話，在今天全世界史大林黨的空前危機下，特別具有現實性，現在的問題僅在於我們主觀方面能否認識這種「緊急的」和「現實的」局勢。首先是我們能否將一切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力量統一起來，有系統地干涉史大林黨日益加深的危機，爭取它們當中的一切戰士，作為解決革命領導危機的基本幹部，以此再進一步去團結一切革命分子，形成革命的群眾黨，應付行將到來的革命局勢。

我相信你是能把握整個世界局勢的趨向和我們運動的歷史使命的。所以我特別希望你，根據參加革命運動和三個國際的長期的經驗，尤其是你同托洛茨基長期合作的經驗，貢獻於我們整個國際的運動，以更大的注意和更多的精力幫助國際解決一些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在現時首先就是解決我們運動重新統一的問題。這絕不是白恩斯同志所說的什麼「大老闆」和「典型的個人崇拜」。這是根據於你個人在一般的革命運動中，特別是在我們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的記錄，及由此而得到的威望。

你是深深知道托洛茨基由一九二九年被迫離開蘇聯後，特別是自一九三三年德國革命失敗後，即以全力從事建立一個統一的革命的國際。他爲了這一目的，不但爲這個國際制定了革命的綱領，而且他費了無數的精力，以極大的耐心，說服各國的各種托派組織，促使他們統一起來，以便形成統一的革命國際的基礎。假如他還活著的話，他看到我們運動，在今天如此有利於發展的客觀條件下，而形成如此的分裂狀態，我相信他一定是要以急切的心情，使用全力來謀取統一的。

我們反對巴布洛主義的運動，在政治上是完全勝利了的。這是巴布洛的思想的密切合作者，柯克林、柯林斯和麥斯特等之公然脫離運動，巴布洛本人之被迫後退，停止發表他的修正主義思想，以及 I.S. 屬下各支部的絕大多數同志，強烈地要求和我們統一（要求和我們統一，便是等於同意我們所堅持的正統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便是最好的證據。但在組織上，由於我們所採取的「非常舉動」不容易爲大多數同志所了解，以及 I.C. 的錯誤（如對平委會）和無能，以致成就很少。這從大多數同志仍然留在 I.S. 內、以巴布洛爲總書記的這一事實，不可否認地表現了出來。

因此，現在的中心問題是，我們應當而且必須根據我們所堅持而且已經勝利了的正統托洛茨基主義立場，即以我們的過渡綱領爲基礎，在組織上儘速地將一切托洛茨基主義的力量統一起來，以適應當前的最有利的客觀環境和歷史需要。爲要儘速達成這一目標，我提議：

1. 我們不應像過去那樣，對統一這個如此有關我們整個運動的重大問題，完全採取被動的態度，即應主動地，即對運動負責地，採取行動。將 I.S. 對你給 P.O.D. 信中所提的有關統一問題的各项建議，重新考慮，作更具體的答覆。

2. 同時，我們應向 I.S.表示：我們接受它提出的紐西蘭（即美國）派一負責代表參加統一談判的要求。這種要求，即在我看來，不但是合理的，而且爲了談判有效，在實際上是不可缺少的。因爲根據 I.C.過去對平委會的不負責的，至少是不嚴肅的態度，如沒有紐西蘭代表的參加，任何統一談判都不會有好結果的。

最後，我希望你向社工黨的領導提議，請它根據新的事實，即各國托派組織迫切需要統一的事實，（我在前面已舉出了一部份）重新考慮我們運動的統一問題，採取堅定的立場。雖然社工黨因爲 Woolis 法案，不屬於 I.C.，但由於它在我們整個運動史中的地位和貢獻，以及其在國際間的聲望，它的主張是具有重大的，甚至決定的影響的。而且，另一方面，社工黨既曾經以公開信發動了反巴布洛主義的鬥爭，現在這一鬥爭既在政治上取得勝利，它便有責任幫助我們整個運動，在組織上重新統一。

由於客觀條件的異常有利，我們的整個運動正處於一個歷史的轉變時期，在這時期內，時間的因素，對於解決重大的問題，在現時便是解決統一問題，是具有決定的意義的。我希望你特別注意這點！

致最友好的問候！

彭述之

## 為托洛茨基殉難第十八週年紀念

### 致中國同志們的信

(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

親愛的中國同志們：

我們的偉大導師：第四國際的創立者，托洛茨基，他的殉難第十八週年紀念日又來到了！

讓我們藉這個機會，這個曾經使我們極感痛苦的日子，敘說我們幾年來僑居海外對於整個運動的觀感，並報導一些有關我們運動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實，作為這次紀念會的貢獻。

這裡，我們無須說，托洛茨基如何與列寧手攜著手完成了十月革命，在這個地球上建立了第一個工人國家。這裡，也不必重述，托洛茨基怎樣保持了十月革命的傳統，繼承了馬列主義，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揮了它。這些都是大家早已熟悉了的。

這裡須要特別指出的，只是：托洛茨基的中心思想，托洛茨基主義的基礎，乃是「不斷革命論」。這個理論運用到實際的政治上便是：一個國家（落後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斷地發展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一個國家勝利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不斷地發展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乃至不斷地消除一切剝削和壓迫的殘餘達到無階級的完全平等和自由幸福的共產主義社會。

與前面這個理論對抗的，首先是孟塞維克的「革命階段論。」根據這個「理論」，在落後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之間橫著一道歷史鴻溝，因而無產階級

的任務僅以推動資產階級走上政權，進行民主改革為限。史大林繼承了這個「理論」，這個已被俄國歷史推翻了的理論，發揮了他的「一國社會主義論」，即在一個國家（而且是落後的俄國）內建設社會主義，希圖與資本主義共存共榮，以此對抗革命的國際主義。其結果是，在蘇聯形成了稀奇古怪的異常可怖的官僚獨裁，在國際上斷送了許多具有勝利希望的革命，乃至最後取消了第三國際。正因此，托洛茨基根據他的不斷革命理論，在蘇聯提出了政治革命，以便恢復他與列寧所堅持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民主制；在國際上創立第四國際，以便繼承他與列寧創立的第三國際的歷史使命，完成世界革命。

但在一個長時間內，由於史大林及其徒黨利用了十月革命的威望及其所創造的社會主義財產制的物質基礎，在全世界範圍內對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主義者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惡意的誣衊、迫害和封鎖，並謀殺了托洛茨基，致使我們的運動，陷於異常困難和孤立的境地，而無法獲得應有的自然的開展。特別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戰爭所造成的特殊條件和資本主義的極度衰朽，史大林主義勢力得以擴展至東歐諸國，乃至毛黨在中國走上政權，以及蘇聯經濟在十月革命所創立的社會主義財產制基礎上之迅速發展，更顯得炫人耳目，似乎史大林主義已被歷史事實證明其正確，它的勝利是不可抵抗的。因而不但在全世界廣大的群眾中，特別是在東方落後國的被壓迫群眾中，對它浮起了很大的希望，即在我們自己的隊伍內也對它發生了強烈的幻想，認為它可能自我改良，領導世界革命走到勝利。此種幻想的集中表現便是巴布洛主義。

但「歷史法則究竟強過官僚機關」（托洛茨基語），正當史大林主義勢力登峰造極時，史大林主義官僚統治的內在矛

盾，特權官僚與被壓迫群眾間不可調和的衝突，也就達到它的爆炸點了。這種爆炸，首先反映在南斯拉夫與蘇聯的破裂上（一九四五年），隨後則表現於東德暴動與伏庫塔集中營的大罷工和諾林斯克的集中營的暴動中（一九五三年，史大林剛死後）。這樣，便使得史大林的繼承者，克里姆林宮的官僚，不得不在聯共第廿次大會上宣佈清算「史大林的個人崇拜」，「史大林的個人獨裁」及由此造成的一部份驚人罪惡，企圖以此緩和群眾，來挽救他們已被群眾怒火，乃至暴動所搖撼了的特權統治。

正是這個對史大林罪惡在全世界面前的公開暴露，不但證實了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主義者對史大林主義的反動和罪惡的分析和批評是完全正確的，而且由此引起了各國史大林黨的空前混亂和危機，特別是東歐諸國史大林黨官僚統治的危機，因而爆發了波蘭和匈牙利的革命。

不管波蘭革命因哥穆爾加的中派妥協傾向而變成流產，匈牙利革命被克里姆林宮官僚的坦克車殘酷地壓平，但這些鐵的歷史事實充分證明；蘇聯集團內的政治革命已正式爆發了，托洛茨基對蘇聯所作下的政治革命結論，已不是在理論上，而是在事實上被證驗了。

現在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史大林主義同資本主義一樣，正處在臨死的掙扎中，它的喪鐘被敲響了！

各國的史大林黨，首先是沒有格柏烏直接保護的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史大林黨，都陷入一種不斷分化和解體的狀態中。這同時也就是托洛茨基主義達到一個歷史的轉捩點。它已從被誣蔑、被迫害和被孤立的地位，進到成爲一切革命戰士，包括史大林黨內覺醒過來的革命戰士嚮往的思想武器。現在讓我們概括地指出一些事實來看吧：

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法、意的史大林黨，如大家

所知道的，以義大利為最強大的黨，也可以說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史大林黨的堡壘。單就法國史大林黨來說，它在聯共第廿次大會前擁有卅五萬黨員，控制著三百萬會員的工會，在一九五五年的國會選舉中得到了五百萬投票者的支持；但自聯共第廿次大會後，特別是經波匈革命後，它的黨員已失去了七萬人。它所控制的工會內發生了向左右分化的傾向。它所獲得的投票者的數目，在近年來的地方選舉中也逐漸低落。而且最重要的事實是，這個黨的內部第一次出現了一個有組織的左派反對派，並出版了它自己的內部公報，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公開抨擊了黨的官僚領導，探討了史大林主義的根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左派反對派的絕大多數都熱烈地閱讀托洛茨基的著作和托派的刊物，其中很多人已完全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思想而加入了托派。這個事實表明，托洛茨基主義已深入到史大林黨的心臟裏去了，前者已在後者的內部開闢它發展的新園地了。在最近戴高樂走上政權的過程中，法國史大林黨的官僚領導層盡了極其怯懦而卑鄙的幫凶作用，並正在準備大規模地出賣工人階級。正因此，它的左派反對派也就以較激烈的態度反對它的官僚領導，準備在黨內外號召和集合一切戰士和群眾來阻止法國陷入法西斯專政的深淵。雖然這個任務須要法國一切托洛茨基主義者團結起來，在國際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大力支持下，進行最堅決的鬥爭，才有可能完成；但這個左派反對派的傾向已表明：法國托洛茨基主義者挽救當前嚴重危機的綱領，已在史大林黨內部得到響應和合作了。

義大利的史大林黨原來擁有二百廿萬黨員。但在聯共第廿次大會後，脫黨者即達四十萬人。而且在黨內發生了許許多多的派系。這些派系，雖然在政治上還陷於混亂中，但有一種傾向是明顯的，即是：所有的派系都要求民主，反對官

僚的專斷領導。在這種傾向中可能形成一個像法國史大林黨內那樣的左派反對派。義大利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正在史大林黨內努力進行此種工作，且多少已在那些反官僚領導的派系中散播了一些托洛茨基主義的種子。他們收穫的時期是不會很遠的。

英國的史大林黨比起法意的史大林黨來是遠較脆弱的。但它的黨員在大戰後最盛的一個時期內曾達到五萬餘人。即在聯共第廿次大會前還有三萬五千餘人。從聯共第廿次大會後，在很短的時期內，自動脫黨者或被官僚開除者竟達七千餘人。而且這些脫黨者或被開除的黨員中，很多是具有革命思想和精神的優秀戰士。因此，他們自行聯系和集合起來，成立所謂「社會主義論壇」，曾召開了一次代表六、七千人的會議，討論有關英國社會主義前途的許多問題。托洛茨基主義者在這次會議中，曾成為公開討論的對象，更重要的是，這些脫黨或被開除的分子中，有不少是傑出的作家、新聞記者和工會領袖，已加入托派（如你們所知道的《匈牙利悲劇》的作者彼得·佛列爾，即是其中之一），成為不列顛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富有活力和戰鬥精神的戰士，因而大大地加強了那裡的運動。

美國的史大林黨，在戰後最盛時期曾擁有七萬餘黨員（它自稱有十萬黨員），並在一般左派集團（如當時的進步黨和勞動黨等）和某些工會中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但自五十年代開始，特別是自聯共第廿次大會後，這個曾經擁有七萬或十萬黨員的黨，只剩下五千餘人了（它自稱還有七千餘人）。而且這五千餘黨員多半是些最昏庸、最頑固，但是不活動的史大林主義的老朽，而脫黨的大多數則為較有生氣的中年和青年人。同時，這個黨在各種左派團體和工會中亦完全失去了它的影響，陷於最孤立的地位。因此，這個黨的領導層發生了

不斷的不可調和的內鬨，以至較有獨立思想的克拉克（前「工人時報」的主編）和蓋茨（黨中央組織部長）們都憤激地離開了它。我們可以說，美國的史大林黨已經完全解體了，所剩下的僅是一個史大林主義的硬殼。

但在另一方面，美國的托洛茨基主義黨 S.W.P.（社會主義工人黨），卻已從多年來的孤立狀態中解脫了出來，成了美國現時左派社會主義運動的軸心和動力。前進步黨的領袖里曼（一九五二年該黨的總統候選人）和前勞動黨的領袖麥克洛等及其許多幹部與史大林黨斷絕了關係（他們以前是曾被史大林黨所極力推崇的同盟者），同 S.W.P. 站在一道，支持後者的候選人，並共同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試圖以此聯絡和團聚一切左派的社會主義者及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工人，以便為建立群眾的工黨作切實的準備。在最近發起的「社會主義者統一投票」運動中，（即為本年參議院議員和某州州長的選舉而確定共同的候選人和組織統一的投票。）要進一步表現出美國左派社會主義運動已形成為一種新興的力量，鼓勵了相當廣大的群眾，引起了資產階級輿論的重視。但這個運動正是 S.W.P. 所推動，它的政綱的主要部份是由後者所提供的。由此證明，托洛茨基主義者已開始在美國的左派社會主義運動中在實際上取得了推動和思想領導的地位。以致史大林黨中具有革命性的分子和已經脫黨分子，不顧他們的官僚領導的命令，自動地參與 S.W.P. 所發起的運動和集會，並帶著同情的態度聽取 S.W.P. 發言人的意見，其中有些人甚至閱讀托洛茨基的著作和《戰士報》，對托洛茨基主義表示同情或同意了。

說到這裡，請你們特別注意：美國雖然在現時屬於資本主義世界中是帝國主義的堡壘，反革命的中心，但它同時也是人類未來命運的決定因素。因而美國史大林黨的分崩離析

和托洛茨基黨的朝氣蓬勃，便已明顯地象徵著托洛茨基主義與史大林主義的前途了。

像前面所敘史大林黨在美、英、法、意的分化和分解過程及托洛茨基主義的發展現象，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如歐洲的瑞士、荷、比、奧……東方的日本、西半球的加拿大，特別是拉丁美洲諸國，都以或大或小或速或遲的不同程度表現了出來。

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史大林黨中，有一些最普遍的現象，就是：對克里姆林宮及本國官僚領導的「絕對正確的權威」已經不存在或根本動搖了，「盤石般的黨」已經向兩極分化或分解了，黨員群眾原本對托洛茨基主義的無比仇視或恐怖已經消解或在消解的過程中，因而凡是從左邊反對官僚的幹部和黨員，都從托洛茨基的著作和托派刊物中尋找思想的出路，乃至最後走進了托派的隊伍中。……這些現象綜合起來，便足夠表明托洛茨基主義與史大林主義的興衰交替的相互關係了。

在蘇聯集團內各國的史大林黨，由於黨官僚壟斷了政權，操縱了秘密警察和軍隊，享受了無比的特權，可以任意迫害異己，特別是迫害具有托洛茨基主義傾向的分子，鎮壓群眾，情形當然有所不同。但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史大林黨仍然有其共同點，那就是「領導的絕對正確」的權威已被打破，「堅如盤石般的黨」已在分化和分解中（公開的或暗地的）。而且正由於官僚的橫暴獨裁，無限的特權享受，任意迫害異己和鎮壓群眾，這些國家的官僚也就愈來愈成為群眾一切不滿、怨恨和仇視的箭靶。雖然此種不滿、怨恨和仇視，在東歐諸國、蘇聯和中國之間有其差異，但此種差異僅是程度上而非本質上的。因此，所有這些國家都在朝著同一的方向走，——政治革命的爆炸。

在東歐，一九五三年的東德暴動，一九五六年九月至十月間的波蘭革命，特別是同年十月至十一月的匈牙利革命，已將政治革命的全部內容顯露出來了：它的目的是保衛社會主義的財產制，實現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它的手段是群眾武裝暴動推翻特權官僚的獨裁機構，建立群眾自由選舉的蘇維埃或代表會議。而且，在此種群眾所舉行的暴動（東德）、政治革命的預演（波蘭），和政治革命（匈牙利）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被壓迫的工人群眾和革命的知識分子，是如何地由罷工示威，一直走到武裝暴動，以反對本國官僚及其主子，克里姆林宮的獨裁者。在這些暴動和革命中，人們又可看出：土著的史大林黨官僚，在暴動的群眾面前，怎樣地暴露了他們的狼狽醜態，僅靠克里姆林宮的坦克車才勉強將暴動與革命鎮壓下來。

暴動和革命雖然是被坦克車鎮壓下去了，但引起暴動和革命的基本矛盾，被剝削壓迫群眾與本國特權官僚及大俄羅斯主義的克里姆林宮官僚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不但沒有因此被消除，反而愈益加深和加劇起來。因此，我們可以說，東歐正如一座火山，坦克車可能一時堵住火山的裂口，但它絕不能阻止火山的最後爆發，相反地，它將加劇火山總爆發的進程。

另一方面，在東德暴動和波蘭革命中，雖然還沒有托洛茨基主義的團體或其代表人物出現於政治舞臺，但托洛茨基主義對於蘇聯所訂下的政治革命綱領，已完全由群眾用革命行動表現出來了。正如托洛茨基在我們的《過渡綱領》內所寫的：托洛茨基主義「之具有牢不可破的力量，就是因為它不但表現革命的傳統，而且還表現今天俄國（現在應加上東歐諸國及中國、北韓、北越等）工人階級的真正反對態度」。此種「真正的反對態度」一旦發展成爲革命行動時，便自然地、

邏輯地將托洛茨基主義所提出的政治革命綱領烘托出來了。假如波匈的革命不遭到克里姆林宮坦克車的威脅和摧毀，繼續發展下去，革命的群眾，特別是其領導分子，在徹底反對和肅清史大林主義的號召之下，極可能將一些堅決反對史大林的托洛茨基的名字提出來作為旗幟，並從托洛茨基主義中尋求他們再向前進的方針的。此種傾向，在波蘭革命的過程中曾有所反映，就是：有不少革命者曾談到托洛茨基與史大林的鬥爭，並希望從前者的著作中探索他們反史大林主義的歷史淵源。由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東歐諸國未來的政治革命中，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將與群眾的革命行動連結起來的。

關於蘇聯內部被剝削和被壓迫的群眾與特權官僚間的深刻而尖銳的矛盾，政治革命的客觀條件，托洛茨基本人已說得十分精細，這裡無須重述。這裡須要指出的只是以下幾點：

A. 伏庫塔集中營的大罷工已給政治革命提出了信號。而諾林斯克集中營的猛烈暴動更給未來的政治革命作了一次預演。

B. 聯共第廿次大會對史大林的個人崇拜和獨裁的罪惡之宣佈，已在被壓迫群眾面前暴露了那個「列寧的繼承者」、「永無錯誤」、「偉大天才的領袖」，原來是直接背叛列寧的窮凶極惡的暴君。而且這個暴君的罪惡，正是由這個暴君一手提拔起來，並在長期內執行暴君罪惡命令的，現時以赫魯曉夫為首的官僚層所宣露的。

C. 宣露史大林個人獨裁罪惡的官僚們，曾經強調以「集體領導」代替「個人獨裁」，答允「改良」。但當匈牙利的群眾自動起來以武力打碎史大林主義官僚所強加於他們身上的枷鎖、實行改良時，宣佈要「改良」的官僚們竟以無比兇殘的手段將匈牙利的革命群眾壓下去了！

D. 另一方面，宣佈「集體領導」的官僚們，不久，爲了爭權奪位，便不斷地自相爭鬥，其結果是：莫洛托夫、馬林柯夫、加卡諾維等被趕出克里姆林宮，充軍遠地；米可夫被撤除軍職被看管，布加林被撤職後投諸閑散。於是，所謂「集體領導」又回到了「個人獨裁」，所不同者只是以赫魯曉夫代替，正確些說，繼承史大林而已。官僚們爭權奪位的醜惡形態與赫魯曉夫的陰險野心，由此又一次在群眾面前暴露無遺。

E. 在前面所指出的一切醜惡的事實被暴露之下，特別是在匈牙利革命示範的光照之下，蘇聯被壓迫的群眾，尤其是革命的知識分子，已經瞭解，至少已在探尋他們的當前任務與歷史前途了。他們不但已利用批評的武器指責和暴露了官僚的罪行（如第廿次大會後，蘇聯不少刊物發表批評官僚的文章及文學作品等），而且用行動來抵抗官僚的壓迫（如莫斯科及列寧格勒地區許多工廠的罷工）和同情波匈革命（如莫斯科及列寧格勒各大學學生同情波匈革命及抗議官僚鎮壓匈革命的罷課示威），這些罷工抵制和罷課示威，正是蘇聯未來政治革命的開幕演習。（波匈的革命就是從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示威開始的）。

F. 由於史大林的兇殘罪惡的暴露，所有被壓迫群眾，尤其是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工人，都自然地，而且必然地聯想和記憶起那位與列寧完成十月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曾同史大林進行過長期鬥爭，並爲史大林趕出蘇聯，乃至被他謀殺的托洛茨基。關於群眾在這方面的思想演化過程，由於官僚的嚴厲壓制和封鎖，我們自難得到詳細的情報。雖然如此，但仍然由旅行過蘇聯的人們透露了一些消息出來。

例如一位名叫彼德的英國青年，前共黨黨員（他是因抗議克里姆林宮鎮壓匈等事而脫黨的），在去年秋參加了莫斯科的青年聯歡回來後；報導說：他通過翻譯員，曾同一些俄國

青年人舉行過幾次談話。在談話中，那些青年人除對當權官僚極表不滿外，並特別談到托洛茨基。其中有一位對於托洛茨基在二十年代與史大林的鬥爭極感興趣，正在追求此種鬥爭的全部內容，困難的只是很難得到文件。他並熱烈表示要知道托洛茨基出國後對於蘇聯及國際大事所發表的意見。（全文載英國彼得·佛列爾主編的「每週新聞通訊」）與此相類的報導，從訪問過蘇聯的其他人們中亦間或看到。單憑這點，就已夠證明，蘇聯群眾中的先進分子在托洛茨基反對史大林的鬥爭中尋找他們思想的武器了。

從前面幾點的敘述和解釋中，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蘇聯政治革命的必然性和迫切性，在基本上是與東歐諸國相同的。所不同者，僅是克里姆林宮官僚操縱了無比龐大的物質力量，可能在群眾的壓力之下讓些步，給他們的生活以某種限度的改進，因而在一些時間內緩和群眾的憤懣。但在另一方面，蘇聯的群眾，特別是工人群眾，不但具有巨大的數量（工人數目達四千餘萬人），而且已有較高的文化水準。他們現在已達到這樣一種程度，即是：再難容忍騎在他們頭上的官僚們橫行霸道了。因而對微小的物質改進，他們是絕不會滿足的。杜賓切夫的著名小說「不單是爲了麵包」，便完全洩露了蘇聯群眾的真實情感和意向（正因此，赫爾曉夫們便給了杜氏以最嚴厲的抨擊和懲戒）。他們在不遠的將來，一定要拿起武器來同史大林主義的官僚算賬的。

在此種行動到來的大清算中，我們可以預想，甚至可以預斷，托洛茨基的思想，托洛茨基主義將會起著重大的，甚至是決定的作用。理由是：不但托洛茨基是與列寧一起領導了十月勝利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在群眾中具有絕對不能磨滅的深刻影響，而且正因爲他與史大林進行了長期的鬥爭，散發了他的許多文件，影響了幾百萬人。雖然這些人當中最堅

決的戰士為史大林所毀滅，但還有很多人被迫消沉下來，掩藏在群眾裏。當史大林被繼承他的官僚所清算時，他們一定重新感到他們以前的思想和奮鬥是絕對正確的，多少恢復了一些勇氣，浮起了新的希望，在青年中傳佈思想影響。因此，可以預見：在未來的革命真正開始時，將有許多曾經直接受過托洛茨基思想影響和領導的老一代的人們，將與新一代革命青年結合一起，成為革命的動力和領導的。從這一點說，蘇聯的政治革命，比之東歐更有其優點，即是：托洛茨基主義在蘇聯群眾中具有它的深厚的傳統，在革命開始時，至少在革命的高潮中，托洛茨基的名字，將被革命群眾當作革命的旗幟高舉在他們的頭上。這將是蘇聯未來政治革命勝利的保障。

關於中國近年來所發生的事變及其演化情形，同志們，由於你們有接近大陸的方便，當然會比我們知道得更多而更詳細。因此，我們在這裡無須多說，只是表示我們對於中國現狀及其前途的一些基本觀念。

毛黨統治的中國，不但較之東歐諸國大有差異，即與蘇聯相比亦有所不同。其主要原因是：蘇聯的史大林主義官僚，是在當時西方革命失敗與蘇聯孤立的條件下形成起來的。因而這個官僚層得以轉變無產階級專政為官僚的獨裁，並殺害了整代老布爾什維克和無數革命青年，把整個國家放在格柏烏的監視之下。雖然這個官僚層保持了十月革命所創造的社會主義財產制，並施行了好幾個經濟建設的五年計劃，大大地發展了生產，但所有這些都是為了保持和增加官僚的特權，因而在計劃經濟建設的進行中，在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過程中，官僚們僅依靠行政的鞭子，給經濟和群眾帶來了無數的損害與犧牲。一句話，蘇聯經濟上所有的成就，是以犧牲工農群眾為代價的。因而蘇聯的官僚從頭到尾是反動的。

東歐諸國更等而下之。因為那裡的官僚全是為克里姆林宮所指派或認可的。因而他們只能奴顏婢膝地執行莫斯科的命令，將蘇聯的經濟措施及一切官僚方法變本加厲地移植於那些國家中，使得群眾感到他們是處在一個不能忍受的魔窟裡。

至於毛黨，雖然是在史大林學校培養出來，完全繼承了史大林的「革命階段論」，(毛把它發展成為「新民主主義論」)和階級合作的機會主義政治路線：但由於第二次大戰所造成的特殊條件，它被迫地和經驗主義地進行了一連串的革命行動或進步措施：特別在蔣介石的不可調和的進攻與其農民武裝群眾的壓力之下，不得不進行「總反攻」，因而摧毀了蔣政權，建立了「人民共和國」。隨後，由於美帝進攻朝鮮的威脅和國內地主和資產階級的蠢動，又不得不參加朝鮮的抗戰，並在國內發動「三反」「五反」的反資產階級運動，加緊土改，消滅地主，並於一九五三年放棄其反動透頂的「新民主主義」，宣佈「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加緊工業化乃至進而加速農業集體化等。所有這些，不管如何被歪曲，在基本上總是革命的，是為中國從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所必需的。這便是中國與蘇聯及東歐諸國大相差異的所在。

但在另一方面，正由於毛黨的整個領導層是從史大林黨教育出來的，它便保持了史大林主義官僚全部的傳統和方法。所以在實施計劃經濟的工業和農業集體化的進程中，所採用的方法全是史大林式的，即完全站在官僚的特權利益上，以犧牲工農群眾為代價去達成它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指標，「超額完成」它的「計劃」。尤其在政治方面，雖然政權已被改稱「無產階級專政」，但實際上，不僅工人群眾完全被剝奪了他們的基本政治權利，自由選舉代表成立政府（蘇維埃政府）和監督政府的權利，即連一般普通的民主權利，

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信仰和罷工等自由的權利，也都在被嚴厲禁止之列。從這些方面看來，中國與蘇聯乃至東歐諸國，並無本質上的不同，只是程度上的差異而已。

假如對毛黨的外交政策注視一下，它不但完全追隨了克里姆林宮的反動外交政策（基於與資本主義世界共存共榮的政策），而且有時甚至比後者還走得遠。它最近對南斯拉夫所採取的猛烈攻擊態度便是一例。

最後，毛黨對史大林的個人崇拜和獨裁的態度，即對史大林主義的基本立場，比起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官僚來也是更為保守或反動的。因為即在聯共第廿次大會宣佈對史大林的清算之後，毛黨還是強調史大林的功績，為他的基本思想辯護的。這是反映了基本的傾向：他一貫以東方的史大林自命，曾實行了，而且還要實行史大林式的個人崇拜和獨裁。

由前面的分析和說明，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中共，這個蘇集團內最大的史大林黨（就黨員人數說），在中國不祇是被迫幹了一次革命（當然是畸形的），把中國推上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但由於它所繼承下來的史大林主義的思想傳統和官僚方法，卻又把中國限制於蘇聯官僚獨裁統治的體系中。由此便形成了特權官僚與被壓迫的工農群眾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而替政治革命埋下了火藥，因而它的前途也就註定與蘇聯和東歐諸國糾纏一起了。

中國此種反官僚獨裁的政治革命的遠景，已在波匈革命後的「鳴放運動」的高潮（約自去年四月末到六月初）中清楚反映出來了。工人、農民、知識份子，特別是學生青年們，曾尖銳地批評了中共的官僚主義，有些地方甚至走到罷工、罷課和示威的行動。在這種情勢下，甚至中共第二號領袖劉少奇也不得不公開承認：「官僚主義很厲害」，群眾「對錯誤的批評遍及中國各角落，包括工廠、農場、學校和其他組織。

批評的箭頭只指向領導」(見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的人民日報所載劉少奇在招待錫蘭新社會平等黨訪華代表團宴會上的講話)。此種情形如進一步發展下去，就要接近政治革命的爆炸點了。當然，中國史大林黨根據匈牙利革命的經驗，是絕對不能容忍此種發展的。所以它「及時採取必要的措施」，把一切來自左邊，即來自群眾和革命知識份子的對官僚主義的批評，都放在反右派的名義之下壓平下去了。

但在此種反官僚主義的批評浪潮中，有兩種傾向是含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值得特別指出加以注意的：

1. 北京人民大學學生林希翎，反官僚主義的學生運動的領袖，她是很年輕，且一向為青年團團員，與托洛茨基主義者毫無關係，但她所發表的思想和主張：中國不能單獨建立社會主義，擁護社會主義的財產制，打倒官僚獨裁制：竟與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立場不謀而合！這表明，政治革命已在中國成為客觀的需要，即使沒有托洛茨基主義者去宣傳，反官僚主義的群眾運動中最好的具有獨立思想的革命分子，根據群眾的反映及自己的經驗和思索，已能自動地達到與托洛茨基主義者相同的結論了。(在匈牙利革命中有一個文件對史大林主義的批評及局勢的分析和結論即與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立場很接近。該文件曾發表於去年某期《戰士報》上。)

2. 丁玲、馮雪峯、艾青等，中共內傑出的和最有成就的文學家和文藝理論家，雖然他們對黨的官僚主義的批評還限於反對官僚對於文藝界的格柏烏式的控制，主張文藝應描寫現社會的真實生活，即暴露群眾在黨官僚統治下的窒息和痛苦生活及其意識形態。這與蘇聯杜賓切夫所代表的傾向是相一致的，但在黨官僚的眼中，已是不能容忍的「叛徒」了。更重要的是：據官方披露，丁、馮、艾等與已被迫害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王實味和受過托洛茨基主義影響(通過王獨清的

李又然之間)，有其淵源和密切的關係。這又表明：凡是忠實於事實和真正同情群眾疾苦的文藝家，是容易接受托洛茨基主義的影響或同意托洛茨基主義的觀點的。

從前面所舉的兩個事實中，我們有理由相信：不管林、丁、馮、艾等現時遭到如何的打擊與迫害，他們所代表的傾向，在毛黨官僚繼續統治之下，一定在群眾中，首先是在群眾的先進分子中繼續發展，在未來政治革命的浪潮到來時，定與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匯合而成革命的動力的。從上面對史大林主義危機在全世界範圍內所引起的分解趨勢及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新興氣象的敘述和分析，當能相信我們的判斷：史大林主義同資本主義一樣，正處在一種臨死掙扎中，「托洛茨基主義」將會成為一切真正革命戰士，包括史大林黨內覺醒過來的戰士的軸心！

現在讓我們告訴你們關於反巴布洛運動的結果及我們運動重新統一的前途的一些消息。

巴布洛主義在我們運動中所引起的思想混亂及其惡劣影響，以致最後引到分裂，無可否認地，這給我們的運動帶來了極大的損害。但另一方面，由於正統托洛茨基主義者團結起來進行了對巴布洛主義的堅決鬥爭，其後果使我們的幹部在思想上更為堅定而深入，而將運動向前推進了一步，至少是思想上推進了一步。

現在可以說，反巴布洛主義運動，在思想上是完全勝利了，巴布洛主義在我們運動中，不但再沒有發展的餘地，而且也沒有存在之餘地了。這從如下的兩點事實可以表明：

1. 自正統托洛茨基主義者對巴布洛主義進行了猛烈攻擊和徹底批判之後；巴布洛的思想上的最密切的合作者和堅決的支持者，如柯克林、利維斯東、柯林斯、麥斯特等，都公然脫離了運動，走到親史大林主義的泥坑中去了。因此，

巴布洛本人，從那時起，也就停止他的「主義」的宣傳。

2. 在聯共第廿次大會宣告清算史大林及波匈政治革命爆炸的光照之下，不但曾經受巴布洛主義影響或為巴布洛的思想所混亂的 I.S.（國際書記處）屬下各支部的絕大多數同志，自然地自動地澄清了他們思想上的混亂，回到了正統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就是巴布洛本人，為了維持他在國際書記處的地位，也試圖轉變其思想，以此去取得絕大多數同志的諒解和支持。

在上述的這種情形下，我們運動重新統一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了，正因此，不但屬於國際書記處各支部的絕大多數同志早就要求統一，促使國際書記處於去年九月所召開的世界會議上一致通過了要求統一的決議，即國際委員會方面，現在認為統一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以前國際委員會有許多人是堅決反對統一的。）不久以前，國際委員會在召開的世界會議上（六月初）已正式通過了重新統一，改組第四國際領導的決議案。因此可以說，我們運動的重新統一，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實現的。

就現時整個世界的形勢來說，不但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早已爛熟，落後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正在發生和發展，即蘇聯集團的政治革命的客觀條件也已由完全成熟而開始爆發了。而在另一方面，以美帝為首的反蘇集團的世界大戰，又在繼續準備中。在這種形勢下，托洛茨基給我們寫下的《過渡綱領》內所指示的：「如果沒有一個社會主義革命，在下一歷史時期中，將有一個大災難威脅著全人類的文化」。在當前的核子武器時代，這個指示是更具有真實性和迫切性的。

「現在的問題歸結到無產階級，主要的還是歸結到它的先鋒隊。人類歷史的危機還原為革命領導的危機。」「無產階

級領導的危機已變成了人類文化的危機，而這一危機只有第四國際才能解決。」

看了我上面所詳述的關於史大林主義衰落的趨勢及托洛茨基主義新興的氣象，不但有充分的理由，而且有具體的事實作見證，相信：第四國際對世界革命領導的危機已開始在進行解決了。

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

## 從赫魯曉夫訪美 反映出來的國際局勢及其前途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於本年九月間受美總統艾森豪威爾正式邀請訪問美國，並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據會談公報宣露：雙方同意緩和國際緊張局勢，避免以武力解決爭端，並擬於最近的將來召開四強首腦會議解決國際間一切重大問題。尤其是赫氏訪美後所作的種種緩和國際局勢的言論和姿態，及強調避免戰爭與和平共處的宣傳，這便在世界範圍內造成了一個印象：原本日趨緊張的國際局勢緩和下來了，某些人們甚至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可以避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制度的和平共處是可能的。

但事實果會如此嗎？

要徹底解答這個問題，必須首先追溯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局勢的演化，特別是美蘇在國際地位上的演化。

美國從第二次大戰的勝利中走出來，由於戰爭對它所造成的空前繁榮和龐大軍力，曾不可一世地以第一強國出現於國際舞臺，操縱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滿以為二十世紀是美國的世紀了。但另一方面，由於十月革命所造成的社會主義財產制的優越性，以及工農群眾在戰爭過程中保衛此種財產制所表現的無比犧牲精神和英勇氣概，蘇聯不但擊毀了希特勒的兇猛進攻，而且佔領了歐洲的東半部，成了世界第二大強國，因而形成了美蘇對立的尖銳局勢。

在這種局勢下，美帝國主義立即動員了它的財政力量，經過馬歇爾計劃，不僅幫助它的同盟國英法恢復戰爭所破壞

的經濟機構，緩和了它們的社會危機，並幫助戰敗的德、意、日，將它們被戰爭破壞的生產恢復過來。隨著，即對蘇聯發動了冷戰，在西方建立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的軍事同盟，在東方組織東南亞協定集團，在中東組織巴格達條約集團，並在全世界建立海、陸、空軍基地，以此包圍蘇聯，加緊製造原子彈，準備第三次大戰，企圖相機轉變冷戰為熱戰，一舉而毀滅蘇聯。

但蘇聯方面，在戰後初期，雖然史大林盡量向美帝國主義所領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退讓，不惜在歐洲抑制法意的革命運動，解散在共黨領導下的工農武裝，恢復資產階級的統治；在東方抑制中共的活動，恢復國民黨在淪陷區域的政權，希圖以此贏得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但看到美帝發動冷戰，武裝其同盟國，準備新的大戰來進攻它時，克里姆林宮的統治層也不得不積極從事防衛。首先以驚人的速度恢復戰爭所破壞了的生產，並進而大大地發展了它，得以成爲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工業國（這當然也是由於社會主義的財產制和工農群眾的特殊努力）。同時幫助中共進行對蔣介石的反攻，解放了整個中國大陸，建立了人民共和國，使社會主義陣營力量擴展到了亞洲大陸。最後並以全力從事原子能的研究，因而也能製造核子武器，打破了美國對該項武器的壟斷。尤其是在火箭方面，盡力與美國競爭，甚至第一次把人造衛星射上太空，送到地球的軌道。（在這方面，蘇聯已超過美國，它九月十四日把衛星成功地射上月球，這迫使美國不得不承認它的進步）。蘇聯這些巨大的成就，不僅給了美帝反蘇戰爭準備一個有力的回答，而且直接給了美國本身以極嚴重的威脅（放射性武器的威脅）。

差不多同時，在中國革命勝利的鼓舞之下，亞洲、非洲乃至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不斷興起，這便大大地削

弱了美帝所領導的帝國主義在這些區域的勢力，這反過來更加深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危機。另一方面，由於美、英、法等帝國主義間的某些矛盾，致使北大西洋條約組織不斷發生裂痕，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無法採取一致的步驟（例如法國不願駐法的美軍儲存核子武器，以致迫使美空軍撤離該國等）。由於伊拉克革命的勝利（實際上是半勝利），巴格達集團已成癱瘓，而東南亞條約組織則變成了無力的虛構。再加上美國、尤其是美國人民大眾對新的大戰的恐懼和反對，這一切事實與上敘蘇聯的成就配合起來，便迫使美帝國主義的代表艾森豪威爾對越來越緊張的美蘇關係，特別是西柏林問題所引起的嚴重局勢，重加考慮，謀取緩和。這便是美國正式邀請赫魯曉夫訪美的根因。

美國這次邀請赫氏訪美，並同意後者召開四強首腦會議（這在以前是拒絕了的），無疑地表明美帝國主義已從反蘇的冷戰中退卻下來（不管是暫時的），國際的緊張局勢緩和了，第三次大戰的恐怖氣氛鬆弛了。這種情形，當然是一般害怕戰爭的人們所歡迎的。

至於赫魯曉夫之樂於訪美，盡力謀取妥協，乃是繼承史大林一貫堅持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的基本政策。赫氏自排斥他的競爭者馬林可夫、莫洛托夫、布爾加寧等，取得全部權力，繼承史大林的獨裁地位之後，更是堅定地向「和平共存」的方面走。幾年來它不斷要求召開首腦會議以解決國際爭端，並屢次聲稱希望與艾森豪威爾直接談判，便是明顯的表示。雖然他有時作些威脅的姿態，如聲稱限期結束西柏林的佔領狀態等，但不過是藉此要挾對方遷就他實行召開首腦會議，談判妥協條件，達成和平共處的目標而已。所以當艾森豪威爾同意邀請他訪美會談時，他幾乎表現了樂不可支的態度。他在訪美時所發表的一切言論，都是以極溫

和的語調宣傳他的和平主義，強調戰爭必須避免，以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制度必須和平共處等。

赫魯曉夫自訪美回來後，更是大肆宣傳和平主義，甚至人道主義的福音。無論在言論上或行動上，他都盡量討好或綏靖美、英、法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他公然主張「互相讓步、考慮對方的利益」。例如他在十一月一日所發表演說中，除了強調「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和平共處，預先假定相互讓步，相互考慮對方的利益，否則正常的關係便沒有建立的可能。」——這一準備向資本主義世界讓步的宣告之外，並進而贊揚法國獨裁者戴高樂對解決亞爾及爾戰爭的建議，認為它「在解決亞爾及爾問題中會起重大的作用。」甚至說：「在法國與亞爾及爾間所存在的歷史上形成的密切聯繫，是大家所知道的。」這就是說，亞爾及爾和法國應「互相讓步，互相考慮對方的利益」，謀取妥協。他在中印邊界的爭端中完全採取中立的和事老的態度。尤其是他在中國國慶宴會上所發表的演講辭，更有系統地「有理論地」發揮了戰爭必須避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和平共處的必要與可能。底下便是他的演辭的主要內容：「還在蘇維埃政權最初的年代裏，偉大的列寧就確定了外交政策的總路線是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的方針。西方國家長期以來拒絕這種真正人道的原則。雖然如此，和平共處的原則還是深深打入絕大多數人的心。」「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人士越來越不得不考慮現實，從新建立國際關係。因此，在我們的世紀裏，除了根據和平共處的原則，是無法成功地解決兩個制度之間的關係問題的。別的道路是沒有的。」「我們深信，捍衛世界和平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政策將繼續不斷地取得新的勝利。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作不少的努力。但是，這個崇高的目的是值得不遺餘力地為它奮鬥的。」

從赫魯曉夫在上面所表示的這些言論和行動中，已十分清楚地反映出了克里姆林宮的統治層不僅要緩和緊張局勢，而且準備「不遺餘力地」為和平共處的原則而奮鬥。換句話說，這是準備不惜任何代價向美帝國主義讓步，謀求妥協，以便達成和平共處、維持現狀的基本目標。美國哈利·沙利斯堡（HARRISON SALISBURY）在九月十五日紐約時報上對赫氏訪美曾作如下的判斷：

「赫魯曉夫先生以關於兩國（美蘇）未來關係的某種確定的觀念來到美國。他曾在許多場合中說過，他所歡喜的是由美國和蘇聯所指導的兩個強國的世界。」

「赫氏沒有這樣十分率直地表示他的觀念。但它們隨著同樣一般的模型，每一強國承認另一強國在某一定區域內的無上利益。」「這將意味著承認東歐與亞洲共產主義的現狀。這也承認西歐與西半球資本主義的現狀，這兩大強國將負責鎮壓那些小國對和平的任何搗亂或威脅。」

沙利斯堡這個判斷，只須把「鎮壓那些小國對和平的任何搗亂或威脅」修改為「鎮壓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和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內的工人革命運動，以及蘇聯集團內民眾反官僚獨裁運動」，是完全符合於赫魯曉夫的思想邏輯和願望的。但根本的問題則在於：在資本帝國主義存在的條件之下，戰爭是否真可避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制度是否可以長期和平共存，美帝和蘇聯所控制的現狀是否真可能長久維持。

假如不是從克里姆林宮統治層的願望或和平主義者的幻想出發，而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歷史所屢次提供的事實來看戰爭問題，便不得不承認：現代的戰爭乃是深深地植根於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之中。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它的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它的生產力已遠遠地超過了它的國內市場的狹小界限，和它的民族國家的

範圍。它必須不斷向國外擴大銷售商品，取得原料和投資的新領域，即按期地重分世界。否則，它便無法繼續生存。這便是以前兩次世界大戰發生的客觀原因。這差不多已成了人所共知的常識，至少是馬克思主義者絕對不可否認的常識。

不錯，在第二次大戰後，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已取得壓倒一切的優勢，資本主義列強間重分世界市場的戰爭的可能性似乎已消失了，或至少減到最低限度了。但由於蘇聯勢力的發展，社會主義財產制的擴張（戰後社會主義的財產制已由戰前地球六分之一的面積擴展到三分之一），不僅大大地縮小了資本主義的市場，而且直接地威脅到資本主義世界本身的存在。此種社會主義財產制與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的矛盾，比之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更是無比的深刻而不可調和。因而在這兩種制度間的戰爭更顯得尖銳而不可避免。列寧早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就已說過：「我們剛從戰爭走到和平，但我們切勿忘記，戰爭還是要來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同時存在時，我們便不能和平生活：二者之中，最後地，這一個必然消滅那一個。喪歌不是對著蘇維埃共和國唱，便是對著世界資本主義唱的，這是戰爭中之一個暫時的休戰。」（這段話與赫魯曉夫前面所謂的，實即偽造的列寧確定了「不同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的方針」是絕對相反的。）列寧這種說法乃是根據兩種制度間最深刻而不可調和的矛盾得出的結論。這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點看來是不能有任何爭論餘地的。

或者人們會說，未來的戰爭將以核子彈為主要武器，這對於戰爭的雙方都要造成毀滅性的浩劫。因而雙方的統治層都不敢嘗試這樣的戰爭，這便是戰爭可以避免的主要原因。是的，未來的戰爭是最具毀滅性的，對整個人類將造成難以想像的彌天大禍。正因此，甚至現時的帝國主義的代表們，

如麥美倫和艾森豪威爾之流，對此也感到憂懼，表示願與赫魯曉夫談判，謀取妥協，試圖避免或延緩戰爭。但麥美倫與艾森豪威爾現時所表示的傾向，僅是帝國主義還未決定發動反蘇戰爭之前一種暫時的緩和與妥協姿態而已。當資本主義的危機（如經濟恐慌及社會危機等）達到爆炸點，帝國主義的基本利益受致命威脅時，帝國主義國家，如美、英、法等國將產生另一種瘋狂好戰的代表人物，如希特勒與墨索里尼之類的人物來代替麥美倫與艾森豪威爾之流建立法西斯獨裁，不顧一切地掀起反蘇戰爭，希圖以此挽回資本主義的末途。

要想真正避免戰爭，建立持久的和平，只有一條路，即：世界的，首先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獲得完全勝利，從根掘毀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制，才有可能。別的道路是絕對沒有的。所有偉大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里卜克拉西、盧森堡、列寧和托洛茨基都一致地堅決地認為必須以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消滅帝國主義的戰爭，以此建立永久的社會主義的和平。列寧所領導的布爾塞維克黨，在第一次大戰中提出「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即革命）」正是基於上敍的基本觀念。在十月革命勝利後，列寧更不斷強調發展世界社會主義革命以防阻新的世界大戰，為人類創造永久和平的條件。第三國際正是為了完成這一崇高和偉大的目標而建立的。

自列寧去世後，史大林完全違背列寧的遺教和十月革命的傳統，製造「一國建立社會主義」的理論，隨即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代替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最後，且進而乾脆地解散了第三國際。史大林之所以這樣做，乃是代表蘇聯新起的官僚層的特權利益。這個階層自從把無產階級的專政轉變為官僚獨裁，剷除了整代

老布爾塞維克之後，便自然而然地放棄世界革命，需要與資本主義維持和平，以便長久保持和享受他們的特權。今天赫魯曉夫所表示的「不遺餘力地為和平共處的原則而奮鬥」，不過將蘇聯集團內官僚保持特權的決心更確定地坦白地向世人宣告而已。

但戰爭與革命問題最後決定，既不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領導人物，也不在於蘇聯集團的統治層，而在於先進國家的工人階級，被壓迫國家的廣大群眾及蘇聯集團的工農大眾。他們是絕對不能長久忍受所謂「和平共處」或美蘇所控制的「現狀」的。因為這樣的「現狀」僅是維持帝國主義者現存的利益和蘇聯集團內官僚的特權。同時也就是維持帝國主義對壓迫民族的奴役，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與壓迫，官僚對工農群眾的監視與鎮壓。這樣的現狀在被壓迫的民族、被剝削的工人階級（資本主義國家內）和被壓制的工農群眾（蘇聯集團內）看來，只是一套枷鎖，他們遲早要打破這種現狀，擊碎這套枷鎖的。這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律，不管人們願意與否，一定被實現出來，把這個星球帶到永久和平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上的。

赫魯曉夫對和平共處的宣傳和努力，當然會在某些群眾中造成幻想，癱瘓他們的鬥爭意識，模糊他們的奮鬥方向。但另一方面也會促醒工農及革命的知識份子進一步認識克里姆林宮統治者及其指導下的各國黨之徹底放棄革命與資本帝國主義謀取妥協的真面目，利用暫時緩和下來的國際局勢的空隙，重新團結一切革命勢力，在各個國家乃至國際上形成革命的領導，替未來世界革命的勝利準備必須的條件，這樣，所謂「和平共處」的時期將會成為世界革命徹底勝利的準備時期。

為什麼「接受了不斷革命論」的「正統馬列主義者」(托派)「不能領導革命勝利」？

## 對蘇達的批評的批評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五日)

蘇達同志在他的《中國革命的回顧與前瞻》一文中，談到革命階段論者的中共如何領導革命達到勝利後，曾提出一個問題：「爲什麼中國不曾產生一個自覺信奉不斷革命的工人黨，由它領導革命勝利呢？誰要是知道早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的次日，就有一部份中國共產主義者接受了不斷革命論，以後一直爲它奮鬥，他就更急於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而蘇達自己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

「那些早已接受了不斷革命論的正統馬列主義者（托派），雖然掌握了正確的革命戰略路線，有了正確的綱領，但是沒有成熟到懂得客觀形勢具體地運用革命策略和選擇每時期最實際的工作。反動的年代不能增加他們的經驗和提高他們的政治能力，反而使長期關在小圈子裏的他們滋長一種孤芳自賞、憤世嫉俗的宗派主義心理。因此在抗戰期間和其後的內戰期間，他們都曾有正確的戰略路線，卻限於一般的宣傳工作，反復背誦不斷革命的公式，而不曾努力去和中共領導下的廣大群眾鬥爭建立聯繫（在抗戰時沒有參加敵後武裝鬥爭，內戰時沒有真正積極支持解放戰爭和土改戰爭，沒有利用農民的英勇鬥爭鼓舞工人起來。）這樣，他們就始終站在革命的邊緣上，幻想在客觀的主流之外，掀起一個革命，對大事變只有批評而沒有行動，完全談不到積極影響事變，更談不到爭取領導權。所以中國革命一方面證明不斷革命論

（客觀革命的規律）的偉大力量——反不斷革命論的中共終於被迫走不斷革命的道路，它所有違反這路線的政策都令革命和它本身遭受到打擊和腐化；另方面也證明僅僅掌握到革命理論而沒有正確的具體行動政策，也不能起作用的。正因為中國不斷革命信徒的幼稚無能，才讓領導中國不斷革命達到勝利的責任落在階段論者身上。」（原稿五一—六頁）

我們姑且承認蘇達同志在前面所提出的問題是一個值得研究和答覆的問題，甚或是具有歷史意義和重大教訓的問題，但異常不幸，他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卻縮小成爲「中國不斷革命信徒的幼稚無能，才讓領導中國達到勝利的責任落在階段論者身上」。假如這個「答案」是對的，則由此得到的教訓是什麼呢？詛咒「不斷革命論信徒的幼稚無能」吧！「歌頌階段論者的中共的成熟有能」吧！這便是蘇達提出問題和答覆問題的邏輯「結論」！！

如果依照蘇達提出問題和答覆問題的方法，人們也可以得出「結論」說：「……正因為世界革命（不斷革命的最高發展）的信徒托洛茨基領導的左派反對派的幼稚無能，才讓建設社會主義成功的責任落在『一國社會主義者』（階段論的發展者）的史大林官僚身上。」

何以蘇達同志在其對「中國革命的回顧」，即檢討第三次革命的全部經驗和教訓中得出如此荒謬的，至少是「幼稚」得可笑的「結論」呢？首先，而且主要是：他對於像中國第三次革命這樣一個歷史大事變，像「階段論者的中共領導不斷革命達到勝利」的這樣奇特事件，不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世界規模的特殊條件中去尋求其客觀的原因，卻自限於從中共的具體政策上，特別是從中國托派「沒有正確的具體行動策略」上，即它的「幼稚無能」上來找尋「答案」，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驚人的主觀主義和唯心論的典型表現，這

還不等於不從蘇聯的落後和孤立中去尋求當時左派反對派「失敗」的客觀原因，而僅歸罪於它「沒有正確的具體行動策略」的「幼稚無能」，是同樣荒謬的主觀主義嗎？

凡是歷史唯物論者，對於巨大的歷史事變（包括革命與戰爭）的評斷，首先必須追尋其客觀原因，以此估計其可能的演化，從而得出其教訓，這已成了馬克思主義的 ABC。關於脫離城市工人階級單靠農民武裝的「階段論者的中共」竟能領導第三次革命達到勝利的客觀原因，我在《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中曾根據不可爭論的事實作了頗為詳細的分析和說明，其結論或「答案」如下：

「毛澤東依靠脫離城市工人階級的農民軍對資產階級地主的國民黨蔣介石政權的勝利，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的特殊條件下，即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各種錯綜複雜的特殊條件綜合下所促成的。這種特殊條件的基本點便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已趨於極度的衰朽和解體，而中國則是資本主義最弱的一環，代表資產階級的蔣介石政權的自動崩解，僅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衰朽和解體之一個極端的表現。另一方面，史大林官僚依靠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的財產制，並利用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矛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以空前擴張其勢力和影響，這便大大吸引了在資本主義極度衰朽和解體下而陷於無出路的群眾，特別是落後國家的群眾，這便促成這些國家的史大林黨特別強大起來，毛澤東黨正是這類史大林黨登峰造極的典型。再加上美帝國主義當時在國際局勢（第二次大戰所造成的局勢）中不利的地位，而被迫放棄對蔣的援助或對毛的干涉；同時，蘇聯因在第二次大戰結束時在滿州所取得的特殊地位，並以此為根據給蔣政府以極嚴重的損害，直接援助毛澤東黨，使後者的落後的農民武裝趨於現代化。如果沒有這些條件的配合，毛黨單純依靠農民武裝的勝

利是不可想像的。

由上面這個結論得出的教訓是：

「托洛茨基和我們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曾堅持，摧毀資產階級國民黨政權，不能單靠農民武裝力量，必須由城市工人階級領導農民舉行暴動去完成——這一基本觀念，即在今天看來還是正確的。……例如在印度，我們仍然要堅持印度工人階級領導農民群眾舉行暴動去摧毀國大黨的資產階級政權。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落後的印度順利地走上真正解放和發展的道路。……但同時我們必須理解：像中共這樣脫離工人階級而專靠農民武裝所取得的勝利，不但其本身是畸形的，而且替往後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種下許多極難克服的障礙。我認為瞭解這點，對於我們評斷和估計中共領導的整個運動和決定我們的戰略和策略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當然，我前面分析中國第三次革命所作的結論及由此得出的教訓，只是一般性的，但如果我們不是從第二次大戰所造成的整個世界局勢的特殊條件去瞭解中共領導第三次革命達到勝利的客觀原因，我們便無法進一步瞭解具體事變的發展和教訓。蘇達同志的基本錯誤恰在於：他把中國第三次革命從第二次大戰所造成的整個局勢中孤立起來，因而不但把中共勝利的原因歸之於它的具體策略的「正確」（例如蘇達說：「抗戰時期中共以武裝鬥爭為主，而且相當獨立發展自己的軍隊，那是正確的。……後來不顧史大林的壓力，保持自己的武裝力量……終於發展成全國的解放戰爭，也是正確的」，）而且主要地歸之於中國托派的「幼稚無能」，這還不是主觀主義和唯心論的典型表現嗎？！

假如蘇達同志是從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出發，他便應當這樣地提出問題：「為什麼早已接受了不斷革命的正統馬列主義者，掌握了正確戰略路線，有了正確的綱領的」中國托派，

在將近二十年中始終陷於小組織狀態，而且是極微小的組織狀態，而不能形成一個工人階級的群眾黨，「由它領導革命達到勝利呢？」因為只有成爲群眾的革命黨，才有可能領導革命達到勝利，反之，一個微小的革命組織根本談不到領導革命達到勝利的。正確地答覆了這個問題，則中國托派之不能「積極影響事變」，「爭取領導權」，也就不難理解了。但要正確地答覆這個問題，不僅不能從中國托派的主觀上的「幼稚無能」去尋求，甚至不能單從中國本身的環境去尋求，而必須在世界範圍內的托洛茨基主義和史大林主義的鬥爭中去探究其根源。

大家知道，托洛茨基主義是從反史大林主義運動的過程中發生和發展起來的。史大林主義乃是一個工人國家在孤立和落後的環境下的特有產物。它代表著蘇聯官僚層的特權利益，不惜犧牲十月革命的一切傳統而替這個階層的特權服務。托洛茨基主義則代表國內及國際工人階級的革命利益，堅持十月革命的傳統，以此向特權官僚層進行了不可調和的鬥爭。但正由於西方和中國革命的不斷失敗及俄國的落後性，致使代表官僚特權利益的史大林篡奪了無產階級的政權，剷除了爲十月革命勝利而奮鬥的整代老布爾塞維克及後起的革命青年，並進而排除了各國共黨內的革命領袖，篡奪了共產國際的領導。隨後則利用十月革命的威望和蘇聯的物質基礎及已經史大林主義化的各國共黨，在全世界範圍內向托洛茨基主義運動進行了史無前例的迫害（包括造謠污蔑、毆打、綁架、暗殺及公然屠殺等）。

這便大大阻礙了「正統馬列主義者」，繼承十月革命傳統「接受了不斷革命論的」、「掌握了正確革命戰略的」托洛茨基主義的革命組織直到今天還未能形成爲革命的群眾黨，除了錫蘭的 LSSP（新社會平等黨）之外。而 LSSP 之得以形成

爲群眾黨又恰因爲該黨是在錫蘭共黨產生之前成立的。由此充分證明：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義組織（除錫蘭外）直到今天還不能成爲群眾黨，絕不能拿它們不懂得「運用具體策略工作的幼稚無能」來解釋。如果根據這樣的論據來解釋各國托洛茨基主義組織之所以不能形成群眾黨，便等於說，各國的托洛茨基主義組織都是「長期關在小圈子裏，……不知不覺地滋長一種孤芳自賞，憤世嫉俗的宗派心理」，「不懂得客觀形勢具體地運用革命策略和選擇每時期的實際工作」，而變得「幼稚無能」了！果真如此，那麼托洛茨基主義還有什麼希望和前途呢！從蘇達同志的主觀主義和唯心論的評斷所能得出的便是這樣的一種極度的悲觀主義的「結論」！

如果就中國托派來說，它所受到的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殘酷壓迫和中共的污蔑與迫害，遠遠地超過了其他國家（蘇聯除外）的托派遭遇。因而中國托派不但絕難形成爲一個群眾的黨，且因此經常發生內部的爭吵，不斷陷於分裂，乃至不斷發生背叛（叛徒告密等）。在這種情形下，中國托派能夠堅持「不斷革命論」，「掌握了正確的戰略路線」，保持了「正確綱領」，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但爲更具體更確切地瞭解中國托派過去所經歷的艱險及其所以不能形成爲群眾黨，而始終陷於小組組織狀態，「不能積極影響事變」，「爭取領導權」……便必須檢閱一下它的全部歷史。因此，特將我們的運動分期地給以簡括的描敘如下：

第一期，一九二九年五月至三一年五月，這是中國托派運動發生及各派（那時共有無產者社、我們的話、十月社和戰鬥社四派）對立的時期。在這期間內，各派除了關於國民會議和第三次革命是否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性的爭論外，主要是互相攻擊，這種攻擊大大地削弱了托派對於吸引黨的幹部的影響（關於這方面，碧蘭在評王凡西自傳中有較詳細的敘

述)，這可以說是最混亂的時期。這種混亂狀態，由於一九三一年五月的統一才算告一段落。但統一後不到兩星期，統一的領導機關大部份成員被捕，而那些爭取領導地位而沒有達到目的的英雄們，不是叛變（這次被捕正是由於叛徒的告密），便是消極了。這樣，剛統一起來的托派不但不能前進，反而在沉重的打擊下往後退了。首先就是不少黨員離開了運動。

第二期，一九三一年五月至一九三二年十月，這是重新整理組織和向外發展的時期。在這時期內，由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我們曾出版了一個公開刊物（名《熱潮》）在黨內及群眾中積極進行了宣傳與鼓動，因而爭取了黨在上海的一部份幹部，爭取了許多工廠支部，並由此建立不少新支部。到一九三二年秋天，老黨在上海的大部份工人支部都轉到我們方面來了。這是中國托派運動第一次建立工人基礎的一個時期，並由於我們的組織具有工人基礎，所以我們領導了許多次較大規模的罷工，並獲得了相當的勝利。同時，由於我們的公開刊物鼓動反對蔣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中共正式領導對十九路軍抗戰所採取的極端教派主義態度，贏得了不少工人群眾的同情和一部份學生青年的擁護。這情形表現托派運動正在上升，大有向前發展之勢。但這個發展的前途被國民黨的迫害打斷了——這便是一九三二年十月陳獨秀彭述之等整個領導層的被捕（這次被捕也是由於叛徒的告密）。

第三期，一九三二年十月至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三」。這時期可以稱之為組織殘破的「冬眠時期」。自陳獨秀等被捕後，我們的運動完全失去了領導，隨後不久，上海最積極負責的幹部（上海各區委聯合會的委員）又全部被捕。於是「九一八」以來所建立的一切工人支部（那時工人支部三十餘個，

包括黨員二百餘人)都失去了指導和聯繫，幾乎全部離散了，從此我們的運動便進入了「冬眠狀態」，因為最積極的領導份子和幹部都被投入國民黨的監獄中，絕大部份的黨員不是離開，也是消極了。這種「冬眠狀態」一直延長到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變發生為止。

第四期，一九三七年「八一三」至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這可以說是我們運動復活和重新發展的時期。由於「八一三事變」的爆發，國民黨政府在日帝猛烈進攻之下，迫不得已進行抵抗，因而不得不釋放政治犯。這樣，被監禁的托派份子獲得了「自由」，其中一部份如彭述之、劉家良等得以重新投身運動，恢復組織，在上海建立了中央領導機關。另一方面，由於抗戰的刺激，以前消極或不活動的份子都在各地方自動地形成了組織，從事活動（如廣東的中山、香港、廣西、溫州、山東和北平等）。於是托派運動又復活起來，而且向前發展了。再加上我們在這時期內，除了按期出版《鬥爭》外，還出版公開刊物《動向》，並出版一批小冊子，特別出版了托洛茨基的《蘇聯現狀與前途》，《過渡綱領》及《俄國革命史》等，這便大大地擴大了托洛茨基主義的政治和思想影響，加速了我們運動的發展。

但這個時期內，除了史大林黨拼命造謠，以「托派漢奸」污蔑我們外，我們內部亦發生了兩次嚴重的思想鬥爭，即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反意因連根的極左教派主義的鬥爭。前一鬥爭雖在組織上沒有引起嚴重的糾紛，但由於陳獨秀的歷史地位和社會影響，他之公開散播機會主義的思想及申明他不再屬於托派，曾給了我們的運動以極嚴重的打擊。後一鬥爭經過了一年以上的激烈爭論，由於教派主義者完全漠視組織原則，終於自動脫離，導致分裂。而且這種分裂又是在極度嚴重的時期，即太平洋戰爭剛爆發時發生，這便給

了組織以很大的損害。這次分裂跟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結束了這一時期。從此我們的運動陷於極黑暗的境地。

蘇達同志指責說：「在抗戰時沒有參加敵後武裝鬥爭」，他這種指責，是出於完全不瞭解當時組織的具體情形。我在前面已說過，我們的組織是在「八一三」事變後才重新恢復起來，差不多一切都得從頭作起。首先是必須建立中央領導機關，與各地方新成立的組織建立聯繫，並在工人中重找關係，盡可能出版機關報和迫切需要的小冊子、書籍及公開刊物等。在這種情形下，在組織還很微小（黨員數目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還不過百餘人，且多是年輕學生），有經驗的幹部極少的條件下，當然沒有可能有系統地去「參加敵後的武裝鬥爭」，因為武裝鬥爭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如果組織沒有達到相當嚴密的程度，並且有相當數量的黨員和幹部（此外還有交通費等），是無法組織群眾進行武裝鬥爭的。否則便是軍事冒險。關於這一點，當時組織內部確發生過意見分歧。陳獨秀主張不管有無組織和政治路線，必須首先參加武裝抗戰。因此，他曾在武漢團集一批幹部（如連根、樸亦凡等），並與某些軍人接洽，企圖介紹他們去「參加武裝鬥爭」，但都沒有成功。此外，中山有位老同志（姓陳）自動地組織一些農民進行「武裝鬥爭」（也許是受了陳獨秀的影響），但所得到的結果是一個慘敗，且因此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山東方面一些同志也自動「參加了敵後武裝鬥爭」，但也遭到了同樣的結果，並且是在中共游擊隊攻擊之下喪失生命的。這證明一個十分微弱的革命組織，要想組織或參加武裝鬥爭，往往是得到相反的惡果。

當時從監獄中出來的我們，在抗戰的情況下，並不是沒有注意到或不懂得「參加敵後武裝鬥爭」的重要和必要。但認為要直接參加武裝抗戰，必須具有一定的條件。首先是重

新建立黨的領導機關，出版機關報，在政治上確定我們的抗戰方針，與新成立起來的各地組織取得密切聯繫，在城市工人中建立關係，然後才有可能有計劃地把組織擴展到農村，從事農民運動，以此作為組織或參加武裝鬥爭的基礎。但這不是一下辦得到的。當一九三九年我們的組織稍上軌道的時候，我們曾在浙江某地從事農民運動，嘗試組織武裝鬥爭。但由於種種的複雜的原因，首先是組織的微弱，缺乏幹部，我們這一嘗試也就成了流產。由於這次流產的經驗和教訓，我們深深感到我們的組織力量太薄弱，還沒有能力組織或參加武裝鬥爭。在當時還只能在政治上批評國民黨抗戰的反動政策，宣傳抗戰的正確方針，鼓動群眾自動武裝進行抗戰等等。為了在最近將來實行「參加武裝鬥爭」，我們還得發展和加強自己的組織。但太平洋戰爭一爆發，我們的全部計劃都被破壞了。

第五期，一九四一年末到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這是我們運動陷於最困苦黑暗時期。由於珍珠港事變的爆發，日帝軍隊立即佔領了上海租界，這便迫使我們的中央機關與各地組織截斷了一切聯繫。不久上海又遭到一次大破壞，最積極的一部份幹部被捕，印刷工具被沒收。中央的負責人陷於最可怕的危害中（他們已失去了住所，過著流浪生活）。留下來的少數幹部也得轉移他地，這樣在上海的組織，也因日軍的佔領和控制而解體，差不多所有的同志都得遷移別地，以圖生存。因而在這一時期中，在日帝直接統治的區域內，我們已無法進行任何有組織的活動。我們所能作的只是發生個別影響，爭取某些可靠的同情者，為未來的復興運動作準備而已（例如彭在這時化名當教授，影響了一些左傾的學生，並與同情者保持密切的聯繫，這些聯繫便是「和平」後得以大規模出版刊物的資源）。

第六期，一九四五年冬至一九四八年，這是運動復興的時期。由於戰爭的停止，敵偽統治的崩潰，蔣政權還沒來得及在「收復區」鞏固其嚴密統治。我們乘著這個時機，首先在上海集合離散的同志，恢復組織。特別以全力出版公開刊物（如《求真》和《青年與婦女》），以此公開傳播我們的思想和政治影響，並藉此作為一面旗幟，在全國範圍內把久已分散的托派份子和同情者吸引到它的下面來。因而在很短的時期內，各地的組織如香港、廣州、溫州和廣西等都恢復了。不久並獲得了新的發展，同時新的組織也開始形成起來（如南京、武漢、山東等區域。雖然如此，我們的力量還很微弱。尤其在客觀局勢迅速發展，一般群眾對國民黨的反對和腐化統治的憤懣，國共衝突和內戰的急劇發展之下，我們的力量顯得遠落在事變的後面。因而我們除了在部份的學生青年和極有限的工人群眾中散佈一些影響，推動罷課罷工的鬥爭外，對於整個群眾運動無法給以「積極的影響，更談不到爭取領導權」。尤其對於農村反國民黨的武裝鬥爭，我們更無力量去影響它們。事實上這些鬥爭都是在中共直接指揮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不是光說大話，放空炮之徒，我們只能腳踏實地，按照我們的能力所作到的為限。就這一點說，我們那時總算盡可能履行了我們的職責。假如事變不是發展得那樣急劇，假如我們獲得更多的時間，我們是有可能發展成為具有相當群眾基礎的黨，因而有可能「積極影響事變」，甚至「爭取領導權」的。但客觀的發展終於打斷了（就歷史說，還是暫時的）我們運動在大陸上的進程。這或者可以說，這是我們的整個運動在歷史上的「厄運」吧！

當然，我不是說，我們在這時期內沒有犯過錯誤。但我們的錯誤並不是像蘇達所指責的：「不曾和中共領導下的廣大群眾建立聯繫（……內戰時期沒有真正支持解放戰爭，沒有

用農民的英勇鬥爭鼓舞工人起來。)」，而是對整個事變，特別是對中共單靠農民奪取政權的估計。關於這一點，我曾經指出：「我們黨對於中共勝利地奪取政權，是完全沒有估計到的。由於對這整個事變估計上的根本錯誤，便派生出對事變發展進程一連串估計上的錯誤；以及某些對外宣傳上的策略性的錯誤。因而影響我們黨對整個事變的態度或多或少趨於消極方面的批評，而低估了它在客觀上的革命意義。這是應當鄭重地予以糾正的。但如我在前面所說過，我們的錯誤並非原則性的，而只是對事變的估計上的，因而是容易改正的……（見我的《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

如果要更具體些說，我們最大的錯誤在於：從一九四七年夏天起，國共談判完全破裂，中共已被迫決心反攻，公開提出了打倒國民黨政府的口號，在這種情形下，我們還繼續以前對它的批評態度，這是一種極錯誤的宗派主義，是不能容許的。那時我們應當採取的立場是：站在中共方面積極號召工人群眾起來摧毀國民黨的統治，要求中共號召工農兵群眾組織蘇維埃，在城市實行組織工人起來配合農民軍的進攻。而我們還沒有這樣做的錯誤根源，正由於我們死死抱住了那個原則：在現代社會城市支配鄉村的條件下，農民武裝如得不到城市無產階級的直接領導，是不能成功地摧毀資產階級的政權的。但我們沒有注意和瞭解第二次大戰所造成的特殊條件下有可能促成依靠農民武裝的中共走上政權。蘇達同志在他大談中國托派過去的錯誤和教訓時，竟完全沒有提到這點，這證明他對於過去事變的發展還是一個外行。

至於蘇達說：「在內戰時期沒有真正支持解放戰爭……沒有用農民的英勇鬥爭鼓舞工人起來。」這樣說是抽象的。只有當中共實行與國民黨決裂（實際是與它自己的幻想決裂），公開提出打倒蔣介石政府的口號時，我們站在前者方面實行

鼓動工人群眾起來摧毀後者，才算得「真正積極支持解放戰爭」，才算得「用農民的英勇鬥爭鼓舞工人起來」，即令如此，中國托派還不能因此便能「積極影響事變，爭取領導權」，因為我們組織力量實在太微弱了，與事變的發展距離得太遠了。這只能表示：在政治上，在中共奪取政權的鬥爭中，中國托派最後採取了一個正確的立場。

從前面全部歷史的簡單描敘，便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A，中國托派所處的極度艱巨的環境，它所遭到的國民黨的殘酷迫害和史大林黨的無恥污蔑，使它在二十年間不但陷於小組組織狀態，而且這樣小組組織本身亦不斷為白色恐怖特務所破壞、所中斷或陷於分裂。這是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最受迫害和痛苦的一個革命組織（蘇聯的除外，事實上蘇聯早已沒有托洛茨基主義組織存在）。

B，這樣一個最受迫害和痛苦的革命組織，在二十年間，特別是「在抗戰期間和其後的內戰期間」，「都有正確的戰略路線」（蘇達的評語），並保持了布爾什維克的民主集中制的傳統，在多次被反動統治的特務破壞之後，又重新抬起頭繼續前進——這一切所表現的堅決、勇敢和犧牲精神總是值得自豪的，在全世界所有革命黨運動史中不可多得的。

C，中國托派過去當然犯過錯誤（不犯錯誤的革命黨是沒有的），特別是在一九四七年中共推翻國民党政權時所犯的錯誤極為嚴重。但這種錯誤不是原則性的，反而是過於拘泥原則。因而完全忽視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特殊局勢，這是值得注意，應從其中獲取教訓的。

D，像這樣長期陷於小組組織狀態的中國托派，要指責它不能「領導革命達到勝利」，這是完全不懂得我們的運動所處的客觀環境及其遭遇和本身演化的過程，是一種純粹主觀主義或唯心論的武斷，且是極幼稚的武斷。

E，不管「階段論者的中共領導革命達到勝利」，甚至「反不斷革命論的中共終於被迫要走不斷革命的道路」，但它的「勝利」從歷史上看來還是短暫的。它走不斷「革命的道路」，乃是以歪曲真正的不斷革命論和犧牲廣大工農群眾的切身利益為代價的。<sup>1</sup>這就註定了它的命運，將被政治革命來清算。從這一基本觀點說，未來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事業還是要由托洛茨基主義者去領導的。

史大林主義，已因史大林的繼承者宣佈了它的破產（見赫魯曉夫在蘇共廿次大會上的秘密報告），波匈革命更在行動上敲響了它的喪鐘。現在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史大林主義和整個資本主義一樣，已到它臨死掙扎的時候了，毛澤東所代表的史大林主義不過是一種臨死掙扎的昏亂表現而已（毛所發動的人民公社運動便是這種昏亂冒險的典型），而托洛茨基主義，正由於史大林自行宣佈破產，已開始從被壓迫和被污蔑的孤立狀態中脫離出來，向建立群眾革命黨的道路走去，近年英國和日本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發展，便是一個預示。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在中共取得政權後，雖然受盡了迫害和污蔑的痛苦，但他們所「信奉的不斷革命論」仍然是一種最堅強而正確的武器。這種武器不但可以揭露中共利用不斷革命之名來辯護其階段論之實的種種荒謬措施（如以不斷革命論辯護人民公社的冒險政策等），而且是一個指南針，它將引導中國工農群眾走向政治革命，推翻官僚獨裁，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制，並進而與蘇聯及全世界的工農群眾消滅史大林主義和資本主義，完成全世界的社會主義改造，走向真正自

---

<sup>1</sup>關於中共歪曲不斷革命，詳見彭著《中共及其政權的性質——政治革命，還是民主改良？》一文中《被歪曲了的不斷革命與不斷革命論的被歪曲》。這裏僅指出：蘇達斷定中共「終於走不斷革命的道路」是不正確的，因毛澤東的「一國共產主義」正是徹頭徹尾違背了不斷革命的國際主義的。

由、平等和幸福的理想世界——共產主義社會。

最後，我應當說，蘇達同志對於問題的研究是認真的。例如他對人民公社研究所寫的文章（《論人民公社》）以及對整個革命的檢討的文章（《中國革命的回顧與前瞻》），都表現他確是在認真地思索問題。但他有一個嚴重的弱點，就是：他對問題的看法不是太片面（如對人民公社，他強調了它的「大生產的優越性」，卻輕視了「農民自願原則」的決定性），便是太抽象或太主觀（如前面所指出的，對中國托派運動的具體歷史事實既極少知道，便作出它的「幼稚無能」的結論）。這種弱點多數是由於對唯物辯證法的不夠理解和運用。但缺乏實踐經驗或太注意具體事實，亦是構成他的弱點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希望他以後研究問題時，除了注意活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外，假如不能多參加實踐工作，至少要多研究具體的事實，接受別人的實踐經驗，這對他會是有利的。

## 關於古巴革命決議草案

### (一九六一年七月)

#### 一、關於古巴國家的性質

就一九五九年秋古巴革命政府排除了資產階級的代表於政府之外，特別是一九六〇年八至十月間這個政府剝奪了美帝國主義者和本國資產階級的主要工業爲國有，以及計劃經濟的建立和對外貿易獨佔的實行——這些社會主義性的措施無可爭論地表明：古巴已踏進了工人國家的軌道。

另一方面，正由於革命政府排除了資產階級的代表，徹底解除資產階級的武裝，武裝農民和工人，成立民軍，這又表明「聯合政府」時期的雙重政權已告結束，一個「工農政府」已出現於政治舞臺。但這個工農政府有一個嚴重的缺點，就是它還缺乏無產階級的民主內容，即這個政府不是由工農兵代表會議或蘇維埃產生和受其控制的。因而政權仍然留在「七月廿六日運動」的領導層手裏。這樣，在「工人國家」和「工農政府」之間存在著一種實質上不相符合的矛盾。要解除這個矛盾，只有徹底發揮工人和貧農的民主權利，組織工農兵代表會議來改組這個政府，這是推動古巴革命今後向徹底勝利發展的指標。

#### 二、關於蘇聯集團對古巴革命援助的意義及其影響

在美帝的軍事威脅和經濟封鎖的異常嚴重情況下，蘇聯集團對古巴革命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如供給武器及貸款和商業協定等），在現階段對於挽救古巴革命的迫切危機和協助其發展，無疑地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因爲這種援助不僅阻止了美帝的直接軍事干涉，而且在經濟上維持革命的古巴得以繼

續存在和發展。這同時也就表明：不管蘇聯集團的官僚獨裁本身如何反動，但十月革命建立的社會主義財產制及其國際性，仍然在對古巴革命的物質支援中起著巨大的進步作用。

但蘇聯集團對古巴革命的這種援助，並非基於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國際主義，多數是出於史大林主義官僚的外交政策。這就不可避免地要把史大林主義的思想伴著物質的援助帶到古巴的革命隊伍中，首先是帶到革命的政治機構中。因而有可能使革命政權趨於史大林主義化，即官僚主義獨裁化的危險。這便在革命走向無產階級民主化的道路上形成一個嚴重的障礙，要克服這個障礙，使革命走向社會主義的民主政制，只有建立一個真正的革命黨，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領導之下前進才是可想像的。

### 三、建立革命黨的條件與七月廿六日運動的領導層

古巴需要建立一個革命黨，在我們隊伍內已沒有人否認。即卡斯特羅自己亦表示有建立革命黨的必要。問題僅在於：在現時的情況下根據甚麼成分及怎樣建立它。假如我們不是空談「建立革命黨」的口號，而是負責地要在實際上去幫助建立它，那我們便必須首先重新評價和估計「七月廿六日運動」的領袖們及其幹部在革命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思想發展的傾向。

以卡斯特羅為首的革命領袖們，雖都出身於小資產階級，並抱著急進的民主政綱投身於革命，領導鬥爭，但在革命的過程中，在美帝反革命的強大壓力和工農群眾的迫切要求之下，他們一步一步地（當然是經驗主義地）放棄了原來的民主政綱（實際是幻想）而實行了社會主義的措施。這些實際的行動表明：這些領袖們在革命進程中並不固執成見，在思想上具有頗大的可塑性。因而尚能適應革命的需要而逐

步地改變自己。他們現在已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並在研究馬克思主義。這一切表明：以卡斯特羅為首的革命領袖們及其幹部，有轉變成為組織革命黨的基本幹部之可能。

但同時，人們必須瞭解，七月二十六日運動的領袖們，由於他們缺乏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傳統，多少習慣於用經驗主義的方法應付問題，特別是取得政權後，他們已多少習慣於從上面發號施令，再加上前面所指出的蘇聯史大林主義的影響：這一切都妨礙著他們徹底瞭解無產階級的創意力，以及此種創意力的發揮與無產階級民主或社會主義民主的相互關係（沒有無產階級的民主制，群眾的創意力是要被窒息的）。因而在建立一個布爾什維克的民主集中制的革命黨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要發生某一定的障礙。但無論如何不能因此排斥七月二十六日運動集團為組織革命黨的重要構成分子。如要排斥它，在現時在古巴建立革命黨不但完全是空想，且將引起災禍。

另一方面，古巴的共產黨亦將成為建立革命黨的構成部分。雖然這個黨具有極壞的史大林主義傳統（如在某時期共產黨支持巴蒂斯塔的獨裁），但革命發生後，這個黨已轉而擁護革命，它的大部分成員已投進革命運動中。不管這個黨的領導分子仍然堅持史大林主義的傳統，但其黨員，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已受了一次革命的洗禮，或多或少沖淡了他們原來的史大林主義成見，而較易於接受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思想。

至於托洛茨基主義者，當然要參加建立革命黨的工作。但由於他們的數量太微弱，很難起重要的作用，至少在開始時是如此。他們唯一的力量在於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和我們運動所繼承的革命傳統。但在古巴建立革命黨的進程中發揮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影響和革命傳統，單靠古巴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奮鬥是很難得到成效的。這個責任必須由國際的托

洛茨基主義者，首先是美洲的托洛茨基主義者集體合作來負擔。

#### 四、古巴革命與世界托洛茨基主義者的迫切任務

古巴革命既然是在一個非史大林主義的革命集團，七月二十六日運動的領導之下進行，且由民主主義革命轉到了社會主義革命，這不僅在客觀上證明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正確性，而且給托洛茨基主義者提供一個直接影響和干涉這個革命的絕好機會。假如這個革命能在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影響之下走向徹底的勝利，即在國內完成無產階級的民主政制，並將這一革命推展到國外，首先擴展到拉丁美洲各國，則將在今後的世界革命運動中開闢一個全新的局面。反之，如果這個革命落在史大林主義的影響之下，讓古巴的革命政權轉變為史大林主義的官僚獨裁，則整個世界的革命運動，特別是拉丁美洲的革命運動，將受到最嚴重的打擊，因而對世界的革命運動將發生很壞的影響。

在這樣嚴重的局勢之下，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美洲的馬克思主義者，除了在各國動員一切力量和輿論反對美帝的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以保衛古巴的革命外，必須竭盡全力幫助古巴建立一個離開史大林主義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黨，這是推動革命走向徹底勝利的唯一保證。

## 關於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重新統一的 意見和建議

(一九六一年八月五日)

自去年夏印度柯柏 (Koepe) 同志和美國韓生 (Hansen) 的通訊談到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統一問題，隨後法蘭克 (Frank) 同志又祝賀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總統選舉運動，那時英國同志便已預感到：這「是一個徵兆，再度處於『統一』運動的前夜。」(見英國社會主義勞工聯盟 SLL 致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 (SWP) 信的追敘)。尤其當去年末日本同志向美國同志正式提出統一建議後 (見英一給克利 (Kerry) 的信)，英國同志更感到統一運動即將到來，因而立刻以英國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全國委員會的名義於今年 (一九六一年) 一月特別寫信給 SWP 全國委員會，在該信中根本否認有統一的可能和必要，並希望後者和他們採取同一的立場，但 SWP 於二月六日答覆 SLL 的信中卻重覆申明它贊成統一的一貫主張。於是統一問題又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二月廿五至廿六日 IC (國際委員會) 會議特別討論了這個問題，但沒有能作出明白而具體的決議，我當時建議，因參加 IC 會議的支部代表極有限 (除我外，只有歐洲的英、法、德和瑞士的代表能出席)，對於這個極關重要而又久已引起紛爭的統一問題，必須將有關信件 (如 SLL 和 SWP 間的通訊) 及其他文件送交各支部，讓它們認真討論和發表意見，以便根據多數支部的意見作最後決定。當時我並申明，我將對統一問題提供一個較詳細意見書以供各支部討論該問題的參考。

這次英國同志根本否認統一的可能和必要的觀點從底下一段話中充分地表現了出來：

「我們現在正進入一個在意義上可以與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相比的時期，這是一個嚴重的時期，像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一樣。因此必須與我們自己隊伍中一切種類的中派主義傾向清楚而截然地決裂。如果我們要在未來幾年中像布爾什維克那樣地去履行我們革命的義務，我們必定要跟從列寧的例子，不是跟從盧森堡的例子，對當代一切種類的考茨基派，首先是巴布洛輩，不僅加以批評，而且要使自己不妥協地和他們分裂開來。(SLL 一月二日給 SWP 信，RI)

英國同志這樣斷定「巴布洛輩」，即 IS 各支部的成員都是考茨基式的中派，「我們必定要跟從列寧的例子……對巴布洛輩……不僅加以批評，而且要使自己不妥協地和他們分裂開來。」那就當然談不到任何的統一了。

英國同志並且更進一步宣稱：「現在是時候了，應該結束巴布洛派修正主義還被認為是我們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內部一種傾向的時期。若不這樣做，我們就無法準備現在正在開始的革命鬥爭。我們希望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和我們一起在這種精神上前進。」(同上第三頁，重點係原有)

英國同志既主張必須「結束巴布洛派修正主義還被認為是我們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內部一種傾向的時期」，並要「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和『他們一起』在這種精神上前進」，這便等於說，不但現在談不到我們和 IS (國際書記處) 屬下的各支部謀取統一，即將來也沒有統一的可能了。

假如英國同志前面的判斷和主張是正確的，這便發生了一系列的問題：為什麼當一九五四年六月 IS 剛開過它的「第四次大會」後，英國組織的負責者白恩斯 (Berns) 同志即和錫蘭代表商談統一 (七月)，並接受了後者的建議：組織平權

委員會（Parity Commitee）來進行統一呢？當法國同志堅決反對此種統一建議時，何以白恩斯仍堅持統一談判，並提議徵求 IC 各支部的同意來作最後決定？而且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IC 會議上（即當各支部表示贊成統一後），白恩斯還親自提出了實行統一談判的具體條件，要求 IC 通過，並選出了三名代表與 IS 進行談判。最值得注意的是：當布洛克同志（當時 IC 的書記）拒絕擔任和 IS 談判的代表職務時，白恩斯同志甚至提議前者辭去 IC 書記（因此後者作了 IC 書記）。難道「巴布洛修正主義」或「巴布洛輩」所代表的「中派傾向」，在那時還不夠明顯，或者還未被發現嗎？！

事實上，「巴布洛修正主義」在 IS 所召開的六月會議（所謂第四次大會）上已表現得十分清楚。那就是巴布洛的修正主義思想的有力支持者和密切合作者的李文斯東、密斯特里斯和柯林斯等在那次會議上公然主張取消一切托洛茨基主義的獨立組織，以便深深地滲入共產黨和社會黨等，並提議取消第四國際，只出一個理論機關報（李文斯東在那次會議發表的意見，我在《評巴布洛主義》一文中曾有引證）。但也正因為李文斯東等把巴布洛的修正主義思想發揮到了它的邏輯結論——澈底的取消主義，不僅參加那次大會的多數代表感到驚異而表示堅決反對，即巴布洛本人為了保持自己的總書記地位，不但不敢支持他的思想上的合作者，甚至轉而反對他們了，因而《史大林主義的興起和沒落》草案便被修改，即刪去了巴布洛的那些露骨的修正主義和取消主義的觀念。這同時也就充分證明我們正統托洛茨基主義者（以 SWP 為首）在一九五三年《戰士報》所發動的反巴布洛的修正主義和取消主義的鬥爭已收到了極大的成效。就是說，由於我們反巴布洛主義的堅決鬥爭，已經直接地影響了 IS 的各支部，首先是錫蘭支部（如錫蘭社會平等黨在一九五四年四月所發

表的對《史大林主義的興起和沒落》的批評和修正決議），以致它內部發生了顯著的分化：一方面李文斯東（柯區龍派的代表），柯林斯、密斯特里斯等將巴布洛的修正主義和取消主義帶到了最後的結論，完全離開了托洛茨基主義；另一方面，絕大多數支部，以錫蘭支部為首的代表多少保持托洛茨基主義的基本立場。正是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才有可能和 IS 談判重新統一，我們之接受統一談判的建議（即白恩斯和錫蘭代表商談後提出的建議）即是根據這種情形。否則，我們那時接受統一談判便成為毫無原則的輕舉妄動了。

因此，我現在必須指出：白恩斯同志在一九五四年七月與錫蘭代表商談統一問題，同意後者的建議，並堅決要求 IC 接受它時，如果沒有承認上敘情形的變化，即 IS 內部多少清除了或改正了巴布洛的修正主義的思想，那就是毫無原則的行為。假如他承認了上敘的情形，則他在一九五四年四月 IC 會議上堅持取消統一談判也是無原則的，或個人的專斷行為。因為他這次堅持取消統一談判，並沒有徵求各支部的同意。此外，假如白恩斯不承認我們反巴布洛主義的鬥爭在 IS 內部引起了深刻的分化（如李文斯東等在 IS 六月會議與錫蘭代表等的破裂，以及往後李文斯東之完全脫離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則便等於否認我們正統托洛茨基主義者反巴布洛修正主義鬥爭的重大意義和成就。當今天重新討論統一問題時，關於這個第一次統一運動流產的經驗和教訓是值得大家注意和檢討的。

SLL 在給 SWP 的信中總結式地聲明：「在過去七年間，我們已在辛克洛（Sinclair）同志致格爾曼的公開信以及一九五九年八月份「勞工評論」的社論中扼要地表明了我們對巴布洛主義發展的政治估計，我們相信這些意見是正確的，而且這些文章裡的主要政治論據今天仍站得住的。這裡所謂的

「巴布洛修正主義發展的政治估計」，即英國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夏所斷定的：「巴布洛派修正主義和我們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見《反巴布洛派修正主義的鬥爭》）這正是他們在一九五七年第二次統一運動中堅決反對統一談判的「主要政治論據」。根據這種「主要政治論據」，他們現在當然要說：「我們不能同意韓生同志在他給柯柏信中所說的政治論據。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同意說，我們與巴布洛派之間的政治分歧正在減少。」因此，我覺得將一九五七年的第二次統一運動，即英國同志所謂的「Unity Manoeuvres」（統一演習）來檢討一下，是必要的。

首先我應當指出，那次的統一運動並不是什麼「Unity Manoeuvres」（統一演習），寧可說是嚴肅的，至少比之一九五四年七月白恩斯同志和錫蘭代表商談後所發動的統一運動要嚴肅得多。因為這是 IS 受了聯共廿次大會清算史大林的個人崇拜和波匈革命這些巨大事變的刺激，以及在它各支部的下層的強大壓力之下，不得不和我們謀取統一，以便應付新的局勢。它首先通過錫蘭的哥納華德納同志寫信給加農同志，要求重開統一談判。加農在答覆前者的信中（一九五七年三月），認為自柯區龍、柯扶斯和密斯特里斯等公開反托洛茨基主義及隨後幾年事變壓力之下，雙方的政治立場已趨接近，這使得統一可能的初步條件已經具備，因而贊成統一。隨著，IS 特派代表潘迪里克至美國同加農直接談判，結果加農同志代表 SWP 提出了關於進行統一談判的具體建議（見「加農給潘迪里克所提的重新統一的條件和保證。」）但這一建議卻遭到了英國同志的堅決反對（見白恩斯一九五七年五月給加農的信）。因而這次的統一運動又被打斷了。

至那時英國同志所強調的「巴布洛修正主義與我們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辛克洛在給格爾曼的公開信中，即他批

評「史大林主義的衰亡」的文章「under a stolen frag」中，並不曾指出可靠的證據。而且當格爾曼反駁他之後（見「對托洛茨基主義者統一的毫無原則運動」），辛克洛同志又沒有作進一步的答覆，這便等於默認自己的立場站不穩。實際上，辛克洛所批評的那個「史大林主義的衰亡」草案，雖然其中包含一些模糊和錯誤的觀念，尤其是格爾曼的學究氣，但它比起「史大林主義的興起和沒落」草案來要進步得多。例如對蘇聯問題，這是導致一九五三年分裂的中心問題，該草案說：「因此我們認為克里姆林宮的『新路向』不是一種官僚自我改革運動，而是官僚的一種自保運動。當客觀力量促進並加速群眾運動覺醒時，尤其當官僚階層從上至下產生分化而促進並加速群眾運動覺醒時，我們認為『新路向』不但不足以代替群眾及官僚的政治革命，反而是這種革命的準備形勢。」（見英國同志出版的「反巴布洛派修正主義的鬥爭」轉載的《史大林主義的衰亡》草案第二頁）

從前面這一段話可以表明，IS 已排除了巴布洛的修正主義的中心觀念，即巴布洛曾經認定蘇聯官僚在「新路向」之下可以自我改良的觀念。（見巴布洛的《史大林死後的新路向》，發表於一九五三年三、四月份第四國際）這絕不能看作離我們的立場越遠，寧可說是更接近於我們的。因此可以說，那時加農斷定「雙方的政治立場已趨接近」是有根據的。（韓生在給柯柏信中所說的不過是重復加農在一九五七年所作的判斷而已。）這同時也就表明英國同志強調「巴布洛派修正主義和我們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缺乏事實的證明，因此我可以說，英國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堅決反對統一談判，和他們在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始而堅持統一談判，從而又堅決主張取消它，同樣是沒有原則的，並且是前後自相矛盾的。

自一九五七年後，我們與 IS 間的政治意見是否在接近，

還是「越來越遠」，在許多重大事變的看法和問題上，如阿爾及利亞戰爭，中國人民公社運動，古巴革命，以及不久以前的比利時的總罷工等等，我們和他們之間無疑地是有分歧的，但這種分歧，即在我們自己隊伍中也是存在的。如果就原則的問題說，如蘇聯官僚的性質和政治革命，第四國際的歷史使命和各國托洛茨基主義黨的革命作用，我們和 IS 之間的意見假如不是趨於接近，至少也沒有表現愈來愈遠。

SLL 在給 SWP 的信中又強調格爾曼在比利時總罷工的立場說：「巴布洛派在最近比利時問題上所表示的立場，其離開歷史實際進程之遠，是遠得可笑（但可悲）的。」因此，二月的 IC 會議上花了大半的時間報告和討論這已經結束的比利時總罷工事件，嚴厲地指責了格爾曼在這次總罷工中所起的壞作用。毫無疑義，格爾曼在這次總罷工中所採取的立場是錯誤的，有害的。因為領導總罷工的工會領袖或社會黨左派把罷工完全限制在議會主義的合法範圍內，而格爾曼則把自己的立場限制在支持社會黨左派的政策上，因而沒有提出推動罷工前進的任何革命口號和政綱（如建立工廠委員會，工人武裝和工農政府等），這是應該譴責、檢討和從中取得教訓的。主要的教訓是：「巴布洛的深深滲入政策」的破產。但不能因此作出結論說：格爾曼是考茨基式的中派，我們必須「明白且斷然地與他決裂」，再也不能和他及其他的巴布洛派謀取統一了。如果人們一定要把格爾曼在比利時總罷工所表現的錯誤立場作為拒絕統一的藉口，那我就不得不指出我們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所採取的立場來對照一下。

當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IC 會議討論關於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決議時，我曾著重地說：「阿爾及利亞的反法帝鬥爭不是密薩里（Messali）黨所獨有的，而是由許多自發組成並集合攏來的（如民族解放陣線）地方團體來進行的。」但我這個意

見並沒有被 IC 會議接受。這次會議所通過的《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鬥爭團結一致的決議》，竟有如下的一段話：

「阿爾及利亞的民族運動，在工人群眾的領導下，在極度艱苦的非法條件下從事活動，對帝國主義進行頑強的戰鬥，是值得歡呼的。密薩里·海地（Messali Hadi）這個人是世界被壓迫被剝削人民鬥爭的活生生象徵。」

因此，我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五日寫的《對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鬥爭團結一致的決議的聲明》內，曾對上面的一段話作了如下的批評：

「一個國際領導機關，畢竟不應將密薩里加以神化，把他當作世界被壓迫和被剝削人民鬥爭的象徵來看待。因為無論從密薩里的過去表現或現在行動來說，他都不值得享受這麼高的榮譽，況且他的將來如何還難逆料。只有像李卜克內西這樣的偉大的革命家才夠資格享受這樣榮譽。」

我們對於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決議（這是 IC 存在七年餘來對重大事變的唯一的正式決議）片面地支持密薩里黨，並稱譽密薩里為「世界被壓迫和被剝削人民鬥爭的活生生象徵」。其結果怎樣呢？結果是：密薩里黨在阿爾及利亞所領導的游擊隊投降了法帝國主義，而密薩里本人最後放棄了反法帝國主義的鬥爭，要求戴高樂政府召開圓桌會議解決阿爾及利亞戰爭問題。他現在已成了戴高樂手中對 FLN 和平談判的籌碼！難道這還不夠表明我們對阿爾及利亞戰爭所採取的政策破產嗎？！

但關於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決議案，白恩斯同志不僅親自參加了它的起草，而且為了「與阿爾及利亞民族運動團結一致！」白恩斯還親自去訪問密薩里·海地，隨後英國的平達同志又在《勞工評論》上發表了一篇大文章，從經濟和階級關係上分析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運動，認為阿爾及利亞的

民族運動（密薩里黨）是唯一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勢力。但英國同志最近指責巴布洛在阿爾及利亞「資產階級民族運動」中的錯誤政策時卻完全忘記了他們在這同一「資產階級民族運動」中所犯的更嚴重的錯誤。

SLL 二月廿四日給 SWP 的信說：巴布洛派「在資產階級民族運動 FLN 中，自己隸從於這個組織的活動。他們已變成這個運動的官員，沒有任何真實群眾基礎。」

我們現在應當公開地說，我們在阿爾及利亞戰爭這個重大事變中所採取的立場，假如不比巴布洛派在比利時總罷工中所採取的立場更壞些，至少也沒有更好些。當人們抨擊別人的錯誤時，應當把自己所犯的同類錯誤當作一面鏡子來照一下呀。

英國同志現在特別挑出格爾曼作為巴布洛派的代表來加以批評，並由此暗示：我們不但不能與這種「巴布洛輩」統一，而且必須「使自己不妥協地與他分裂」。這同他們在一九五七年強調我們不能和巴布洛談判統一是一樣的。例如白恩斯在一九五七年五月給加農的信中說：「巴布洛未曾改變他的政治方法」，以此作為他拒絕統一談判的主要論據之一。因此，我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寫給 IC 委員們的信中說：「由於巴布洛的印象主義、官僚方法和在組織事務上的權謀手段，我個人認為要巴布洛改變他的修正主義觀點是困難的，但我們不能拒絕或拖延統一，我們的目的不在於像巴布洛等少數個別分子，而在於仍留在國際書記處中的各國支部的大多數同志，他們是忠於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重點係我現在所加）

對於我這個意見，當時白恩斯同志在他答覆我的信中，提出如下問題：「如果在巴布洛運動中的大多數是托洛茨基主義者，那末他的政策怎會如此輕易成功。」

對於白恩斯所提出這個問題，因為他企圖將巴布洛與 IS

各支部的大多數同志混爲一談，以此作爲拒絕統一的重要理由；因此，我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寫給加農同志的長信中特別給它作了如下的頗爲詳細的說明：「在分裂之前，除了紐西蘭支部討論了一年多，英國支部有過短期的辯論外，其他各國都未舉行政治討論。因此，傳統托洛茨基主義和巴布洛修正主義之間的路線並未劃分清楚，在法國這個導致分裂的主要支部情形是如此；國際的絕大多數領導同志，包括某些後來參加傳統托洛茨基主義派的同志在內，都在政治和組織上充分支持了巴布洛的觀點和方法。因此，在巴布洛所能控制的各國支部的下層戰士中缺乏清晰的政治瞭解。再說，我們所採取的非常手段（如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公開信，和成立國際委員會等），雖然在當時是受環境所迫的，甚至是需要的，但不易爲所有國際同志所瞭解。就是在這樣特殊的條件下，巴布洛才能使他的政策如此輕易變得成功！這些事實，必須耐心地向各支部同志解釋。

「關於上述情形，我可以向你列舉一些例子，第一，當中國同志接到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公開信》時，絕大多數同志同意該信的政治立場，但同時他們覺得在未曾向國際各支部提出任何文件，又未曾舉行任何政治討論前就發表《公開信》，是與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錯誤的。關於這點，我們曾寫了幾封長信詳細說明巴布洛如何用官僚方法控制國際領導機關，以他的意志排斥反對者，因此使得在組織內部不可能展開任何正常的民主討論，在這樣非常的情形下，我們被迫採取非常手段如《公開信》等。於是，中國同志才相信《公開信》的必要，進入鬥爭。如果不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加以明白解釋，他們一定會只同意『公開信』的政治立場而仍舊甚至反對其組織手段。

「這兩個例子（另一個例子從略）向我們表明，即使是

某些忠實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和老戰士，他們同意我們的政治意見，但對我們發表『公開信』的例外行動仍難瞭解，且會表示懷疑或反對。……因此我深信，國際書記處屬下的各國支部中之絕大多數同志不能追隨由《公開信》發動的呼籲，仍留在國際書記處之下，主要是因為他們不能瞭解，為什麼我們在提出批評巴布洛修正主義以供內部討論的文件，讓他們有機會討論，對分歧取得清楚觀念之前，就採取非常手段呢？這點是使他們激怒的。

「如果論巴布洛修正主義的文件在分裂之前提到整個國際面前，經過澈底的討論，使傳統托洛茨基主義者和修正主義之間的基本界線劃分清楚，像過去反對盤納姆和夏克曼的修正主義那樣，其後果將會完全不同。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處理這類問題，應該同處理其他問題一樣：客觀地分析其發展，以避免這樣的純主觀判斷，即認為凡是同意我們關於《公開信》的非常手段的，都是傳統托洛茨基主義者，凡對我們懷疑或不同意的，都是巴布洛派。

「另一方面，既然美國和英國支部事先有內部討論，就發生某種程度的政治分歧，柯區龍和柯林斯傾向是巴布洛所發起的修正主義思想之邏輯的發展，它最後走到反托和親史的結論，由此完全離開了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反之，正是這個理由，是在分裂之前未曾進行政治討論的支部，它們的大多數同志縱然仍留在國際書記處之下，但仍繼續在托洛茨基主義旗幟之下從事戰鬥。

「另一個要點是：有些同志，他們仍留在國際書記處之中，是因為他們長期以來受巴布洛主義的影響。但是由於歷史事件之鐵的事實：聯共廿次大會宣佈清算『個人崇拜』和史大林其他罪行，波匈革命，都清楚地暴露柯區龍、柯林斯和密斯特里斯派之反托思想，並全盤證驗了托洛茨基主義之

傳統、原則和綱領，尤其是它對史大林主義官僚的分析和預見之正確，以致在上述這些同志之中，造成某些思想混亂。正是由於這個理由，他們才一致要求和我們統一，這種傾向反映在『五次大會』所一致通過的提案中，這次大會是由國際書記處在贊成重新統一的情形下召開的。

「從上述的解釋中，我可以確認，在國際書記處領導的各支部中的大多數同志不是巴布洛派的，他們和我們一樣，一般地是忠於托洛茨基主義的，且正在為我們的運動作巨大的努力。那裡有許多幹部，他們是由我們運動長期所造成的，是我們運動所累積起來的寶貴財產之一部份，將會在各國我們運動的進程中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我們不應因他們仍屬於國際書記處支部，便簡單在巴布洛派的名義下將他們加以抹殺，或拒絕與他們統一和合作。」

前面這些解釋雖是在三年前寫的，直到今天我不但認為是正確的、有效的，而且當人們把 IS 各支部的同志稱之為「巴布洛輩」或「巴布洛派」加以反對、敵視，因而拒絕和他們統一與合作時，我這些說明和分析更顯得重要和必須。

英國同志重新宣佈，他們在一九五七年判斷「巴布洛派修正主義和我們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直到今天還是正確，因而根本否認我們與 IS 各支部的成員有統一之可能和必要。最後宣稱：「這是我們的意見，我們已為這種無結果的統一討論浪費了許多時間，國際運動現時所需要的是一個由傳統托洛茨基主義者作出的政治宣言，以表明他們對今日各重大問題的立場，沒有這種國際政治宣言，就不能重建國際運動。」

（見英國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給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信第七頁），因此他們提供了一個大文件，《國際遠景決議草案》，企圖以此形成「一個由傳統托洛茨基主義者作出的政治聲明，以表明我們對今日各重大問題的立場。」（見 SLL 給 SWP 信

第七頁)

但這裡我必須提醒英國同志：當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第一次統一運動時，白恩斯曾代表 IC 敦請美國同志起草關於國際局勢的決議，即「一個由傳統托洛茨基主義者作出的政治聲明，以表明我們對今日各重大問題的立場」。包括「今日各重大問題」的一批決議草案是寫出來了，如《今日世界》《今日蘇聯》《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成果》和《殖民地資產階級的興起》，但這些決議草案，不僅 IC 各支部不曾討論它們，即 IC 自己也從來沒有討論過，便被放進檔案文庫裡去了！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開的 IC 會議指定我起草關於國際局勢的決議《戰後國際局勢和第四國際的任務》。隨後，英國同志又提出了一個關於國際局勢的草案。但這些決議草案和以前的一樣，沒有經過任何討論便被擱置起來了！因此，我很有理由懷疑；英國同志這次強調討論「政治聲明」是否藉此來迴避討論統一問題的一種手段？！至於那個《國際遠景決議草案》是否可以作為「一個由傳統托洛茨基主義者作出的政治聲明，以表明我們對今日各重大問題的立場。」我不想在這裡評論它，只須指出一點：這個「決議草案」除了幾十次重複和強調「建立革命政黨」外，對於「今日各重大問題」，如人民公社運動後中國的局勢，殖民地解放運動發展對美蘇集團的影響等，都沒有被給予應得的地位而加以分析和評價。像這樣的「決議草案」即令不像以前的一樣被擱置，但要討論它，恐怕很難得出滿意的結果吧。

白恩斯同志在他二月六日給加農同志的信中說：「他們支持這種觀念，認為所需要的是重組國際運動，而不在於急急重新統一。」他這裡所說的是指印度同志「支持」英國同志的「重組國際運動」的觀念！！但問題在於：誰能「重組國際運動呢？」IC 嗎？或者 SLL？要答覆這個必要答覆的問

題，我們才更不得不檢討一下 IC 過去的成就。

IC 在它過去存在的七年半中，除了它初期（約半年）在反巴布洛主義的運動中表現其活躍和一定成就外，隨後便逐步趨於不活動和懶散甚至癱瘓狀態中，就政治方面說，IC 幾等於不存在。因為七年來，它除了對阿爾及利亞戰爭作出了一個正式決議外，對其他的重大事變，如蘇聯共黨廿次大會清算史大林的「個人崇拜」，中國人民公社運動，日本的反日美安全條約運動和古巴革命等，竟沒有表示過任何意見。至那個對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決議，如我在前面所指出過的，乃是一個破產的典型。

另一方面，國際委員會不是一個能工作的機構，只是一個極懶散的機構，它沒有像國際書記處那樣的辦事處，以便集體工作，沒有出版物，以發表宣傳資料，提出我們的政治口號。就國際委員會的會議而論，它們不僅不能時常及時舉行，而且也很少討論政治問題。更糟的是，會前毫無準備……時常是國際委員會會議通過的決議從沒有實行的。最壞的是，甚至一九五七年六月世界大會給 IC 規定的「職能」（見「國際委員會的職能」——一九五八年六月世界大會討論的決議。）也完全被停留在紙上。像這樣的 IC 不但根本談不上擔負「重組國際運動」的巨大任務，而且如果讓它這樣繼續存在下去，除了阻礙「國際運動」外，恐怕再難起別的積極作用。

因此我可以說，在現時，只有 IC 和 IS 各支部的忠實托洛茨基主義者重新團結起來，才有可能「重組國際運動」，重建國際的領導。避免討論「重新統一」而專談「重組國際運動」，假如這不是有意阻礙統一的手段，便是毫無意義的空談。

不錯，英國同志在他們的《國際遠景決議草案》中對統

一問題的態度已有改變，例如該決議草案說：

「在世界範圍建立革命領導的重要任務包括重組第四國際，因此要考慮到巴布洛派」（「決議草案」第二五頁，著重點我所加）

「一九五三年的突然而深重的分裂，在許多國家造成重大的混亂。甚至現在還表明有些國家這種混亂仍舊存在，這點必須儘速解決。

但是任何企圖用組織方法去達成重新統一的，其結果只有更加分裂。英國社會主義勞工聯盟並不反對統一，但反對那種不經過國際充分討論，不以基本政治協議為基礎的統一至上論調。」（同上二七頁，著重點我所加。）

SLL 現在表示它「不反對統一」，這證明它在要求統一的壓力之下不得不放棄原來根本反對統一的立場，即「我們必定要跟從列寧的例子……不僅加以批評，而且要使自己不妥協地和巴布洛輩分裂開來。」這當然是一個進步或讓步。但在這種進步或讓步的聲明中又發生了一個問題：誰「企圖」用組織方法去達成重新統一呢？或者換句話問：誰主張「不以基本政治協議為基礎的統一至上呢」？SWP 嗎，或者我們當中的什麼人？

就 SWP 說，它在前述的二月六日答覆 SLL 的信中即已表明：「根據原則基礎來統一國際托洛茨基主義的力量」（著重點我所加）。至於我呢，早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即當第一次統一運動時，我寫的《評巴布洛主義》中便已經說過：「現時，在我們開始我們運動的重新統一之前，需要在這個問題上經過完全和澈底的檢討和廓清，以便使我們國際在傳統托洛茨基主義之強固思想基礎上重新統一。」（著重點係現在所加）。

我這種根據「基本原則」來進行統一的主張，隨後不斷地提出過。而且我相信，我們當中沒有任何人「企圖」「用組織方法去達成重新統一」，或主張「不以基本政治協議為基礎的統一至上論」。因此，我應當說，英國同志所反對的「統一至上論」如果不是用來掩飾或辯護他們以前根本反對統一的錯誤主張（如他們在一月二日給 SWP 的信所表示的），便是「無的放矢」。

英國同志爲了表明或證明他們是主張一個真正的（不是至上論的）「經過國際充分討論，以政治協議為基礎的統一」，便提出了如下的建議：

「重組第四國際必須立即進行如下步驟，即準備一次澈底的討論，使所有加入國際委員會和國際書記處的各國支部都作出決議和建議。儘廣地在整個國際運動中傳閱。這種討論至遲應在一九六一年五月開始，應該由兩派以同等人數組成一個小型委員會來推動，這個委員會的任務在於監視各種資料能被廣泛流傳，使各支部下層同志都有機會加以考慮。經過一年之後，應舉行國際運動的預備會議，以便確定協議方法或其他由討論所引起的問題，然後提出國際運動的章程。」（《國際遠景草案》第二七頁，重點我加。）

上面這個建議，表面看來似乎是很認真的，民主的和具體的。但它實際上卻包含了無法實現的矛盾。例如它主張「所有加入國際委員會和國際書記處的支部都作出決議和建議。」以便進行「一次澈底的討論」，從一九六一年五月起，討論一年之後，「舉行國際運動的預備會議，以便確定協議方法或其他由討論所引起的問題。」這顯然是企圖把統一的討論變成爲無了無休的，以便無限期拖延下去。因爲如果英國同志建

議一切支部「提出決議和建議」，所指的是關於當前的國際局勢或「今日的重大問題」，如他們在《國際遠景決議草案》所表示的，那末，根據我在前面所指出的 IC 及它的各支部過去對於許多決議草案都不曾加以討論的經驗，即令 IC 和 IS 的各支部都「提出決議和建議」恐怕除了無限期拖延討論或乾脆地不討論外，再不能有別的結果。因為要實現英國同志所主張的如此廣泛而澈底的討論，必須有一個具有相當能力的國際機構，才有可能。但現時我們正是沒有這樣的國際機構。因而，英國同志這種建議，假如不是藉以拖延統一討論的手段，至少在現時是空想的。

如果英國同志的建議是指討論「基本原則基礎」，那就不須要「所有加入國際委員會和國際書記處的支部都提出決議和建議」來進行「徹底討論」（在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只須 IC 和 IS 雙方同意成立一個「平權委員會」，或如英國同志所建議的「由兩派以同等人數組成一個小型委員會」，根據我們過渡綱領的原則以及引起一九五三年分裂的諸原則問題，作出一個雙方同意的「政治協議」送交各支部徵求同意就夠了。為什麼英國同志不提出這樣直接而又實際可行的辦法呢？因為這樣的辦法會加速統一的成功，這是和他們拖延統一的政策相矛盾的。

總而言之，英國同志在過去七年中對於統一的主張是自相矛盾的（如始則堅持統一，隨後又堅決反對它，遇到要求統一的壓力過強時，又想藉手段來阻撓它或拖延它），缺乏原則的。他們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於他們對統一問題不是從世界運動的整體利益上出發，而老是站在極狹小的派系觀點上去考慮它。例如，他們在給 SWP 的信中說了許多關於他們在英國和巴布洛派鬥爭的故事，以及他們自己的成就等，但

沒有一句話提到我們的運動在過去七年中，因分裂所受到的損害。他們更沒有注意到客觀局勢的發展需要我們的運動重新統一，以及全世界大多數的托洛茨基主義者迫切地要求統一以應付有利的客觀局勢的願望。因此，我要特別提醒英國同志，把他們的注意力從小派系的觀點轉到廣大的國際主義方面來。關於近幾年來事變發展所造成的有利於我們運動的客觀條件和我們自身分裂間的矛盾，我在前面引證過的那封給加農的信中，曾作了如下的簡單分析：

「我們運動經過三十年極痛苦的鬥爭，今天已達到一個歷史轉變點；自從聯共廿次大會宣佈清算史大林的『個人崇拜』，他的『個人獨裁』和其他罪行以來，尤其是波匈革命爆發之後，在所有史大林黨內都出現空前的危機，結果普遍產生深刻的分化和瓦解，這種新局勢給托洛茨基主義運動開啓一個嶄新的有利的客觀形勢，這點我們大家都已認識到了。

「但是在這樣有利的客觀形勢之下，在我們前進的路上正擺著一重嚴重的障礙，這障礙是屬於主觀的，即我們運動在全世界範圍的分裂。這種情形，在許多國家早已留下極壞的影響，且阻止我們運動在那裡的發展。其結論是：「在這空前有利的歷史條件下，我們國際運動的重新統一是絕對必需的。任何拖延都不能再予忍受。」

上面的話寫出後，時間又過去了三年，我們的運動因分裂狀態的繼續存在，不但沒有能利用客觀的有利條件而向前發展，反而在許多國家裡趨於停滯，甚至倒退，這是極可惋惜的。現在的客觀條件當然已有改變，但一般地還是有利於我們的運動，因而需要統一。正如 SWP 在它二月六日給 SLL 的信中所指出的：

「對托洛茨基主義說來是偉大和嶄新的機會，又從下述這些事變中標誌出來：古巴的革命，中東和非洲的自由鬥爭，

日本的騷動，比利時的總罷工等，現在正開敞在我們面前，如果我們的運動是統一的話，那末我們要比一個分裂的或派別的，整日爭論著那些他們不能使相信社會主義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明白其爭論的運動來，會更好地從這些事件中獲得好處，且會以更快的速度在許多地區生長，而具有更鞏固的基礎。這點在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雙方同志中都感覺到的，因此更加要求用一切方法來解決問題，在這方面，最近一件最有教訓意義的例子就是日本。」

在這裡我要特別指出古巴革命的緊急情形，以證明我們的運動要求統一的迫切性。大家知道，古巴革命是西半球唯一勝利的民族民主革命，它正在向社會主義道路走，而且由非史大林主義黨所領導的。因而這個革命有可能發展成爲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民主政制的前途。但這革命現正處於緊急狀態中：一方面是美帝的強大壓力，另一方面是蘇聯集團的有力支持。在這種微妙的特殊情況下，這個革命所建立的政權，假如不是被迫倒退，甚或被摧毀，便有可能演化成爲史大林主義式的官僚獨裁。要避免這種前途，只有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統一起來，特別是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義者重新團結起來，盡可能地去幫助它，特別以托洛茨基主義的政治綱領去幫助它（通過拉丁美洲托洛茨基主義者聯合出版西班牙文的刊物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從思想上影響那裡的工農群眾和革命幹部，形成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領導才有可能。像現時陷於組織分裂和意見分歧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不但不能有效地幫助古巴革命，甚至會給它以壞的影響。例如，不僅拉丁美洲的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集團對古巴革命的意見表現混亂和分歧，就是 SLL 和 SWP 對於古巴革命政權性質的評價也發生了嚴重的分歧。更壞的是：這種分歧意見甚至公開發表在各自的機關報上（戰士報和新聞通訊），這種可悲的

現象是值得我們嚴重注意和警覺的。同時也就充分證明：爲了應付當前的緊急事變，我們的運動是如何迫切地需要統一啊！

最後，當人們現時還在強調一九五三年分裂的分歧意見，甚至說，這種分歧意見「越來越大」，以此來反對統一或阻撓統一時，我就不得不說，那次的分裂不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是說，假如我們在分裂之前提出了批評巴布洛主義的文件，按照民主集中制的軌道，要求在國際內部進行普遍而澈底的討論，我相信極可能清除巴布洛的修正主義思想和他在組織上的官僚方法，乃至撤銷他的總書記，而保持國際的統一。我們沒有這樣作，而突然發出「公開信」，組織「國際委員會」，這是太過非常的措施。就我個人說，對這種非常措施的計劃雖事先毫無所知，但爲了加強反對巴布洛的極度危險的修正主義思想和官僚主義方法，我曾爲這種「非常措施」辯護過。但由於分裂後七年餘來，我們整個運動所遭到的損害和痛苦教訓，我現在不得不聲明：我們反對巴布洛主義的運動，從政治上說，完全是正確的，必須的，而且成功了的。但我們那時所採取的非常措施，（因此導致分裂，並給國際運動以壞的例子。）從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組織觀點，即按照布爾什維克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和傳統說，是錯誤的。我們是繼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托洛茨基主義者，而不是自以爲永遠正確的史大林主義者，必須從過去的經驗，尤其是從痛苦的經驗中取得教訓，認識錯誤和及時改正它。我們現時改正這一錯誤的唯一而具有積極性的辦法，便是盡可能快地把已經分裂了七年餘的國際運動重新統一起來。

我在三年前寫給加農的信曾說：

「托洛茨基從他被迫於一九二九年離開蘇聯，尤其是一九三三年德國革命失敗後，便從事建立一個統一的革命國

際。爲了這一工作，他不僅寫了一個極完備的綱領，而且花了很多時間耐心地努力說服許多國家各派統一，由此奠定了統一的革命國際的基礎。（見他給各派托派的許多信件。）如果他仍活著，看到運動在現時有利的局勢下陷於分裂，我相信他必定要設法儘速使之統一而不稍遲延。

「……必須在堅持我們政治立場（這點已經成功），即堅持我們以過渡綱領爲基礎的傳統托洛茨基主義立場上，去統一切托派力量，……迎合這有利客觀局勢之歷史時機的迫切需要。

「我認爲這是使我們運動重新統一的最好時機。爲了迎合這有利客觀局勢之歷史時機的迫切需要，最後我提出下述辦法，作爲實現重新統一的程序：

1. IC 必須將一切有關統一問題的信件和文件儘速送交它的一切支部，各支部收到該項信件和文件後，應立刻舉行普遍的討論，儘速作出決定送交 IC。

2. IC 收到各支部對統一問題的決議後，如大多數贊成統一，應立即召開會議，討論進行統一的實際步驟。

3. 進行統一的第一個步驟是 IC 主動地寫信給 IS，建議重開統一談判。如 IS 方面同意統一談判，首先由 IC 和 IS 推出同等數目的代表，成立平權委員會，平委會的主要任務如下：

A. 討論和起草關於統一的政治協定（political agreement），即根據我們的過渡綱領的基本原則和導致一九五三年分裂的諸原則問題作成政治協定。送交各支部徵取同意。

B. 商討各國支部（如一國存在有 IC 和 IS 的支部）合併的實際辦法。

C. 起草關於國際局勢及第四國際任務的政治決議草案，交 IC 和 IS 各支部討論，以便未來的統一會議採納。

D. 審查第四國際的章程，重新規定國際領導機關的任務、職權和責任，以及國際領導機關與各支部的相互關係。

4. 某些國家存在著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托洛茨基主義組織或支部，如發現困難不能合併的，可以容許這些組織暫時分別存在，讓統一大會去討論和解決。但那些分別存在的組織須成立一聯絡委員會，以便在對外的行動上交換意見，採取一致的方針。

5. 在進行統一的這段時間內，遇有國際上發生重大事變或某些支部發生重大問題時，平權委員會須以第四國際的名義發表主張和解決那些支部的迫切問題。

6. 統一大會應規定在一定的時間內舉行，至遲不得超過一九六二年。」

## 關於人民公社和中共及其 政權性質的爭論 (一九六二年)

### 對人民公社問題的爭論（一九五八——一九五九）

緊接著東歐問題之後，發生了中國人民公社的爭論。這個問題由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以下簡稱社工黨）的史華貝克和李福仁提出。史華貝克是美國老一輩的共產主義者，與加農一起，是一九二八年美國托派的創立者之一；地位和聲名都不及加農。李福仁則是大家都熟知的人物。

一九五八年八月，毛澤東提出「人民公社好」，全國的生產合作社便一窩蜂地狂熱參加建立人民公社。八月底，人民公社的政策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正式獲得通過。

人民公社的主要內容是什麼呢？它把以前的生產合作社整個區域地拼攏起來，把農民一切私有的東西都收歸公社，說是「消滅資本主義殘餘」，即絕對共產主義化。它設有公共食堂，所有農民都一起吃大鍋飯；設有公共托兒所，把所有孩童集中起來，好讓他們的媽媽去參加農業的生產。農民把鍋子、窗框等所有金屬東西，統統毀掉，放在「土高爐」裏去「煉鋼」。

人民公社的工作是瘋狂的，工時往往長達十四小時，加上煉鋼，勞動的強度達到了頂點。規模的龐大和強行「共產主義化」的方法是聞所未聞的。這個運動震驚了全世界：資產階級地主固然反對，甚至蘇聯官僚和所有的史大林派都非常震驚，——連赫魯曉夫也指出這個政策的瘋狂。但是，在小資產階級中，因為這個政策而對中共產生了幻想的人也

不少，這些人夢想著一個新的共產主義時代真的到來了。

在我們的運動內部，也有不少人受了這種幻想的影響。但是以文件表示出來的，在美國就有上述兩人。在國際方面則有巴布洛，他以爲這不但是中國，而且是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新時代。

在美國紐約的領導層裏，以湯·基利、杜勃士、韓生等爲首的意見比較穩重。他們從過渡綱領和列寧對農業集體化的意見爲基礎出發，認爲對待這個問題應予特別謹慎。他們從俄國的經驗中看出這樣的人民公社是不正常的，所以他們採取不贊成的態度；不過，他們並沒有足夠的事實和理論去說明他們的立場。

在洛杉磯方面，有當時擔任全國委員會主席的加農，和洛杉磯支部書記的勞域；前者由於沒有機會深入研究這個問題，而後者則疏於研究，因而在由司華貝克和李福仁，代洛杉磯領導機關起草的人民公社的文件上簽了名。（司是全國領導機關的成員之一，曾寫過一些關於蘇聯的文章，李則寫過許多關於中國問題的文章，所以他們被認爲是蘇聯和中國問題專家）

這樣一來，紐約和洛杉磯便形成了對峙，因爲紐約的中央領導感到與眾洛杉磯領袖意見的分歧異常尷尬。於是，鐸伯斯通過李瓊，徵求我的意見，希望我對有關問題寫一篇批評文章。

那時是一九五九年初，人民公社已經建立，我們在法國的生活正是最困難的時候。我盡力搜集資料，寫成了「對支持人民公社各種意見的批評」。這篇文章，我認爲是我所寫的各論文中最重要和最有貢獻的文章之一，因爲這是馬克思主義者有關農業集體化的文獻中最清楚和詳細的。

在中國，蘇達也引經據典地支持人民公社政策。他根據

馬克思經濟學的「大生產總優於小生產」這個無可否認的規律作為基礎以贊成人民公社，說它「又大又公」。因此，我的文章一開始便批評蘇達的意見，然後再批評司華貝克和李福仁的見解。我解釋農民與工人的基本不同之處，指出農民是過渡的階級，只能向兩極分化。文中，我引述了恩格斯的《德法農民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對農民問題的經典著作，解釋如何使農民脫離落後和孤立的狀態，把他們引渡到社會主義道路上來。我又介紹了列寧在十月革命後，怎樣應付這個歷史的大問題：把千千萬萬小農轉變為集體化農民。列寧強調，必須用宣傳、教育和示範，使農民瞭解和自願自動參加集體化生產。否則，如果用強迫命令，只會造成最壞的結果。列寧還說到，要使農業馬上集體化，在俄國當時的經濟條件絕不可能；只有發展技術、電氣化、機械化，和發展交通工具等等；而且最終得到西方先進國家革命的幫助，那時農業集體化才有可能。列寧甚至認為，即使在一些西歐國家進行農業集體化，也只能由農民自願參加，而不能加以強迫。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的中農也是小生產者，是無產階級必須爭取的對象之一。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為農民問題提出的政策就是朝著這個方向走的；他提議應當增加他們的土地，協助他們生產，對他們採取對待同盟者的態度。只有靠說服才能使他們慢慢地走上集體化的道路，使之自覺地擁護無產階級專政。這是列寧關於農民最基本的綱領。我在文章內，引述了列寧這個最中心的原則：要農民參加集體化一定要他們自願，不能強迫。祇是「大」有時反而是禍害，不會有其他好處。我就是根據列寧的觀點批評蘇達的意見的。但他從來不曾回答過我這篇文章。

司華貝克和李福仁的主要論據是：農業集體化後，生產大大增加。他們引用了中共官方謊報的生產增加，來「證明」

公社化的合理，因而把公社說成是最高的社會經濟的組織形式，憑此可以直接達到共產主義。他們聲稱公社包含了所有進步的因素，不但可以消滅城鄉的差距，還可以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區別。他們還認為，公社既然建立了公共托兒所和公共食堂，因此婦女也就真正被解放了。

他們在論證中提出棉花和糧食的增產，但是他們連中國農村的起碼知識都缺乏——這些棉糧等農作物是在人民公社建立之前已經種植了的。公社不過收穫它們而已。司、李把公社以前種植的成果算在公社的賬上，是可笑的！

他們說人民公社是「最高的社會經濟組織形式」，這個意見錯得非常嚴重。社會主義毫無例外地也要分工的。把全部的社會工作和生活都包含在公社之內，其唯一可能的後果是混亂和矛盾。農業集體化絕不能離開農業的機械化、電氣化；可是誰都知道中國的科技水準是如何地落後的，它甚至連蟲藥都不能有起碼的供應，更談不上什麼機械化或電氣化了。

至於他們說公社的實施使婦女從家庭解放出來，成為社會的生產者，也只能反映他們對中國社會的落後的無知。他們不知道中國農村的交通情形，要所有老老幼幼的男女都往公共食堂去吃飯，實際上卻使他們的生活造成更多不便。如果沒有豐富的物質和其他必須條件（如適當的房屋和交通工具等），便不可能證明公共食堂會比在家吃飯更好。托兒所的設立也是一樣。

婦女徹底解放絕不是一朝一夕可達到的，即在社會主義革命推翻全部私有財產制度後，還要經過若干年才能達成。

而且，要實行公社制度，必須由農民自己選舉出管理人員，絕對不應該由官僚控制。司華貝克和李福仁竟然連這點也不懂得。巴布洛對人民公社的估計也非常高。他在法文版的「第四國際」雜誌上寫道：「公社是原子時代的產物，是蘇

維埃的形式；是按照不斷革命論的公式發展起來的。」針對這點，我的文章反駁道：「公社內所有委員會委員實際上全由官僚指定，即使有選舉也是虛偽的。黨書記壟斷一切，是毛澤東壟斷全國的統治權的縮影。」我還在文內預先指出：「公社既根本違反農民的意願，所有公共飯堂等等一定無法長久維持下去，不久就會被迫放棄的。」

托洛茨基的意見基本上和馬克思、列寧一樣，認為要根本解放農民只有進行農業集體化，把分散的小農經濟提高變成大生產。可是，他非常堅持必須讓農民自願參加。

要解決公社問題，重新爭取農民，應該在公社裏重新進行討論，讓農民自己決定是否繼續還是改組。要是多數贊成繼續，應由他們自行試驗，否則應把公社解散，重組小生產合作社。如有必要，可以把土地分給農民，讓他們自己耕植。國家對農民應予以幫助，不能收取太多的成果（不超過百分之二十）。

我的這篇文章在社工黨內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韓生、鐸伯斯和艾芙蓮看後，稱這文章為一枚炸彈，把司華貝克和李福仁誇大人民公社的論據都給炸碎了。加農和勞爾克完全贊成我的意見；這樣一來，社工黨領導層的意見便統一起來。司華貝克和李福仁都不能答覆我對他們的批評，這證明他們的意見完全破了產。日本支部的山西英一，在看到我的文章後，完全支持我的意見，並且說這篇文章是馬克思主義在這個問題上的教科書。

至於在歐洲方面，也因這個問題而發生分歧，不過並沒有像社工黨的爭論那麼劇烈。必須承認在農業集體化問題上，中國支部的意見對國際是個大的貢獻。

### 關於中共及其政權的性質的歧見

約在一九六〇年，討論人民公社以後，司華貝克和李福

仁的親毛思想還繼續發展。雖然，他們對人民公社的意見失敗了，但他們對中共和政權的性質又有了不同的解釋。他們認為社工黨在一九五五年的決議案裏把中共界定為史大林主義的黨，其政權為官僚專政，主張在中國進行政治革命都是錯誤的；即認為中共政權是民主選出的政權。

一九五四年，我寫了「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前途」，文內指出中國會慢慢地朝東歐的方向走，逐步改變為國有財產制度；會由人民民主專政過渡為「無產階級專政」，演化下去變為變態的工人國家。它的經濟的下層基礎是社會主義的，政權的上層建築是官僚專政，與墮落的蘇聯的性質相同。因此，必須以政治革命來推翻官僚層，社會主義才能向前發展。這是我第一次對中國問題達到一個綱領性的意見。美國的同志們當然看到了我這份文件，所以一九五五年社工黨的決議案的立場大致和我們一樣。社工黨這個立場，當時曾為司華貝克和李福仁所贊成。只是到了六〇年，由於人民公社問題的影響，他們便改變了意見。他們認為中共在四八至四九年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改變了黨的性質，失去了史大林主義的黨性，因而其政權也不是史大林主義的官僚專政了。他們甚至說，中國沒有保護官僚利益的警察制度，政權是用民主方式（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的，和列寧時代的蘇維埃制度一樣。中國從合作社發展到人民公社，完成了更高的階段，可見中共已朝不斷革命的方向發展。因此，提出政治革命推翻這個政權是不對的，應該用民主改良的綱領去改革它。這種意見當然和領導機關發生了衝突，不過這次加農和勞域都沒有在這種意見上簽名。

司華貝克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歐洲和加拿大一些同志訪問中國的人的報導，引經據典，使那時是社工黨總書記的杜勃士十分為難。他又經過李瓊向我徵求意見。由於這個問題

的根本性和重要性，我寫了「民主改良還是政治革命」一文。那時我們要做計件工，生活非常艱苦，但我還是盡可能搜集材料寫成這篇論文。在生活困難、資料貧弱的那個時代，周鯨文的「風波十年」裏的一些資料很有價值，給我以不少幫助。

早些時與巴布洛和格爾曼爭論南斯拉夫和中國的性質時，司華貝克和李福仁都不同意他們的意見。格爾曼認為南斯拉夫黨和中共黨在革命過程中改變了史大林主義的性質，以此給巴布洛的修正主義作了理論方面的解釋。他們這樣發揮道：由於客觀的原因——孤立、落後，使到蘇聯布爾什維克黨發展成墮落的黨。中國雖然也像蘇聯一樣落後，但它由於得到蘇聯的支持，因此並不孤立。這種說法很容易使人誤信為真。

我在文章內引用四九年革命後的許多事實去反駁這些論據。我根據事實分析中國的內外政策，指出一方面中國的落後性（比俄國還要落後），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接受蘇聯史大林主義官僚的幫助，就無法避免受到官僚主義的影響，在與蘇聯同樣的基礎上沿著史大林主義的道路走上官僚特權的墮落。我又引用曾經參加過中共高層政府工作的周鯨文所寫的書中的資料，暴露出官僚生活的真實面貌，以駁斥那些訪問中共的人對中共領袖生活的虛偽美化。

周鯨文的書又說到中國的警察制度。據他說，中共的警察機關是由特務頭子羅瑞卿建立起來的。不但整個國家設有層層級級的公安部、公安局、公安分站……而且還有街坊委員會等機關，簡直無孔不入，對於人民的生活包括旅行到買一雙鞋子的小事，都不能逃出警察的監視；甚至在工廠或機關和學校內也建立起嚴密的監視制度，使到每個人說話都不能暢所欲言。因為要是稍有不慎便會禍從口出而遭受批鬥。

這種生活使人惶恐不安，不能不人人都滿口馬列主義。事實上，在這種警察制度下，人民要戰戰兢兢地過日子。

周鯨文的書內還介紹了中國「選舉」情況。中國的工農根本沒有享有自下至上的民主普選的權利。從中央到地方一層層一級級地由上而下，指定名單；人民只能在既定的名單上劃圈圈，這種包辦式的官僚方法，根本就不能稱作選舉！我把這些情況都引述出來，並且以之和蘇聯當年的蘇維埃制度作個比較。司華貝克和李福仁所引以為據的，早已經由事實無情地揭露它們的虛偽性了。

我的文章中有一章專門論述到不斷革命論的問題，以「被歪曲的不斷革命與不斷革命論的被歪曲」為小標題。我分析到中國的事變發展怎樣從正反兩面證明不斷革命論的正確，不斷革命論又如何地被巴布洛、司華貝克和李福仁所歪曲。我又指出中共雖然反對不斷革命論，但在客觀形勢的壓力下，為了自保而不得不進行某些符合不斷革命論的改革。最初，他們連土地改革也不想施行，到了韓戰爆發，他們為了取得農民的支持才迫不得已實行土地改革。但即使這樣，他們還堅持「新民主主義」，忠實地保護私有財產制度。一直到一九五三年，當實行工業化遇到資產階級的抵制時，才又不得不在公私合營的方式下把財產國有化，以此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這表明：在事變的壓力下，為了保持政權，中共終於被迫走上了不斷革命的道路。

## 白恩斯領導下的 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往那裏去？

——評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  
教派主義傾向的危險性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四日)

我在一九六一年五月寫的「關於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意見和建議」一文中，曾分析過以白恩斯同志為首的社會主義勞工聯盟領導層的傾向，是不顧整個運動的利益，假借一切口實、利用一切手段來反對和阻礙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統一。我同時並指出，社會主義勞工聯盟領導層所強調的政治討論「即所謂統一必須先有一次國際上的充分討論，然後以基本上一致的意見為根據」，不過是企圖無限期地拖延統一的一種手段而已。

近一年餘來，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所代表的這種反對統一傾向的發展，不但證實了我在一年前所作的分析和判斷，而且由於他們為要求拒絕和國際書記處各支部統一的政治論據，特別為要尋求反對社會主義工人黨主張統一的政治論據，在許多重大問題上，首先是在古巴革命問題上，已完全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而走到極端教派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的立場。這種極端教派主義的傾向，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在它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日答覆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第四國際問題及其今後步伐》的文件《被背叛了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中，最明顯地充分地暴露了出來。

由於它的極端教派主義的立場，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導層公然指責社會主義工人黨「採用了巴布洛修正主義的政

治方法」，「背叛了托洛茨基主義」。其結論是：「爲了在美國建立一個革命的政黨，其最迫切的工作莫過於擊敗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領導層方面的修正主義」。這樣，不但國際委員會和國際書記處的各支部談不到統一，即國際委員會本身亦將發生新的分裂。首先是社會主義勞工聯盟準備和社會主義工人黨破裂，這明顯地表明：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又面臨著一個新的危機！

在這種新危機的威脅下，我深深地覺得社會主義勞工聯盟所代表的頑強地反對統一的傾向，因而不惜準備和堅持統一的社會主義工人黨破裂，特別是它的領導層所表現的極端教派主義的思想，如任其發展下去，勢必導致新的分裂，把我們的運動拉往後退若干年，並使它自己走向災禍的深淵。因此，爲了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利益，同時也是爲了各國托派運動的利益，我們必須給社會主義勞工聯盟領導層所代表的危機傾向以徹底的批評和暴露，以便及時挽救它所引起的新的危機，並在一個共同的政治協定的基礎上，儘快地把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統一起來，重新建立第四國際的領導，謀取各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合作，以此幫助各國托派組織走向建立群眾革命黨的道路。

### 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教派主義在古巴革命問題上的暴露

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在攻擊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文件中，特別強調和重復地指責後者的，是它以「客觀主義」代替「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見 SLAUGHTER 在一九六一年七月國際委員會會議上「關於國際委員會的報告」）或「採用巴布洛修正主義的政治方法」。但實際上，恰好是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以自己的印象主義或主觀主義代替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這在他們分析和評斷古巴革命一系列的問題上

——古巴國家的性質，卡斯特羅政府的性質，以及古巴革命的性質等——赤裸裸地暴露了出來。因而暴露出他們的極端的教派主義的傾向。

### 關於古巴國家性質的問題

社會主義工人黨根據卡斯特羅沒收美帝國主義者和古巴資本家的產業為國有斷定「古巴已建有一個工人國家」（《第四國際的問題及其以後步伐》第一頁）。社會主義工人黨在這裏所用的「方法」和托洛茨基在決定蘇聯國家的性質時所用的，是完全一致的。因為托洛茨基正是根據十月革命所創造的「國有財產制」未被改變，不管史大林的官僚篡奪了無產階級的政權，蘇聯仍是一個工人國家（墮落的），關於這個基本點，甚至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導者們也不得不承認：在辯護蘇聯仍為一個工人國家的問題上托洛茨基本人認為：十月革命在社會和經濟方面的勝利品仍然完整無缺。但他們同時卻宣稱：「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和巴布洛派認為古巴是一個工人國家的界定是脫離馬克思主義方法的另一實例」。

為什麼托洛茨基根據國有財產為「標準」決定蘇聯為工人國家是對的，而社會主義工人黨根據這同一的「標準」來認定古巴為一個工人國家，便是「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方法」？關於這個問題、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曾企圖解釋說：「為求得蘇聯國家性質的定義，托洛茨基在其長七年工作的每一階段上，都執著於一個完整而精密的遠景，並非僅以定義的標準為依據，而採用一種「標準性」的方法的。美國社工黨的方法則完全相反，他們從世界部份地區革命之某一特殊表現的討論中，抽取某種標準，來作為世界革命事變發展中的唯一場面」。這一大段「解釋」的話，除了暴露社會主義勞工聯盟領袖們的可驚的混亂和詭辯外，並證明他們

完全不懂得托洛茨基在其研究蘇聯「性質」的七年長期工作中，「每一階段的工作情形」，托洛茨基絕對不會「執著於一個完整而精密的遠景」，恰好相反，而是「僅以定義的標準為依據，而採用一種『標準性』的方法的」。社會主義工人黨也正是這種「標準性」的方法，而絕不是「從世界部份地區革命鬥爭之某一特殊表現的討論中，抽取某種標準」。這就是說、托洛茨基決定蘇聯國家的性質時，絕對不是根據什麼特殊情況或一個完整而精密的遠景，如他自己所說的，而是根據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這種社會學的概括公式是：

「生產關係是適應於這些關係之物質生產力發展的特定階段的。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了社會的經濟構造，亦即社會的真正基礎，在這個基礎上面，產生了法律和政治的上層構造，而社會的意識，則是適應於這些上層構造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了社會、政治和知識生活的一般進程。」（見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從上面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的公式中得出來的結論便是：「社會的經濟構造，亦即社會的真正基礎」，決定著一個法律和政治的上層「構造物」的性質。托洛茨基正是根據這個基本原則，認定十月革命所創立的國有財產關係，亦即「生產關係」既未改變（或如社會主義勞工聯盟所承認的社會和經濟的勝利品，仍然完整無缺）；因而他判定蘇聯還是一個工人國家。這個根據財產關係的「標準」來決定國家的性質，不但通用於蘇聯，而且可以適用於任何時代和任何形式的國家，封建領主的財產關係決定了封建國家的性質，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關係決定著資產階級國家的性質。我們的運動對於戰後東歐各國及中國等國家的性質，也完全是根據這些國家的財產關係的轉變，即財產國有化這個「標準」來判斷的。這個以財產關係為「標準」來決定國家性質，可以說早已成

爲馬克思主義的 ABC。但不幸，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直到今天還不懂得這個 ABC！

社會主義勞工聯盟領袖們既不懂得決定一個國家的社會性質的馬克思主義的標準，於是他們發明一個新的標準來代替它。底下便是他們的新標準的內容：

「什麼是工人國家的具體方式呢？這個方式是這一或那一形式下的無產階級專政」。「現在古巴已存有無產階級專政」麼？我們的答覆是一個斷然的不字。（見《被背叛了的托洛茨基主義》第十三頁）

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在這裏以「無產階級專政」爲標準來決定工人國家的性質，便是以「政治標準」代替經濟「標準」，即以政治上的上層構造，代替「經濟上的社會構造」，以此來絕對地否認現時古巴的工人國家的性質，他們「主觀上」似乎是「勝利了」，但怎樣解釋蘇聯和戰後東歐各國及中國等的國家性質呢？假如他們有信心和勇氣認定他們的「新標準」是正確的，不是特別爲古巴創造出來，而是具有普遍適用性的——一個決定工人國家性質的標準應當而且必須具有普遍的適用性，那他們首先便從根推翻托洛茨基對於蘇聯國家性質的評價。更無須說要絕對地否認戰後東歐各國及中國等國家是工人的國家！因爲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早已爲史大林主義者的「官僚獨裁」所代替。而東歐各國和中國等一開始便是在史大林黨的官僚獨裁統治之下，根本沒有建立過任何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這樣，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們在國家性質的問題上，首先是在蘇聯和東歐各國及中國等國家性質的問題上，完全離開托洛茨基主義和第四國際的傳統立場，而陷入修正主義的泥坑中去了！你們看，一經離開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原則，依照其邏輯的發展，會走得如何之遠！！

這裏須附帶地指出，當三十年代爭論蘇聯國家性質的問題時，從布魯諾到盤納姆和夏克曼都是毫無例外地，以「政治標準」代替「經濟標準」去評斷蘇聯國家性質的變化，即根據它的無產階級的政權已為史大林的官僚所篡奪，已轉變為「全能獨裁」，甚至根據史大林和希特勒所簽訂的「德蘇條約」為理由，「絕對地」拒絕承認蘇聯還是一個工人國家。現在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導層對古巴的國家性質所採取的立場，不過是「那些我們運動中屬於小資產階級傾向」的修正主義立場之繼續或重復而已。

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似乎感覺到以「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標準去否認古巴為工人國家，不夠充份。因此，他們又提出另一個標準作為補充。他們說：

「在一個落後的國家中，工人國家在經濟方面的一個基本標準，乃是土地的國有化，以及當權者經由政治措施來阻止富農的生長。無論在埃及或在古巴，都不曾採取此等步驟。相反，古巴的卡斯特羅最近還在糧食危機的壓力下，答應把土地還給農民。只要土地還可以讓與、只要小商品生產還繼續存在、那末，古巴便仍然還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見《被背叛了的托洛茨基主義》第十四頁）

上面這個「工人國家在經濟方面的基本規範」比起那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規範來，不但沒有好些，而且更顯得荒謬。因為它包含著如下的理論上的實踐上的無知：

A、當列寧抨擊考茨基的理論、說「考茨基認定把大地產收歸國有，以後再分成小塊地出租給農民，也具有某種社會主義性質的看法，根本是對馬克思的嘲笑」，他曾援引馬克思的意見說：「土地的國有化，事實上是與資產階級的口號相一致的」。（見《列寧選集》第二卷莫斯科本第四二四頁）由此可見，即令實現了「土地國有化」還不是社會主義的，只

是適合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辦法（列寧語）。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以資產階級性的「土地國有化」作為「一個落後國家工人政府在經濟方面的基本規範」，這證明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如何地外行！

B、不錯，列寧曾說過：「土地的國有化曾給予無產階級政府以最大的機會，使它能將農業過渡到社會主義去」（列寧語）。但如果無產階級的國家不把一切生產資料，如工廠，礦山，運輸工具和銀行等握在自己手裏，則「土地國有化」不過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肅清道路而已。社會主義勞工聯盟肯定土地國有化為「工人國家的基本標準」而沒有提出沒收一切生產資料歸國有，這表明他們和「考茨基的上述意見」沒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

C、說到當權者應經由政治措施以阻止富農的生長問題，假如一切生產資料不操在「當權者」手裏，這簡直等於夢囈！即令一切生產資料操在「當權者」手裏，還不能「阻止富農的生長」。因為要真正「阻止富農的生長」除了「當權者」握有一切生產資料、實行計劃經濟、控制國內市場、建立對外貿易獨佔外，還必須實行全部農業集體化，以此消滅「富農生長」的社會根源。但「在一個落後的國家裏」，實行全部農業集體化，絕對不是短期內所能收效的，僅僅依靠「經由政治措施」去「阻止富農生長」，絕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策，只是史大林的冒險主義而已。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口頭上反對史大林主義，但一到實際的問題上卻變成了後者的俘虜。

D、至於「小商品的生產」即令在「土地國有化」之後，在停止「土地轉讓」的條件之下，還是不可避免地「繼續存在的」，因為「在一個落後國家裏」，依照列寧的意見，在宣佈「土地國有化」的同時，必須實行平均的土地政策，就是說，

必須把土地重新分配給農民，讓他們進行個體的農業經營。而這種個體的農業經營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小商品生產的繼續存在」，這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 ABC。要認真終止「小商品的生產」也只有實行全部農業集體化才是可想像的，但要實行全部農業集體化，已如上面所說，絕不是短期內所能完成的。所以在十月革命後，特別在新經濟政策實施後，「小商品生產」還是繼續進行的，從社會主義勞工聯盟領袖們的觀點看來，列寧領導的蘇聯也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了。

### 關於卡斯特羅政府的性質問題

我們曾經指出，自一九五九年末資產階級的代表被排除於政權之後，古巴的革命政府或卡斯特羅政府已轉變為「工農政府」。但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既以反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背棄它的基本原則否認古巴為工人國家之後，更進一步宣稱：「卡斯特羅政權是各種不同的資本主義政權之一。這個政權並不曾創造一個本質上與巴蒂斯塔政府不同的政權形式」（見《被背叛了的托洛茨基主義》第十四頁）。這便等於說，卡斯特羅政府和巴蒂斯塔政府「在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同是資本主義的政權。像這樣的說法，不但在事實上完全盲目，而且在理論上也是絕頂荒唐。

就對外的事實方面說，巴蒂斯塔政府完全擁護美帝國主義在古巴所享有的一切特權，自願地使古巴安於半殖民地的地位，並盡力保衛美國資本家的一切產業，讓它們任意壓榨古巴的工人和農民。而卡斯特羅政府不但剝奪了美帝國主義的特權，爭得了民族獨立，並進而沒收了美國資本家的財產為國有，頑強地進行了並還在進行反美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在這種絕對不可爭論的事實對照之下，卡斯特羅政府和巴蒂斯塔政府果然「在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嗎？！

就對內的事實方面來說，巴蒂斯塔政府盡力保衛古巴地主和資本家的利益，讓它們無限地榨取工農群眾的血液，並建立了最反動的極權政制，剝奪了一切人民的民主權利，以軍隊、憲兵和警察最殘暴地迫害人民。而卡斯特羅政府則從根摧毀了巴蒂斯塔的政權機構，消滅了它的軍隊、憲兵和警察。不但排除了地主和資本家的代表於新政權之外，而且沒收了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或集體經營，剝奪了資本家的產業歸國有，並建立了工農民軍以鎮壓地主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抵禦美國的侵略，保衛工農群眾的基本利益——這兩種政權之間，果真「在本質上」是一樣嗎？！！

就理論方面說，列寧和托洛茨基都重覆地斷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絕對不能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堅決鬥爭，完成民族的獨立；更不能站在農民方面推翻地主，沒收他們的土地分配給農民，解決土地問題。因而只有工人領導農民進行革命的戰爭，才能解決民族獨立和土地問題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這已寫在我們的《過渡綱領》裏。如果依照社會主義勞工聯盟領袖們的說法，卡斯特羅政府在「本質上」和巴蒂斯塔沒有不同，同樣是「資本主義的政權」，換句話說，這兩種政府在「本質上」都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那就等於承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也能夠進行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地主的堅決鬥爭，解決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的任務——民族獨立與土地改革了！

更有進者，卡斯特羅政府不僅取消了帝國主義的特權，沒收了地主的土地，而且沒收了帝國主義資本家和本國資本家的財產歸國有，實行計劃經濟和對外貿易壟斷等社會主義的措施。依照社會主義勞工聯盟領袖們的斷定，卡斯特羅政府和巴蒂斯塔「在本質上」沒有什麼差異，同樣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這便等於說，資產階級也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

措施，即沒收自己的財產歸國有，實施計劃經濟和對外貿易獨佔等等。這樣，留給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革命任務是什麼呢？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在理論上」特別強調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革命作用，但在事實上卻完全取消了它！！

從前面的分析和解釋，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斷定卡斯特羅政府「在本質上」和巴蒂斯塔政府沒有不同，或前者「只是各種資本主義的政權之一」，這反映他們對事實的完全盲目的主觀主義和在理論上的淺薄的印象主義，達到了何等驚人的程度！！

但最令人驚異的還是下面的聲明：

「因之，我們便看到了凱末爾、蔣介石、納薩、卡提納斯、貝隆、彭貝拉，以及卡斯特羅等等人物。」（見《被背叛了的托洛茨基主義》第十五頁）

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在這裏把卡斯特羅和蔣介石等平列起來，加以同等的敵視。在去年七月的國際委員會會議上，BONDA 曾宣稱：「卡斯特羅和蔣介石是同樣的東西」，我當時曾請他把他的話重覆一遍，以便記錄下來。由於白恩斯不表贊成，BONDA 既不否認他的話，也不敢重說它。現在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竟把 BONDA 一年多以前所表示而為白恩斯所不贊成的意見，公然寫在他們的文件上，單從這點可以看出；他們的教派主義傾向，是依照自己的邏輯不自覺地自己發展起來的。但他們完全不懂得，蔣介石在中國第二次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從頭到尾是反動的，是革命的絞殺者，工農群眾的劊子手。而卡斯特羅不管他有如何的缺點，犯了怎樣的錯誤，在古巴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從開始到今天還是革命的，是革命的領導者。把還在領導革命的卡斯特羅同反革命的蔣介石，放在同一平面上加以污蔑，這已經越出了任何教派主義的限度，而滑進反動的立場上去了，假

如社會主義勞工聯盟把這種反動的觀點公開出來，一定要遭到一切革命者，特別是拉丁美洲的革命者的唾棄，而給托洛茨基主義的旗幟蒙上難以洗滌的污點的。

### 關於古巴革命不斷發展的問題

爲要否認古巴革命已由民主革命發展到了社會主義的革命，即爲要否認古巴革命發展的不斷性，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根據他們同一的主觀主義和印象主義，在他們的文件中寫道：

「儘管在過去二至三年內，古巴已發生了各種經濟上或社會上的變革，但這種變革並不曾使政權自一個階級的手裏，一往不返地轉移給別個階級，因而不可能稱爲一個社會革命；相反，因爲政權僅從一個階級的這一部份人轉移到另一部份人的手中，所以只能說是一個政治革命，在這個轉移的過程中，工人群眾曾獲得一些重要的讓步，不過這些讓步，並未超過資本主義統治和剝削的限度。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袖們竟欲在這一方面，來證實不斷革命論的正確性，真是多麼的孩子氣啊。」（見《被背叛了的托洛茨基主義》第十五頁）

上面這大段話，又是充滿著對事實的無知和理論上的荒謬。首先讓我們問：什麼是「社會革命」？假如社會主義勞工聯盟沒有完全拋棄或忘記馬克思主義的 ABC，我們便應當懂得；「社會革命」就是表示社會財產關係的轉變，即財產從一個階級轉到另一個階級手裏。所以，馬克思主義者都認爲十八世紀的法蘭西革命是一個「社會革命」，因爲它已將地主和教會的封建財產關係轉變爲資本主義的財產關係。馬克思主義者稱俄國的十月革命爲「社會革命」，因爲它已把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關係轉變成爲工人國家所有的財產關係。「古巴

過去二至三年內所發生的一切經濟上和社會上的變革」，正是社會財產關係的轉變，即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關係已轉變工人國家所有的財產關係。（如沒收一切工廠、礦山、運輸工具和銀行等，）如果說，像這樣的財產關係的轉變還不能算做「社會革命」，那麼，社會主義勞工聯盟所謂的「社會革命」的具體內容究竟是什麼？

假如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不是專門否認事實，說空話，而是為革命負責的話，他們既認定現時古巴的革命還沒有達到「社會革命」，那麼他們就應當而且必須替古巴未來的革命提出一個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作為鬥爭的方針。為什麼他們不提出這樣的綱領？事實很簡單，因為古巴革命事實上已進到「社會的革命」，實行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綱領，即沒收了資本家的財產歸國有，他們再也提不出任何「社會革命」的綱領了。這便證明，這些專門否認事實的人們，站在事實面前便束手無策了！

實際上，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在「社會革命」的問題上，和他們在工人國家的問題上一樣，完全背棄了馬克思主義的ABC。因為他們用來判斷革命性質的「標準」不是根據「財產關係」的轉變，而僅僅依靠「政權」的轉移。他們不懂得，一個革命，即令「政權」從一個階級轉移到另一個階級之手，假如財產關係沒有跟著「政權」的轉移而轉移，還不能算做完成的「社會革命」；反之，在一個革命中，如果財產關係已經轉變，例如生產資料已從資產階級轉變為工人國家所有，即令政權還沒有為工人階級直接掌握，馬克思主義者還得承認這樣的革命已經是「社會革命」運動，我們稱東歐各國、中國、北韓和北越等國家的革命為「社會革命」或「社會主義革命」，正是根據它們的社會財產關係的改變為標準來判斷的。所以我們在這些國家的政綱是「政治革命」

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

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斷言古巴的革命「是一個已把政權從一個階級的這一部份人，轉移到同階級的別一部份人手中的「政治革命」，這和他們所說的「卡斯特羅政權是各種不同的資產階級政權之一」，是同義詞，因而對事實的盲目和理論上的荒謬也是同等的。

至於說「在這種轉移的過程中，工人群眾已獲得若干重要的讓步，不過這種讓步並未超過資本主義統治和剝削的限度」。所說「讓步」無疑是指「過去二至三年內所已經發生的經濟上和社會上的變革」。即資產階級的財產（工廠、礦山、運輸工具和銀行等）已被沒收歸國有。像這樣的財產國有化，或「工人群眾所獲得的重要讓步」，並未「超出資本主義統治和剝削的限度」，我們不知道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在這裏所謂的「資本主義統治和剝削」是甚麼意思。難道資本家的財產——生產手段——不是它們統治和剝削的物質基礎嗎？！難道剝奪他們這種「物質基礎」歸國有之後，資本家們還能照舊「統治和剝削」工人階級嗎？！讓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答覆這些問題吧。

社會主義勞工聯盟領袖們竭盡全力否認古巴革命已由民主革命進到社會主義革命，否認古巴革命發展的不斷過程，其主要目的在指斥社會主義工人黨已承認「古巴提供了不斷革命論之正確性上的一個新鮮證驗」。但我在前面所舉出的事實和理論的論據已足夠證明：不管古巴革命還含有如何的缺點，它已由民主革命不斷地發展到了社會主義，是不可爭論的事實，這便在客觀上「證實了不斷革命論的正確性」。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不顧一切地否認這一點，這便表明，他們如果不是「孩子氣」，至少對於不斷革命論還是一個門外漢。

不斷革命論，依照托洛茨基的解釋，「首先包括有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在內。這確實是這個理論的歷史起源」。（見《不斷革命論》引言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俄文本第一版）古巴革命發展的事實，已經無可爭論地證明它從初期的民主革命「過渡」到了社會主義的革命。這個「過渡的決定點」是一九六〇年八月至十月間古巴一切主要工業的國有化。由於這種工業的國有化，這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結構便已從根本上改變過來了。但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為否認這個社會經濟結構的根本改變的事實，便最後求援於托洛茨基，因而引證他的下面一段話來作盾牌：

「儘管在各個單獨國家裏可能採取了怎樣一種初步插話性的革命步伐，工農革命同盟的實現，總只能體現於無產階級先鋒隊，亦即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之下。換言之，民主革命的勝利，只有經由無產階級以其與農民聯盟為基礎的專政制度，並首先解決了民主「革命的任務，才是可以設想的事」。（見《被背叛了的托洛茨基主義》第十五頁的引證）

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從上面的引證中不作任何考慮即立刻作出結論說：「這樣的古巴革命在事實上只是不斷革命的否定。那裏的工人階級並不能領導農民摧毀了資產階級的政權，相反，倒是資產階級以其自己滿意的方式，插足其間解決了民主革命的問題。」但他們在這個得意忘形的結論中，卻完全沒有注意到在南斯拉夫和中國所「發生的事變」，在那裏不但「資產階級政權」「已被摧毀」，而且「民主革命的任務」（民族獨立和土地問題）也「已解決」。但這顯然不是經由無產階級以其與農民聯盟為基礎的「專政制度」。因為這兩個國家直到今天還沒有成立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制度」，這是社會主義勞工聯盟所承認的。面對著這樣的事實，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怎樣解釋呢？是否南斯拉夫

和中國的情況都是「資產階級插足期間解決了民主革命問題」？假如他們是肯定地答覆這個問題，像他們肯定地說古巴的情形一樣，那就等於承認已經「解決民主革命問題」的南共和中共都是代表資產階級的黨，南斯拉夫和中國直到今天還沒有達到社會主義的階段，還停留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範圍內。這樣，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便要從根推翻他們以前對南斯拉夫和中國的革命性質和國家性質的評價了！

當托洛茨基開始和盤納姆（BUMHAM）及夏克曼（SHACHTOMON）等爭論蘇聯國家的性質問題時，曾教訓他們說：「在討論蘇聯的社會性質問題上，錯誤的產生……乃由於以綱領式的標準來代替歷史的事實，由於把標準脫離了具體的事實」（見《保衛馬克思主義》第三頁，著重線本文作者所加）。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不瞭解，他們上面所引證的托洛茨基的話正是「一種綱領式的標準」，但活的事變往往不是完全依照「綱領式的標準」進行，有時候是或多或少歪曲它，甚至違反它的，特別在某種特殊的情況下是如此。南斯拉夫和中國所發生的事變，便是大大地歪曲了托洛茨基的「綱領式的標準」的顯例。古巴的革命，雖然和南斯拉夫及中國的有許多不同，但沒有完全依照「綱領式的標準」進行，是相類似的。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在古巴革命的一系列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恰好是「由於以綱領式的標準來代替歷史的事實，由於把標準脫離了具體的事實」。

古巴革命，雖然不是「在無產階級先鋒隊，亦即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之下」，因而在革命的過程中沒有能及時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但確已「摧毀了資產階級的政權」，在基本上「解決了」「民主革命問題」並進而實行了社會主義的措施。這是「歷史事實」。單拿「綱領式的標準」來否認這種「歷史事實」，不但無用，而且不可避免地要犯嚴重的「錯誤」，在實

際的政策上招致可怕的災禍。馬克思主義者和小資產階級的教派主義者的根本不同之點，首先在於面對著「歷史事實」或「具體事實」正確地分析它和理解它。如果發現「歷史事實」和「綱領式標準」之間存在著矛盾，或前者不會依照後者進行時，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便是進而研究和解釋它，以便找出其原因而獲得教訓。但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恰在這方面表現出完全無能，他們只會抓住「標準」或「教條」來否認「歷史事實」。

就古巴革命的特殊情況說，主要是那裏沒有「一個無產階級先鋒隊，亦即共產黨的政治領導」，革命的發動和推進都是在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激進民主集團——七月二十六日運動——的領導之下進行的，因而不可能在革命過程中及時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因為這個集團最初所懷抱的政綱乃是基於民主主義的觀念，甚至人道主義的觀點，根本不會想到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或不斷革命的「綱領標準」，但由於這個革命集團的領導者們的特別年輕，富於革命熱誠、勇氣和進取精神，尤其是因為他們沒有社會民主黨人那種牢不可破的改良主義傳統，更沒有史大林黨那種頑梗不化的「革命階段論」的成見。因而當他們推翻巴蒂斯塔（這也是由於這個政權的過份腐朽）之後，在新興的工農群眾的急切的革命要求的壓力和美帝國主義的嚴重威脅之下，在戰後蘇聯勢力的驚人膨脹和東歐各國，特別是中國等工人國家的興起的巨大影響之下，他們便逐步地（經驗主義地）放棄了原來的民主主義的幻想，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不但排除了資產階級的代表於新政權之外，成立了工農政府，贏得了民族獨立，解決了土地問題，並進而實行社會主義的措施。就這樣，他們把古巴的革命推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這雖然不完全符合於不斷革命論的「綱領式的標準」，但確是追隨著革命不斷發展的客觀邏

輯進行的。這是「歷史事實」。

當然，我們解釋古巴革命中所包含的「歷史事實」和「綱領式標準」中間的矛盾或缺點，並不是一般地否認不斷革命的「綱領式的標準」。相反，而是要運用這個「綱領式標準」來解除矛盾或缺點。例如，我們看到七月二十六日運動的領導層，在革命過程中由民主主義的立場而轉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給革命的推進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但同時由於它缺乏布爾什維主義的傳統，不很瞭解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的內容及其對社會主義事業的決定性，所以我們曾提出建立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黨來改造它，我們看到那裏的工農政府不是由工農的民主方法產生，我們曾主張召集工、農、兵代表會議或蘇維埃來改組它，以此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政制——無產階級專政。最後，我們認為古巴革命的徹底完成，必須把這個革命擴展到國外去，首先是擴展到拉丁美洲各國去。爲了這一目的，我們主張拉丁美洲的一切托洛茨基主義者儘快團結起來，以實際的行動支援古巴革命。（見社會主義工人黨對古巴革命所發表的一系列的文件和我的關於古巴革命和托洛茨基主義者任務的決議草案）。

但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以其特有的主觀主義否認古巴革命已進到「社會革命」，否認古巴工人國家的性質，斷言「卡斯特羅政權是各種不同的資產階級政權之一」之後，他們提出什麼政策來推進古巴革命呢？換句話說，他們提出甚麼社會主義的政綱來進行他們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沒有，也絕對提不出來。因而他們除了在宣傳上詛咒卡斯特羅政府，詆毀古巴革命的成果，在實際上對這個革命怠工外，再不能起任何積極的作用。

說到這裏，也許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要起而抗議辯說：「我們不是主張古巴建立馬克思主義黨來推進那裏的革

命」嗎？是的，他們在他們的文件中作了如下的宣言：

「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為建立一個以工人階級為基礎，並從馬克思主義武庫中，取其最優良和最新的武器而武裝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而鬥爭……同時也表示從史大林主義和卡斯特羅主義的官僚混合體中，求取組織上和政治上的完全獨立。這個混合體的名稱，就叫做統一革命黨。……（見《被背叛了的托洛茨基主義》第十五頁）

上面這個「建立一個以工人階級為基礎，並從馬克思主義武庫中，取其最優良和最新的武器而武裝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宣言，也許會引起某些「幼稚的左派份子」的喝彩。但我要提醒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注意：他們在古巴革命一系列的基本問題上所表示的意見，都是根本違背馬克思主義的極陳腐的修正主義和不可救藥的教派主義的混合物。假如他們拿這種修正主義和不可救藥的教派主義，到古巴去宣傳「建立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政黨」，除了招致災禍外，再不能有什麼。而在實際上，這只是說空話。因為他們既已宣告「統一革命黨」為「史大林主義和卡斯特羅主義的混合體」，當然不會參加到它裏面去活動。另一方面，他們認為現時存在於古巴的那個托派組織（POR）是巴布洛派，他們宣稱在政治原則上和這個托派組織有不可調和的分歧，當然不會和它合作。這樣，他們在古巴「建立馬克思主義黨」，除了從倫敦派人去單獨進行便沒有別的法子了，這不是說空話嗎？！

\*

\*

\*

我在前面從社會主義勞工聯盟領袖們最近發表的文件《被背叛了的托洛茨基主義》中引證有關於古巴國家的性質、卡斯特羅政府和古巴革命的性質等的原文，逐句逐字地

給以分析和批評，以不爭的事實證明他們對事實的完全盲目，以最明顯的論據，甚至是馬克思主義 ABC 的論據，揭露他們對理論的無知或歪曲。由此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出：社會主義勞工聯盟領袖們引以自傲的正確「方法」，原來只是專門否認事實的主觀主義或印象主義；他們自以為高深的「理論」實際上不過是盤納姆 BRUNO R. BURNHOM 和夏克曼 SHOCHTMAN 等修正主義之再版；他們自以為無比正確的建立革命黨的正確路線，實際上只是重復為托洛茨基在《過渡綱領》中批評過的那種不可救藥的教派的立場。假如讓他們拿這種修正主義和教派主義的混合物去宣傳，尤其是在托洛茨基主義的名義下去宣傳，一定使托洛茨基主義的旗幟蒙受難以洗刷的污點。假如讓他們拿這種修正主義和教派主義的路線，通過國際委員會（如現時的情形）去指導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義者而不遭到抵抗，那就不可避免地要招致最嚴重的災禍。所幸者，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對於這種必然招致災禍的路線，已開始提出如下的批評和抗議：

「我們相信國際委員會的意見，即認為古巴不是一個工人國家的意見是錯誤的，這意見不曾考慮到俄國，中國，南斯拉夫，以及其他各國的情形，也不曾計及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傳統，在估計導使革命前進的上層政治結構以外，還須分析清除資本家政權時經濟構造的變化。國際委員會的錯誤，根本上是由於不知道或誤解了自古巴革命發生以來，影響及於拉丁美洲群眾的反應而來的。假使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對古巴問題犯有錯誤，並否認古巴之工人國家的性質，否認消除資本主義之後無產階級所造成的社會主義果實，否認那裏存有反對共產黨教派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鬥爭，甚至否認古巴工農政府為全體拉丁美洲人民而持有的路線的話，我們不妨重覆說一句，如果我們否認這一切的話，那末，拉丁

美洲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無異是迅速地趨於政治上的剖腹自殺。」

上面這些批評和抗議，是從智利的 POR 的兩位領袖，CARLAS HUGEMBEST 和 JOSE VALDES 簽名的文件，「向一九六二年十月末國際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中引出來的，可惜，這個具有最現實和重大意義的文件沒有被國際委員會的十月會議所討論。但 HUGEMBEST 和 VALDES 同志的確是代表拉丁美洲一切托洛茨基主義對國際委員會所通過的關於古巴問題路線（即包含在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世界社會主義展望」中的路線）的嚴厲抗議，同時也是給社會主義勞工聯盟領袖們一個最嚴厲的警告。

### 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在阿爾及利亞鬥爭中所表現的 兩種極端態度——從右傾順應政策到極左教派主義

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在現實政治問題上攻擊社會主義工人黨最為激烈的，除了古巴問題外，便是關於阿爾及利亞問題。例如它在答覆後者文件上說：

「社會主義工人黨對阿爾及利亞鬥爭的態度，尤其它譴責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對民族解放陣線的領導及其與法國帝國主義妥協問題所作的說明上，將可作為一個良好的事例。關於這個問題，應該可以這樣說：社會主義工人黨已把自己處於一個長期歷史行程的末端：這行程開始於孟什維克派，直至中國革命……至於我們曾在過去數年中分析過阿爾及利亞的戰爭和革命之性質，並說明了阿爾及利亞領導的特性。」（見《被背叛了的托洛茨基主義》第七頁）

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在上面這段話裏，公然指責「社會主義工人黨對阿爾及利亞鬥爭的態度」為追隨孟什維克的路線，並誇耀他們自己如何分析在阿爾及利亞戰爭和革

命的性質，並說明了這個「領導的特性」。但完全忘記他們以前的對「阿爾及利亞鬥爭的態度」，恰是一種最壞的「孟什維克路線」。因此我不得不重新引出下面的話來和他們今天的「態度」加以對照：

「在最苛刻的非法條件下從事工作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正進行著一種由工人階級領導的，反帝國主義的堅決鬥爭。這裏值得頌揚的，全世界的被壓迫和被剝削者，可在海奇（海奇是阿爾及利亞民族運動的領袖）的身上體現出這個鬥爭之活生生的象徵。

「這個口號——一個唯一能與民族和社會主義原則相符的口號——要求在阿爾及利亞召開一次享有民族權利的立憲大會」。

上面兩段話係引自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國際委員會會議通過的「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鬥爭團結一致的決議」上。這個決議是白恩斯同志親自參加起草的。他爲了向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表示「團結」，曾親自訪問海奇，並寫了供作爲訪問記發表在《論壇報》上。隨後班達又寫了一篇大文登在《勞工評論》，該文從社會經濟和階級關係各方面分析阿爾及利亞戰爭的原因和遠景，其結論是，在這個戰爭中代表工人階級利益而奮鬥的只有民族解放運動，這便證明國際委員會這個決議的立場主要是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負責的。此外，我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五日曾寫了「關於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鬥爭團結一致的決議之聲明」一文。該文主要是對上指的兩點加以批評。我並要求白恩斯發表我的文件，以便重新討論阿爾及利亞戰爭問題。但我的文件未被發表，這便更加證明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在那時是堅持國際委員會決議案的立場，不容許討論和修改的。事實上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和法國革命領導的組織擁護「海奇」及其黨阿爾及利亞

民族解放運動，直到後者投降法帝國主義爲止。

現在讓我進而討論前面所引兩段話所含的政治意義吧：

A. 斷定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是「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全世界的被壓迫和被剝削者，可在海奇身上體現出這個鬥爭之活生生的象徵」，我們姑且不說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及其領袖海奇後來投降法帝國主義的結果，像這樣的判斷和恭維，即在當時看來也是十分荒謬的。因爲就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的政綱和它在戰爭開始所採取的政策說、都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集團。海奇在他過去及當時所表現的思想和行爲，原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政客。把小資產階級的集團說成爲「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把小資產階級的政策捧成爲「這個鬥爭之活生生的象徵」，試問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這是運用什麼「方法」，根據什麼事實「分析」得出來的結論？難道這就是他們對阿爾及利亞戰爭和革命之性質上的分析，並說明了阿爾及利亞領袖的特性麼？

B. 關於這個口號——唯一能與民主和社會主義原則相符的口號——要求在阿爾及利亞召開一次享有民族主權的立憲大會，「這是把海奇所主張的立憲大會」說成爲「唯一能與民主和社會主義原則相符的口號」。對此，我在我的「聲明」中曾作如下的簡單批評：「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立憲大會屬於資產階級民主的範疇。甚至一個最民主的立憲大會也與社會主義的原則無關。……這個決議把民主的原則和社會主義的原則混同起來了，且拿這些原則來吹捧這個立憲大會。此種理論，只能算作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無共同之點」。現在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強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特別歡喜拿「孟什維克」來指責別人，像他們以前把資產階級性的「立憲大會」附會成爲「社會主義原

則的口號」，又怎樣解釋呢？

C. 事先斷定一個小資產階級的集團（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進行著反帝國主義的堅決鬥爭」，這又是根據什麼理論和事實？難道這也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分析「民族解放運動的特性」而作出來的預測或估計嗎！？把小資產階級的集團說成爲「工人階級領導之下」，「並預先斷定它進行著反帝國主義的堅決鬥爭」，把小資產階級的政客海奇稱譽爲「這個鬥爭的象徵」，把資產階級性的「立憲大會」附會爲「社會主義原則的口號」。所有這些便是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在「阿爾及利亞鬥爭」的第一時期（一九五五——一九五八）中的基本路線，即「孟什維克的路線」。這條路線的破產，在一九五八年海奇及所領導的貝隆尼斯（人名）的游擊隊向法帝國主義的投降中公開發露出來了！

但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在這次可恥的破產中，不但沒有學得任何教訓，直到今天還要替他們自己辯護，並責罵別人。例如他們在答覆我批評他們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時（見我的《關於統一全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提示和建議》），他們除了指責我「只是重覆了巴布洛的污衊和陳說」以外，甚至公然宣稱：「無論那一方，只要他們能同法國作戰，我們都予以有條件的擁護。但若我們認爲必要時，我們要保留以馬克思主義觀點從事批評的權利。」（見「對彭述之同志的答覆」第九頁）這是一個漂亮的立場！但讓我問，他們這個漂亮的立場，發表在什麼地方？所謂「擁護運動的雙方」寫在什麼文件上？寫在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鬥爭團結一致的決議」上嗎？絕對沒有，在這個「決議」裏所寫的僅僅是「頌揚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運動，以及恭維海奇的這個鬥爭的活生生的象徵」。絕對沒有提到「支持」民族解放陣線，正因此，在我的「聲明」中才迫不得已提出我的如

下的立場：

「阿爾及利亞反對法帝國主義的鬥爭，並非是由海奇的黨所單獨領導的，而是由許多各地自動組織起來和自動集合起來的團體所領導的，例如民族解放陣線等。因此，我建議應作如下的修正：我們應與一切群眾團體相團結……與一切實際上在阿爾及利亞從事反對法帝國主義的團體相團結……那就是說：我們不應僅支持一派、例如海奇等，同時卻反對能夠領導群眾，以武裝領導反對法帝國主義的另一派」。

現在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把我在七年前表示的上面的主張：「支持這個運動中的各派」，當作他們的主張，來掩飾他們當時片面支持「海奇一派」以反對民族解放陣線的破產政策，這還不是表示人們在政治上破產後，再用謊言和偽造來掩飾自己嗎？最諷刺的是，在我根據文件和不可爭論的事實批評社會主義勞工聯盟領袖們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所犯的錯誤之後，他們不但不去認識自己的錯誤，反而憑空指責我「簡單地重覆巴布洛的污衊和陳說」。對此，我除了聳肩外再不能說什麼。

此外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又引證約翰·比勒斯貝的阿爾及利亞的《叛亂和革命》一書中對海奇（MELAUGAMASAELE）的描述來替貝隆尼斯的投降作辯護，以及藉恐怖主義來解釋海奇及其黨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的背叛的責任加在他們的政敵身上，並企圖以此推卸自己曾經全力支持這些投降者和背叛的責任，這還不是十足的犬儒主義麼！

事情經過四年之後，就是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所極力推崇和片面支持的 MO-MOLIHADJ 和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投降法帝國主義四年之後，他們看到民族解放陣線在去年三月和法國在伊維安談判停戰協定時便大叫「出賣」，我

們姑且暫時承認這是「出賣」，但他們以前對海奇 MASSALIST 的投降，爲什麼默不作聲呢？！

實際上，伊維安協定絕非「出賣」，而是雙方讓步和妥協的結果：一方面法帝國主義在七年半的征服阿爾及利亞的戰爭中，動員了全國的軍事和財政力量，事實證明它再也不能繼續下去，無法征服民族解放陣線所領導的抗戰，因而不得不承認阿爾及利亞的政治獨立，以便保持它在那裏的經濟權利和軍事根據地；另一方面，民族解放陣線所領導的抗戰，在七年半的搏鬥中，直接間接所遭受的損害已遠超過它的負擔能力，弄得精疲力竭，又因法國共產黨和社會黨的機會主義政策，民族解放陣線得不到在它們控制下法國工人群眾的任何支援；此外，民族解放陣線的臨時政府駐在突尼斯，它的一部份軍隊和軍需供給站又分駐在突尼斯和摩洛哥，當戴高樂政府表示願意和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談判停戰時，突尼斯和摩洛哥當局都給民族解放陣線很大的壓力，促使後者和法國妥協，以便卸去自己的負擔。正是在這種困難的情形下，民族解放陣線的領袖們才在取得政治獨立的條件之下，不得不暫時容忍法國的經濟權利和某些軍事利益繼續保全，而且在簽訂伊維安協定之前，民族解放陣線的領導曾徵詢過它的一切政治和軍事幹部的同意的。正因此，在伊維安協定才簽訂後，民族解放陣線的下層群眾中都沒有有人反對這個協定，假如不是懷著教派主義的成見或「左派共產主義者」的觀點來評斷伊維安協定，不管民族解放陣線的領袖們有如何的缺點，或在抗戰中犯了任何錯誤，我們絕不能說這是他們的「出賣」，只能說這是一種「妥協」，一種迫不得已的妥協。像這類的妥協條約就是最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黨，有時也不得不接受。例如，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也曾和德帝國主義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如果拿布列斯特和約同伊維安協定比起來，

前者比之後者所作的讓步更多得多。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能認為布列斯特和約也是「出賣」嗎？列寧曾教訓那些絕不妥協的「左派共產黨人」說：「在原則上拒絕妥協，拒絕允許一般性的妥協而不問其性質如何，那只是一種難以認真考慮的孩子氣而已。」（見列寧選集第二卷第二篇五八四頁、一九五二年莫斯科版）。

所以問題不在於否認妥協，更不應把不得已的妥協說成爲「出賣」，而在於指出這個妥協所包含的矛盾及解除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從這個妥協中，阿爾及利亞已獲得政治上的獨立，這是阿爾及利亞人民在七年半的血戰中爭取的重大收穫，是巨大犧牲的代價，值得特別珍視的；另一方面，這個妥協容忍法帝國主義保持它在阿爾及利亞的經濟權利及一部份軍事利益，這對於阿爾及利亞的政治獨立是一種嚴重的威脅。如不取消法國經濟權利和軍事利益，阿爾及利亞的政治獨立是沒有保障的。爲了解除上面這種矛盾，阿爾及利亞的一切革命者必須團結起來，以現時已經獲得的政治獨立爲基點，製定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政綱，再進而動員工人群眾及一切貧苦的農民繼續進行鬥爭，爲撤退法國駐軍和取消它的經濟特權而鬥爭，爲徹底解決土地問題和實現產業國有化而鬥爭，爲爭取工農的民主權利，和建立工農兵委員會和工農政府而鬥爭，以此把阿爾及利亞推上社會主義的道路——這便是我們對阿爾及利亞所應採取的路線，並以此爲批評本·貝拉政府一切措施的標準，和鼓勵一切革命者去形成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黨，繼續進行鬥爭的方針。

但社會主義勞工聯盟領袖們把不得已的「妥協」說成爲「出賣」，把已經獲得的具有重大意義的政治獨立說成爲毫無意義，這便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的現實主義的立場，而陷於極左的，甚至是孩子氣的教派主義的泥潭。因而他們除了對民

族解放陣線的領袖們作一些消極的攻擊之外，再不能為阿爾及利亞的革命提出繼續鬥爭的綱領，正同他們對古巴革命，除了否認古巴國家為工人國家，指責卡斯特羅政權為資產階級的政權之外，提不出積極的主張，其錯誤是相類的。

社會主義工人黨不承認伊維安協定為「出賣」，並提出阿爾及利亞從這個協定中得到政治獨立的重要性，這正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現實主義的觀點得出的結論。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在這一點上來指責社會主義工人黨，恰好又一次反映它的教派主義的立場。

至於社會主義工人黨說：阿爾及利亞的第一步是鞏固與獨立，其次必須把阿爾及利亞轉變為社會主義的國家，這和社會主義勞工聯盟所指斥的「史大林主義中落後國家革命的兩個階段論」毫無關係。因為這是就簽訂伊維安協定所發生的實際情形所提出的立場，這就是說，既已取得政治獨立，首先便須保衛和鞏固這個獨立以便進一步，而且必須進一步走上社會主義改革的道路。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在這裏大談不斷革命，不過又是暴露他們以「綱領性的規範」去代替「具體的事實」而已。

如果把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以前對阿爾及利亞民族運動的「態度」和現在對民族解放陣線的「態度」加以對照，人們便可以清楚地看出：這是兩種極端。這就是說，他們以前對小資產階級政黨的極右的順應態度，遭到破產後，即轉到極左的教派主義的態度了。他們這種從極右向極左的跳躍，恰好說明他們近年來的政治演化過程，這種演化過程同樣表現在他們對工黨的滲入政策上。在貝萬轉到右派以前，他們差不多把全部希望放在貝萬身上。那時（一個長時期）他們對於他的頌揚、順應和幻想，遠遠超過了對海奇的态度。結果貝萬不顧他們的頌揚和順應，依照他自己的道路

轉到蓋斯基爾一方面去了。從此他們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轉到極左的教派主義的立場——這便是社會主義勞工聯盟今天在英國工人運動中的立場。我這裏因為篇幅有限，不擬詳細批評它從極右到極左的這種轉變過程，但我必須指出：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現行的教派主義政策，對於他們的運動是很危險的，如不及時改正，不可避免地要招致災禍。

### 巴布洛主義的演化與 社會主義勞工聯盟領袖們反巴布洛主義的鬥爭

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爲了堅決地反對統一，早在一九五七年便發明了一個論據：「巴布洛修正主義和我們之間的分歧，正在愈來愈大」。現在他們把這個論據稍加修改說：「不管巴布洛是怎樣，它已在理論上愈來愈橫逆，而在組織上愈來愈官僚化。」（見《被背叛了的托洛茨基主義》第十七頁）由於社會主義工人黨堅持統一，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便進而指斥前者說：「社會主義工人黨已定下了一個虛偽的路線，並正在無可奈何地陷落於巴布洛思想的泥坑中。」跟著，他們宣稱：「我們建議，我們要像過去一樣的一貫作風，繼續與巴布洛作戰」。如依照社會主義勞工聯盟領袖們上面的說話，人們可以得出如下三個結論：

1. 巴布洛主義的演化是愈來愈離開「我們」。這樣，當然談不到任何統一。
2. 社會主義工人黨已投降，或至少「正在無可奈何地陷落於巴布洛思想的泥坑」。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爲了繼續反對巴布洛主義，因而必須反對社會主義工人黨。
3. 巴布洛主義既未改變，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在過去又是一貫地反對過巴布洛主義的，所以他們現在有資格

主張「繼續與巴布洛主義作戰」。

首先，讓我提醒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巴布洛主義和其他一切類似的思想流派（CURRENT）一樣，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有它自己的發生、發展和沒落的過程。尤其是當一種錯誤的思想（如機會主義或教派主義之類）遭到強力的攻擊和事變的否定時，不可避免地要趨於沒落。巴布洛主義正是如此。

爲了清楚地指出巴布洛主義的演化過程和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在過去反巴布洛主義的鬥爭中究竟起過什麼作用，或是否一貫地反對過巴布洛主義，這裏讓我們把它們分作三個時期來加以論敘：

### 第一時期——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三年十一月

這一時期可說是巴布洛主義逐步發展的時期。巴布洛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親史大林主義的傾向，（與夏克曼等的仇史大林主義傾向相反。）它發生的客觀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史大林主義勢力的驚人擴展，和蘇聯成爲世界第二強國，東歐各國轉變爲變態的工人國家，尤其是南斯拉夫和中國革命的勝利以及西歐法意等國共產黨的生長等等。巴布洛在一九四九年十月發表的《幾世紀的變態工人國家》（《關於南斯拉夫的性質》）正是前面這種客觀情形的反映。他在一九五一年初發表《我們到何處去？》（一九五一年二至四月國際季報）當這篇文章遭到比利布勞的攻擊時，他於同年六月又發表《關於自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之轉變的時期及其性質》（見一九五一年六月份《國際消息公報》）。這兩篇文章都是對《幾世紀的變態工人國家》作進一步的發揮。這是巴布洛主義的「理論基礎」。根據這個理論，巴布洛提出了滲入政策，他首先企圖把這個政策在法國實行。因而命令國際主義共產黨加入法

國共產黨。因此他遭到了以比利布勞爲首的多數派的反對。

巴布洛的滲入政策，實際上包含了 he 後來所發揮的蘇聯官僚可以自我改良，各國共產黨在群眾壓力之下可以走上革命的道路，以及拋棄《過渡綱領》等觀念的因素或種子。這從他一九五二年一月參加國際主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滲入政策時所發表的如下意見表現出來：「今天的史大林主義運動，在冷戰的影響下，以及在可能與帝國主義作決定性戰爭的情形下，正客觀地處於各種新的情況中，是不得不有所行動的。事實上，他們已在行動。關於史大林主義者目前的作爲，是誰也無法予以辯護的。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七年間，他們曾有過一個和平共存時期的幻想。我們將同那些瞭解這點，並且願意把那個在一個完全不同時期中所寫的《過渡綱領》放在一邊的同志們，進行討論」。（見 LA VERIDE 一九五二年一月號）巴布洛上面這種露骨的修正主義的思想，立即遭到了法國多數派的激烈反對，巴布洛即在這次會議上假借國際書記處的名義停止了多數派十六名中央委員的職權，這就公開爆發了巴布洛和法國黨多數派間的鬥爭，以致後者被排除於運動之外。

巴布洛的修正主義的進一步的發展，是在史大林死後，表現在他們的《史大林死後的新路線》中。這篇文章列舉了馬林可夫所施行的各種「讓步」之後，得出結論說：「一旦這種讓步擴大了，則走向史大林主義之真正清算的行程，就會成爲無可抵抗的。」（《第四國際》一九五三年三、四月號）這已明顯說出蘇聯史大林主義的政制將通過「讓步」而肅清。

巴布洛的修正主義的思想比較有系統和更明顯的發揮，是在《史大林主義的興衰》的草案中。這個草案敘述形成史大林主義的客觀原因在戰後消失之後，得出兩個主要的結論：

1. 「蘇聯的官僚們當處身於帝國主義威脅和殖民地革命

的環境之中時，發現自己必須與世界革命站在一起，以反對帝國主義。

2. 「在共產黨構成工人階級之多數的國家裏，他們能夠在群眾的壓迫下，被導引著走向一個革命的方向……」前一結論是肯定蘇聯官僚將放棄以前的反動政策而轉到領導世界革命的政策，後一結論則斷定各國共產黨在群眾壓力之下可以走上革命的道路。

國際書記處在一九五三年六月東德暴動和同年八月法國總罷工所採取的立場，正是巴布洛的修正主義在實踐上的第一次露骨的表現。

至巴布洛在這一時期內所實行的官僚主義方法，最顯著的表現在下列的事實中：他假借國際書記處的名義擅自停止法國黨多數派十六名中委的職權，隨後又以權術排除他們，隱藏紐西蘭支部對第三次世界大會決議的修正文件；禁止法國多數派批評第三次世界大會決議和我批評「第三次中國革命草案」的文件；以非常手段停止紐西蘭代表 M·和我出席國際書記處會議；以及在幕後指使柯克林派反對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導等等。

對上面的巴布洛的修正主義思想的發展和他在組織上的官僚主義的措施，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組織者和主要的領導者，白恩斯同志，在當時採取什麼立場？「他曾經反對過巴布洛主義麼？」不幸，事實恰相反。無論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白恩斯都是堅決地支持巴布洛的。最不可爭論的事實是：當我在一九五二年二月國際書記處擴大會議上指責巴布洛擅自停止法國黨多數派十六名中委職權是違反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傳統時，格爾曼、德國的 U 和義大利的 L 都同意我的指責。但白恩斯卻起而堅決地支持巴布洛的官僚主義措施。在這次會議後，國際執委會的委員和法國黨全體中委的聯席會議上

辯論多數派的問題時，白恩斯又站在巴布洛的政治立場上（即滲入政策）最激烈地打擊了多數派。由此充分證明：白恩斯同志那時對巴布洛修正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態度，和現在社會主義勞工聯盟領導人宣傳的，他們「過去曾一貫地反對過巴布洛主義」是如何地相反！

在中國問題上（這是我當時和巴布洛修正主義思想直接衝突的問題），白恩斯同志也是完全站在巴布洛方面。當一九五二年五月的國際執委員會議討論格爾曼在巴布洛主義下起草的《第三次中國革命》的草案時，白恩斯除了表示贊成「格爾曼」的草案外，並宣稱「這並不是毛澤東的政策，或其思想觀點的勝利，相反，乃是我們的運動開始以來，我們所主張的前景及其戰略思想的勝利。」（見一九五二年十月份的《國際資料公報》第三十三頁，劃線作者所加。）如果現在人們把白恩斯當時中國問題的講話和現在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對古巴問題所發表的意見加以對照，會是很有趣的！

此外，有一件事值得指出：當我在第三次世界大會的遠東委員會上報告中國問題被國際書記處的代表 A·中途停止我的報告，因而我向國際書記處抗議時，白恩斯代表巴布洛來向我解釋。他在解釋中，除了把責任推給 ALI 外，並對我說：「巴布洛是我的密友。他有著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天才，而且能夠接受別人的意見，希望你能參加國際書記處與他合作」。（上面這些話係根據我當時的記錄）從白恩斯這種對巴布洛的極高評價以及他和後者的親密友誼關係，更可以看出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在當時支持巴布洛的修正主義思想和官僚主義措施，絕不是偶然的。

不錯，在一九五三年五月的國際執委會會議上，白恩斯對巴布洛的政治決議《蘇聯發展的新階段與第四國際的任務》曾表示一些不同意見。他甚至警告說：由於南斯拉夫事件作

了過份樂觀的估計，以致無法充分把握這一事件的意義，我們應由此獲得教訓。但他這次提出警告，顯然是受了當時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反對巴布洛主義的影響，（因那時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內部反對巴布洛的擁護者柯克林派的鬥爭已達到最激烈的程度。）也就正因為此，巴布洛指使羅蘭斯在美國組織內開始進行反白恩斯的鬥爭。白恩斯在那次國際執委會全會上第一次對巴布洛的思想表示不同意見，也許是他和巴布洛破裂的起點，以及往後他站在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方面反對後者的根源。

### 第二時期——一九五三年末至一九五六年末

這一時期是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領導反對巴布洛主義鬥爭的時期，同時也是巴布洛主義遭到激烈的攻擊而趨於分化和沒落的時期。

巴布洛的修正主義和官僚主義，在前一時期內已經發揮得很明顯；他以「幾世紀的變態工人國家」的「理論」根本否定了用革命方法改造史大林主義官僚統治的蘇聯和東歐各國的可能性。他斷定蘇聯官僚可以自我改良或自我改正，各國共產黨在群眾的壓力之下可以領導群眾走上奪取政權的道路，因而根本否定蘇聯集團內的政治革命和在各國建立托洛茨基主義的革命黨之必要。如果依照這種修正主義觀念的邏輯發展，必然要走到取消托洛茨基主義運動而向史大林主義投降。巴布洛的官僚主義表現在他企圖建立史大林式的國際領導，操縱各國的運動。爲了這一目的，他任意壓制不同意見，排除異己（包括組織和個人），並在各國支部內建立自己的小組織，企圖以此奪取各支部的領導權。這種奪取領導權的企圖，巴布洛通過柯克林在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內所進行的鬥爭，到一九五三年秋已達到破裂的臨界點。前面這一切

情況明顯地表示出，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已遭到一個空前的最嚴重的威脅。面對著這一威脅，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不得不起而鬥爭，這便是它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所以發表《致全世界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公開信》和《反對巴布洛修正主義》的原因！

上面這兩個文件的內容已為大家所知道，我這裏無須重說。我僅僅指出一點：它們根據巴布洛在文件上（特別是《史大林主義的興衰》的草案上）（如對東德暴動及法國大罷工）所發表的修正主義思想和在實際上對史大林主義所表現的妥協行爲，以及在組織上表現的官僚主義方法，作了有系統的暴露和深刻的批評。這便掀起了一個世界規模的反巴布洛主義運動，雖然這個運動導致了組織上的不幸分裂（這個分裂，原來可以避免的，關於這點，我在我的《有關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統一問題的意見和建議》中已指出過。）但給了巴布洛主義以致命的打擊，在政治上挽救了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危機。

巴布洛主義在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致命打擊之下，國際書記處各支部內立刻發生了激烈反應和分化。首先是錫蘭的黨於一九五四年四月發表關於《史大林主義的興衰》這個問題的決議和修正。這個文件，實際上是表示錫蘭黨對於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批評巴布洛的修正主義思想之最有力的回聲。它在討論巴布洛的修正主義的三個要點之後，得出結論說：「上面所討論的三點，是有其邏輯上的連繫的。當我們把它們綜合起來看時，就可以看出下述一個基本的思想，那就是說：在此世界革命的泛濫期內，蘇聯官僚與帝國主義的長期妥協是不可能的；同時，就各個群眾性共產黨之史大林主義的領導說，這些官僚也將會在群眾的壓力下趨向於革命的道路。這種思想不但導致對托洛茨基主義關於史大林主義的

立場之基本修正，而且否認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繼續獨立存在的一切理由。」（見一九五四年四月份錫蘭黨的內部公報第七頁）

雖然錫蘭黨這個結論是從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反巴布洛修正主義」中申引出來的，但由於錫蘭黨的文件從國際書記處內部發出，便特別顯得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抨擊巴布洛的修正主義的正當，因而在國際書記處支配下的各支部內發生巨大的影響。

另一方面，巴布洛思想的密切合作者和積極支持者，在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激烈攻擊之下，便更進而按照巴布洛的修正主義的邏輯，發展到它的最後結論，這就是美國的柯克林派在一九五四年四月發表的「我們的方向」。這個文件公開地宣稱：「現在的事實是：我們的整個傳統（按即托洛茨基主義傳統）……對現在的勞工運動並無益處，因為這個傳統大體上產生自勞工運動以外，而且對勞工運動是陌生的。從事運動的人看不見或竟不相信，這個傳統的任何東西能適合於解決他們的問題，……從而應該從這裏得出應有的教訓。」什麼教訓呢？那就是說：「目前這種國際革命的陣營，必會引致我們得出結論，認定明天的革命黨，將不會是我們運動中傳統上所認定的那種托洛茨基主義的政黨」。因此，柯克林派主張拋棄托洛茨基主義的全部傳統，不要提及托洛茨基的名字和其著作，也不要提及第四國際的名義及其存在。應該「把我們自己合併在現在的運動中。」（以上引句均為全國委員會所通過的決議草案，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如果我們把錫蘭黨批評巴布洛的修正主義思想的結論，和柯克林所發揮的同一修正主義思想得出的結論加以對照，便可以看出：後者恰是前者的預斷。同時表明錫蘭黨和柯克林派在國際書記處內部代表著兩個不可調和的極端。這兩種

極端相反的傾向不可避免地要發生不可調和的衝突。這個衝突，在國際書記處召開的一九五四年六月會議上公開爆發出來了。柯克林派的代言人克拉克在這次會議上公然提議取消各國的托洛茨基主義的組織，一切托洛茨基主義者都得加入群眾的黨，如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等。即第四國際的總部亦須取消，僅保留一個「理論機關報」。克拉克這個徹頭徹尾的取消主義的提議，除了羅蘭士、梅士特列和加拿大的一個代表完全贊同之外，以錫蘭代表為首的其他一切代表都憤怒地表示堅決反對，甚至巴布洛本人亦被迫起而反對他以前的思想合作者和積極的支持者——克拉克、羅蘭士和梅士特列。經過一場激烈的爭論之後，絕大多數的代表一致採取錫蘭黨代表的意見，修改了原來以巴布洛的修正主義思想為基礎的《史大林主義的興衰》草案。這便第一次表明；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所發動的反巴布洛主義運動，不但團結了一部份托洛茨基主義者圍繞於國際委員會的周圍，而且在國際書記處各支部內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引起了深刻的分化，終於使那些曾經多少受過巴布洛的修正主義思想影響或混亂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在基本原則上，即在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批評巴布洛的《史大林主義的興衰》草案所指出的原則上，回到托洛茨基的立場。另一方面，克拉克、羅蘭士和梅士特列等帶著他們所發揮和擁護的巴布洛主義的最後結論——徹底的取消主義，公開脫離了托洛茨基主義運動而投降了史大林主義。這便標誌著我們反對巴布洛主義的運動，在政治上已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同時表明巴布洛主義，在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和錫蘭黨的內外夾攻之下，不可挽回地走上沒落的道路。這就為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重新團結，打下了政治基礎。

一九五六年十月至十一月匈牙利革命的爆發，以及蘇聯史大林主義官僚對這次革命的殘暴鎮壓——這個巨大的歷史

事變，以無可爭論的鐵的事實，暴露了巴布洛的蘇聯官僚可以自我改良的修正主義的謬論，因而國際書記處對匈牙利革命所發表的宣言，不管它裏面還包含著某些模糊的觀念，但它已明白地肯定工人群眾推翻官僚統治的必然性，這便在基本上恢復托洛茨基主義的傳統立場，如果把這個宣言和以前對東德暴動的宣言加以對照，更顯得國際書記處在政治的實踐上脫離了巴布洛的修正主義。假如人民要說，經過匈牙利革命的教訓之後，國際書記處及其所屬支部內還有什麼巴布洛主義的思想，那只能說僅是一些殘餘而已。

在這一時期的反巴布洛主義的鬥爭過程中，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究竟起過什麼作用呢？如果就反巴布洛主義的思想方面說，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因為在這整個的反巴布洛主義運動中，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沒有寫過一個批評巴布洛修正主義思想或暴露他的官僚方法的文件。至少在國際方面沒有發表過這類的文件。他們反巴布洛主義的鬥爭，僅僅限於在英國和羅蘭士派的鬥爭。而且這種鬥爭主要是在組織方面，在爭奪機關報《社會主義前瞻報》方面，因此，我可以說在這時期內反對巴布洛主義的鬥爭中，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所起的作用，與其說是思想方面的，倒不如說是組織性的。現在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特別自誇他們的「理論」和「方法」，但異常不幸，在真正反對巴布洛主義的火熱鬥爭中，他們在這些方面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文件說：「不管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現在對一九五四年事件如何估計，但他們已發現自己必須同國際委員會的其他支部一起，分發彭述之一九五五年所寫反對巴布洛主義的文件。這個文件對巴布洛主義的批評，恰同一九五三年的公開信一樣地嚴重」（見《被背叛了的托洛茨

基主義》第十八至十九頁)。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在上面這段話裏企圖引證我一九五五年批評巴布洛主義的文件來證明「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現在對一九五四年事件的估計」是錯誤的。實際上，我在一九五五年寫的《檢討巴布洛主義》，其主要目的，並不在繼續公開反對巴布洛主義的鬥爭，而是爲了統一。所以我在這個文件開頭便說：「在我們開始我們現時的統一運動以前，爲要在傳統的托洛茨基主義之鞏固的思想基礎上來統一我們的國際運動，我們必須要對這個問題作一次完全而徹底的檢討和澄清」。我那時主張重新統一，差不多和現在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估計」一樣，認爲克拉克、羅蘭士和梅士特列在國際書記處的一九五四年六月會議上和錫蘭黨的代表所領導的絕大多數代表公開破裂而脫離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之後，已替「重新統一」奠定了一個基礎。所以我在這個文件著重的特別批評巴布洛主義的「理論」「幾世紀的變態工人國家」，並解釋「巴布洛主義的起源和其後果」，以及克拉克等的「最後的發展」，這正是試圖「爲要在傳統的托洛茨基主義之鞏固的思想基礎上，來統一我們的國際運動」，爲巴布洛主義的問題，作一次完全而徹底的「檢討和澄清」。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直到今天還不懂得一九五四年國際書記處內所發生的「事件」和我寫「檢討巴布洛主義」正是爲了統一，這證明他們的主觀主義是不顧任何事變的發展和別人的意向的。

### 第三時期——一九五七年至現在

這一時期是巴布洛主義在國際書記處內趨向完全解體，社會主義勞工聯盟起而反對巴布洛主義的時期。我在前面已經指出過，自匈牙利革命後，國際書記處在基本上已回復到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這從國際書記處一九五七年十月「第

五次大會」所通過的《史大林主義的衰落》的決議案中明白地表現了出來。不管這個決議案還包含著某些缺點、模糊乃至錯誤的觀念，但在關於蘇聯官僚的性質和政治革命的基本問題上，已完全脫離了巴布洛的修正主義而恢復了托洛茨基主義的傳統立場。例如該決議案說：

「我們認為克里姆林宮的新路線，不是官僚們自我改良的運動，而是他們的自保運動。這個新路線的客觀作用，必會促進，甚至加速群眾運動的覺醒，尤其當這條路線在官僚層內部產生了由上至下的分裂之時，我們認為它不僅不能取代群眾反官僚的政治革命，而且還是這個革命的準備階段。」（見一九五八年冬季號《第四國際》五十六頁）

上述的引證表明了國際書記處業已解脫了巴布洛修正主義的中心思想，換言之，亦即巴布洛所說，蘇聯官僚可以在新路線下自我改良的思想。（見巴布洛《戰後史大林主義的新路線》）這也正是一九五七年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和我們主張國際委員會和國際書記處各支部謀取統一的政治前提。

一九六一年一月國際書記處的「第六次大會」通過的《史大林主義的危機》比之《史大林主義的衰落》更清楚而確定地表明了托洛茨基主義的傳統思想。這個決議案在批評赫魯曉夫對內的「改革」和對外的「和平共存」、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經由議會到達社會主義的和平道路」等等政策之後，作出結論說：「因此，史大林主義的矛盾，竟已到了一種政治成熟的程度。這程度顯然有利於以具體的詞句，來提出政治革命和復興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以及群眾性的國際革命的新領導問題。（見一九六〇——六一年冬季號「第四國際」第五十四頁）因此這個決議案主張：提出我們的觀念，在工人國家內部加速形成第四國際的支部，形成群眾性的革命政黨，以準備工人國家內的政治革命，和恢復群眾運動的

革命領導。(見上書第五十七頁)

### 是繼續分裂還是重新統一？

我在本文開始時曾指出：以白恩斯為首的的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其傾向是藉助於他們所能找到的任何藉口，藉助於他們所能運用的任何手段，來拒絕和妨礙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統一，完全漠視整個運動的利益。這種「傾向」在上半年來，即在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接受建立平權委員會進行統一談判以來，表現得更為清楚而堅決。

首先，看到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有關第四國際及其其次一步驟的問題》，表示決心促進統一時，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立刻宣稱：「社會主義勞工聯盟不準備與這種修正主義的路綫同行一步，並將奮鬥到底」(見《被背叛了的托洛茨基主義》第二頁)。「在美國本身革命政黨的構造上，擊敗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導層的機會主義，其需要程度是極端迫切的」。上面這個宣告，不但表示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絕對拒絕和國際書記處各支部統一，而且要「擊敗」主張統一的「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導」。既然如此，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為什麼還參加談判統一的平權委員會呢？底下就是他們對這個問題的宣告：

「在世界運動內部擊敗巴布洛的修正主義，乃是建立一個國際在為巴布洛主義所控制的民主集中機構之基本條件，我們不願抑制國際組織中的少數派權利。自一九五三年以來，分歧已經愈來愈大，我們將要利用這個討論來證明這一點」。(見「對於社會主義工人黨全國執行委員會所起草的國際執委會第二十三次全體會議宣言的批評」。)

從下面這個宣告中，人們可以看出底下的兩個要點：

A，社會主義勞工聯盟領袖們參加統一委員會的唯一目

的是：「利用這個討論，以證明」「一九五三年以來愈來愈大的分歧」。這就是說，他們企圖「利用」談判統一的平權委員會來「證明」統一的不可能，也就是企圖把進行統一的平權委員會變成破壞統一的工具！

B，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為不願「在為巴布洛主義所控制的國際組織中少數派的權利」，這表明：一方面，他們並不相信自己意見的正確足以「擊敗巴布洛主義」，否則，為什麼不利用「國際組織中的少數派權利」爭取大多數的同志呢？另一方面，他們所謂「一個國際民主集中機構的建立」，只是為自己的派系永遠居多數，以便操縱這個「機械」，否則就不加入它。因為他們「不願居於少數派的權利」啊！！

從前面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表示絕對不願意和國際書記處各支部統一，並準備和一切主張統一的組織或個人破裂，首先是準備和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破裂，並「擊敗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導」。那麼，他們的基本目標究竟是什麼？那就是：維持自一九五三年以來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分裂現狀，首先是維持國際委員會的現狀和白恩斯在國際委員會的書記地位，以便控制國際委員會，XXX 並通過它自由地推行他們近一年來所發展和堅持的極端教派主義的路線——這就是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還強調的「第四國際的改組」或「國際民主集中機構的建立」，和「在每個國家中建立革命的政黨」的藍圖。

國際委員會書記白恩斯任意違反一九五八年六月國際委員會世界會議規定「每一支部派一代表出席國際委員會會議」的決議，他擅自指定英、法支部各派兩個代表出席國際委員會會議，以此在國際委員會會議上永遠居多數，控制國際委員會，這就是社會主義勞工聯盟所強調的「一個國際民主集中機構的建立」的範例！

但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在制訂上面這個「藍圖」時，卻完全沒有注意到時間和環境的巨大變化。現在不但不是一九五三年，也不是一九五七年，即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第一次反對統一得勝的時候。在過去九年中，（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二年）已發生了如下的重要事件。

A. 蘇聯共黨廿次大會對史大林個人崇拜的清算和罪惡的暴露。波、匈革命對蘇聯集團的政治革命的不可避免的證明。中蘇兩集團衝突的公開暴露和各國史大林派內部的日趨分裂，以及非史大林主義的革命集團所領導的革命勝利（如古巴革命）。這一切都證明客觀局勢極有利於托洛茨基主義運動，迫切地需要我們重新統一以應付這個有利的局勢。

B. 巴布洛的修正主義思想，在國際書記處召開的一九五四年六月的會議上，在錫蘭的代表所領導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反對之下，已遭到了不可救藥的打擊，致使巴布洛主義的忠實支持者克拉克、羅蘭士和梅士特列等脫離了運動。隨後在波匈革命的刺激之下，國際書記處的「第五次大會」和「第六次大會」所發表的文件已排除了巴布洛的修正主義思想，基本上恢復了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最後，甚至取消了巴布洛的總書記職位。這就基本上消除了引起一九五三年分裂的政治分歧，替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重新統一奠定了基礎。

C. 近年來所發生的事變，特別是古巴革命，在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內部引起了新的分歧，特別在國際委員會內部引起了最嚴重的分歧。在古巴革命的基本問題上，如革命發展的性質問題，古巴國家和卡斯特羅政權的性質問題等，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已完全離開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原則及托洛茨基主義的傳統，而陷於修正主義和教派主義的泥坑。而國際委員會和國際書記處的絕大多數支部在這方面一致保持了托洛茨基主義的傳統立場。這又給重新統一安置了一個新的

政治基礎。

D. 國際委員會在白恩斯（國際委員會書記）的領導之下，頭六年中（一九五五——一九六〇年）完全表現無能。對重大的歷史事變，如聯共廿次大會對史大林的清算和波匈革命等作不出一個政治決議。近一年餘來，白恩斯又企圖把社會主義勞工聯盟領袖們的極端教派主義的觀點和決議（如「社會主義的世界展望」）強加在國際委員會身上，企圖通過它執行他們的災禍路線，智利同志們稱之為「政治上自殺」的路線，這就使得國際委員會的大多數支部再不能容忍下去。

在上面所發生的這些新的事件所形成的新環境的光照之下，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袖們還企圖藉口「自一九五三年以來，分歧已愈來愈大」，來維持一九五三年以來的分裂現狀，這不但是唐吉訶德的幻想和愚行，簡直是不自覺地破壞世界托洛茨基主義的運動。

現在的情形已非常清楚：一方面，國際委員會絕大多數的支部和國際書記處絕大多數的支部，都急切要求結束一九五三年以來的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分裂狀態，在一個共同的政治協定上儘速實現統一，以便改組第四國際，重建領導，恢復托洛茨基主義的政治立場和組織傳統——「充分自由的討論，完全統一的行動」和「少數派的民主權利」。以此幫助各國支部走上建立革命群眾黨的道路。

另一方面，堅持繼續分裂狀態，甚至實行或準備重新分裂的，是保薩達斯所把持的拉丁美洲局和白恩斯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及其同盟者 LAMPER 的組織。就政治上說保薩達斯所代表的是機會主義和教派主義的混合物，白恩斯則代表著極端的教派主義。但二者都是朝著災禍的方向走去。在組織的觀點和行動上，他們幾乎是一致的。例如保薩達斯不願在國際書記處內居於少數，以致自行分裂。但他對於拉丁

美洲局屬下的各支部實行巴布洛的官僚主義的嚴厲控制，對於主張統一的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則特別敵視。白恩斯領導的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公開聲明「不願在國際組織中居於少數派權利」，但在它內部同樣採取巴布洛的官僚主義措施，不容許任何反對派意見的存在。而對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敵視遠超過保薩達斯宣稱要擊敗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導。因此可以看出他們堅決反對統一，甚至實行或準備重新分裂絕不是偶然的。

當 CADOGON 和 BEHON 起而對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導表示不同的政治組織意見時，二者都被開除，並且是在全國會議召開的前夕被開除。這證明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領導不容許不同意見的少數派存在。這就從根破壞了「充分自由的討論」和「少數派的民主權利」。如果把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內部和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內部的情形加以對照，便更顯得清楚，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內部，對於一切重大問題，如近年來所發生的中國人民公社及中共的性質問題，古巴革命問題和統一問題，都實行了毫無限制的討論，不但發表少數派的一切文件，而且讓它的代表在全國委員會會議上作與多數派對立的報告。這表明：反對領導的少數派不但沒有一個人被開除，而且還保持他們原來的地位和意見，繼續在黨內討論。試問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內部有這樣的民主嗎？絕對沒有。我們所看到的只是「獨霸」。

是繼續分裂走近災禍，還是重新統一復興托洛茨基主義運動？

這是白恩斯同志作最後選擇的時候了！

## 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的形成（下）<sup>1</sup> （一九六四年四月）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一經成立，爲了徵集和培養共產主義的青年幹部，它於一九二〇年七至八月間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小組織，這個組織差不多是從以前上海「工讀互助團」解散後留下的份子組成的<sup>2</sup>。由於這個青年團小組的成立，共產主義的小組才有可能在實際上從事工人運動，即派遣青年團團員去接近工人，調查工人的生活情況，和個別的工人談話「作朋友」，這便爲往後上海的工人運動、組織工會開闢了道路。

差不多和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時，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爲了喚起工人群眾，使其覺悟他們自己的利益，爲他們自身的解放而奮鬥，於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五日出版了一個專門刊物，名爲《勞動界》（週刊），這不僅是中國共產主義者在工

<sup>1</sup> 此文是作者彭述之一九二〇年參加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回憶的第二部份，在最近才找到。第一部份曾經以《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是怎樣形成的》爲題，首刊於《十月評論》第四十六期（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日出版），並收集在《彭述之選集》（第一卷）內。此文題目包括第一、二部份；寫於一九六四年四月，看來還是未寫完的初稿，但仍屬很有價值的歷史資料。

<sup>2</sup> 一九一九年末和一九二〇年初，在北京曾發生一種所謂「工學主義」或「半工半讀主義」的運動，這個運動的「理想」是「打破勞心勞力的界限：使社會上勞力的人都去唸書——要求高深的學問；唸書的人去作勞力的工。」這樣，便可以「破除職業的階級與奴隸的制度」（見當時散發頗廣的《工學旨趣書》），起初由北京高等師範一部份學生成立「工學會」，跟著，北京大學的學生組織「北京工讀互助團」，隨後，上海亦成立了同樣的組織，這些工讀互助團都是靠捐款開辦食堂、石印、洗衣等來維持團員的生活（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也曾經在《新青年》雜誌署名登廣告，號召捐款幫助互助團）。北京工讀互助團的發起人王光圻，無政府主義的領袖之一，認爲這是「新社會的胎兒，是實現我們理想的第一步」。但由於捐款的耗竭，這些工讀互助團的存在不過幾個月便自行解散了，這給無政府主義的空想一個實際的教訓，所以工讀互助團中最好的份子後來都轉到社會主義青年團。

人中宣傳共產主義的第一個刊物，也是中國勞動運動史上真正為工人階級利益說話的第一個刊物，這個刊物對於有關工人階級解放事業的一系列的基本問題：從勞動者創造一切社會生活的物質資料；勞動的價值、價格和剩餘價值；以及由此產生的剝削階級——資產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無產階級；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和不可避免的滅亡，直到社會主義的必然勝利，都給了最通俗的一個普通工人能夠懂得的解釋，並以俄國工人階級在十月革命中取得勝利，建立了「勞農政府」的實例來證明，這便喚起了和鼓舞了工人中先進份子的嚮往和信心。

此外，《勞動界》並登載了關於中國工人，特別是上海工人受剝削和被壓迫的實際情形的許多報導（這些報導多數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在工人中調查的結果），以及工人為改善生活條件而鬥爭（如罷工等）的事實記錄，同時又介紹了戰後歐美和日本工人運動蓬勃發展的情形，以資效法和鼓勵。

由於《勞動界》在工人中的散佈和宣傳，很快就得到工人的響應，例如在它的第七期（一九二〇年九月廿六日出版）便登載一個工人名叫李中（上海海軍造船廠工人）的投稿，標題為「一個工人的宣言」，這個宣言說：

「工人的運動，就是比黃河水還厲害還迅速的一種潮流，將來的社會，要使他變成工人的社會；將來的中國要使他變成工人的中國；將來的世界，要使他變成工人的世界。……我可親愛的工人呀！俄國已經是工人的俄國，……這個潮流快要到中國來了，我們工人就是這個潮流的主人翁。這個潮流的主人翁就要產生工人的中國，但是不貫徹聯絡，就會沒有力量。」

所以李中向工人群眾發出呼籲：

「我們少數同聲同類的工人，再聯絡多數同聲同類的工人，成一個大團體，由我們的大團體聯絡其他一大團體，以成中國的大團體，由中國的大團體，再聯絡他國的大團體，以成世界大團體。世界團體呀！中國團體呀！我們團體呀！發端就在我們少數工人哪！」

李中的「宣言」不僅是《勞動界》進行共產主義宣傳的有力回聲，而且是代表中國工人階級對於共產主義的嚮往，對於它的前途的信念，以及要求自身團結的一種明白的宣告，而且事實上，李中在《勞動界》發表他的宣言之後，很快就受到一些工人的支援，首先他在他所工作的海軍船廠裏得到一部份工人同意發起工會組織，經過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協助和指導，李中又聯絡了電燈廠、厚生鐵廠和幾家紗廠的機器間的工人，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廿一日正式成立了上海機器工會，雖然這個工會所包括的會員只有三百七十人，但它是在工人階級先鋒隊，共產主義者領導下的中國工人階級自己組織起來的第一個工會組織。上海機器工會成立後不久，又成立了上海印刷工會（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人數在一千以上。此外，並著手組織紡織工人，雖然這一工作，由於從事工人運動的人很少，尤其在那些作工人運動的幹部離開上海而去莫斯科學習以後，組織工人方面便停下來了。

爲了聯絡各方面的工人活動份子，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又組織了「上海工人遊藝會」，它的第一次會議，也就是成立的會議，於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中在復旦大學舉行，到會的工人將近三百人，我們外國語的學生也參加這次會議，由李啓漢作主席，陳爲人任記錄。李在他的會議開幕詞中說：「我們各人是從前苦著餓著；我們想要免除這些困苦，就要大家高高興興聯合起來，討論辦法；我們不獨得到這樣的遊藝會而已；甚麼金錢萬能，我們都要改革打破！」。此外，還有楊明齋和

幾個工人演說（陳爲人的記錄登載於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廿六日出版的《勞動界》二十期）。後來並計劃成立一個「勞動俱樂部」，作爲工人經常集聚之所，這個俱樂部的章程已發表於一九二一年一月十日出版的《勞動界》二十三期，但也由於留俄學生的出國而停頓了。

自留俄學生出國，外國語學校也解散了，留在上海繼續作工人運動的只有李啓漢，他一個人當然不能發展工人運動，他所能作的是把已有的工人組織，如機器工會和印刷工會等繼續保存，這便是一九二一年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處成立後，在上海從事勞動運動的基礎。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爲了加強對外的社會主義宣傳，決定把《新青年》逐漸轉變爲它的機關報，因而從它的第九卷第一期起開始改變它的內容，即比較明白地和肯定地提出改造中國的政治方面，並特闢一個「俄羅斯研究」專欄，登載那時可能得到的材料，使一般傾向社會主義分子有可能去瞭解蘇俄的真實情形，以此加強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信心。

陳獨秀在一九二〇年九月出版的《新青年》八卷第一號發表的「談政治」一文，不但表示陳本人以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的主張（他自稱是「我最近對於政治的見解」），同時也是中國共產主義小組的政治方針的公開宣佈。在這篇文章中，陳一方面批評了當時不問政治或反對從事政治運動的幾種傾向，特別是較爲詳細地分析和批評了無政府主義者一般地「反對政治、反對法律、反對國家、反對強權」的論據；他認爲無政府主義者否認政治是消極的，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所歡迎的，因爲「從事實上說起來，……世界各國裏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別的，就是少數遊惰的消費的資產階級，利用國家、政治、法律等機關，把多數勤苦的生產的勞動階級壓在資本勢力底下，當做牛馬機器還不如。要掃除這種不平這種痛苦，只有被壓迫的

生產的勞動階級自己造成新的強力，自己站在國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機關，把那壓迫的資產階級完全征服，然後才可望將財產私有、工銀勞動等制度廢去，將過於不平等的經濟狀況除去。若不主張用強力，不主張階級鬥爭，天天不要國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組織的社會出現，那班資產階級仍舊天天站在國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夢想自由，便再過一萬年，那被壓迫的勞動階級也沒有翻身的機會」。「所以資產階級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會的學說，是階級鬥爭的學說；資產階級所歡迎的，不是勞動階級要國家政權法律，是勞動階級不要國家政權法律。」

「第二，我們要明白各國底資產階級，都有了數千年或數百年底基礎，站在優勝的地位，他們的知識經驗都比勞動階級高明得多；勞動階級要想征服他們固然很難，征服後想永久制服他們不致死灰復燃更是不易。這時候利用政治的強權，防止他們的陰謀活動；利用法律的強權，防止他們的懶惰、掠奪，矯正他們的習慣、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這時候若反對強權的壓迫，若主張不要政治、法律，若提倡自由組織的社會，便不啻對資產階級下了一道大赦的恩詔；因為他們隨時得著自由，隨時就要恢復原有的勢力地位。所以各國共和革命後，民主派若失充分壓服舊黨底強力，馬上便有復辟底運動。此時俄羅斯若以克魯巴特金的自由組織代替了列寧的勞動專政，馬上不但資產階級要恢復勢力，連帝政復興也不可免。」（底下是駁克魯巴特金的「國家論」。）

「第三，我們要明白人類本性的確有很惡的部份，決不單是改造社會制度可以根本剷除的；就是社會制度——私有財產制度、工銀勞動制度——所造成的人類第二惡性，也不是制度改變了這惡性馬上就跟著消滅的。工銀勞動制度實在不應該保存，但同時若不強迫勞動，這時候從前不勞動的人，

自然不會忽然高興要去做工；從前受慣了經濟的刺激（Economic Stimulus）才去勞動的工人，現在解除了刺激，又加上從前疲勞底反動，一定會懶惰下來；如此一時社會上的工作效率必然銳減。……」

「據以上的理論和事實討論起來，無政府黨所咀咒的資產階級據以造作罪惡的國家、政治、法律，我們也應該咀咒的；但是勞動階級據以剷除罪惡的國家、政治、法律，我們是不應該咀咒的；若是咀咒他，倒算是資產階級底朋友了。換句話說，就是我們把國家、政治、法律，看做一種改良社會的工具，工具不好，可以改造他，不必將他拋棄不用。」

評修正主義派，即德、法、英國的社會民主黨的改良機會主義派。陳評修正主義派說：「他們不主張直接行動，不主張革那資產階級據以造作罪惡的國家、政治、法律底命，他們仍主張議會主義，採取競爭選舉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資產階級據以作惡的政府、國會，想利用資產階級據以作惡的政治、法律來施行社會主義的政策；結果不但主義不能施行，而且和資產階級同化了，還要施行壓迫勞動階級反對社會主義的政策。現在英法德底政府當局那個不是如此！像這樣與虎謀皮為虎所噬，還要來替虎噬人的方法，我們應該當做前車之鑑。……」

「他們反對馬格斯〔即馬克思，下同〕底階級戰爭說很激烈，他們反對勞動專政，拿德謨克拉西來反對勞動階級的特權。他們忘記了馬克思曾說過：『勞動者和資產階級戰鬥的時候，迫於情勢，自己不能不組成一個階級，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佔領權力階級的地位，用那權力去破壞舊的生產方法；但是同時階級對抗的理由和一切階級本身，也是應該掃除的；因此勞動階級本身底權勢也是要去掉的。』（見《共產黨宣言》第二章之末）」。

「他們只有眼睛看見勞動階級底特權不合乎德謨克拉西，他們卻沒眼睛看見戴著德謨克拉西假面的資產階級底特權是怎樣。他們天天跪在資產階級特權專政腳下歌功頌德，一聽說勞動階級專政，馬上就抬出德謨克拉西來抵制，德謨克拉西倒成了資產階級的護身符了。我敢說，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佔領權力階級地位底時代，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也就是資產階級永遠把持政權抵制勞動階級的利器。修正派社會主義底格言，就是：『從革命去到普通選舉！從勞動專政去到議會政治』，他們自以為這是『進化社會主義』，殊不知 Bebel 死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正因此墮落了！」

陳獨秀的「結論」是：

（一）「我承認人類不能夠脫離政治……」。

「我承認國家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主義。古代以奴隸為財產的市民國家，中世紀以農奴為財產的封建諸侯國家，近代以勞動者為財產的資本家國家，都是所有者的國家。這種國家底政治、法律，都是掠奪底工具，但我承認這工具有改造進化的可能性，不必根本廢棄他，因為所有者的國家固必然造成罪惡，而所有者以外的國家卻有成立的可能性。」「我雖然承認不必從根本廢棄國家、政治、法律這個工具，卻不承認現存的資產階級（即掠奪階級）的國家、政治、法律有掃除社會罪惡的可能性。「我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

（二）「對於時局的我見」（載《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提出：

「我以為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一是資本家的國家，一是勞動者的國家，但是現在除俄羅斯外，……所有的國家都是資本家的國家，我們似乎不必妄生分別。各國內只有階級，

階級復有黨派，我以為『國民』不過是一個空名，並沒有實際的存在。有許多人喜歡拿國民的名義來號召，實在是自欺欺人，無論是國會也好，國民大會也好，俄羅斯的蘇維埃也好，都只是一階級一黨派底勢力集中，不是國民總意底表現；因為一國民間各階級各黨派的利害、希望各不相同，他們的總意不但沒有方法表現，而且並沒有實際的存在。」

（三）國家、權力、法律這三樣本是異名同實。無論何時代的法律，都是一階級一黨派的權力造成國家的意志所表現。我們雖然應該承認他的威權，但未可把他看做神聖；因為他不是永遠的真理，也不是全國民總意底表現，他的存廢是自然跟著一階級一黨派能夠造成國家的權力而變化的。換句話說，法律是強權的化身，若是沒有強權，空言護法毀法，都是不懂得法律歷史的見解。吾黨對於法律底態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樣迷信化，也不像無政府黨那樣根本排斥他；我們希望法律隨著階級黨派的新陳代謝，漸次進步，終久有社會黨的立法，勞動者的國家出現的一日。

（四）在社會黨的立法和勞動者的國家未成立以前，資產階級內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會進化上決不是毫無意義；所以吾黨遇著資產階級內民主派和君主派戰爭的時候，應該幫助前者攻擊後者；後者勝利時，馬上就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對他們的要求，除出版結社兩大自由及工廠勞動保護的立法外，別無希望，因為吾黨雖不像無政府黨絕對否認政治的組織，也決不屑學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利用資產階級的政治機關和權力作政治活動。」

（五）陳獨秀《國慶紀念的價值》（刊於《新青年》八卷三號，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一日）提出：

「全國底教育、輿論、選舉都操在少數的資本家手裏，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實際上是金力政治。所以共和底自由幸

福多數人是沒有份的。主張實際的多數幸福，只有社會主義的政治。共和政治為少數資產階級所把持，無論那一國都是一樣，要用他來造成多數幸福，簡直是妄想。現在多數人都漸漸明白起來要求自己的自由與幸福了。社會主義要起來代替共和政治，也和當年共和政治起來代替封建制度一樣，按諸新陳代謝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命運。

「……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會主義，這是社會進化一定的軌道，中國也難以獨異的；現在雖說是共和失敗了，封建制度恢復了勢力，但是世界潮流所趨，這封建主義得勢，也不過是一時現象；我以為即在最近的將來，不但封建主義要讓共和，就是共和也讓社會主義，……但有人以為由封建而社會主義，中間還必須經過共和時代，所以眼前還是政治問題要緊；又有人以為中國封建式的武人為患，是政治造成的，不是經濟造成的，所以眼前只是政治革命要緊，還不須經濟革命；我看這兩種話都似是而非。由封建而社會主義雖是一定的軌道，然這軌道卻不能夠從必須要經過若干歲月才可以改變方向。……現在的東方各國卻和他們（指西方各國）的情形不同，所以俄羅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會主義代替了，封建和社會主義之間不必經過長久的歲月，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例。至於說中國只須政治革命不必經濟革命，我便有七個疑問：……（六）中國除勞働界有了階級的覺悟，組織強大的革命團體，絕對打破資本家生產制，有何方法可以抵制外國的經濟的侵略進而為政治的侵略？（七）單是政治革命，能否解決官、匪、政客、游民兵過多的問題？我不但不反對政治的革命，而且很盼望他早日實現；但我斷然不能迷信他能夠將中國從危險中救出；若有人迷信他，說中國此時只須政治革命不須經濟革命，我便要請他解答上面的七個疑問。」

# 中共黨內鬥爭與中國政局<sup>1</sup>

(一九六七年二月廿八日)

## I

毛澤東領導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思想是，儘管國家還比較貧窮落後，還面臨國際上的孤立，但精神的力量（領導的號召）、革命的鬥志和榜樣（嚴苛的勞動）、以及人海戰術這些因素，將能夠使中國盡快躍進變成強大的國家，並進而對世界局勢施加重要的影響。毛澤東的觀點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在取得革命戰爭勝利後，在一個落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種急躁心態，尤其是在蘇聯撤走全部援華專家、終止一切對華援助後，中國陷入了一種更為嚴重的孤立狀態，這種急躁心態就更加強化了。

然而中共黨內的其他領導人如劉少奇等，以前一直追隨著毛澤東路線，但毛的一些政策的失敗，使他們打破了對毛的盲從，希望對毛的路線進行一些修正。關於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他們認為要在一定的程度上尊重經濟的客觀規律，放棄那種「假大空話」，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著力發展科技，改善中國的國際關係。這些當然都不是反對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而只是希望尋求一種更為平穩和謹慎的發展道路。

文化大革命集中反映了中共黨內分別以毛澤東和劉少奇為代表的兩條路線的生死鬥爭。從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六年，中共黨內一直都有對一些重大問題的不同意見。但由於

---

<sup>1</sup> 本文是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經第四國際聯合書記處（USFI）的同意發表在《國際資訊公報》一九六八年第一期上，國際執行委員會（IEC）在一九六七年春天討論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文集文章，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廿八日中國革命共產黨全國臨時委員會通過的一項決議，此譯文未經著者過目。

黨內的官僚體制，這些問題都沒有進行公開的討論。那些不滿毛澤東政策的人，開始聚集在劉少奇周圍，並在黨內把毛澤東孤立起來。

他們對毛澤東的政策主要的爭議有以下幾點：

1. 農業集體化問題。在這一點上，他們不同意毛澤東在農業集體化進程中的激烈做法。

2. 關於三面紅旗的政策。他們反對搞大躍進，反對全民大煉鋼，反對搞衛星試驗田以及人民公社化運動。

3. 關於文藝政策，他們反對對知識份子的極度嚴厲控制，反對黨八股，反對用現代戲劇取代傳統戲劇。

4. 關於個人崇拜，他們雖然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但是反對日益加劇的對毛的個人崇拜。

以上這些問題中，最嚴重的就是三面紅旗的政策。它集中體現了毛的魯莽、幻想和幼稚。全民大煉鋼、衛星試驗田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事實上嚴重摧殘了中國的經濟。這些政策不僅沒有實現十五年內趕超英國的目標，相反卻使國民經濟陷入混亂，倒退了多年。這種魯莽的經濟政策，使中國遭受了三年之久的大饑荒。

以上這些政策都沒有經過黨內領導層的充分討論，就在毛澤東的個人衝動下制定出來。毛的個人獨裁已經達到這樣的程度：他經常忽視中央委員會、甚至中央政治局的存在。常常是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在事後不得不接受毛的決定，然後為毛的決定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承擔責任。

在史大林時代，這種個人獨裁是被容忍的，但在非史大林化後，中共黨內那些一心一意幹革命的高層領導便逐漸不能忍受這種獨裁了。這種情況使得鄧小平（黨的書記處書記）、劉少奇（國家主席）以及其他一些領導人如彭真、陸

定一、周揚、羅瑞卿等人團結在一起，共同抵制毛的幻想，減少毛削弱官僚體制的怪僻政策。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毛澤東辭去了國家主席的職務，這有象徵意義，表明劉、鄧、周已經開始有計劃地削弱毛的無上權力。後來，他們進一步削弱毛在黨內的領導地位。毛曾經抱怨說，有人對待他如同死去的父親；這話形象地說明了當時的情況。

劉鄧集團的觀點是，雖然與毛相左，但不是簡單的個人權力鬥爭。客觀上，他們反映了黨內已存在多時對毛的普遍不滿；換句話說，劉鄧集團反映出了黨內官僚體制和普通群眾的深層矛盾。但這並不是說他們真是在為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而鬥爭，而是說他們已經認識到整個社會矛盾的爆發日益臨近。為了維護官僚體制，他們選擇打著糾錯的旗號，進行改革，即使是在官僚體制內部糾錯。這樣可以緩解官僚集團與廣大群眾之間的矛盾。這也是歷史上所有改良派的共同特點。

劉鄧集團逐步平穩地控制了黨和大部分的國家機器。在他們當權的那段時間裏，他們把大量的人民公社退回到生產隊的組織形式，放鬆對自由市場和小型私人財產的箝制，把農業作為經濟建設的基礎，放緩經濟的發展速度，放鬆對知識份子的控制，緩和中國和蘇聯的關係等等。於是，一直惡化的經濟形勢逐漸開始恢復。

北京在市長彭真的領導下成爲一個反毛的中心；控制著全國宣傳文化工作的中宣部和文化部也站在劉鄧一邊，給予知識份子批評毛澤東錯誤政策的機會。《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就是典型的例子。

面對權力被削弱和大量的批評，毛澤東發現很難在北京控制局面。因此，他去了上海，在那裏他籌劃反攻，揭開了殘酷的黨內鬥爭的序幕。

## II

相比於毛派系，劉鄧集團已經控制了黨團機構、工會，大部分的中央委員、中央常務委員會和政治局都站在了他們一邊。同樣地，他們也控制了幾乎所有的國家機器。就這樣，他們把毛澤東置於非常孤立的地位。因此，毛認為他不可能通過正常的程序改變整個局勢，他重新奪回權力的唯一途徑就是利用林彪掌握的軍方力量。

毛首先通過《解放軍日報》和上海《文匯報》對《三家村札記》發起攻擊，然後他在林彪軍方的支持下，回京把彭真調離北京。他還通過召開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撤換了一批中央委員，改組了政治局和中央常務委員會，為其重新控制中央委員會鋪路。儘管採取了這麼多非常措施，毛仍然不能夠控制整個黨團組織及國家機器。

毛在北京「奪權」後，開始懷疑自己能否僅僅依靠軍方持續掌權。他也擔心，如果他過於依賴林彪，他就不得不把自己的一些權力讓給林彪。毛也希望通過群眾運動重新奪權，並利用這樣的機會，培養一批新的官僚取代舊的官僚。

於是，毛通過媒體的宣傳鼓動青年人組成紅衛兵，並利用個人威望和青年人的叛逆精神，號召紅衛兵衝擊反對派。

雖然紅衛兵是群眾運動的一種形式（主要是學生），但它更是一場被匆忙組織起來的信仰運動。運動的核心任務是保護毛澤東的個人權力及其思想的絕對支配地位。紅衛兵運動主要由他的親信陳伯達和他的妻子江青領導。中央委員會領導下的文革小組事實上成了毛派的臨時指揮部。

旨在改變傳統習俗的幼稚宣傳，以及娃娃紅衛兵的行動，造成了普遍的反叛氣氛，以便開始清除劉鄧集團分子及其他異議者。在實際行動中，紅衛兵和林彪的軍隊團結協作，

打倒了許多地方政府的改良派領導人以及在位的當權的反對派。

簡而言之，毛的目的就是重新建立起個人獨裁，腰斬任何改良措施。爲了達到此目的，他縝密地通過媒體進行個人崇拜的宣稱，並將之推到極致，還拼命地將他的思想當作七億中國人的唯一正統思想。毛的個人崇拜已經超過了三四十年代的史大林。儘管毛澤東用「革命」、「反修正主義」、「群眾運動」、「巴黎公社」、「大民主」等辭彙把自己裝飾得光輝燦爛，但實際上他依然固守著史大林主義這個最爲保守的堡壘，堅決反對世界範圍的非史大林化運動，不顧一切地維護史大林已經消逝的「輝煌」。從這點看，毛的文化大革命、紅衛兵運動、奪權運動等措施本質上都是反動的。

### III

劉鄧集團的主要缺點是：

1. 雖然劉鄧及其追隨者對毛的政策不太滿意，但他們並沒有完全跳出毛的思想框架。他們仍然對毛的最高權威保持尊敬，在實際行動中，他們也是毛的仰慕者和追隨者。因此，在與毛爭奪領導權的鬥爭中，他們是註定要失敗的。

2. 劉鄧集團既從未針過對毛的錯誤政策在黨內外發動過任何公開的批評，也沒有能夠提出一個清晰全面的政治綱領來反對毛。在實際的鬥爭中，他們不得不「打著紅旗反紅旗」。因此，他們並不能亮出自己的特殊政治旗幟以爭取群眾，並發起有效的奪權鬥爭。

3. 劉鄧集團並不真正相信人民群眾並依靠群眾。他們從事的只是局限於黨、團的高層鬥爭。因此當他們遭受毛派的攻擊和羞辱時，他們不可能獲得群眾的大力支持。

4. 劉鄧集團缺乏革命的鬥志，他們滿足於按照傳統的方

式和法定的程序辦事（可能是想避免內戰）。當毛澤東採取法律之外的鬥爭手段反擊他們時，他們就陷入完全被動的境地。另外，毛的威望是如此之高，以至於他們根本不能、不敢公開地組織起來用國家機器的力量來反對毛。所以，他們除了忍受攻擊外，別無其他選擇。

毛澤東對付其反對派的手法環環相扣，引蛇出洞、任加罪名、編造謊言，用各種手段羞辱他們，讓他們沒有機會為自己辯白。任何反對毛的人都被扣上「修正主義」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帽子。

與毛共事多年並熟練使用這種手段的劉鄧集團，完全明白這其中的含義。當毛發起文化大革命時，他們就組織「工作組」；當毛組織他的紅衛兵時，他們就組織自己的紅衛兵，甚至是工人紅衛兵；當毛號召進行大串聯，他們也去號召更大的團結；當毛決定進行奪權，他們除了偶爾地進行自衛外，也進行奪權鬥爭。總之，他們好像總是在萬能的毛澤東的陰影中。不管怎樣，這一點是確定的：支持毛的紅衛兵和支持劉鄧的紅衛兵之間，支持改良的工人和對毛「忠誠」的學生之間，在全國範圍內發生了衝突。

所有的官員被迫要選擇站在這一邊，或者那一邊；分分合合的過程仍未達到穩定的狀態。

許多中共的老革命（如朱德）因為不滿其眾多同志被打倒而被肅清。

在動亂中被擢升為中南局書記的陶鑄（政治局排名第四），在被任命為中宣部部長及文革小組組長後不久，也很快被打倒，儘管初期他在毛派和劉鄧集團之間倒是起了緩衝的作用。

中央委員會文革小組的成員以及解放軍文革小組的成員不停地更換。江青和新任成員的矛盾不斷發展，導致毛林集

團內部產生了新的矛盾。很顯然，動亂仍在繼續，勝負判定尚為時過早，雙方仍要經過長期的鬥爭才能取得最終的勝利。

對未來局勢的發展，我們嘗試做出如下判斷：

儘管毛林集團在當前這輪鬥爭中佔據了上風，成功地把主要的反對派頭目軟禁在家，掌握了一些大的省市的領導權；但親劉鄧集團的力量遍佈全國，並在一些大的行政區佔據著優勢地位，他們還有一定的軍事實力。要想把這些實力派打倒並奪取他們的權力，對毛來說，肯定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毛澤東所依賴用於奪權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組織幾乎都是缺乏訓練的烏合之眾。紅衛兵最初的造反行動顯得過於幼稚，當他們真正掌握權力後，他們自己也不能擺脫官僚特權的侵蝕。不斷產生的新矛盾迫使毛不得不在其集團內部整治被名為「個人主義」、「土匪思想」、「拉幫結派」等狀況。紅衛兵在打倒反對派後，將很難持久掌權並提高經濟生產水平。

無論毛能否取得對反對派的勝利，他似乎已在一段極短時間內破壞了這個具有四十多年歷史的黨的紀律和統一。

被毛澤東打倒和奪權的人，大部分是二三十年代參加革命的老同志，他們是中共的骨幹力量，因而是自掘中共的墳墓。可以肯定，從現在起中共的官僚統治很難建立起穩定或鞏固的根基。史大林的殘酷統治是在其死後才得以暴露的，但毛的官僚統治在其活著的時候就已經開始瓦解。這說明了：歷史朝向社會主義民主化的進程是加速的。社會主義民主化是全世界發展的必然趨勢，這不是一個毛澤東就能夠擋得住的。

解救當前中國局勢的唯一方法就是群眾的興起。現在的情況是，親劉鄧的國家機器到處被攻擊，新的親毛的國家機器還在籌建過程中，整個社會的政治控制比較寬鬆，甚至在

某些地方出現了半無政府狀態。號召人民群眾起來反對毛澤東及特定官員之外的任何高層官僚，就能夠利用「官定」的民主造成群眾批評中共的氛圍。

地方政府的那些當權者，每當面臨紅衛兵的攻擊時，總是請求工農群眾來保護他們，因此，工農群眾就有機會站出來採取行動。那些過去下放農村的人已經大量返回了城市，那些曾被關過勞教所的人也在參加鬥爭。大量的工人走上街頭要求改善當局強制制定的不合理生活標準與工作條件，要求提高收入水準。持續的罷工已經使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陷入癱瘓，其中上海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的罷工尤為盛大。在農村，人民公社的成員已經開始行動了，他們分了積累的資金和倉庫的糧食。工農運動在起初總是帶有經濟鬥爭的色彩的。

當毛澤東及其追隨者指責那些當權者鼓動群眾採取「經濟主義」的反抗方式時，當權者並不認賬。但毛並不準備在經濟上對群眾讓步。相反，毛派要求人民群眾放棄他們的鬥爭成果，並稱之為「資本主義傾向」，號召工人們「無私奉獻」，祛除「自私思想」。毛反反復復地向人們表示，工人、農民的生活水準不可能提高。這說明毛的路線是與人們群眾的利益背道而馳的，人民群眾註定是要將其拋棄的。

事實上，當前的群眾運動還處於干預政治事件的初級階段，它還沒有一個明確的鬥爭方向，也缺乏正確的領導。因此，在現階段，群眾運動還不可能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我們認為，未來的形勢發展可能會有以下幾種可能：

1. 在毛派進行全國範圍內奪權的過程中，一些親劉鄧集團的省份有可能會採取公然抵制毛派的立場，反對毛派的奪權，並造成局部的內戰狀態。（事實上，這種情況已經在某些地方發生了。）

2. 位於邊疆地區（例如新疆、西藏）的反對派力量，有可能由於毛派的進攻而撤退到山區開展游擊戰爭。毛澤東過去開展游擊戰的經驗有可能被用於針對他自己。八一軍隊事件已經顯示了這種傾向。這些游擊隊有可能得到蘇聯的支援，並發展壯大起來。

3. 群眾運動的發展，將有可能產生擺脫反毛改良派的領導的新流派。「百花齊放」運動時期孕育出的群眾的革命思想有可能發展，並把群眾運動引向政治革命。

#### IV

關於中共黨內的鬥爭，我們不希望看到毛林派取得勝利，因為那會堵死所有的改良道路，重新回到冒險主義的道路上，並強化已近瘋狂的個人崇拜和個人獨裁。從國際層面看，毛的勝利將會增強史大林派的勢力，損害反帝的社會主義統一戰線，這客觀上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有利。

我們還是要嚴厲地批判劉鄧的改良主義是不徹底的，他們的一些政策，諸如放棄優先發展重工業，阻止大躍進，解散人民公社，保留部分田地財產，一定程度地放鬆對自由市場的管制，通過鼓勵文藝工作者採取主動，因而為知識分子營造寬鬆的文化環境，反對毛的個人崇拜，為彭德懷事件中的人員辯護等等，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需求和不滿，客觀上比毛的頑固政策要好一些，也有利於中國的社會主義的發展；但是這些措施仍然沒有跳出史大林主義的思維框架，或者說仍然和蘇聯及其他東歐國家所做的沒什麼兩樣。我們要让群眾看到各種改良政策，才能促使群眾走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康莊大道。

不管怎樣，雖然群眾的革命鬥爭是由中共黨內的改良派領導的，我們的態度還是要這樣的：一方面堅持我們自己的

獨立地位，同時在各種可能場合支持改良派，反對我們共同的敵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把群眾運動推向更加廣泛和深入的階段，使群眾運動有機會提高自身並最終拋開改良派的枷鎖，走向革命的道路。

另外，針對中共黨內的反毛林派鬥爭，我們應給予反對派批判的支持，因為這些反對派畢竟反映了人民群眾的進步要求。我們要認識到，一旦毛派取得了勝利，中國的局勢將比任何時候都要糟糕。

一方面，我們要聯合中共黨內的反對派一起攻擊最保守的官僚集團層份，以便為徹底摧毀官僚集團的政治革命創造有利的條件，把整個官僚集團埋葬；另一方面，在實際的階級鬥爭中，我們還要努力通過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綱領，贏得廣大的革命者，從而增強我們推翻官僚集團的力量，在中國建設民主的社會主義。

階級鬥爭是殘酷無情的。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是不允許騎牆中立的。

我們以前已經說過，我們要時刻警惕著中共黨內改良主義者的妥協性一面，時刻反對史大林主義所孕育的機會主義。雖然在實際的鬥爭中，我們將和中共黨內的反對派並肩戰鬥，反對最腐朽的官僚集團部份，但我們也要毫不猶豫地反對他們的任何機會主義言行。我們與他們在反對毛林集團方面要共同戰鬥，但在立場上必須要與這些改良主義者劃清界限。

我們要在實際的鬥爭中，一步步地提高群眾的階級覺悟，直到群眾真正意識到，在中國建立起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唯一途徑就是推翻官僚集團（這是新中國十七年來的歷史已經反複證明了的），官僚集團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健康發展的絆腳石。

這是我們要給予中共黨內的反對派以批判的支持的真正意義。

爲了將運動引向民主社會主義的方向，引向有組織的群眾運動，我們特提出以下的基本要求：

1. 立即向全國的群眾公佈當前鬥爭的全部資訊，以及中共黨內的不同觀點，以便讓全國群眾能夠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並作出自己的是非判斷。

2. 讓中共黨內反對派發表意見、捍衛其立場。同時允許所有的革命工人、革命農民、革命知識份子以及革命黨派自由發表意見、批評他人的意見。

3. 立即停止對持不同政見者的人身迫害和秘密審判。

4. 給予任何支持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的人以思想、言論、寫作、出版、集會、結社、罷工、武裝和反對個人崇拜與個人獨裁的自由權利。

在以上措施基礎上，應在全國範圍內就未來的政策進行群眾大討論。

無產階級專政是對所有階級敵人的專政，包括帝國主義者、資本家、地主和富農，但卻應爲工人、農民和革命知識份子提供充分的自由。資本主義民主是少數人的虛偽的民主，而社會主義民主是多數人的真正的民主。無產階級的民主本應該更加廣泛和深入，但不幸的是，自史大林背叛列寧和迫害托洛茨基之後，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就逐漸走上了官僚化的道路。

自那以後，世界上所有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都仿效史大林的模式建立起了官僚體制。在官僚集團的殘酷統治下，那些曾爲革命事業奮鬥過的很多人開始對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喪失信心。那些對馬列主義失去信念的人不可避免地投向了資本主義民主的懷抱。因此，真正社會主義民主的發展受阻，客觀上就意味著史大林模式的強化。這是歷史的悲劇。在這種環境

下，我們應該高舉真正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民主的旗幟，以便將所有的革命力量引向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

我們相信，在中共和共青團內有相當一批人有改造社會的雄心，懷有滿腔的革命熱情。雖然他們在毛澤東時代成長起來，但他們畢竟有機會接觸馬列主義。他們在日常的生活和社會鬥爭中，進行獨立思考，努力尋找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我們真誠地希望他們能夠團結黨內外的同志並組織起來，最終成爲領導中國社會主義理性發展的主力。我們希望能夠和這些革命同志或革命團體建立起友好的同志關係，以便共同爲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與社會主義民主鬥爭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

因應當前的形勢，我們的建議是：

1. 維護當前生產資料的國有制，維護現有的革命成果，反對帝國主義者、資本家、地主和富農的各種復辟私有財產制和資本主義的陰謀。

2. 實行無產階級民主。要讓工人、農民和革命知識份子擁有組織政黨、印刷物品、發表言論、發行書刊、報紙、雜誌、組織民眾、遊行、罷工及參與選舉的權利。

3. 廢除所有黨委人員控制國家機關、教育機構和社會組織的權力。

4. 讓工人、農民、專家、科學家和技術工人等組成一個全國經濟建設委員會，由其負責制定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整體發展規劃。

5. 在執行農業集體化和人民公社政策時，要堅持農民自願的原則。國家應該通過科學技術與機械化，引導農民走集體化道路，並通過提高生產力增強集體化的影響力。要讓農民有加入和退出公社的自由。

6. 全國的工廠和農村生產單位，都應該由工農民主選舉出來的委員會管理。只有這樣，生產和供求關係才能受到監督，從而平穩發展。

7. 在無產階級民主原則上，建立工農兵委員會，作為全國和各級政府的領導機關。各個委員會應每年選舉一次，委員的任期不能超過三年。選民對其有權撤換。

8. 廢除所有的官僚特權。他們的待遇不應該超過普通工人的水平。

9. 拋棄萬隆會議的機會主義原則，無私支援其他國家工農群眾的革命鬥爭，以推進全世界的革命運動。

10. 聯合所有的工人國家組成聯合的反帝陣線，以便針對帝國主義及其侵略行為進行有效的鬥爭，並推進世界的真正和平事業。

我們堅信，只有社會主義民主的力量在政治經濟領域的成功才能終結殘酷、無情、獨裁的統治，只有實行民主的社會主義才能將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引向和諧理性的發展之路，從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為人民的熱情和創造力提供更好的空間，使廣大人民群眾恢復對社會主義的信心，並再次使世界上被壓迫、被奴役的民族以及其他工人國家的未來發展從中國的革命經驗中受益。所有這些積極因素，終將有利於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使中國盡快擺脫落後狀態，並有助於建立一個和諧的世界社會主義大聯盟。

## 關於中國問題給國際執委會的信

(一九六七年三月)

我抱歉不能參加國際執委會全體會議，特別是這次會議的重要議程是討論中國問題。正因為這樣，加上我特別關心對中國所採取的立場，我決定寫這封信。

首先，我想評論「聯合書記處」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發表一篇題為《中國的內部危機》的聲明。

一般地說來，這篇聲明只根據幾篇文件而不是按事件的實際發展而作出來的。例如，聲明只把「政治掛帥」作為其基礎分析之一，但並沒有按實際局勢的內容去分析這一口號。它只是抽象地接受這一口號，然後企圖一般地概括它。結果不但不符合事實，而且是和事實截然相反的。

真實的情形是：兩派——毛派和反毛派——的衝突原先是由大躍進（包括人民公社、土爐煉鋼等）的失敗而產生的。這一衝突隨後由於毛澤東的文藝、教育政策，特別是對蘇聯和越戰的態度，使中國處於孤立地位的外交政策和印尼的嚴重失敗而變得越來越惡化。這就是在我們的刊物中轉載過的具體發展，但聲明卻完全不考慮這些發展。它忽略事實，只以抽象的觀點考慮這些發展，因此，它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認為中國的鬥爭並沒有社會基礎，這只是官僚層兩派的鬥爭，即「官僚內部鬥爭」。

實際上，每一派的觀念都反映了不同的社會基礎。我已經在我的「訪問記」中在某種程度上描述了兩派的思想，而佐治·諾華克同志在他的幾篇文章中亦有同樣的分析。如果聲明是按照這些事實進行分析，它就不會得出上述的「官僚內部鬥爭」的結論，也不會採取中立主義的立場。

聲明說：「統治層常常提出的思想主題之一是平等主義的思想主題。」我們要問，在那裏和什麼文件中，人們能找到建基於平等主義的口號以反對毛的反對派？

聲明又沒有指出毛對反對派所採取的行動，如污衊反對派，不讓他們發表自己的思想、逮捕、監禁、拷打等。所有這些已經驅使了很多人自殺或企圖自殺。用這樣的方法來對付反對派，我們的立場怎樣？聲明不但沒有澄清我們的立場，相反，它說，毛更傾向於「官僚的溫情主義，而不是採取鎮壓措施。」難道這不是和史大林用以鎮壓所有反對派的相同的行動嗎？史大林不是在開始時污衊所有反對派，控告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和人民公敵嗎？托洛茨基主義者不是批評史大林當時所用以反對布哈林和左派反對派的一切方法嗎？那麼第四國際對毛的行動和方法——「官僚的溫情主義」，應採取怎樣的立場？

根據聲明所說，毛的反對派是赫魯曉夫主義。正如我在「訪問記」和「公開信」中所闡明的，赫魯曉夫主義包括有兩個不同的內容。但聲明並沒有這樣解釋。我的意見是，毛的反對派和赫魯曉夫實行的反史大林運動有著非常共同的地方，但我並沒有看見任何他們同情赫魯曉夫政治上修正主義的證明，或發現他們反對中共對赫魯曉夫政治上修正主義的鬥爭的證明。我覺得在毛澤東方面，事情剛好是反面。他特別反對反史大林運動，因為由於他自己個人的需要，藉以保持其在中共黨內個人獨裁的地位。聲明所採取的全部立場就是中立主義，這點可由里維奧同志和皮雅爾同志參加在三月召開的聯合書記處會議中的發言加以證實。當毛使用史大林主義的方法，我們能夠在這個問題上採取中立主義的立場嗎？在我的兩篇訪問記中——其中的一篇是早在聲明前幾個月發表的——我已經清楚地解釋了一般的局勢和毛的反對派

的思想。我業已清楚地說明，一般地說，這個反對派是較為進步的。那麼，人們怎麼還忽略這些事實，而採取中立主義立場呢？

應該指出，這並不僅僅是基於承認消息缺乏而採取中立主義立場，要求在獲得更多消息或等待事件發展得更清楚以前採取中立主義立場的問題。事實上聲明是既描述了主要派別的特性，又分析了他們的鬥爭，才採取了不給予任何一方以支持的中立主義立場的。

尤有甚者，如果聲明認為鬥爭是一次「官僚內部的鬥爭」，毛派以平等主義口號進行號召群眾反官僚的思想是真實的話，我們必須問，為什麼聲明不給毛派以批評的支持，而只是採取中立主義的立場？為什麼聲明不從它所提出的思想作出邏輯的結論？和聲明相同的思想已經分別地由里維奧同志特別是皮雅爾同志最近發表的文章中進一步解釋清楚（里維奧同志的文章見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和三月三日出版的《世界展望》，皮雅爾同志的文章見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出版的《世界展望》）。根據這些同志的意見，上海工人以自動的社會力量進行罷工干涉事件的發展，響應毛的號召，響應他的平等主義口號和響應毛的「文化大革命」一般思想和目標，要求提高工資和其他利益。這些都絕對不符合事實的發展。其實上海工人只是響應毛的反對派底號召，即上海市黨委會的號召，而行動起來的。正是他們這些人組織工人進行反對毛派，反對毛的「文化大革命」。正是這一理由，毛派指控上海市黨委會是「經濟主義」，那就是說，腐蝕工人，收買他們將文化大革命轉為反動的運動。然後毛派進行清算整個上海市黨委會的領導、大量幹部，並立即取消反對派所給予工人的所有讓步。很多文章對這一事件的過程及結果都有清楚敘述的（如果將來有需要的話，我們將更詳盡地論述這一問

題)。

關於最近的事件，有些同志覺得，毛澤東和整個官僚層在面臨工人階級獨立運動的威脅中正在退讓，毛澤東正在尋求某種妥協，某種反對派可以接受的解決辦法。正如我們上邊敘述的一樣，其實目前仍未有任何真正獨立的工人運動存在。

如果有任何特色的話，目前局勢的特色是毛派比反對派更弱。毛派的弱點在於沒有黨幹部。正因為這一理由，毛澤東首先被迫越出黨外進行清算，同樣的理由使他從一開始就非常倚重軍隊。目前局勢實際上是這樣，毛澤東正在作著策略上的退卻——這並不是妥協——目的在於鞏固他已獲得的東西，重新集合他的力量，準備另一次攻擊。毛澤東已獲取了幾個城市，現在他必須進行鞏固他的勝利品。這樣做，他需要幹部，同樣理由，他正進行重新把那些由周恩來代表的幹部集合在他的旗幟之下（大家都記得，我把周恩來代表的一組認為是一種第三者的傾向，但並非真正的反對派）。毛澤東對反對派的態度完全沒有轉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一小撮」，仍然受到和從前一樣的嚴峻批判，「奪權」的口號仍在那些反對派當權的地方如火如荼般進行。依我的看法，兩派的鬥爭仍然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這一鬥爭有它的深厚的社會根基，是不能夭折或很容易妥協的。兩派達成妥協的可能性是需要一種非常的情況才可能發生的，但這並不是目前的現實。

最後，由聲明所提出的只是一種可以應用到差不多所有工人國家的抽象的原則。它沒有針對中國的具體事件而提出問題，也沒有對這些事件作出任何新的提議。

對目前危機中就行動方面說來，這些抽象理論是無助於中國同志的。從上邊我所作的分析，我要求國際執委會重新

估計聲明所採的立場，在將來按事件的實際發展進行分析，不要僅滿足於抽象的可能性和抽象的理論與思想。

我的立場與思想，中國同志的立場與思想，在我的兩篇「訪問記」和「公開信」中已經表達得非常清楚。因此，這裏毋需贅述。我們認為，聲明所採取的立場是非常錯誤的，這樣的立場必然使中國托洛茨基主義的前途陷於非常危險的境地。我們的結論是，我們必須採取給反毛派及反個人獨裁的反對派以批評的支持的立場。

## 我們在中共內部派系鬥爭中應有的立場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當毛澤東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發動所謂文化大革命時，由毛澤東和劉少奇分別代表的兩個主要派別爆發了一場巨大的鬥爭。在隨後的兩年時間中，這一鬥爭業已加劇，震盪著中國社會的每一部分。不僅該黨及其青年組織，而且各級工會和政府都造成了極端混亂的局面，甚至在人民解放軍中亦產生了深刻的分裂。武鬥在中國到處發生，全中國今天仍然處在此一巨大政治風暴的陰影威脅之下。

過去兩年來，國際不但沒有得出共同立場去干預中國事件，而且陷於混亂狀況和產生嚴重衝突的政治立場。爲了澄清這一混亂並由此而得出正確的和共同的立場，首先讓我闡述業已發展的三種主要的政治分歧。

(一) 佐治·諾華克同志在他的一篇題爲《中國的政治危機》(載於一九六六年秋《國際社會主義評論》)，分析了中國事件之後，以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名義說：

「同時，我們對於因要求更多思想和言論自由和要求改正由目前領導所造成的錯誤而遭到無理迫害和污蔑的中國革命共產黨員，知識份子，學生和青年應負起責任。在爲更廣泛民主和正確道路的鬥爭中，我們要站在他們那邊。」(一四四頁)

(二) 國際執行委員會一九六七年三月舉行的全會對中國事件所通過的聲明說：

「但是，使國際與中共目前彼此抗爭的任何傾向和派別能獲得一致的資料仍不夠清楚。」(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世界展望》，五二三頁)

(三) 阿根廷同志在他們對國際執行委員會一九六七年三月討論決議的聲明中說。「丟開其怪異的，官僚主義的方面不說，毛派邦拿巴特主義在發動文化大革命中扮演著進步的角色，因為它動員群眾反對官僚主義，不管毛林派的邦拿巴特計劃，這一運動有其自身的動力。

「因此，對這一運動必須給以有條件的支持，使其反官僚主義的動力更加明確，批評毛派所定的可怕的限制，領導和思想；

「這一批評的支持決不能限制我們積極參與引起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因為只有這種參與並和群眾結合的參與才能事實上克服毛派的領導。」(載於「聯合書記處內部公報」，一九六七年十月第七卷。「對中國文化大革命國際討論公報」第四號)

非常明顯，這三種立場彼此互相矛盾，特別是第一種和第三種。我們現時所面臨的任務是：決定這些解釋中的那一種最符合中國事件的實際發展，因而我們可以採納作為國際工作的共同基礎。為了作出這一決定，我們必須開始檢查和分析上述的每一種解釋。

### 支持那些遭受無理迫害的人

上述的諾華克同志的文章，來源自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即一年前）所作的演說。那時，對中國事件所得的材料比現在還少。但即使在那時，諾華克同志仍然能夠說：

「從羅織對異己知識分子的罪狀及其他資料來源中，我們可以分辨出他們的批評及其思想傾向的大約輪廓：

「(一) 他們懷疑毛澤東永不錯誤的神話。

「(二) 他們認為自己是比目前的領袖更好的共產黨員。

「(三) 他們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分子表示「同情」；那

就是說，他們想聯合各「社會主義國家」以防萬一美國可能的攻擊，彌補與蘇聯的裂痕和重建聯盟。

「(四) 他們批評「大躍進」各種過份的做法和企圖在落後的土高爐煉鋼中的浪費努力。

「(五) 他們要求更多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有權對官方路線表示不同意見。

「(六) 他們可能甚至敢於提議，以健康或年齡為理由要毛澤東下臺。

「綜合起來，這些立場將構成一個重要的反對派綱領。」  
(一四二頁)

去年動亂事件一般地證明這幾點和諾華克同志對事件嚴重性的看法的正確。這些又證明諾華克同志正確的洞察力：「現時公開受攻擊的作家、專家和學者，可能是攻擊黨內和軍內高層人物（包括那些對近年來外交和內政政策的結果不滿的分子）的真正目標的代替品」。事件已經確定地表明，吳晗、鄧拓、廖沫沙、田漢等人，正是黨內和軍內高層人物——如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羅瑞卿、陸定一等——真正目標的代替品。

怎的諾華克同志在他的分析中這麼正確？照我的意見，這一正確性並非是偶然的。諾華克同志的結論和中國同志的結論是一致的，雖然他們之間並沒有共同討論過，這也不是偶然的事。諾華克同志和中國同志僅僅考慮了客觀的事實和應用了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分析這些事實。

### 中立主義

一九六七年三月國際執行委員會所討論通過的決議，是由里維奧·邁登同志所起草的。這一決議是在諾華克同志的文章發表了九個月之後，經由國際聯合書記處整理發表。在這九個月的時間裡，毛派和劉派的鬥爭升級到新的高度，衝

突的基礎變得越來越明顯，特別是從毛派分子在攻擊其反對者時發表的大字報和文章的資料更是如此。但是，國際執行委員會仍然認為「資料不夠清楚」。這只能表示，要嗎就是文件的作者存有偏見，要嗎就是沒有掌握事件發展的要素。

緊接著上面的引述之後，國際執委會的文件企圖以如下的方法證明它的中立主義立場是對的：

「資料的缺乏主要地是由於毛派在對付其反對分子時所採用的史大林主義的方法，這是我們要強力地予以譴責的。至於毛的反對者，如劉少奇和鄧小平，如果他們願意，他們過去握有和現在仍然握有可以發表他們的政治路綫的相當手段，但他們在這問題上保持緘默，迫使我們對他們的政策內容採取較為慎重的態度。」

這一辯明在下述兩方面都是錯誤的：

（一）一九六六年十月在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一次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和鄧小平受到毛派分子猛烈攻擊，被迫作自我檢討。從那時起，他們不僅是失去了所有「可以發表他們的政治路綫的手段」，而且他們已經被軟禁在家，受到嚴密的監視。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很容易明白，他們沒有任何可能提出自己的政治路綫和回答毛派分子對他們的各種攻擊和污衊的機會。國際執委會的文件指責劉、鄧的沉默，如果不是諷刺話，就是反映了對中國事件的違理的不瞭解。

（二）我們當然應該「強力地譴責」毛派在對付其反對分子時所採用的史大林主義的方法。但這並不表示沒有足夠的資料。我們又必須檢查和分析毛派分子的攻擊，藉此決定「他們的（劉鄧的）政策內容」。在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當我們檢查某一史大林黨內鬥爭時，這是我們的傳統方法，而托洛茨基本人就是用這一方法進行分析在蘇聯內發生的事件。但在國際執委會的文件中沒有一處地方人們可以找到這

樣的企圖去進行這樣的分析。

這似乎是，在劉鄧正式提出其立場之前，國際執委會的文件的思想是不提自己的立場。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必須等待劉鄧奪回政權和鬥爭結束。但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有責任去干預目前的鬥爭，以此決定鬥爭的結局。因此，我們必須檢查毛派的攻擊和控罪。例如，讓我們考慮下列各點：

（一）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基本分歧發生於一九五八年。當時毛獨斷地提出了和實行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政策。諾華克同志在上面引述的文章中曾詳述了在這些政策上的分歧。我本人曾在安東尼奧·法里恩同志的兩次訪問記中，特別是第二次的訪問記「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關係和分歧」——去年八月投給《世界展望》——具體地詳細地敘述了這點和其他的主要分歧（見《世界展望》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和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過去六個月的事件發展更進一步證實了這一判斷。毛派攻擊吳晗的劇本《海瑞罷官》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這不是偶然的事件。吳晗的「海瑞」實際上是指彭德懷，他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廬山會議上因反對大躍進特別是人民公社而被毛澤東清算。因為他的反對，彭德懷變成了所有反對毛澤東政策的表徵。

這裡，我們必須注意到廬山會議期間及以後劉少奇所採取的立場。紅衛兵報《首都紅衛兵》關於劉少奇這樣說：

「一九六二年一月在中央召開的七千人的大會上作了一個修正主義的報告，他大肆攻擊三面紅旗，竭力誇大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他認為暫時的困難是由於工作中的錯誤造成，『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攻擊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鬥爭過火了，反右傾本身就是錯誤的，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翻案。他誣蔑黨內缺乏民主，黨的生活就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攻擊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一九六七年二月廿二日

——《劉少奇的罪狀》)

這表示，劉不但反對毛的政策，而且替彭德懷及其支持者翻案，主張黨內較多的民主措施。

一九六七年八月《人民日報》和《紅旗》（見一九六七年《北京評論》第三十四期）發表了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關於彭懷德事件決議的撮要。這一決議譴責了彭德懷，因為彭德懷稱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為冒險主義和「小資產階級狂熱病」。這些字句清楚地顯示出彭德懷的立場。

更重要的是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它說：

「就是這個人（劉少奇），在廬山會議上極力玩弄反革命的兩面手法，積極支持彭德懷的反黨活動……廬山會議之後，他開始亮相，污衊總路綫為盲目冒進，大躍進『匆忙中提出』，造成『經濟上的不協調』，認為『人民公社成立得太早』，『有解體的危險』。他甚至荒謬地認為『廬山會議做錯了』，『反右傾機會主義是錯誤的』。」（《北京評論》，一九六七年第三十五號，七頁）

如果上述由劉少奇表達的思想並不完全正確，至少它是進步的，反映中國工農群眾的情緒和中共絕大多數幹部的意見。

（二）反史大林化運動、反毛澤東個人崇拜和個人獨裁是劃分毛派和劉派的最嚴重和無法妥協的問題。

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的中共第八屆代表大會關於赫魯曉夫在蘇共第廿次代表大會譴責史大林個人崇拜及其他罪狀的演說的討論中，劉少奇、鄧小平和很多其他領袖表示同意赫魯曉夫的行動。正因為這一理由，第八屆代表大會提到劉少奇的建議（見紅衛兵報紙《井崗山》之《看到劉少奇的醜惡面目》，轉載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十九兩天的《明報》）將

中共黨章修改，刪去所有關於毛澤東思想的論述。在提議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鄧小平說：

「反對個人崇拜的意義，蘇聯共產黨第廿次代表大會中作了有力的闡明，這些闡明不僅對於蘇聯共產黨，而且對於全世界其他各國共產黨，都產生了巨大影響。」「蘇聯共產黨第廿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功勳，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個人崇拜是有長遠歷史的社會現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定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見紅衛兵報紙《紅旗戰鬥》——「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轉載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廿一日的《明報》。）

這是在反史大林化的問題上中共黨內氣氛的反映。在這一壓力之下，毛澤東被迫忍受這些反史大林化的措施，即使這些措施是對個人嚴重的打擊。可是，第八屆代表大會以後的歷史清楚地表明，毛澤東從沒有接受反史大林化的措施。他推出劉、鄧負責其個人損失，爭取每一機會向他們報復，並努力恢復他的舊聲望。就是這個主要理由，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把劉、鄧作為主要敵人，將毛的個人崇拜推到不能令人置信的高度。

（三）毛澤東在文藝、教育領域中的政策和日丹諾夫在蘇聯所實行的，即使不會過之但也無不及。因此，在文化和教育工作者中經常出現批評。在毛澤東與文化、教育工作者之間經常存在著尖銳的敵意，這些敵意就是毛澤東指控那些人是匈牙利「裴多斐俱樂部」在中國翻版的來源。

陳碧蘭同志根據很多可靠和各方面的資料來源，在一次訪問記中詳細描述了關於在文藝和教育問題上所發生的最重要的鬥爭（見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世界展望》）。這裡我

將不再重覆那些訪問記中所包括的豐富和貼切的資料，但我希望同志們注意一個重要的事實：劉少奇在對中共第八屆代表大會所作的政治報告中強調這一點，即是，黨不應該獨斷地干涉科學家和藝術家的工作。以劉少奇的報告為基礎，這次大會通過了一個決議，說：

「爲了保證科學和藝術的繁榮，我們必須確定不移地主張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使用行政方法獨斷地干涉科學和藝術是錯誤的。」

這說明了，劉少奇在文藝和教育問題上的思想和毛澤東有很大的不同。因爲劉在這些問題上的容忍立場，所以很多文化、教育科學幹部都支持劉少奇反對毛澤東。正因爲如此，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文化、教育的領導幹部作爲首要的攻擊目標。

（四）雖然關於外交政策分歧的資料較少，但我們一般地同意諾華克同志的觀察：「他們（反對派）想聯合『社會主義國家』以防美國萬一可能的攻擊，彌補與蘇聯的裂痕和重建聯盟。」這點已由前陸軍參謀總長羅瑞卿所發表的思想予以證實，羅從軍事觀點反對與蘇聯決裂。

自從文化大革命發動以來，毛澤東把中國和蘇聯的關係推到瀕於完全決裂邊緣；同時，他明白地表示拒絕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聯合共同保衛越南反對美帝。這點從反面證明了毛劉之間在外交政策，特別是和蘇聯的關係上存在著分歧。

（五）上海事件，特別在人民生活水準問題上，似乎進一步加深了毛劉之間的新分歧。但是，這一分歧是長期存在著的。

在中共奪取了政權後不久，毛澤東提出了以毛澤東思想號召群眾以革命精神建設社會主義的綱領。從此，他創造了犧牲的氣氛，嚴格限制群眾生活程度的改善；另一方面，劉少

奇覺得，不改善群眾生活程度，即只要求群眾犧牲而沒有報酬，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因此，劉少奇在第八屆代表大會所作的政治報告中強調改善群眾生活水準的必要。在同一的以劉少奇報告為基礎的決議中，我們發現下述的一段話：

「如果國家取去國民收入中太大的百分比，而沒有注意改善人民生活程度，不注意他們的利益和個人需要，這將有害於提高勞動生產力和群眾在建設社會主義中的積極性，那就是說，有害於社會主義的利益。」

按照毛澤東的觀點，改善人民的生活程度就是提倡「物質鼓勵」，對他說來，這是修正主義道路。毛澤東獨斷地實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政策，為的是盡量掠取群眾的勞動，他們被迫做比往常更長的時間，但領較少的工資。群眾對此產生的憤怒和不滿仍然是中國生活的主要因素。圍繞著這些感覺，毛澤東的反對派能夠組織群眾在毛派紅衛兵攻擊中防衛自己。通過向工農讓步，如增加工資和其他利益，反對派能夠引誘工農抵抗甚至以罷工反對毛派的政策。這在去年一月（一九六七年）上海、南京、南昌、廣州及其他很多地方大規模的罷工達到最高潮。毛澤東用軍隊在上海奪權和壓平了罷工之後，他取消了所有讓步，指控反對派腐蝕群眾，即「經濟主義」和「修正主義」。從這些事件開始，人民生活程度問題變成了鬥爭中兩派的重要分歧。

\*

\*

\*

上述五點在很多攻擊劉少奇、鄧小平和其他反對派重要人物的文章中記載得很清楚。如果這五點加上上述諾華克同志的七點及在我的訪問記中所列的其他各點仍然未足以「構成重要的反對派綱領」的話，但這些確無疑表示，劉、鄧代表的反對派是中共內部的一種改良主義的傾向，或多或少反

映群眾的願望，因此，這一傾向是進步的。

國際執委會的文件並沒有檢查或分析兩派之間的分歧，我們必須問，爲什麼？主要的理由是，文件的作者並沒有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在這點上，阿根廷同志在其一篇題爲《對於一九六七年三月國際執委會決議的聲明》正確地批評了國際執委會的文件：

「這一決議包括著各種疏忽和危險的方法論的錯誤……它沒有評述，當所有官僚之間的分歧具有如此重要和可悲的性質時，這些分歧本身反映了深刻的階級壓力，除此就沒有別的；僅僅是官僚之間政治的和策略的分歧隨後就具有階級的性質。」

在國際執委會的文件中，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被遺棄了，而代之以印象主義。這一鬥爭只被表面地分析，因而認定，它僅僅是「官僚之間的衝突」（見邁登同志的文件，《中國內部衝突的風暴》，一九六六年十月七日《世界展望》）。只要有這一抽象的公式——官僚間的衝突——我們就不必要分析造成兩派抗爭的分歧，也不必要分析這些分歧的社會來源。這一公式預先假設兩派基本上是一樣的，因此就需要採中立主義的立場；即，不支持任何一方。這就是國際聯合書記處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聲明的主旨。

雖然國際執委會的文件（一九六七年三月）放棄了敘述「官僚之間的衝突」的公式，但它仍然沿著十一月國際聯合書記處聲明所定下的同一路線前進。在描述中國事件發展的不同階段時，國際執委會的文件絕沒有敘述這一鬥爭爲了什麼，也沒有敘述由此而發生的不同的政治立場。

國際執委會的分析不但是表面的，而且在好幾處歪曲事實。例如，它贊揚毛派分子發動了上海罷工。然後它說，在面臨給予群眾讓步的問題上毛派分子發生了分裂。這一思想

在里維奧·邁登同志和皮雅爾·佛蘭克同志的幾篇文章中發展起來（見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和一九六七年八月廿五日的《世界展望》）。邁登同志在其中的一篇文章中說：

「……當危機觸發時，上海的領導是毛澤東的主要支持和……黨市委會一致決定發表反吳晗的著名的文章」。

事實是，上海的領導並不是「毛澤東的主要支持」。他們的立場可以稱之為中立主義。當毛澤東命令姚文元所寫的攻擊吳晗的劇本的文章在《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發表時，上海的領導並沒有把問題看得很嚴重，因為這僅僅是涉及對某一個人的批評。因此，他們沒有反對毛的命令。但隨著吳晗被貶，特別是整個北京市領導被撤換，紅衛兵攻擊高級黨官和全國各地方黨委會之後，事件的嚴重發展迫使上海市委會採取某種措施保護自己。因而他們開始組織群眾，給他們各種讓步。上海領導方面的抵抗迫使毛澤東採用軍隊的效忠實行鎮壓工人罷工。差不多整個上海市黨委會的領導和工會、工廠、其他經濟機構的領導幹部，加上《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的編輯和職員隨後都被清算。已經給予工人的讓步跟著由毛派分子予以撤銷。這一切，結果造成了經濟癱瘓，因而引起周恩來批評排除原有幹部的各新近成立的委員會。軍隊、紅衛兵，某些原來幹部的聯盟——「三結合」——從此被提出，作為組成新領導機構和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方法。

邁登同志和佛蘭克同志對上海事件的描述，並非建基於具體的事實之上，而只是憑藉他們自己想像中的虛構而已。他們宣稱，上海領導支持毛澤東和毛派分子在面臨工人罷工時發生分裂，這完全是違反事實的。

當文化大革命開始發動時，很多地區的、省的、地方的領導採取中立或「等著瞧」的態度。只在鬥爭發展到威脅他

們自己的地位的時候，他們才開始採取抵抗毛澤東的確定的立場。上海領導、廣東省和湖北省領導就是最好的例子。

開始時，很多軍隊的領袖也是採取中立的立場。例如，武漢司令陳再道，在目睹了對一些人如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進行嚴重的和污蔑性的攻擊之後，開始改變了原先的中立主義立場，變成採取抵抗紅衛兵和毛派分子攻擊的立場。

很不幸，國際執委會文件的作者並沒有考慮這些重要的資料。

### 對文化大革命批評的支持

阿根廷同志要求給予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以批評的支持，事實上是要我們支持毛澤東清算劉鄧派。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召開第十一次全會所通過的「十六點」已經指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是「鬥爭和粉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隨後的事件清楚地表明，這是意味清算劉派的領袖，如劉少奇本人、鄧小平、陶鑄、彭真、陸定一、羅瑞卿和很多地區和省級的領袖，如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峯、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上海市委會第一書記陳丕顯、上海市長曹荻秋，江西、山西、黑龍江、山東、青海和貴州省等省委會差不多所有領袖。

阿根廷同志能提出證明其給予毛澤東文化大革命以批評的支持的唯一理由是：

「——丟開其怪異的官僚主義的方面不說，毛派波拿巴特主義在發動文化大革命中扮演著進步的角色，因為它動員群眾反對官僚主義……（重點是本文作者所加）。

這一論點早就由佛蘭克同志在其一篇有關上海事件的文章中提出來，他在這篇文章中說：

「……我們完全不能責備對群眾發出反官僚化的黨及國

家機器的號召，即使這一號召是由官僚層的一翼提出的……我們已經注意到毛派分子沿著平等主義要求的路線上提出某種號召，即使這些號召是煽動性的，這有可能產生某些結果」（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世界展望》）。

如果毛派分子實際上號召「群眾……沿著平等主義要求的路線上……反官僚化的黨及國家機器」，那末，人們必須承認這樣的號召是進步的，因此我們必須給予提出這些號召的人，即毛派，以批評的支持。

上述佛蘭克同志清楚地表達的意見亦是國際聯合書記處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發出的聲明的主題之一。在一封於一九六七年三月給國際執委會全會的信中我已經簡略地批評那一個聲明，在這封信中我說：

「但是，如果聲明所表達的思想認為這一鬥爭僅僅是一種『官僚之間的鬥爭』，毛澤東派用平等主義的口號號召群眾反官僚主義是真實的話，那末爲什麼聲明不予毛派以批評的支持而只採中立主義的立場呢？爲什麼聲明不從它所提出的思想得出邏輯的結論呢？

國際聯合書記處的聲明並沒有說我們應給毛派文化大革命以批評的支持，但它的思想確定地意味著我們應該這樣，或者至少導向這樣的立場，而現在阿根廷的同志邏輯地要求我們採取這一立場。

阿根廷同志提出的基本分析根本是和「希利小組」的一樣，而和「每月評論」的「斯瓦柏克小組」或「舒伯曼小組」和「史維斯小組」的見解並無很大的不同。他們亦是開始假設，毛澤東組織學生群眾進行反官僚主義。但這一假設提出了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紅衛兵是怎樣組織起來和他們用什麼手段來反官僚主義的呢？這兩方面都由諾華克同志和韓生同志在給《每月評論》的答覆中談及了：

「學校開了門，千百萬青年被放了出來。他們賦與一種特權，而這一特權即使在一個富有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很有吸引力的；由政府支付旅行北京的費用，免費交通、住宿和膳食提供給那些絕大部份新組織的未來候選人。

「這一政策就是利用這些手段把這些青年籠絡到他們的派系那一邊，誘惑他們接納其派系的綱領，但不讓他們明白實情，不讓他們知道反對派的傾向，不給機會讓他們在公平的辯論中提出自己的觀點，事實上，從一開始反對派就受到污蔑，毫無辯論的餘地就被打上了反黨、反革命和『可悲的一小撮』牛鬼蛇神的烙印。

「被指控的領導人的真正『罪過』不是他們陰謀進行復辟資本主義，而是他們和毛派有著嚴重的分歧。他們的觀點被歪曲，以此在群眾的心目中鬥臭他們，即使不是在人身上而是在政治上毀滅他們。

「這些毛澤東及其隨從者在史大林主義學校中學來的論爭方法首先對托洛茨基主義者實行……除了在運用中加一些特色外，這並非什麼新創意，也不是什麼新東西。」（見「馬力特出版社」小冊子：《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幕後》，四十七——四十八和五十二頁）

這最好地解釋了「毛澤東邦拿巴特」怎樣動員群眾反官僚主義和他們使用的方法。如果阿根廷同志已經得出毛澤東的行動是進步的結論，那末他們就是走著由《每月評論》讚揚備至的「希利」和「斯瓦柏克」的同道路。

當阿根廷同志批評國際執委會的「危險的方法論錯誤」時，他們對這一討論作出了有價值的貢獻。但是，他們本身卻沒有利用他們所提倡的這一方法論的程序。他們沒有說及，更談不上描述和證明，「階級壓力」是怎樣在毛林派或劉鄧派中得到反映。他們只表示，劉鄧派代表著被毛派分子清

算的死硬官僚分子，而毛派則是官僚層中較進步的分子，因此，我們要給毛澤東以批評的支持。如果阿根廷同志繼續堅持他們的立場，用這樣的方法和採取這樣漫不經心的態度，我們就不能和他們進行嚴肅的討論，對此我們是感到遺憾的。

### 政治革命和中立主義

一九六七年三月國際執委會的文件第二段這樣寫著：

「由這次領導危機所引起激烈鬥爭的過程中，特別是由於『文化大革命』所採取的方式——黨、國家、工會、青年組織等完全陷於混亂。同樣的理由，在領袖、國家機器和群眾之間的關係同樣經歷了基本的轉變。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創立以來，群眾，特別是大城市的無產階級群眾第一次被組織起來，其自然的高潮就是一次反官僚層的『政治革命』」。

這一描述和中國事件的前景，特別是「反官僚層的政治革命」的前景，應該予以強調。這是自國際統一以來第一次正式採取贊同在中國實行政治革命的立場。但是，國際執委會的文件並沒有表示政治革命的必需理由。它既沒有指出中共是史大林黨的特點，也沒有指出其統治的官僚獨裁。如果人們不解釋這兩點，人們就沒有提供要求政治革命的理論基礎。

在國際內部，對於中共及其統治的性質存在著幾種不同的意見。就我所知，只有社會主義工人黨和中國同志曾經廣泛地討論過中國問題並採取了確定的立場——要求政治革命。（見社會主義工人黨之《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成果》——一九五五年十月《討論公報》A 三十一號；彭述之的「論中國共產黨及其統治的性質——政治革命還是民主改革？載於一九六一年三月社會主義工人黨《討論公報》二十二卷，第四期）事情似乎是國際其他部分的大多數人到現在才嚴肅地

討論和採取確定的立場。

一九四九年中國革命之後，國際的大部分主要領導同志採取這樣的立場，認為中共奪取了政權之後再不是一個史大林主義黨和隨後由它建立的政府並非是官僚專政。這一分析當然排除了「反官僚層政治革命」的前景，因此，如果中共及其統治的性質在目前的討論中不予以澄清的話，那末只有混亂和矛盾的發展是必然的。

此外，更重要的是，國際執委會提出了政治革命的前景，但沒有說明兩個鬥爭派系的社會基礎。缺乏了這樣的分析是不能領導群眾走上政治革命的道路的，相反，它只能使群眾產生混亂，因而客觀上幫助了較反動的分子——毛派分子。

中立主義實際上意味著什麼？它本質上意味著毋需干預目前的鬥爭。換言之，毋需給一方以批評的支持而反對另一方。在中國對今天發生的動亂和具有歷史性的事件底光照之下，站在一旁並以觀眾的身份對待這些事件的中立主義，對革命者說來只能被認為是最不負責任的立場。反對者大致說，我們對於毛派和劉派之間的鬥爭不感興趣，我們感到有興趣的是引導群眾走上推倒整個官僚層的政治革命的道路。像這樣的反對者只能反映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無知，或是宗派主義的表現。在開始的時候，群眾運動的性質是難於認識的，有的只是官僚統治的性質和政治革命的需要，具有這樣的認識只有通過直接的經驗。目前，中國群眾正在開始認識到兩個在鬥爭中的派系那一派較能和他們的利益合調。

最初，群眾往往支持改良主義的傾向。只有他們經歷了與改良主義傾向一起的某種經驗之後，他們才會認識到，即使是改良主義者也不能解決目前的緊要問題。換言之，中國群眾主要地通過他們自己的經驗，不是從那些站在旁邊宣傳政治革命的人，認識政治革命的需要。

目前毛劉之間的分歧已經變得非常明顯。一方面，毛澤東仍然堅持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政策是正確的；要求在科學、教育和文化方向的極端奴隸臣服；絕對拒絕改善群眾生活水準的讓步；拒絕允許群眾任何言論自由的要求，但要求他們完全按他的思想辦事；絕對拒絕和其他工人國家特別是行將與其關係破裂的蘇聯採聯合陣線。另一方面，由劉少奇領導的反對派則反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政策；大力反對毛澤東在科學、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政策；支持反史大林主義化；反對毛的個人崇拜和獨裁，因而贊成言論自由；想改善和蘇聯的關係以便幫助越南人民。這些分歧排除了任何中立主義的立場，即只是旁觀者的立場。作為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我們，不得不採取建基於《過渡綱領》的確定的立場，即我們必須給劉派以批評的支持，反對毛派及其追隨者，以便干預這一鬥爭。只有這樣做，我們才能爭取群眾和那些受毛派攻擊的人到革命政綱這邊來。只有支持劉派，我們才能夠向群眾表明，劉少奇及其同黨是不能夠解決中國的基本問題的。這是說服群眾必須推翻整個官僚層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中國的唯一道路。

### 結論

十月革命和史大林篡奪政權證明是對很多自稱為革命者的派別和個人的嚴重考驗。今天中國問題僅次於蘇聯問題。特別是自一九四九年中國革命以來，很多派別和個人都受到中國事件的考驗。在我們的運動中，我們見到了巴布洛和斯雅柏克的特出的例子。因此，我希望國際對中國問題的立場採取嚴肅的態度。我誠懇希望各國同志都積極參加討論，以便幫助國際取得正確的立場，干預中國事件，並且將中國的政治革命提到行將到來的議程上。（譯自聯合書記處《內部公報》）

## 為第四國際重新統一和 反希利的極端教派主義而鬥爭 (一九六九年)

從一九五四年初國際正式分裂為國際書記處（IS）和國際委員會（IC），直至一九六三年重新統一為止，中間相距差不多十年。

我們已經說過，這次分裂是不合理的，本來可以避免的。在巴布洛方面，他們走得太遠，走到了完全的取消主義，從政治上來說，有理由形成分裂。但是，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公開信沒有首先由內部討論，按照正常的組織方法，而獨斷地公佈出來，因而造成了分裂。這種分裂是不正常的。雖然我和香港的同志們贊成公開信的政治內容，但從組織程序說，這次的分裂是不合理的，所以我在國際委員會內極力主張重新統一；我認為應該依照組織的程序在黨內鬥爭爭取多數，才符合第四國際的民主集中制的傳統。

在當時贊同我的意見的，有錫蘭支部的同志。一九五四年巴布洛派召開他們的第四次大會時，錫蘭同志也參加了。他們同我的意見一樣，雖然堅決反對巴布洛的政治意見，但極力主張重新統一。錫蘭支部是第四國際當時最有力量的群眾黨，在錫蘭國會佔了十四個議席，擁有相當的群眾基礎，所以大家都很看重這個支部。一九五四年四月巴布洛派的大會之後，錫蘭的代表錫爾華戈文來和我商談，我們對統一問題有相同的看法。因此，當這個問題在國際執委會上再度提出後，會議即席決定由我起草文件，作為協議統一的政治基礎。我的《評巴布洛主義》一文，就是在這種情形下寫成的。

在一九五五年，由國際書記處和國際委員會各派代表成立了一個平權委員會。

希利（即白恩斯——編者）是當時國際委員會的書記，他表面上雖然贊成統一，骨子裏卻很不願意。巴布洛也有同樣的心情。因此，他們雙方在平權委員會上玩弄外交手段，使得統一問題毫無進展；平權委員會也就中途停頓了。鑒於這種情況，我寫信給錫蘭的社會平等黨和美國的社工黨，要求他們各派代表參加平權委員會，不讓希利和巴布洛玩弄詭計。錫蘭方面沒有回信給我，看來他們不願派出代表。美國方面雖然回信說同意我的看法，但表示難以派出代表。

再一次，我去信給美國社工黨，促其實現統一。大概在一九五八年間，加農看到我的信後（他當然也看到了我批評巴布洛的文件。在那份文件中我提到三個主要支持巴布洛的人：美國的克拉克、英國的羅林斯和法國的米歇爾，已經走到徹底的取消主義，離開了國際。）他因而給了錫蘭支部當時的總書記廸拉克一封信，內容認為雙方的意見已經接近，統一的時機已經成熟；加上上述三人已脫離第四國際，因此客觀上有利於統一的達成。加農把這封信的副本寄給我和其他國際委員會成員。

希利根據加農這封信內的意見覆了一封信。希利否定加農的看法，認為我們與巴布洛的意見曾得到書記局各國支部內的許多人的支持，不是偶然的，不能因為幾個人離開，就證明統一沒有障礙。

我在國際委員會內和希利進行了嚴重的鬥爭，並寫了一封信給加農。信內指出：巴布洛派的思想確是越來越接近我們。在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後，由曼德爾寫的《史大林主義的衰落與滅亡》，比起一九五四年的《史大林主義的升起和沒落》，已經有很大的改變。所以，不能把他們已經改變的意

見說成和過去一樣。至於巴布洛爲什麼得到各國支部內很多同志的支持，那主要是因爲社工黨當時發表的公開信，沒有經過正式的組織手續，先在國際內部進行討論。因此，有很多支部對巴布洛的修正主義思想不清楚，有些同志，雖然在政治上贊成社工黨公開信的內容，但組織上卻不同意它的方法，因此，仍然留在國際書記處裏；錫蘭支部就是一例。我說，如果社工黨在未公開刊登公開信前，先交國際組織內部討論，那不但不會造成分裂，而且一定可以爭取到多數。我舉了一個非常恰當的例子：三十年代末在社工黨內部發生的關於蘇聯問題的鬥爭。由於托洛茨基根據布爾什維克的組織程序進行內部討論，結果社工黨的絕大多數和各國支部都贊成托洛茨基的意見，只有很少數的人追隨夏克曼脫離組織。如果在一九五三年，社工黨發表公開信前，經過同樣程序在內部討論，結果會和現在完全不同。

我又在信內反駁希利藉口巴布洛的「個人崇拜」，說即使統一後不會有好結果。我指出這種「個人崇拜」的現象，完全是歐洲支部的一些領導幹部造成的。我舉出了如下的事實：希利自己曾親口對我說：「巴布洛在政治上可以比得上托洛茨基，組織上還過之。」像這樣的話，正是製造巴布洛的個人崇拜的顯例。如果真有對巴布洛的個人崇拜，希利本人首先就要負責。可以說，如果組織是正常的，根本就不會讓巴布洛這樣的人控制國際的領導。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對於自己的錯誤應該加以分析、承認，並且糾正；現在我們應加緊推進統一的工作，並展開嚴肅的討論，這樣才可以幫助我們糾正錯誤。

國際委員會當時由希利操縱，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完全不能起任何積極作用，非常殘缺呆滯。會議對政治問題不作嚴肅的討論，間或討論了，也沒有作出決議——或是有了決議

也不見得執行。舉例說，像赫魯曉夫在蘇共第廿次大會上反對史大林的報告——這樣對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發生著重大影響的政治事件，國際委員會竟沒有去討論！只委託法國的藍伯特派去起草決議。但這決議並沒有草成。像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在組織方面，當時法國的藍伯特和英國的希利都反對統一，他們甚至不讓義大利派出代表參加國際委員會，拉丁美洲的支部如智利、阿根廷等也沒有代表參加。

為要改變這種不正常的狀態，我三番四次去信要求美國派代表參加國際委員會，要求他們負責推動統一的工作。但是美國採取消極的態度。當時社工黨的總書記杜勃士回信給我，說他們財政困難，派不出人。我回他的信中說，我可以出面向瑞士支部要求幫助。但卻沒有收到美國明確的答覆。這些美國的通信，其中有些是公開發表在內部公報上。最後，在六二年，韓生赴歐悼念托洛茨基夫人娜姐莉亞，才算正式派出代表。韓生往英會晤希利，同往的還有他的妻子利巴和加拿大的代表道生。但是，希利對待他們非常無理，使他們很難忍受。最後，希利給了韓生一個文件，名為《被背叛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即攻擊社工黨已背叛了托洛茨基主義。

韓生受了這個打擊，當他來到凡爾賽探望我們時，表現出沮喪，準備回到美國去，我勸他應該留在巴黎，不管希利陰謀詭計破壞統一，我們必須盡力實現統一。否則，國際委員會是會崩潰的。我還告訴他，巴布洛派正在瀕於分裂。法國從前堅決支持巴布洛的比爾·法蘭克，現在已認為非統一不可。曼德爾也有這種傾向（法國支部為韓生安排住處，就是表示法蘭克有意於統一）。我還答應寫一篇反擊希利派的文章。

最後，希利和他的同僚從英國來到巴黎，舉行國際委員會會議。我參加了這次會議，在會議上，希利和藍伯特一唱

一和地攻擊社工黨，使韓生非常難堪和灰心。會後，我告訴韓生：第四國際即使沒有英國的希利和法國的藍伯特，仍然是要統一的。我又打氣說，我們方面有瑞士、美國、中國、日本（當時我已與日本山西英一取得聯絡）、加拿大以及南美洲的阿根廷和智利的支部。另一方面，我們並不是和巴布洛個人統一，而是爭取國際書記處底下的其他支部，和它們統一。韓生接受了我的意見，穩定下來，並且寫信給國際委員會的拉美各支部；信內說到我的意見，即不管希利他們是否參加，我們一定要進行統一。

我的《白恩斯（即希利）領導下的英國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往那裡去？》一文，就是在這種形勢下寫的。即針對希利的《被背叛了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寫的。希利派的文章，在三個問題上指責社工黨背叛了托洛茨基主義：首先是古巴國家的性質問題，其次是卡斯特羅政權的性質和阿爾及利亞問題。因此，我不得不從理論上和事實上徹底地批評希利派的立場，澄清他們對社工黨的污蔑。

希利派認為社工黨根據古巴的國有財產制而把古巴界定為工人國家，是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他們認為界定工人國家應該根據這個國家有沒有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這是一個歪曲馬克思主義的新鮮論據。我詳細地駁斥了希利派的錯誤觀點，指出他們根本不懂得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問題的基本理論。我指出，界定一個國家的性質，應該根據它的經濟基礎，而絕對不是根據它的政治形式。依照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一個社會的上層建築是由它的下層經濟基礎決定的；是經濟決定政治，而不是政治決定經濟。我舉出托洛茨基批評夏克曼對蘇聯國家性質的曲解時，就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這種社會學。當時，夏克曼派認為蘇聯和希特拉訂立德蘇協定後，蘇聯就不再是一個工人國家了。托洛茨基

在《保衛馬克思主義》裏的許多文章就是要說明這一點：不管蘇聯與納粹黨簽立協定這件事多麼反動和荒唐，但是協定並沒有觸動蘇聯的財產國有制度；十月革命所創造的財產制度的基礎並沒有改變，這個國有財產制度一天存在，蘇聯就仍然是個工人國家，不過，這是個墮落的工人國家，因為它的上層建築已經從無產階級專政墮落成爲官僚專政了。

希利派的理論家斯老德，是從英共產黨轉過來的。雖然他認真，但他的理論還沒有脫離史大林主義的傳統。希利派的另一個論據，說古巴要成立一個工人國家，就必須實行土地國有化；甚至說，必須消滅富農。我指出，希利派又要回到列寧和考茨基爭論土地國有化問題的時代去了。當考茨基說土地國有化是社會主義時，列寧曾說，按照馬克思的意見，土地國有化只是資本主義最徹底的改革，是爲資本主義發展肅清道路。關於消滅富農的問題，我說，只有經過徹底的農業集體化，才有可能消滅富農。但是，古巴——甚至蘇聯，還談不上徹底的農業集體化。依列寧的意見，國家在土地改革後，即把土地分給農民耕種，在沒有完全集體化以前，農民中還會產生富農。但要農民完全集體化，只有在社會的生產技術高度發展後，證明集體農場確比小農生產優越，才能吸引農民自願參加到集體農場，才能有效地消滅富農的發展。最後，希利又說工人國家應該沒有商品經濟。我指出，只有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到極高度的時候，商品經濟才能消失。十月革命後列寧把土地分給農民，農民是天然地要生產商品的；列寧主張的新經濟政策更離不開商品生產，假如依照希利派的說法，那麼蘇聯便從來不是工人國家了。我指出他們的意見是夏克曼派意見的再版——把政治代替經濟作爲規定國家性質的標準。

第二個問題，即關於卡斯特羅政權的性質。希利派說卡

斯特羅的政權是個資產階級政權，和從前古巴的巴蒂斯達的政權本質上沒有兩樣。但巴蒂斯達的政權對內支持地主和資產階級，對外擁護美帝國主義在古巴的特權，是極端反動和腐敗的政權。卡斯特羅雖然不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到底沒收了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財產，把政權建築在工農基礎之上，帝國主義在古巴的勢力可說是徹底地被消除了。國內資產階級的勢力也完全被瓦解。這樣一個進步的政權，希利派甚至拿它和壓平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後的蔣介石政權相比！這是何等的荒唐！如果依照希利派的說法，實行了民主任務和社會主義改革的卡斯特羅政權還是資產階級政權，那就不啻是說：資產階級不但可以執行民主任務，甚至可以執行社會主義的改革任務了。

社工黨在它的六二年的決議上說，古巴在一九六〇年已經走上不斷革命的道路——即是說，卡斯特羅已經從民主革命走到沒收資產階級財產的社會主義革命。社工黨這個論斷，希利派不以爲然。他們說：沒有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就不是不斷革命論；沒收私有財產……算不得是不斷革命。我反駁了他們的論據，指出他們自相矛盾：在中國和東歐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是史大林主義的黨，它們既不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亦不會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可是，正是這些史大林主義黨在這些國家內實行了從民主改革到社會主義的沒收私有財產，最終建立了國有財產制度的基礎的工人國家，客觀上實現了不斷革命的過程——這些，第四國際早有定論，就是希利自己過去也承認的。如果按照希利派今天的說法，那麼我們對工人國家的傳統判斷和分析便要完全翻轉過來了。

第三，是更複雜的阿爾及利亞問題。在一九六二年阿爾及利亞和戴高樂政府簽訂了停火協議，法國承認阿爾及利亞的政治獨立權，阿爾及利亞承認法國在該國的投資石油特

權，並保留在阿的軍事基地，例如海港給予法國海軍利用的權利。協議的達成使阿法戰爭告一段落。美國社工黨認為協議的簽訂是阿爾及利亞的勝利。希利卻認為阿爾及利亞的反帝鬥爭被出賣了，還說社工黨繼承了孟什維克的傳統。

在阿爾及利亞反法帝戰爭開始時期，曾有兩個組織同時進行。一個由麥沙里·哈茨領導，另一個是「民族解放陣線（FLN），由邦彼拉領導。國際委員會委託希利起草的關於阿爾及利亞問題的決議，得到藍伯特支持，認為麥沙里·哈茨所代表的是以工人為基礎的力量，是革命的象徵，因此主張全力支持他——希利甚至親往阿爾及利亞訪問麥沙里，還邀我同行，被我拒絕了。決議又提出召集「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民會議。我強烈地反對這個決議（只有我一人反對，瑞士代表搖擺不定），但其他人不接受我的意見而把它通過了。會後，我發表了一個聲明，內容是這樣的：在阿爾及利亞進行反法戰爭的組織有好幾個，只要它們都堅決地反對法國帝國主義，我們都應該給以支持。同樣，對任何這些團體，我們保留對它們批評的權利。麥沙里是個民族主義者，他的政綱是小資產階級性的，和無產階級拉不上關係；這種人很難保證不會投降。把李卜克內西說成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革命的象徵是可以的，把麥沙里說成是革命象徵則非常荒唐。至於國民會議，它完全是資產階級性的，在理論上與社會主義有本質上的不同，絕不能混為一談。我要把這個聲明發表在內部討論公報上，卻被他們拒絕了。我把這個聲明文件寄給美國社工黨，他們礙於「紀律」，沒有將它發表，我的意見便因此湮沒無聞。不久之後，麥沙里和他的整個組織果然投降了戴高樂，對希利的打擊是夠厲害的。

最後，是巴布洛與我們之間的鴻溝是否越來越寬的問題。根據巴布洛所寫的文件，我把他的思想演變劃分為三個

時期：最初是一九五三年以前的上升時期；一九五三——五六年是巴布洛的思想遭到猛烈的打擊而趨於衰落時期，此後便自行消滅了。至於希利對巴布洛的評價則謊話連篇；我揭穿他的秘密——出自於他害怕統一。希利爲了私利，恐怕統一後便不能在國際領導機關佔重要地位。不統一，還可以繼續作國際委員會的書記。所以他不惜用種種詭計來破壞統一。我的文章結論說：希利到底朝著統一的大道走，還是要走到自我毀滅的窮巷？！

我這份文件，對第四國際運動是個有意義的貢獻，許多從前未曾弄清楚的非常複雜的問題，在這裏都一一加以解釋和澄清了。

這份文件寫成後還有一個插話。當文件翻譯成英文後，韓生來到我們家裏，我們把這份文件交給他，請他修正英文。他說駁斥希利非常有力；祇是關於巴布洛思想的產生、發展到衰亡的一節最好不要，他恐怕因此而觸怒曼德爾和法蘭克，會發生爭論。我反對他的意見，說按照這種分析才能獲得健康的統一，我們不能遷就錯誤意見和修正主義者統一，如果曼德爾和法蘭克不同意我的分析，可以提出批評，我是準備答覆他們的批評的。所以我不同意刪去或修改我的文章。韓生表示，恐怕這樣難以達成統一。我說，如他不願修改，我可以把這篇文章直接送給希利，他不能因爲我攻擊他而不予發表。韓生聽到我這樣說，便目瞪口呆，擔心這樣會弄成僵局。我把巴布洛派（包括法朗克和曼德爾）批評社工黨一個文件交給他看，指出巴布洛派（法朗克、曼德爾）批評社工黨這麼厲害，難道他就不怕因此影響統一嗎？我們爲什麼不可以同樣地批評他們？要統一，便該把有關的政治問題一概澄清，不可遷就對方，進行無原則的統一。他聽了這些話，才答應修正英文稿。這個插話反映了韓生有時害怕批

評，恐怕因此影響統一而趨於妥協。

後來這份文件送到美國去印，作印刷工作的同志看了都非常高興，來信給我們表示文件解決了許多困難問題。

這次統一實在很不容易，因為在國際委員會內，較強大的支部是美國社工黨。在歐洲是英國和法國支部；其餘的像瑞士和南美各國的支部都是比較弱的。英國和法國這兩國頑強地反對統一，使到韓生很猶豫。在我看來，希利和藍伯特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都是不講原則的，不能爲了遷就他們而放棄統一運動。他們絕對不要統一，我們只好把他們扔在一旁，讓他們去自生自滅吧，我們幹我們的。

統一會議終於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在義大利羅馬郊外召開了。我要介紹這次大會所暴露出來的巴布洛派的一些醜態作爲結束語。在我和碧蘭看來，這次大會是充滿著戲劇性的，其中不無強烈的諷刺意味。那就是：統一大會暴露了巴布洛及其派系的統一原來早已和曼德爾、法蘭克等因統一問題進行了猛烈的鬥爭。巴布洛本來是極端反對統一的。所以在統一大會上，他瘋狂地攻擊法蘭克，使法蘭克氣得結結巴巴講不出話來。還有，曼德爾向來負責作巴布洛的英語翻譯者，但在這次大會上，他竟然拒絕給巴布洛作翻譯——但是，他卻爲我的蹩腳英語演說作解釋，當起我的傳譯來。碧蘭也在會上講了話——由韓生按她的意思作更通順的英語傳譯。碧蘭的講話在會議上博得大家熱烈的歡迎和贊美，大家特別高興的是：在三次大會時，我們甚至不能說幾句普通的英語；在這次大會上，我們都用英語發表意見了。此外，巴布洛的擁護者，因爲曼德爾拒絕爲巴布洛作翻譯，他們竟然企圖毆打曼德爾！

會後，我和碧蘭都感到這是我們來法十多年最值得高興的事情：最重要的是看到了第四國際的重新統一；其次，我

們又看到了巴布洛的下場這麼富戲劇性的一幕醜劇！中國支部為國際的統一貢獻了它的一份力量。如沒有我們的特別努力，國際的統一也許要拖延得更久。

（史丹譯）

## 回到托洛茨基主義的道路

(一九六九年三月五日)

### (一) 游擊戰爭和《過渡綱領》 ——卡斯特羅主義還是托洛茨基主義

在一九六八年二月間一次國際執委會(IEC)的會議中，爲了起草一項世界大會的決議案以供討論外，曾有人正式提出應在拉丁美洲採行游擊戰爭的戰略和策略的建議。在那次會議中，我曾對欲在落後各國中以游擊戰爭作爲革命戰略的主張，作了一次尖銳的批評；並曾指出說：這樣一種戰略是與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直接矛盾的，可是我在那次會議中，卻居於少數派的地位。

自那次國際執委會的會議以後，游擊戰爭的傾向竟至發展到更強大和更堅決的程度。現在就《世界革命的新高潮》這個決議草案看來，顯然游擊戰爭已不僅僅以拉丁美洲爲限，而且要在亞洲、中東和非洲的許多國家中推行了。在決議草案中關於「殖民地革命的復興問題」這一章裏，曾概括地敘述了東南亞的老撾、泰國、緬甸和印尼等國，以及中東和非洲各國的游擊戰爭的一般前景；甚至連歐洲的希臘和西班牙兩國，也被包括在這一同樣的前景中。換句話說，這個決議草案顯然欲在一切落後國家，甚至在若干半落後國家中，推行游擊戰爭的戰略；因之，適用於這些落後國家中的《過渡綱領》，或者已被拋棄，或者竟已完全被忘記了。

可是，許多刊載在我們國際出版物中主張和支持游擊戰爭的文章(例如邁登、莫斯科索等同志所寫的)、以至於上述的決議草案內，都未曾公開而坦白地宣佈《過渡綱領》已不再有任何用處。同時，人們也無法在別處看到有人提出要在

落後國家中應用《過渡綱領》。那就是說，同志們業已自覺或不自覺地拋棄了《過渡綱領》，而代之以游擊戰爭的戰略了。甚至就在題為《世界革命的新高潮》這個決議案內，也未號召人們注意《過渡綱領》在落後國家中的決定性意義。草案全文中提到《過渡綱領》的地方只有一次，那是與古巴路線的某些缺點有關的。草案說：古巴的路線令人感到不足的，是未能對城市群眾所需要的《過渡綱領》有一種革命性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見第二十九頁）；草案的作者之把《過渡綱領》限於「城市群眾」，證明他或者未曾瞭解這個綱領對落後各國之決定性的意義，或者業已根本忘記了此一綱領。其實，《過渡綱領》並非僅僅適用於城市群眾，例如綱領便曾說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中心任務，在於土地革命，亦即清算封建殘餘；以及民族獨立，亦即推翻帝國主義的鎖鍊。」（見《過渡綱領》）

上面所述的，已給第四國際的同志們提出了一個極基本的問題：我們應該繼續推行國際上那個過渡性和基本的綱領式路綫，亦即《過渡綱領》的路綫呢？或者應改採游擊戰爭的新戰略。

爲要答覆上述的問題，我們應首先替游擊戰爭的性質作出一個定義。很明顯，現在這種游擊戰爭的理論，是取自古巴的經驗。如玻利維亞支部的領導人莫斯柯索同志便曾寫道：「在目前拉丁美洲的現行條件下，古巴憑游擊戰爭而達成的成果，是在任何別的國家中都可實現的。所以我說：游擊戰爭無可爭辯地是一條革命家們必須採取的道路，以便把他們的人民從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剝削中解放出來。」（見《國際社會主義評論》（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一九六八年三四月號十一頁莫斯柯索著《古巴革命的教訓》一文）莫斯柯索同志的意見，正直接反映著 LOLAS

所發表的一般宣言中的見解。(見《國際主義評論》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和十二月號)

那末，什麼又是古巴的游擊經驗呢？如所週知，卡斯特羅曾同其他若干人一起在墨西哥接受了游擊訓練，其後即偷偷地返回古巴，在鄉間發動游擊鬥爭。經過多個月的鬥爭後，游擊運動在全國各地增強了，最後乃驅逐了巴蒂斯塔（BATISTA）而奪取政權，並終於經驗主義地達成了土地革命和民族獨立的目標，進而沒收了國內外資本家的財產而予以國有化。這樣一種似乎是簡單的革命捷徑，曾經吸引了許多人的注意，並欲在他們自己的國家中重複古巴的經驗；卡斯特羅本人就曾主張應以古巴的經驗作為典範。他說：「我們堅決地相信，在長期的過程中，我們所應遵循的，只有採取表現於《拉丁美洲的游擊戰爭》這個決議案中所主張的辦法。」（見卡斯特羅在「LOLAS 大會中的演講詞」刊於《國際主義評論》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和十二月號第二八頁）

儘管卡斯特羅和其他一些人堅決地相信游擊戰爭，但人們仍必須先要解答下述問題：古巴革命的經驗能夠在整個拉丁美洲重複實行嗎？或者如莫斯科索同志所堅持的，「古巴游擊戰爭所達成的成果……，是在任何別的國家都可實現的」麼？據我的看法，這個問題的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首先，人們必須瞭解，古巴游擊戰爭的勝利，主要是因為美帝國主義未能干涉之故。可是，自從古巴革命勝利後，尤其是自古巴成爲一個工人國家之後，美帝國主義業已根本上改變了它的政策。現在的美帝國主義者，不僅已在援助拉丁美洲的一切反動政府以反對人民，而且如在多明尼加共和國中的事變一樣，已在直接干預各該國政府的事務，甚至派遣軍隊用以鎮壓各該國的革命運動了。在曾經爆發游擊戰爭的各國裏，美帝國主義已在負起責任武裝和訓練特種部隊，

以對付這些游擊運動；古瓦拉（GUEVERA）的悲慘失敗，正足以證明美帝在政策上的此一變更及其所產生的效果。其他如在委內瑞拉、危地馬拉、哥倫比亞和秘魯等國游擊戰爭運動的低落和失敗，也都不外是美帝國主義直接干預的結果。這些事實，對那些贊成或支持游擊戰爭戰略的人們說，都應該加以鄭重的考慮，並應從這些事實中，清楚地學會無可避免的教訓。

如果人們能從馬克思、列寧或托洛茨基主義之基本的和歷史的原則出發，對這種游擊戰爭的戰略加以一番評價，則這種「新」戰略的意義便可更徹底地暴露出來。依照列寧的意見，革命本身必須以工農群眾為基礎，而一個革命的首要任務，便是建立一個能為群眾準備革命的革命政黨，一俟革命的形勢到來時，這個黨所應採取的基本任務，便須為群眾進行準備，以便起而武裝奪取政權。另一方面，若沒有革命形勢存在的話，任何欲直接從事武裝鬥爭的組織，都只能導成災禍性的失敗。事實上，這種沒有革命形勢存在的武裝鬥爭戰略，也就同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後史大林所強加於中國共產黨，而使其執行的冒險主義政策的戰略及其後果完全一樣。如所週知，托洛茨基那時便已在許多文章中，非常嚴厲地攻擊了史大林這種冒險主義政策，尤其在《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一文中說得更為清楚。（見托著《中國革命問題》一書）

目前的拉丁美洲，就其整體而言，不僅並未存在著任何革命形勢，而且許多國家的革命發展都曾受了嚴重的挫折，例如巴西、玻利維亞和阿根廷等國。在這種情形下建議採取游擊戰爭的戰略，無異就是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後，史大林所建議的冒險政策。這樣的一種戰略，自也只能導成同樣的災難性後果。

爲了避免這種游擊戰爭戰略的災難性後果，並爲準備拉丁美洲革命的勝利計，必須要訂出一種過渡的綱領，這綱領除了其他一切必須的要求外，還必須包括下述各項要求：實行土地改革，完成民族獨立，實施出版、言論、集會和罷工等的自由，以及成立一個「由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而普選出來賦有全權的立憲會議」。（見《中國革命問題》第一八九頁）只有通過這樣一個過渡性的綱領，我們才能重行組織和動員群眾，去反對軍事寡頭的獨裁制度和美帝國主義。也只有通過這樣一種群眾的組織，我們才能走向爲奪取政權而必須進行的武裝鬥爭。

或許某些同志會如他們所曾表示過的一樣，將會以下述的意見對上述戰略表示反對：「現在已沒有可能有一個合法鬥爭的改良主義時期……」「因此，玻利維亞人民所可能有的前景，只是一個直接鬥爭……而這個鬥爭也只能採取武裝手段，亦即在鄉村裏，在各礦山和各城市中從事游擊戰爭……一切其他展望都是烏托邦，並只能導成群眾的失敗……」（見《洲際期刊》（INTERCONTINENTAL PRESS）第六卷第二二號第五四六頁《玻利維亞新革命的醞釀》一文）可是這一立場，也只不過是三十年代中國共產黨在史大林領導下所採取的立場之重演。當時托洛茨基曾特別指出中共的這個政策是一個冒險性而沒有前途的政策，歷史已充分證明了托洛茨基批評的正確。「跟著廣州暴動之必不可免的崩潰之後，共產國際竟在完全缺乏工業無產階級之熱烈支持的情形下，採取了游擊戰爭和農民蘇維埃的道路。就這樣進入了一條死路以後，共產國際乃又利用了中日戰爭，把『蘇維埃中國』一筆勾銷，不僅使那個農民『紅軍』，同時也使那個所謂『共產』黨，附屬於與以前完全一樣的資產階級「國民黨」。（見《過渡綱領》）爲了史大林的冒險主義經驗，世界革命已付出了一

筆最大的代價。我們必須不僅爲了玻利維亞，同時也爲了拉丁美洲和整個世界的革命，瞭解這個經驗及其教訓。

也許某些同志又會問道：「但中國共產黨不是已於一九四九年憑著游擊戰爭的戰略奪取了政權麼？」其實中共之於一九四九年奪取政權，與游擊戰爭的戰略本身完全無關，而是由於日本侵略中國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一種非常例外的歷史環境所招致的。首先是蘇聯對中國最工業化的地區滿洲之佔領，曾給了蔣介石的勢力以一項沉重的打擊；更加因解除日軍武裝而爲紅軍所得到的現代武器，經已被用以裝備了林彪所率領的中共第四方面軍。此外最重要的因素，也是美帝國主義的無力干涉。事實上，在蔣介石政權失敗的好幾個月以前，美帝國主義甚至即已削減了對它的援助。（這是蔣介石失敗的重大原因之一）（關於中共何以能奪取政權的問題，我曾在所寫的《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一文中，加以詳細的解釋。該文曾經由社會主義工人黨於一九五二年二月間，發表於《國際資料公報》（*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bulletin*）中。

同樣，越南問題也不能被用以辯護游擊隊戰爭戰略的正確。事實上，在越南進行鬥爭的，並非是一種游擊戰爭，而只是美帝國主義和各個工人國家間的一次有限度戰爭。儘管是各工人國家，尤其是蘇聯和中國所給予越南人的援助，數量上並不夠充分，但越南人之得以繼續進行他們的鬥爭，還是完全靠著這些援助的。此外如越南的地理位置，也不是一個可忽略的因素；就因爲有了這一因素，越南人才有可能直接收受各工人國家一切重要的援助。在這一方面說，假如印尼、馬來西亞和玻利維亞等國的地理位置，卻構成了無可克服的障礙。要號召產生「二個、三個或許多個越南」簡直是空想。這樣一種號召的口號，不僅實際上無法實現，而且完

全隱瞞了當前越南衝突的起源及其性質。

爲避免在我們對游擊戰爭的批評和拉丁美洲各國史大林主義對此的批評之間，發生任何可能的混淆起見，我們應該在這裏簡單地指出：我們決不是如史大林主義者一樣，爲了辯護其和平到達社會主義的道路，或爲了辯護其與自由民族資產階級締結盟好的道路，才反對游擊戰爭，相反，我們之反對游擊戰爭是因爲那是一種冒險主義的戰略，與我們的過渡綱領不符之故。

我們並不反對以游擊戰爭作爲一種戰術，但卻反對讓它成爲一個戰略。無可懷疑，當任何一個國家的局勢，成熟到我們必須立即準備群眾的武裝叛亂以奪取政權之時，農民的游擊戰爭或將是一種最有用處的戰術。

在原則上，對過渡綱領作必要的修正，是誰也不能反對的。作爲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並不把我們的綱領認作是一種教條。假使同志們能在理論和實際兩方面，證明已出現了一種新的現實環境時，那末，不成問題地我們必須在《過渡綱領》中作出一切必需的改變，以便能適應新的現實。但若對我們這個一向在傳統上被公認的綱領作出任何非原則性的修正，尤其是企圖作出任何偷偷摸摸的修正時，我們就應該而且必須予以反對。假使同志們認爲：《過渡綱領》的一部份（或甚至全部），已不復適用或應該代以某種別的綱領的話，那就應該公開而坦白地向國際提出他們的意見以供討論，以便讓國際予以接受或拒絕。

自從古巴的革命勝利以後，卡斯特羅主義不僅在拉丁美洲，而且也在整個世界別的地方，對某些激進份子發生了影響，卡斯特羅主義的這種影響，甚至竟侵入到第四國際的內部中來。拉丁美洲各支部，甚至國際的領導層之接受游擊戰爭的戰略，乃是卡斯特羅主義對第四國際發生影響之一種直

接的反映。這情況，將在邏輯上必然引起卡斯特羅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間一種相互關係和分歧上的問題。我們的運動雖曾對古巴的領導層予以甚多贊揚，但卻從未對它加以嚴肅的批評。另一方面，卡斯特羅卻曾惡意地抨擊和污衊了托洛茨基主義（在一九六六年的三洲大會中）。

托洛茨基主義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直接延續，同時也是布爾什維主義傳統的繼承者。此外，托洛茨基主義代表了不斷革命論的發展，並代表了馬克思主義者對一個墮落工人國家的分析。再說，托洛茨基同志又曾第一個具體地分析了法西斯主義的現象，並從一九二〇年代和三〇年代世界工人運動所蒙受的嚴重失敗中，得出了必需的結論。所有這一切，都曾在我們運動中那個綱領式的基本文件，亦即《過渡綱領》中，作了具體化的總括。

在另一方面，卡斯特羅主義迄未對馬克思主義作出理論上的貢獻。卡斯特羅的綱領，只不過是以他自己個人在古巴革命中的經驗為根據，而作出的一種行動綱領而已；也就是說，只不過是一種游擊戰爭的綱領。很明顯，卡斯特羅並不瞭解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基本原則，或許也不瞭解世界工人運動中某些最重要的教訓和經驗，例如布爾什維克革命，托洛茨基和史大林之間的鬥爭等等。這種瞭解的缺乏，已在實際上表現於卡斯特羅的各種政治活動中，例如古巴國內還沒有一個民主集中制的政黨，古巴政府也不是一個以工農蘇維埃組織為依據的民主政府，以及在拉丁美洲支持一種游擊戰爭的戰略等等。當然，我們將像支持其他工人國家一樣，支持古巴的工人國家以反對帝國主義；甚至在某些具體問題上，例如古巴領導人對莫斯科那種和平共存和主張和平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等路線的反對，以及其他對這種或那種傾向的鬥爭，我們都將予以批評性的支持。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徹底批評古巴領導層的一切弱點。例

如他們對游擊戰爭戰略的支持，便是我們必須加以批評的所在，指出這種戰略決不是史大林主義者那種和平到達社會主義戰略的代替品，而只能在長期鬥爭中客觀地幫助史大林主義者的機會主義，同時也幫助了美帝國主義者。

## （二）走向工人階級

一般地說，我們的國際在過去時期內，曾發現自己主要僅在小資產階級的階層中，特別僅在學生運動中從事活動和爭取支持，當然，這一活動的領域，在一種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於客觀的條件所決定的。但不管怎樣，我們過去在工人階級中的工作及其工作的方向，總還不夠如我們的理想中那種應有的程度。因此之故，轉向於工人階級並使自己與工人階級合為一體的工作，乃是今天我們運動中所最感迫切的任務。

或許某些同志對這種使我們的運動轉向的號召，會以下述的意見表示他們的反對。他們會說：我們之走向工人階級的方向，儘管未曾明白地聲明，但卻是一種不言而喻，大家都能瞭解的方針。可是我們運動上的具體現實，卻未能支持上述這種反對的說法，我們只須看一看我們在世界上大多數工業化國家的支部，例如西歐各國的支部，便可發現在我們這些支部中，竟沒有一個有著工人階級的真正基礎的。在這些支部的同志們，主要都非來自工人階級，而且現在都還生活在工人階級以外。假使這種情況仍允許其繼續長期存在下去的話，那末這些支部將不得不趨於退化或墮落。

當然，我們過去在學生運動等領域裏的工作，曾給我們帶來了許多寶貴的幹部，同時也曾使我們藉著參加和領導各個重要鬥爭之助，而得以擴大我們的影響。但我們也必須瞭解：類似乎學生運動等這樣一種運動，不會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一種經常或穩定的現象；再者，這種運動並非是（甚至也不可能被認

爲是)組成一個革命的(群眾)黨的基礎。我們所能認爲堪以建立一個革命(群眾)黨的唯一基礎,乃是工人階級。學生運動必須被認爲是次要的,而必須從屬於這個方針。

尤其重要的,我們之走向工人階級的趨向,必須具體地基於我們在職工會中的工作上。職工會不僅代表著無數有組織的工人,同時也是實際階級鬥爭的基本因素之一。可是最不幸的現實乃是:在過去這個時期內,職工會不僅被各種不同的改良主義和親帝國主義的領導層所支配,甚至竟被他們所完全控制。如果我們不首先在職工會中進行反對目前這些領導層,並在「某種」程度上進行戮穿他們信譽的鬥爭,那就誰也無法提出並實現建立一個能夠採取奪取政權路線的群眾性革命黨的真正前景。「除非這種鬥爭〔即在職工會中反對機會主義領導層的鬥爭〕已達到一個相當程度,否則,要想奪取政權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應有奪取政權的企圖)。」(見列寧著《左傾幼稚病》第六章)

這種反對當前改良主義領導層的鬥爭,其中心及其最重要的部份,只能是在職工會內部進行一貫的工作。這種工作當然是非常困難的,並將給我們的運動提出了最困難的(同時也是最重要的)戰術問題及其所應採取的考慮。但不管如何困難,資產階級和官僚化的職工會領導人們,也可能會迫使我們從事於這一工作。「我們必須能夠抵抗這一切迫害,甘願於任何犧牲,甚至到了必要時不惜出於各種各樣的計謀、詭詐、非法手段,以至於採用各種遁詞和花招,其唯一目的便是要參加職工會,並設法留在內部,以便不顧一切代價地在內部進行共產主義的工作。」(見前引書同章)

因此,當未來的世界大會開會時,必須要對這個問題加以認真嚴肅的考慮,並提出一個具體的方案,以便準備在職工會內部和整個工人階級中從事工作。只當具備有這樣一種

走向工人階級的具體計劃，我們才有希望建立一個能夠奪取政權的群眾性革命政黨，此外別無其他途徑。

### （三）我們應從阿爾及利亞事變中學習

一九六五年六月間的龐米甸（BOUMEDIENNE）政變，不僅標誌出是阿爾及利亞革命運動的一個轉變點，同時也標誌出整個中東和非洲革命運動的一次挫折。這政變又代表著對第四國際及其政治立場的一項沉重打擊，其理由不僅由於國際的若干支部，例如法國和阿爾及利亞的支部等，都曾被牽連並參加了阿爾及利亞的事件中，同時更由於國際的領導人之一巴布洛曾參加了班貝拉（BEN BELLA）的政府。因此，我們必須像任何別的人一樣，負起這次嚴重挫折的同等責任。就爲了這個理由，我們如欲從阿爾及利亞的事變中得出某種結論和教訓，就必須對這一挫折和我們自己爲此而負的責任，加以一番檢討。也就爲了上述的理由，我曾要求統一以後的第二次大會（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正式討論阿爾及利亞的事變；可是結果並沒有進行正式的討論。以後我又於一九六八年二月間國際執委會的一次會議中，再次提出建議，要求正式把阿爾及利亞事變列入未來世界大會的議程中，並採取一項正式的立場。在這次會議中，雖然出席的多數委員都接受了這個建議，可是邁登和吉利奧馬里奧（SIRIO DIGIALIO MARIO）兩位同志都表示了反對。這兩位同志的反對，正表現出國際領導層中有一種不欲討論其所犯錯誤的最嚴重的弱點。我們必須提醒這些同志，對我們自己所犯錯誤的態度（尤其對那些有關阿爾及利亞事變等重大錯誤的態度），乃是一個革命政黨之基本的考驗之一。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即使是「一個小小的錯誤，如果堅持下去，如果以固執的理由予以辯護，而且把錯誤推向『邏輯的結論』時，也會

變成一個重大的錯誤的。」（見上引書第五章）

應該從國際對有關阿爾及利亞的錯誤中，得出最重要的教訓。其中最大的錯誤之一，便是未曾嚴肅地批評班貝拉政府，以及未曾為阿爾及利亞的群眾提出任何革命的綱領以促進他們的鬥爭。恰恰相反，國際和國際的領導層在他們所發表的許多文章中，都只是大事稱讚 FLN 的領導，尤其特別稱讚了班貝拉，甚至龐米甸等人物。

在統一以前國際委員會的一次討論中，我曾批評了 SLL 領導層在伊維安協議（EVIAN AGREEMENT）問題上所採取的宗派立場。當時我曾為一切與阿爾及利亞問題有關的革命份子訂下了一個基本綱領的綱要。「為解決這一矛盾〔即法國之經濟和軍事利益的繼續保持和阿爾及利亞的獨立之間的矛盾〕，阿爾及利亞的一切革命份子，都應在辛苦爭取到的政治獨立下團結起來，以此作為起點，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綱領而動員一切工人群眾和勞苦農民，從事進一步的鬥爭。依我個人的意見，這綱領應包括有：撤退法國的一切部隊，取消法國的一切經濟特權，實施一項徹底的農業改革，使一切基本生產手段全部國有化，保衛工人和農民的民主權利，以及設立工農兵委員會和建立一個工農政府等等。

阿爾及利亞的全體革命份子，都應該從事實現這個綱領的鬥爭，以便使阿爾及利亞進入社會主義的道路。這便是我們在阿爾及利亞所應採取的路綫，也是批評班貝拉政府所採取各項措施時所應採的規範，同時又是憑此以集結阿爾及利亞的一切革命份子，組成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以進行這個鬥爭的一個綱領。」（見《白恩斯（即希利）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往何處去？——評社勞聯的教派主義傾向的危險性》一文，刊於社會主義工人黨一九六三年五月份「國際資料公報」第一八頁）

如上所述國際所犯的錯誤，表明了一種遷就小資產階級領導的傾向；這種遷就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沒有先例的，國際的過去歷史，就曾屢次表演了遷就改良主義官僚和激進小資產階級的傾向。例如過去國際認為工人國家內官僚領導和某些共黨內將會有所謂「自我改造」的立場，國際於四〇年代末和五〇年代初對鐵托所採取的機會主義態度，以及對毛澤東政權所採取的態度（這態度甚至到今天還在繼續中）；五〇年代內國際對英國的貝文亦步亦趨的傾向；以及過去和現在對於卡斯特羅及其政府之不加批評的立場等，都只是國際中機會主義者遷就班貝拉政府之歷史先例中的一部份。

這種遷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絲毫沒有關係，歷史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工人運動中反對一切小資產階級領導，勇敢鬥爭，具有非常充分而明顯的紀錄。人們只須注意一下馬克思對布朗基（BLANGMI）和拉薩爾（LASSALLE）等人的嚴厲批評，便可以明白這個道理。但若這些歷史上的戰士們今天仍然活著，而國際竟對他們作出馬克思當時對他們所作的同樣批評的話，幾乎是難以令人相信的事。再若，人們還可以注意一下更近的事例，那就是托洛茨基對中派主義者 POUM 的嚴正批評。像布朗基或 POUM 的領導人尼因（NIN）等人物的一般革命本性，當然是無可懷疑的，但這卻不能改變他們在客觀上的政治作用，或使馬克思主義者對他們的政治立場避不作嚴厲的批評。恰恰相反，爲了爭取他們或他們的支持者回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來，對這些人物的批評應該更加熱烈。

認識我們在阿爾及利亞事變上的錯誤，並公開地予以承認並予以改正，較諸承認過去國際歷史上的許多同樣錯誤，甚至還更爲重要些。我們必須要從阿爾及利亞的經驗中得出重要的教訓，並必須把這些教訓應用於我們對越南的民族解

放陣綫，對於卡斯特羅和對毛澤東等的態度上。就在這樣的一種途徑上，阿爾及利亞經驗的教訓將能夠（而且必然會）在締造一個革命的國際方面，表現出一種最重要的作用。

#### （四）結論

以游擊戰爭的戰略來代替《過渡綱領》，忽略了在工人階級及其傳統的階級鬥爭組織中，亦即在職工會中從事最認真的工作，並繼續使自己遷就或適應各種不同的小資產階級思潮及其領導，不僅不可能建立一個國際，而且將會導使我們的運動走入一個死巷，上述各種傾向，等於已脫離了托洛茨基主義，因而爲了回到托洛茨基主義的道路計，在未來的世界大會中對這些問題採取一種正式的立場，嚴肅地予以考慮，將是一項最迫切的任務和責任。

#### 附言

同志們務請瞭解，爲欲先行收閱爲了未來大會而起草的決議草案，上面文件的寫作曾作了盡可能的拖延。可是由於不可能再行拖延之故，遂不得不根據手頭現有的《世界革命的新高潮》這一決議草案而寫成上述文件。過去數天內我們曾收到一項有關拉丁美洲的決議草案，但時間上已不容許我們特別對這個草案加以討論。儘管如此，上述的批評仍沒有任何變更的必要。恰恰相反，這個草案的內容，使得上述的批評反而覺得更加恰當，尤其是關於游擊戰爭的部份。其他如關於中國問題、西歐問題，以及阿爾及利亞問題等的決議草案，到今天爲止仍未到達我們的手中，以致我們迄仍無法爲上述所寫的文件而利用這些草案，這也是使我們至感遺憾的一件事。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二日補誌

# 關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代表少數派對世界大會作的報告<sup>1</sup>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六日)

同志們：

首先我應當指出一個事實：自從所謂文化大革命爆發以來，時間差不多經過了三年有半。正在北京舉行的中共第九屆大會，正式地標誌著這個運動的結束。可是，正在這時——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時候，我們的國際還在討論中國這個大事變的初期階段，我深深地感覺到，這樣的一種情形對於國際是一個恥辱，顯然的，國際關心中國事件，絕不是為著給行動提供指導，而只是為國際的文件處悠閑地製造一些文件和決議案而已，像國際處理大事變的這一種程序，國際的每一個同志都應對它將來的工作予以監視。

統一書記局關於中國的文件僅僅在大會前一個月才通過，我是在大會前三個星期才收到這個文件的。至於處在歐洲以外的同志們收到這個文件一定更遲些，假如他們在大會前收到的話。因此基層黨員，乃至各國支部的領導層，要想根據這個文件來作任何嚴肅的討論，都是不可能的。統一書記局所呈獻的一切決議案，特別是關於中國這樣重大的問題，應當至少在大會前六個月準備好，送給同志們，否則，在國際方面不可能進行有結果的討論。事實是，只有一個決議草案是在大會前六個月發出的。其餘的都在大會前六個星期當中才發出，有些草案甚至只能在大會上才找到，這是清楚的，各支部的幹部沒有可能討論世界大會的決議案。這樣

---

<sup>1</sup> 刊載於一九六九年七月出版的《國際資料公報》第十號

的情形表現出國際領導的最嚴重的弱點，這種弱點在將來必須給以糾正。

雖然所謂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交給大會的決議案已經過時，但我並不拒絕根據統一書記局的決議案來進行討論，因為這個決議對於下面的重大問題，包含了許多錯誤和矛盾，如對中共及其政權的性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目的和發展。毛劉兩派的分歧意見。這種分歧的根源及其社會基礎。以及中國事變的意義等。所有這些問題都等待國際來一個嚴肅的討論。正因為沒有經過嚴肅的討論，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三年之後，國際對中國事變還不能達到一個共同的解釋，甚至於上敘的問題陷於不可忍受的混亂狀態中，對中國事件作了大錯，爲要對中國事變達成共同的和明白的解釋，糾正我們過去的錯誤，避免將來犯錯，國際對中國問題必須舉行一個徹底的和嚴肅的討論。否則，更嚴重的，不可補救的，甚至災禍的錯誤會降落到國際和它的支部的頭上來。

至關於統一書記局多數派所通過的草案，因為我在書面討論的文件中，如一九六七年三月我寫給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我寫的文章，題爲《我們對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究竟採取什麼立場》，已經表示過我的意見，故在這裏不想重複。現在只將我的講話限於以下幾個要點：

1. 統一書記局的草案是根據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政治委員會所提供的草案作成的。但我們發現，統一書記局多數派將原草案中許多重要的觀念刪除了，卻增加了許多新的錯誤的觀念。例如，統一書記局多數派把原來文件中第一段話的句子「在內戰中引導史大林化的中共」中的「史大林化」這個詞刪除了。這和統一書記局多數派在他們的草案內拒絕確定中共的性質爲史大林主義的，便清楚地表明：統一書記

局的多數派，甚至今天還不承認中共是一個史大林主義的黨。

統一書記局多數派這種態度，在一九五一年的第三次世界大會中有它的根源。在那次大會上，對中國問題曾有三個主要的傾向：巴布洛代表一種傾向。他認為中共違反史大林個人的勸告而奪取政權後，它是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黨了，我的立場恰與之相反，不管中共奪取了政權，它仍舊是一個史大林主義的黨。因為它之奪取政權，僅僅因為它在蔣介石發動的嚴厲進攻下採取了戰鬥的行動，而這種行動是得到史大林的允許的。格爾曼同志代表第三種傾向。他認為中共取得政權後，已變成左傾中派主義的黨。

由於國際的領袖們中對中共性質的不同意見，因而對中共政權的性質也就邏輯地發生了分歧。巴布洛既已認為中共是一個革命馬克思主義的黨，因而斷定中共的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巴布洛的觀念，後來發展得更為具體。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出版的法文《第四國際》中，人們可以從邁登寫的《中國的不斷革命》一文中看到如下的文句：「人民公社的管理委員會，實際上是市鎮的人民會議，即蘇維埃」，從這裏可以看出：巴布洛認為中共的政權是以「市鎮人民會議，蘇維埃」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了。」當然，今天每個人都知道巴布洛自己對中國問題已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他現在認為中國的政權，甚至比起史大林的政權來還要壞些。

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在一九五五年採取了一個立場，認定中共是一個史大林主義的黨，中共的政權是官僚主義的專政，因而主張政治革命（見《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餘波》，發表於一九五五年十月《內部討論公報》A-31）。差不多同時，我也達到中共政權是一個官僚獨裁的結論，因而同意了政治革命的結論。現時統一書記局多數派關於中共性質的立場，仍然停留在巴布洛原來的分析上，所以，直到現在，他們還

沒有確定中共政權的性質，多數派的草案只是說，中國有官僚主義，但它避免把中共政權的性質確定為官僚專政。但不管這樣，統一書記局多數派的決議案卻提出了政治革命。從這裡我們可以明白地看出：這個決議案中所包含的根本矛盾。官僚主義甚至在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下的蘇聯也是存在的。但我們很難設想，統一書記局多數派僅因為官僚主義的存在會贊成號召政治革命來推翻以列寧和托洛茨基為首的蘇維埃政權的。

2. 統一書記局多數派所增加的東西，其中有些值得加以檢討，如他們所指出的「中國的主要矛盾」——a, b, c, d, e, f, 以及從這些矛盾中得出的結論。例如決議案在「a」點中說，「經濟增加率和人口增加率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差不多是一切落後國家的最共同的現象。但它和文化大革命沒有直接的聯系。在「d」點中我們看到：「人民大眾的一般消費的低水準和日益增加的官僚的特權利益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也是存在於史大林主義共產黨所統治的一切工人國家中的共同現象，但和文化大革命同樣沒有直接關係。在 b、c、e 和 f 字母之下的其他四種矛盾，也是抽象的和繁瑣哲學的。但統一書記局多數派決議案的作者們，卻利用這些矛盾得出下面的結論：

「所有這些矛盾，由於大躍進的第二階段和一九五九至六一年的接近飢荒時期所造成的農業和經濟上的損害而緊張起來了。它們在這個國家裏造成了一種爆炸性的局勢，在這個國家內部，政治分化的過程和日益增加的群眾的政治活動已成為可能。在這種局勢內，真正的反對統治的官僚層的政治革命的條件成熟起來了，文化大革命在客觀上構成著毛派的一個企圖去把社會力量從推翻官僚主義轉移為改良官僚主義的方向去了。」

這個結論包含著三個最重要的事實上的錯誤：

A. 政治的分化過程和日益增加的群眾的政治活動，在一九五七年的「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的運動中已經發生，漢陽三千高中學生的暴動，便是顯著的例子。這個運動已發展到威脅著中共的政權。在這次暴動後，毛澤東不得不鎮壓這個運動，以阻遏群眾的革命傾向。

由大躍進（實際上是由於人民公社政策）所造成的一九五九至六一年的嚴重飢荒（不是接近飢荒），當然「在這個國家內裡造成了爆炸性的局勢。」但從一九八〇年起，在劉少奇領導下所施行的一些改良，如結束大躍進、改變人民公社政策讓農民佔有小塊土地，重新開放鄉村自由市場……以及對文化和教育界的工作人員的某些讓步，這便大大地緩和了群眾的不滿，減輕了官僚所面臨的危險，那就是說，把「一個反對統治官僚的真正的政治革命」，轉移過來了。

B. 毛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絕不是「在客觀上企圖把社會的力量……從推翻官僚轉變為改良官僚」，相反，「文化大革命」乃是毛派企圖排除劉少奇和他的追隨者，以此保證毛自己的個人獨裁，這是一個自明的事實，每個人都懂得，除了多數派文件的作者外。

C. 說「文化大革命在客觀上構成毛派企圖把社會力量從推翻官僚轉變為改良官僚的方向」，那就無異於說，毛派是代表改良主義的傾向，即代表比之官僚層中其他各部分較為進步的傾向。那麼，為什麼決議案不給毛派以批評的支持以反對官僚中的其他部分呢？這不是一個很大的矛盾嗎？真正的原因似乎是，為什麼決議案給予毛派以改良主義的頭銜，即進步的頭銜，其用意在於掩飾它的反動的實質。

3. 決議案說：「從馬克思主義的標準看來兩個主要派系中，沒有一個值得政治的支持以反對其競爭者。從可以適用

的情報說——大家承認這種情報是缺乏而不夠的——沒有一個派系可以判定較之另一個為進步。」這段話只是一九六七年三月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討論決議案」所表示的立場之重復。我已經列舉毛派和劉派之間的五點不同意見，證明後者是比較進步的（見《我們對中共內部的派系鬥爭應當採取什麼立場》），這裏我不想重復那些分歧點，但要請同志們特別注意下面的兩種事實：

A. 對蘇聯的「非史大林主義化」運動，劉派是給予它以支持的，這從鄧小平在中共第八屆大會的報告中明白地表示了出來。關於這點，我在我的文章中已經引證過（見所引上文六至七頁）；另一方面，毛派對於「非史大林主義化」採取了最強烈的反對立場。多數派決議案的作者們，應當答覆下面的問題：毛劉兩派之間對於「非史大林化」問題是否絕對地沒有分歧意見呢？統一書記局多數派的同志們對於這個問題必須給我們以不含糊的答覆。

B. 我已經引證過許多事實，證明劉少奇，特別是彭德懷曾經反對毛澤東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彭的反對立場，可以從他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給毛澤東的信中明顯地看得出來（彭信發表於一九六八年三月香港出版的《祖國》月刊）。彭德懷的信雖然十分溫和委婉，甚至表面上還推崇毛澤東，但其實質是批評毛的三面紅旗政策的。例如他批評總路線造成了「不平衡現象」，「現在我們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的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質的，是關係到我們今後動員群眾實現大躍進的所在。」彭說：「在全民煉鋼中，……浪費了一些資源（物資、財力和人力），當然浪費了一筆較大的損失」（二十億元）。

彭德懷指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是由於「小資產階

級的狂熱性。」把本來要幾年或幾十年才能達到的要求變成爲一年或幾個月就要達成的指標。他說：「在有些同志看來，只要政治掛帥就可代替一切。忘記了……政治掛帥不可代替經濟法則，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的具體措施。」「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比反對右傾保守還要困難。」

雖然彭德懷的信中的觀念一般是正確的，但毛澤東却惡意地譴責他「是一個野心家」，「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

換言之，彭德懷對於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政策所表示的立場，一般地是正確的。毫無疑義，比起毛澤東的立場來遠較進步。因此，我們必須請同志們，特別是統一書記局的同志們重新考慮毛劉兩派的分歧意見，以期我們能夠爲國際和中國支部達成一個正確的政治立場。

4. 草案說：「爲要在殖民地世界獲得影響，北京使用一種強烈地反帝國主義者的言語。它們物質的援助擴展到某些國家的游擊力量。這不但造成了遠較莫斯科爲左的印象，而且在客觀上有利於世界許多地區，特別是東南亞、阿拉伯國家和非洲的反帝國主義鬥爭。」

上面這段話所表示的觀念與中國政治革命的觀念是完全矛盾的。假如北京的立場和行動「是有利於世界許多地區的反帝國主義鬥爭」，那麼，爲什麼決議案不給北京政權以批評的支持，反而主張政治革命來推翻它呢？草案作者所採取的立場顯然是自相矛盾的。

最後，我要對多數派文件的主要作者利維奧同志說幾句：我必須坦白地申明，利維奧沒有能力寫關於中國問題的文件，因爲他對中國的情形知道得很少。對於中共在一九四九取得政權後的中國事變的演化，他更是門外漢。必須懂得：中國的情形和它的各種問題是非常複雜的，是世界上最難瞭

解的，特別對於西方人（因語言的關係），托洛茨基自己便曾經承認這個事實，所以他對中國問題採取了最嚴肅的態度，他甚至要求拉狄克——孫中山大學的校長特別注意中國問題，他有一批中國學生幫助他收集有關中國經濟、社會階級和歷史的資料，拉狄克的工作對於幫助托洛茨基瞭解中國的具體情況是極有益的。但利維奧同志從來沒有認真研究過中國的情形和它的問題，他的意見只是根據從中國報刊上翻譯的某些文件或文章和西方報刊上找到的一些材料，再和他自己的想像及窄狹的成見的假設配合起來，所以他起草的文件，不但包含着事實上的許多錯誤，而且充滿了觀念上的自相矛盾。

但最壞的事情之一，是利維奧從沒有請中國支部表示它對於「文化大革命」的意見，他在準備關於中國的文件前甚至沒有和我商討過像對各國支部的這樣一種態度，只能和史大林控制下的共產國際的態度相比擬。此外，還應當指出的是：我對於利維奧同志寫的關於中國的文件，如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統一書記局通過的「聲明」，一九六七年三月國際執行委員會通過的「討論決議案」，都作過許多批評，但直到今天，利維奧同志對於那些批評沒有任何答覆，也沒有試圖在這方面澄清他的立場。因此，人們只能從此得出一個結論：利維奧同志處心積慮地逃避討論不同的意見，這便反映了他的狂妄和在政治上的完全不負責任。

## 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 理論、政綱、傳統及其幹部的歷煉

—— 又一次「對蘇達的批評的批評」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 中共的勝利和托派的失敗問題

在十七年前，蘇達寫了《中國革命的回顧與前瞻》，說中國托派是「接受了不斷革命論的」「正統馬列主義者」，「但不能領導革命達到勝利」，「……這證明僅僅掌握到革命理論而沒有正確的具體行動政策，也不能起作用的，正因為中國不斷革命論信徒的幼稚無能，才讓領導中國不斷革命達到勝利的責任落在階段論者（中共）身上。」

我們當時（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五日）對上述蘇達的指責和批評，寫了《對蘇達批評的批評》以回答他，指出：「如果依照蘇達提出問題和答覆問題的方法，人們也可以同樣說；正因為『世界革命』（不斷革命的最高發展）的信徒，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左派反對派的『幼稚無能』，才讓建設社會主義的責任落在『一國社會主義者』，（階段論的發展者）史大林主義的官僚身上！」

我們跟著問：「何以蘇達同志在其《對中國革命的回顧與前瞻》，即檢討中國第三次革命的經驗和教訓，得出如此荒謬的，至少是『幼稚』可笑的結論呢？首先，而且主要的是：他對像中國第三次革命這樣一個歷史大事變，『階段論者的中共領導不斷革命達到勝利』的這種奇特事件，不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世界規模的條件去尋求客觀的原因，卻自限於從中共的『正確的具體行動政策』，特別是從中國托派『沒

有正確的具體行動政策』，即它的『幼稚無能』，來尋找答案，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驚人的主觀主義和唯心論的典型表現！這還不是等於不從蘇聯的落後和孤立（由於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不斷失敗的後果）中去尋求『左派反對派』失敗的客觀原因，而僅歸咎於它『沒有正確的具體行動政策』的『幼稚無能』，是同樣荒謬的主觀主義嗎？！」

我們並著重地指出：要領導一個革命達到勝利，除了正確的政策外，還要有一個革命的群眾黨。一個微小的組織，即令有正確的理論和政策，還是不能領導革命達到勝利的。例如一八四八年革命中的德國共產黨，雖然有「《共產黨宣言》」的正確理論和政策（宣言最後一部份即指出德國革命的政策），並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指導下，但還是失敗了，因為當時德國共產黨實在太小了。

中國托派，自一九三一年統一，正式宣佈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直到一九四九年，始終陷於小組組織狀態，由於國民黨和日帝國主義的殘酷迫害，這個小組組織好幾次被破壞，趨於解體（見《對蘇達的批評的批評》中所列舉的托派運動六個時期的描述），在抗日戰爭結束，中國托派有新的發展，但它的黨團員還不到四百人，像這樣不斷遭受殘酷迫害、長期陷於小組組織的中國托派，雖然是「接受了不斷革命論的正統馬列主義者」，又怎能「領導革命達到勝利」呢？所以我在《對蘇達的批評的批評》的結論（D點）中說：「像這樣陷於微小組織狀態的中國托派」，要指責它不能『領導革命達到勝利』，這是完全不懂得我們運動所處的客觀環境及其遭遇和本身演化的過程，是一種純粹主觀主義或唯心論的武斷，且是極幼稚的武斷。」

上面《對蘇達的批評的批評》寫成於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五日，它以小冊子的形式發表於一九六一年十月廿五日，就

發表的日期直到現在已經十六年了。但蘇達在這段長時期中沒有任何反應或回答，如果他是誠實的對自己黨的批評（他承認中國托派是「我黨」），是負責任的，他就必須對別人給他的反批評以應有的答覆或解釋，以表明他自己不是別有用心，蓄意詆毀中國托派。但不幸，蘇達經過了十六年的緘默之後，又大搖大擺地走出來，用同一的主觀主義和唯心論的方法，大寫其《中國托派的現狀和前途》，這就迫著我們不得不「又一次」寫《對蘇達的批評的批評》了。

蘇達的《中國托派的現狀和前途》，和《簡評綱領草案》，還只發表三部份，但他聲明還沒有完，就他的第三部份發表的時間（四月）算起到現在已有半年多了，不知道他何年何月才能寫完，我們是耐著性子等待他寫完再說。但國內外的同志們卻要求我們給他以必須的批判，以期澄清他的文章所引起的混亂及避免其可能發生的惡果。所以只好就他已發表的三部份給以簡要的批評。

蘇達在他的文章的第一部份中，劈頭便說：「中國托派在一九四九年中國革命勝利後，遭到極悲慘的失敗（這個失敗的原因和教訓，我們尚未做出正式的結論）。」

說中國托派在一九四九年毛黨走上政權後「遭到極悲慘的失敗」，這算是蘇達唯一正確的判斷，因為在中國大陸的托派份子，甚至同情者，幾乎全部被捕，投進監獄或集中營，這等於說，蘇聯的「左派反對派」，在史大林實行特爾米多（THERMIDOR），後「遭到極悲慘的失敗」，是相類似的。但說「這個失敗的原因和教訓，尚未做出正式的結論」，那就未免與事實不符了。因為說托派「極悲慘的失敗」，便意味著毛派的「極光榮的勝利」。關於毛派「勝利的原因和教訓」，中國托派的代表彭述之，在第四國際第三次大會上（一九五一年八月）討論中國問題時，曾作了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

詳細地分析了中共勝利的原因，並指出它的基本教訓，其要點是：

「毛澤東黨依靠脫離城市工人階級的農民軍對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蔣介石的勝利，是在特定的歷史階段的特殊條件下，即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各種錯綜複雜的條件下所促成的。這種特殊條件的基本點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已趨於極度衰朽和解體，而中國則是資本主義最弱的一環，代表資產階級的蔣介石政權之自動崩解，便是資本主義世界的衰朽和解體之極端表現。另一方面，史大林官僚依靠十月革命所創造的社會主義財產制，並利用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矛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以空前地擴張其勢力和影響，這便大大地吸引了在資本主義極度衰朽和解體下陷於無出路的群眾，特別是落後國家的群眾，促成了這些國家的史大林黨特別強大起來，毛澤東黨正是這類史大林黨登峰造極的典型，再加上美帝國主義在當時國際局勢中處於極不利的地位，而被迫最後放棄了對蔣的援助，即對毛的干涉，同時蘇聯因在第二次大戰結束時，在滿州取得了特殊地位，並以此為根據地，給蔣政權以極其嚴重的損害，直接援助毛黨，使後者的落後的農民武裝趨於現代化。如果沒有這些條件的配合，毛黨單純依靠農民武裝的勝利是不可想像的。」（著重點現在加的）

由上面這個結論所得出的教訓是：「托洛茨基和我們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曾經堅持：摧毀資產階級國民黨政權不能單靠農民武裝力量，必須城市工人階級領導農民舉行武裝暴動去完成這一基本觀點，即在今天看來還是正確的……譬如在印度，我們仍然要堅持：印度工人階級領導農民武裝暴動去摧毀國大黨的資產階級政權，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落後的印度順利地走上真正解放和發展的道路。」

「但同時，我們必須瞭解：像中共這樣脫離工人階級而

專靠農民武裝所取得的勝利，不但其本身是畸形的，而且替往後的中國革命運動種下許多難於克服的障礙，我們認為瞭解這點，對於我們評斷和估計中共所領導的整個運動和我們決定我們的戰略和策略，是具有決定意義的。」（著重點是現在加的）

「我們黨對於中共勝利地奪取政權是完全沒有估計到的，由於對這個事變估計上的錯誤，便派生出對事變發展進程一連串的估計上的錯誤，以及某些對外宣傳上策略性的錯誤，因而影響我們對整個事變的態度，或多或少趨於消極方面的批評，而低估了它在客觀上的革命意義，這是應當鄭重地予以糾正的。但如我們在前面所說的，我們的錯誤不是原則性的，而只是對事變的估計上的，因而是容易改正的。」

上面的引文，只是從我《對中國局勢的報告》摘錄的要點，在第四國際第三次大會上，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反對，雖然巴布洛（當時國際的總書記）不同意我的分析，但他只在背後散佈謠言，沒有勇氣公開反對，而且自第三次大會後，從來沒有人公開批評上述的基本觀念，以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為首的各國支部是同意我對中共領導第三次中國革命勝利的分析、評斷和教訓的。

《對中國局勢的報告》傳到中國後，（當然只限於香港）中國同志們的反應如何，我沒有收到領導機關的正式報導，只從旁面得悉（私人信件中），多數同志是同意的，明同志（即已去世的丁毅）甚至說：「只有《對中國局勢的報告》才能解釋事變的發生和發展」，這和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一些同志的說法是相同的。至於當時的蘇達看到《對中國局勢的報告》後有何高見或異議，我沒有看到他書寫的文件，不便猜測，但我《對蘇達的批評的批評》，已從《對中國局勢的報告》中引證過上面的幾段話，答覆了蘇達當時所提出的中共勝利和托

派失敗的原因。爲什麼他置之不理，現在又「舊調重彈」呢？這表明他不是誠實地討論問題，負責地爲黨澄清歧見，只是片面地、重複地「大放厥辭」，不斷地在黨內散佈混亂，挑起爭論，製造離心傾向而已。

### 中共政權的性質和政治革命的任務

關於中共取得政權所形成的局勢，蘇達告訴我們說：「在一九四九年革命前，我黨有一個黨綱，……但……原有的黨綱已爲歷史發展超過了，那綱領所提出的革命目標，即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已經實現了，」（見《中國托派的現狀和前途》第一頁）。

上面一段話中最末一句：「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已經實現了」，這是蘇達於無意中透露了他對一九四九年革命所建立的政權的評斷。因此，我們必須嚴肅地對待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首先我們要問他：如果中共一九四九年的革命「已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爲什麼他現在贊成「政治革命」來推翻中共所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呢？用「政治革命」來推翻「無產階級專政」，是一種什麼性質的革命呢？這不是意味著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嗎？我們主張「政治革命」，是推翻中共的「官僚專政」，蘇達是否同意我們這個主張呢？如果同意的話，那麼，中共一九四九年革命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什麼時候被轉變成爲「官僚專政」了呢？蘇達能明確地答覆這些問題嗎？

蘇達是最愛強調「理論」的，他應當知道，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面，「無產階級專政」是有其確定的階級內容和歷史任務的。首先，這個「專政」必須由民主方式選舉的工農兵代表會議（如十月革命的蘇維埃）所構成，以此實行對資產階級的專政，包括沒收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如果是

落後國家，還要完成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如土地改革、民族獨立等)，建立國有財產制，實行鎮壓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活動，開始踏上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中共一九四九年的革命所建立的政權果真是「無產階級專政」嗎？假如不是完全盲目，都會看到：中共建立的政權是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四個階級的聯合政權」或「聯合政府」，有如中共自己所宣佈的。雖然，這個政府由中共控制，但絕不能否認，有許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黨派代表參加了這個政府的各級行政機關，並且公開宣佈保衛資產階級的私產，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所有這些鐵一般的事實，難道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表現嗎？如果不是，你怎能說，「無產階級專政已實現了」呢？我們的「理論家」蘇達在無產階級革命這個中心問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已陷於極端混亂的修正主義的泥沼中去了！

當然，說一九四九年革命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不只蘇達一人，在第四國際的領導層中也有這種說法，這就是巴布洛，他通過克拉克（當時社工黨駐國際的代表）告訴我說：「巴布洛認為中國第三次革命實行了不斷革命，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因此他主張國外的中國托派應當加入中共，即回到大陸去為革命服務」。巴布洛這種見解，後來又表現於他所控制的國際書記處召開的所謂第四次大會（一九五四年）的決議之中，該決議案說：中國不須要建立獨立的托洛茨基主義的革命黨，以避免妨害革命的發展，意即妨害「無產階級專政」。

至於我們，自始就堅決反對巴布洛這種修正主義的思想，我們認定中共在一九四九年革命建立的政權是一種邦拿巴特式的專政（見《對中國局勢的報告》），我們謹慎地追隨著事變的發展，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寫了《中國第三次革命

及其前途》(刊登於一九五五年初第四國際瑞士支部的機關報《社會主義評論》)，在該文中較有系統地分析了中共政權頭五年在政治、經濟和外交各方面的演變後，得出結論說：

「毛黨最可能依照類似東歐所經過的道路爬行，這就是說，在國內外階級矛盾的壓力之下，毛黨將逐步地排除資產階級的代表於政權之外，取消『聯合政府』，建立其單一政黨所控制的政權，所謂『由人民民主專政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同時，將逐步地合併或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為國有，所謂『由新民主主義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經濟』，這樣中國在實質上將類似於東歐的變態工人國家，果真如此，中國要走到真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也將同東歐各國和蘇聯一樣，還須要經過一個政治革命。」(著重點為現在所加)

上面所提出的「政治革命」，還是根據中共踏上政權頭五年的事變的演進趨向所作出的「預測」，但這個預測在一年以後便被證驗了，如一九五五年所開始的「公私合營」，及一九五六年中共第八次大會所宣佈的「無產階級專政」，便和東歐各國的變態的工人國家差不多完全一樣了。就是說，在經濟的基礎上社會主義性質的「國有財產制」，而上層的政治結構則是「官僚專政」，因而以政治革命來推翻官僚專政是必須的，不可避免的。

我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提出上述的「政治革命」主張後，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在它一九五五年八月舉行的全國大會上，通過了《第三次中國革命及其餘波》的決議案，在該決議中肯定說：「中共是一個史大林主義的黨，它的政權是一種官僚專政，必須有一個政治革命去推翻它。」但到一九六〇年，該黨的全國委員會的兩個委員，史瓦貝克和梁恩(即李福仁)，在人民公社的煽惑之下，寫了『中國第三次革命、公社和政制』，在這篇文章中宣稱：中共不是史大林主義的黨，

中共政權不是官僚專政，他們引用大量的「事實」，「證明」中共在一九四七——四九年奪取政權的鬥爭中已改變了它的史大林主義性質，中共的政權絕非官僚專政，因為它沒有秘密警察保衛官僚的特權利益，它是像列寧時代的蘇維埃政府，經過民主方法選舉出的，因此，他們宣稱：「政治革命的綱領和口號，對中國是無用的。」他們主張用「民主要求的綱領」去改良中國的政治制度。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導受到史和梁的挑戰，又因為對史、梁所引證的事實弄不很清楚，要求我寫一篇文章以澄清他們在黨內掀起的混亂。因此，我寫了《中共及其政權的性質——政治革命還是民主改良？》我根據不可爭論的事實，詳細地駁斥了史瓦貝克和梁恩的一切論據，證明中共是一個史大林主義黨，它的政權是類似蘇聯的官僚專政，只有通過政治革命才能摧毀它，並替政治革命提供了一個綱領，從此可以說：

「在一九四九年革命勝利前，我黨有一個黨綱……那綱領提出的革命目標即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在一九四九年革命後，中共所建立的政權是和「無產階級專政」相反的「官僚專政」，所以我們提出政治革命以推翻官僚專政，建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民主政制——這就是「中國托派的新黨綱」。

我們這個「新黨綱」在一九六一年三月發表後（見社會主義工黨內部討論公報廿二卷第四期），當時歐洲一些托派領袖，如曼德爾（MANDEL）、弗朗克（FRANCK）和邁登（MAITAN）等，還保持他們原來反對政治革命的成見，但在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衝擊之下，到一九六七年三月舉行第四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全會時，他們為事變發展所迫，也公開承認「反官僚層的政治革命」的必要了。這就表明：中國托派所提出的「政治革命」的主張，已被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義

者所公認了。

蘇達對於這個全世界托洛茨基主義者所公認的「中國政治革命」，表示過什麼立場呢？底下一段話似乎是他的立場的表白：「關於革命後的新中國裏面的繼續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雖然在一系列的基本問題上（中國新社會的性質、政權的性質、革命任務、對象和動力）…，有了一致的確定的見解（正因為如此，才一直維持著某種程度的團結），但這些見解還欠缺一個堅固並為全體同志一致接受的理論基礎，我們同志這些共通見解，主要是模仿托洛茨基對墮落後的蘇聯的見解而得來。托洛茨基對蘇聯有深刻精細的研究，他關於蘇聯的革命理論和路線令我們完全信服。我們又看出第三次革命勝利後的中國在本質上和史大林官僚篡位後的蘇聯相同，…但作為黨的思想基礎，這是不夠堅強的，這還帶有很大的信仰成份，還不完全是科學研究的成果。黨的堅強的思想基礎，必須是對新中國本身的產生和發展過程，以及必然的趨勢所做的周密的科學分析。在這方面，我們不但沒有達到一致的見解，而且，這個研究工作根本還進行得很少，至今還沒有一套深入而成熟的意見提出來。在這樣脆弱的基礎上，我黨根本沒有可能進行強有力的理論鬥爭，沒有可能通過有力的宣傳工作對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發生重大影響，更談不到把整個先鋒隊以及整個階級爭取過來。」

上面一大段充滿學究氣，混淆不清，自相矛盾和幼稚思想的話是蘇達的「周密的科學分析」的總結，值得大家注意，但因為冗長和複雜，我們不得不把它分成幾點來給以檢討：

（一）蘇達所謂的「新社會的性質，政權的性質、革命的任務、對象和動力」，指的究竟是什麼具體內容呢？是否如我們根據社會學的定義所說過的，新中國是「一個變態的工人國家」，它的社會性質是「國有財產制」，它的「政權性質」

是「官僚專政」，「革命任務、對象」是「推翻官僚專政」，「革命動力」是工農群眾和革命的知識份子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依照蘇達說中國已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看來，他的答案應是否定的），蘇達又拿什麼社會學的定義來確定它們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爲什麼又說「這些見解還欠缺一個堅固的理論基礎」？所謂「理論基礎」，究竟是什麼？蘇達既然「發現」我們的綱領，「政治革命」「欠缺理論基礎」，爲什麼他不負起責來給以修正或補充呢？單做消極的批評，而不做積極的建議，或建設性的貢獻，這便是蘇達一貫的「作風」！

（二）蘇達說：「我們同志這些共同見解，主要是模仿托洛茨基對墮落後的蘇聯的見解而來的，托洛茨基對蘇聯有深刻精細的研究，他關於蘇聯革命的理論和路線令我們信服。」但「托洛茨基關於蘇聯革命的理論和路線」究竟是什麼？蘇達沒有任何交代或解釋，只是抽象地說：「我們又看出第三次革命後的中國，在本質上和史大林官僚集團篡位後的蘇聯相同」。但「相同」的「本質」是什麼呢？蘇達又不加以任何解釋，好像一切事物都是自明的，但他又宣稱：「作爲黨的思想基礎，這是不夠堅強的，這還帶有很大的信仰成份。」所謂「作爲黨的思想基礎」是什麼？蘇達又不給以解釋，要人們去猜測，這樣一來，他所謂「黨的思想基礎」，不但「帶有很大的信仰成分」，簡直是一團迷霧，或「空中樓閣」了。

爲要澄清蘇達所放出的迷霧和空想，我們便不得不多寫幾行來解釋一下了：

俄國的十月革命，是在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達到勝利的，這是一個典型的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革命，所以勝利之後即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解決了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隨後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建立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國有財產制，但由於舊俄的落後性和西方先

進國家工人階級革命的失敗而陷於孤立，而以史大林爲首的官僚（這也是落後性的產物），得以團結一切官僚份子於其周圍，形成一個龐大的官僚層，篡奪了黨和國家領導機關，以特爾米多式的政變，摧毀了保持十月革命傳統的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左派反對派」，把無產階級專政轉變成爲官僚獨裁，以民族保守主義的「一國建立社會主義」代替了世界革命的方針，但史大林官僚層爲了保持官僚享受特權的物質基礎，不得不保留十月革命所創造的國有財產制，這就在下層的經濟基礎和上層的政治結構之間形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要解除這種矛盾，只有經過政治革命才有可能——這就是托洛茨基「深刻精細」地研究「墮落後的蘇聯」的「理論和路線」。

至於中國第三次革命後的演變和「蘇聯」的演變並不完全「相同」。首先，這個革命是在一個完全史大林主義化的中共領導下，單靠農民武裝取得勝利的，所以它建立的政權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四個階級的聯合政府，它不但沒有及時剝奪資產階級的財產，反而保護它，甚至拖延土地改革，企圖在幾十年內去完成那個反動透頂的新民主主義的政綱。但「在國內外的階級矛盾的壓力之下」（如朝鮮戰爭，資本家和地主的反攻等），中共爲了自保，才被迫地實行土地改革，用「公私合營」的手段完成「國有財產制」，並逐步地排除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黨派的代表於政權之外，形成了中共一手把持的官僚獨裁，這就同蘇聯一樣，在下層經濟基礎和上層政治結構之間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這便是中國托派運用托洛茨基研究「墮落後的蘇聯」的「理論」和方法以研究中國得出來的「路線」，也就是根據「新中國本身的產生和發展過程以及必然的趨勢所做的科學的分析」的總結，也許不夠「周密」，但它一般的正確性是不可否認的，因爲它已被二十餘年來事變的發展所證驗了。

但蘇達堅持說：「在這方面，我黨不但沒有達到見解一致，而且，這個研究工作根本還進行得很少，至今還沒有任何一套深入而成熟的意見提出來。」我在上面已經指出：「這個研究」，已「進行」了二十多年，並得出了結論，在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中已「達到見解一致」。在中國，除了蘇達及其追隨者外，絕大多數的同志不但同意，而且為它鬥爭了。如果蘇達不同意，又如果他是為「我黨」負責，不是專事批評，光說空話，那他就應當「做周密的科學分析」，提出「一套深入而成熟的意見」來，給大家看看。如果真是「深入而成熟」，我們是準備著接受他的「意見」的。

（三）蘇達最後強調說：「在這樣脆弱的思想基礎上，我黨根本沒有可能進行強有力的理論鬥爭，根本沒有可能通過有力的宣傳工作對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發生重大影響，更談不到把整個先鋒隊以及整個階級爭取過來。」這段妙不可言的話，須要分開幾點來說明：

A. 說「我黨」的「思想基礎」是「這樣脆弱」，這是蘇達的主觀判斷，這裏不須再和他辯論，因為前面已說得夠清楚了。

至於說「我黨根本不能進行強有力的理論鬥爭」，這就完全抹煞了事實，「我黨」早已進行了「理論鬥爭」，也許不夠「強有力」，但所發生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例如中國托派最初提出「政治革命」的主張，已贏得第四國際旗幟下全體托洛茨基主義者，世界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的同意，現已在世界範圍內為它進行宣傳。在中國大陸，因為沒有托派的組織，當然不能「通過宣傳工作」去「影響」那裏的「無產階級先鋒隊」。但無產階級的一部份先鋒隊和革命的知識份子，根據他們自己的親身經驗，已於去年四月五日在天安門的示威中表示：「為了真正的馬列主義，我們不惜拋頭灑血。」這不是

未來「政治革命」的預告嗎？這不是「我黨的思想基礎」反映了客觀局勢發展的要求嗎？即以香港來說，雖然那裏的托派組織很小，但已「通過宣傳工作」「進行強有力的理論鬥爭了」。例如近年來，托派在《十月評論》上發表反擊毛派的造謠污蔑的許多文章，毛派都不敢，也不能回答。這就足夠證明，「我黨的思想基礎」的「強有力」了。同時，「通過宣傳工作」，托派的「聲音」已得到了左傾份子的「回響」。例如我們反對「官僚獨裁」，主張「社會主義民主」，已在左派刊物，如《黃河》，《左翼評論》和《學苑》中反應出來了，難道這還不是事實嗎？不是證實「托派思想的堅強」嗎？我們深信，「托派的思想」將隨著時間的前進而進展的。

B. 把蘇達上面一段話反轉過來，如果有一個「堅強的思想基礎」，「我黨」便可以「通過宣傳工作對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發生重大影響」，乃至「把整個先鋒隊以及整個階級爭取過來」，但他又忘記了一件小事，「我黨」還是一個十分微小的組織，像這樣的小組織，即使有堅強的思想基礎，又怎能夠「通過宣傳工作對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發生重大影響」，「把整個先鋒隊以及整個階級爭取過來」呢？這不等於說，只要有「思想基礎」，不管運用「思想」的工具——黨的能力和客觀條件如何，可以隨意製造奇跡，「把整個先鋒隊以及整個階級爭取過來」嗎？讓蘇達用他的「周密的科學」去解答這些問題吧！

C. 蘇達在另一方面肯定地說：「在國內政治革命爆發之前，在香港形成托派領導的強大的群眾運動…這種可能性是微小到幾乎等於零」（同上引文第三頁）。既然如此，那麼，托派又怎能專靠「思想基礎」，「通過宣傳工作對無產階級先鋒隊發生重大影響」，「把整個先鋒隊以及整個階級爭取過來」呢？這不是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嗎？

D. 一種「思想基礎」，即令是「最堅強的」，也不能在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把整個先鋒隊以及整個階級爭取過來」的，俄國二月革命後的布爾什維克黨，它的「思想基礎」總算得夠堅強的了，且擁有相當的群眾和先鋒隊，即以黨員說便有四萬人。但在七月以前，它在無產階級組成的先鋒隊蘇維埃中還是居於極少數，只有到八月哥尼洛夫的叛亂被壓平了之後，布爾什維克黨才於九月間，在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的蘇維埃中取得絕大多數(但不是「整個先鋒隊」，更不用說「整個階級」了，因為這是不可能的)。由此舉行暴動，奪取了政權。蘇達對於這種偉大的革命經驗和寶貴教訓，完全沒有體驗到，只是把一些偉大的字眼和抽象的辭句拼湊起來，當做「批評的武器」，向黨大肆「批評」，大發議論，這表明他的「科學研究」，不但欠缺「周密的分析」，簡直是「不知所云」了。這除了在那些沒有馬克思主義修養和缺乏革命歷史知識的人們當中，引起混亂、迷惑、離心傾向和頹喪情緒外，再不能有其他的結果。

### 關於「黨的領導核心極不勝任」的問題

蘇達從「理論」上、「思想」上和「政治」上，批評了中國托派「欠缺堅固的理論基礎」，或是「脆弱的思想基礎」後，便進而從組織上批評黨的「領導核心」的「極不勝任」或「幼稚無能」，他說：

「在第三次革命勝利前，我黨可說曾具有一個這樣的(領導)核心，那就是以犀照和耀如二同志為代表的領導集團，……可是，中共領導的革命勝利暴露了我黨有重大錯誤，連帶地也暴露出原有的領導核心實在並不勝任。此後二十幾年來，犀照同志和中委會原有的其他同志一直都沒有做到糾正過去的錯誤，補救原有的缺點，為黨建立一個堅固的理論

和政治基礎，因此，同志們很自然地普遍對他們喪失了信任，而越有獨立思想能力的同志越不再信任他們。

「至於一九五二年成立起來作為原中委會的繼承者的全臨會…更一貫地表現出極不勝任，得不到同志信任，這情況在最近四年裏並無好轉，只有暴露得更明顯。他們掛著領導機關的名義，卻完全起不了真正的領導作用。目前我黨顯然沒有一個真正的領導核心。」（同上第二至第三頁）

蘇達上面對「領導核心」的「不勝任」和「極不勝任」的指責，含有極深刻的用意，和他以前所散佈的「名存實亡」說（見他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五日寫的《怎樣著手去重建校友會》第一頁），聯繫起來，可能在某些人中發生惡劣的影響，必須分成幾點來給以詳細檢討：

（一）說「以犀照和耀如二同志為代表的領導集團」，「中共領導的革命勝利暴露了我黨有重大錯誤，連帶也暴露出原有的領導實在並不勝任」，首先要問：「重大錯誤」在那裏？是不是「沒有正確的具體行動政策」或「幼稚無能」，有如蘇達以前所批評過的呢？如果是，我在前面，根據文件和事實，已經解答過了。如果不是，那只有等到蘇達指出新的錯誤的證據來，我們再來解答。

（二）說「二十幾年來，犀照……沒有做到糾正過去的錯誤，補救原有的缺點，為黨建立一個堅固的理論和政治基礎」。我們又要問：怎樣「糾正過去的錯誤，補救原有的缺點，為黨建立堅固的理論政治基礎」呢？是不是指分析我黨失敗和中共勝利的諸原因，由此做出總結，得出教訓，「為黨建立理論政治基礎」，提出鬥爭的政治路向呢？如果是，我們在一系列的文件，如《對中國局勢的報告》、《對蘇達的批評的批評》、《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前途》、《中共及其政權的性質》等中已經解釋過、闡述過和論證過了，而且在本文的前部份

又重覆了一次。如果蘇達認為所有這些還不夠，甚至錯誤，就請他提出另一套解釋、論證和「理論政治基礎」，以及「鬥爭的路向」來，我們是準備接受他的挑戰，從長討論的。

（三）說「同志們很自然地普遍對他們喪失了信任」，請問蘇達，他這種判斷根據什麼文件或調查記錄？如果拿不出文件和調查記錄來證明「同志們很自然地對他們喪失了信任」，那就表明：如不是有意中傷，便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志」了！

（四）至於說「越是有獨立思想能力的人越不再信任他們」，這裏所謂「越有獨立思想能力的人」，指的是誰？他沒有說出姓名來，我們不便猜測，但可以肯定的是：蘇達自以為是「越有獨立思想能力的人」。但他的「獨立思想能力」創造出來的作品是些什麼貨色？是不是《中國革命的回顧與前瞻》和《中國托派的現狀和前途》呢？如果是，（實際上一定是，因為除此以外，再看不到他有什麼偉大的作品。）那我們已經批評過了前者，並正在批評後者。它們所包含的主要內容究竟是些什麼東西，讓同志們（包括「不信任的同志」）去鑒賞蘇達的「獨立思想能力」所創造出來的傑作吧。

此外，根據蘇達的親密朋友關係看來，陳勝最可能是他所謂的「越有獨立思想能力的人」之一。就陳在組織內部鬥爭中所採取的態度、方法和言論看來，差不多和蘇達所採取的異曲同工。可是這位「有獨立思想能力」的陳勝，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出版的《戰訊》上，發表了一篇題名為《反右傾的鬥爭》。在該文中分析了「毛江派」所發動的「反右傾翻案風」為「進步的」之後，聲明「支持反右傾翻案風，不等於支持毛江派，毛江派既然裝成『左』，在策略上，應該視他們為暫時的同盟者，將鬥爭的矛頭指向右傾的官僚」。不幸得很，四月五日天安門的示威者（十萬人），恰好和陳勝「唱反

調」，高喊「打倒慈禧太后（江青）」的口號，「讓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毛澤東們）見鬼去吧！」這不是打了陳勝一個大巴掌，對「有獨立思想能力的人」的大諷刺嗎？我們不知道蘇達對此作何感想？！

還有一件事值得指出的，就是：「革馬盟」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出版的《戰訊》上，發表了一篇綱領性的文章——《中共官僚統治的危機與政治革命的前途》，該文說：「毛派主要的社會基礎，向來都放在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政治覺悟最高底階層的身上，……至於右派（即周鄧派），則其社會基礎建築在正在凝聚中的科技管理人員、知識份子、國家機器的官僚幹部和比較富裕的農民這樣的階層上面」，並說前者執行了「不斷革命」，後者則是反對它的。這樣露骨的親毛傾向，連一向支持革馬盟的耕野〔王凡西的筆名——編者〕也感到難於緘默，起而批評說：

「如果真是這樣，我們非但應該像我在上面所說的去『擁毛反右』，而且已沒有理由堅持對毛派採取政治革命的路線」（見耕野致革馬盟胡、陳、明的信，刊載於一九七七年一月出版的《戰訊》）。

耕野對革馬盟親毛傾向的批評，可說是「一針見血」。從這點說，他還保持著托洛茨基主義的一些原則，是值得贊許的。蘇達和耕野一樣，同是革馬盟的支持者，而且該組織的領袖陳和明，又是他的親密朋友，但他對革馬盟的親毛傾向，是否和耕野一樣，採取了公開的批評呢？沒有，這表明，「越有獨立思想能力的」蘇達，只是對第四國際中國支部，中國革命共產黨採取「獨立」批評的態度，而對於革馬盟的親毛傾向，假如不是事先同意，至少是事後包容了。

（五）說「一九五二年成立起來作為中委會繼承者的全臨會，……更一貫地表現出極不勝任，得不到同志的信任。

這種情況，在最近四年裏並無好轉，只有暴露得更明顯。」爲要「暴露」這段話的作者對托派所遭受的極嚴重的打擊及其最艱險的處境之完全無知，或故意抹煞，我們必須把它分成三部份來討論：

A. 自中共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後，即以全力進行搜捕托派份子，到一九五三年初，留在大陸所有的托派及其同情者，甚至他們的家屬都被捕、監禁了。這就給了中國托派一個致命的打擊，把托派在二十年中所建立起來的基礎掃蕩無遺，這對中國托派運動是一種劃時代的災禍。和三十年代的蘇聯，在史大林策劃下的大審判案剷除托派（當然還有老布爾什維克右派）的情況是相類似的，只是規模的大小不同而已。

約在一九四九年左右，從大陸逃到香港的領導份子和幹部盡力在當地重建領導機關，出版機關報，訓練幹部，整理組織準備向外發展，但工作剛剛開始時，卻遭到港英當局的壓迫。大批同志被捕、被驅逐，最後是領導份子被迫流亡。於是，香港的托派第一次遭受了最沉重的打擊，跟著的是國際領導的錯誤政策又給香港托派帶來了災禍。由於以巴布洛爲首的國際領導層，認定第三次中國革命實行了不斷革命論，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中國托派沒有獨立發展的歷史前途，只有參加入中共幫助它去完成社會主義的任務；主張香港的托派份子回到大陸去參加革命活動，因而發生了「回鄉運動」，如阿蘇、阿余、阿毛等一批人所實行的。這些返回大陸的同志們的命運如何，極少消息，多半是悲劇性的，但對於香港的組織來說，又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了。從此以後，香港的托派愈來愈陷於孤立，再加上內部不斷的爭吵和派系鬥爭（這也是在革命失敗後陷於孤立的革命組織不可避免地發生的現象）。這種內部鬥爭經過一段時期後，由於鬥爭沒有積極的結果，雙方的領導份子及其追隨者，不是脫離運動，便是

消沉下去了。在這樣外來的強大打擊和內部不斷紛爭的情況下，怎能產生「勝任的領導」，得到同志的信任呢？

一個在革命運動中失敗而又陷於極端孤立的組織，不但不能成立「勝任的領導」，「得到同志的信任」，而且往往是相反的。例如，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失敗後，德國共產黨員不是消極或脫離，便是流亡到國外去了，尤其流亡到英國的最多。那時雖有馬克思和恩格斯那樣傑出的領袖，不但建立不起「勝任」和得到同志「信任」的領導，反而陷於最糾紛的漩渦中，因為流亡者中意見紛歧，互相爭吵，形成了兩個不可調和的派系。最後，使倫敦的中央委員會分裂成兩部份互相攻擊，經過「科倫共產主義者審判」之後，共產主義者同盟也就瓦解了。這表明：雖然有「堅固思想」和偉大天才的領袖，如馬克思和恩格斯，還是不能轉變不利的客觀局勢，製造奇跡，如蘇達所想像的。

留在香港的托派，雖然困難重重，但剩下來的幾個領導幹部繼續補充的「全臨會」還是勉強地維持了殘局。斷斷續續地出版刊物（如《嚮導》）和小冊子（如《對擁護人民公社的各種意見的批評》和《中共及其政權的性質》等）及《校內公報》等。雖然不能維持組織的正常生活，但還能時常集會，交換意見，討論國內外的時局，更重要的是，對大陸發生的重大事變，如人民公社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等，都發表了對它們的分析、評斷和預測，不管這些工作做得不夠好，或有缺點，但總算表示出「全臨會」的繼續存在，繼續活動，在二十餘年最艱苦的長時期中，把中國托派的政治和組織生命維繫下來了。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不是蘇達的唯心論）的觀點來檢討「全臨會」的負責幹部的工作，是應該給他們一個公道的評價的，那就是：他們在中國托派運動最艱苦的長時期中，起了「繼往開來」的不可缺少的作用。如

果沒有他們的艱苦奮鬥和逆流游泳的精神，中國托派運動也許早已「瓦解」或中斷了。

如果我們將歐美各國托派運動的情形拿來和中國托派運動加以對照，就顯得後者的突出。在西歐（除納粹佔領時期外）和美國的托派享有公開出版、集會和競爭選舉的自由，在領導機關服務的是「職業革命家」（即生活費由黨維持）。雖然如此，但能長期奮鬥的還是少得很。例如法國托派（法國托派在西歐算是最好者之一），在三十和四十年代加入運動的黨員剩下來的不到兩三打人（指現時四個托派組織的老黨員），而積極負責活動的更是寥寥無幾。美國的社會主義工人黨是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正常發展」的典範，但三十年代加入它的老黨員也只剩下不過一打多人，一貫積極活動的更少；即以四十年代加入的黨員來說，剩下來的也不過兩三打人，而至今積極負責的，也不比三十年代加入的老黨員更多些，假如不是更少些的話。

由上面的敘述可以看出：即令在條件最好，享有相當民主自由的國家裏，托派運動還是極難發展，因為參加運動的成員和幹部不能堅持長久奮鬥，這當然有其客觀原因：一方面托派總是遭受史大林派的不斷造謠污蔑，甚至謀殺（托洛茨基和他的兒子西道夫等）和法西斯的迫害（如希特勒占領西歐大陸的時期），以及資產階級政府的打擊（如在第二次大戰中美國社工黨的大批領袖被捕、監禁以及隨後麥高錫法案的迫害）。另一方面，從一九二八年末在各國成立托派組織算起，到現在已近半個世紀，即以一九三八年正式成立第四國際來算，亦快四十年了，在如此悠長的歲月中是很難堅持繼續奮鬥的。革命家也是人，忍受艱苦總是有限度的。只有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及其歷史使命有深刻理解而又具有最堅強意志的戰士們，才能抵抗一切艱苦和打擊，百折不撓長期

奮鬥，死而後已。但這樣的奮鬥不能求之於一般的革命家，所以三十和四十年代加入托派運動的黨員，由於忍受不住長期艱苦奮鬥，成千地退出鬥爭舞臺了。中國托派在長期中遭受了稀有的挫折和艱苦奮鬥之後，還剩下少數老幹部（他們都是四十年代左右加入運動的）繼續進行鬥爭，對他們來說，是可以引為自豪，值得尊敬，和青年效法的；只有別有用心之徒，才會貶低他們，指責他們，惡意中傷他們。

還有一點應該指出的：革命家的嚴重考驗之一，要看他是否能夠抵抗嚴刑逼供。現時的領導幹部中，有一位老同志，曾經兩次被捕監禁，尤其在一九四三年被日本特務拘捕時，經過了殘酷的拷打，他始終忍受得住，沒有供出一個同志的姓名、住址和任何秘密，以致連拷打者也承認他是「好漢」。在這方面，蘇達並無光彩，因為他一經被捕，即吐露了我們護照上的姓名，以致我們無法回港替運動服務。

B. 蘇達指責「全臨會」「極不勝任」，「得不到同志的信任」，但他自己在那個二十多年的長時期作了什麼呢？如果他有責任感，為「我黨」負責，為什麼不及早提出批評和建議，以改造那個他認為「極不勝任的全臨會」呢？即令「全臨會」不同意他的建議，他還有權利（一個黨員的權利）向同志們，尤其向那些「不信任」「全臨會」的「同志」們呼籲，提出具體的辦法，請求大家討論，作出決議，以改組「全臨會」，或另建新的領導機關。他為什麼不這樣做？要等到一九七三年，正當全臨會自己振作起來，開始整頓組織，恢復正常生活，準備出版公開刊物時，他才大寫文章，宣言：「中國 T 學校校友會（即中國托派組織）早已名存實亡了」（見蘇達一九七三年九月寫的《怎樣重建校友會》第一頁），這就根本否認了「全臨會」在二十多年中繼續存在的事實。因此，他主張「重建校友會」，提議「成立一新的統一的中 T 校友會（即中

國托派新的組織)，代替舊的組織。新會恢復使用一九四二年分裂前的組織名稱，或另定新名稱，新會仍然為「四際中支」，這就等於說，取消中國革命共產黨的名義，以便和那個在一九四二年違反布爾什維克民主集中制的小派別殘留下來的兩個人成立中國托派的新中央委員會，恢復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或另用新的名稱，這便是蘇達以「仲裁者」自居，對雙方「仲裁」所做出來的「總結」。想不到，在我們運動中竟有這樣狂妄的人！

在我們方面，除了對中國大陸所發生的一切重大事變，發表文章和訪問記，在國際上表示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看法外，我們曾密切地注視香港組織，在重重壓力之下所形成的孤立狀態、內部糾紛和種種困難，不斷地給以忠告、批評和建議，試圖調解爭執，協助克服困難，使運動繼續向前發展。

當一九六八年旅行日本時，我們從浪同志得悉香港組織的具體情況，知道那裏的組織趨於渙散，停止了正常的組織生活。因此我們回到歐洲後，即寫信給全體同志，指出世界局勢的新發展（如一九六八年五、六月間法國的革命和捷克的民主改革運動）有利於托派運動的擴張，以鼓勵他們振作起來，復興事業，並建議籌集資金，出版公開雜誌，以期廣泛地傳播我們的思想和主張。全臨會採納了我們的建議，於短期內籌集了可觀的現款，足以應付刊物的出版，但問題在於缺乏一個負責主編的人，我們曾推薦蘇達擔任這個職務，可是，被他拒絕了。這表明，蘇達除了肆意批評和大發議論外，是絕不願意擔負組織的任何重要實際工作的。

從一九七二年春天起，香港七〇年代集團中的一批青年陸續地到法國留學，並訪問我們。因此，我們有機會和他們討論有關革命的思想問題，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問題。此種討論經過了半年之久，最後說服了他們中的大

多數，從無政府主義思想轉變到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來了，這便是從一九七三年秋起，一批青年托派出現於香港政治活動的來源。這表明，我們不只是專做建議，只要一有機會，我們是盡力之所及幫助香港托派組織的發展的。

C. 蘇達說「這情況最近四年來並無好轉，只暴露得更明顯」。這就是說，從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七年這段時期，「全臨會的極不信任」，「暴露得更明顯」。這種說法，不僅完全抹煞事實，簡直是惡意中傷，存心誹謗！

先看事實吧：一九七三年組織開始恢復了正常生活，由法國回來的青年托派，向外公開活動，一九七四年初開始出版《十月評論》，到一九七五年末，這個刊物已幾乎做到按月出版，差不多同時，青年團也領導出版了刊物《左岸》（後改爲《新思潮》）。……這一切，都是在「全臨會」的領導或幫助之下進行的。怎麼能說「全臨會的極不勝任，暴露得更明顯」呢？這還不是完全抹煞事實，惡意中傷，存心誹謗嗎？

另一方面，現時全臨會的負責同志，不像歐美托派領導幹部，由組織維持生活，他們是全靠自己從事職業以維持其家庭生活的，只利用業餘時間來替組織工作，如替刊物寫稿，開會討論問題，以及處理其他的一切事務等。所以他們的工作是異常忙碌而繁重的。此外，他們還要設法替組織籌措必需的費用，如出版刊物和書籍等。像這樣艱苦工作和自我犧牲精神，在全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幾乎是獨一無二的，理應「得到同志的信任」和欽佩，予以積極的支持的。但蘇達卻指責他們「極不勝任」，這還不是惡意中傷，或別有用心嗎？

### 蘇達對大陸和香港局勢的看法和建議

蘇達在他的《中國托派的現狀和前途》中，花了大半篇

幅論述大陸和香港局勢的演變，但他不能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分析事變的發展，得出明確的結論，作為鬥爭的指南。相反，他用印象主義的描敘和學究式的講解，造成了很大的混亂和矛盾，致使讀者陷入迷途。為要讓讀者從迷途中轉向革命的道路，必須澄清混亂，解除矛盾。

先讓我們看看蘇達關於大陸局勢演變的論述吧：

「中共統治，自從所謂文化大革命以來，一直在上層危機中打滾，由於官僚特權層的本性所決定，中共面對著越來越複雜的國際和國內問題時，不是採取比較民主，比較多依靠群眾的路綫，而是反過來越來越遠離群眾，加深寡頭統治和個人獨裁的程度，但結果並未達到維持黨內團結和穩定的目標，反而使上層危機接連爆發而且日益劇烈。（見《中國托派的現狀和前途》第五頁）

蘇達寫了上面一段印象主義的描敘後，即對大陸局勢的發展作出了如下的總結：

「由於十年來中國人民已經飽受毛澤東大搞假革命之苦，飽受在繼續『革命』名義下給予他們的種種打擊，所以他們那種普遍對現狀不滿的心理，與其稱為『人心思變』，倒不如說是『人心思安』。…但『思安』則是感覺紛亂、震動、犧牲已經太多了，更多的變亂和犧牲是無意義、無價值的，希望那些掌握政治和軍事權力的人放下屠刀，讓人民過安定的生活。現在中國人民的普遍心理屬於後一種。……這不是革命臨近的徵兆，而是革命前途尚遠的徵兆，現在繼續『革命』的口號，在中國的名聲並不好，普通人民都把它當作災禍。以華國鋒為首的中共新領導集團提出大治的前途是爭取人心的聰明手段。」（同上第五頁）蘇達從他的「人心思安」的哲學得出的總結：「現在繼續『革命』的口號在中國的名聲並不好，普通人民都把它當作災禍」，這樣，就根本否認了作

為推翻官僚專政、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的中心口號——「政治革命」了。這是徹頭徹尾的取消主義！而且表現出蘇達的自相矛盾，因為他也是贊成（在口頭上）政治革命的。

我們要問蘇達的是：所謂「普通人民」代表什麼階級呢？他們的「思安心理」又反映了什麼階級的意識？或者是反映了超階級的意識？如果就愛好「過安定生活」把「繼續『革命』當作災禍」來說，當然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和願望，但這和近年來大陸的工人群眾和革命知識份子提出的要求和表現的行動是不相符合的，我們只須指出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門事件，就夠說明人民的意向和行動了。

蘇達總不會否認天安門廣場十萬示威群眾，是反映了大陸人民的「普遍心理」吧。他們的「心理」表現在什麼地方呢？表現在激烈的言語和暴力的行動中。他們摧毀警員車輛，焚燒軍用房屋，這還不是革命的行動嗎？他們宣稱：「人民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這不是指毛澤東的統治已經過時了嗎？他們宣言：「我們相信馬列主義，讓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見鬼去吧！」這裏所謂「秀才們」指的是誰？不是指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嗎？他們宣誓：「爲了真正的馬列主義，我們不惜拋頭灑血。」這是爲了「過安定生活」嗎？而且在這個宣誓幾點鐘之後，他們當中幾百人，在毛澤東的血腥鎮壓下，果然「拋頭灑血」了！像這樣震動全世界的巨大事變，蘇達對它作了什麼評價呢？什麼也沒有。他只是把「天安門事件和李一哲大字報」平行起來，指責他們「還未拋棄對整個官僚層的期待，提出奪取政權的問題」（同上第六頁）。這種指責，簡直是迂夫子的口吻。他完全不懂，當革命群眾在沒有革命黨的領導下，常是對統治層中的溫和派或改良派懷抱幻想，如一九五六年中匈牙利的革命群眾對納吉派之抱幻想，就是最新鮮的例子。天安門的

群眾，事先毫無組織和行動計劃，只是在偶發事件（搬走獻給周恩來的花圈）的刺激下，自發地行動起來的。怎麼能指責他們「還未拋棄對整個官僚層的期待，提出奪取政權的口號」呢？假如這不是對革命群眾的行動滿懷成見，便是對事變的發展幼稚無知。

在我們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托洛茨基主義者看來，天安門事件，是表示人民大眾對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統治之第一次挑戰。因為人民在這個統治的二十八年中，既失去了一切的社會主義民主權利，而生活又日趨貧困（工資已凍結了十年，物價卻不斷增漲），再加上毛澤東為了鞏固他的個人崇拜和個人獨裁，不斷地發動「運動」或鬥爭，以清除他的一切反對派系，致使人民大眾、中共自己的基層黨員和幹部都經常陷於恐懼狀態之中。這一切含有爆炸性的因素，積累起來便成了天安門事件爆發的根源。這是匈牙利革命的回響，中國政治革命的序幕。

這種政治革命，我們早在二十年前，根據中國事變的發展已預測過了，並且給它提供了政綱。天安門廣場的示威群眾，第一次用語言和行動證驗了政治革命的必須和正確性。我們一定要把天安門事件看做政治革命的起點，向革命的群眾指出：他們必須從天安門事件的經驗中吸取教訓。首要的是他們必須組織自己的革命共產黨，當時機到來時，舉行起義，推翻官僚獨裁，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政制。讓蘇達假借「那些飽受假革命之苦的群眾」詛咒「我們唯恐天下不亂，企圖混水摸魚」吧（上引文見《中國托派的現狀和前途》第七頁）。中國大陸的革命群眾一定會依照托洛茨基主義者所指出的，天安門的示威者所開始走的道路——政治革命——前進的。

蘇達對香港局勢演變的論述，比起他對大陸所做的，較

少混亂和矛盾。其中有些甚至是值得參考的，如對港英當局施行「開明政策」的解釋，毛派思想在香港激進青年中的影響及其（激進性和保守性）的分析。但他沒有一句話提到天安門事件對於香港的影響，正如他對天安門事件的重大意義沒有給以任何評價一樣，這表明他只看到樹枝而不見森林。

事實上，天安門事變給了香港的激進青年和一般輿論界一個極大的刺激，使人們對大陸的看法發生了轉變，在此以前，香港的毛派，通過學聯的領導，差不多控制了激進化的，至少大部份的學生青年。在天安門事件後，學聯發生分化了，部份院校的領導已落於反毛派之手。《學苑》從親毛派轉到反毛派，就是顯著的事實。香港的輿論界，多年來，毛派的報刊都處於進攻的陣地，但在天安門事件以及隨之而來的清算四人幫事件，毛派刊物（《文匯報》、《七十年代》等）都陷於狼狽不堪的狀態，而處於退守和自衛的地位了。

另一方面，代表激進思想的刊物和集團，在天安門事件以前，是孤立的，受毛派排斥的，但在天安門事件後，這些激進青年團體昂起頭來向毛派進攻了，如《黃河》雜誌派之向新華社投遞抗議書，各左派團體在維園集會抗議毛澤東對天安門示威者的血腥鎮壓，要求釋放被捕者。同時，非毛派的刊物，如《南北極》、《明報月刊》、乃至《明報》，都對天安門的示威及其犧牲者表示同情和憤慨，因而把同情擴展到與天安門事件有直接關係的周鄧派，以致毛澤東的聲譽在香港一落千丈；甚至成為攻擊的主要目標。對托派來說，天安門事件不但證驗它所一貫主張的政治革命的正確性，而且它所提倡的推翻官僚獨裁，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已得到了廣大的回聲，本年七月各左派團體代表（《十月評論》、《左翼評論》、《戰訊》、《黃河》及部份大專學生等）的聯合集會，公開討論中國的現狀和前途問題，達成了較接近的意見。這對

於香港托派運動的未來發展準備了新的條件。

從上面所敘述的事實總結起來：香港和大陸一樣，天安門事件給它們劃了一個標界，從今以後，毛澤東的思想和影響已「日落西山」，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和影響將「如日東升」。

至於蘇達對香港運動所提出的一系列的建議，其中有些可供參考。但它們缺乏一個理論和政治的中心，乃是經驗主義地把各種各式的問題平列起來，再加上錯誤或歪曲的解釋，便顯得混亂和矛盾了。因為，一方面，他完全不懂得我們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理論和政治的傳統，如前面詳細地所指出過的，另一方面，他自己沒有堅實的理論和政治基礎，這從他任意攻擊黨的理論基礎和政治立場所暴露出來。因為本文篇幅有限，不可能批判蘇達的一切錯誤、混亂和矛盾，而且本文的主要任務，在於分析和批評蘇達在理論上、政治上和對黨的傳統問題上所犯的錯誤。現在讓我們把這一任務進行到底吧。

### 對蘇達「簡評綱領草案」的分析

在《簡評綱領草案》時，蘇達確是以「理論家」的姿態出現於人們面前。因此，對他的《簡評》值得詳加分析。這裏指出三點，分述如下：

（一）蘇達在《簡評》一開始即指出：「綱領草案第十二條批評中共在取得政權後初期保存資本主義成份的政策，說這政策『完全違反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後立即無償地沒收資產階級生產資料的主張』。其實，馬克思主義並沒有這樣的主張，草案這句話是信口開河。」因此，他大顯其歷史博學知識，引證《共產黨宣言》的綱領文句，十月革命後沒收資產階級財產的經過，以及一九三二年托洛茨基教導德國無產階級怎樣辦的意見等等，以證明「草案」

的「信口開河」。

我們承認，綱領草案說：「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立即無償地沒收資產階級生產資料的主張」，這句話中的「立即」兩字是有語病的，或過激的。但並非「信口開河」。蘇達拿一八四八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對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所規定的政策來替一九四九年中共取得政權後的機會主義政策辯護，這是對歷史開玩笑！他完全忘記了，或不懂得，《共產黨宣言》發表時正是資本主義開始向上發展的時代，中共取得政權時，資本主義早已發展到它的最後階段——帝國主義時代了。在《共產黨宣言》發表和中共取得政權之間已有一百年以上，拿前者的政策來辯護後者的政策，這還不是對歷史開玩笑嗎？布爾什維克在十月取得政權後，並不是依照《共產黨宣言》所規定的政策行事（即把沒收資產階級財產放在不定的時期去解決），而是在短期內，即取得政權八個月後（一九一八年六月），基本上已剝奪了資產階級的財產。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二年教導德國無產階級怎樣辦的話中，如蘇達所引證的，「工廠可以借紅衛兵的幫助而奪取」；他在一九二八年談到，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失敗和第三次革命的前途時，就已經預示，第三次革命開始將會觸犯資產階級的財產制。一九七四年四月葡萄牙的革命發生後不到三個月，工人群眾便自發地沒收了資產階級的大量財產，如銀行、保險公司、運輸企業和工場等。蘇達能指責葡萄牙工人群眾違反了《共產黨宣言》所規定的政策嗎？

歷史發展到了我們的時代，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不但絕不能依照《共產黨宣言》所規定的政策去進行，就是十月革命的經驗也不能死板地去抄襲。這就是說，越是接近資本主義的死亡時期，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對資產階級的剝奪也就越激烈。這是依照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對歷史發展的分

析所得出來的結論。讓蘇達向歷史的發展規律去嘲笑吧。

中共在取得政權後，公開宣佈「保護資產階級的財產」，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博學的蘇達爲什麼不從《共產黨宣言》、十月革命後的經驗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托洛茨基等的文獻中搜尋論據，替中共這種機會主義的政策辯護，反而默不作聲呢？！

另一方面，蘇達卻大肆宣揚中共的「成就」，如說「中共在內戰勝利後超速地穩定了金融物價，並恢復了生產，這是偉大的成就，中國內外（包括第四國際）引起了普遍的讚揚。」這種「讚揚」不知根據何種文件或報刊。就我們所記憶到的，並不曾看到「普遍的讚揚」。如有的話，讓蘇達去找出論據來證明吧。還有，史大林佔領了東歐各國後，也「穩定了金融物價，並恢復了生產」，爲什麼蘇達完全緘默呢？這是否由於他的民族主義的立場而讚揚中共呢？否則，就是對中共懷有特別的好感了。

（二）蘇達引證綱領草案二十條最後一段話：「在進入共產主義階段之前的過渡時期，『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仍然是最有效而必須遵守的原則」，他認爲『這見解包含了幾重的錯誤』，因爲「在僅僅能夠『按勞分配』的時代，根本不可能實現『各盡所能』，而到了真正能夠『各盡所能』的時候，必然也能夠『按需分配』了」。蘇達對「各盡所能，按勞分配」這一解釋，確是根據托洛茨基一九三六年批評史大林的新憲法的意見中演繹出來的（見《被背叛了的革命》第十章第一節）。這是蘇達的全文中含有積極意義的一點貢獻。但他說：「在現階段的中國，不但不能實現『各盡所能』，連『按勞分配』的條件都不夠」。這種說法，不但不正確，而且是大錯特錯的。試問，如果說「現階段的中國」，「連按勞分配的條件都不夠」，那又怎樣進行「分配」呢？蘇達對此毫無交代，因

爲他提不出任何別的分配方法來代替「按勞分配」。事實上，「按勞分配」是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迫不得已的辦法，無所謂條件夠不夠的問題，在落後國家和先進國家一樣，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都必須採取「按勞分配」的辦法，因爲除此以外，沒有其他的辦法可以解決「分配」問題的。而且國家愈是落後或貧窮，如「現階段的中國」，就愈加需要「按勞分配」。問題在於執行「按勞分配」的政權，是否名符其實的無產階級專政，還是官僚專政。如果是前者，在它開始執行「按勞分配」時，務必使「按勞分配」所發生的工資差距限制到最小程度，並用法規使這種差距漸趨縮小，漸臻平等；同時盡力提高教育水準，務使社會所有成員的智能平均發展，逐漸消除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發展生產力，增加生活物資，不斷改善人民的生活，在大力促進世界革命的完成中，結束「過渡時期」，逐步走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道路。如果是官僚專政，像現時的蘇聯和中國的情形，所謂「按勞分配」，不過是特權官僚擴大其層份（如以高薪吸收擁護者）和維持其特權的物質享受作掩護而已。

三、蘇達引證綱領草案第三十三條指出「一支農民軍在中國革命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但它始終就由一個較強大的中共所建立、所領導，沒有這個黨的存在，這支軍隊的勝利是不可思議的」。蘇達嚴厲地批評了這種說法的錯誤。但這種說法，和蘇達所說的「正因爲不斷革命信徒的幼稚無能，才讓領導不斷革命達到勝利的責任落在階段論者中共身上」，是類似的錯誤，因爲它們同樣忘記了中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各種錯綜複雜的條件，如我在前面所指出過的。「如果沒有那些錯綜複雜條件的配合，中共單純依靠農民武裝隊伍的勝利是不可思議的。」換句話說，綱領草案的錯誤和蘇達的一樣，只從主觀方面看問題，而忘記了客觀條

件所起的決定作用。

四、關於「中共到底是一個什麼性質的黨？」蘇達對這個問題發表了一大篇議論，並引述了中外托派份子對它的各種各式的看法，但他自己卻沒有說出中共的性質是什麼。最後，他根據「上引草案那段話對於一個問題彷彿是確定了立場」，就是「自二次革命失敗後，中共一直是史大林主義的黨」，這種「彷彿」「確定」的說法倒是真的，因為我們在過去幾十年所寫的許多文件中，都說中共是一個史大林主義黨，或史大林主義的中共。可是蘇達跟著「追問」：「所謂史大林主義黨，在政治上的含義是什麼？說得更具體些，這是否表示某一階級性？是否表示它是革命的，或機會主義的，或中派主義的？又是否表示它完全遵照蘇聯官僚的路線？」從蘇達提出的這一系列問題中可確定一點，就是：他反對確定「中共為史大林主義黨」的。可是他又和對其他問題一樣，不說出他自己對中共的性質究竟是什麼，或代表什麼階級，只是「追問」人家，盡力避免表示自己的意見。因為他害怕從正面表示自己的意見後，會受到別人的批評，這是一種最狡滑的爭論方法，對自己，當然「佔便宜」，可是太不負責任了。不過，我們還得「追問」他：他對中共的性質究竟怎樣看法？對我們來說，認定中共是一個史大林主義的黨，是含有一定的內容，一定的階級性的。

托洛茨基和所有的托洛茨基主義者，都稱蘇共、法共、意共等為史大林主義黨，並且寫進《過渡綱領》中，至於它們「在政治上的含義是什麼？」「這是否代表某一階級性？」我們曾說過無數次，現在再說一遍：史大林主義黨，「在政治上」是代表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黨，等於列寧、托洛茨基等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稱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包括俄國的孟什維克）是小資產階級的黨是同樣的。不管這些史大林主義

黨和社會民主黨一樣，擁有廣大的工人黨員，就其組成份子說，是些工人黨，但在政治上即就這些黨的領導所執行的基本政治路線說，是小資產階級的，因為它們和社會民主黨一樣，所追求的是在資本主義體系內謀取民主改良，而不是準備無產階級去推翻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自己的專政，以此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因而它們的政策，在實質上是替資本主義（包括帝國主義）的統治服務的。

蘇聯的史大林黨（蘇共），爲了特權官僚層的利益，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名義下，放棄了推翻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政策，因而實行「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的總路線。在國內實行官僚專政，任意剝削和壓迫工農大眾。在蘇聯集團外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史大林黨，除了變成克里姆林宮外交政策的工具外，已和社會民主黨同流合污地實行同樣的改良主義政策了。

現在的問題是：蘇達是否同意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對於蘇共性質的看法？如果不同意，他就應該公開說出來，如果同意的話，我們便要進一步問：中共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以及「實行官僚專政」，任意剝削工農大眾」等政策，是否和蘇共相同呢？在這些有關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基本問題上，是絕不能容許含糊或避免作答的，讓蘇達認真考慮後來答覆這些問題吧。

### 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傳統

蘇達在《怎樣建立校友會》一文中，斷言「中國 T 校校友會早已名存實亡了」以外，並指責「二十年以上的老幹部也大都非常缺乏政治的歷煉，他們的身體和精神已漸趨衰老，能力上仍舊非常幼稚——總而言之，我們的傳統是很微弱的，今後想打開前途，必須從頭做起。」關於蘇達辱罵「老

幹部……能力上仍舊非常幼稚」的話，我不想浪費筆墨來批評它，因為這已越過批評同志的限度太遠了，讓讀者去思索這句話的含意，並把這句極端侮辱的話當作一面鏡子去照照侮辱者的嘴臉吧。我所關心的是「我們的傳統很微弱」，如果真如蘇達所判定的，經過了將近半世紀最艱苦的鬥爭，付出了巨大犧牲的中國托派，除了錯誤、罪惡、領導者的「幼稚無能」、和「老幹部……能力上仍舊非常幼稚」外，沒有留下任何值得重視的經驗和教訓，所留下來的只是沾滿污點的廢紙而已。歷史的事實果真如此嗎？首先應該問：什麼是「傳統」？就一個革命黨的傳統來說，主要是它的理論、政治、組織原則及其幹部的奮鬥和犧牲精神，在鬥爭過程中，經過事變的考驗得出來的經驗和教訓的總和。我們就根據上述的傳統的要點檢查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全部歷史吧！

首先應當特別指出的是：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是由中共一部份領袖和幹部，根據他們領導和參加第二次革命所得到的親身經驗和失敗教訓，在托洛茨基的思想啓示下，組織起來的。在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只有美國托派運動可以比擬，因為後者也是一部份領導幹部（如加農）所組織的。正因為如此，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一開始就嚴肅地研究了第二次革命的全部經驗和失敗教訓，以及導致這次革命失敗的最高領導——共產國際強加於中共的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的政策。這種研究寫成爲中國左派反對派的綱領，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由陳獨秀、彭述之、尹寬、陳碧蘭和鄭超麟等八十一人簽名發表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

這個文件有系統地敘述了史大林強加於中共的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的政策，並追溯此種政策的根源——史大林在列寧逝世後篡奪了黨和國家及共產國際的領導權，以階級合作代替了階級鬥爭，以「一國建設社會主義」代替了國際革命

的方針，以官僚集中制代替了布爾什維克的民主集中制，因而破壞了列寧和托洛茨基創立起來的共產國際及其各國支部；最後，文件提出了最後的建議：「重新審查中國革命失敗的教訓，並決定新的政治路線，改組聯共和共產國際及各國支部的領導機關。」（因為當時托派還在黨內鬥爭，故提出改組蘇共、共產國際及其支部的領導。）

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所發表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在全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是最有系統地第一次總結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政治和中國第二次革命教訓的一個文件，同時也就成了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傳統」，對以後所發生的一切大事變，我們都是根據這個文件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去分析它們，進行宣傳和鼓動的。這裏僅舉幾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變來表達中國托派的「傳統」。

一、一九三七年爆發的中日戰爭，是決定中國民族命運的一個關鍵性的事變。中國托派所採取的立場是：在軍事上支持蔣介石領導的抗戰，而在政治上批評他的反動政策，並在組織內部和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和鄭超麟、王凡西所代表的極左教派主義，進行了極嚴重的鬥爭，中國托派這個立場不但和托洛茨基的一致，並且為往後事變的發展證明其正確性。

二、當一九四七至四九年，中共被迫對蔣介石進行反攻，企圖奪取政權時，中國托派由於過分堅持原則，對中共採取了教派的態度，因而在政治上採取了錯誤的立場。這是應該從這種錯誤中吸取教訓的。後來我們檢討這種錯誤，得出了教訓。（彭述之《對中國局勢的報告》）從錯誤中得出教訓，也是屬於「傳統」之一。

三、一九四九年，中共對蔣介石的國民黨的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中國全部歷史上劃時代的事變。我們

給了這個事變以極嚴肅的研究，分析它的勝利的各種原因，指出了它是一個畸形的革命，及其對往後發展所隱伏的危機，提出中國托派對它的態度和政策，最後指出新中國的前途多分是向東歐各國的道路走去，將成爲變態的工人國家(同上)。一九五四年我們又寫了《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前途》，更進一步指出：中國已踏上東歐國家的道路，成了「變態的工人國家」，因而提出了政治革命的主張。當一九六〇年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兩個領袖和其領導爭論中國問題時，我們參加了這次論戰，寫了《中共及其政權的性質》，對中共及其政權，作了詳細的分析，確定了「中共是一個史大林主義的黨」，它的政權是「官僚專政」，必須由群眾的「政治革命」來推翻它，並爲政治革命提供了一個大綱。由此，替中國托派對中國的戰略路線奠定了一個理論基礎。

四、一九五八年毛澤東所發動的人民公社運動曾震動了全世界，直接地影響了五億農民的生活，我們根據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對農業集體化所定下的原則，以及蘇聯在二十年代末和戰後東歐各國實施農業集體化的經驗，指出了毛澤東的人民公社運動是一種極端冒險主義的政策，勢必引起農業減產，增加農民的痛苦和引起全國人民的反感，後來的事實證實了此種預測。

五、毛澤東在一九六六至六八年所進行的文化大革命，我們在《洲際報》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訪問記，曾經指出：這個運動的主要目標在於摧毀劉少奇派，由於毛在人民公社運動中遭到了失敗，他的個人崇拜和個人獨裁受到了打擊，在黨內和人民中的威信大爲低落，不得不「退居第二線」，讓劉少奇當權。由於劉少奇對人民公社所造成的災禍，施行了一些改良措施，在黨內外提高了他的信譽，這就威脅到毛澤東的地位，所以他組織「紅衛兵」，利用黨外群眾來摧毀劉派，

以恢復他的個人崇拜和個人獨裁。事變的發展證明了我們的分析一般地是正確的。

七十年代初，毛派所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反右傾翻案風」、「天安門事件」、以及毛死後的「整肅四人幫」事件，對這一切事變，中國托派都給它們作了分析、批評和預測，經得起事變本身發展的考驗。

上面所列舉的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對中國發生的大事變所做的分析和判斷，都是根據托洛茨基主義的方法和理論，並經過事變本身的考驗，因而也就成了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傳統」。

此外，值得指出的：第四國際中國支部的代表，二十餘年來直接參加了國際的活動，在國際內部的三次嚴重爭論和對四個國家的革命運動都表示了中國托派的立場，如反巴布洛的親史大林主義傾向（《對巴布洛主義的批判》），反希利的極左教派主義（見《白恩斯（希利）領導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往何處去？》）以及關於拉丁美洲游擊戰的冒險主義政策的爭論（見《回到托洛茨基主義的道路上來》），所有這些爭論的結果都證明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立場是站在正確的一方面。

當古巴一九五九年爆發革命時，中國托派的代表即對這個革命做出了分析，預測了它的發展趨向（不斷革命的趨向），並提出了推動這個革命走向正常發展的戰略路線（見《關於古巴革命的決議草案》——為國際委員會起草的）。當一九六三年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運動進入高潮時，中國托派的代表，除了批判希利領導的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對這個運動採取的極左教派的錯誤立場外，並為這個運動提供了一個有系統的革命政綱（見《白恩斯領導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往何處去？》），此外，對一九七一年發生的智利革命和一九七四年

發生的葡萄牙革命，中國托派代表都對它們做了戰略性的建議（見彭述之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為智利革命致國際執委全會的信，以及一九七六年二月為葡萄牙革命致國際執委全會的信）。但不幸，上述四個國家的革命，尤其是後兩個國家的革命，不是從正面，而是從反面證驗了我們的分析和判斷的正確性。所以一九七四年二月列托派在義大利舉行會議時，以會議的名義寫了一封信給我們，說我們保持了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傳統。一九七六年三月法蘭克代表國際多數傾向（IMT）寫了一封信給我們，說他們完全同意我們對葡萄牙和安哥拉所提出的建議。這一切，難道是表示「中國托派的傳統很微弱」嗎？

關於組織的原則方面，中國左派反對派開始形成時，就在黨內堅持布爾什維克的民主集中制以反對當時在史大林指揮下的中共的官僚集中制。因而被開除了黨籍，組織黨外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一九四一至四二年，王凡西所領導的中共同盟內的少數派，一方面主張對抗戰採取失敗主義，同時要求無限制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我們拒絕了他們的要求，因此他們破壞了民主集中制的紀律而脫離了中共同盟，組織了他們自己的「黨」。但這個黨在五十年代初即自行瓦解了。這證明：破壞民主集中制而成立的政治組織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我們中國革命共產黨，雖經過了無數的嚴重打擊，但由於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還是把政治和組織的生命延續下來了，並留下了一個關於《組織原則與方法》的文件（一九四八年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這個文件，一方面總結了中國托派運動過去二十年的組織經驗，另一方面又為將來的托派運動提供一個最有價值的組織方案。

說到中國托派在敵人迫害下經得起考驗，我們只須舉出幾種事實就夠證明了。從一九三一到一九三四年之間，托派

幹部被捕監禁者在三十人以上，除了劉仁靜、謝少安和宋逢春等表示悔過投降外，其他絕大多數都表示了堅持信仰，抵抗迫害。在一九三二年陳獨秀和彭述之等十人被國民黨政府拘捕，控告他們違反民國緊急法時，他們得到了公開審判的機會（由於社會人士的呼籲），他們把反革命的審判廳轉變為革命的宣講台，當眾表示他們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指出了資本主義必然為共產主義所代替，並揭露了國民黨政府對國內外的一切反動政策，宣佈了中國托派對解決當時嚴重局勢的政綱（見《彭述之的辯訴狀》，刊登於一九七六年九月出版的《十月評論》）。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三年之間，在中國大陸的托派被毛政府拘捕監禁者二百餘人，沒有看到一個同志公開發表悔過投降的聲明。這一切表明：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在全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是最能抵抗迫害，最經得起考驗的。他們在敵人的威脅利誘、嚴刑恐嚇之下，能夠堅持信仰、不惜犧牲一切的英勇精神，這也是中國托派最可寶貴的傳統之一。

從上面概述的中國托派在理論、政治以及其幹部在被迫害時所表現的堅決抵抗精神——這些「傳統」不但絕不是「很微弱」，寧可說是最堅強的。蘇達說：「中國支部是第四國際的最弱的一環。」從人數上說確是如此，但從思想和傳統說，中國支部是第四國際最強有力者之一，正合乎《過渡綱領》所說的：「在人數上雖仍微弱，但在理論、政綱、傳統以及在其幹部的無比歷煉上是強有力的」。因為在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沒有一個國家的托派像中國托派經歷過那麼多的巨大事變和殘酷迫害，中國托派的創立者們曾經親身參加過第二次中國革命的領導工作，因而從革命的上升和失敗的過程中獲得了第一手的經驗和教訓。隨後，經過了蔣介石二十年的極端反動的統治，日帝國主義佔領大部份中國時的殘

暴壓迫，以及中共佔領大陸後對中國托派的毀滅性的鎮壓：這一切都在中國托派身上烙上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使他們深切而具體地理解了資產階級國民黨的統治，日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史大林主義的中共的官僚專政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最後，中國托派在過去二十八年中對中共官僚專政下所發生的一切重大事變，都進行過分析、批判並預測其演變趨勢，指出了人民大眾要從此種官僚專政下解脫出來，必須經過政治革命。所有這些因素配合起來便使得中國托派「……在理論、政綱、傳統以及其幹部的無比歷煉上是強有力的」。這便替中國托派的發展「前途」準備了有利的條件，有如我們在《對蘇達的批評的批評》中所指出過的：

「不管『階段論者領導革命達到勝利』，甚至『反不斷革命論的中共終於被迫走上不斷革命的道路』，但它的『勝利』從歷史上說是短暫的，它『走不斷革命的道路』，乃是以歪曲真正的不斷革命和犧牲廣大工農群眾的切身利益為代價的。這就註定了它的命運將由政治革命來清算。從這一基本觀點說，未來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事業，還是要由托洛茨基主義（即真正的馬列主義）去領導的」。

如果將蘇達對中國幾個重大事變的分析和判斷，和上述的中國托派「傳統」，加以對照，便更顯得蘇達所謂的「傳統」是怎麼一回事了。例如：從一九四七年秋起，中共在蔣介石的猛烈攻擊下，迫不得已動員農民軍進行反攻時，蘇達（當時以馬基的筆名）寫道：「從群眾動員的觀點說，現時的革命甚至比第二次革命還要正常，因為後者組織起來的群眾不過一千萬，前者甚至在解放軍跨過長江以前，便有一萬萬農民起來分配土地了」。我當時曾經指出：「在第二次革命中，工人階級的最大部份不僅組織在省港罷工委員會和上海總工會等工會組織之中……，並佔領了全國運動的領導地位，發動

了許多次的總罷工和大示威，而且舉行了好幾次勝利的暴動，如漢口和九江的工人群眾自動地佔領了英國租界，在上海，除了公共租界外，整個的中國城市都被工人佔領了。

「在現時的中共運動中，從它開始爭奪政權起，沒有任何城市發生過工人群眾的總罷工或暴動，甚至連小規模的罷工和示威也沒有。工人的絕大多數是消極的，不活動的，他們至多對這個運動表示希望而已。這是不可爭論的事實，怎麼能夠把現時的運動和中國第二次革命相比呢？國際的決議案明白地說：「毛澤東對蔣介石的勝利是農民暴動對完全腐朽的政權的勝利」。這就是說，中共這次的勝利不是工農群眾真正革命的政治勝利。這表明，維護國際決議的馬基（蘇達）同志走得太遠，太過美化中共所領導的運動了。此種對事變的美化不僅培養幻想，而且將引致錯誤的判斷。這兩者都是危險的，因為幻想往往導致幻滅或失望，而錯誤的判斷不可避免地要成為錯誤政策的根源（見《對中國局勢的報告》，前面所引的兩段話都是從英譯本轉譯過來的，望能按照中文原本加以改正）。

當一九四九年中共推翻蔣介石的政權，建立四個階級的聯合政府時，蘇達說：「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已經實現了」。我在本文前面已批評過蘇達不懂得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內容」和「歷史任務」，因而把「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主資產階級的聯合政府」看做「無產階級專政」，將保衛資產階級財產，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看成「無產階級專政」的政策，因而他「在無產階級革命這個中心問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已陷進極端混亂的修正主義的泥坑中去了！」

當一九五八年毛澤東發動極端冒險主義的人民公社運動時，蘇達（又以馬基的筆名）寫了一篇《論人民公社》的長

文，在該文中特別強調人民公社的「大」與「公」，並以「大生產優於小生產的經濟學的原則」去作為支持人民公社的主要論據。我爲了駁斥蘇達這種片面的論據，詳細地引證了恩格斯和列寧關於農業集體化所定下的基本原則——「農民自願參加」的原則，以對抗毛澤東的強迫農民參加公社的冒險政策，並引證了列寧在俄國共產黨第八次大會上《關於農業工作的報告》的話：

「我們首先所應依據的真理，就是這裏採用強迫方法其實是什麼也作不到的。這裏的經濟任務，是完全另一個方式擺著的……在這裏採取強力就等於葬送全部事業。這裏需要長期的教育工作。農民不僅在我國，而且在全世界上都是實際主義者，都是務實的人，我們應向他們作出具體的例子證明公社是最好的東西」。

我又引證了托洛茨基寫在《過渡綱領》中關於農業集體化的綱領：

「制定土地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的綱領時，應把沒收小農財產以及強迫他們集體化的可能性根本除掉。農民將仍舊是他的一塊土地的所有主，只要他還相信這是一件可能和必要的事。爲了在農民眼中恢復社會主義綱領的令譽，便必須毫不留情地暴露史大林派底集體化的辦法，這些辦法的施行，並不是爲著農民和工人的利益，而是爲著官僚的利益」。

最後，我問：「他（蘇達）爲什麼在這個有關工農聯盟的基本問題上，有關五億農民的實際生活的如此重大問題上，發生了如此的矛盾，乃至放棄其原則呢？事情很明顯，他是在『農業大生產的優越性的片面固執之下』，在『公社有很大的優越性』的炫惑之下，不自覺地忽視了或忘記了『強迫公社化』可能造成的危險和惡果，因而不懂得農民自願參加的原則在農業集體化過程中所起的決定作用」。（以上的引文都

見《對擁護人民公社意見的批評和我們的態度》)。

當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組織紅衛兵以攻擊劉少奇派，並經過林彪大肆宣揚「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時，蘇達寫了《簡評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在該文中，蘇達對文化大革命雖然作了一些有價值的分析和批判，但他對毛澤東的思想卻作了如下的一般評價：

「反映在毛澤東著作裏的毛澤東思想，本來包含有不少的真理和進步的東西……因此，所謂『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在一定限度內也確實有積極的意義，可以幫助人們樹立共產主義的人生觀和採取正確的工作方法（不消說還可學到一些革命的理論）」。（見一九六六年十月卅日出版的《嚮導》）。

把中共脫離工人階級單靠農民武裝奪取政權的運動譽之為比第二次革命還要正常，把中共一九四九年勝利後所建立的四個階級的聯合政府看做「無產階級專政」；完全忽視「農民自願參加的原則」，而單以「大生產的優越性」去擁護冒險主義的人民公社政策；把史大林主義的毛澤東思想說成爲「可以幫助人們樹立共產主義的人生觀和採取正確的工作方法」——上面這些對重大事變的看法和他藐視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原則（如主張解散 RCP 以遷就二十五年前破壞民主集中制分裂出去的兩個人，和他們建立新的領導機關），以及他個人經不起考驗（如一經被捕即供出了我們護照上的姓名）等結合起來，或者這就是蘇達自己的「傳統」吧。但這種「傳統」不但和中國革命共產黨所代表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傳統」毫無共同之點，而且是完全相反的，這正是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和蘇達之間的根本分歧的所在。對蘇達說，如果他「今後想打開前途（托洛茨基主義的前途），必須從頭做起」！

### 結束語

從前面《又一次對蘇達的批評的批評》所揭露出來的蘇達的思想傾向，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在實質上是親毛的。因而他對中國革命共產黨所代表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儘量加以醜詆和中傷，說它的「思想基礎」「脆弱」，「傳統很微弱」，組織「早已名存實亡了」，領導「極不勝任，得不到同志的信任」，「老幹部……的身體和精神都已衰老，能力上卻幼稚非常」……總而言之，中國革命共產黨，在蘇達看來，除了錯誤百出和幼稚無能外，再沒有什麼值得保存的了，這對黨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失敗主義，一種拆臺主義。所以凡是和他接近，受他影向的人都是反黨或脫離黨的，他的親密的同志陳與游都脫離了黨，跑到「擁毛反右」的革馬盟去了，就是顯例。

因此，我們不得不向蘇達作最後的忠告：如果他自認為是一個托洛茨基主義者，是忠實地為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服務，而不是蓄意拆散它的話，那他就必須進行一次最嚴肅的自我檢討，首先解答我們對他的批評，以此澄清他的親毛思想，我們將拭目以待。

# 論「墮落的」和「變態的」工人國家與 政治革命

## ——評葉寧的修正主義傾向

(一九七八年六月廿一日)

關於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及其政權的性質，中國革命共產黨和第四國際早已確定了：中國是一個變態的工人國家，其政權是官僚專政。因此，我們的戰略路線是：在保存國有財產的前提下，以群眾的政治革命推翻官僚專政，建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這種戰略路線已為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所公認，並已在世界範圍內進行宣傳了。

中國革命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一九七七年十月五日通過的《對「中國托派運動統一的基礎」的意見》有如下的一段話：

「我們認為，當我們論述中國政權性質的時候，應當明白指出，它與工農間的不可調和的關係，即明白指出，它是官僚專政，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這不是『工人政權統治的形式』問題，而是『官僚層統治的本質』問題。不是工人在統治著國家，而是官僚在統治著工人（以及全國人民）。」（見『聯合內部討論』第一期第五頁）

上面一段話，正是中革共關於中國政治革命的理論基礎的簡要而通俗的論述，一般地是正確的。但葉寧同志，在他的《托洛茨基關於工人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一些論述》中，引述了上面一段話，並替它作出三點（A、B、C）結論後，給了如下的批評：

「這些結論，其中含有極之錯誤和混亂的見解。事實上，它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學說和國家學說相違。在下面，爲了便於說明問題，我們引了很多托洛茨基的見解。

「每當馬克思主義者說及『國家性質』和『政權性質』時，意思就是它們的階級性質或階級基礎，它們的實質意思完全是一樣的。決定這個性質的是財產關係。財產關係決定了階級關係和上層建築。所以，在托洛茨基的文章裏頭，常常將蘇聯工人國家的性質和政權的性質（有時甚至是『社會』性質）……當作同一個意思來應用。」（同上引文第九頁）

說「財產關係決定了階級關係和上層建築」，一般地是對的，因爲這是馬克思主義的 ABC，但斷定「托洛茨基的文章裏頭，常常將蘇聯工人國家的性質和政權的性質……當作同一個意思來應用」，這只能限於他在一九三六年以前寫的「文章裏頭」。但從一九三六年起寫的文章中，關於蘇聯國家性質和政權性質不但沒有「當作同一個意思來應用」，而且是相反的，即他認定：蘇聯國家的性質是工人的，即墮落的工人國家。但它的政權的性質不但不是工人的，而且是反對工人的官僚專政了。正因此，托洛茨基才提出了打倒「官僚專政」的「政治革命」的主張。如果像葉寧所斷定的，托洛茨基把蘇聯國家的性質和政權的性質視爲同一，同是工人的，那怎能解釋托洛茨基提出「政治革命」來打倒「官僚專政」呢？葉寧對於這個中心問題，第四國際關於蘇聯的綱領問題，沒有任何解釋，便匆忙地、片面地、不加思考地去引用托洛茨基的話來辯護自己的虛偽見解。例如：

「社會解剖學是由它的經濟關係來決定。若十月革命所建立的財產形式不曾被推翻，則無產階級仍然是統治階級。」假如人們抓住這句話當作「教條」，機械地去觀察蘇聯，把蘇聯看作一成不變的東西，那他一定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十

月革命所建立財產形式未曾被推翻」之前，絕不能提出「政治革命」的口號，因為你不能用「政治革命」去推翻「仍然是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這樣一來，托洛茨基所主張的「政治革命」不但不正確，而且是「反革命」的了（史大林派正是這樣罵托洛茨基）。因為用「政治革命」來推翻仍然是「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絕不能說是「革命的」。

更糟的是：如果堅持「若十月革命所建立的財產形式不會被推翻，無產階級仍然是統治階級」這個公式，那末，即在今天，也不能在蘇聯提出「政治革命」。因為十月革命所建立的財產形式不會被推翻，無產階級仍然是「統治階級」。至於東歐各國、中國和北韓等，當然也談不到「政治革命」了。因為所有這些國家的「國有財產形式」（和十月革命所建立的，在實質上是一樣的）還繼續保存，因而「無產階級仍然是統治階級」！大家看：依照葉寧所引用的托洛茨基一句話的邏輯發展，便從根取消了第四國際黨對於史大林主義官僚統治的所有國家的政治革命的政綱了！

說到這裏，便發生了一個問題：為什麼葉寧引用「托洛茨基關於工人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一些論述」，一開始就和托洛茨基給蘇聯所制訂的政治革命的綱領發生如此不可調和的矛盾呢？

這個矛盾的根本原因，乃是由於葉寧完全不懂托洛茨基研究蘇聯問題所用的方法。如托洛茨基自己所說的：「我們的傾向從來沒有說過永無錯誤。我們不接受現成的真理作為啓示錄，像史大林主義的高層們所幹的。我們研究，我們討論，我們在存在的光照之下，檢驗我們的結論。我們公開地改正已認識的錯誤，而且一向前進。科學的良心和個人的嚴謹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最好的傳統。在這方面，我們是忠實於我們的導師們的。」（托洛茨基文集一九三四——三五，第一

八四頁) 換言之, 托洛茨基研究蘇聯問題, 不是根據某種先驗的公式, 或某種「現成的真理作為啓示錄」, 而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 謹慎地、密切地跟隨著蘇聯本身事變的發展而發展的。因此, 他對蘇聯共黨、共產國際和蘇聯政權的性質所作的判斷, 前後不同。因而對於改造它們所提出的主張, 也就前後相反。他開始時, 把聯共、共產國際和蘇聯政權都看做可以改良的物件, 但經過事變發展的經驗和教訓之後, 即看到了聯共、共產國際和蘇聯政權不斷地墮落後, 他便放棄了改良的嘗試, 而採取了革命的立場。

### 從改良到革命

從一九二三年秋起, 托洛茨基在聯共黨內成立了左派反對派——布爾什維克列寧派, 直到一九二九年初, 都是企圖通過黨內的民主討論, 爭取多數, 改良以史大林為首的官僚領導(托稱之為「官僚中派主義者」), 恢復布爾什維克的黨內民主制度, 從而恢復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的對內對外的革命政策。(請參考托的《新路向》和《聯共反對派政綱》)

在一九二九年初, 托洛茨基被史大林官僚流放到土耳其後, 他即以全力組織國際左派反對派, 試圖改良共產國際及其各國支部(包括聯共)。這從他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發表的《國際左派反對派, 它的任務和方法》可以清楚地看得出來。(托文集英文版一九三二——三三, 第四九——六二頁)

但到一九三三年春天, 德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控制下, 在一個最有希望的革命中, 不經一戰, 即讓希特勒輕易地踏上了政權, 粉碎了工人階級的一切組織(包括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托洛茨基根據這個歷史大悲劇判定: 共產國際, 作為世界革命的領導機關來說, 已經死亡了, 再也不能改良了。於是他決定建立第四國際, 以代替第三國際擔負領導世界革

命的歷史使命。(見一九三三年七月後，托寫的關於建立新國際的一系列的文件，如：《和史大林、曼陸伊次基和洛佐夫斯基留在同一國際內，這是不可能的》、《布爾什維克代表團在左派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代表會議上的聲明》、以及《四個組織的聲明——論新國際的必要和原則》。以上各文件均載於托文集英文版一九三三——三四)

托洛茨基根據一九三三年德國革命慘敗的教訓，放棄了改良聯共和共產國際的企圖，但對於蘇聯國家還是抱著改良的希望。這清楚地表示於《和史大林、曼陸伊次基和洛佐夫斯基留在同一國際內是不可能的》一文中：

「十月革命，以布爾什維克為其領袖，創立了工人國家。現在，布爾什維克黨不復存在了。但是，十月革命的基本社會內容還活著。官僚專政，不管在它（違反它自己）所達到的技術成就，大大地便利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但幸運的是，還沒有達到這個復辟點。由於內部的，首先是國際的有利條件，工人國家的建築物，不須要新的革命，可以在蘇聯的社會基礎上恢復起來。

「整個問題是實際的力量問題。我們曾經看到史大林主義官僚如何在國民黨面前，在英國工會面前爬行。現在我們看見它如何在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者面前爬行。真能反對帝國主義，因而保衛蘇聯的強大的革命諸黨，將迫使史大林主義的官僚計算到它們。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組織將在蘇維埃的工人眼中得到巨大的權威，因而將最後為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復生創造有利的條件。這便是不要新的無產階級革命，可以改良蘇維埃國家的唯一道路。」

「這樣，我們放棄改良蘇聯共產黨的口號，我們建立起新黨：作為改良蘇聯的工具。」(以上引文，均見托洛茨基文集，英文版一九三三——三四，第二〇、二一頁，重點是我

加上的)。

但「放棄改良聯共」，「建立新黨作為改良蘇聯的工具」，這便發生了兩個重大而矛盾的問題：①「共產國際的崩潰不是同時意味著從十月革命中出現的那個國家的崩潰」嗎？因為指導共產國際和蘇聯國家的都是同一的「史大林主義機關」。②「史大林主義機關」是否能「代表無產階級專政」，還是「史大林主義官僚對無產階級專政」？為了解答這兩個十分複雜而矛盾的問題，托洛茨基第一次寫了《蘇聯國家的性質》（一九三三年十月）。

關於「共產國際的崩潰」是否「同時意味著從十月革命出現的那個國家的崩潰」，托洛茨基作了詳細的解釋。其要點是：

「共產國際代表著趨向於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工具。蘇維埃政府則代表著保存已經完成的革命勝利品的一種工具。西方共產黨沒有遺傳的資本。它們的力量在於它們本身，而且僅在它們本身之內。史大林主義的機關的十分之九的力量不在它本身，而在於由勝利的革命所產生的社會變革……它顯示給我們怎樣並為什麼史大林主義的機關能夠浪費它的作為國際革命因素的意義，但以看守無產階級勝利品的資格保存了它的部份的進步意義。這種雙重性的地位——我們附加一句——在它本身乃是代表著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的表現之一。

「假如無產階級專政不成為歐洲和世界規模的，它就必然引導到自己的崩潰，這在廣大的歷史遠景上是完全不可爭辯的。但一切事物都是圍繞著具體的歷史時期轉動的。人們是否可以說史大林主義官僚的政策已把工人國家引到了破滅呢？這便是現在的問題。」

「關於政權從一個階級之手轉到另一個階級之手的劇變

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只能適用於革命時期，即當歷史大躍進的時候。但也適用於反革命時期，即社會開倒車的時期。誰說蘇維埃政府已經逐漸地從無產階級的改變為資產階級的了，那他只是把改良主義的影片倒轉過來演放而已。」（前面的引文均見托洛茨基文集，英文版，一九三三——三四，第一〇二、一〇三頁）。

根據托洛茨基前面的說法，總結起來就是：不經過一次反革命，蘇維埃政府仍然是無產階級的。但當時的蘇維埃政府顯然是在史大林主義官僚的控制下。那麼史大林主義官僚的統治是否可以代表無產階級專政，還是「史大林主義官僚對無產階級專政」？托洛茨基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是：

「人們從何處和在什麼書上找到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無疵的公式呢？一個階級的專政並不意味著它的全體群眾長期參與國家的管理。這首先在資產階級的情況中看到。貴族通過專制君主來統治，但它卻跪在君主跟前。資產階級的專政，只有在資本主義上升和統治階級無所畏懼的條件之下，才能採用比較發展的民主形式。在我們跟前，德國的民主已被希特勒的獨裁所取代。所有傳統的資產階級黨派都被打成碎片了。今天，德國的資產階級不是直接的統治。在政治上，它已完全屈服於希特勒及其黨徒。然而，資產階級專政在德國並沒有被侵害。因為它的社會支配權的一切條件仍被保存，並且加強了。希特勒在政治上剝奪了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卻拯救了它，即令是暫時的。資產階級被迫求助於法西斯政權，這事實證明它的支配權受到了威脅，但並非垮臺。

「我們的論敵看到我們的論據時，將會匆忙地反駁說：雖然，作為一小撮的剝削者的資產階級，可以利用法西斯專政來保存它的統治。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無產階級，卻必須自己管理它的政府，直接引導更廣大的人民群眾來參加國家

的工作。這個論據，就它的一般形式說，是不可反駁的。但在特定的情況下，它不過意味著現時的蘇維埃專政是一種病態的專政而已。在一個孤立的和落後的國家，再加上領導的虛偽政策——最後分析起來，這也是反映著落後和孤立的壓力——建設社會主義的可怕困難已引到一個結果，即官僚在政治上剝奪了無產階級，以使用它自己的方法保護社會的勝利品。社會的解剖學是由它的經濟關係決定的。只要十月革命的財產形式未被推翻，無產階級仍然是統治階級。」（同上，一〇三——一〇四頁，重點是我加的）

托洛茨基既認定「蘇維埃專政是一種病態的專政」，雖然「官僚在政治上剝奪了無產階級」，但它還在「用它自己的方法去保護社會的勝利品」。因此，他主張不拋棄這個「病態的專政」，而要「醫治」它，改良它。其方法是：「對史大林主義的官僚給以無情的批判，為新的國際訓練幹部，恢復世界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戰鬥能力——這就是『醫治』的本質。它和歷史進步的基本方向相符合的。」（同上，第一〇五頁）

「進一步成功的條件是正確地估計世界局勢，包括蘇聯的階級性質。沿著這條路線，新國際將從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去經受考驗。在它能夠改良蘇維埃國家之前，它一定要把保護蘇聯的責任放在自己身上。」（同上，一二一頁，重點是我加上的）

葉寧也從托洛茨基的《蘇維埃國家的階級性質》中引述了不少文句，並把他「醫治病態的工人國家」的一段話引來，作為自己的「托洛茨基關於工人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一些引述」的結論，以此教訓「中委會的一位同志」（見『聯合內部討論』十二頁）。但他完全沒有指出，或不懂得托洛茨基當時對蘇聯的立場是「改良」史大林主義官僚所控制的「蘇維埃政府」，即「醫治一種病態的專政」。這和他後來主張用「政

治革命打倒史大林主義的官僚專政」是完全不同的——這就是葉寧的錯誤的根源。

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三年十月發表《蘇聯的階級性質》後，史大林主義官僚層，在希特勒勢力日益生長的威脅下，它的對外對內政策作了一次尖銳的轉變，即從「第三時期」的極左冒險主義政策轉到了它以前的極右機會主義政策。同時，史大林利用基洛夫的暗殺事件，在黨內外進行了新的大規模清算。這些事實結合起來，便標誌著史大林主義官僚統治的墮落已到了一個更為深刻的階段。因此，托洛茨基於一九三五年二月寫了《工人國家、特爾米多與拿破崙主義》（托文集英文版，一九三四——三五），給這種更深刻的墮落作了進一步的分析和衡量。這篇文章，除了指出克里姆林宮的對外對內政策向極右轉變和恐怖主義的清算外，便是重新檢討特爾米多和拿破崙主義的歷史類比，精確地分析了它們的歷史意義和在蘇聯新環境所扮演的角色。並指出了特爾米多早在一九二四年已經開始，以後逐步地完成了它的反動任務，即特爾米多派逐步地排除了「左派反對派」於黨和政權之外，成為史大林主義官僚層的骨幹，最後發展成為以史大林為中心的拿破崙主義專政。

關於此種拿破崙主義專政形成的過程，托洛茨基在《無產階級專政與官僚專政》的標題下，作了如下的簡要論述：

「官僚自身內部的矛盾引導到一種制度，即：主要的指揮部都是一手提拔起來的。爲了在選擇的品級需要紀律，又引到了單獨的個人統治和永無錯誤的個人崇拜。這同樣的制度通行於工廠、國家農場、大學和政府之中：一個領袖站在他的可靠的隊伍之上，其餘的則跟隨他。史大林，由於他的性格，從來不是，也不能是群眾的領袖，他是官僚『領袖們』的領袖、他們的主體、他們的化身。」（同上引文，一七一頁）

至於史大林如何達到他個人的統治，托洛茨基也作了如下的概述：

「史大林今天的統治與革命頭幾年蘇維埃的統治毫無共同之點。以一個政權代替另一個，並非一蹴而成，而是經過一連串的步驟，由官僚層向無產階級先鋒發動一系列的小型內戰。從最後的歷史分析看來，蘇維埃民主是被社會矛盾的壓力所摧毀了。官僚層利用後者，把政權從群眾組織手裏奪過去了。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是官僚專政，甚至是史大林的個人專政。可是，這種篡奪之所以成爲可能，並能夠維持自己，僅因爲官僚專政的社會內容，是由無產階級革命創造的那種生產關係所決定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完全斷定，無產階級專政，在官僚專政之中，找到了自己被歪曲了的，但是無疑的表現。」（同上，一六二——一六三頁，重點原有）

上面這段話，正是葉寧引用的。它的內容已很明顯，和「中委會」所說的「是官僚專政，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意見，是符合的。但葉寧卻說：「中常會的『意見』恰恰將托洛茨基的觀點倒轉過來，它說『這不是工人政權的統治方式問題，而是官僚層本質問題』。」（「聯合內部討論」十二頁）他這種指責，人們很難瞭解。或者是因爲中委會說到官僚專政時，沒有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在官僚專政中，找到了自己被歪曲了的，但是無疑的表現」吧。但事實上，托洛茨基自己不久以後，也將「無產階級專政在官僚專政中找到自己被歪曲了的，但是無疑的表現」這類說法拋棄了。

當托洛茨基一九三五年二月寫《工人國家、特爾米多與拿破崙主義》時，他雖然精確地指出了史大林主義官僚專政的反動性，但他還沒有放棄改良官僚專政的立場。所以只好說，「無產階級專政在官僚專政中，找到了自己被歪曲了的，

但是無疑的表現」。因此，托洛茨基在這篇文章末尾作的十四點總結中，沒有一句話提到如何對付史大林的官僚專政，只是說些一般的鬥爭。例如十四點說：「拯救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的鬥爭，和第四國際的鬥爭是一致的。」（同上，一八三頁）不過在這同一篇文章的附錄中，托洛茨基說：「我們討論，我們研究，我們在實際生活的光照下校正我們的結論，我們公開改正已認識的錯誤。」（同上，一八四頁）這是托洛茨基準備對蘇聯的改造拋棄改良立場，而轉向革命路線的一種預示。

事實上，自一九三五年起，特別在一九三六年初，托洛茨基對蘇聯問題進行了全盤的、有系統的和精密的研究。這種研究的成果便是《被背叛了的革命》。在這部著作的結尾提出了「新的革命之不可免」說：

「官僚將侵吞了工人國家呢？還是工人階級將把官僚肅清出去呢？這就是目前待決的問題，蘇聯之命運依賴於此問題之解決」（《被背叛了的革命》中譯本二四八頁），「一切徵兆都指示未來發展必然不可避免的要走到民眾中文化上發展的勢力和官僚寡頭政治間的決裂。這個危機是沒有和平出路的。沒有一個魔鬼自願地斬斷它的爪子。蘇維埃官僚不經過鬥爭也不肯放棄他們的地位的。事態發展顯然引上了革命的道路。」「無論如何，官僚政治只能用革命勢力來推翻它。」「官僚專制政治，必須讓位於蘇維埃民主政治。」（同上，二四九——二五一頁）。

### 政治革命的綱領

托洛茨基根據《被背叛了的革命》所研究的基本內容，於一九三六年七月寫了十八條提綱，名為《第四國際與蘇聯》（托洛茨基文集，英文版，一九三五——三六年，第三七

——三九頁，而中譯本載於《論蘇聯國家性質》導言，九——十七頁)。這個文件是托洛茨基關於蘇聯政治革命第一次所提出的綱領。從①到⑨條提綱，是論述政治革命的理論基礎。(讀者可參考《論蘇聯國家的性質》導言，九——十二頁)我這裏只引出和葉寧批評「中委會的意見」有關的，以及政治革命的中心思想的三條提綱。

(10)「在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官僚把蘇維埃中所有的進步東西都給破壞了。它不是『社會主義財產』的守護者，而是它的掘墓者」。這就根本取消了「官僚以自己的方法去保護社會的勝利品」(社會主義財產)，即改良官僚政權的論據，而為政治革命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基礎。

(13)「憲法順帶地在法律上取消了無產階級在國家的統治地位，即一種在事實上早已被取消了的地位。……新憲法正式確定了蘇維埃社會的特權層對生產群眾的專政。」「憲法順帶地在法律上取消了無產階級在國家的統治地位」，這不是「無產階級仍然是統治階級」的反面嗎？「蘇維埃社會的特權層對生產群眾的專政」，這不是「官僚在統治著工人」的同義語，或「官僚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另一種說法嗎？讓葉寧去想想吧！

(15)「蘇聯的工人階級已被剝奪了合法改良國家的最後可能性。反對官僚的鬥爭，必然變成革命的鬥爭。……為了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政治革命已成為不可避免的，即必須以暴力推翻墮落官僚的統治，而保存十月革命所建立的財產關係。」(前面引文均見托洛茨基文集，英文版一九三五——三六年，第三八、三九頁)。

「蘇聯的工人階級已被剝奪了合法改良國家的最後可能性」，這是托洛茨基公開承認：他以前主張改良蘇維埃政權的意見，已經被客觀事變的發展證明為不適用了。所以他提出

政治革命的主張。這裏要提出的問題只是：「以暴力推翻墮落官僚的統治（蘇聯政權），而保存十月革命所建立的財產關係（蘇聯工人國家的經濟基礎）」，這難道也是托洛茨基「將蘇聯工人國家的性質和政權的性質當作同一意思來應用」的表現嗎？讓葉寧去答覆這個不很愉快的矛盾問題吧！

在一九三八年九月第四國際創立大會上通過托洛茨基所制訂的《過渡綱領》中，關於《蘇聯過渡時期諸問題》的綱領的主要內容是：

「蘇聯以一個工人國家的資格從十月革命中出現。生產手段的國有，乃是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個必須的先決條件，它已開展了生產力迅速發展的可能性。但同時這個工人國家的機關卻已經歷了徹頭徹尾的墮落：它已由一種工人階級的武器，變成一種反對工人階級的官僚暴力的武器，而且愈來愈成爲一種對國家經濟怠工的武器了。」（重點是加上去的）

「蘇聯就這樣地包含著可怕的矛盾。但它仍舊是一個墮落了的工人國家。這是一種社會性的診斷。至於政治性的推斷，則有兩者擇其一的性質：或者是官僚制度愈來愈成爲世界資產階級在工人國家的一個機關，它將推翻財產制的新形式，且把國家推回到資本主義；或者工人階級將摧毀官僚制度，開啓到社會主義之路。」

「只有被壓迫群眾的勝利革命暴動，才能恢復蘇維埃政制並保障它向社會主義作更進一步的發展。現在只有一個黨能夠領導蘇維埃群眾暴動，這個黨就是第四國際黨。」（重點是加上去的）

上面所摘引的第四國際關於蘇聯政治革命的綱領，其明確性是無須解釋的，且爲每個托洛茨基主義者所熟悉、所遵守和奉行的。但當葉寧論述托洛茨基「關於蘇聯工人國家和政權的性質」以反對「中委會的意見」時，竟完全不提這個

綱領，好像它是不存在似的。試問，葉寧這樣作，爲了什麼？答案只能是：他在修正托洛茨基主義。

### 葉寧的修正主義傾向

從前面論述托洛茨基關於蘇聯問題的思想發展，可以分爲三個時期：一九二三至一九三三年，是他主張改良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時期；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年，是他試圖改良蘇維埃政府的時期；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年，是他提出政治革命以推翻官僚專政的時期，《過渡綱領》中關於《蘇聯過渡時期諸問題》的綱領，就是這一時期的總結。凡是認真閱讀過托洛茨基關於蘇聯問題著作的人們，都會看出他對改造蘇聯的思想經過了這三個時期的演變。從葉寧的《托洛茨基關於工人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一些論述》中所引證的文章看來，他是閱讀過托洛茨基論述蘇聯問題的一些重要著作的。但他完全沒有指出或提到托洛茨基在他那三個時期中關於蘇聯問題的思想發展。這就是他的「論述」造成極端錯誤和混亂的根本原因，同時也是他根本不懂得中委會的「意見」，而走到了修正主義傾向的危險道路。

中委會的「意見」說：「當我們論述中共政權性質的時候，應該明白指出它與工農間的不可調和的對立關係，應該明白指出它是官僚專政，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工人統治著國家，而是官僚在統治著工人……。」中委會這種「意見」，不但和《第四國際與蘇聯》所提出的「意見」相符合，如前面所引證過的，而且和《過渡綱領》的「意見」，在實質上也是一致的，僅僅說話的方式不同而已。《過渡綱領》說：「工人國家機關已經歷了徹頭徹尾的墮落：它已由一種工人階級的武器，變成爲一種反對工人階級的官僚暴力的武器。」所謂「工人國家的機關」，不是等於說「工人國家的政權」嗎？

「它已由一種工人階級的武器，變成爲一種反對工人階級的官僚暴力的武器」，不是等於說：「工人國家的政權」，已由「無產階級專政」墮落成爲「官僚對無產階級的專政」了嗎？

不管「中委會的意見」如何同「過渡綱領的意見」一致，葉寧卻另有高見，不如說，另有用心，認爲前者「含有極之錯誤和混亂的見解」。因爲托洛茨基說過，「社會的解剖學由它的經濟關係決定，若十月革命所建立的財產形式不會被推翻，無產階級仍然是統治階級」，這就等於說，「無產階級仍然」在「統治」國家，而不是「官僚在統治工人」。這樣一來，「中委會的意見」不但極之「錯誤和混亂」，而且根本反對托洛茨基的意見了。

但不幸的是（對葉寧說），托洛茨基的「社會的解剖學由它的經濟關係決定，若十月革命所建立的財產形式不會被推翻，無產階級仍然是統治階級」——這幾句話，是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寫的，即寫在《蘇維埃國家的性質》之中。那時正是他第一次提出「改良蘇維埃國家」的主張。因爲當時「左派反對派」中有些人，如德國「列寧團」的領袖烏魯班斯強調，在史大林控制下的政權，已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拿破崙主義的政權（托洛茨基文集，英文版，一九三三——三四年，一〇七、一〇八頁）。所以托洛茨基也強調，「只要十月革命所建立的財產形式未被推翻，無產階級仍然是統治階級」（同上，一〇四頁）。但後來事變的發展證明，無產階級在史大林主義官僚日益加緊的統治下，已失去了它在國家的「統治地位」。所以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寫的《第四國際與蘇聯》中，托洛茨基公開說，「憲法順帶地在法律上取消了無產階級在國家的統治地位，即一種在事實上早已取消了的地位」（著重點是現在加上去的）。這正是托洛茨基曾經表示過的，「我們改正已認識的錯誤」。因爲只有這樣的「改正」，他才有理論

的根據，提出政治革命以推翻官僚專政的主張。

葉寧利用托洛茨基主張改良蘇維埃政權的論據，來攻擊中委會主張政治革命的論據，就等於利用托洛茨基在前期提出改良蘇維埃政權的主張，以修正他後期提出政治革命推翻官僚專政的綱領了。葉寧這種修正主義的傾向，從他引用托洛茨基的一段話中也清楚地反映出來。那段話說：「無產階級是蘇維埃國家的支柱。但當管理的職權集中在不負責任的官僚手裏，擺在我們目前的便明顯地是一個病態的國家。可以醫治它嗎？……我們所理解的醫治，不是脫離世界革命的任何種類的人工辦法，而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之下繼續鬥爭。對史大林主義官僚作無情的批判，為新的國際培養幹部，提高世界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鬥爭能力——這就是『醫治』的本質，它是符合歷史進步的基本方向的。」所謂「醫治病態的國家」，就是「改良」史大林主義官僚統治的政權。這是托洛茨基一九三三年十月所提出改良蘇維埃政權的綱領。葉寧把前面一段改良蘇維埃政權的話，當做他的《托洛茨基關於工人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一些論述》的總結。這就表示他是擁護托洛茨基前期的改良意見而反對他後期的政治革命的。這從葉寧的《托洛茨基關於工人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一些論述》的全文中，沒有一句提到蘇聯或中國的政治革命問題，就更露骨地表現了他以「改良」反對「革命」的修正主義傾向。

或者有人會說，葉寧並沒有公開反對蘇聯和中國的政治革命，只是批評「中委會」關於「中共政權的性質」的「意見」而已。然而，正是在「批評中委會的意見」中，葉寧否定了「中共政權是官僚專政」，或「官僚在統治著工人」，而是無產階級專政，因為「無產階級仍然是統治階級」。這就從「理論上」根本否認了蘇聯和中國的政治革命，有如我在前

面分析過的。假如葉寧不是反對蘇聯和中國的政治革命，那他就必須作一次公開的自我檢討，放棄反對政治革命的理論。因為他不能在「理論上」反對中、蘇的政治革命，而在口頭上擁護它。這樣，不但自相矛盾，而且變成「兩面派」了。

最後，須特別指出的是：自一九三八年第四國際創立大會上通過蘇聯政治革命的綱領後，已近四十年了。在這個漫長的時期內，蘇聯官僚專政的專橫、醜惡和兇殘，已暴露於全世界之前。

而且，反官僚獨裁的群眾暴動，亦已在蘇聯和東歐國家出現了好幾次。尤其是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群眾反對史大林主義官僚的革命，更明顯地表現了政治革命的預演。即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的官僚專政來說，其專橫和殘暴並不下於蘇聯。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十餘萬人的大示威（包括焚毀警車和軍房），也第一次預示了政治革命之不可免；對蘇聯和中國所發生的這些巨大的歷史事變，為什麼葉寧視若無睹，反而說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仍然是統治階級」呢？！要解答這個問題，必須檢討葉寧觀察事變和分析問題的方法，以及他近年來對黨、對工作所採取的態度。但因為篇幅有限，我這裏僅指出兩點：

（一）他根本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尤其不懂托洛茨基研究蘇聯問題的具體方法。這從我們前面對他的意見的揭露中明顯地透露了出來。

（二）葉寧批評「中委會」關於「中共政權性質的意見」不是幫助黨加強立場，澄清混亂。而是蓄意反對「中委會的意見」，目的在使中委會「名譽掃地」。這從他批評中委會的態度和言辭中所包含的敵意透露了出來。托洛茨基說：「科學的良心和個人的嚴謹，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最好的傳統。」

假如葉寧懂得這個箴言的意義，他就不會寫出肆意攻擊中委會意見的那種東西了。

### 從墮落的工人國家到

#### 「變態的工人國家」與各式修正主義傾向

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十月革命，在摧毀資產階級政權之後，即以民主選出的工農蘇維埃為基礎，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跟著，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為國有，又建立了社會主義的財產關係。所以，在蘇維埃統治的頭幾年，工人國家的性質和政權的性質是一致的。但因為蘇聯的落後和孤立，以史大林為首的官僚層，逐步地排除了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派——「左派反對派」，篡奪了國家政權，把無產階級的專政轉變為官僚專政。但為了官僚特權的物質利益，仍保持國有財產。這就在工人國家的經濟基礎和上層的政治結構之間形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托洛茨基稱這種矛盾的國家為「墮落的工人國家」。意即「財產」仍為「國有」，但「政權」已被「官僚篡奪去了」。在這種情形下，「工人國家的性質和政權的性質」，不但不一致，而且是相反的，因此，托洛茨基主張以政治革命推翻官僚專政，但保存國有財產。正因為這種矛盾的、即辯證的主張，在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內部發生了兩種主要的修正主義傾向。

第一種修正主義傾向，是極左的教派主義。在三十年代初，以烏魯班斯為代表，已如前面所指出的，他認為史大林主義官僚的統治，已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拿破崙主義的獨裁。並且社會主義的財產已為「國家資本主義」所代替了。和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相類似的，是夏克曼所代表的「官僚集產主義」。他認為史大林主義的官僚政權，不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而是代表「官僚集產主義」的利益。在中國，意因是烏魯班斯的擁護者（見意因著：《國家資本主義論》），

王凡西則是夏克曼的應聲者（見王凡西著：《蘇聯研究》）。

第二種修正主義傾向，是以巴布洛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或親史大林主義。他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勢力的擴張，尤其是史大林在東歐各國所進行的改革（如土地改革和剝奪資產階級的財產），他認定蘇聯官僚可以自我改良，在帝國主義威脅之下，蘇聯官僚可能對外採取革命路線。西歐的群眾共產黨（如法共、意共），「在群眾的壓力之下」，會領導群眾革命奪取政權。但後來的事實證明，蘇聯官僚不但沒有「自我改良」，反而變得更為殘暴（如對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的血腥鎮壓）。至於西歐的群眾共產黨，不但沒有「在群眾壓力之下」採取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而公開宣佈放棄「無產階級專政」，而與社會民主黨的改良主義同流合污了。因此，巴布洛的修正主義自行消滅，沒有像烏魯班斯的「國家資本主義」，在英、美、法還有它的支持者（如英國和美國的「國際社會主義黨」及法國「工人戰鬥派」）。

變態的工人國家，最初出現於東歐諸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紅軍佔領了東歐後，史大林企圖和西方帝國主義謀取妥協，因而與東歐各國的資產階級成立聯合政府，保護資本主義的財產。但自美帝國主義以「馬歇爾計劃」穩定西歐國家，排除法意共產黨的代表於政權之外，史大林感到與西方帝國主義妥協的失望，便把東歐各國的資產階級代表踢出聯合政府，建立了史大林主義的官僚專政，並沒收了資產階級的財產為國有，使東歐各國同化於蘇聯。這樣，便形成了「變態的工人國家」。這就表明，東歐的「變態的工人國家」開始成立時，即包含了「工人國家的性質和政權的性質」之不可調和的矛盾，因而埋伏了政治革命的爆炸物。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取得勝利後，它完全仿效史大林在東歐的做法，起初，和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黨派成立聯合政

府，保護資本主義的財產，甚至延緩土地改革，為的是在幾十年內實行「新民主主義」。但當一九五〇年，美帝國主義假借援助南韓之名，發動了大規模的侵略戰爭時，中共在此種嚴重威脅下，不得不放棄那種反動透頂的新民主主義，而採取革命的防禦措施。除了在軍事上援助北韓外，便是實行土地改革，爭取農民的支持。最後以「公私合營」的手段，逐步地剝奪了資產階級的財產，完成了財產的國有化。並宣佈以「無產階級專政」代替「人民民主專政」（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這樣，中國的情形幾乎完全和東歐各國一樣，變成爲「變態的工人國家」了。

但在中國問題上，也和蘇聯問題上一樣，發生了幾種修正主義的傾向。最初是巴布洛的親毛傾向。他認爲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對蔣介石的勝利後，即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因此，他主張中國托派的任務，應滲入中共，幫助後者去完成革命。無須說，這是巴布洛的親史大林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具體運用。但中國革命共產黨駐國際的代表，自始即反對巴布洛的這種修正主義思想，認爲中共在勝利後所建立的政權絕非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種波拿巴特式的政權。但它的前途多份是向東歐的「變態工人國家」的道路走（《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到一九五四年末，我們看到中國正在向「變態的工人國家」的道路走時，我們便提出了政治革命的主張（《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前途》，發表於一九五五年初第四國際瑞士支部的機關報《社會主義評論》）。和巴布洛修正主義傾向平行的，是曼德爾、邁登和弗朗克的《官僚中派主義論》。依照這種理論，中共和南共一樣，自從它違反克里姆林宮的意志奪取政權後，已不是史大林主義的黨，而是一種「官僚中派主義的黨」。因此，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不應組織無產階級的革命黨」，「準備政治革命」，只須滲入中共從左方幫助

它完成中國革命。這個立場曾寫進於《史大林主義的興起和衰落》的決議案之中（即一九五四年巴布洛派召開的第四次國際大會通過的議案）。一九六五年所召開的統一後的第一次世界大會關於中蘇衝突的決議案，又塞進了官僚中派主義的論據，替毛派的立場辯護（即說毛派比莫斯科左）。一九六七年三月國際執委會同意了政治革命的主張，理應放棄官僚中派主義的論據。但在一九六九年舉行的世界大會上，邁登等提出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又提出了官僚中派主義的問題，以致引起了多數派與少數派的分歧。這種分歧和拉丁美洲的游擊戰略匯合起來，便形成了以後「國際多數傾向」（IMT）和「列托派」（LTF）的對立。在中國方面，擁護「國際多數傾向」的官僚中派主義論的是王凡西同谷禾等。（見王等一九七四年致國際第十次大會的信）

另一方面，差不多和「官僚中派主義論」的傾向一致的，是史瓦貝克和梁恩（李福仁）。他們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衝擊之下，認為中共已不是史大林主義的黨，因而它的政權不是官僚專政。因此，他們反對社會主義工人黨一九五五年大會上通過的關於中國政治革命的決議，主張提出民主的要求去改良北京政府。這就在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引起了嚴重的爭論。我們被邀請參加了這次討論，對史和梁的反對政治革命的論據給了詳細的分析和批評（見《中共及其政權的性質——政治革命，還是民主改良？》）。

在中國托派中，最初接受巴布洛的修正主義傾向的是蘇達。他認定，中共在一九四九年「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已經實現了。」（《中國托派的現狀和前途》第一頁）

根據這個判斷，對中共的政權，只能予以支持，絕不能提出政治革命來推翻它。但在大多數同志的壓力下，蘇達亦

接受了政治革命的主張。因此，他的「判斷」（無產階級專政和「主張」政治革命）是完全矛盾的。

最後，就是葉寧的修正主義傾向。對此，我們已經在前面論述過了。這裏只須指出：葉寧的修正主義傾向是承繼巴布洛和蘇達的「傳統」的。後者稱中共的政權為「無產階級專政」，葉寧則從托洛茨基的文章中引用辭句來證明：中國和蘇聯一樣，「無產階級仍然是統治階級」。這就從「理論上」否定了中共政權為「官僚專政」。

從前面的論述可以看出，所有的修正主義傾向，都在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造成了大大小小的災禍。烏魯班斯的「國家資本主義」把「列寧團」送進了墳墓；夏克曼的「官僚集產主義」導致了社會主義工人黨的一次大分裂（一九四〇年）；巴布洛的「親史大林主義」，使第四國際分裂達十年之久（一九五三—一六三），他的「親毛傾向」，誘惑了香港一部分托派分子返回大陸，湮沒無聞；史瓦貝克和梁恩的「親毛傾向」，雖然在社會主義工人黨內沒有造成大損害（跟隨史脫黨的不過二十餘人），但就他們兩人脫離運動說，也是一個損失，因為他們是最初參加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曼德爾和邁登的「官僚中派主義」加劇了一九六九年世界大會上的多數派與少數派分歧的嚴重性，並使第四國際對中共的性質，至今尚沒有一個共同的立場；蘇達的「親毛思想」所發生影響，我們在《又一次對蘇達的批評的批評》一文中已經指出：「凡是和他接近，受他影響的人，都是反黨或脫離黨的。他的親密同志陳與游之脫離黨，並跑到『擁毛反右』的革馬盟去了，便是顯例。」因此，我們希望葉寧從過去各種修正主義傾向所造成的災禍中，學得教訓，及時檢討自己的嚴重錯誤，公開聲明放棄他的修正主義傾向，重新回到正統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上來！

## 拉丁美洲游擊戰爭問題 (一九七八年)

對拉丁美洲游擊戰爭問題的爭論，幾乎造成了分裂。事實上，許多支部的確分裂開來了。雖然這種分裂不是真正的分裂，而只是兩派的思想分歧。從一九六九年，在世界大會上成立了兩派，分爲多數傾向和少數傾向；後來發展爲國際多數傾向（IMT）和列寧托洛茨基派（LTF），一直到一九七七年，兩派才統一起來。

爲什麼會在第四國際內部發生這種分歧呢？第四國際有適用於一切國家（包括落後國家）的過渡綱領；但是這個綱領之內沒有包括游擊策略。那麼爲什麼會有人在第四國際之內贊成這種策略呢？要解答這個問題，必須從客觀的現實環境中檢討，去找尋原因。

我們知道，自從中國毛澤東以游擊戰奪取政權，使中國問題變得非常複雜，不容易理解，以致產生了巴布洛主義的思想。拉丁美洲游擊戰略問題的產生，其一是由於古巴革命的勝利。卡斯特羅在五十年代末期組織了一些革命份子，在古巴進行游擊戰爭，經過了幾年終於把美帝國主義支持的巴蒂斯達的政權打倒；勝利後甚至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沒收了私有財產，建立了以工農爲基礎的新社會。這一個新鮮的條件，加上卡斯特羅的公開號召，使得拉丁美洲的左派革命青年都熱衷於游擊戰爭，在許多國家（如在玻利維亞、阿根廷、烏拉圭、委內瑞拉等）形成了一股游擊戰的熱潮。在這種游擊熱潮和卡斯特羅的鼓吹之下，第四國際的某些幹部也被吸引進去了。在一九六六年至六八年，拉丁美洲各國的許多革命份子以至托派的一些幹部都主張進行游擊戰爭。在

這種形勢下，贊成這種思想並不稀奇，可是要抵抗它倒很困難了。連第四國際的領導幹部如義大利的邁登，比利時的曼德爾和法國的法蘭克也贊成游擊戰爭，拉丁美洲的革命青年和領導幹部（如玻利維亞的莫斯科蘇）之捲入游擊戰爭便毫不足奇了。

一九六八年二月，在一次國際執委會上，討論了由邁登起草的拉丁美洲游擊戰爭的文件。出席會議的委員都一致贊成游擊戰爭，並對邁登的文件投了支持票，會上只有我一個人投反對票（美國當時駐國際的代表亞爾特也投票贊成的）。在這種情形下，我寫了《回到托洛茨基的道路上來》這份文件，提交世界大會討論。

文件全面地探討了中國和古巴的游擊戰爭勝利的根源和性質，並警告第四國際有走入死巷的危險。

文件指出，用游擊戰爭代替《過渡綱領》是荒唐的。卡斯特羅怎樣倚靠游擊戰爭走上勝利？古巴革命的勝利，主要是美帝國主義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以及巴蒂斯達的政權太腐化，極受人民的痛恨。最初，美國看不起卡斯特羅的力量，想不到它後來的發展會得到城市群眾的響應和支持，結果把巴蒂斯達的政權打垮了。但卡斯特羅勝利後，美帝國主義在拉丁美洲的政策便完全改變了。它集中力量在拉丁美洲各國阻止這種情形的出現，任何游擊戰的可能都要預先消滅。美帝國主義在玻利維亞訓練一支特別軍隊去打擊古瓦拉的游擊戰，當多明尼加的群眾剛興起時，美帝立即派軍隊去鎮壓……從這些事實可以看到，要在拉丁美洲任何國家再靠游擊戰爭重演古巴的做法已不可能，只會得到慘敗。我指出，依照馬克思、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意見，要幹革命，首先要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綱領的群眾黨，由這樣的黨去組織群眾。最後，到群眾已信任這個黨〔的號召〕時，才舉行暴動，奪取政權。

這是列寧的道路。

從中國的經驗可以得到教訓。中國的史大林黨和列寧的道路剛剛相反：革命到來時，他們擁護資產階級的國民黨；革命失敗了，他們進行游擊戰。到了一九三七年，史大林黨再度投降了國民黨。這當中犧牲了無數英勇真誠的革命者。托洛茨基當年怎樣批評他們呢？我們一定要從中國游擊戰的失敗中獲得教訓。因此，在拉丁美洲應該提出的不是游擊戰略，而是革命的過渡綱領，如：土地改革、民族獨立，言論、出版、結社和信仰的完全自由；總的口號是普選全權的國民大會。應該組織一個革命的群眾黨，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這些意見詳細的寫在文件上，經得起考驗。玻利維亞和阿根廷等游擊戰的失敗，便是歷史事實。

這裏還要說說，這份文件內的兩個很重要的問題：游擊戰略和面向工人階級的問題。

第四國際那時普遍存在一種迎合小資產階級的傾向，這種傾向是承接著巴布洛主義的影響的。前面我已經說過，希利領導下的國際委員會對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鬥爭組織中某一派的幻想是怎樣的；巴布洛在這方面也不遑多讓。那時巴布洛不僅對班貝拉政府沒有一點批評，對阿國革命鬥爭沒有提出一個綱領，他甚至還到阿爾及利亞做班貝拉政府的顧問！阿爾及利亞政府也是打游擊戰開始的，不過他們是迫於形勢才這樣做。第四國際的一些領導幹部這樣迎合毛澤東、卡斯特羅，這是由於一種很深的機會主義意識產生的。

我批評了卡斯特羅的思想。我指出，他所領導的革命是屬於激進的小資產階級的。他起初還只是個民主主義者；他的一套思想是人道主義的；他領導的游擊隊單靠行動，沒有一個政治的綱領——更不用說不是社會主義的綱領了。卡斯特羅的理想沒有什麼體系，主要還是靠游擊行動，他不懂得

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懂得十月革命的經驗；最重要的是他不懂得托洛茨基與史大林的鬥爭。卡斯特羅的黨不是列寧民主集中制的黨，黨內完全沒有民主。他的政府和東歐及中國的一樣，根本不是從工農兵蘇維埃基礎上產生的。卡斯特羅不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但這不妨礙我們在某些地方批判地支持他，像在他和蘇聯官僚以及拉丁美洲共產黨的一些爭執上。可是對於游擊戰略，不但絕不能迎合它，而且必須指出它的原則上的錯誤，給它以嚴肅的批評，不能因為這些人幹革命便不批評。歷史上有許多同類的例子可資參考：像與馬克思處於同時代的布朗基，整輩子幹武裝暴動，坐了幾十年牢，不能不算是革命家。馬克思卻嚴厲地批評了他，認為正常的革命道路不能光靠暴力和恐怖。還有一個納塞爾，是正正式的德國工人運動領袖，但是他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馬克思不得不批評他，而且還批評得很厲害。就是在第四國際裏也可以舉出很好的例子：西班牙的馬克思主義工人黨的領袖安德·寧。當西班牙內戰時，他是第四國際西班牙支部的群眾領袖，但他放棄了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而與史大林派妥協，參加他們的人民陣線。所以托洛茨基不僅批評他，最後並和他決裂。那麼，我們為什麼害怕批評卡斯特羅呢？因為那種根深蒂固的迎合主義。我們一定要拋棄這種思想，回到托洛茨基主義的道路上來。

我們也說到游擊戰爭並非完全不可用。當城市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的時候，農村當然可以採用游擊戰爭作為附屬的鬥爭。我甚至說如果發現《過渡綱領》有什麼錯誤，應該公開說出來，甚至可以修改，但絕不應該偷偷摸摸地代之以游擊戰略，這是極端違反列寧主義的傳統的。

另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面向工人階級的問題。六十年代開始，第四國際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學生運動；學生運動低

落後，好些人感到沒有出路，同時看到拉美游擊戰的興起，便被這種游擊戰吸引住了。例如曼德爾當時就提出過：「我們應該怎樣對待參加拉丁美洲游擊戰爭的革命家呢？」他們以對游擊戰爭的幻想代替了研究游擊戰爭的興起及其必然產生的後果。因此我才提出：「第四國際應該走向工人階級，不是走向農村打游擊。」我指出歐洲的所有支部，沒有一個在工人群眾中有基礎，我們吸收的幹部全是從知識份子中來的。我說學生運動固然要幹，而且也有一定的效果，可是第四國際的基礎不能建立在學生上面。學生運動是小資產階級性的，時高時低；我們是應當去參加和領導，從中吸收革命份子，加以培養，使之成爲無產階級的革命家。我們是一個無產階級政黨，黨的基礎只能建築在工人階級的基礎上面；只有爭取工人階級的多數，我們才有勝利的前途。我提出要面向工人階級。但面向工人階級不是一句空話，我們首先得打入工會。歐洲、美洲的工會都擁有千千萬萬的群眾，只有深入到工人階級裏面才能影響、吸收工人和幹部。無疑，這個工作非常艱苦；像美國的工會，工會官僚的勢力很大。不過，不管怎樣，只有這樣做才是我們的出路。我還引用了列寧的話，他說我們一定要到工會中去；如果不能在工會中爭取到群眾，便談不上走向政權。那個時候，我這個意見沒有多少人贊成，有些人甚至反感。現在，全世界的托派都相一致了。

我這份文件到了美國，得到社會主義工人黨（下稱社工黨）的嚴肅考慮。另一方面，韓生也寫了文章批評邁登的游擊戰略的草案，比較具體地分析了他們的意見。這樣證明社工黨已轉變了，這一轉變對國際是非常重要的。在初期，韓生和鐸伯斯曾寫過贊成古巴游擊戰的文件，社工黨的代表也在國際執委會上舉過手贊成游擊戰。美國的意見還影響過王凡西，他在爲過渡綱領中譯本的序文上提出過渡綱領應該補

充游擊戰爭問題，可見他也支持游擊戰爭（詳情可參看碧蘭批評王凡西的文章）。社工黨的轉變是經過細心研究的結果；倘若不是他們的轉變，我的文件很可能再一次被湮沒了。

韓生和我的文件都及時地趕到了大會。這次世界大會非常熱烈地辯論了游擊戰的問題，產生了國際多數傾向和列托派兩個派別。由於美國社工黨改變了立場反對游擊戰爭，所以增強了反對游擊戰略的陣容，連帶把拉丁美洲一部份支部爭取了過來。這裏包括阿根廷的馬蘭奴；他讀了韓生和我的文件後才轉變到我們的立場上來。

自此以後，兩派對很多問題都持有不同意見，採取不同立場。國際多數傾向甚至發展到主張在歐洲、錫蘭、印尼以至全世界推廣游擊戰略。

多數派的游擊狂熱，從一例子可見一斑。一九七一年在巴黎紀念巴黎公社的一百周年中，法國支部動員了所有支持者遊行。我親自看到：他們用汽車懸掛了三幅大照片，車前掛著的是古瓦拉的像，兩旁的才是馬克思和列寧。沿途他們不斷高呼「古瓦拉」和「胡志明」！

我在《回到托洛茨基的道路上來》內提出面向無產階級後，在國際內部發生了微弱的反響。譬如說，我這個意見獲得了美國社工黨內一些年青同志的支持。我還看到有一個女同志撰文引述了托洛茨基、加農、韓生和我的文章，主張除了學生運動之外更要做工人運動。不過這些意見並未為社工黨的領導贊成，他們甚至還對這種主張加以嘲諷和譏笑，貝利·雪巴因為黨內有不少年青同志支持我的意見而寫信要求我出面助他們平息這種傾向。我當時這樣告訴他：面向工人階級這個方向是對的，儘管不是一朝一夕能夠辦到，但必須認真堅持在工人裏活動。美國社工黨的領導多是從學生運動中產生出來的知識份子，沒有參加過工人運動，也自然地在

某種程度上輕視工人工作。他們對持有面向工人方向意見的同志加以冷待和譏諷，使到一部份年輕同志感到失望而退出運動，有些還被黨開除，這是很可惜的。

到了一九七五年八月美國社工黨的大會上，才把面向工人階級這個方向肯定下來。可是，領導對於前不久因這個問題引起的一些爭論，以及過去他們為什麼反對而現在又贊成一句都不提，這種方法是很不誠實的，不符合列寧主義的傳統。像在一九六二年時，社工黨的領導是主張游擊戰爭的，雖然後來他們改變了意見，走到正確的立場，但是對於為什麼有這種轉變也是毫不交代的。甚至當曼德爾和巴基斯坦的亞里詢問他們的原因時，他們還是默不作聲。可見，這樣的一個領導層是不很負責任的，因為一個負責任的領導不僅應該，而且是責無旁貸地把過去所犯的錯誤公開出來並加以檢討；唯有這種做法，才能有效地教育幹部，得到同志的擁戴。

最後，在一九七七年多數傾向和列托派宣佈解散，多數承認了游擊戰略的錯誤，國際又回到實際的統一來。事實上，在玻利維亞以及阿根廷這些國家的游擊戰爭都遭到了悲慘的失敗；古瓦拉死在玻利維亞的戰地上，我們的阿根廷支持多數傾向的支部有二、三十個優秀同志的生命也斷送在游擊戰爭中。唯有支持列托派，即反對游擊戰略的阿根廷社工黨——即馬蘭奴一派，因為參加以工會運動和選舉運動，在群眾中得到很大的發展，在七十年代中發展了黨員三、四千人。這個強烈的對照是無可辯駁的事實，多數派便是在慘痛的實證裏獲得教訓，不得不把錯誤的立場糾正過來。

我的文件，也因經過了事變而獲得了證驗，證明了「回到托洛茨基主義道路上來」是唯一的出路。

（史丹譯）

## 葡萄牙的革命問題

(一九七八年)

葡國工人在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推翻了卡丹諾獨裁政府，成爲多年來資本主義國家裏發生的第一場革命。造成革命有許多客觀因素；安哥拉和莫三鼻給長期的民族解放運動，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之死等等，使得這個帝國支持不住，並最終被工人起而推翻。這裏要談的不是這些客觀原因，而是第四國際在這個革命中應該採取什麼相應策略。

一九七五年六月，國際書記處的多數派和列托派分別對葡萄牙革命問題作出決議。多數派的決議案除了提出土地改革外，還提出了工農兵蘇維埃的口號；而列托派除了提出土地改革，還號召「加強立憲會議」（因爲那時立憲會議早已召集了）。當時第四國際在葡萄牙有兩個組織，都很微弱；它們分別支持了多少數派的兩個立場。其中支持多數派意見的葡萄牙國際共產主義同盟還提出了沒收資產階級財產的綱領。至於列托派提出「加強立憲會議」，卻完全沒有提供一套方法。

這樣提立憲會議的立場是根本錯誤的。我在當時寫的反對這種立場的文章（見《葡萄牙革命的中心問題》）上說：在某種情形之下，如在反動時期提出立憲會議是可以而且必須的。俄國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列寧便提出了這個口號；中國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托洛茨基也提出這個口號。但俄國在二月革命之後，列寧已提出一切政權歸蘇維埃了。那時俄國已經有蘇維埃，立憲會議的口號便成爲附屬口號。在革命時期只提出立憲會議是不夠的。過渡綱領清楚指出：一有革命局勢存在，便要號召組織蘇維埃，並且沒有其他形

式可以代替它。葡萄牙早已存在革命局勢，除了提出工農兵蘇維埃之外，沒有別的辦法可以動員群眾。工人雖然有工會組織和工廠委員會，農民也可以組織農民協會，但軍隊卻受控制於反動的將領手裏；只有在工農兵蘇維埃的號召之下，才能把工、農、兵組織起來進行革命奪權的鬥爭。可是列托派卻根本不提出這個問題。

列托派不提出蘇維埃的口號，是有歷史原因的。第四國際長期以來把這口號置於一旁，好像已經把這個重要口號忘記了似的。一直以來，只有我屢次力提這口號，但國際執行委員會以及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導從來沒有正視這個口號。古巴革命在一九六〇年前後、阿爾及利亞從民族解放鬥爭發展到真真正正的革命局勢時，我屢次提出蘇維埃的口號，有些還寫在文件之中。可是，第四國際卻根本沒有人討論這些問題，至多也只提出土地改革。到七三年的智利，我又提出了蘇維埃口號，還把文件送交國際執委會（也交托美國同志帶回社工黨去）討論，可是結果還是沒有人認真注意這個問題。這一次葡萄牙革命，多數派提出了，少數派卻拒絕這個口號。在一個革命的組織——特別是第四國際，屢犯這個錯誤是非常嚴重的，所以我一直要求討論這個問題。

我這份文件是在一九七五年社工黨的大會後，列托派會議之前的八月間寫好的。文件在列托派的會議上散發了，可是卻沒有被討論；可見，列托派是不重視這個意見的。不過，我的意見也收到一些效果——阿根廷的馬蘭奴同志接受了我的見解。可是，由於這樣，其他人便對馬蘭奴有不歡迎的態度。馬蘭奴因事未能等到列托派會議結束前離開，臨行前把他贊成蘇維埃口號的意見囑咐了美國社工黨的負責人，並要求在會議上轉達和討論；會議也答應把他的意見放進決議案去。可是，決議案發表後證明了會議並沒有實現諾言，這事

件使馬蘭奴非常反感。

一九七六年六月，國際執委會舉行兩派會議，葡萄牙問題當然是主要議程之一。由於我未能參加會議，因此寫了一封長信給國際執委會。信內詳細而具體指出：葡萄牙的兵士如果繼續被控制在反動的軍官手上，那麼葡國的革命便不會有什麼前途的。唯有工農兵蘇維埃才可以把兵士爭取過來，才能夠談得上建立革命政權。葡萄牙已經有了蘇維埃的萌芽組織：像街坊委員會、工廠委員會及兵士的一些組織。我們必須立即開始這方面的宣傳和解釋。當時在葡萄牙的毛派組織以及軍事加強運動（MFA）也提出了蘇維埃的口號，但他們的提法十分混亂，或只拿來用作幌子；因此，第四國際的兩個組織必須在土地革命外加上工農兵蘇維埃和沒收資產階級財產並將之國有化的綱領上動員群眾，必須詳細和耐心地向群眾解釋這個綱領；只當群眾在瞭解並在這個綱領之下動員起來才能挽救葡萄牙革命，第四國際的兩個組織才能得到重大的發展。

這個文件交由積克·巴列士（Jack Barres）轉交到國際執委會。會議上，多數派的同志贊成我的意見，少數派的同志——除了馬蘭奴之外——反對。可是，由於我沒有出席會議，所以他們沒有把它正式通過成爲共同綱領；因爲我沒有出席，便沒有人能夠正確地解釋我的提議！多數派雖然贊成提出蘇維埃，但他們竟然把蘇維埃和工廠委員會這兩種不同性質的組織形式混淆起來。馬蘭奴也不能好好地加以解釋。另一方面，列托派仍然堅持要加強立憲會議。可是立憲會議在葡萄牙早已召集過了，而且還通過了一個憲法。社會民主黨還趁機組閣，把革命緩和下去。共產黨是個史大林主義政黨，奉行著孟什維克主義；它和社會民主黨一樣，是改良主義政黨，不會提倡社會主義革命的。可是對於這兩個臭名遠揚的

改良主義政黨，卻被第四國際裏的兩派分別支持：多數派支持共產黨，列托派支持社會黨。第四國際這兩派不能夠向葡萄牙革命提供一個完整的革命綱領，因而由社會黨組織資產階級內閣政府，這局面一直拖延到今天。

最荒唐的是在列托派還沒有解散之前，以社工黨為首的列托派與國際多數派的邁登、曼德爾、法蘭克三人在《洲際通訊》上進行了一場公開爭論。最初是多數派批評列托派（實際是批評社工黨），說他們放棄了過渡綱領。社工黨有見及此，亦以韓生、諾瓦克、傅利（Gerry Folly）三人聯署作答，雙方詞鋒都很嚴厲。邁登等的文章內有一句很嚴重的話，攻擊社工黨只要立憲會議，不要蘇維埃，已走回「議會道路」，變成「民主的白癡」。社工黨對此沒有作答，爭論也就停止了。

另一方面，馬蘭奴在列托派七五年會議後，把會議（包括我的）文件印發給一些拉美國家和歐洲一些有關係的組織，而且成立了布爾什維克傾向（BI）；最後到一九七九年世界大會前分裂出第四國際之外。

馬蘭奴的一些意見和對於歐洲的某些問題是對的，他曾極嚴厲地批評社工黨不接受我和碧蘭提出的真正革命傳統意見，可是，當發展到組織問題時，他卻混亂了。

此外，多數派從馬蘭奴處看到了我的文件，便十分興奮。知道了我並不因為住在美國，生活受社工黨支持而避免批評社工黨，我對社工黨不同意的地方仍舊提出。他們又知道我沒有派系偏見，沒有因多數派是敵對派系而否認他們的正確意見，所以當時他們打算派人來訪問我。比爾·法蘭克寫了一封信給我（當然是代表多數派寫的），表示他們完全同意我關於葡萄牙和安哥拉的立場，甚至完全同意我的主張：和馬蘭奴、藍伯特以至外圍團體聯合起來，成立委員會發動幫助葡萄牙革命，募捐和派人到葡國幫助進行宣傳工作等等。信

的結尾對社工黨攻擊得十分厲害。我沒有回覆這封信，只在某次回覆曼德爾的信中請他轉達信已收到。我不是不想回信給法蘭克，可是他在信末攻擊社工黨，使我因此不好回覆；我不想背後批評社工黨，更不想捲進無謂的派系漩渦裏。

最後，多數派對拉丁美洲游擊戰問題作了檢討，承認錯誤。社工黨便利用這種形勢，要求解散兩個派系。社工黨不去弄清楚葡萄牙的問題，也沒有通知列托派其他支部，不經過召集列托派會議先行討論便單方面宣佈解散。這種做法暴露了它的真正動機。阿根廷社工黨不同意美國這種做法，以及認為自己代表列托派多數，因此決心與美社工黨決裂；它又撰寫了文件說美國社工黨有墮落傾向，說它的領導都是從六〇年代出來的學生，沒有一個工人，還說諾瓦克是個民主派，說美社工黨出現這種墮落傾向不是偶然的。這份文件傷害了美社工黨這群年輕幹部，他們對馬蘭奴懷恨很深。結果葡萄牙問題又造成了分裂，雖然國際多數派和列托派分立之局算是解決了，可是馬蘭奴一派又分裂了出去——上次大會時我向國際呼籲的信也起不了作用。

以上是我三十年來參加國際的經歷。首先是反對巴布洛的鬥爭，那是歷時最長的。接著是在美國社工黨內部關於人民公社、中共政權的思想理論的鬥爭。由我直接發動的關於第四國際重新統一的鬥爭，圍繞著統一鬥爭的又有對希利及他對古巴和阿爾及利亞問題的鬥爭。關於拉美游擊戰略的鬥爭也是由我發動的，跟著就是葡萄牙的問題。

從這許多的鬥爭的發展和結果看來，我們是值得引為高興和自豪的，因為我們的確是發揮和保衛了托派的傳統，執行了《過渡綱領》。在這些鬥爭中，有些是勝利了，有些可並不成功，但是都有重大的影響，比如對巴布洛的鬥爭。在組織上說，社工黨在加農的領導下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從思

想上來說，中國革共黨卻佔了重要的地位，我們對巴布洛的批評是最徹底的。

至於人民公社的問題，我們是徹底勝利了，並幫助了社工黨掃除混亂。對希利，我們完全打敗了他，在古巴和阿爾及利亞問題上正確地發揮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拉美游擊戰略問題上，我們更獨立地發揮了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反對在拉丁美洲和中國以游擊戰略代替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結果證明對方完全錯誤，而對方亦已承認了錯誤。對於葡萄牙問題卻沒有結果。第四國際沒有利用葡萄牙的革命局勢宣傳蘇維埃，是一次失敗；反之我們的主張是對的，這一主張後來反映到伊朗革命上。伊朗學生受美國社工黨的影響很大，所以他們回國去也只提出「立憲會議」，沒有提「蘇維埃」的口號。國際的多數雖然提出了蘇維埃，但並沒有著力宣傳，使得伊朗革命和葡萄牙革命一樣，立憲會議召開了，製成了一套新的憲法，保衛資產階級的財產所有權；這便是召集立憲會議的唯一成果。這個問題反映了社工黨現時的領導層不懂得《過渡綱領》及十月革命的傳統，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史丹譯）

## 蘇聯一國建設社會主義與 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鬥爭<sup>1</sup>

(一九七九年)

我在《史大林〈一國建設社會主義〉與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國際主義〉的鬥爭及其後果》(刊《彭述之選集》第二卷——編註)一文中，曾經指出：史大林爲了「一國建設社會主義」，把原來領導世界革命的共產國際，轉變成爲指使各國共黨執行蘇聯「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對外政策的簡單工具。到了一九四三年秋，史大林爲了向羅斯福表明：「蘇聯並無世界革命的計劃」(像他一九三六年對霍華德所說的)，他便公開地取消了這個「工具」——共產國際。從此各國共黨失去了聯繫和領導的「合法」中心，只好像私生子一樣，偷偷地依附於克里姆林宮，任其指使。因爲那時只有蘇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各國共黨的官僚們，必須依靠蘇聯的「威望」及其「物質支持」，不得不奴顏婢膝地聽從史大林的指揮(當史大林獨自取消共產國際時，竟沒有一個共產黨表示異議或反對，就夠證明所有共黨的馴奴性了)。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情形就完全改變了。這種改變的突出表現是：在東歐和東南亞先後出現了一系列的「社會主義國家」，如南斯

---

<sup>1</sup>此文是彭述之的遺作之一，寫於一九七九年中越戰爭爆發之後，是鑒於各國共產黨之間的敵對衝突日趨激烈，而企圖對蘇聯與其他工人國家的關係做全面的總結的；原稿最末一行寫上「中蘇衝突的原因及其後果」(作者計劃接著評論中、蘇與印支三國共黨等問題)，但由於年事已高(已近八十五歲)，患有嚴重心臟病，時常發病，致使他雖常想繼續寫完它，也無法如願。現在，作者已經長逝，這個意願完全不可能實現了。儘管如此，已寫出的這部分仍有發表的需要的。——編者

拉夫，波蘭、東德、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以及中國、北朝鮮和北越。這就打破了蘇聯「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壟斷」地位。以前，史大林任意指使的是無權的共黨，現在要對付的是掌握政權的共黨了。這些握有政權的共黨，也模仿史大林的榜樣，要在他們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於是，老牌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和新起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乃至生死鬥爭。這種情況首先在戰後蘇聯和南斯拉夫的關係中充分暴露了出來。

### 蘇聯與南斯拉夫的破裂

南斯拉夫的共黨領袖狄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組織游擊隊，進行了反納粹侵略的戰爭。到大戰結束時，狄托的游擊隊已控制了整個南斯拉夫，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實行土地改革，並開始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準備向「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走。這便對史大林所控制的蘇聯以外的共黨第一次發生了嚴重的矛盾。

起初，史大林還是依照以前命令各國共黨執行他的政策的老規矩，替南斯拉夫擬訂了一套計劃，如把南國的經濟建設隸屬於蘇聯的計劃經濟之中，以及派遣蘇聯人擔任南國的經濟、政治和軍事的顧問等。狄托是從史大林學校受過訓練的。看到史大林替南斯拉夫擬訂的計劃，他知道：不但要將南斯拉夫變成蘇聯的附庸，而且要將他本人變成史大林任意擺佈的工具。因此，他毅然拒絕了史大林的圖謀，因而導致了一九四八年六月蘇聯與南斯拉夫的公開破裂。當時，這種「破裂」沒有發展成爲蘇南戰爭，僅僅因爲戰後發生的許多嚴重問題，迫使史大林不敢向狄托下討伐令。但從那時起到史大林之死（一九五三年三月），「社會主義的蘇聯」把「社

會主義的南斯拉夫」看成不可調和的死敵。因而兩國的關係經常處於緊張狀態之中。

### 史大林對東歐政策的盤旋演變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蘇聯紅軍已經佔領了或控制了東歐各國（南斯拉夫除外）。爲了和西方資本帝國主義謀求妥協，史大林在東歐一些國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與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黨派成立「聯合政府」，保護資產階級的財產，把東歐變成蘇聯與西歐之間的「緩衝區」；同時，命令法國和義大利的共產黨避免奪取政權（因法意共黨在戰後已發展成爲強大的群眾黨，在當時資產階級衰弱的情形下，有可能奪取政權），以參加資產階級的「聯合政府」爲限，試圖以此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

但當代表西方資本主義的美帝國主義派遣馬歇爾到歐洲，用他的「馬歇爾計劃」穩定了西歐的經濟和政治局勢，並將法意共產黨的代表從資產階級的「聯合政府」趕出時，史大林才感到「和西方帝國主義謀求妥協」無法實現，不得不放棄東歐「緩衝區」的幻想，將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們踢出「聯合政府」，成立了清一色的史大林主義的官僚專政，並沒收了資產階級的財產歸國有，使東歐各國完全「同化」於蘇聯，以此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

但當史大林把東歐各國實行「同化」於蘇聯時，不僅將蘇聯官僚專政的全套機器搬到了那些國家裏，而且從狄托的「獨立行爲」取得了「教訓」，那就是他對於東歐各國掌握大權的幹部，實行了最嚴格的挑選，即選擇了那些對他絕對忠實和服從命令的幹部。爲了保證那些幹部的安全和監視他們的不變，他在每一個國家裏建立了蘇聯格柏烏監視下的秘密警察，和蘇軍指導下的本國軍隊。這樣，東歐各國的工農群

眾和知識份子，乃至普通共產黨員，都成了史大林主義官僚任意指使，和秘密警察隨時迫害的對象。因而引發了東歐各國民眾的異常憤懣和憎恨，成爲一觸即發的火山。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革命和一九六八年捷克的民主改革運動，就是「火山」爆發的典型例子。

### 匈牙利革命之被絞殺

在匈牙利，史大林主義官僚的頭子是拉科西，其副手爲法卡斯和吉羅。拉科西是史大林的縮影，匈牙利的毛澤東。它擁有無上權威，但缺乏基本知識。例如，他對經濟方面的知識完全是外行（和毛澤東一樣），卻任意制訂經濟計劃（像毛的大躍進，土高爐煉鋼和人民公社），強迫幹部和群眾去執行。結果是生產衰落，人民生活日趨困苦。但他絕對禁止人民發表意見、提出修改經濟計劃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要求。如果有人敢於提出任何不同意見，對現狀表示不滿，便立刻遭到秘密警察的拘捕，投進監獄，備受酷刑（秘密警察在全國各城鎮設有特殊牢監，拷打犯人的特殊工具，令人無法忍受）。這種官僚獨裁的極端殘暴情形，到了一九五三年史大林之死，才開始有點改變。因爲匈共內部有些較開明的幹部，感到現狀如果繼續下去，將會發生爆炸。因而於一九五三年七月，在一次黨的中央委員會全會上推選了納吉（他是匈共領袖中的改良派）擔任政府總理。納吉施行了一些改良措施，一時緩和了人心。但到一九五五年四月，拉科西感到納吉的改良對他是一種威脅（因後者的改良措施頗得人心，就像劉少奇一九六〇年以後所施行的改良措施一樣，成爲對毛的威脅）。於是，通過他所控制的國民會議，撤除了納吉的總理職位，回復了他的個人獨裁。但到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屆大會上清算了史大林的個人崇拜，暴露了他的

一部分罪惡。這就在匈牙利人民中引起了強烈的反應。特別是團結在貝多斐俱樂部的知識份子憤慨異常，他們舉行了七千人參加的大會，提出了民主化和知識自由的強烈要求。由此又引起了其他學生和工人集會示威。在這種群眾不滿和要求民主自由的強大壓力下，匈牙利共產黨被迫於一九五六年七月召開了它的中央委員會。在這次會議上，拉科西辭去了匈共第一書記，由吉羅代替。指揮秘密警察的法卡斯被貶為普通黨員。但吉羅擔任第一書記，就等於拉科西繼續掌權，不過從公開轉到幕後而已。因此，匈牙利人民和官僚專政的衝突的根本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因而局勢日趨緊張。這種緊張局勢到了十月二十三日，爆炸開來了，由此便發展成為震動全世界的、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歷史上第一次反對史大林主義官僚獨裁的革命！

這個革命，從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由學生發動（和秘密警察戰鬥），像野火一樣，在全匈牙利的人民中燃燒起來；工人、農民、學生、一般知識份子，以及普通共產黨員，幾乎全體捲入了革命的火焰中。不但工人和學生普遍地武裝了起來，就是匈牙利的軍隊也擺脫了蘇軍的監視，不是直接參加革命隊伍，就是把武器交給了工人和學生。因而在短短的十一天中（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三日），革命摧毀了全部秘密警察，釋放了一切政治犯（單在布達佩斯被釋放的政治犯就有五千五百人），粉碎了拉科西獨裁的全部機器（包括匈共黨部）。在全國各地方成立了工人、兵士、農民和知識份子的委員會（名為國民議會，實際上類似蘇維埃），即地方的革命政權。但在首都布達佩斯，代表拉科西殘餘勢力的吉羅卻在玩弄陰謀：他一方面，讓納吉組織各黨派的「聯合政府」，以圖緩和革命運動；同時，暗地請求克里姆林宮派遣軍隊到匈牙利鎮壓革命。當時，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官僚層已經

深深地感覺到：如果讓匈牙利的革命得到最終勝利，不但整個東歐將被捲進革命的漩渦中，就是蘇聯本身也將受到革命潮流的衝擊；說不定，他們的命運將和拉科西聯到一起。所以，他們毫不遲疑地派遣大軍（光是坦克車便有六百輛）到匈牙利，實行瘋狂的血腥鎮壓。雖然布達佩斯的工人、兵士、學生、一般市民，甚至中學生拼死抵抗蘇軍，表現出了無比英勇的犧牲精神，但由於力量太過於懸殊，經過整整四天（十一月四日至八日）的血戰之後，終於被蘇聯坦克車壓平下去了！這就是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的悲劇。這個悲劇已被寫進史大林「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史之中。

### 捷克民主改革運動之被鎮壓

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形和匈牙利的有所不同。因為這個國家是由兩個主要的民族——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所構成，前者約占全人口百分之六十，後者不過百分之三十。因而斯洛伐克屬於「弱小民族」的地位。所以史大林挑選捷克斯洛伐克的黨政領導幹部時，只注意前者。如哥特瓦爾德和諾夫特尼都出自捷克族。正因此，斯洛伐克族的人民感到不滿。雖然哥特瓦爾德和諾夫特尼（哥氏死於一九五三年，以後便由諾夫特尼掌權）的獨裁統治對於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的人民是同樣殘暴的，但斯洛伐克族的人民總覺得他們需要有自己的領袖來抵抗諾夫特尼。因而在一九五八年斯洛伐克的共黨會議上選出了杜布切克為它的第一書記。從此便發生了杜布切克和諾夫特尼的鬥爭。

杜布切克既出自較受壓迫的斯洛伐克族，所以他也就多少從被壓迫者的觀點和利益去看問題，從一九五五年至五八年，他在蘇聯從事研究某種專門學科，那時正是赫魯曉夫清算史大林的個人崇拜，在蘇聯進行了非史大林化運動，杜布

切克當然受了這個運動的影響。因而深刻地感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組織和統治方式都是從蘇聯輸入的、史大林式的，是違反社會主義的民主準則的。因此，他提出了一套民主改革的綱領，從事宣傳鼓動。起初獲得了斯洛伐克人民的支持，隨後又得到了捷克族人民的回應，以致動搖了諾夫特尼的獨裁地位。雖然，勃列日涅夫於一九六七年底親自出席捷共中央委員會全會，施行壓力，希圖挽救諾夫特尼，但無結果。到了一九六八年一月初，捷克舉行中委全會時，諾夫特尼不得不辭去黨的第一書記職位，由杜布切克取而代之。到同年三月，因國防部和保安部擁護諾夫特尼以圖推翻杜布切克的軍事陰謀被暴露，諾夫特尼又被迫辭去了總統職位，由斯伏波達擔任。這就給杜布切克的民主改革運動清除了障礙。他於一九六八年四月九日正式成立了新政府，宣佈了「捷克共產黨行動綱領」，即民主改革的綱領。

這個綱領反對權力集中於少數人之手，以致造成個人崇拜和個人獨裁。主張官吏由民主方式選舉。各黨派有權發表政治主張，從事政治活動。宣佈言論、出版、集會、信仰的完全自由。「新聞檢查」正式被廢止。那些聽令於蘇聯的秘密警察頭子受到整肅。於是，舊時被禁止的團體（如作家協會）被恢復了，新的團體成立起來了；新的刊物有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政治性的集會到處舉行，吸引了成千上萬的群眾，熱烈地討論各種各樣的問題。人們甚至在街頭、在餐館、在咖啡店和任何群眾場所，公開談論諾夫特尼獨裁時代的殘暴和貪污故事，發表各種各樣的政治主張，好像自由的閘門開放一樣，整個社會生活都沸騰起來了，充滿著朝氣和進取精神。這就是所謂「布拉格的春天」。假如這種「春天」繼續下去，捷克斯洛伐克有可能經過改良，而不需要革命（政治革命）逐步地清洗史大林主義官僚制度的殘餘，實現社會主義

的民主。並且此種社會主義的民主將吸引東歐和蘇聯一切被壓迫的民眾，形成一種廣泛的民主改革潮流，動搖那裏的史大林主義官僚的獨裁統治。但正因為如此，代表蘇聯史大林主義官僚層的勃列日涅夫，迫不及待地聯合東德、波蘭、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的官僚，於一九六八年七月底向杜布切克下最後通牒，命令後者取消民主改革，但遭到了拒絕。於是，蘇聯和東德、波蘭、匈牙利和保加利亞五國動員了五十萬大軍，於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向捷克進攻，以排山倒海之勢，於兩、三天之間佔領了整個捷克斯洛伐克，俘虜了杜布切克及其他改革派領袖。最後，勃列日涅夫強迫杜布切克取消民主改革，恢復諾夫特尼時代的舊秩序，並指定胡薩克去代替諾夫特尼。這便是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六八年民主改革的悲劇！

這個悲劇表明：即使不用流血革命，而以和平的方法來改革史大林主義的官僚專政，史大林主義的官僚也是絕不容許的。「任何反動的統治，如不經過革命來推翻它，它是不會自動地退出政治舞臺的」。這個歷史定律，在捷克事變中，從反面又一次得到了證明。

### 中蘇衝突的原因及其後果 (手稿至此為止)

# 闡析拉丁美洲國家的若干問題<sup>1</sup>

(一九七九年九月)

## (一)

這個決議寫成於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與隨後發生的事件特別有關的幾個實例，都已包括在決議內。其中最重要的發展，就是尼加拉瓜革命。尼加拉瓜的經驗沒有寫入這個決議裏面；它已由另一份單獨的決議來做；後一決議為世界大會多數所通過，題為《革命在前進中》。少數意見的決議名為《尼加拉瓜革命的提綱》。

對古巴革命的討論的詳細總結沒有包含在這個決議中，因為對古巴的特別討論，已計劃在第四國際領導機構之間進行。這項討論的基本架構，在本決議的第二十三和二十四兩節中已指出了。

在另一方面，最近的經濟發展使拉丁美洲的工人階級，不但在數量上，而且在社會比重上，有了顯著的增加。在資本高度集中的大工業方面，一系列新的部門（譬如汽車工業）有了很大的發展。整個地看來，這表示拉丁美洲出現了年青的而且強大的無產階級。這一層無產階級，跟較老一輩的工人階級及其較長的階級鬥爭和工會組織的傳統，一起存在，而且一起生長。由於老的工會領袖受了改良主義及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影響，而且臣服於資產階級國家，新一層的無產階級的生長及其活力，就使工人組織的方法及形式得到更新。老一輩的無產階級與新一代的無產階級的結合，特別是

---

<sup>1</sup> 編註：此文看來是對拉丁美洲決議的補充性闡釋，原本無文題及寫出的年月日，亦無分開節數。出版前代為加上。

在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哥倫比亞、秘魯及其他國家，已經使各種工人組織有了巨大的增長，尤其是在巴西。

無產階級逐漸成爲整個階級鬥爭的領導，而且越來越傾向於使用最先進的、最有力的鬥爭形式。政府的所謂緊縮計劃不但影響到工業無產階級，而且影響到全部靠工資爲生的勞動者（特別是城市勞動者），隨著經濟的發展，這個靠工資爲生的部門有著很大的增長。

工人階級要對抗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以及資產階級國家，這個國家愈來愈被工人階級看成爲緊縮政策的支持者和保證人。因此，就創造了一個向反帝反資方向發展的新同盟的基礎。通過這個同盟，無產階級能把工資勞動者及一切被壓迫人們圍繞著社會主義綱領組織起來。

## （二）

拉丁美洲的群眾運動在一九七六年以後就逐漸上升。在巴西，一九七八年至七九年的強大罷工運動，標誌了這個大陸的最大、最重要的工人階級的覺醒。在秘魯，軍人獨裁制度被一連串群眾動員及罷工運動所震撼。這些群眾動員及罷工運動，是接連工人階級在一九七八年的立憲大會選舉中有著極大收穫而來的。哥倫比亞市政工人在一九七七年的罷工和玻利維亞工人在一九七七、七八年的罷工，亦標誌了同樣的趨勢。在加力比海區域，特別是在格林伍德所發展的反對帝國主義統治的運動，使這個區域的政治發展，接近整個拉美的政治發展。一九七九年推翻尼加拉瓜暴君索莫沙的勝利鬥爭，成爲這個上升的階級鬥爭新局面的最高點，這個勝利鬥爭對於增強薩爾瓦多及中美洲其他國家的鬥爭，有著直接的影響。

尼加拉瓜證明了拉美大陸的革命時機已經成熟。尼加拉

瓜的革命是以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索莫沙的急進的游擊戰爭開始，然後發展成勝利的城市暴動。在推翻索莫沙的暴動中，無產階級及城市貧民起了決定性作用。

整個大陸的尖銳政治危機，是與一九七四至七五年的經濟蕭條所開始的世界資本主義嚴重經濟局勢同時發生的。全球及全拉美的深刻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以及一連串資產階級內部的危機、無產階級數量的增加及其組織的擴大，和小資產階級的急進化，所有這些因素確定了以下的觀點：要推翻拉美的獨裁政制及其所推行的緊縮政策，只有依靠以下的方法：群眾運動及群眾鬥爭的激動的暴力的過程、同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國家的正面對抗、工人階級的組織、以及結合總罷工、民主動員、武裝鬥爭、群眾起義等等不同的鬥爭方式。

這個過程定會經歷曲折的轉變；民主時期可能會與獨裁形式的繼續或重現結合起來。群眾的抵抗與動員會向獨裁形式挑戰。在這個過程中既不會有穩定的獨裁政制，也不會有穩定的民主的資產階級政權。工人運動的主要鬥爭目的之一就是民主權利。民主權利的獲得及保持，只有在群眾的日常鬥爭、動員及群眾在社會各部門的組織形式的增長情況下才有可能。群眾組織形式的基本核心，是在生產的地方、在工廠礦山的工人組織中。

無產階級一向是所有被壓迫的人們的帶路人。無產階級是拉美社會主義革命綱領的擔負人。無產階級若要組織起來、擴大它的綱領、與其他被剝削被壓迫的人們聯盟、推翻資本主義、以及建立工人國家，必定要通過各種各樣的鬥爭與組織形式、方法。這些鬥爭與組織的形式、方法，是從列寧主義的實例中傳給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

當新的革命力量從新急進的民主及反帝的鬥爭中，從工人階級，特別是工業無產階級的動員中生長起來的時候，建

立列寧主義式的群眾革命黨的前景就大為增大了。在礦山、工廠及農場的工人中間生根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就最能夠生長及爭取到新的革命鬥士。

因為地方的農業活動與全世界性的資本積累過程結合起來，所以資產階級國家逐漸被改變為帝國主義財政資本在該國家的政治代理人。拉美大農業企業生產的原料也直接與世界市場結合，一點也不考慮到該國所需的糧食與原料。

### (三)

建基在民主要求上的工農聯盟，就會漸進地朝向反對資本主義的方向發展。農民鬥爭的循環，趨向於與工人鬥爭相一致。但是這個聯盟不可能自動地鞏固起來。革命家的行動，以及一個表達工農階級的共同反對資產階級及其國家的鬥爭的政綱，是非常必要的。革命家行動和宣傳的終極結果就是工農政府。

他們之提倡這個游擊戰戰略，一部份原因是對古巴革命的動力的誤解。

譬如在阿根廷就發生了這種情形：在這麼一個高度城市化及無產階級眾多的國家裏，革命工人黨（PRT）卻展開了一條長期游擊戰的戰略。這個戰略包括在所佔據的地區建立雙重政權。在他們看來，目前以游擊戰的方式出現的民族解放戰爭就是革命。

因此，游擊戰作為戰略是不正確的。它只是一個策略，從屬於動員群眾及建立列寧主義政黨的前景。

他們本來應該經過像「工業警戒線」那樣的群眾組織將群眾的自衛力量組織起來，反對政變的威脅。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反而自稱自己為先鋒組織，說要在政變以後，發動武裝鬥爭。

不管是獨裁政府也好，形式上的民主政府也好，當群眾運動一旦超過了已有的改良主義及民族主義範圍的時候，所有這些拉美資產階級政府都用嚴苛的方法鎮壓群眾運動。但是尼加拉瓜勝利的經驗昭示我們，一當反對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在群眾中間深深地生根的時候，這個鬥爭就會經過總罷工、群眾武裝、群眾起義等等行動，與資產階級國家機器（軍隊、警察及法庭等）作殊死決戰。

尼加拉瓜在一九七九年七月的勝利，並不是英勇的少數人的功勞，也不是武裝鬥爭的專家的工作。它是勞動群眾漸增地組織起來、而且被捲入各種反對索莫沙獨裁政制的鬥爭過程的結果。這些由桑解所領導的所感召的行動，包括在城市中由工人、城市貧民、青年及一部份小資產階級所參加的總罷工及武裝起義；貧農及農業工人的佔有土地；以及漸漸有效的游擊行動。在鬥爭過程中，群眾在自己的工作單位，在街坊，以及在農村組織了他們自己的委員會。這種委員會不但實施軍事的自衛行動，而且還負擔送菜、環境衛生、及糧食分配等行政事務。最後勝利是由城市人民群眾的暴動所取得的。

拉美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之一就是將上述的教訓向群眾解釋。這些教訓證明勝利的關鍵就是群眾的暴動。

最近幾年來，第二國際，已經作了很大的努力，要把它的影响力擴張到拉丁美洲去，包括與拉美資產階級建立更深的關係，譬如參加一九七六年五月在加拉加斯（委內瑞拉首都）舉行的國際會議。

在拉美的反抗的人民眼中，沒有比古巴的革命立場與美國的反革命立場的對比更鮮明的了。

#### （四）

拉美的戰略包括三個互相有關連的軸心：

(1) 表示工人階級最迫切需要的要求，在這些要求中，階級獨立是最主要的。

(2) 符合工人及社會上最受壓迫的部份，如農民、城市貧民、受壓迫的少數民族及婦女所需要的民主要求。

(3) 因帝國主義不斷地奴役拉美人民而引起的要求。

圍繞著這三個軸心的要求而作不歇的鬥爭，就會很快地與資產階級政權相對抗，而且會產生反對資本主義的動力。在今天的拉美，只有工人階級才能領導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鬥爭，走向反對資本主義的方向。

統治階級的緊縮政策一定會迫使工人去尋找反擊的方法。經驗已經證明，尋找反擊的工人首先就會求助於他們的現有群眾組織，特別是工會。

工會官僚的腐敗、鎮壓工會內部民主，利用暴力來對付工會基層會員，都是由於官僚與統治階級及資產階級國家的密切關係。

受資產階級的緊縮政策打擊最大的，就是工人階級中最受壓迫最受剝削的層次。統治階級若能夠對這些層次作大的打擊，就會向工人階級中最強大的層次發動攻擊。因此，工人階級若要反對緊縮政策，一定要團結工人階級的各層次一起反對。

甚至於更進一步的發展也會出現，如智利的「工業警戒線」和玻利維亞在七十年代初期的人民集會。轉變工會為工人階級的鬥爭工具，不但不與組織工人階級更廣大的蘇維埃式組織的前景相矛盾，而且還是那個前景的必要的補充物及準備階段呢！

它們必須領導爭取民主權利及反對帝國主義統治的鬥爭。

這才最能使工人階級領導社會上所有被壓迫者的鬥爭，

特別是，在工人與貧農之間建立一個堅強的同盟，反對共同的敵人——統治階級。只有工人階級獨立地組織起來才能領導這個鬥爭，但工人階級一定要把農民群眾爭取過來。

一九七八年至七九年的巴西及玻利維亞的事件，也證實了工會組織採取更大政治步驟的傾向。組織工人黨的運動——與資產階級完全分離的運動——是由一批工會的領袖及辦事人員所發動的。這一批人曾經參加過巴西南部的工業無產階級所進行的大罷工。這個運動就是建立工人階級自己的組織的直接表現。

在玻利維亞，自從一九七八年初血腥的班塞獨裁政權垮臺以後，工會聯盟（WORKERS CONFEDERATION）已經成為反對政變的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因為這個行動，才阻礙了軍人統治的穩定。但是工會聯盟還需要以更完善的形式來表示他們的反抗，那就是組織一個工人黨。要求工會採取政治行動，並不意味對控制工會運動的階級合作領導層表示有信心。相反地，督促工會組織群眾的工人階級政黨的鬥爭，是與創立另一個領導層這個更廣大的鬥爭分不開的。這個新的領導層才能把工會轉變為階級鬥爭的工具。換言之，創立工人群眾黨的鬥爭，是與採納一個全面行動的綱領分不開的，這個綱領能夠使工人階級與它的同盟者聯合起來，反對資本主義的統治。

因此，這兩個過程（建立一個革命馬克思主義黨和建立一個以工會為基礎的工人群眾黨）並不是矛盾的，而是互相補充的。

### （五）

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包括群眾採取自衛行動，以對抗統治階級的合法及非法攻擊的需要。當軍隊、警察及與前二者

有關的半軍事性的部隊向遊行、罷工及其他工會的活動、貧民區的動員和一般性的抗議行動發動恐怖性攻擊時，那就自然而然產生自衛行動的需要了。當群眾擴大及加深民主的、工會的及其他形式的鬥爭的時候，他們的自覺就會慢慢地提高，他們就愈覺得自衛行動的必要。

群眾運動應當採取何種自衛行動，是一個策略的問題。反對合法的及非法的攻擊時一個最有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政治上的準備工作：①取得廣大群眾的支持；②運用防衛性的政治公式；③採取其他的無產階級的鬥爭方法，使得統治階級很難發動攻擊。在這些情勢中，正如在所有群眾活動中一樣，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提出適合情勢的建議來領導群眾。

在那些還沒有受赤裸裸的軍事獨裁所統治的國家裏，如果群眾已經感覺到對自己主權需要的時候，立憲會議的口號也是非常有效的。反對繼續實施緊急法令的鬥爭，反對反動的立法的鬥爭，反對不斷的新聞管制的鬥爭，爭取工人政黨合法化的鬥爭，反對暗殺及嚴刑拷打政治犯、工會領袖及農民領袖的鬥爭等等，都可以概括在立憲會議的口號之中。

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通常是圍繞著特別的主題而動員起來的。一般說來，實行及領導這些動員的組織形式，常常是特定的行動陣線。這些陣線並不是永久性的組織，但是反對帝國主義的行動卻是拉美革命戰績中的一條永久性的路線。

主張立即並無條件地拆除美國在波多黎各的所有軍事設備。主張美國海軍立即從波多黎各的維也奎斯島撤出。

拉美每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局勢都有不同，其所處的階級鬥爭階段也不同。因此，每一個國家的第四國際黨，在應用共同的戰略方針時，一定要注意它自己國家的具體情勢。在這個範圍內，才可以建立起一般的工作方針。

我們運動的努力工作，已經贏得重要的勝利，譬如保衛

巴西的受監禁的社會主義戰士的運動，及保衛秘魯的農民領袖及著名的托洛茨基主義戰士的運動，及保衛秘魯的農民領袖者布朗哥（HUGO BLANCO）的運動。

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支持工人階級的重要部份真正採取階級政治獨立的步驟，雖然推行這些步驟的綱領可能包含某些弱點。

在哥倫比亞和秘魯，我們已經採取重要的步驟來統一部份分裂的力量。

如果無原則的分裂能夠避免、有原則的統一能夠實現的話，建黨的工作就會有很大的進展。這樣，第四國際就能在每一個國家經過統一的組織向群眾發言。我們使統一成功的傳統指導原則包括在綱領上和最重要的工作軸心（問題）上取得基本上的一致，以及保證黨內部的民主。在這個組織內，理論問題及不太緊急的策略問題，都有充分機會進行討論、爭論。

雖然領導層的一個重要責任就是教育黨員；以使他們準備在遭受鎮壓的狀態中能夠活動，但是中心的目標必須是盡可能找機會公開活動。

## 國際對古巴問題看法的歷史演化

### ——兼評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關於古巴的意見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六日)

一九五九年，古巴革命勝利。到一九六〇年，第四國際對這問題有正式的反應。反應最先的是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這也是很自然的。美國與古巴是鄰國，有密切的關係。社工黨在當時派了韓生和杜勃士到古巴訪問。韓生後來寫了一本小冊子。那時，他們對古巴有很大的希望——如果不說是「幻想」的話——完全支持古巴革命。這種支持很對，可是他們並沒有認真地深入分析新生政權的性質。因而，在一九六三年，韓生和杜勃士寫了一個文件，贊成古巴革命的方法：即是用游擊戰包圍城市的戰略。他們認為這個新的戰略正確可行，這就成了後來在拉美主張游擊戰略的人們的藉口。

在一九六一年，美社工黨與英國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對古巴問題發生了分歧。美方面，由韓生起草的支持古巴的決議案，認為古巴政權排除了資產階級的代表，沒收了資產階級的財產，因而走上了工人國家的道路。希利領導的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則根本反對這個說法。他們認為古巴不過是雙重政權，國家性質沒有改變，還沒有進步到成為工人國家。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寫了一份文件，名為《古巴革命問題》，認為古巴既然排除了資產階級代表於政權之外，又沒收了資產階級的財產為國有，因此在財產關係上可以說是一個工人國家。在這點上，我支持社工黨，並批評了社會主義勞工聯盟的看法是錯誤的。古巴不是雙重政權，而是卡斯特羅的單一政權。同時，我要求大家小心。因為古巴是個很小的

落後的島國，如果沒有其他國家的支援，特別是拉丁美洲革命的援助，它是非常孤立、危險，很難支持的，因此我們不可以過分誇大這個革命的前景。

不久之後，因為國際委員會要開會討論古巴問題，我寫了一個草案提供討論。這是六一年七月的事。草案寫得很謹慎，客觀。我指出：古巴革命是獨立於史大林主義之外的一個革命，現在已經走上不斷革命的道路，這在西半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我們必須支持這個革命。我又特別提醒大家：古巴爲了生存，它已經受到蘇聯官僚的支持。對於這點，我們應該辯證地來看：它具有兩面性。按照十月革命的財產制，蘇聯支援古巴是理所當然的——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十月革命的財產制度仍然發生影響。沒有蘇聯的支持，古巴根本不可能繼續下去。美國封鎖它，並主張拉丁美洲的國家封鎖它；蘇聯購買古巴唯一的產品：糖，並向之提供物資和軍火。可見，古巴要接受蘇聯的援助是絕對必要的。但是，另一方面，蘇聯已經不是無私地奉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列寧時代的蘇聯，它早已墮落了。在史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的政策底下，官僚專政的蘇聯之支持其他國家，是要取回代價的。因此，蘇聯對古巴的支持，至少要把蘇聯的史大林主義思想帶到古巴；換句話說，就是要使古巴史大林主義化。這情況不僅可能，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倘若古巴史大林主義化，就不可能有很大的前途。因此我主張第四國際——特別是在美洲的托派組織，召開一次美洲的特別會議來討論支援古巴革命。我們的組織的物資很微弱，不能提供什麼物質援助，只有在思想上去幫助它，希望在古巴境內能夠建立一個馬克思主義黨。同時，把托洛茨基最重要的著作翻譯成西班牙文，送到古巴去；最好是能辦一份西班牙文的刊物，影響古巴群眾。

但是會議反對我的決議案，特別是希利和班達。班達甚至說卡斯特羅是巴蒂斯特，是古巴的蔣介石。

我又把我寫的這份草案送給比爾·法蘭克，意思是希望國際書記處（IS）和國際委員會（IC）聯合起來討論古巴問題，幫助古巴革命。但結果得不到法蘭克的回音。

稍後，我看到巴布洛派（IS）支持古巴革命的文件，爲了支援古巴革命，我極力主張 IS 和 IC 統一合作。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召開的統一大會上，雖然沒有特別討論古巴問題，但大家都同意古巴已經是一個工人國家了。希利派和朗貝特派之不參加統一大會，對古巴國家性質的不同看法，是原因之一。（見我的《白恩斯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往哪里去？》）

跟著發生了一個新的問題。卡斯特羅在夏灣拿召開了一個拉美會議，號召拉丁美洲運用游擊戰略。卡斯特羅說：拉丁美洲的國家，只有運用游擊戰略才能解放自己。在他這種公開號召之下，拉美的青年們便熱烈地響往古巴及其游擊戰略了。自卡斯特羅強調游擊戰的決定性後，拉美的游擊戰風起雲湧；在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阿根廷等國都發動了游擊戰。這情況甚至影響到第四國際，特別影響了歐洲的一些領導幹部，如利維奧、邁登、曼德爾等。邁登在一九六八年二月起草了一個議案提交國際執行委員會（IEC）討論，並在 IEC 會議上獲得通過，即 IEC 接受了拉美游擊戰戰略，就是說，接受了卡斯特羅的號召。會議上，只有我投的一票是反對票，所以我的反對是徒然。決議案雖然只是草案，但反映了游擊戰略對第四國際一部分領導者的影響。在這種情形底下，我不得不進行鬥爭。

我首先要求社工黨的領導慎重考慮這個問題。否則，第四國際將背棄托洛茨基主義的政綱，走向墮落的道路的。另

外，我寫了《回到托洛茨基主義的道路上來》，這個文件影響了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一些托派。結果，在六九年的世界大會上，對拉美游擊戰問題，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形成了兩派，即後來的多數傾向和列托派。

《回到托洛茨基主義道路上來》內有一小標題：《是卡斯特羅主義，還是托洛茨基主義？》。我強調指出：第四國際有一部分幹部在卡斯特羅的影響下，已走上了游擊戰略的道路。這種分歧，一直到七四年的世界大會，多數派還在保持他們的意見。

這裏，我要著重指出的是：社工黨開始是支持游擊戰略的，後來接受了我的勸告，反對游擊戰。韓生並寫了一篇文章，批評古巴革命問題的草案，很接近我的意見。這種意見一直維持到七七年兩派的統一。從此對古巴問題沒有什麼分歧，因為多數派完全放棄了游擊戰略，承認了錯誤。

但問題又在新的情況下提了出來。從一九七五年開始，到七八年越南佔領柬埔寨。由於古巴支持越南這個行動（因古巴站在莫斯科方面，中國則站在柬埔寨方面），於是古巴的革命作用被誇大起來。

瑪莉——阿麗絲·華達士撰文評論越南和柬埔寨的問題時，一反過去的立場，儘量美化越南。過去，法國支部支持越南、美化越共時，社工黨是和我們一起反對法國的意見的。現在，法國支部修改了原有的立場，倒是社工黨特別支持越南。從前，我們都是批評地支持越南的。自越侵柬戰爭後，社工黨不單不批評越南，而且多少給它加以美化。他們對柬埔寨的看法，也與我們不同。

我們認為，在波爾·布特統治下的柬埔寨是極端矛盾的。一方面，他沒收了資產階級財產，建立了社會主義的財產關係。從這一基本點說，他是一個工人國家。但另一方面，由

於波爾·布特是史大林主義中最愚蠢而又最殘暴的官僚，是個殺了上百萬人的屠夫，因而他的政權是極端橫暴而醜惡、深受柬人民仇恨的專政。從辯證的觀點看，不能否認他的國有財產化的進步性，值得支持；但應該批評他的盲動，如廢止貨幣，停止商業。由於他的醜惡的官僚統治，應當予以儘量暴露和攻擊。但是社工黨的意見不同。它強調官僚專橫罪惡，因而否認了沒收私有財產這個事實，以致認定柬埔寨是個資本主義國家。這種看法很古怪。因為沒有私有財產、沒有商業的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上是不曾存在過的。由於古巴支持越南，社工黨也就跟著支持越南。

最重要的是，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蘇聯派軍侵入阿富汗，這事變使第四國際發生了新的分歧。

社工黨在開始時是完全支持蘇聯進軍阿富汗的，歐洲托派的大多數採取不同立場，要求蘇聯軍隊撤出阿富汗。這一點也反映出在香港的革馬盟內，葉寧支持美國的意見，吳仲賢則同意歐洲的主張。最近，社工黨對蘇軍侵進阿富汗的立場已有改變，多少採取批評的態度了。

### 古巴是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要認清這個問題，就必須先討論一些根本問題。華達士寫的《當權的無產階級領導》一文中說：古巴實行的是無產階級專政。其理由是：古巴的對外政策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政策。現時，古巴支援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就是事實。她過去之支援安哥拉、埃塞俄比亞、甚至派送了軍隊支持她們。這些事實，我們都承認。但是我們怎樣分析和評斷這些事實呢？

首先，古巴本身是不是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這是最基本的問題。社工黨的文件有一種暗示，古巴像十月革命

時代列寧所創立的那種無產階級專政。這種意見雖然沒有明白說出來，但卻是常被暗示著的。我們必須問，無產階級專政是用怎樣一種形式呢？

且不說巴黎公社，就說十月革命吧。十月革命的政權，是建立在工農兵蘇維埃的基礎上。這種蘇維埃，是由工人、農民和兵士經過民主的選舉產生出來的。因而蘇維埃的政權，對資產階級說，是無產階級專政；對無產階級說，是最民主的。像這樣的政權，歷史上只發生過兩次。第一次是巴黎公社，由巴黎公社的社員直接選舉的。第二次，是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權，工農兵群眾直接選舉出來的政權。

古巴有沒有工農兵蘇維埃的組織呢？當卡斯特羅的游擊隊從鄉村打到城市所建立的第一個政權，是與資產階級聯合的政府，像中國一九四九年成立的政府一樣。後來把資產階級排除於政權之外，由卡斯特羅的「七月二十六日運動」，與古巴共產黨合併成共產黨，單獨掌握政權。這政權有沒有工農兵的蘇維埃的基礎呢？絕對沒有。不錯，工人有工會組織，農民或許有什麼組織，——這點我知道的不太清楚。總而言之，古巴沒有像蘇維埃那樣的群眾組織是不可否認的。因此，說古巴是無產階級專政，根據什麼群眾基礎呢？

卡斯特羅的黨組織，是和蘇聯、東歐和中國的共產黨一樣，根本沒有民主，只有集中。像這樣的黨，絕不受群眾監督的。如果古巴可以說是無產階級專政，那也可以說中國、東歐，甚至蘇聯都是無產階級專政了！

我們應該怎樣評斷這些史大林主義的所謂工人國家呢？可以說，古巴的那種專政，較諸中國或東歐好一些。它的官僚沒有那樣橫暴，這是可能的，而且也是事實。但是，無論如何，它的政府人員是由黨指定的，不是工農群眾直接選舉出來的。這個黨，就是卡斯特羅。古巴共產黨沒有民主集中

制，因為它是抄襲蘇聯的。卡斯特羅的話說了就算，在這點上跟中國的毛澤東沒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不同的只是前者更年青、更警惕，後者更昏庸、更橫暴而已。所以古巴不像蘇聯和中國的官僚那麼橫暴、集中，較多地接近群眾。

### 古巴支持的安哥拉、埃塞俄比亞是什麼貨色？

華達士最大的論證是古巴的國際主義。她說得最多的是古巴援助的尼加拉瓜、格林納達、薩爾瓦多，以及過去派軍隊援助的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亞。這裏，我要稍為分析一下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亞當時的政治情況和那些政權的性質。

古巴派遣軍隊支援安哥拉，完全是蘇聯的關係。在葡萄牙革命後，蘇聯支持安哥拉的一派，即 MALF；中國則支援另一派（當時有三派）。後來中國放棄了支持，那些派系便投靠了帝國主義，尋求扎伊爾和南非的支援，因而發動了內戰。古巴得到蘇聯的支持——沒有蘇聯的武器、物質和財政上的支持，古巴的派兵到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亞，是不可能的。儘管如此，這個行動是具有進步的意義，甚至有革命的意義的。因為那些派系已經墮落了，公然投靠帝國主義的陣營，由帝國主義援助在安哥拉進行內戰了。蘇聯和古巴如果不支持安哥拉，她便很有可能被南非、扎伊爾分割，落在美帝國主義的控制下——這是非常壞的。我老早就這樣說：不管古巴是在蘇聯支持下派兵安哥拉，它這行動有進步意義，是應該支持的。那時，倒是社工黨不同意古巴派兵到安哥拉去。

但是，古巴所支持的安哥拉的統治層，不是社會主義者，而是民族主義者。他們從葡萄牙統治下鬥爭出來，雖然得到古巴的支援，免受帝國主義的統治，但他們對左派的社會主義份子敵視的，準備鎮壓的。像這樣的一個統治層對於安哥拉的社會主義的前途是最大的障礙。因為，這個統治層害

怕改變財產制度，堅決地維持著資本主義；在這樣的制度下，一定要發生社會主義運動的——現在可能已經發生了——這統治層在未來一定要壓迫這運動，以保持私有財產制的繼續存在和發展。假如古巴的軍隊那時還沒有退出安哥拉，它將處於極端尷尬的地位；假如它繼續支持現在的統治層，甚至起反革命的作用。

埃塞俄比亞較諸安哥拉大得多，古老得多，也有文化得多，這個國家經過了反對君主專政，趕掉了皇帝；這無疑是有進步意義的。現時的統治者就是當時發起反對君主專制的領導者。這群人最初受到了美帝國主義的支持，後來轉向了蘇聯——他們為什麼有這個轉向，我不很知道，可能是因為蘇聯給他們某種好處。蘇聯曾經幫助埃及建水閘、送軍火，派軍事顧問訓練軍隊，企圖以此拉攏埃及，但結果是沙達把蘇聯的所有人員趕走。蘇聯又在薩莫拉和蘇丹遭到同樣的失敗。因此，蘇聯拼命在埃塞俄比亞動手腳。美帝國主義那時雖然支持埃塞俄比亞，但它對被支持者是不客氣的，這或許是埃塞俄比亞轉向蘇聯求援的原因吧。因為蘇聯不僅給埃塞俄比亞以軍火和物資，而且對那個國家的統治層盡力買好。

在埃塞俄比亞國境內的東北部，有一個名伊利杜利西的少數民族，約三百多萬人口，對新當權者是一個威脅，所以新政府靠攏了蘇聯，蘇聯就要求古巴派軍隊支持它。那時候，埃塞俄比亞和薩莫拉發生了衝突，古巴的軍隊支持了前者。埃塞俄比亞的統治層比安哥拉的更壞。他們是原來皇朝的軍人，生活很腐化。他們雖然在推翻皇朝後進行了部分的土地改革，把舊時皇家土地和一些大地主的土地分給了農民，但是繼續保持私有財產制度。為了鎮壓為數三百多萬的少數民族，要求古巴軍隊的支持。在這點上，古巴不敢派自己的軍隊去攻打這個少數民族。這群統治者敵視青年、學生、左派

分子。將來他們一定像蔣介石一樣鎮壓群眾運動的。古巴支持埃塞俄比亞，比支持安哥拉更壞，因為前者既沒有受到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反動勢力的進攻，又保存著私有財產的關係，甚至殘酷壓迫少數民族，是非常反動的一個政權。卡斯特羅對此很尷尬，因而沒有派軍（而只是供應軍備）攻打那個少數民族。

從前蘇聯也曾幫助過中國的。它以大量的金錢、顧問和軍火等支持國民黨的蔣介石和汪精衛，結果怎樣呢？埃塞俄比亞那些軍人是不是像蔣介石一樣的貨色呢？很難說。沒有人敢保證不是。所以，這些所謂國際主義的支持，是應當弄清楚。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要問，是支持什麼人？是革命群眾，還是資產階級？很明顯，古巴所支持的是資產階級而非革命的工農群眾。因為埃塞俄比亞很明顯的是資產階級居於統治地位。這樣一種「國際主義」實在大有問題。這一點，韓生的《古巴在非洲的角色》（見一九七八年九月號《十月評論》）裏的意見和我們的很接近。社工黨現在卻不再提這篇文章。

尼加拉瓜和格林納達都是小國，不能起重大的作用。格林納達只有十萬人口，而尼加拉瓜也不過二百萬人。不過，後者在中美洲的國家中，如薩爾瓦多、危地馬拉和洪都拉斯等國會起一種爆炸性的作用。這些國家一向受美帝國主義控制、剝削、非常窮苦，所以很容易發生革命。尼加拉瓜的美國傀儡蘇南沙政權正因為太壞了，致使人民不得不起來反抗——像過去古巴人民對巴蒂斯達一樣。我們當然應盡力給以支持、推動這些國家的革命，不管它們有何弱點。但我們亦不應將它們美化、誇大，說它們的影響足以轉移世界局勢。

我們說，這些地區的革命對美帝國主義是一個打擊，因此我們希望這些國家向社會主義發展。我們必須明白這些國

家太落後，工人的數量非常之少，是很難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至多只能建立古巴式的政權。

古巴支持尼加拉瓜革命是很自然的；因為它在拉美太孤立了。它當然需要其他各地革命的援助，幫助這些國家即幫助它自己。

必須記著，這些國家在拉美政治上不能起決定性的作用的。假如這些國家的革命能繼續發展，當然對拉美國家可以發生一些影響和作用。但在拉美能夠影響整個局勢的國家只有幾個，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阿根廷雖然國土不大，人口不多，但它是工業化的國家，有相當大的工會組織，因而它在拉美的政治影響大。墨西哥有六千萬人口，工業也有相當基礎；巴西則國土更大，人口更多（一萬萬）。當然，我不是說其他國家如委內瑞拉、秘魯、智利、玻利維亞、哥倫比亞等國的革命沒有作用，不過它們較諸前指的三國不能起那麼決定性的作用而已。

因此，第四國際應該在拉美的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等國家內建立群眾黨，領導工人階級進行革命。但是，社工黨的態度相反。由於和莫利洛派的分裂，社工黨對拉美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失望，因而只看到古巴、尼加拉瓜及格林納達這些國家。他們對拉美的國家沒有一個全盤的看法和計劃；試想想，如果我們能在墨西哥、阿根廷等國建立一個強大的支部，將比尼加拉瓜的革命更有作用！

如上面所說，古巴由於在西半球孤立，當然支持尼加拉瓜的革命，並盡可能把尼加拉瓜等置於它的影響之下，成為古巴的衛星國。但古巴支持這些國家，還要看莫斯科的態度。莫斯科在這方面是很猶豫的。因為蘇聯若要在中美洲建立勢力，美國勢必起而干涉。它已經警告過，甚至不惜進行軍事干涉。像它現時對薩爾瓦多的態度就是顯例。莫斯科官僚的

態度很猶豫，它只想通過古巴去行動。

因此，可以說，古巴的國際主義是在蘇聯官僚的影響下，由蘇聯的對外政策所決定的。蘇聯對外的基本政策是：不要革命，尤其不要先進國家的革命。但她要動些手腳，使美國爲難，以提高討價還價的籌碼。這就是她在非洲的埃及、薩莫拉、埃塞俄比亞等國所進行的活動的意義。古巴在蘇聯的這樣一種控制下，不能有多大的活動空隙的。

什麼才是國際主義政策呢？列寧和托洛茨基成立第三國際，通過第三國際在各國建立共產黨，幫助革命。至於列寧對落後國家的政策，不是簡單地幫助資產階級，而是要通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走上社會主義革命。在先進國家則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是非常明白的，毋須贅述。

卡斯特羅又怎樣呢？他強調幫助被壓迫民族。對的。列寧曾認定落後國家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極重要因素。因爲這可以削弱帝國主義，可以幫助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革命，同時就是幫助被壓迫民族通過民主革命走上社會主義革命。但是，卡斯特羅根據的是什麼呢？他只仰望著蘇聯。但蘇聯在史大林主義官僚的控制下，已成了一個反對世界革命的反動的國家。現在世界上有兩個反動大本營：一是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國家，一是以蘇聯爲首的墮落和變態的工人國家，後者甚至比帝國主義還要殘暴，她控制的東歐就是一個例子。不消滅在兩國的反革命力量，是談不上有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的。卡斯特羅說，沒有十月革命就沒有古巴。這種說法一半是對的。十月革命產生了一種新財產關係，在這種關係上能幫助古巴。可是，在這種財產關係上所產生的毒瘤——官僚專政，他卻一句話也沒有說。這個官僚專政妨礙著世界革命，起著最反動的作用——這點，卡斯特羅也沒有說一句話。他完全不懂十月革命早已被叛變

了，十月革命所留下的只是國有化的財產關係，但這種國有財產完全被官僚控制、把持；官僚不過爲了自己的利益，偶然幫助某些國家，以此來同帝國主義做買賣。

卡斯特羅完全不提這點，因爲古巴需要靠蘇聯支援，不然就不能生存下去。因而，卡斯特羅不敢說蘇聯官僚專政的真相，或許可以原諒。可是，我們社工黨的領導人也不提，也跟著古巴一樣隱瞞蘇聯真相，那便不可原諒了。這種做法，客觀上背叛了托洛茨基主義，因爲太過分遷就卡斯特羅了。

最後，我有三點總結：

第一，社工黨強調古巴國內沒有官僚制度。

古巴有官僚，沒有人否認這點，社工黨的文件也承認有。當然，官僚應和官僚專政分開。在落後國家的革命是不可避免地會存在官僚的；只有先進國家無產階級占多數，工人文化水準高，才能建立最民主的無產階級專政——對工人來說是最民主的，對資產階級則是專政。古巴的官僚情況是否嚴重到成立一個官僚專政或獨裁呢？如果發展已到達一種獨裁的程度，那就要以政治革命來推翻這個官僚層了。社工黨內有一位年青同志寫信給我，表示認爲古巴已產生了一個專政的官僚層，需要政治革命推翻它。我對這個問題的考慮非常慎重。我認爲，古巴是存在著官僚制度的——因爲它根本沒有蘇維埃式的組織。沒有無產階級的民主選舉，政權就必然由官僚的方法產生；問題是這個官僚制度發展到怎樣程度。那時，我答覆這位同志說，關於古巴官僚制度發展的情形，我得到的資料不多；不過，對於古巴存在著官僚制度，這是可以肯定的。但它還未走到像蘇聯、中國那樣僵化。因爲古巴的人民還有一定程度的民主。

韓生的一篇文章，表示古巴的軍隊存在著官僚制度。這是很自然的。因爲軍隊裏有等級制度，容易發生官僚化。該

文還提到一個被捕的詩人 Patilla，被迫悔過。這個事實是值得重視的。因為蘇聯、中國都是這樣迫害異議者，不容許一點民主、自由，不容許任何不同意見，或任何不同觀點，包括文藝方面。

後來，有些社工黨成員訪問古巴回來，說那裏的人民有活動自由等等，我想這是可信的。卡斯特羅不像史大林那樣專橫，沒有毛澤東那樣粗暴；他有一點聰明，知道古巴只是個陷於極端孤立的小國，不能對民眾過分壓迫。否則，古巴就很難生存下去。

所以，我不贊成那種說法，即認為現在就需要用政治革命來推翻古巴的政權。不過，我也不同意那些人，認為古巴不存在官僚制度。那個詩人的逮捕，是有著象徵意義的。還有，古巴國內沒有蘇維埃，黨內沒有民主集中制。後來就只有卡斯特羅發言，他好像古巴的小皇帝，他的說話就變成聖旨。這種情形，明顯是官僚制度的表現。社工黨太美化古巴了，因而忽視了它的官僚主義的事實。

第二，社工黨認為古巴已實行著無產階級專政，實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沒有官僚制度，就像列寧時代的蘇聯。他們甚至把列寧和卡斯特羅、十月革命和古巴革命並列起來。

古巴革命和十月革命，有什麼共同點？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十月革命，是經過了幾十年的準備，從普列漢諾夫創立勞動解放社，後來建立社會民主工黨，經過許多嚴重的思想鬥爭，尤其是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鬥爭，不斷革命論和階段革命論的鬥爭；後來，又經過世界大戰，對本國帝國主義的態度更成了決定性的鬥爭，發展了最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如列寧和托洛茨基所代表的。因此，十月革命才能基本上按照從前說過的話順利進行；臨時的決定，只是從過去的

思想基礎上派生出來的。所以，十月革命是一個典型的無產階級革命，在徹底的馬克思主義領導之下，由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在一個龐大的國家裏進行了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震動全世界，改變了人類歷史的方向。

古巴革命是怎樣的呢？在革命前，卡斯特羅是個民主主義者，甚至是個人道主義者；沒有受過馬克思主義的任何訓練。受到中共一九四九年革命勝利的影響，進行了游擊戰爭。在一種特殊情況下——即美國來不及干涉以前，領導著游擊隊走上了政權。這是一個小資產階級革命。只有在奪得政權後，爲了獲得其他國家——即蘇聯的援助，才和共產黨合作，搞一點馬克思主義。卡斯特羅是一個行動性的——亦即進行游擊戰爭的人物。現在社工黨的領袖強調自己是行動的，那就是強調游擊戰爭。他們不明白列寧的說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卡斯特羅原來是個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者，即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激進派。由於巴蒂斯達的過分腐敗，才僥倖地得到了勝利。但勝利後還和資產階級合作，建立聯合政府。只因爲資產階級威脅著他們，才迫不得已把資產階級排除出政權之外，成立了自己的政府。但這個政府是沒有經過無產階級的民主方法選舉的。所以，古巴革命和十月革命相比，是無從比擬的；把列寧和卡斯特羅並列，簡直是貶低了列寧。

一定要指出這點，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一個人如果不懂十月革命，不懂蘇聯的墮落，不懂托洛茨基和史大林的鬥爭，這種人根本就談不上是馬克思主義者，而只是一個糊塗人，只能簡單背誦馬克思、恩格斯的詞句。卡斯特羅從來不提托洛茨基的名字，在一九六三年還侮辱托洛茨基主義者，誣衊社工黨人爲美帝國主義的特務。

第三，就是古巴能否領導世界革命的問題。這是一個中

心問題。

華達士在文章內沒有說得很清楚。但我在另一些場合，聽說過社工黨提議，第四國際應該和卡斯特羅合作領導世界革命。華達士的文章也反映了古巴走上領導世界革命的道路這個觀點。

這是一個中心問題，將影響全人類的命運，是非常嚴重的。

托洛茨基主義與卡斯特羅的傾向根本不同。對於卡斯特羅，我們只能這樣說：由於直到今天，他仍是向革命方向走。因此，我們應該批評地支持他。但和他一起來領導世界革命，則只是說笑話而已。

因為卡斯特羅根本沒有一個世界革命的政綱——如果有的話，只是那種援助安哥拉、埃塞俄比亞的行動。對於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的政綱——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他是完全不懂的。

蘇聯墮落已經半個世紀了。蘇聯官僚對本國工農的壓迫，以及對東歐各國人民的壓榨，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對這些事實不發一言的人，如果不是個蠢才、瞎子，那就是故意要為蘇聯的官僚掩飾。卡斯特羅掩飾蘇聯的官僚，如果為了獲得蘇聯的物質援助，那還可以原諒。但是，對世界革命來說，蘇聯的官僚專政是絕不能掩飾的。現時世界革命是有兩種革命，一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包括先進國、落後國家）裏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一是在工人國家進行政治革命。受官僚專政壓迫的人民占了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進行這兩種革命是在《過渡綱領》上明確地寫著的。卡斯特羅會不會同意在蘇聯進行革命呢？會不會同意東歐各國推翻蘇聯官僚壓迫的統治，建立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呢？極難。因為這樣就要根本破壞蘇聯官僚對它的援助。你想卡斯特羅能夠這樣做

嗎？如果我們爲了遷就卡斯特羅，按下蘇聯集團的政治革命不提，那就是根本背叛了托洛茨基主義，背叛了第四國際，投降了史大林主義，變成了史大林主義的俘虜。

要不要堅持第四國際綱領上的兩種革命呢？卡斯特羅能不能贊成革蘇聯官僚的命？這兩個問題，是社工黨的領袖們必須回答的。

（亞立記錄）

## (附錄 1)

## 陳碧蘭：給劉毅同志的信

(一九六一年四月廿九日)

親愛的劉毅同志：

讀了你二月二十五日的來信，其中充滿了對我們流亡國外生活的同情與感慨。我深深地相信：你的這些感慨，決不是出於一時「動感情的時候的」，而是「經過長久思索」，根據我們多年來的困苦情況而流露出來的真情實話。由此便可想見，你對於我們生活的瞭解和愛護之深了。我們異常之感動，而獲得了極大的安慰！

我們在歐洲的生活最艱苦的時期，是在巴布洛對付我們的時代（見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五日我給你們全體同志的信）。自反巴布洛運動發動之後，我們不但在政治上是完全勝利了；而且在生活方面經過一個時期的困難之後，也從此獲得了某種限度的改善，因除李瓊（Jane）以外還得到美友的援助，擺脫了饑寒的威脅，而得到勉強維持生活。隨後又獲得在加拿大的本國同志的幫助，我們的生活便更穩定，有可能相當注意營養和健康了。你所深深記憶的那種啃乾麵包喝自來水的生活，僅僅是在與巴布洛開始鬥爭的一個短暫的時期。像那樣的生活，不要說我們是有相當年齡的人不能繼續下去，就是年輕人也是不能忍受的。

上次給你的信中，隨便提到我們自己動手修整居室的事。這並不表示我們的困苦，而是證明我們的生活是有可能在改善了。因為以前屋頂的破爛，下雨時水滴在床上，我們無力修理；只將雨衣蓋在床上，這樣過了幾年。至於自己動手粉刷房屋，作這類的事，這在歐洲並不稀奇。歐洲人除了

真正的有錢人以外，這類的工作多半都是自己動手的。不過我們因過去沒有訓練，同時年齡稍大一點（尤其是述之），所以覺得特別吃力而已。

我們在歐洲的生活雖然艱苦，但最困苦而時間最長久的還是在國內。由於你的來信提到我們一生的生活，勾起了我的回憶。自一九二七年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後，我們的生活便經常陷入窮困、遷徙、恐怖與逃亡的狀態之中，曾有許多次是在千鈞一髮的情景中得以脫險的。尤其是自一九二九年一起我們轉入托派的初期，因述之把全部的時間和精力都花費在運動方面，以致將維持生活的唯一手段——譯書的工作常常停頓下來；同時我也不能在社會上找職業，因而我們的生活便更陷入狼狽不堪的境地。我常常到米店去賒米，經常踏當鋪的門。尤其當馬玉夫叛變，說出我們的地址之後，我們（連同四歲的莉莉）匆促地逃出來，全部的衣物、書籍和傢俱都丟掉，連一件換洗的衣服都沒有。以致在極無辦法之時，即連想進當鋪得到幾角錢的可能也沒有了。這樣的生活一直到一九三二年秋述之被捕時差不多常常是如此。

在述之被捕後，我便開始寫作，從賣文得到一部分的生活費用（初期友人幫助一些）。從經常賣文的過程中，獲得了社會上某些沒有政治偏見的文化人士之同情，因而找到固定的職業。不但自己的生活穩定下來，而且還有可能養活和教育兩個孩子（在港的玲兒是述之被捕後出世的）。這樣的生活整整過了五年（因述之在監獄中整整五年）。及至一九三七年日軍進攻上海，「八一三」事件爆發後，我便失業，接著述之便從監獄出來。幸而我已經建立了一些朋友關係，由於那些朋友對我們的尊重和同情，於是便由他們幫助我們最低的生活費用。隨後朋友關係逐漸擴大，不但生活勉強夠溫飽，在當時日帝和汪精衛漢奸統治的敵偽時代，數口之家夠溫飽已

經不易，而且還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書籍，如托洛茨基著作（這些在《評王凡西自傳》中有較詳細的敘述）。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全面和平之後，當你見著我們時，我們的情形，不論私人或事業方面的，較之以往都大大不同了。我們辦了兩個雜誌，經常開討論會和演講會，發展很快，你是經常參加而知道的。可惜好景不長，我們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離開上海到香港，不久又開始過著流亡的生活了！

在一九五〇年一月，由於英帝國主義者對我們的追捕，經組織決定述之、家良和我，遷移越南，其他領導成員則仍留香港。我們全家到達越南，在那裏住了一年半。初期因生活無著（僅僅靠莉莉補習英文維持），受盡了困苦和艱難。尤其在住的方面，因房租很貴，一家五口擠在一間小房子裏，每當夜晚幾張帆布床都伸展它的四腳時，就無法走動。氣候又異常炎熱，經常缺乏水，為著準備第二天的用水，我要一點一滴地弄到半夜，生活簡直像地獄一般！及至述之和我找到教職，莉又找到較好的職業後，生活的困難雖減輕了，但由於家良的遭遇，述之的安全又受到嚴重的威脅。於是我們寫信給瓊，請他轉告國際，準備述之一人前往歐洲。但由於國際建議我也同去；因而我們便準備帶著兒女（因需莉翻譯，小兒子太小無法丟下，只丟下大兒子一人在越），一同前往歐洲。雖然如此決定，但這筆龐大的旅費，如果沒有你們的大力援助（一小部分由一友人幫助），是無法成行的。當時為焦勵夫負責，他盡全力主持和推動籌款運動，同志們也異常熱心捐助（聽說你為此竟把結婚的一套衣服當掉，我們非常感動）。由於你們這種自我犧牲精神的援助，述之便脫險了，我和兒女們也因此同來歐洲。

到歐洲之後，由於房子很貴，我們在一個長時期中，還沒有固定的住所。及至一九五二年年底，巴布洛才決定將述

之和我兒子三人安排在一間越友曾經住過的三層閣樓裏。不管條件如何之壞（甚至房間裏沒有水，必需到樓下去提，廁所也在樓下，下去要經過一段露天走廊，冬天異常之冷），但我們總算有了棲身之所，也就心滿意足了。但異常不幸，約摸住了兩個星期左右，就有一個年約三十左右的中國男子來訪問我們，他聲明是來找中國同志的。當時莉正在我們的住所裏，她去開門，她因該人來歷不明，所以拒絕他入內。我們後來從看房子的（即門房）那裏得知，這個男子在未來找我們之前，就先在那裏詳細地問過我們的履歷（因進來居住要填履歷表）；同時，在我們閣樓的正對面，住著一對夫婦，男的為共產黨負責者，每當我們或來人出進時，對面房子的人總是掀開窗簾注視我們，歐洲人從沒有這種行動的。我們起初以為他們是由於好奇，後來便有點不安的感覺了。最後我們才知道原來就是那個中國男子的合作者。過了十天之後，那個男子又來了，因第一次來訪問我們碰了壁，故不直接來找我們，便到第二層樓去找我們的越南同志。原來越友在那裏住了多年，且大家素知他們為托派，我們住的那間房本是他們多年來會議和作技術工作之用的。當時越南同志在法國將近百人，大都在雷諾大汽車公司作工人，他們較法國同志慷慨，在經濟方面對國際有很大的貢獻，在技術方面也儘量努力，即對我們也熱情幫助，他們將自己的房間讓我們住，自己則打游擊。因此，我們一住進去就容易被史大林黨所發現。否則，在別的地方是不容易發現的。那人聲明他是負責為中國人找職業的。當越友詢問他的住址時，他卻支吾其詞，說他一個月後再來（他說：「一個月後再來」，是詭計，事實上兩星期就來了）。恰在這個時候，我們的兒子到越友的房間去，他貪婪地問我兒子的姓名、籍貫、有兄弟姐妹幾人等。我們的兒子因不知道他的用意，便如實地告訴了他。

他得知了確實的情形，便滿意而去。那時正好歇爾曼在我們家裏，越友將這些情形告訴他，他說很壞，大家都覺得情形非常嚴重。他並慎重聲言，次日即將此事告知巴布洛，設法使述之立即離開住所。巴布洛將這一使命交給法國支部（少數派），叫他們安排此事。但兩星期過去了，此事卻杳無消息。

恰在過了兩個星期之後的一個早晨（十時左右），忽然敲門之聲甚急，像是公務人員（如郵差、看電燈、煤氣表等公務人員）之類的緊急敲門聲，這是運用偵探術來一個心理上的突擊，使腦子來不及轉念頭就去急速開門。我便迅速地去開門。當我在未開門之前，用法語問「是誰」的時候，外面的人卻用很小的聲音且用中文回答「是我」。顯然是冒充我們自己的中國朋友。我因回答的聲音很小，分辨不出是誰，以為是何伯瓊提早來此（原約他當日下午來的）。可是當我們開了門之後（只開了一小部分，手還拿著開門的機關），原來一個年約三十左右的陌生中國男子顯現在我的眼前，彼此愕然相視。當時，我用法語說「不是」便迅速地關了門。但在那一瞬間，這人所表現的一些姿態，卻一一射入我的眼簾。他緊緊地倚門而立，右手拿著一件用報紙包著用紅繩纏著約二尺長而面積（圓形）不甚大的東西，正對著門縫。他一見我便驚慌失措，面色發青，嘴唇顫動著，牙齒格格作響，像是欲說話而又說不出聲似的。兩手發抖，一言不發便轉身狼狽而去。本來他選擇的時間，對於他的陰謀是最適當的。他從我們對面他的同謀者那裏得知：每晨十時，我的兒子上學去了，我一定到市場去買食物之類的東西，在外面需一小時以上。這時只有述之一人在家，他上午從不出門。但那天特別例外，我準備十時出門，但只在附近買了一瓶奶就回來了，準備馬上再到市場去。正在準備出去前的一剎那，他就敲門了，他知道我出去了，但沒有看見而且想不到我這樣快就回

來（因從來沒有過，對面注視了一個多月）。所以當他看見開門的人是我而不是他所要施行謀害的對象時，他便驚慌失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知道房子裏有兩個人，不利於他的行動，於是便驚慌狼狽而去。假如那天不是特別例外，例如只述之一人在家，那便不堪設想了！（只要像我一樣將門開一點就夠了，因他的準備很準確，只一舉手就會中）想不到他在歐洲又經歷了一次風險！他是常常扮演驚險鏡頭的角色，在他的一生中，扮演這類角色竟有十次之多了！如果單從這一點來說，他真是一個幸運者！

當日下午，何果然來了，莉也來了，原來我們約定討論問題的。我們鑒於這種嚴重情形，不管經濟如何困難，述之絕不能在此繼續住下去，於是便決定立即離開住所。在暮色蒼茫中，何領著他離開了這危險的地帶，暫尋旅館居住。爲了斬斷線索，我和兒子次日也離開那裏。

這件事直到現在爲止，還不曾告知你們當中任何一人，因我覺得當時你們的環境惡劣，情緒不佳，不願意把這件已經過去的事來擾亂你們，更加重你們的精神負擔。這次由於你的信，觸動了我的想像力，它就像一條鑰匙一樣，打開了記憶之門。不論是快樂的或痛苦的都一齊湧現出來。沿著這一些線索的發展，便不知不覺地寫到這件事上來。現在事過境遷，你們就把它當作一個故事看吧，不要過分擔心，我們還是要隨時留意的。

總之，從一九二七年起直到現在，已整整三十五年。在此悠長的時間內，我們的生活經常陷入貧窮、驚險與流亡的狀態！人生最寶貴的青春與壯年時代，完全消耗於此種生活之中！但我一點也不惋惜。我深深相信：它決不會白白地過去的，至少也要留下一點痕跡。對這一點，我們都抱著「宿命觀」的。因爲我們深深懂得真理與現實生活的矛盾，凡是

爲崇高的理想而奮鬥的人，在真理還沒有獲得最後勝利之前，他們的生命總是坎坷的。正如你所說：「……在我們這個時代，一個人願意爲真理而犧牲一切，願意爲被奴役的人向改善生活方面走的人，他們的境遇多份都是艱險的，他們的命運多份都是坎坷的……」莎士比亞說的「甚麼都比不上厄運更能磨練人的德性」這句話，我是從幾十年來的實際生活中體驗到的。每當我遭到任何打擊和痛苦時，總是作如是觀，總是以極大的耐心來面對它。我深知道：「一個人越是缺乏擔負痛苦的勇氣，痛苦壓在心頭越是沉重」（莎士比亞語）。這是比抱著「宿命觀」再進一步地採用了辯證哲學的方法，從痛苦中去磨練自己的德性，鍛煉自己的意志。只有這樣，才能平衡自己的精神狀態，才不致爲痛苦壓倒，而卒至減輕痛苦。

我們來歐洲將近十年。雖然歷盡了人生的困苦與艱辛，然而從另一方面說，也是富有意義的。雖然在將近八年中，我們將大部分的時間消耗在爲生活的計件工作上，但這是沒有辦法的；我們因此維持了一部分的生活，培養兒子讀書。同時述之還是盡可能的爲運動作了一些事情。在國際方面，他寫了一些關於中國問題的文件，有相當的貢獻。最重要的是參加了和干涉了國際的運動。在反巴布洛的修正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鬥爭中（巴的官僚主義是我們首先發現的），曾起了相當的作用。現時還正在爲國際托洛茨基主義統一而努力。這些，我們還是相當滿意的。當然，假如這幾年中，沒有做工，將那大部分的時間（最近兩年來作得少一點）用來爲國際爲本國的運動多寫一些東西，同時寫自己準備寫的著作，那就更好。但話又要說回來，假如沒有那種工作，在反巴布洛的後一段頗長時期內，是無法生活下去的。因此，我們並不爲此惋惜，而且我們從沒有把它看作是一件痛苦的事，寧

可說是把它當作一件僥倖的事。因為述之和我的年齡和語言的關係，除此之外，絕無可能找到其他工作。現在我們準備在不久的將來放棄這工作，僅僅是因為我們已上了年紀（當然還是由於各方面的援助才有這個可能），我們想利用我們有限的在生之年，為運動多作一點事情，寫出我們所準備寫的東西。否則，再做一二年工，我們的體力也許還能擔負得起。

從各方面的觀察和體驗，我深深地感覺到：歐美無論那一個國家，做托洛茨基主義者固然艱苦，但比起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來，我認為他們還舒服得多哩。不說別的，他們的組織是合法的（例如法國，即在特戈爾上臺以後還是如此）。因此他們可以用公開的名字、住址登記出機關報，可以用組織的名義租借會堂開會（這是在特戈爾未上臺前），可以同普通人一樣在社會的各部門做職業。所有這些，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是不能同日而語的。他們不但經常有被捕的威脅，甚至有生命危險。有許多知名的人，不但不能在社會上找職業，即賣文譯稿還要化名，更談不到公開開會和公開登記辦機關報了。何況歐美國家一般的生活水準比中國高得多，因而他們之間的生活也是不能比擬的。正因此，我在一九五九年二月回答你關於丁毅同志逝世的信中有一段說：

「他參加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已二十餘年。在這漫長的歲月中，經常過著艱苦窮困的生活！從他那消瘦的身軀和灰白的面容上，便充分地刻劃著營養不良的痕跡。正因此，才致使他染上了一些致命的疾病而卒至吞噬了他。這便象徵著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之無比艱苦與難於忍受！他雖然長期處於極度困苦的生活中，可是他的態度總是那樣地平靜而處之泰然；這又充分地表現著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之特有的吃苦和忍耐的精神。我常常這樣說，尤其來到歐洲後，更常常地感覺到：做一個革命者固然不易，做托洛茨基主義者更難，尤

其是做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更是難上加難。正因此，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便更值得自豪了。」

我說「做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更是難上加難」這句話，並不是隨便說的，也沒有一絲民族的偏見（這是國際主義者不會有的）或任何強調，而是有其真實的內容，是有血有肉的，是從歐美各國的革命者尤其是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實際生活中體驗出來的。因此，我們常常紀念那些在大陸曾經遇難的戰士，和現在還在囚禁中的同志——他們物質上與精神上的痛苦自不必說。你們的境遇雖然比在囚禁中的同志們要好得多，但你們處在這個孤島之上，一方面要設法謀生，同時為要作點事情，還有被捕驅逐出境的威脅。你們多年來（尤其在我們離開後的初期）在這個艱難與極有限的時間和精力的條件之下，多少還為組織作了一些事情。因此，當工作不能正常，當某些同志一時表現消極時，我們總是採取原諒的態度而不可苛責的。這是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應有的客觀態度。

此外，你說除了閱讀其他書籍外，還看了一些文藝作品，並看完莎士比亞戲劇全集。我也是利用一些零碎的時間（因太零碎的時間不能看嚴肅的書），閱讀了一些文藝作品，並仔細閱讀莎氏的戲劇全集二次。我認為其中寫得最好的，還看過二次以上。我以前雖然看了一些歐美各國作家的文藝著作，如德國的歌德、俄國的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法國的巴爾扎克、羅曼羅蘭……以及美國的辛克萊等的名著。其中除了辛克萊的石炭王、煤油和屠廠三大巨著，我認為它們只有社會學的價值而沒有文藝價值之外，其餘的作品都各有其時代和文藝的價值，各有其獨自的風格和優點。但我認為，莎士比亞的作品，不但有時代的和文藝的價值，而且其中充滿了智慧。每一個人物典型的刻劃深刻而細膩、說話恰合身份，就是罵人的話也很聰明，因此，我認為莎氏的作品最為偉大

和超卓。托洛茨基說「莎士比亞揭開了人類的天靈蓋」這句話，我以前還不能深刻地體驗（雖然以前也看過一些莎士比亞的作品）。經過這次仔細閱讀莎氏戲劇全集之後，我才真正瞭解托洛茨基這句話，是經過細心研究莎氏的作品而得出來的精確評價。實際上，他這句評價的本身，也就是人類智慧高峰之一種體現。

最近三個星期來，因述之趕寫關於國際統一運動的文件，較少做工，因而我較以前多有一些時間來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準備繼續寫《我的回憶》。同時你的信也還是談到我們一生的事業和生活問題，因而我就順便在回答你的這封信上，用粗線條劃了一個輪廓。

最後，你說本來想談三個問題，還有甚麼問題，儘可來信提出，我是異常樂意和你討論的。雖然筆談極有限制，不及面談來得自由而痛快，但這是無法克服的。我們和你們遠隔重洋，暫時只能如此。但我相信：無數世事的變化，孕育在時間的胚胎內。我們等著吧！只要一有可能，我們便會回到東方來的。即令不能住在自己的國土上，也有可能和你們見面暢談一切的。

此致

革命的敬禮！

碧蘭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 (附錄2)

## 評胡適之的實驗主義與改良主義

(一九三一年)

〔這是一年前評胡適之「中國到那裡去」的舊稿之一段，今全文雖失，但此段倖存！並且此段係批評胡適之的政治主張之根本立場，即他的實驗哲學，所以直到現在還沒有失掉它的時間性。今發表出來，對於幫助讀者了解胡適之的哲學及其政治主張當不無多少益處罷。〕

胡適之一向自以「實驗主義者」標榜於世，而且在歷史上(「五四」運動時)他曾替實驗主義在中國作過廣大的宣傳，散佈過廣大的影響，即在他本人的「言行」方面，數年來亦曾相當遵守他那「實驗主義」的立場(如在曹錕吳佩孚統治下實驗他的「好人政府」主義，在段祺瑞的善後會議內實驗他的……現在又在實驗他的「人權論」等)，換言之，胡適之的言論行動是「一貫」的，有系統的，都是源於他那根本出發點的實驗主義而來的。所以我們要想批評胡適之現時所提出「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主張，你不能不將他所依據的根本立場——實驗主義，加以相當的檢閱。

實驗主義(Prognatism)究竟是一種什麼「主義」，它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裡代表一種什麼傾向，有何作用？這些是我們應當明白了解的。但要了解這些問題，則對於全體資產階級哲學思想(他們的宇宙觀)的替變及實驗主義產生的時代和環境，必須簡括說明一下。我們知道，任何意識形態(Ideology，哲學也包括在內)都是環境的產物，並且是隨著環境的變遷而變遷的。歐洲(也可以說是世界)資產階級的

全部哲學思潮史，如果以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即以費爾巴赫為標界來劃分的話，那我們顯然可以看出，費爾巴赫以前的哲學，自英國十七世紀盛行的「經驗哲學」（此派哲學接近於唯物論，其主要的代表為倍根，霍布士，洛克等），法國十八世紀的「唯物論」（此派又稱為百科全書派，其主倡為拉美德黎，狄德洛，霍布巴赫等）直到德國的古典哲學（以黑格爾為代表），就一般說來，都是進步的，走近真理的，帶有革命性的（自然其中也包含有妥協性與反動性，這乃是資產階級的本性使然）。因為當時資產階級還要在中世紀勢力壓迫或妨害之下，還沒有取得統治社會一切必需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權力，即還須與中世紀勢力鬥爭，他們在思想上便不能不追求一種比較進步而有力量（切近真理）的武器，而且在實際鬥爭中也必然會產生這樣的武器。英國的「經驗哲學」與法國的「唯物論」，就是代表當時資產階級的意識反抗中世紀的「煩瑣哲學」，神學及一切傳統思想之公開標幟；而德國的古典哲學，雖然表面上帶著折衷的，晦澀而艱深的「純粹哲學」的面具，然而始終沒有失掉它在歷史上的「偉大與革命性」（見恩格斯「論費爾巴赫」），而且正因為如此，這一派哲學理論上的深造，在資產階級哲學營壘裡竟達到登峰造極的地位（如黑格爾的辯證法）。由此產生費爾巴赫的唯物論，由此德國的古典哲學自身，即一般資產階級的真正哲學，於以告終（見同上書），無產階級的辯證哲學於以開始。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辯證唯物論就是在這個歷史的轉變時期形成的。這個時期是歐洲資產階級取得最後決定的勝利的時期（如英法資產階級），同時也就是他任歷史上第一次見到他的新敵人（無產階級）企圖單獨奪取政權，根本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一八四八年法國巴黎的工人階級）的時期。從此資產階級看待敵人的視線轉換了方向，以前主要的

唯一的還是中世紀的封建勢力，此後則完全轉到無產階級勢力一方面了。所以此後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盡力與他的舊敵人（一切舊勢力）妥協，公開實行反動，盡量打擊和防範他的新敵人。在思想方面，則資產階級的一切哲學傾向或派別，都集中其注意力與活動於底下一個中心問題：如何才能從唯心論上去擁護資產階級社會和資本主義秩序，以反對社會革命？即如何才能使人們普遍地根本地確認和支持資產階級的社會和資本主義秩序？即如何才能更有效地防禦那對於現存秩序觀念上的最大仇敵——辯證唯物論？自然，資產階級除了防範辯證唯物論這個大敵之外，他們自身還須設種種方法，依據各自所處的環境造出種種哲學體系，以圖鞏固和加深他們對於現存秩序的信念，並以之蒙蔽其他階級的群眾。但無論如何，他們在本質上是保守的，反動的，只能回顧昨日，再沒有勇氣瞻望前途，探尋真理；他們已經被困定在一個狹小的圈子內，只能對現存秩序作些無謂的讚美詞，或無意識的感嘆語，或單純的夢囈；遇到歷史提出真實的問題時，他們只有對之逃避，仇視，漫罵，甚至瘋狂地反對，毫無聆悟的能力。所以從費爾巴赫以後，歐洲資產階級的哲學不僅完全離開了「唯物論」與「辯證法」，（像狄德洛與黑格爾等曾經提出的）而走到各種各樣的形而上學的唯心論，甚至回復到中世紀的唯神論。如在歐洲大戰以前便已有「反歸康德」的普遍呼聲。迄至歐戰後，因大戰的空前破壞及繼續大戰而起的世界革命，引起了資產階級社會基礎的深刻動搖，資產階級哲學更由「康德」而走到純粹宗教的觀念，甚至乞救於「東方的精神文明」走向極粗野的迷信方面，如信仰降神術，扶乩，靈魂不沒等。這種情形，在大陸德法諸國表現得特別厲害。然而在美國一方面，卻發生了另一種現象，就是實驗主義的特別流行。

實驗主義原本發生於美國前世紀八十年代，半世紀以來，逐漸在美國資產階級思想界形成了一種支配的力量。這派哲學在英國也有很大的勢力，即在歐洲其他各國（如意大利）亦有某種影響。何以實驗主義能在英美發展成爲這樣大的勢力呢？這不是偶然的。因爲歐洲大陸（特別是法，德，奧）自經過一八四八年大革命潮流的激蕩之後，資產階級雖然勉強把他的新敵人鎮壓下去，取得最後勝利，但他自身卻已成了驚弓之鳥，而且工人運動與辯證唯物論的影響，並沒有因資產階級的勝利而消滅，事實上反而日漸增長起來，一步一步地向資產階級進逼。然而在英美的情形則不然。英國自十七世紀經過劇烈的流血革命鬥爭以後，資產階級便逐漸走向政權，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大憲章運動，工人階級與小資產階級雖採取了半革命的形式，但並未曾搖動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而且在客觀上反幫助了英國資產階級對封建勢力取得決定的勝利。即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中，英國亦未曾受到何等重大影響，反而從歐洲大陸革命中獲得直接的鉅大利益（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經濟評論」）。美國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中更是如此（同上），特別從加里福尼亞金礦發現和「南北戰爭」之間，國勢更加蒸蒸日上，又從未遇到工人階級的嚴重反抗。總而言之，自一八四八年以來，像歐洲大陸法，德等國無產階級那樣鬥爭的猛烈及其思想影響之鉅大，在英美是沒有的。因此在英美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上特別富有漸進改良的條件，這正是實驗主義產生和繁榮發展的基礎。實驗主義，從哲學的觀點上看來，是一種變相的中世紀式的「煩瑣哲學」，從經濟的政治的觀點上看來，是一種「法利塞」式的「實利主義」與美國式的「改良主義」。這個學派，在表面上帶著民主主義和似是而非的激進的科學的面具，然而實際上卻是十分保守的，專斷的，反動的，違反科學精神

的。如果我們將實驗主義的內容來稍微分析一下，便可以更加瞭然。

實驗主義所唯一標榜的，也就是它所唯一依據的，是：(一)「實際的效果」或「實際的影響」，(二)「實驗的方法」，或「科學實驗室的態度」。所以實驗主義者便以「實際的效果」，為唯一的最後的尺度去測量實驗宇宙間一切事物和一切觀念。換句話說，實驗主義者觀察宇宙間一切事物和真理，都是看實驗其「對於他眼前有無實際利益」為標準的。實驗主義的開山祖師皮耳士 (C.S.Peirce) 說：

「你對於一個科學實驗家(即實驗主義者)無論講什麼，他總以為你的意思是從某種實驗法若實行時定有某種效果。若不如此，你所說的話他就不懂了」。胡適之稱「他(皮耳士)生平只遵守這種態度」(「胡適文存」，二卷八五頁)。

他又說：

「一個觀念的意義，完全在於那觀念，在人生行為上所發生的效果。凡試驗不出什麼效果的東西，必定不能影響人生的行為。所以我們如果能完全求出承認某種觀念時有那麼些效果，不承認他時又有那麼些效果，如此我們就有這個觀念的完全意義了。除掉這些效果之外，更別無意義。這就是我們主張的實驗主義」(同上書八五——八六頁)。

完成實驗主義哲學系統的詹姆士 (William James) 更將皮耳士的「主張」應用和擴大到各方面。從詹姆士看來，凡「事物」，「觀念」，「信仰」，「真理」和「實在」等之是否存在或有無意義，都要視(實驗)其有無「效果」或「影響」而定(見胡適文存二卷九五——一〇八頁)。所以詹姆士總論實驗主義的方法是「要把最先的事物移到最後的事物，從通則移到事實，從範疇移到效果」(詹氏著「實驗主義」五四——五五頁)。而詹氏論事物的意義是：「一切事物都能影響人生

的行爲，那種影響便是事物的意義」(借用 Ostwald 的話)。「若要我們心目中所起事物的感想明白清楚，只須問這個事物能生何種實際的影響」(同上四六一—四七頁)。

胡適之(中國的實驗主義者)將實驗主義的「效果說」與「實驗法」更加說得具體而露首。他曾舉例說：

「昨天下午北大哲學教授會審查學生送來的哲學研究會講演題目，內中有一個是：『人類未曾運思以前，一切哲理有無物觀的存在？』這個問題，依實驗主義者看來，簡直是廢話(多武斷!)。因為無論我們承認未有思想以前有哲理或沒有哲理，於人生實際有何分別？假定人類未曾運用之時「哲理」早已存在，這種假定又如何證明呢？這種哲學於人生行爲有什麼關係？再假定那時沒有哲理，這哲理的沒有，又如何證明呢？又於人生有什麼影響呢？若是沒有影響，可不是不成問題的爭論嗎？」(見胡適文存二卷八六頁)

他於解釋「觀念」的意義時也是這樣舉例說：

「一個觀念(意思)就像一張支票，上面寫明可支若干效果：如果這個自然銀行見了這張支票即刻如數兌現，那支票便是真的——那觀念便是真的」(同上九五頁)。

像實驗主義者這類以「效果」去「實驗」一切的論據，還可以舉出無數，然而在上面所舉的已經嫌太多了！但「效果」與「實驗」乃是實驗主義的根本出發點，我作為要徹底明瞭實驗主義的根本立場，便不妨多引他們自己的話來作證據。現在我們可以進而分析由實驗主義這種根本立場——效果與實驗——所發生出來的根本謬誤究竟何在：

(一) 實驗主義是狡猾的多元的唯心論。實驗主義者對於宇宙一切事物，既然只注意於其對他主觀上有無「實際的效果」，或「實際的影響」，這樣就顯然在根本上否認了「事物客觀存在的意義」。在實驗主義者看來，無論任何事物，對

於「人生」(實際就是實驗主義者)有「影響」有「效果」的才算存在，才有意義，反之，就不能存在，就沒有意義。這就是說，宇宙的存在，宇宙間一切事物的存在及其意義，都是爲了對「人生」有「效果」有「影響」才存在，才有存在的意義的。但我們要問問實驗主義者：在未有「人生」，即未發生人類以前，宇宙是否存在呢？那時的地球，太陽系，天體，以及各種物理的化學的力與質，是否存在呢？如果不存在，那實驗主義者就根本否認了他們所已承認的現代自然科學(天文學，地質學，生物學和物理化學等)，並且根本否認了「人生」，否認了他們自己(因爲人類是從地球上的生物中發生並發展起來的)。如果存在的話，則那時既沒有人類，那裡來的對「人生」的「效果」與「影響」，可見宇宙事物的存在是純全客觀，與人的思想意志無關的，換言之，宇宙事物自身不管對人生有無效果，有無影響，它是客觀地自在地存在的。當然，有些事物，可以「影響」人生，可以給人生以「效果」，甚至人生還可改造他，轉變它……然而有些事物卻不能影響人生，對於人生更不能有什麼效果，但是否就因此否認它們的客觀存在呢？如果於人生有影響有效果的就承認，反之就否認，這難道不是中世紀的純粹的獨斷論嗎？這就是實驗主義者「科學的實驗態度」啊！

自然，實驗主義在表面上並不承認他們是唯心論者，甚至否認唯心論，因而有時自稱急進的經驗論。如胡適之論「杜威哲學的根本觀念」說：「既不承認經驗是主觀的，反過來既承認經驗是人應付環境的事業，那麼一切唯心唯實(即唯物)的都不成問題了」(同上一一二頁)。實際上成問題得很！經驗究竟從何而來的呢？是腦子裡空想出來的嗎？如果沒有客觀事物的存在，如果人們不「應付」和繼續「應付」「環境」(客觀事物)，能有經驗嗎？其實經驗就是人們腦神經對於應

付客觀事物或環境時的反映，即人們於不斷「應付」環境的過程中不斷反映於其腦神經的一些意像憑藉記憶力積累起來聯繫起來的結果。總一句話說，經驗不過是事物（人自身的行動包括在內）過程的反映而已。實驗主義者把經驗看作唯物與唯心的中間物，實際這不過是一種最狡猾的企圖——逃避唯物論，閃過唯心論的表面而隱匿於其背後的蔭影中的企圖。在這一點上，實驗主義與經驗批評論是一致的，同是帶假面具的滑頭的唯心論，同是一樣的荒謬。

實驗主義還有一個根本的概念，就是「多元的宇宙觀」（Pluralistic Universum）。因為實驗主義既只尋求「最後的事物」，只承認個別的事物，即個別的效果，而不承認「最先的事物」，最高的總體，即最本源的東西。所以在實驗主義看來，宇宙是由相互間沒有關係的「個別事物」（當然是效果，經驗，感覺，感情等）成立的。這顯然是與現代自然科學相矛盾。現代自然科學已經證明，宇宙是多元的統一，由電子到整個的天體都是依辯證的法則相互錯綜聯繫著的。此種只見樹株而不見樹林全體，絕對分離的多元宇宙觀，正是原始野人的多神教之反映啊！那種實驗主義者所以提倡多元論的，也是由於想逃避「宇宙本源」的問題，即逃脫唯物與唯心的問題，尋找中間的道路。

何以實驗主義者（經驗批評論者也是一樣）不敢公開承認或主張唯心論呢？這正是因為自費爾巴赫以後，即自現代的辯證唯物論發生與自然科學發達以後，一方面唯物論（尤其是辯證的唯物論）已成了反資產階級的利器，同時唯心論又被辯證唯物論與自然科學駁得體無完膚，於是一部份較聰明的資產階級就不能不從唯物論與唯心論之間找中間的立場，或超越的立場，一方藉以反對唯物論，尤其是辯證唯物論，同時又可逃避唯心論的攻擊目標，不誠一舉兩得嗎？其

實唯物與唯心之間絕不能有中間的道路，凡是不承認或反對唯物論的，都必然要走到唯心論，凡是想從唯物論與唯心論之間或以外找尋立場，都不過是唯心論之各種各式的表現而已。實驗主義與其他一般唯心論的區別只是：在實驗主義者方面，只研究最簡單的最原始的，如感覺，感情等一類的東西；而極力避免關於「本源」問題的討論；而別的唯心論者則公開提出最高的精神作用當作本源的東西看待。在這裡，實驗主義比起其他的唯心論來，自然要狡滑得多，可是同時也就淺薄的多。所以從根本說來，實驗主義是一種狡滑而淺薄的觀念論。

(二) 實驗主義根本否認客觀的真理。實驗主義既根本否認事物的客觀存在，則必然要否認客觀真理的存在，這是自然的邏輯結論。所以，胡適之說：「『人類未曾運思以前，一切哲理有無物觀的存在』？這個問題，依實驗主義者看來，簡直是廢話」。爲什麼呢？因爲「真理是人造的，爲了人造的，是人造出來供人用的，是因爲他們大有用處所以才給他們以『真理』的美名的」(同上一〇一頁)。就一般說來，當然，凡是「真理」，差不多都是於人「有用處」的。但絕不能因此便說，真理只因爲於人「有用」才能存在，而沒有其客觀的基礎。例如我們在上面剛才說過，未有人類以前，即還沒有人類運思以前，地球是存在的，太陽系、天體、以及各種物理的化學的力與質，都是已經存在的，這是否「真理」呢？這已是現代自然科學的天經地義了。更進一步來說，天文學上的「引力」，「拒力」，物理化學上的「物質不滅」，「能力不滅」以及生物學上的「生物進化」等原理原則(或哲理)，是否因爲於人「有用」才存在？當其沒有人類之時，是否地球、月球等行星不是按照引力與拒力的法則而運行，各種生物不是依照生物進化(物競天擇)的法則而生滅發展呢？難道「萬

有引力」與「生物進化」的法則真是牛頓、達爾文等人用腦子空想出來的嗎？真沒有物觀的在嗎？實驗主義者這種否認真理或哲理的物觀存在，簡直是根本否認現代（他們自己所承認）的自然科學！

其實，真理亦如「事物」一樣，是純粹客觀存在的，不具有「物觀存在」的真理，根本就不成其為真理。真理僅是一切事物運行，變化，和作用等的因果法則，因而真理即在事物之中，離開事物便無所謂真理，只是幻想，玄學，所以真理絕非人們所能憑空製造的。人只能依據客觀的事物，就事物本身的運行，變化，作用及與其他事物和相互關係等當中去探尋所以然的因果關係，這種「所以然的因果關係」就是真理，就是「物觀存在的真理」。我們平常所謂的「真理」（名符其實的真理），不過是此種「物觀存在的真理」反映到我們人類的主觀，為我們主觀所發見所認識而已。自然，人們「主觀」對於「物觀存在」的「認識」，不能達到絕對一致，只能相對的一致，正因為如此，所以從辯證唯物論者看來，「真理是相對的」。但同時必須注意：相對的真理，即與物觀存在性相對一致的真理，在一定的時間與空間內自有其絕對的意義；並且相對的真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向著絕對的真理方面進行的。這就是辯證唯物論與一切唯心論（實驗主義也在內）的獨斷論或懷疑論對於真理的態度根本不同之點。所以真理的標準，即真理本身是否真確的問題必須視其是否恰合於「物觀的存在」而定，換言之，「客觀」是真理的「試金石」。而胡適之卻說：「真理的試金石是實驗」。但我們要問：「拿什麼去作『實驗』的標準呢」？「效果」嗎，「有用」嗎？但對誰「有用」，對誰有「效果」呢？這不明顯地表明：對於實驗主義者（及他們所代表的資產階級）「有用」的，有「效果」的東西，就承認其為真理，反之就否認它嗎？這種種以資產

階級的特殊利益和目的爲真理的最高判斷者的「真理論」，在資產階級看來自然是很便宜的事體！！

胡適之說：「真理是人造的，是爲了人(資產階級)造的」，這是純粹唯心論目的論的觀點。其實應該說：真理是物觀存在的法則，這種法則恰爲我們人類(有時是階級)所發見，所理解，因而爲我們所利用；某種事物的法則，當其尚未爲人類所發見，所理解時，人類(或階級)便無從去利用它；我們人類現在已有的法則或真理，都是全體(或全階級)在自然界在社會裡爲爭生存而勞動而鬥爭的長期過程中所積累的結果，絕非某一人的功績，更不是某人預先立定計劃憑空製出來的。自然，人類爲了與自然鬥爭，或這一階級爲了與那一階級鬥爭，必須利用已有的經驗，已有的法則，不斷地再從事物的運行中，從勞動與鬥爭的過程去從事於新的發見，新的理解，即採尋新的法則，這是必須的。然而這決不是憑空去製造。

胡適之說，天下沒有永不變的，一切真理都是變遷的，以前認爲真理的，現在往往認爲非真理了(同上一一一至一二頁)，這個意思如果正確的了解是對的。因爲一切真理都有其時間性與空間性。但這並不是證明真理本身之因有用無用而或興或廢，而恰是證明真理本身只是事物的客觀存在之反映，因而跟著事物的變遷而變遷。他又說：「……律例原不過是人造的假設用來解釋事物現象的」(同上七八頁)，這卻完全是錯誤了，這是倒果爲因，這是否認真理之物觀存在的企圖。其實一切律例或真理絕非「人造的假設」，而是人類長期勞作與鬥爭的結果，即人類在勞作與鬥爭的長期過程中理解事物的屬性，即理解事物的「物觀存在性」的結果，真正的科學律例都是「差不多」符合於「物觀存性」的，正因爲如此，我們才「用來解釋事物現象」的可能。

實驗主義者，只注意事物的效果，而絲毫不了解該「效果」與原來「事物」間的關係；只知道真理的變遷，而絲毫不了解真理變遷的原因；結果實驗主義者便必然要走到根本否認真理之「物觀的存在性」，必然要走到否認真理本身，走到違反真理，走到純粹的迷信：信仰上帝，相信邪魔鬼怪及種種胡說欺騙。所以詹姆士說：「……我們照宗教經驗的證據（效果）看來，也可以相信比人類更高的神力是實有的，並且這些神力也朝著人類理想中的方向努力拯救這個世界」（詹氏實驗主義三〇〇頁）。這不是實驗主義者只顧某個觀念的「實際效果」，便「以為這個上帝的觀念，能使我們人類安心滿意，能使我們發生樂觀，這就可以算為真理了」（胡適語）嗎？胡適之批評說「詹姆士不先把上帝這個觀念的意義弄明白，卻先用到宗教的經驗上去，回頭來又把宗教經驗上所得的『外快』（即欺騙來的）利益冒充這個觀念本身的價值。這就是他不忠於實驗主義的所在」（胡適文存二卷一〇五頁）。其實，平心說來，這正是詹姆士真正「忠於實驗主義的所在」！實驗主義的根本方法既是「從最先的事物移到最後的事物……從範疇移到效果」（這是胡適之自己承認和時常應用的），既然要「處處用效果來證實真理」（同上一二八頁），即以「實際效果」去測驗觀念本身的價值，那末，照此方法，對於「上帝這個觀念」，就自然要「先用到宗教的經驗（效果）上去」，然後「回頭來又把宗教經驗上所得『外快』利益（效果）冒充這個觀念本身的價值。」這是實驗主義方法的必然邏輯。胡適之卻主張應該「先把上帝這個觀念的意義弄明白。」但如果真要「弄明白」，那就勢必要「從最後的事物移到最先的事物，……從效果移到原因」，就是說首先要追向「上帝這個觀念」有無「物觀存在」的基礎，這樣，也就勢必要根本

推翻（不忠於）實驗主義的立場。這恐怕不是胡適之所願意的罷？！然而這卻是真理。

（三）實驗主義是「美國式的」改良主義。實驗主義既只注意於個別的事物，各個事物或觀念的實際效果，而不承認有全體統一的宇宙，不承認有概括的普遍的原理原則（或主義），因而在經濟生活上，在政治行動上，都不承認有「根本的改造」，不承認有「革命」。只主張一點一滴的「改造」，只主張「改良」。所以詹姆士公開承認實驗主義的人生觀為「改良主義」（Meliorism——同上一〇七頁）。胡適之說：「世界是一點一滴一分一毫的長成的……」。所以「實驗主義只承認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因此他教訓人們說：「請你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同上，一〇七，一〇一，及一五一頁）。實驗主義根本否認有「主義的革命」，只承認有「零碎的改良」，由胡適之這幾句話算是充分表現出來了。

但是宇宙的發展史，即自然與社會的發展史中究竟有沒有過客觀存在的「革命」呢，實驗主義者對於這個問題一般是否定的。他們說「世界是一點一滴一分一毫的長成的……」，換句話說，世界（自然與社會）是沒有經過「革命」（突變）的。但事實果真如此麼？地球及其他行星從最初的太陽體（星雲球）分裂出來，是一點一滴一分一毫的分裂出來而沒有經過劇烈的變動（突變）嗎？地球從最初平面的地殼而變成現在的山川洋海的地殼，難道也是「一點一滴一分一毫的長成」而沒有經過「突變」的嗎？生物界裡從最初的原始動物變到現在的人類，難道也沒有經過無數的劇烈變化（突變），而是一點一滴一分一毫的長成的嗎？假設實驗主義不根本否認現代的自然科學，那對於以上的問題，便應該得到一個肯定的答案，就是：整個的自然界，從太陽系，地球……

到人類，都是經過無數的革命（突變）才形成現在的形態的，絕不僅是漫漫地一點一滴一分一毫的長成起來的。至於在人類社會歷史上的革命，更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如法蘭西的大革命，俄國一九〇五與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就是胡適之也不能不承認的。但實驗主義在碰這些真憑實據的歷史事實（革命），無法作乾脆的否定時，便想出了一個「掉槍花」的辦法，就是把「革命與演進」（即突變與漸變）混淆起來，企圖以此去蒙混人們對於「革命與改良」兩個觀念的根本區別。

胡適之說：「革命和演進是相對的，比較的，而不是絕對的」，這是對的，因為由一個「絕對」變到另一個「絕對」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否「革命與演進」就是一件事，或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沒有本質上的差異呢？胡適之接著說：「順著自然變化的程序，如瓜熟蒂自落，如九月胎足而產嬰兒，這是演進。在演進的某一階段上，加上人功的促進，產生急驟的變化；因為急驟的變化，表面上好像打斷了歷史的連續性，故叫做革命。其實革命也都有歷史演進的背景，都有歷史的基礎」（新月，二卷十號）。接著他又將歐洲的「宗教革命」，「工業革命」與法國革命俄國革命等加以敘述，總之，意在證明革命與演進並沒有什麼根本不同，只有程度上「緩急」的差異而已。然而在胡適之自己所說的話及所行的事實裡面，就顯然可以看出「革命與演進」兩個觀念是根本不同的，是與他的企圖（混淆革命與改良兩個觀念的企圖）相反的。譬如「瓜熟蒂自落」，「九月胎足而產嬰兒」，這正是說明演進與革命（突變）的過程，我們可以說，當「瓜」自結花到「成熟」而「蒂落」之前，當「嬰兒」自「結胎」到「胎足」而產生之前，這是「演進的過程」，這是漸變，但一到成熟蒂落與胎足產生時，這已經不是演進，而是突變（革命）了。演進或漸變是數量發展的過程，革命或突變乃是由數量轉變為

質量的過程，這兩種過程是根本不同的。而胡適之把兩種過程混合起來，通謂之「演進」，這顯然是他自己的混沌。

至於說「在演進的某一階段上，加上人功的促進，產生急劇的變化……故叫做革命」，彷彿革命與演進之分，就在於有無「人功的促進」，這完全是主觀論的觀點。其實從演進到革命，也完全由客觀的發展而形成的。固然，在革命到來時有「人功的促進」，即革命階級的奮鬥，特別是革命政黨的領導。然而必須在一定的客觀條件之下，即在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與一定的階級關係之下，革命才有可能；猶之胎兒必須在母體內懷至一定的時期（足期），然後才有產生之可能。所以馬克思說：「……人類所能解決的問題，必定在他的能力範圍以內；因為最切近的觀察，往往發見，每一個問題的上舞台，必在其解決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已經具備，或至少已在懷胎之時」（經濟學批判序言），革命的政黨就好像接生者，但接生者絕不能從一個處女身上去接生嬰兒，何況假使沒有革命的社會經濟基礎，就根本不能有革命的階級，更不用說能有代表革命階級的革命政黨了。反之，有了革命的社會經濟基礎，必然要產生革命的階級及代表革命階級的革命政黨，而革命的階級與其政黨必然會進行革命的爭鬥，直至實現革命。固然，在革命過程中，革命政黨領導革命的政策如果正確，可以促進革命的發展過程，可以保證革命的勝利；同時革命政黨政策的錯誤，往往亦能使革命遭受不必要的失敗，然而這不過是將革命的勝利延長時期，卻絕不能根本消滅革命（假使革命的客觀基礎存在的話）。

總之，「革命與演進的區別」，絕不在乎有無「人功的促進」，（因為「改良」也有賴於「人功」）。而是因為人類的歷史，在某一定的階段內（即有階級的社會階段內）其本身就包含有演進與革命的必然過程，此種過程，歸根究底說來，

與人們主觀努力不努力，毫無關係，歷史在某一定的時期內，即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還能相安的時期內，是演進的，或改良的，但一旦生產力發展到與生產關係根本相矛盾時，即由新生產力產生出來的新階級與擁護舊財產關係的階級根本不相容時，於是就非發生革命不可了。馬克思早已說過：「社會之物質生產力發展到某一定的階段，就與現存的生產關係，或從法律的術語上說，即與其從來在那裡面活動的財產關係發生衝突，這些關係由生產力發展的形態中一變而成爲它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期便到來了」（經濟學批評序言）。這還不明顯嗎？可見實驗主義者此種混淆「演進與革命」的區別，其用意不外是企圖根本否認「革命」，而證明只有「演進」即只有「改良」，這對於已經統治全社會的資產階級，特別是已經差不多統治全世界的美國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當然是十分有利益的！

\*

\*

\*

實驗主義就其全部精神看來，正是美國資產階級精神的反映，此種精神的主要點就是尊重「實際的效果」，即「實際的利益」，若要更通俗化起來，就是專注意於\$（金元），這就是「真理」，人們只要「一點一滴」的積聚金錢，自然就會有一切，此外一切都是假的，換言之，實驗主義就是美國資產階級「拜金主義」的抽象化。這是現代資本主義的時代的「法利塞主義」。

美國資產階級循著金元的中心目標，一點一滴的作去（實驗），萬變不離其宗，因此它現在積聚了世界全部金子之一半，變成了全世界財政的支配者。他現在很可以以成功者的資格，根據他實驗主義之高貴的哲學理論告訴一切人們說：你們不要空談什麼真理正義，或什麼「主義」，應該注重「實

際的效果」啊！他對工人們說：你們應該注意眼前的生活，活一天算一天，這是「實際的利益」，什麼社會主義，革命，都是不「兌現」的支票，都是假的「觀念」！他告訴殖民地的勞苦群眾說：你們應當顧到「實際的效果」吧，應當採用「科學實驗室的態度」去看待問題吧！「請你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貧窮啦，疾病啦，愚蠢啦，貪污啦，擾亂啦，諸如此類的問題，你們一個一個地去研究吧！這些與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封建勢力……都無關的，你們應該一點一滴的去解決！解決好了，才能有資格說帝國主義；不要胡思妄想，「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就是說，不要妄談什麼民族革命，民族獨立，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社會主義等，這是毫無「實際效果」，這不是「科學實驗室的態度」！！妙哉！妙哉！這就是我們美國博士胡適之先生的根本立場——實驗主義——的來源。這就是他為我們一切被剝削者與被壓迫者所介紹的「人生觀」的根本立場——「科學的」的「實驗主義」！？

(原載《讀書雜誌》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三二年三月出版。)

( 附錄 3 )

## 怎樣去正確認識和領導目前的『紅軍』鬥爭

(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 )

### 一、「紅軍」的階級性

史太林主義者幾年來將農民的武裝隊伍，甚至將土匪隊伍，都冠之以「紅軍」的頭銜，這顯然是一種指鹿為馬的滑稽勾當。其實真正的紅軍，只有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才有成立的可能。因為真正的紅軍乃是由無產階級和貧農所組成的一種正式軍隊，譬如蘇俄的紅軍便是十月革命勝利的產品，其本身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沒有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沒有無產階級的政權，紅軍是絕不能組織成功的。

但現時在中國的所謂紅軍，完全是另一回事，大家都能記憶，此種「紅軍」的產生，不是由於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恰相反，而是由於失敗。現時「紅軍」中最老的隊伍，如朱毛所領率的，主要成份乃是過去革命的殘餘勢力。換言之，即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失敗之後，尤其是湘鄂贛的秋收暴動賀葉南征和廣州暴動失敗之後，在湘鄂贛等省參加暴動失敗的農民，和曾經參加革命或表同情於革命的兵士及其他革命份子等所混合成的。後來再加上國民黨軍隊許多潰兵和當地土匪的參加，以及各地被白色恐怖壓迫無法存身的農民之投奔，最後就是因農村經濟不斷破產和水旱天災所逼迫的破產農民和災民之匯合，因而勢力日漸擴大。這便是現時所謂紅軍的形成史。顯然的，此種「紅軍」的構成份子是十分複雜的。不但其中無產階級的成份十分微弱，即貧農的成份亦不十分強。其中有很大數量是中農，遊民無產者，潰兵與土匪，乃至富農等。像這類份子雜湊起來的隊伍，不

但絕不能與蘇俄革命勝利后的紅軍比擬，而且其中顯然包含有十分危險的成份。如果妄冠以「紅軍」的頭銜，不但名實不符，而且在將來的革命中留下魚目混珠的危險。因為此種「紅軍」在將來城市無產階級真正起來奪取政權時，究竟能否擁護無產階級而不為其他資產階級政派所利用，還是一個極大的疑問。

但史太林主義者何以不惜將「紅軍」的王冠套在此種複雜隊伍的頭上呢？他們的目的無非是企圖藉此以遮掩他們過去機會主義失敗的罪惡，權作冒險主義的盾牌，以欺騙或炫耀無產階級和一般民眾而已。

然而如果我們將史太林主義者套在現時湘鄂贛閩皖等省區那些武裝隊伍頭上的「紅軍」頭銜擱在一邊不提，那究竟此種隊伍算是一種什麼的武裝呢？當然絕非統治階級所誣蔑的什麼「遊民土匪」，固然其中含有不少的潰兵和土匪等，但其主要的成份還是農民，其傾向亦是代表農民的，即要求土地和反地主豪紳及國民黨軍閥之剝削和壓迫的。所以此種隊伍，無論其成份如何複雜，其傾向如何不純，但就一般說來，始終不失為農民的武裝，不失為一種反國民黨政府的革命勢力，這是絕不容忽視和否認的。

## 二、「紅軍」中所包含的矛盾與危機

但當我們估量「紅軍」的作用和運用這一革命勢力時，我們亦絕不應忽略此種勢力中所包含的矛盾和所具的危險性，只有預先明白瞭解真正的矛盾及其危險性，才能採取適當的策畧去防止和糾正它。

「紅軍」所包含的成份既一般是農民，則我們必須知道農民本身的弱點。農民的弱點最主要的是小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觀念。他們之起來參加革命，當然不是為了贊成或信仰社會主義，而是反抗地主豪紳軍閥和貪官污吏等種種經濟上

政治上的壓迫，要求分配土地等。但土地一旦到手之後，他們是很容易後退的。因此，農民不能同無產階級一樣，能具世界眼光，能預見遠大的將來。在另一方面，農民缺乏組織的習慣，缺乏自動自覺的精神，尤其缺乏集體的精神。所以農民不是處於散漫狀態，就是容易為某種領袖所利用，尤其在軍事組織中，農民往往變成某一軍事領袖的工具，同時農民是富於地方性的，因此又容易受領袖們的操縱，形成各種地方性的小派別。至於遊民無產者，除了具有農民一般的弱點之外，還有他們特有的冒險性和腐化性。所以歷史上（資本主義社會前期）一切農民運動，結果往往為流氓無產者出身的領袖以至地主貴族所利用和出賣，卒至完全失敗，絕對不是偶然的。

固然，現時的「紅軍」中，已經有了現代無產階級的成份。而且有共產黨的領導，但無產階級的成份既然十分微弱，當然很難影響於農民群眾，而且有時反為農民意識所同化；共產黨人在「紅軍」中形式上確佔領導地位，但在史太林主義的壟斷包辦之下，不惟沒有能糾正農民和遊民無產者的弱點，反而助長了他們的弱點；他們本身久已與農民和遊民無產者同化，並達到最尖銳的程度。譬如現時史太林主義者當中的盲動情緒，官僚主義，以個人或地方關係為中心而結合的無原則的小派別等，固然有其「國際的」來源，但中國的農民和遊民無產階級對於他們亦不無相當影響。尤其在「紅軍」中，以地方或個人（主要是軍事領袖）為中心而結合的小派別，更是表現得異常厲害而普遍。但那些小派別之間，在政治上和組織上有沒有任何原則上的分歧呢？沒有的，只是在他們個人間，軍事領袖間或地方黨部間（實際還是軍事集團間）有某種利害關係不同而已。這種現象無疑地是十分危險的，而且此種危險，過去黨的領導機關不惟沒有事先設

法防止它糾正它，而且是盡力促成了它。譬如朱德和毛澤東原是很合作的，但李立三爲了要打擊毛澤東，便不惜使用種種詭計鼓勵朱德反對毛澤東，曾逼迫毛澤東不得不離開井岡山而遭一度嚴重的失敗（見一九二八年冬毛澤東致中央局的信）；後來陳紹禹派爲要在「紅軍」中造成己派的實力，更是挑撥離間，無所不用其極。此外，凡是反對中央（不論李立山派的中央或陳紹禹派的中央）的都派遣到「紅軍」中去，這亦是促成和加深「紅軍」中派別的重要原因之一。實際上，這不是領導，而是在「紅軍」中製造危機。

尤其重要的，是史太林主義者對「紅軍」在政治上所犯的錯誤。他們把「紅軍」誇大成爲解放中國無產階級的「天使」，一方面在城市工人階級中散佈對「紅軍」的幻想，同時在農民中散佈對城市無產階級的輕視心理，破壞農民對城市無產階級領導的信任心。對富農始而採取優容妥協的態度（六大決議案謂「不要故意反對富農」，李立三謂「富農是革命的」），致使在「紅軍」中，在「蘇維埃」中，以至在黨的組織中，富農份子曾佔在領導的地位，如 AB 團，四軍中的許繼慎，福建的林某等，使「紅軍」內部發生了很嚴重的危機。但後來他們碰到事實的打擊，在所謂反立三路綫之下又直接抄襲史太林在蘇聯的方法，企圖簡單地從軍事上和行政上消滅富農，但結果又引起了中農的動搖和逃跑，甚至「反水」（見湘鄂西省蘇區的工作報告——紅旗第四十期）。

最後，在「紅軍」中，只看見軍事領袖的權威，絕看不到黨的領導力量，「紅軍」中的黨員，實際上不過一附屬的駢枝機關，不僅不起任何領導作用，而且連會議也是不召集的。至於地方黨部，常常爲流氓份子（名義上算是無產階級）所把持，當然說不上有任何共產主義的意識，對農民群眾往往發生了很壞的影響，所以在許多地方都發生「紅軍好，土共

壞」的歌謠。總之在「紅軍」中差不多完全抄襲了國民黨的「軍權高於一切」的傳統，黨只是軍隊的附屬品而已，在群眾中替軍隊作點宣傳工作而已。此種情形，在黨的刊物中（來自蘇區的報告）亦隱約表露出來。

以上這些矛盾，這些危機，一半固然是在城市無產階級革命潮流未起來時客觀上所很難避免的，一半卻是由黨領導機關的策略和官僚制度所造成。而黨的官僚機構爲了要在城市工人階級面前，甚至在一般黨員群眾面前誇耀「紅軍」的勢力，藉以維持官僚們破產的權威，便不惜將「紅軍」中一切矛盾，一切危機掩飾起來，其實這種辦法除了養癰遺患之外，沒有其他意義。但我們爲了瞭解真相起見，爲了真正擁護和領導農民的武裝運動，糾正其錯誤，使其能得到政治的出路起見，必須照實揭露出來。只有不害怕真理的人，才能真正擁護真理。

### 三、「紅軍」在現局勢中的意義及其前途

我們在上面所指出「紅軍」裏面包含的矛盾與危機，當然不是說此種武裝隊伍現在已走到不能發展或行將消滅，或在現時的局勢中沒有任何作用。事實上，「紅軍」在現時（編者按：約五六月時）是向前發展的最好機會，並且在目前反日反國民黨的鬥爭中，無疑地站在一個十分重要的地位。

自去年秋天的大水災和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中國的經濟愈趨衰落，尤其農村經濟愈陷於破產而絕無出路的境地，再加上國民黨軍閥貪官光棍們的盡情搜刮。逼迫農民只有走上鬥爭的道路；在另一方面，國民黨在滿滬事變中已完全暴露了它的卑鄙無能，它的投降賣國，不但引起了一般民眾對它的憤懣，即在資產階級，甚至它自己的黨員群眾中亦喪失了對它的信仰，因此引起了民眾對國民黨的反抗（如搗毀黨部，毆打黨國要人等），國民黨內部更深刻的分裂，國民黨政權的

動搖；尤其國民黨南京政府的財政現時差不多已完全陷於無出路，黨政教育等機關都只能發半薪或三分之一的薪水，軍隊欠餉則有至一年或半年以上者，一般兵士都陷於飢餓之中，軍隊（特別是而非蔣系的雜牌軍）時時有叛變瓦解之虞（最近孫連仲部下及湖北安徽好些軍隊叛變投降「紅軍」就是事實）。在這種情形底下，國民黨政府當然再沒有多大力量來對付武裝的農民（現時蔣介石親自出馬進攻「紅軍」，事實上不過為掩飾他對日帝國主義不抵抗主義的賣國政策，討好於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及保持他的武漢南昌等大城市的地盤而已。他至多只能防止「紅軍」進攻那些大城市和截斷京漢長江等重要的交通。在現時消滅「紅軍」不但不可行，即防止其發展亦很困難。）這些都是十分有利於「紅軍」發展的客觀條件。何況城市中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的民族民主運動已在開始復興，工人運動也開始活躍，這對於農村的武裝運動更有決定的影響和意義。

反之，在現時的局勢之下農民武裝運動的發展，對於城市的民眾運動，無疑地亦有巨大的影響，因為他們能在許多鄉村和小城市中摧毀了國民黨的統治勢力，而且威脅到大城市（如武漢與南昌等）。所以我們認為在目前反日反國民黨的運動之下，現時的農民武裝運動，已具有新的重要的政治意義，已經非三年前的那種「紅軍蘇維埃」可比。因此我們認為現時「紅軍」不應只採取消極保守的態度，而應謀積極的發展，盡可能在各方面削弱國民黨的統治。

但是要領導「紅軍」向積極方面發展，首先就必須根本改變黨整個的政治路綫。黨必須將農民的土地鬥爭與城市的民族民主鬥爭聯繫起來。黨必須堅決提出國民會議的口號以作此種聯繫鬥爭的總口號。黨應該用最大的力量來領導國民會議的鬥爭和城市的工人運動。只有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運

動的鬥爭變成中國全民眾實際鬥爭的目標，城市的工人運動走到真正復興的地步，鄉村的土地鬥爭，農民的武裝運動，才能有政治的出路。

黨如果改變了總的政治路綫，在「紅軍」中的策略上當然亦應加以積極的改變。黨應公開地明確地告訴「紅軍」中的先進份子：現時的所謂紅軍，絕非真正無產階級和貧農的武裝，只是一種農民的武裝隊伍，而且其中還包含有不少危機成份；農民武裝運動的出路，只有在城市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領導之下，在城市無產階級已有力量來推翻國民黨統治階級的政權之下，才有可能；應使農民相信城市無產階級的領導；在「紅軍」中應確定對於富農的策略，應提高黨的領導作用；「紅軍」的基礎應建立在貧農和雇農之上；應根本消滅一切以個人或地方為中心而結合的無原則的小組織，防止軍事領袖的跋扈（即在農民武裝隊伍中防止新軍閥的形成）。總而言之，黨的策略應立即脫離農民和遊民無產者的原始意識，恢復無產階級的立場，目前的農民的武裝運動才有前途。

但我們以上的提議，唯一正確地領導目前農民武裝運動的提議，正式黨的領導機構，史太林主義者，「紅軍」中的實際領導者，是否能接受呢？根據我們過去的經驗，凡是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與提議，他們都是不願意接受的，他們寧使任何革命運動，任何群眾鬥爭失敗（最近的電話工人罷工就是最現實的例證），而他們的成見，他們的「權威」，他們的「顏面」，是非保存不可的。如果他們始終拒絕我們的提議，不顧一切地一意孤行，則目前的農民武裝運動，不但要錯過目前最有利於其本身發展的機會，而且是放棄推動中國整個政治運動走上革命局勢的機會。這樣，則「紅軍」在相當時期內不但沒有發展的可能，而且其內部的矛盾與危機將不可避免地要爆發出來，形成內部的嚴重糾紛以至混戰。固然，此種農

民武裝隊伍，即令外部（國民黨軍閥）如何壓迫，內部如此分裂，完全消滅雖然很少可能，但到那時，其存在亦不過苟延殘喘而已。

然而在現時，城市的一般的民主民族運動和工人運動尚在開始向復興的道路前進，鄉村的農民鬥爭還盡有發展的可能。我們希望每個真實的革命份子，尤其共產主義者和「紅軍」中的革命家，應立刻起來重新分析「紅軍」的真實狀況，正確認識此種武裝隊伍在目前民族民主鬥爭中的可能作用及其前途。首先應向史太林主義者的錯誤領導作堅決的鬥爭，這不但是擁護目前湘鄂贛閩皖等省的農民武裝運動的唯一有效辦法，而且是推動目前中國整個民族民主運動走向真正的革命局面之起點。

（原載中國左派反對派北方區委機關報《先鋒》六、七期合刊。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出版。）

( 附錄 4 )

## 西班牙內戰與國際局勢前途

(一九三六年十月廿二日)

目次

自序

第一章：革命前的西班牙

第二章：民主政府沒有能解決民主任務

第三章：人民陣線及其擁護的政府幹了些什麼？

第四章：內戰的發生與兩個營壘的對照

第五章：西班牙內戰與國際局勢的前途

附錄：「格柏烏」在西班牙的活動

### 自序

西班牙的內戰，自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開幕以來，已經整整地二十個月了。這是西歐自法蘭西大革命後的一個時間最長而又最殘酷的國內戰爭。這個戰爭不但為西班牙全體人民未來的命運所關，而且強烈地直接地影響了整個歐洲的局勢，並且間接地影響到了全世界。「八一三」日帝國主義向中國的猛烈進攻以及最近德國併吞奧國的事變，都是與西班牙的內戰密切地相聯繫著的。

西班牙的內戰仍然在繼續著。它的前途究竟如何，此時雖不能作肯定的論斷，但無論是馬德里或薩拉哥薩那一方面獲得最後的勝利，其對整個歐洲局勢將更給以決定的影響，將成為國際局勢轉變之新基點，是毫無疑義的。因此，我們對於西班牙內戰發生的原因、過程和前途以及對於國際局勢的影響，都有立求瞭解之必要。但國內報紙和許多雜誌一年餘來對於西班牙內戰的情形雖不斷地揭載，不斷地介紹，然

而不是失之膚淺，就是任意曲解，等於給西班牙的內戰蒙上了重重的雲霧。要想從這些報紙和雜誌的記載中去瞭解西班牙內戰的真相，簡直比透過重重雲霧去觀察一支繡花針還難。這個小冊子原來的目的，就是想把被蒙在西班牙內戰上的重重雲霧揭開，讓人們去認識它的本來面目。

這個小冊子是在西班牙內戰發生後的第五個月寫的。那時著者正在南京的監獄裡，為應某雜誌的要求寫了這一篇，後因該誌停刊，一直未曾發表。現在時間同著西班牙的內戰又經過了十五個月，但這篇東西的內容並沒有失掉它原來的價值。不但它對於西班牙內戰發生的原因之分析是正確的，就是對於其前途之估計，也依然保持它的正確性，並且一年餘來事變的發展已部份地證實了它的正確性。所以著者覺得就是現在讓它出版，也還是時候。

自然，西班牙內戰近十五月來的發展，不是毫無痕跡地過去了的。實際上，這十五個月事變的發展，不僅是繼續內戰開始五個月後的局面前進，加深了西班牙人民的痛苦，而且也加深了西班牙革命之新的危機。去年五月巴塞洛拉反動的事變，就是這一新危機之具體的暴露。

大家知道，巴塞洛拉是西班牙的「上海」，是西班牙工商業的樞紐（西班牙三分之一的賦稅出在這裡），同時也就是西班牙工人階級的集中地，是西班牙革命的支柱。所以巴塞洛拉自一九三一年「四月革命」後，始終站在革命的前線，成為反對皇黨和法西斯的主要陣營。當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的事變爆發，馬德里和巴塞洛拉的人民陣線政府方陷於驚慌失措，幾將解體時，而巴塞洛拉的工人階級卻毫不猶豫地自動地站了起來，運用自己的力量打擊了反革命，維持了巴塞洛拉的秩序：一方面，把所有的生產機關（連反動資本家關歇的工廠在內）維持並發展其生產效率，以供給前方和後

方的必需生活品及軍用品；另一方面，又組織了一個龐大的武裝隊伍（所謂「民軍」），不斷地派遣到前線去抵抗法西斯的進攻；尤其特別的，是在那裡成立了「民軍委員會」（這實際上等於蘇維埃），有逐漸代替亞柴拉指導下的對革命怠工的政治機構之趨勢，換句話說，在巴塞洛拉已出現了「兩重政權」。這顯然表露出了俄國二月革命後之彼德格勒的模型。這是西班牙抵抗法西斯進攻乃至完成西班牙革命之最可靠的堡壘。但正因為如此，代表西班牙布爾喬亞的亞柴拉政府，即所謂人民陣線政府，便把革命的巴塞洛拉看成為眼中之釘，非拔除不可。因此，人民陣線政府的鬥爭目標，不是集中在佛朗哥的身上，反而移到了巴塞洛拉方面的革命工人。結果，在去年五月中「人民陣線政府」竟掉轉槍頭來掃射巴塞洛拉的工人階級，逮捕了他們的領袖，解散了他們的組織（如民軍委員會），並把他們的武裝隊伍完全放在布爾喬亞的軍官指揮之下，尤其殘酷的是巴塞洛拉革命工人最信任的政黨——馬克思主義聯合工黨（P.O.U.M）——遭受了嚴重的迫害與摧殘，這恰如俄國一九一七年「七月事變」後，彼德堡的工人階級和布爾什維克遭遇到的命運一樣。從此，反抗法西斯之最堅強最革命的巴塞洛拉被削弱下來了，縱或是一時的，但對於佛朗哥卻是一個很大的勝利。

巴塞洛拉的「五月事變」，不僅限於巴塞洛拉一個區域，而且很快地傳染到了人民陣線政府統治下的一切地方。自從那時以後，西班牙的工人階級便受到了雙重的威脅：一方面是佛朗哥之不斷的進攻，另一方面是亞柴拉之不斷的鎮壓。這也恰如俄國七月事變後的工人階級一樣，一方面是哥爾尼洛夫的反革命的威脅，另一方面是克林斯基的鎮壓。但是西班牙的工人階級也同當時俄國的工人階級一樣，一方面忍受著亞柴拉的鎮壓，另一方面還是盡可能地去抵抗佛朗哥的進攻。亞

柴拉政府直到現在還能維持其相當地位者，正是由於此輩工人群眾之「忍耐精神」和「抵抗毅力」。

在國際上，十五個月來也有相當的改變。自所謂「不干涉西班牙內戰協議」完全失敗之後，法國和蘇聯見到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以無數的飛機與正式軍隊從意德兩國不斷地運到佛朗哥統治的西班牙，於是它們也相當改變它們一向的「封鎖政策」（法國和蘇聯支持的「不干涉西班牙內戰協議」，實際上就等於對馬德里政府的封鎖），而以一部份軍火和志願兵資助亞柴拉政府。法國和蘇聯（英國也在內）這種援助，自然是加強了亞柴拉政府對佛朗哥的抵抗力量，但同時也就削弱了西班牙革命民眾對反革命的法西斯之抵抗力量。因為法蘇英不僅幫助亞柴拉反佛朗哥，而且還幫助亞柴拉反對西班牙的革命民眾，特別是巴塞洛拉的革命工人。巴塞洛拉的「五月事變」，可以說是在英法布爾喬亞的代表及蘇聯的「格柏烏」直接指使之下發動和完成了的。在英法布爾喬亞看來，佛朗哥的勝利固然對於它們大有不利，但西班牙革命民眾的勝利，對於它們更屬危險。它們之幫助亞柴拉反對佛朗哥，主要的目的就在於支援亞柴拉政府不致為西班牙的工人政府所代替。而蘇聯的政策僅是為英法及西班牙的布爾喬亞盡一種僕從的責任而已。所以最後說來，像英法蘇現時對於亞柴拉政府那樣的幫助，不但不能阻止法西斯的勝利，反而會替法西斯的勝利造成更穩固的基礎。因為在西班牙要想徹底戰勝法西斯，只有西班牙的工人階級獲得徹底勝利，取亞柴拉政府的地位而代之，才有可能。但這正是法英的布爾喬亞所絕對不願意的。

現在亞柴拉所統治的西班牙，雖然還在與佛朗哥統治的西班牙繼續作戰，但這種戰爭是不能長久下去的。假如人們敢於面對著事實，便不得不承認：亞柴拉統治的西班牙是日見削弱，而佛朗哥統治的西班牙卻是日漸加強。這種情形告

訴我們，西班牙內戰的前途是很不樂觀的。要挽救西班牙的危局對佛朗哥取得最後的勝利，只有一個方法，就是西班牙的工人階級，首先要從西班牙的蔡勒特里，謝德曼等欺騙的迷惘中脫離出來，堅決領導貧農及一切城鄉貧苦人民立刻團聚在一個革命的旗幟之下，一個革命的政綱之下去鬥爭，準備推翻西班牙的米留哥夫、克林斯基，才有可能。所以西班牙未來的命運，究竟是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還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德國反革命的道路，還要看未來西班牙工人階級的覺悟與鬥爭來決定。

但是，西班牙二十個月來付出了無數頭顱的內戰，已經供給了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族以最豐富的教訓，這是最值得學習的。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

### 西班牙內戰與國際局勢前途

西班牙自一九三一年四月發生革命，推倒王政，成立共和以來，已經過了六個年頭。在這六年中，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的鬥爭差不多沒有停止過。而現在已經發展成爲普遍全國的空前劇烈的內戰了。這是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最後決死活的鬥爭。這鬥爭不僅將決定西班牙二千三百萬人民的命運，而且將直接影響到歐洲乃至整個國際局勢的前途。西班牙內戰的結局將成爲國際新的局勢的轉捩點。在東方首先蒙受其影響的將是我國。所以我們對於西班牙的內戰必須予以嚴重的注意。

### 第一章 革命前的西班牙

西班牙在西歐是一個特殊落後的國家。它充滿了中世紀封建的殘餘勢力。它與十月革命前的俄羅斯很相類似。雖然

有所謂憲法，但國王的權力是無限的。貴族的放縱與教會的專橫且遠駕舊俄之上。工農及一般貧民大眾的顛連困苦也與舊俄相去無幾。因此我們可以說，這兩個國家——革命前的西班牙與革命前的俄羅斯——雖然一個在歐洲的極西，一個在歐洲的極東，但它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是同樣的落後，同樣是亞洲式的。

然而從歷史的發展上說來，西班牙是經過了不同的道路，並且有過它自己的光榮時代。當中世紀全歐洲淪於最黑暗最野蠻的境地時，而西班牙在阿拉伯的回教文明統治之下卻成爲歐洲文化之中心。那時不但工商業最爲繁盛，而科學如數學醫學和化學等都有繼承希臘羅馬獨放光彩之勢。這是西班牙的黃金時代。可是這個時代爲時不久便被基督教徒與封建諸侯（西班牙北部興起的小王國）的聯合所毀滅了。從此西班牙變成四分五裂，幾百年間充滿了戰爭和屠殺。直到十五世紀末才又重新被伊薩伯拉女王統一了起來。伊氏並以全力獎勵尋找新世界（有名的哥倫布之發見美洲即在這時），掠取美洲非洲和亞洲的殖民地。於是西班牙的殖民地遍全世界，巨量的黃金和白銀像潮水一般湧入西班牙。西班牙又成了歐洲第一個最富強的國家。西班牙人自稱這個時期爲最榮譽的時期。但這種「榮譽」是建立在最不榮譽的對殖民地的劫掠上面的。而最壞的是：西班牙用最殘酷的手段劫掠於殖民地人民的金錢並未曾用之於改良它的生產力，提高本國的生產，使自己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像後來荷蘭和英國所成就的），而卻全被消耗於宮庭貴族和教會僧侶的奢侈縱慾，以及維護最反動的基督舊教反對新教和鎮壓荷蘭的革命等反動戰爭之中。此外，對於國內的異教徒也採取了稀有的慘酷的壓迫手段。回教徒和猶太人不是被燒殺，就是被驅逐。單只一六〇九年一次便驅逐了一百萬人。但這些被殺和被逐的

異教徒又恰是西班牙最能忍苦耐勞和精明強幹的手工業者，農民和商業家等。整個的十六世紀是西班牙獨霸世界的最強盛的時期，但同時也是它最反動的橫行無忌的時期（尤其就它影響於外界而言）。但當它的反動達到頂點時（腓力第二即代表這個頂點），便急劇地衰敗下來了。

自從第十七世紀起，西班牙在各殖民地的權利逐漸為新起的荷蘭與英法等國所攫取。像潮水一般的金銀的入口停止了，國內的一點工商業基礎崩潰了。但國王的宮庭，官僚貴族和教會僧侶的奢侈生活卻不能削減。於是這班人只好拼命壓榨人民大眾，尤其是農民，以填補其在海外之所失。迄至十九世紀中南美洲的殖民地完全脫離它而獨立時，西班牙的貴族與僧侶之對於人民的剝削和壓迫更是窮兇極惡。因此最後形成了西班牙特殊落後的社會結構。十九世紀末因美國之奪取菲律賓和古巴，西班牙的統治層受了不少刺激（主要還是由於人民的反抗）而欲從經濟上和政治上有所改革，但實際的效果甚微。這是很顯然的，完全站在統治層的利益上來改革西班牙決沒有可能。因為這個統治層的本身就是阻止西班牙進步和發展之唯一的障礙物。但是從下層來改造西班牙的客觀條件也未曾具備。因為這時的西班牙尚缺乏一個有力的進步的階級（如法國大革命前的第三等級或俄國十月革命前的無產階級）。所以十九世紀中在西班牙雖然發生過無數的暴動，政變、改組政府、反對耶教徒、實行教會財產「國有」（如一八〇八年，一八三六年和一八五二年的事變便是最顯著的）等等的事變，但都沒有留下什麼積極的影響。反動落後的西班牙還是依舊反動和落後。

至本世紀初，西班牙的工業才有了相當的進展，但這是由於它的統治階級極力引入了外國的資本所致——主要是英法德的資本。正因為如此，西班牙的資本主義含有半殖民地

的性質。也正因為如此，西班牙的資產階級是帶些買辦性的，並且多半是從官僚貴族中出身的。直到第一次大戰爆發，西班牙因為始終保持「中立」的地位，得與各交戰國家自由進行各種貿易，於是西班牙的民族工業才得到一個空前的機會蓬勃地發展了起來。許多新式的工業，尤其是關於軍需方面的，都是由這個時期內建立的。從此西班牙才真正踏入了現代資本主義的門檻。

但自歐戰停止後，西班牙的新興工業又立刻碰到英法意德等先進資本國家的競爭的壓迫，無法前進，恐慌時起，再加上歐洲一般革命運動的高潮的衝擊，於是國內的勞動運動，加泰隆等省的民族自治運動，以及北非摩洛哥等殖民地的叛亂，都如雨後春筍般發生出來了。在這種情形下，西班牙反動的統治者愈加倒行逆施，成立了里維拉的極端反動的獨裁政制，對於勞動運動和民族運動都施以異常嚴酷的壓迫。並在經濟政策上，一方面盡力保護封建殘餘勢力的特權，一方面實行所謂「工業國有化」，實際上就是使少數財政和工業巨頭在外國資本支配之下壟斷國家一切主要的生產事業。但里維拉這種極端反動政策只能鎮壓騷亂於一時，絕不能解決國家最嚴重的基本問題，僅僅將問題拖延到一個最高的階段去求總解決而已。

很明顯地，這時的西班牙是充滿了矛盾。大戰後新興的資本主義要求開發國內市場以救濟不斷發生的危機。這就是說，要求廢除野蠻的封建式的剝削，改良農業，提高農民的生產力和購買力。但是地主貴族和教會僧侶們卻死死抓住他們的封建特權絲毫不肯放鬆。他們不願意對於農業採取任何改良手段，更不願意對農民作任何讓步。可是西班牙全國的土地約有三分之二為地主貴族和教會所佔領，而西班牙的農民又佔全人口總數 70%。如果西班牙的土地不重新加以適當的分配，農民的生活不予以切實的改善，換言之，西班牙的

土地問題不獲得解決，國民經濟是絕對沒法進步的。其次，西班牙的資產階級因為受了外國資本競爭的壓迫，特別殘酷地剝削本國的勞動者，企圖以此補償他們與外資競爭的損失，因而引起了勞資間劇烈的衝突。同樣，農民與地主和教會間的衝突也是日益尖銳化。此外是國內各民族間以及本國與殖民地（摩洛哥）間的衝突也是愈來愈緊迫。最後是全體人民與王權和里維拉獨裁間的衝突——這種衝突在世界經濟恐慌到來之前已經達到了頂點。

## 第二章 民主政府沒有能解決民主任務

自一九二九年年底在美國爆發的世界經濟恐慌的潮流，很快地就湧進了西班牙，嚴重地打擊了西班牙的脆弱的經濟基礎。於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一切矛盾都爆發出來了。首先被沖毀的是里維拉的獨裁政治。而里維拉的推倒又深深地動搖了西班牙整個社會的上層結構，給了一切反動勢力以猛烈的震撼，同時也就給了一般民眾，尤其是勞動者以深刻的刺激。勞動者和一切真正的民主派都暴動起來英勇地向代表王朝貴族和教會僧侶的王權作最後的進攻，這就是一九三一年四月的大革命。結果亞方朔是被趕跑了，西班牙幾百年來的專制王朝算告了結束，國家政制被宣佈為民主共和。

西班牙一九三一年的「四月革命」恰同俄羅斯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一樣，革命的主要動力完全是下層的工農群眾，特別是馬德里的工人。當馬德里的工人領導一般民眾奮不顧生地向王宮進迫時，柴摩拉所領導的共和黨還企圖同亞方朔作「和平的談判」，以便謀得妥協。但當亞方朔被群眾趕跑了時，共和黨人卻昂起頭來自稱代表民眾，宣稱擁護革命的勝利，因而攫取了革命的果實——政權。這與俄國二

月革命後米留哥夫所領導的立憲民主黨所幹的勾當前後如出一轍！

王權被推倒了，民主共和國成立了，可是民主革命的實際任務卻絲毫也沒有解決。亞方朔雖離開了他的王座，但一切地主貴族和教會僧侶的特權依然仍舊。他們照舊管理他們的田莊與教堂；照舊向農民徵收他們的地租和什一稅；他們照舊放高利貸；照舊將無數的耕地荒廢起來作獵場；甚至照舊鞭打農民……總而言之，全部的土地問題還是同革命前一樣。工人們的工作時間照舊的延長，工錢照舊的減少，資本家照舊的剝削和壓迫。國內加泰隆和巴斯克等被壓迫民族照舊受壓制。摩洛哥等殖民地照舊是殖民地。最後，王朝的貴族軍官照舊指揮他們的軍隊。乃至一般行政官吏，警察，稅收吏和學校教職員等，差不多沒有不是仍舊的。不錯，在馬德里的王宮和高級行政機關中出現了一批共和黨人，這些人昨天還是被踏在亞方朔的腳底下，今天卻站在共和國家的頂點上了——這確是一種完全新的現象。但是，難道西班牙的革命僅僅是為著這個嗎？！絕對不！十分明顯地，工人起來革命是為改善他們的奴隸地位；農民參加革命是為獲得土地；加泰隆等被壓迫民族和摩洛哥里夫人是渴望著民族平等的獨立的自決權；而一般人民則希望脫離那極端反動專橫的教會束縛和警察的經常追逐——這些便是西班牙革命的真實目標，也即是西班牙民主革命急待解決的歷史任務。然而乘著四月革命勝利而攫得政權的柴摩拉黨人對於這些歷史的民主任務不僅故意加以漠視，並且用種種陰謀詭計去避開它們。

這裡同樣令人們想起米留哥夫的故事。當米留哥夫在二月革命後取得政權時，對於當時俄國歷史議事日程上所提出來的民主任務，如土地問題、民族問題、戰爭問題以及工人生活的改善問題等，他都用盡詭計去拖延或避開它們，而同時卻盡力保護地主

貴族和教會以及資本家的權利。爲什麼如此呢？理由很簡單，因爲米留哥夫黨之最後投身革命漩渦，出而挺身擔任組織民主共和政府，爲的就是按住革命使其不要走得過遠；以便保持地主貴族僧侶和資本家們的原來的權利。柴摩拉政府亦完全是如此。柴摩拉黨雖然是代表西班牙的資產階級，但這個階級與地主貴族和僧侶等卻有其深切的連系。在亞方朔的統治下，前者對於後者雖曾表示過厭惡和仇恨，但此刻情形已經轉變了，因爲西班牙的工農群眾已經抬起頭來不願再照舊過他們的奴隸生活了，這在柴摩拉黨人看來自然是危險不過的。因此他們覺得他們當前的責任，不是徹底肅清一切封建殘餘勢力，改造西班牙，解決西班牙民主革命的任務（如土地問題、民族問題和改善工人地位等），反而是怎樣設法抑制革命群眾的「過火」了。

但是已經在四月革命中抬起頭來打倒亞方朔的工農群眾，他們覺得他們已經幹過一件大事，他們覺得他們手頭確有權利，而且事實上他們已經普遍地組織起來，動員起來了。雖然他們沒有好的領導，但他們再也不能安靜下去，他們本能地覺得須要前進，須要鬥爭。農民自動地反抗地主，甚至焚毀教堂。工人們憤激地要求增加工資和減少時間。於是罷工與抗租的運動如潮水一般湧現，此起彼伏，連綿不絕，整個古老的西班牙都被激動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反動的勢力自然會以同等的速度增漲起來。於是官僚、貴族、地主、高級僧侶和高級軍官以及一切反動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份子都分別地集合於皇黨和法西斯的周圍，在各方面向革命的群眾反攻，破壞他們的組織，傷害他們的領袖。同時服從上面威脅和壓迫柴摩拉政府，要求鎮壓革命勢力，並以全力從事反革命的陰謀政變。而一九三四年十月對加泰隆和斯特拉斯的軍事進攻與屠殺，便是這一反革命陰謀之部份的實現。在這次事變中，雖然沒有能完全摧毀革命的勢力，但皇黨和

法西斯的企圖已經十分明顯，而柴摩拉和勒樂等所謂共和主義者的面目更是暴露無遺了。「十月事變」充分證明西班牙的革命已經臨到異常危險的道路。要挽救這危險只有採取最堅決的革命政策，即像列寧在二月革命後所採取的《四月提綱》那樣的政策，才有可能。這裡首先便關係到革命的領導問題。

在那時，西班牙較有力量的自稱站在革命群眾方面的黨，有社會民主黨、無政府主義工團派和共產黨。這三個集團的政治旗幟雖然不同，但它們在群眾運動中自始即起著負的作用。社會民主黨像俄國二月革命後的孟什維克一樣，始終是作亞柴拉一派人的尾巴，而亞柴拉則是柴摩拉左邊的副手。工團主義者的政治上的消極原則，在革命時期永久是麻痹革命群眾的麻醉劑。西班牙的共產黨的政策像它不久以前在德國的兄弟黨一樣，站在極右的地基上擺弄左的姿勢。即一方面以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對抗無產階級專政，同時又宣佈社會民主黨為社會法西斯，拒絕與之作任何聯合戰線的行動。由於這些黨派的政策之錯誤，所以西班牙的革命群眾在長久的時期（五、六年）中不能形成一種強固的力量，從「四月革命」的基礎上再前進一步作奪取權力的鬥爭。因此結果便遭到「十月事變」（一九三四年）的「懲罰」，這難道是偶然的嗎？！

### 第三章 人民陣線及其擁護的政府幹了些什麼？

經過「十月事變」的「懲罰」以後，西班牙的革命群眾從事實上得到了不少的教訓。即站在群眾方面的各種黨派的黨人們似乎也有些覺悟。特別是社會民主黨的下層和工團主義派的群眾，都表示對於其上層領導政策的不滿，要求改變路線，大有左傾之勢。但不幸的是，這些黨派的上層領袖們不僅沒有瞭解「十月事變」的教訓，而且愈益脫離了它們原來的立場，至

少共產黨和工團主義派是如此。這兩個黨派從前對於亞柴拉所領導的左派共和黨的「左傾」還多少有點不信任，現在卻公然要求同它一起建立所謂「人民陣線」了，尤其是共產黨「變」得厲害，它從前認定社會民主黨是「社會法西斯」，絕對不能與之聯合戰線，現在連亞柴拉黨也是最可靠的盟友了！自然，共產黨、工團主義派和社會民主黨及各種工會團體間建立聯合戰線以抵抗共同的敵人皇黨和法西斯的進攻是應該的，是絕對需要的。但與亞柴拉建立聯合戰線，那就等於把自己的手足束縛起來，讓法西斯和皇黨去自由活動，也就是把工農大眾讓法西斯去自由處置。因為亞柴拉正同柴摩拉一樣，無論如何是不會用最堅決的手段對待法西斯和皇黨的。

社會民主黨、工團主義派、共產黨和各工團既與代表布爾喬亞的亞柴拉黨聯合在一起，它們的政綱和行動自然不能包含有任何革命的因素了。所以「人民陣線」的共同綱領上除了一些「復興工業」，「保護小工業與小商業」，「給農民以信用借款」，「改組保障憲法的法庭」，外交政策依照「國聯的原則與方法」來決定等等空洞無意義的和機會主義的東西外，便再找不出什麼。「土地國有」因為左派共和黨的反對便私下打消了。至於國內民族和殖民地民族的獨立自決權，連提也沒有提及。雖然「人民陣線」派的政綱是如此，但當它們號召民眾起來選舉它們的黨員時，民眾還是積極地站在它們一方面，選舉了它們。因為民眾從「十月事變」中深深地感到了柴摩拉和勒樂所領導的政府，僅僅是走到法西斯專政的一道橋樑。所以他們想藉選舉「人民陣線」派來截斷這一道橋樑——這在民眾方面的感覺自然是對的。不過真正的問題卻在於怎樣組織群眾力量去消滅敵人，但人民陣線派的政策恰好是妨礙了這種組織群眾力量消滅敵人的工作。

「人民陣線」派於本年二月底的選舉中獲得勝利，即成立所謂「人民陣線政府」。但實際上西班牙的政權並沒有什麼改變，不過把柴摩拉換成亞柴拉而已。所以「人民陣線政府」成立之後，除了公佈一個赦免政治犯的大赦令含有較重要的政治意義外，簡直沒有任何積極的設施。有一位元老蘇聯記者名愛倫堡的於今年四、五月間考察西班牙「人民陣線政府」統治下的狀況時，曾有以下的記載：

「同樣的摩天樓，同樣的茅屋，同樣的貧窮。農夫們仍舊使用著歷史以前的犁耙。……工人喝著清水，而農人卻連這也只能夢想著。街上的孩子們都是襤褸赤足而且被遺忘了的，要進一個學校比中彩還難……生活是艱苦而殘酷的……

「同樣的三角帽（即法西斯所戴的帽子），像哥雅所畫的「恐怖」一樣，他們在陋巷中間，在橄欖樹中間，在孩子們中間溜躑著……

「在塞哥維亞，法西斯高聲叫喊著：『打倒亞柴拉，醒來，西班牙！』工人們想分散法西斯，內衛團卻開始向工人開槍……

「總統是換了，但總統的衛隊長勃脫——他就是『平定』一九三四年十月加泰隆之亂的——卻並沒有撤職。警察仍然保藏著『叛徒』的名單。在那污損的破舊的卡片上，那些曾經反叛帝制，反叛勒樂和盧布爾斯政府的人們的名字都記載著。卡片上有幾個名字都已是現在的部長了，但在警察的心目中，依然認為是危險的『叛徒』呢。

「巴塞隆納發生了冶金工人的罷工。警察搜查職工會，有八十個工人被拘逮了。加泰隆的政府很為難，便叫警察把工人釋放，警察很不願意地照辦了。但過不幾天，他們又去搜查職工會，拘了一百二十人。

「同一的法律，同一的法官，同一的獄卒……」（以上均見〈西班牙與革命〉一文，譯載於本年八月某日的《申報》）

上面摘錄的記載，雖然是零亂而且膚淺，但這是出於一個「人民陣線」策略的發源地的記者的觀察，這可證明絕對不是出於「惡意」的描寫，所以值得我們特別注意。事實上人民陣線政府統治下的情形簡直同以前柴摩拉政府統治的時代沒有什麼根本差異。最迫切的土地問題完全沒有著手，農民依舊呻吟於地主貴族和教會僧侶的鐵蹄之下。加泰隆雖然獲得了表面的自治權，但摩洛哥等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還是依舊受著西班牙帝國主義的摧殘。軍隊完全照舊由反動的皇黨和法西斯的軍官所指揮。至於法西斯之橫行，警察對於工人的壓迫和對於革命者的仇視，法庭和獄卒的依舊，以及一般人民生活之艱苦殘酷等等的情形，那是連愛倫堡也看出了的。總而言之，「人民陣線政府」同以前的柴摩拉和勒樂的政府一樣，對於西班牙革命的民主任務，一點也沒有解決。對於人民的生活一點也沒有提高。一切的一切都推到將來。

然而革命的民眾卻有點等得不能忍耐了。所以「三月二十五日，愛斯脫瑪杜拉六萬的農民依照農業勞動者協會規定的程序，佔據了三千份的田產。其中阿挪卻羅伯爵有五萬公頃未耕的地——這伯爵是一個深嗜田獵的人。」「在阿斯杜拉·卡拉第煤礦的僱主決定休業，據他們說，是爲了煤產量的過剩。但礦工卻將煤礦田由他們自己接辦著。在巴塞洛拉，工人接收了一家給僱主關歇的玻璃廠。馬的斯紡織廠的工人一知道董事會決定關歇該廠的消息，立即組織一個委員會來繼續進行業務……」（見愛倫堡前文）。但人民陣線政府對於民眾這些自發的舉動採取什麼態度呢？愛倫堡告訴我們說：「政府既不站在僱主的一邊，卻也不承認現在的情形爲合法，據說，一切的一切都是『暫時』的。」號稱人民陣線

的政府對於人民自己接收那些荒廢的土地和關歇的工廠來從事生產這種「情形」反而不肯「承認」爲「合法」，難道讓土地荒廢和工廠關歇才算是「合法」嗎？！這是何等的滑稽！何等的人民陣線政府！「一切的一切都是『暫時』的」，不錯，「一切的一切」都等待法西斯來解決！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所謂人民陣線政府只是儘量地把一切急待解決的問題拖延下去，把歷史上最可寶貴的時間荒廢掉，而專用些空洞可鄙的言詞去麻痹群眾，以便法西斯和皇黨獲得時間去準備他們的反革命暴動來結束這個「暫時」的局面。假如人民陣線政府真是代表人民的，則當它一握得權力的時候，便應立即宣佈土地歸農民；允許摩洛哥的里夫人有完全獨立的自決權；建立工農兵代表聯合會，加緊武裝人民，軍官由兵士選舉（這是淘汰反動軍官絕好的方法）；堅決地打擊法西斯、皇黨及一切反動勢力；剝奪教會一切權利——這樣，不但人民陣線政府立刻獲得人民大眾和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擁護，而且法西斯和皇黨的反動勢力根本沒有存在和生長之餘地了。可惜，當一部份革命份子（如馬克思主義聯合工黨（P.O.U.M）的左派——第四國際的支部）向群眾提出上敘的革命政綱時，而亞柴拉，加白勒諾（社會黨領袖）和狄茨（共產黨領袖）這些西班牙的米留哥夫、蔡勒特里、謝德曼和愛伯爾特們都同聲斥爲盲動，施以威脅和鎮壓。「人民陣線政府」似乎早已確定它自己的責任只是繼續完成柴摩拉和勒樂政府所未完成的任務而已。

#### 第四章 內戰的發生與兩個營壘的對照

但在另一方面，法西斯和皇黨卻能十分瞭解局勢，捉住時機。它們巧於利用「人民陣線政府」的軟弱無能，用全力在各方面進行反革命的陰謀暴動工作。這種工作在軍隊中，

在落後的農民中，在摩洛哥的駐軍和里夫人中，都是半公開地進行著，並且進行得十分迅速和順利——但「人民陣線」派卻視若無睹。到了本年七月初，反革命暴動的一切佈置都妥貼了，所剩下的問題只是等待發動的日期——原定為七月二十五日。由於索台洛（皇黨領袖，里維拉獨裁時代的財政總長，預備暴動成功後的臨時總統）的被暗殺，更催促了反革命暴動的提前爆發，首先由佛朗哥將軍指揮摩洛哥一萬八千駐軍於七月十八日揭出了反叛的旗幟，於是西班牙反革命與革命勢力的空前內戰便這樣正式開幕了！

佛朗哥指揮駐軍在摩洛哥暴動後，立刻佔有整個的摩洛哥以為反革命的策源地，並招募大批的里夫人組成軍隊，與西班牙駐軍陸續開往西班牙本國向「人民陣線政府」和革命民眾進攻。同時西班牙國內的軍隊到處回應佛朗哥的暴動。據八月十八日路透社的通訊說：「依一般人之估計，目下約佔有西班牙全部軍隊 80%，共計二十三萬五千人以上，實行叛變。」若與摩洛哥一萬八千駐軍合算起來，這次參加反革命的軍隊占西班牙全部軍隊 90%以上。人民陣線派曾經大吹大擂地宣傳要肅清軍隊中的反革命軍官，現在事實證明反革命軍官幾乎指揮了全部軍隊來攻打「人民陣線政府」和革命民眾。此外在各城市和鄉村差不多都有法西斯和皇黨所組織的武裝隊伍湧現出來。這些事實都證明反革命派事先對於暴動準備的充分，對於軍隊聯絡的嚴密，指揮的統一和一般規模之浩大。這裡的原因是由於整個的軍隊是握在反革命軍官手裡，全國的軍營變成了組織反革命的中心。再加上一切城鄉的教會及許多警察署、民團、學校（特別是教會把持的學校）……等，都像蜘蛛網一樣密佈全國，盡力於反革命的武裝暴動工作。至於一切地主貴族、高級僧侶和財政巨頭大資本魔王，不用說是他們所有的物質力量支持著反革命派的一

切活動的。但這次西班牙反革命勢力方面還有一個最大的助力，那就是法西斯的意、德和半法西斯的葡萄牙。

現在就是蠢才也可以看出，這次西班牙佛朗哥和穆拉等人的反革命暴動計劃，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是事先參與的（大概還是經過人民陣線政府駐在羅馬和柏林的公使及武官等，因為自佛朗哥一發難，這兩個地方的公使和武官便立刻宣稱脫離馬德里政府了）。所以當佛朗哥在摩洛哥揭出叛旗時，墨索里尼即刻派大批飛機（二十四架）飛往摩洛哥，而希特勒同時派遣軍艦兩艘運載大批軍火至該地。駐在摩洛哥的叛軍及新編的里人軍之進入西班牙，便完全是靠意德飛機的運送及其軍艦的掩護。現在叛軍中的飛機達數百架，都是由意德提供的。至於大炮及其它軍器等大半也由意德供給。叛軍中有許多軍事指揮官和飛機師等都是意德的法西斯。而葡萄牙則除了供給一部份軍需品外，主要的任務就是將意德的軍火經過它以輸送西班牙的邊界交給叛軍。此外意、德、葡對於叛軍一定還有財政上的接濟。總而言之，這次西班牙反革命派勢力之所以很迅速地組織起來舉行暴動，及暴動後之節節勝利乃至造成現在的優勢，根本上雖然是由於人民陣線政府之縱容（不先發制人），但同時也實在是由於意、德、葡三國的全力幫助。

自然，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之幫助西班牙的反革命派，不是簡單爲了法西斯主義上的什麼志同道合，主要還是爲了他們自身及其所代表之帝國主義的利益。首先他們是害怕西班牙走上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那條道路。因爲這樣將會激動全歐洲，首先是法國的無產階級起來作奪取政權的鬥爭，這對於法西斯的意德，不用說是特別危險的。其次，墨索里尼急欲在地中海擴充勢力範圍以爲對抗英國之用。所以他死死地抓住西班牙的反革命派，企圖經過他們攫取西班牙和摩洛哥

的許多權利，特別是攫取摩洛哥北部的休達港和巴里阿利群島中的米洛卡島——這兩個地方如果落在義大利掌握中，則英國的直布羅陀海峽將要受絕大的威脅。而希特勒則同樣是想藉著西班牙法西斯的勝利在西班牙和摩洛哥安置一些陣地，以便日後進入非洲恢復德國在非洲的一切舊殖民地。並且還可藉此包圍法蘭西。至於葡萄牙之援助西班牙反革命則頗簡單，就是葡國的執政者害怕西班牙革命群眾的勝利會引起葡萄牙人民的革命來推翻他們的反動政權。墨索里尼，希特勒和葡萄牙的統治者，正因為他們都是為著自己的迫切利益，所以不顧一切地決心援助西班牙的反革命派，大有不達到最後勝利決不停止之勢。而西班牙的反革命派因為這種援助，所以也就愈加堅決和猛烈地採取進攻的姿勢。

至於「人民陣線政府」方面，我們已經指出過，在事變之前沒有任何準備，甚至連準備與反革命戰爭的意志都沒有。一切時間都荒廢在自誇勝利和許多空洞虛偽的演說及文告裡。最壞的是，加白勒諾和狄茨們甚至用種種謊言和方法去抑制革命民眾的自動武裝，為的是怕引起他們的同盟者亞柴拉派的不滿，將妨害到他們的「人民陣線」的「鞏固」。因此，當佛朗哥和穆拉們高舉起叛旗向馬德里政府宣戰時，人民陣線派的領袖們無不驚慌失措。迄至被馬德里及巴塞洛拉等城市的工人群眾所壓迫，不得已起而去進行抵抗時，他們的態度還是不堅決的。實際上亞柴拉所領導的「人民陣線政府」時時都希望同叛軍謀取妥協以犧牲人民。國民社於八月十日（即開戰後的二十三日）自馬德里發出如下的通訊：「西班牙政府軍與叛軍在各路相持之時，雙方代表曾在法國愛斯加爾杜那地方進行秘密談判。現因叛軍態度強硬，並已決定進攻，談判遂告失敗。」如果不是叛軍的態度過於強硬，

一定要用武力蕩平馬德里政府，消滅亞柴拉和齊羅爾（當時內閣總理）派，恐怕亞柴拉和齊羅爾早已投降了。

假如「人民陣線政府」真有決心抵抗反革命的進攻，至少自七月十八日起即應動員一切的力量去武裝人民，在軍事上立刻採取反攻的陣勢；同時在政治上立刻宣佈土地歸農民，宣佈摩洛哥的獨立自決權，成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肅清政府中的妥協份子。這樣或者還來得及挽救危局。因為在這時摩洛哥的反革命軍還沒有進入西班牙，國內反革命的軍事力量還沒能集合攏來，並且有些軍隊還在動搖中。土地歸農民的宣佈一定可以引起兵士們對革命的熱望，同樣宣佈摩洛哥的獨立自決權可以引起里夫民族的興奮——這些對於叛軍一定會發生絕大的影響。尤其農民將為獲得土地而擁護政府，打擊地主貴族和僧侶並堅決地去從事對反革命的抗戰。然而人民陣線政府在政治上始終保持它原來的機會主義的立場，在軍事上更是完全採取消極的防守戰略。政府雖然在九月四日（開戰後一個半月）改了組，加入許多社會民主黨員和兩個共產黨員，並以社會民主黨領袖加白勒諾作內閣總理，然而加白勒諾的政策（無論是政治上或軍事上的）與齊羅爾的政策並沒有什麼根本刷新。總而言之，自內戰發生後的人民陣線政府，還是緊緊地抱著它原來的機會主義的立場。在政治上似乎是等待著軍事告了結束後再說，而在軍事上則又是等待敵人來攻擊時再去抵抗，但當敵人來猛烈攻擊不能抵抗時，自然只有一步一步地向後退了，照這樣下去，結果將是退出西班牙！

在反革命方面既有國外的意德葡的堅決的充分的援助。但在人民陣線政府方面又怎樣呢？它似乎也有它的國外的同情者，至少有如法國的人民陣線政府和蘇聯。不錯，法國的白倫政府和莫斯科都曾宣稱同情馬德里政府，反對意德葡對

於佛朗哥的接濟，但事實上它們卻是對它加以封鎖，阻止它從國外獲得任何必要的軍需品罷了。因為自從聰明的法國的人民陣線政府向英、德、意、葡、蘇聯及其它各國提出訂立「不干涉西班牙內戰協議」（即禁止各國對西班牙內戰的雙方供給軍火及其它軍需品）的申請書以後，法、蘇、英及荷、比等國都實行對馬德里政府停止軍火的出口，希望意、德、葡亦照樣對待叛軍。可是意、德、葡於口頭上答應之後，暗地裡卻反而加倍地把軍火運送給叛軍了。無怪乎馬德里政府出席國聯會議的代表要憤慨地向法、英、蘇等國說：「你們主張不干涉西班牙的內戰，實際上就是干涉我們，使我們得不到軍火去抵抗反革命的進攻。」現在大概已沒有人能否認這個事實了吧！但事情何以弄到這樣相反的地步呢？簡單說來，法國的人民陣線政府恰同西班牙的人民陣線政府一樣，是機會主義的、妥協的、膽怯的，因而是軟弱的。它對內既害怕本國的法西斯和大資產階級的反對，對外又怕得罪意、德，恐因此引起戰爭。總一句話說，它要維持資本主義世界的「和平」。爲了「和平」，不但可以犧牲西班牙的人民陣線政府和革命羣眾，即連它自身及法國的革命羣眾將亦在所不惜。蘇聯之不敢堅決援助西班牙的人民陣線政府，主要也是由於從一國社會主義出發之極端保守的「和平主義」政策，其理由亦約略與法國的人民陣線政府所持的相同。至於英國，本有舉足輕重之力，但它的自身亦早已陷於不能自拔的矛盾地位中。因為它既一方面擔心佛朗哥派的反革命勝利將使意德在西班牙摩洛哥和地中海的勢力膨脹起來，妨害它的利益；但同時它也很害怕西班牙的革命民眾打敗法西斯皇黨後走上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道路。所以它於無法之中只好接受了法國白倫政府的敷衍辦法——雖然這辦法極有助於意德，也只好忍受了。

但西班牙的工人和農民及一般城市貧民，在這次戰爭中卻表現了稀有的英勇和犧牲精神。雖然人民陣線派在平時爲了保持西班牙資產階級的利益，極力抑制他們的要求，阻止他們自動武裝，但當反革命的真正危險到來時，他們還是立刻拿起武器走上前敵去。雖然人民陣線政府交給他們的武器是一些陳舊的東西，但他們始終憑著他們的勇氣與決心去同那持著精良武器並素受訓練的法西斯所領導的軍隊對抗。他們並打過許多次數的勝仗。馬德里政府之所以能夠抵抗敵人到現在，並還在堅持著抵抗者，就全靠著這些革命羣眾之無比的英勇和犧牲精神。西班牙革命的一線希望也就僅僅系在他們身上。假如有一個真正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在鬥爭中迅速形成起來運用列寧的《四月提綱》，堅決地排除人民陣線的機會主義，領導西班牙的工農大眾去作最後的決死活的戰爭，事情還是有希望的。所以現在擺在西班牙面前的前途還有兩個：無產階級專政或法西斯專政。

### 第五章 西班牙內戰與國際局勢的前途

但我們把西班牙內戰中兩個營壘的實際狀況分析以後，我們不能不說反革命勢力已佔了上風。而在革命方面，由於領導的人民陣線派之可恥的機會主義的接二連三的錯誤政策，以致放過了許多大好的時機，削弱了羣眾的力量，雖然有革命羣眾之英勇奮鬥和犧牲精神，但現在的情形，還是很危險的。

如果西班牙的革命自始能得到正確的領導，勝利也許早已實現了。就是當人民陣線派於本年初獲得選舉上的勝利組織所謂人民陣線政府時，如能立刻採取像列寧在俄國二月革命後所採取的策略，西班牙的無產階級也許不要經過流血的暴動而踏上了政權。最後，就是當七月十八日的內戰開始爆發時，人民

陣線中加白勒諾和狄茨所領導的兩個有力的黨，若能立刻改變以前的錯誤脫離亞柴拉的束縛，重新採取堅決的態度領導革命群眾去戰爭，情形一定不致弄到現在這樣的危險。假如西班牙的革命勝利了，則法國無產階級的革命更有勝利的把握。法國革命的勝利，整個的歐洲乃至全世界的面貌都將因之而改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必然成爲歐洲工人革命勝利祭壇上的羔羊。反之，西班牙如果是法西斯最後取得了政權，首先就要影響到法國。法國的法西斯將立刻向革命的工人群眾採取猛烈的進攻陣勢。法國革命的前途將會受到絕大的危險。如果法國的法西斯也獲得勝利，則整個歐洲大陸將完全爲法西斯的反動勢力所籠罩。蘇聯將要遭受著軍事的侵略，而其命運是不可測的。同時我國淪於朝鮮第二的可能性也更大了。

但是，西班牙的工人階級尙在鬥爭中，全部問題將由鬥爭的發展來解決。最中心的問題要看西班牙的工人階級能否脫離人民陣線機會主義的羈絆，能否在鬥爭過程中集合到一個真正馬克思主義的黨的領導之下進行堅決的鬥爭。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 附錄：「格柏烏」在西班牙的活動

爲要深切地瞭解西班牙「人民陣線政府」統治下的真實狀況和西班牙內戰的前途起見，關於西班牙史大林黨的「格柏烏」活動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自從去年巴塞洛拉的「五月事變」發生後，西班牙工人政黨中最左的一個政黨——馬克思主義聯合工黨（P.O.U.M）——的領袖如安德魯·寧、儒安·昂德拉、儒林、高爾金等，和許多黨員，以及其他工會的左派份子都被史大林黨所組織的格柏烏私行逮捕，並從巴塞洛拉送到馬德里的私有地牢裡，監禁起來；罪名是「佛朗哥的代理人」。

英、法許多左派政治家和工會領袖們，對此都表示異常的驚怪和義憤。因此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到西班牙實地去考察，想把這種誣陷巨案由國際工人團體來共同研究，以期水落石出，大白於世，並對史大林黨施以壓力而給被誣害的戰士以援助。下面的幾段，就是從法國和英國的工會領袖和政治家關於考察該案的報告中摘錄下來的。

法國著名的工團主義者羅宗關於此案考察的報告如下：

「法士格與孟柴尼（西班牙全國勞工聯合會的領袖）認為：寧及別人的被捕是可恥的。並且他們的立場，如法士格在一個講演裡聲明的，是這樣的：如果在馬克思主義聯合工黨內部有奸細，如別的一切反法西斯政黨內部也會有的那樣，那麼把這些奸細懲辦好了，但這卻不能作為消滅馬克思主義聯合工黨的整個組織的理由。」

「此外，他又告訴我們，現在全國勞工聯合會已有八百會員被捕，還有六十個會員失蹤」。

「加白勒諾（西班牙社會黨領袖，前任人民陣線內閣總理）告訴我們說：他久已熟識寧，高爾金及別的個人，雖然他是他們的政治反對者，但他很清楚地知道，他們不是並且不會是法西斯的奸細，『如果寧與別人現在已受偵探的迫害，則其原因完全是政治的，完全因為共產黨想破壞馬克思主義聯合工黨。』」

英國獨立工黨領袖芬克·希洛克威也是代表該黨到西班牙去考察寧等的案件的，他的報告共分九點：

「（1）壓迫馬克思主義聯合工黨是共產黨發動的，由共產黨直接指揮的巡警執行的。

（2）伐倫西亞與加泰隆政府中的非共產黨份子，都因共產黨陰謀之過份而感到不安。

(3) 全國勞工聯合會是一致地反對馬克思主義聯合工黨之迫害的。加白勒諾及社會黨工會中的左派社會主義者都反對這種壓迫。但在該工會內部還有共產黨勢力，這情形使他們難於處置。

(4) 力量正在集合，以打擊共產黨的陰謀陷害政策。

(5) 在我們代表團得到關於審判的讓步時，幫助馬克思主義聯合工黨的國際壓力，必須加重（建議）。

(6) 營救外國社會主義者（因為格柏烏還逮捕了許多各國在西班牙幫助工人階級抵抗法西斯的社會主義左派份子），最好是由各本國去行動。因此我們呼籲，應該組織長久的國際委員會到西班牙去。德、意的代表必須立即前去。此外，應組織一個代表西班牙、德、意政治犯的聯合會（建議）。

(7) 應該執行國際的營救鼓動。國際委員會應在我們代表團之後就到西班牙去（建議）。

(8) 馬克思主義聯合工黨，在非法的情形下仍勇敢活動著。它仍保持著自己的政見，並努力實行著一種實際的政策。

(9) 共產黨正在分散西班牙反法西斯的力量，並嚴重破壞反法西斯的鬥爭。」

此外，馬德里全國勞工聯合會的報紙在去年七月二十九日對於格柏烏的誣陷手段也表示如下的態度：

「我們應該首先聲明：我們相信並且還繼續相信，像寧、昂格拉、羅維拉、亞爾格等人，都是革命家。他們多年以來在西班牙無產階級面前，曾表明了他們知道怎樣為工人階級的利益而鬥爭。我們將要繼續相信他們的正直與政治人格；以同樣的態度，我們也相信佛朗西斯科、法雷爾的崇高的精神，雖然布爾邦的保皇黨們以合法手段把他們表現成西班牙的敵人與惡徒。」

從以上的報告看來，史大林黨的格柏烏在西班牙的活動，也就很可驚了。上面所敘之被捕的許多人的命運究竟如何，尚難推測，但安德魯·寧是確實被格柏烏私行處死了。由這一點不但可以看出史大林黨在西班牙的橫行狀態，而且亦可以看出蘇聯的黨案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西班牙內戰與國際局勢前途》，歐伯（彭述之）著，亞東圖書館印行，一九三八年四月出版。

(附錄5)

## 對於「新啟蒙運動」的檢討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二日)

南冠(彭述之所用筆名)

所謂新啟蒙運動，自最近三年前被人提出後，曾有一個時期在某些刊物上頗出風頭。即到最近，也還有人把它當作討論或宣傳的對象。可是結果怎樣呢？結果似乎同近年來其他的許多運動（如普羅文學運動，大眾化運動等）一樣，除了散播一些不高明的影響外，都成了無花果實，並且逐漸地被人們淡忘了，就是提倡這些運動的人也銷聲匿跡了。

這裡證明中國某些智識份子，對於任何思想運動都是不負責任的，他們不是根據於一時的投機衝動，就是盲從某方的命令等因奉此而行事，一等到個人的私圖達到了，或某方的命令停止了，於是「運動」也就隨之而置諸高閣，不管原來的目的達到與否。

我們爲了徹底推進思想前進起見，對於過去的一切思想運動，尤其所謂左派或號稱前進的思想運動，都不得不加以檢討，分析其社會根源，派系作用，以及對於群眾的影響等等，以便藉此得出今後思想及社會運動的指南。站在這個觀點上，我們現在來把所謂新啟蒙運動加一番檢討，大概不是多餘的吧！

### 歷史上一個典型的啟蒙運動

我們要想正確了解什麼是新啟蒙運動，必須把啟蒙運動的歷史來追溯一下。所謂啟蒙運動，也同歷史上一切偉大的思想和社會運動一樣，決不是偶然發生或人工造成的，而是

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上代表一種新興勢力或新興階級的思想解放運動。在歐洲先進國家的啟蒙運動時期，就是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其中以英法為代表。而這種運動的典型表現，也就是最徹底的表現，是法國。

這種運動的社會根源，乃是當時正在開始發展的資本主義要求擺脫中世紀殘餘勢力的束縛，而為其代表者即當時新興的資產階級。這個階級在經濟上已逐漸取得優勢，但在政治上和一般的文化上還是居於被壓制的地位——這情形在法國表現得特別尖銳，正因為如此，啟蒙運動也在法國表現得特別徹底。

啟蒙運動的策源地是英國。但英國因為經過 1640-60 年的大革命以及一六八八年的所謂「光榮革命」，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已取得了部份的權利，因而英國資產階級的啟蒙運動徹頭徹尾是調和主義的。他們以提倡自由神論去代替獨斷的基督教，提倡個人主義的倫理說去代替絕對服從的倫理，在哲學上起初是二元論（洛克），隨後則轉到純粹的唯心論或唯我論（柏克萊與休謨），在政治上則以君主立憲制度為滿足。但在法國的情形則相反。法國的政治是絕對的君主專制主義，而其支柱就是當時貴族和僧侶兩個極端反動的階級。這兩個階級不但壟斷了國家一切收入，一切政權，而且壟斷了一切文化機關（如教會、學校及出版機關等），一切思想領域。凡是維護舊社會制度和反動階級利益的宗教、法律、道德、哲學、藝術以及其他的思想風俗習慣等，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在這種情形下，負有發展法國資本主義歷史使命並已在經濟上取得相當優勢的資產階級，當然不能忍受，不能不根據自己的要求、自己的見解起而從事反抗。

這種反抗運動表現於思想上，就是法蘭西十八世紀著名的啟蒙運動。它的唯一的武器是「批評」。它確曾猛烈地尖刻

地批評了當時的專制政治，愚昧的宗教，不平等的法律，貴族的藝術，反動的唯心哲學，農奴制度的殘滓，以及一切束縛個人自由發展的思想風俗習慣等，它批評的標準是「理性」。不用說站在這個理性背後的，就是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但在這個長期批評奮鬥的過程中，卻展開了並完成了近代資產階級最先進的世界觀和政治理想。百科全書派的唯物論與無神論，盧騷的民約論以及孟德斯鳩的法意等，都是那時啟蒙運動之最高的產品。而一七八九-九三年的大革命，乃是這一運動的直接後果。如果我們可以說法蘭西的大革命是「武器的批評」，那末，它的啟蒙運動就是「批評的武器」。所以啟蒙運動在法國乃是資產階級的徹底的思想解放運動，而後來的大革命正是完全由這種思想解放運動準備起來的。

### 中國啟蒙運動的意義

「啟蒙運動」既是資產階級的一種思想解放運動，那末凡是已經發生了資本主義，出現了資產階級的國家，便或遲或早要發生這一運動，因此不但歐洲一切先進的國家都經過這樣的運動，就是落後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如埃及，印度和土耳其等，也都曾經有過它們自己的啟蒙運動。而我們中國的啟蒙運動，就是「五四運動」。

無疑地，五四運動的社會根源，在本質上是與法蘭西的啟蒙運動一致的。我國雖然經過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的專制統治，但由中世紀殘留下來的封建勢力還是依舊保存著，並且加以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及其與一切腐舊勢力的狼狽為奸，致使我國民族無法前進，因而激起了新興階級的反抗。五四的啟蒙運動便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爆發出來的。這個運動的主要「武器」也是「批評」。它曾大膽地批評了當時

軍閥專橫腐敗，帝國主義的無理侵略；它批評一切迷信，一切傳統，尤其對於舊禮教（以孔子為其代表，這略相當於歐洲的基督），施行了無情的攻擊。它的口號是自由，解放，民主與科學（所謂德先生與賽先生），並極力提倡文字改革（白話文）。這個運動，在中國思想界確曾開闢了一個新時代，一切舊制度，舊思想，舊道德，舊習慣，舊文學等等，都在「批評」面前遭受了嚴重的打擊。所謂新人生觀，即現代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民族民主主義，新科學新文學等，都成了當時一般智識界，特別是學生青年中間的口頭禪。尤其在文字改革方面獲得了光輝的勝利。如果說法蘭西的啟蒙運動是西方先進國家中的典型的啟蒙運動，那末我們的五四運動便可以說是東方落後國家中的典型的啟蒙運動。自然，我們的運動比起法蘭西的運動來要膚淺而狹隘得多，因為它還沒有深入到各方面，沒有形成自己的（中國資產階級的）思想和文化系統，就分裂了。就是說，其中的右派，因為所代表的大資產階級的卑怯性和反動性，在很短期內就停止，甚至往後退了；而其中最前進最激烈的一派，則因為受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及本國新起的工人解放運動的啟示，很快地便轉到了社會主義運動的一方面（《新青年》的轉變，就帶有象徵的意義）。但正因為如此，也就表示了我們的啟蒙運動的一個鉅大特點：我們的民主主義思想運動與社會主義思想運動中間的聯繫性與不斷性，換句話說，即表示了中國的民主主義思想運動一達到某種程度時，即要產生社會主義的思想運動；由此便預示了中國未來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一達到某種程度時，必然要直接轉入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五四啟蒙運動中這種思想上的特徵，到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中即變成了行動上的特徵。雖然這次革命是失敗了（主要是由於國際領

導的錯誤)，但它所給予中國未來革命的教訓是異常之偉大而極可寶貴的。

### 所謂新啟蒙運動究竟幹的什麼運動？

如果「舊」啟蒙運動是代表布爾喬亞的思想解放運動，那末所謂新啟蒙運動究竟是代表一個什麼階級的思想解放運動呢？提倡新啟蒙運動的主要人物，關於這一點，而且是最主要的一點，卻沒有明白地指示出來。在陳伯達，張申甫和艾思奇等所解釋的新啟蒙運動，不過是「團結救亡運動」，「民族解放運動」，或「愛國運動」及「民主運動」等（見陳伯達的「新啟蒙運動雜談」，張申甫的「什麼是新啟蒙運動」以及艾思奇的「新啟蒙運動和中國的自覺運動」等文），這顯然說的是一種超階級的運動。但思想上的超階級運動是沒有的，凡表面上所說的「超階級」，實際上往往是代表資產階級。

至於這些新啟蒙運動家對於新啟蒙運動所提出的主張和口號，也是開倒車的反動的。他們口頭上都說新啟蒙運動是繼續和加深五四運動，但實際上他們的主張和口號卻比五四運動時代要倒退得多。例如陳伯達竟公開地說：「如果我們稍為涉獵一下過去一些啟蒙思想家的著作，那末，我們就可以看到他們對於一些問題的提出，有時甚至比我們現在所提出的更為無顧忌地激烈。一般說來，我們對於許多問題的提出是很謹慎的」（見《讀書》第三號）。所謂「謹慎」，就是對於現行的制度，現時佔統治地位的思想或主義，不宜多作批評，而應盡量與之妥協。甚至對於「國粹」，對於孔子的「舊愛國說」，對於禮記上及康有為和譚嗣同的「大同說」（見同上所引）都得加意「保存」，這就是說，即封建時代的「排外主義」和「烏托邦主義」，也得繼承下來。張申甫更說：「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見《什麼是新啟蒙運動》），彷彿「孔夫子」

的封建反動思想對於我們的時代還大有益處似的。艾思奇也跟著說：「國難的緊迫，不容許我們完全推翻什麼或建立什麼……就把孔家店去作例子吧……我們……不必要徹頭徹尾把它打倒」（見《文化食糧》第一卷第一期）。夠了，夠了，原來這班新啟蒙運動家所提倡的新啟蒙運動，不但主張投降布爾喬亞的思想，甚至還企圖與舊封建勢力和封建思想（五四運動所堅決反對的）妥協調和，然而這正是第二次革命失敗後布爾喬亞自己所努力幹過的工作呢！由此可以充分地明瞭，所謂新啟蒙運動也者，不過是向一切舊勢力舊思想之屈服投降而已。

###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新啟蒙運動

我國經過了「五四」運動和一九二五-二七年的第二次革命運動後，一般的啟蒙運動時期，即歷史上所謂資產階級的思想解放運動時期，早已過去了。換句話說，就啟蒙運動這一字的嚴格意義或歷史傳統來說，這種運動在中國是再也不會有了。但如果我們不拘於啟蒙運動的歷史傳統，而僅就啟蒙運動是一個新興階級對一切反動思想的批評運動或思想解放運動來說，這樣的運動還是十分需要的。尤其是現在，不但反動的統治階級用盡一切權力和手段在壓制和束縛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思想自由，就是以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代表自居的人物或派系，也是不顧一切地壓迫和鉗制勞苦大眾及革命者的頭腦。人們用詭辯代替了辯證法，用偽造代替了事實，用造謠代替了宣傳，用誣陷代替了爭論，用妥協代替了鬥爭，用投降代替了革命，用邦拉巴特主義代替了普羅列達利特的狄克推多，並且把任何革命的悲慘失敗都說成爲最高指導者的領導之絕對正確，把一切對反動思想和反動政策的批評都指爲奸細行爲……總而言之，指鹿爲馬，顛倒黑白，成了我

們這個世界上最流行的技巧。這種思想界上的「中世紀主義」，這種被壓迫階級內部的「宗教法庭」，如果不用「批評的武器」予以嚴厲的徹底的清算，則我們對於剝削階級和壓迫階級之「武器的批評」將永無希望。因此在這個歷史階段上，以真理為標準，以歷史事實為根據，來一個大膽的絕決的深刻的批評運動，實在是絕對需要的——如果批評是任何啟蒙運動的最高表現，那我們就叫這種批評運動為新啟蒙運動亦無不可——但人們近年來所提倡的「新啟蒙運動」，卻恰恰與此背道而馳！

如果新啟蒙運動就是站在普羅列達利特觀點上的批評運動，則我們不但對於任何的封建殘餘勢力，任何的封建思想，任何侵略者的壓迫與欺騙應予以嚴厲的抨擊，就是對於一切布爾喬亞的反動制度和思想，也得採取不可調和的批評態度。最後，而且最重要的，是關於被壓迫階級內部的一切虛偽和毒害的思想，更應拿來放在「批評」的光線之下，予以透徹的揭露。

在目前的國際範圍內，須要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橫暴，反對侵略，這是毫無疑義的。但究竟誰是法西斯主義的真正幫兇，誰絞殺了德國的革命運動，幫助了希特勒走上政權；誰閹割了西班牙的革命勢力，使弗蘭哥獲得最後勝利……；這一切都應受「批評」的檢查。至於在現時的我國，團結人民大眾以反抗當前的死敵，把抗戰支持到底，更是天經地義。但對於敵人侵略我們的歷史根源，我國當局過去及現行政治上和軍事上的一切設施，以及各種在野政派的主張和行動，也都得加以批評的揭發。

但爲了有效地順利地進行批評運動，無論在任何一個國家內，一個階級內，一個黨派或集團內，爭取民主自由是絕對必要的。

一切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批評的武器」，乃是保證「武器的批評」之勝利的前提。我們希望被壓迫的人們起來大膽地忠實地運用「批評的武器」吧！

(附錄6)

## 歷史唯物論闡釋<sup>1</sup>

將辯證唯物論運用到人類社會及其發展方面，便成爲歷史唯物論或唯物史觀。反過來說，歷史唯物論乃是人類社會運動的基本規律，反映於人類頭腦中、並爲人類所理解、所抽象出來的基本規律。

人類自從以兩足站立起來，用兩手自造工具（不管如何原始），並用這工具開始向自然界爭取生活資料時起，便開始脫離了動物生活而自成一社會，因而就產生了人類社會發展的特有規律，歷史唯物論，便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此種特有規律之最一般的和最基本的體現。對這種最一般的和最基本的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雖然也曾部份地被某些思想家（如某些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和歷史家們（如法國王政復古時代的歷史家們）所觸及或指示過，但將它們全部發掘出來而組成爲一完整的體系，且藉此以說明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和趨勢的，卻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因此可以說，歷史唯物論乃是馬恩兩氏底特有天才的和深刻的創作。

至馬恩兩氏發掘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並把此種規律組成他們底歷史唯物論的時期，那不但與他們創建辯證唯物論同時，而且是與之交相錯綜不可分離的，從某點上說，他們的歷史唯物論甚至比他們的辯證唯物論成熟得更早。正如馬克思在他的《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說的：他在《德法

---

<sup>1</sup>編者按：我們得到此文時，原稿第一頁卻寫第二十五頁，顯示在此之前已寫了二十四頁，談論了另一問題。雖然如此，現有的此文看來卻是獨立論述的，富有理論價值，特收入此卷內。

年鑑》時代（一八四二——四四年）研究的結果，便已得出法律及國家的真實基礎乃是市民社會，即社會的經濟構造了。所以他認為「市民社會的解剖的研究應當求之於經濟學」。恩格斯在《德法年鑑》上所發表的《經濟學批評大綱》和《英吉利狀況》（一八四二年）更清楚地指示了經濟因素是現代社會之決定性的歷史的動力，是現在階級矛盾發生的基礎。一八四四——四五年，可以說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其歷史唯物論的時期。這從他們在此時期內所發表的《經濟學的哲學的草稿》，《神聖的家族》，《英國勞動階級的狀況》，《費爾巴赫論綱》及《德意志的觀念形態》諸著作中明白表現了出來，換句話說，歷史唯物論的最基本的諸規律都在這些著作中闡釋過了，後來馬克思便在《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根據上敘的諸著作在其《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作出了如下的歷史唯物論的綱要：

「人類在其賴以生存的社會生產中，進於一定的必然的不受其意志所左右的關係——生產關係，這些關係適應於其物質生產力之一定發展階段。

這些生產關係之總和便成爲社會的經濟結構，真實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建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建築物，而社會意識的一定形態也是適應於這個基礎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和一般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人的實在，而是人的社會實在決定人的意識。

在其發展上的某一階段，社會物質生產力必然要與當時的生產關係——或者用法律的術語來說——要與當時的財產關係，發生衝突，——生產關係以前便是在這些財產關係中發展的。這些關係本來是生產力的發展形式，現在卻變成了生產力的障礙，於是社會革命到來了，經濟基礎改變了，整個巨大的建築物或遲或速也要發生革命。觀察這種革命時，

必須將物質的由自然科學正確地表示出來的經濟生產條件上的革命，與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總而言之，即一般意識形態的——革命，分劃清楚；——在後一類革命中，人類自覺這個衝突並與之爭鬥。

不能根據革命時代的意識來判斷這個時代，亦如不能根據個人的意識來判斷個人一樣。恰恰相反，這個時代的意識，必須拿物質生活的矛盾，拿物質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中間的矛盾來解釋。

任何一種社會結構，在生產力未曾發展到這個結構不能容納以前，是不會崩潰的；同樣，任何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舊社會內這個生產關係所需要的物質生存條件未曾成熟以前，也是不會產生出來的。」

這個歷史唯物論的綱要，不但絕對正確，而且是異常精鍊的，但要理解和運用它卻不很容易，尤其對於初學是如此。因此，我們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及其他後起者的著作加以較通俗的解釋。

我們在前面解釋辯證唯物論時，曾經指出「物質在先，精神在後，物質是本質是基礎，精神是物質的產品或反映」，換句話說，精神是物質運動和變化的反映。所以歷史唯物論首先認定，人類社會的基礎是諸生產資料所由構成的物質條件，即經濟基礎。因為人類生活在社會之中，第一件絕頂重要的事情，便是取得必要的生活資料來維持自身的存續。人類在從事任何精神生活或政治活動之前，必須先滿足衣食住等生活資料的需要，而這類生活資料又必須由生產來完成。但要生產，又首先需要一定的生產力。所以要瞭解社會的經濟基礎，得先從分析生產力開始。

所謂生產力，就是指勞動、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而言。「勞動首先是人類與自然間的一種過程，是人類以自己的行為來

媒介、調節、並統制他與自然間的物質交替的一種過程。…他因為要能適應於自己的生活形態去佔有自然物，便運動其肉體的種種自然力，自臉、腳、頭、手等，他由於這種運動而作用於外部的自然，並變化它，同時又變化自己的性質。他展開自己性質所蘊蓄著的各種潛伏力，而統制這些力的活動。」「勞動工具，是勞動者用來放在他自己與勞動對象之間而傳導他的活動於其對象的一物或諸物的複合體，勞動者為要依照他的目的將這些東西當作作用於他物的手段而起作用，就利用這些東西的機械的、物理的及化學的種種屬性」。至於勞動對象，則包括自然所提供的一切現成的及加工的可能變成為人類生活資料的對象在內。簡言之，勞動是人類勞動力的運動形態，是主體；勞動對象工具是人類勞動力所作用的和將使之變化的實物，是客體；而勞動工具則是人類勞動藉以作用和變化勞動對象的手段。人類以自己的勞動力運用勞動工具作用於勞動對象時，就發生出生產物質生活資料的活力，這便是生產力。所以勞動、勞動工具及勞動對象是生產力的三個絕對必需的要素，缺乏其中的任何一個，生產是絕對無法進行的。

生產力的三個要素中，尤以勞動工具會有能動的和增產的性質。動物也曾經向自然取得生活的資料，但牠僅僅運用其自然的器官（如嘴和爪等），從自然取得純粹的現成物而已。人類卻能製造並運用勞動工具，把自然所提供的現成物加以改變或改造，使之適合於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弗蘭克林下人的定義時說：「人是製造工具的動物」。這就等於說，人類與動物之根本的區分，即在前者能製造並運用勞動工具以從事於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而人類特有的社會生活，正是由於這種「生產」建立起來的。由此證明，勞動工具，首先是將人類從動物界分離出來的一種動力和標尺。

如果從生產力的發展來說，勞動工具更演著動力與標尺的作用。因為勞動工具每一進步，即要提高生產力，改變生產方式，因而推動社會向前進展一步。例如人類最初的農業，只是以木棒或石器在燒去柴草的原野裡挖穴，放入種子，而常因雜草叢生，以致生產很低。迄至青銅器，尤其是鐵器發明後，並以之配合著牛隻為動力而進行耕種時，生產就大大地提高了。到了現代發明各種曳引機，配合著化學肥料之後，農業生產更達到驚人的高度。在工業方面，這情形愈是明顯。例如以中世紀的手搖紡紗機與現代的電力紡紗機來比較，棉花和勞動力都是差不多的，但獲益於勞動工具的進步，其生產的提高便大為今非昔比了。所以馬克思說：「勞動工具的遺物對於已經被消滅的經濟的社會組織之認識，與遺有的構造之對於已經消滅的動物種屬的身體組織的認識，是同樣重要的。區別經濟上各時代的東西，不是什麼東西被製造出的一件事，而是怎樣的、用怎樣的勞動將勞動工具去造出的一件事。勞動工具，不但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還是勞動所由實行的社會諸關係的指示器。」正因此，我們從歷史所遺留下來的石器、青銅器和鐵器等勞動工具的研究，便可以認識這些勞動工具所屬的歷史時代的社會生產狀況及其社會組織等的情形。

一定的生產力會產生一定的生產關係。但什麼是生產關係呢？抽象地說來，生產關係就是在生產過程中所造成的各種複雜關係的總和。所謂生產過程，就是整個社會的勞動之結合的過程，是社會的分工與合作的過程。任何社會，當生產社會生活的資料時，都必須依照一定的生產方式，把社會各個成員組織起來實行分工與合作。無論在每一個產業的各個部門之間，在各產業的相互之間，以及在各工業與各農業之間等，都必須有一定的分工與合作來相互交換其人力與物

力，保持一定的相互間的平衡。沒有此種分工與合作，社會是無法進行生產的。但正因為有此種必需的分工與合作，也就產生了一定的生產關係。但生產關係，不僅僅是以生產過程中所直接產生的分工與合作的關係為限，一般所謂分配關係、消費關係及交換關係亦包括其中。因為在生產進行之前，便必須有生產手段（即勞動工具與勞動對象）的分配，在生產進行時又必須有人員的分配，最後，在生產完成時，又必須有生產物的分配。而且人員和生產物的分配，是由生產手段的分配所決定的。例如：生產手段如為資本家所有，則生產過程中對一切人員（從經理到職工）的支配權及對一切生產物的處理權，都必然為資本家或其代理人所操縱。消費關係，包括從生產手段的消費，勞動力的消費到生產物的消費這三種關係。這三種關係，不但與生產絕對相聯系，而且一般地也是為生產本身所決定的。交換關係，從生產手段的交換，勞動力的交換和生產物的交換，更明顯地是生產發展到了一定程度的產物，是由生產所決定和發展出來的。例如現代的商業，表面上好像是一種獨立的社會業務，但實際上不過是代替生產機關擔負批發或零賣的交換任務而已。即以支配著生產的銀行業來說，表面上只好像是站在生產之外的，但實際上也只是生產的會計作用及其資金的調節作用之一種擴大體。無論是商業或銀行業，沒有生產是根本無法存在的，反之，如果生產方法有了根本的改變，如生產手段的完全社會化與勞動的社會化結合起來的生產方法，則產業和銀行業務的廢止，而生產還是依舊進行的。總而言之，生產關係是包含了分配關係、消費關係及交換關係等在內，是這些關係的總和。這總和便形成了社會的經濟基礎。

在生產關係中起決定作用的是佔有關係，用法律的術語來說，就是財產關係。此種財產關係的前提是由生產手段的

分配所決定的，如果從另一方面說，是由生產方法所決定的。所謂生產方法，便是指生產手段與勞動力結合的方法。如果生產手段歸公有，以公有的生產手段與勞動力結合的生產方法，是平等的生產方法，在這種方法下所產生出來的生產關係也是平等的。如果生產手段屬於個人私有，則在私有的生產手段與勞動力結合起來的生產方法，只是敵對的生產方法，因而由此所產生的生產關係也是敵對的。古代奴隸制的，封建制的，以及現代資本主義制的社會，便是敵對的生產關係所支配的。

在敵對的生產關係中，由於生產手段的佔有關係，又產生了階級關係。所謂階級，便是在敵對的生產方法下，由於某一社會集團當中，佔有生產手段，而另一社會集團則被剝奪了這種生產手段，以致前者能利用其生產手段的獨佔權，剝削後者的剩餘勞動而生活而致富。因此，在經濟利益上便形成了互相對立和矛盾的階級。更明白地說，「階級是由於人們在歷史的特定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由於他們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由於他們在社會勞動組織的活動，由於依怎樣方法並在什麼程度下去領受財富中所能處理的部份等，而互相區別的人的大集團。總而言之，一定的社會經濟制度中，各社會集團對於生產手段的差別地位，乃是階級差別的基礎。在勞動組織例如在古代奴隸社會中，由於生產手段（如土地及手工場等）及奴隸歸奴主所有，便產生了奴主與奴隸的對立；在封建社會，由於封建領主佔有土地，便形成了封建地主與農民，或農奴主與農奴的對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由於資本家佔有生產機關，而工人除了兩隻勞動的手外一無所有，於是形成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但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生產手段的獨佔者和完全被剝奪者的兩大階級之間，還有與生產手段發生某種關係的各層人，如小

農、小手工業者、小商人及各種類自由職業者等，這便是小資產階級所由形成的各種社會成份。

階級關係，一方是特定的社會生產關係所產生的後果，同時又是一定的上層政治結構所由產生的根因。因為一經有了社會階級的對立，階級利害的矛盾，便自然產生階級的衝突，因而形成政治的結構，這就是說，佔有生產手段的階級，爲了維護它的特殊利益，便必然要創造出一種強制的權力，藉著維持社會安寧或公共秩序的名義，來鎮壓被剝奪了生產手段的階級的反抗。這種強制的權力的體現，便是國家。「它（國家）不過是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社會的產物。它是這個社會陷於不可解決的自相矛盾、分裂爲不可融合的對立、而又無力排除這種對立的一種宣告。然而爲使這個對立，經濟利益相反的兩個階級，不把自身和社會消滅於無益的鬥爭之中，那防止軋轢，保持於『秩序』的界限以內、表面上超出社會之上的權力，就成爲必要。這種由社會產生，卻又超出社會之上而離社會愈遠的權力，就是國家」(恩格斯)。於是，佔有生產手段的階級，通過國家機關成爲統治者，而喪失生產手段的階級則變成了被統治者。因此，國家是在敵對的階級關係上建立起來的，是一階級統治別階級的一種工具。

但國家並不是抽象的，它本身包含有具體的物質力量。從各種政府機關、法院、監獄、獄卒、員警、憲兵，直至軍隊，都是國家的真實的物質力量。而且單是這些物質的力量是不夠的，還必須有種種的法律來約束被統治者。所謂法律，表面上雖是關於人民權利和義務的種種規定，實際上卻是關於保障財產和維持公共秩序的種種規定。換句話說，法律的主要作用，不過是保障既存的財產關係而已。

國家既是社會發展至一定階段的產物，因而它也依著社會發展的階段不同而產生各種不同的國家形態。如古代奴隸

的，中世紀封建的及現代資本主義的國家等。但不管國家的形態怎樣不同，其本質總是在保障在生產上佔支配地位的那個階級的利益，是鎮壓被支配者的工具。不過國家愈是往後發展，其結構愈是複雜，其作用愈加擴大而已。像現代的資本主義國家，不但包含有各種各式的行政、司法和武力等機構，而且還有政黨、立法、教會及學校等。

總而言之，由階級的對立而產生的法律和政治機構（由國家所體現的），便是社會的上層建築之一。也可以說，是直接立足於社會經濟基礎上的上層建築。

但社會的上層建築物，不單是政治的，還有意識的領域。我們前面曾說過，意識是社會實在的反映，而社會的實在，又包括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政治結構在內，因而意識便是反映經濟和政治結構的更高的上層建築物了。

但社會的意識也有各種各樣的形式，這種社會意識的形式，便是社會的意識形態。社會的意識形態，以普通的社會心理為其構成的原始因素。但要這些原始的社會心理因素結成爲意識形態，必須經過洗鍊、抽象化、系統化、然後結晶起來，升華起來。正因此，意識形態乃是社會的最高上層建築物，離下層基礎是比較遠的。

社會的意識形態，由於所反映的方面不同，因而也就有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如法律、道德、宗教、科學、藝術乃至哲學等。這些不同的意識形態，有的是直接從勞動過程中，即人類對於自然的鬥爭過程中，反映出來的。有的是直接從財產關係中反映出來的，如民法及商法等。但有的間接地並綜合反映了各種社會關係，如道德、宗教、藝術及哲學等。

因爲社會的意識形態既是各種社會關係之反映，到了社會發生階級分化和矛盾時，意識形態因而也就包含了階級的成份。尤其是法律、道德、宗教、社會科學、藝術和哲學，

所包含的階級成份最多而最深。甚至自然科學，一經離開純技術性的領域而轉到理論的領域時，也往往充滿了階級的成見（即統治階級的成見）。

---

# 彭述之選集

## 第四卷

二〇一〇年四月第一版

---

出版：十月書屋  
地址：香港郵政總局 10144 號信箱  
國際書號：

---

定價：港幣八十元